

共产主义者
同盟
文件和资料

I

137
4162-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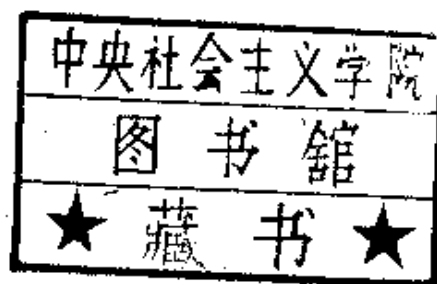
D11-67

共产主义者同盟 文件和资料

I



200129896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共产主义者同盟文件和资料

I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译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海淀路39号)

民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850×1168毫米32开 印张：27.25 插页4

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

字数：613 000 册数：精装本 1—1 200

*

ISBN 7-300-00427-X

D·43 定价：13.10元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

编辑委员会

(按姓氏笔划排列)

主 编	林基洲	谢 韬	
副主编	王 颖 (常务)	校纪英 (常务)	
编 委	杨云若	杨光远 (常务)	宋洪训
	张文焕	张中云	林 海
	高 放		

• • • •

参加本卷译校工作的有：蒋仁祥、朱中龙。

参加本书编辑出版工作的有：王颖；陈丹（责任编辑）；祝东平（封面设计）；李英（技术设计）。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

总 序

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们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创立了同当时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相区别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随后这一思想体系被越来越广大的群众所接受，在世界很多国家里逐渐发展成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而这种运动是由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共产党领导的，从一开始就具有国际性，这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建立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时提出了伟大战斗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草拟的党纲《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但是，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时也承认：“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

自从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立以来，各国无产阶级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在相互影响、相互支持中前进，历经胜利和失败、成功和曲折，终于不断突破资本主义链条上一个又一个薄弱环节，在许多国家取得了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现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正在不断发展中。

百余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积存了浩繁的文献档案，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产。这些文献档案，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研究工作信而有征，具有极重要的意义。1984年春，由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发起，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和近代史研究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中共中央党校和中国人民大学共同组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编辑委员会，集中力量编译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国际工人协会）、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共产国际）以及几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这五个国际组织已发表的全部文献档案。文献选材包括各个国际组织历次代表大会、重要会议的记录、决议和有关文件，力求搜集齐全。凡外国有选编完整的版本者，采用

外国版本；文件散见于外国不同版本者，由我们统一编译。文件完全按原件翻译，不作任何修改删节，译文力求准确，以便让读者直接接触完整的第一手材料，了解各个国际组织的历史本来面目，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初步估计全部文献约两千多万字，从1986年起陆续出版。

这部文献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担负繁重的出版工作，承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各研究单位、高等院校大力支持，谨表衷心感谢。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

编 辑 委 员 会

1985年12月

出版说明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它制订的纲领《共产党宣言》，开辟了国际工人运动的新纪元。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萌芽，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一个极好的革命学校”，培养了第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积累了宝贵的革命经验，写在同盟纲领旗帜上的理论原则，一直是国际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指南。

《共产主义者同盟文件和资料》，是根据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和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集体编辑的（编者：海尔维·费尔德尔、马丁·洪特、叶菲姆·康捷尔、索菲亚·列维奥娃）、柏林狄茨出版社出版的德文本（Der Bund der Kommunisten, Dokumente und Materialien, Redaktion: Herwig Förder, Martin Hundt, Jefim Kandel, Sofia Lewiowa, Dietz Verlag Berlin）编译的。德文本分三卷出版，第1卷1970年初版，1983年再版，第2卷1982年出版；第3卷1984年出版。

这本文件汇编力求全面、完整地反映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面貌，即反映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同盟的组织者和领袖的卓越活动，反映同盟从中央委员会到各支部的活动，尤其是反映同盟本身的内部发展、它的公开活动和它的成员在日益广泛的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中的活动情况。因此，本书的选材尺度很宽，力求做

到最大限度的完备性。同时注意了选材的精练，在不损害有关材料原有政治内容的情况下，删去其中意义不大、重复、离题太远的段落。本书收入了1836—1852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全部历史的有关文件和资料，主要是：（1）同盟中央委员会的纲领、章程和通告信，还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著作和书信的摘录；（2）考虑到同盟是一个秘密组织，同盟盟员一般只能在他们可以给以影响的工人组织和民主团体的范围内公开活动，因此，本书收入了一些同盟在其中有着相当影响的组织（如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科伦工人联合会、民主派兄弟协会以及英国宪章派等）的文件，这些文件是同盟活动的佐证；（3）同盟盟员的回忆录，以及在一些重要事件根本没有同盟本身的文件作证明或没有其他来源的材料的情况下，收入了当时记述一些国家政府的镇压活动的资料，如被捕者供词等。这本文件汇编为研究国际工人运动这一光辉青春时期的历史提供了基础。

本书发表的文件中，手稿资料无论按篇幅还是内容来说，都占有重要位置。这些手稿，首先是书信，其中大量是其他人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来自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向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提供的拷贝。其他记述同盟活动的书信以及一些文字资料，是在民主德国几个档案馆里发现的。在联邦德国、瑞士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档案馆里也找到一些重要资料。其中有大量材料是第一次发表的。除手稿外，还有大量印刷材料（小册子、传单以及今天已经难得见到的报章杂志中所发表的呼吁书、声明、报告和文章等），这些印刷材料也多半是第一次重新发表。

文件均按年代顺序编排（一般按写作日期或发表日期编排），

加上序码，并根据同盟历史的各个重要发展阶段汇编成若干章。

每个文件的篇末都注明原件的出处；原件是手稿，注明“手稿”字样；第一次发表的手稿，则注明“第一次发表”字样。

对原件所作的删节，均用删节号加方括号（〔……〕）表示，并在篇末注明“节录”字样，从较长的文件中摘出较短的段落，则注明“摘要”字样。

凡是今天还常用的缩写予以保留，凡是明显可以补齐的缩写予以补齐（补齐的部分加方括号）。

脚注对文件正文作简短的说明和补充，注释说明资料情况和解释有关内容，并包含有从其他资料中摘取的一些补充材料；在第2、3卷中，还有大量迄今未曾立传或立传不详的那些同盟盟员或者接近同盟的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参加者的活动的注释。

中文本略去德文本导言和各章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和书信，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中已发表者，一律存目，不印正文。此外，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将编索引专卷，本书索引从略。

目 录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41—261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86—206页)

第 一 章

正义者同盟的产生及其发展

(1836—1844年)

1. 卡尔·马克思论正义者同盟 (1836—1846年)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463—464页)
2. 威廉·魏特林论正义者同盟的产生 (1836—1839年) 1
3. 海尔曼·艾韦贝克论正义者同盟的产生 (1836—1840年) 3
4. 关于正义者同盟的产生——正义者同盟和流亡者同盟盟员的供词摘录 (1836—1838年) 4
5. 正义者同盟章程 (1838年) 9
6. 卡尔·沙佩尔《财产公有》一文草稿 (1838年) 16
7. 威廉·魏特林论《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一书的写作和出版 (1838年) 28

8. 威廉·魏特林《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一书摘录 (1838年)	29
9. 关于30年代末正义者同盟的发展——正义者同盟和流 亡者同盟盟员的供词摘录 (1838—1840年)	32
10. 关于正义者同盟参加巴黎四季社的起义 (1839年5月 12日)	39
11. 关于正义者同盟汉堡支部的建立。卡尔·弗里德里 希·霍夫曼的一篇供词的摘录 (1839年底至1840年 初)	40
12. 弗里德里希·门特尔关于正义者同盟的供词(1840— 1845年春)	41
13. 巴黎罢工裁缝帮工的呼吁书 (1840年7月)	51
14. 威廉·魏特林发表在《吁助德国青年》上的呼吁书 (1841年9月)	55
15. 安得列阿斯·谢尔策尔(巴黎)给威廉·魏特林(日 内瓦)的信 (1841年11月15日)	57
16. 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委员会反对《德意志人 民报》的声明 (1841年12月16日)	60
17. 威廉·魏特林为正义者同盟盟员入盟仪式规定的方 针 (1842年)	64
18. 威廉·魏特林为共产主义者在瑞士各工人团体中进 行活动而制定的组织计划 (1842年)	66
19. 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委员会为《年轻一代》 写的通讯 (1842年3月21日)	69
20. 格尔曼·莫伊勒(巴黎)给埃蒂耶纳·卡贝(巴黎)	

的信（1842年6月1日）	72
21.西蒙·施米特（洛桑）给威廉·魏特林（斐维）的 信（1842年9月16日）	73
22.奥古斯特·贝克尔（日内瓦）给威廉·魏特林（斐 维）的信（1842年9月24日）	74
23.威廉·魏特林（斐维）给正义者同盟某成员（苏黎 世）的信（1842年10月9日）	75
24.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威廉·魏特林（斐维） 的信（1842年10月26日）	78
25.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为《年轻一代》写的通 讯（1842年11月5日）	80
26.威廉·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摘录（1842 年底）	82
27.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西蒙·施米特（洛桑） 的信（1842年12月5日）	84
28.格尔曼·莫伊勒（巴黎）给威廉·魏特林（斐维） 的信（1842年12月11日）	86
29.奥古斯特·贝克尔（洛桑）给威廉·魏特林（斐维） 的信（约1842年12月中旬）	87
30.正义者同盟章程（残稿）（约1843年1月）	87
31.塞巴斯蒂安·载勒尔（莫拉特）给西蒙·施米特（洛 桑）的信（1843年1月2日）	89
32.奥古斯特·贝克尔（洛桑）给威廉·魏特林（斐维） 的信（约1843年1月中旬）	91
33.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威廉·魏特林（斐维）	

的信（1843年1月31日）	92
34. 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威廉·魏特林（斐维） 的信（约1843年2月）	94
35. 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威廉·魏特林（斐维） 的信（1843年2月19日）	95
36. 正义者同盟人民议事会一位成员（巴黎）给威廉· 魏特林（斐维）的信（1843年2月21日）	100
37. 洛伦斯·彼得逊（洛桑）给威廉·魏特林（伯尔尼 附近的朗根塔尔）的信（约1843年4月初）	104
38. 奥古斯特·贝克尔（日内瓦）给威廉·魏特林（苏 黎世）的信（1843年5月6日）	106
39. 佐美尔（洛桑）给威廉·魏特林（苏黎世）的信 （1843年5月7日）	108
40. 伦敦法国民主协会会议记录摘录（1843年5月8日和 15日）	111
41. 康拉德·特雷布斯（洛克尔）给威廉·魏特林（苏 黎世）的信（1843年5月8日左右）	113
42. 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威廉·魏特林（苏黎 世）的信（1843年5月15日）	114
43. 巴黎正义者同盟人民议事会的公开信——答布伦奇 里的报告（1843年8月29日）	116
44. 伦敦正义者同盟盟员的公开信——答布伦奇里的报 告（1843年9月10日）	117
45. 弗里德里希·马尔滕斯（汉堡）给威廉·魏特林（马 格德堡）的信（1844年8月4日）	118

46. 关于威廉·魏特林同汉堡正义者同盟盟员会晤的供词摘录（1844年8月20日左右）120
47. 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给《德意志电讯》编辑的信（1844年9月21日）121
48. 关于伦敦欢迎威廉·魏特林大会的报道（1844年9月22日）124

第二章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的开端——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正义者同盟的进一步发展

（1844—1846年底）

49. 卡尔·马克思论他与正义者同盟领导人的最初联系（1844年）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464页）
50. 卡尔·马克思论工人的联合（1844年）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40页）
51. 卡尔·马克思关于西里西亚织工起义的文章（1844年7月31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82—483、487、488页）
52. 卡尔·马克思（巴黎）给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布鲁克贝格）的信（1844年8月11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49—451、452—453页）

53. 卡尔·马克思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1844年8月底9月初）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4—45、66、107页）
54.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门）给卡尔·马克思（巴黎）的信（1844年10月初）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5—8页）
55. 威廉·魏特林（伦敦）给卡尔·马克思（巴黎）的信（1844年10月18日）128
56. 关于伦敦各民族民主之友的一次大会的报道（1844年10月19日）129
57. 洛桑工人联合会给巴塞尔裁缝帮工的信（1844年11月8日）131
58.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门）给卡尔·马克思（巴黎）的信（1844年11月19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9—11页）
59. 汉堡工人教育协会成立大会筹备会议记录（1844年12月30日）134
60.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门）给卡尔·马克思（巴黎）的信（1845年1月20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7—19页）
61. 弗里德里希·马尔滕斯（汉堡）给格奥尔格·韦森巴赫（巴黎）的信（1845年2月10日）135
62.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门）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5年2月22日至3月7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22—26页）

63.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的关系
（1845年3—5月）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12—513、526—527、529页）
64. 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讨论（1845年2月18日
至1846年1月14日）136
65. 弗里德里希·门特尔关于伦敦正义者同盟的供词
（1845年4月至夏天）166
66. 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
塞尔）的信（1845年6月）169
67. 海尔曼·克利盖（伦敦）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
尔）的信（1845年6月9日）170
68. 关于筹建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的会议的报道（1845
年8月20日左右）172
69. 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
塞尔）的信（1845年8月31日）173
70.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关于建立民主派兄弟协会在伦
敦举行的国际大会的文章（1845年9月22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62—676页）
71. 威廉·魏特林（伦敦）给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
希·恩格斯和莫泽斯·赫斯（布鲁塞尔）的信
（1845年9月22—27日）175
72. 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
塞尔）的信（1845年10月31日）177
73. 格奥尔格·范贝尔（基尔）给卡尔·马克思（布鲁
塞尔）的信（1845年11月22日）178

74.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真正的”社会主义（1846年初）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54—655、659页）
75. 弗里德里希·门特尔关于正义者同盟在柏林的活动及其共同巴黎和伦敦的联系的供词（1846年）……179
76. 罗兰特·丹尼尔斯（科伦）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6年1月30日）……202
77. 关于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成立六周年纪念活动的报道（1846年2月9日）……203
78. 罗兰特·丹尼尔斯（科伦）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6年3月7日）……210
79. 关于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的一次会议的报道（1846年3月15日和17日）……214
80. 乔治·朱利安·哈尼（伦敦）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布鲁塞尔）的信（1846年3月30日）……218
81. 巴·瓦·安年柯夫关于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一次会议的报道（1846年3月30日）……223
82.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关于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一次会议的报道（1846年3月30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109—111页）
83. 威廉·魏特林（布鲁塞尔）给莫泽斯·赫斯（斐维）的信（1846年3月31日）……226
84. 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关于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一次大会的报道（1846年4月14日）……229
85. 约瑟夫·魏德迈（希尔德舍）给卡尔·马克思（布

- 鲁塞尔)的信(1846年4月30日)235
86. 正义者同盟一领导成员(伦敦)给海尔曼·克利盖
(纽约)的信(1846年5月1日)238
87. 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菲力浦·日
果(布鲁塞尔)给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巴
黎)的信(1846年5月5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64—166页)
88. 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反对海尔曼·克利盖
出版的《人民代言者报》的通告(1846年5月11
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8—20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第86—102页)
89. 约瑟夫·魏德迈(希尔德舍)给卡尔·马克思(布鲁
塞尔)的信(1846年5月14日)241
90. 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
塞尔)的信(1846年5月15日)243
91. 罗兰特·丹尼尔斯和亨利希·毕尔格尔斯(科伦)
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1846年5月
15日)246
92. 古斯塔夫·阿道夫·克特根(爱北斐特)的通告
(1846年5月24日)249
93. 莫泽斯·赫斯(斐维)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
的信(1846年5月29日)251
94. 罗兰特·丹尼尔斯和亨利希·毕尔格尔斯(科伦)
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约1846年5

- 月底6月初)253
95. 伦敦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
尔)的信(1846年6月6日)255
96. 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给爱北斐特共产主义
小组的信(1846年6月15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3—25页)
97. 罗兰特·丹尼尔斯(科伦)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
尔)的信(1846年6月24日)260
98. 亨利希·楚劳夫(爱北斐特)给弗里德里希·恩格
斯(布鲁塞尔)的信(1846年6月28日)261
99. 约瑟夫·魏德迈(贝克罗德)给卡尔·马克思(布
鲁塞尔)的信(1846年6月28日)265
100. 弗里德里希·门特尔(柏林)给弗里德里希·奥古
斯特·贝伦兹(马格德堡)的信(1846年6月29
日)266
101. 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
塞尔)的信(1846年6月30日)267
102. 罗兰特·丹尼尔斯(科伦)给卡尔·马克思(布鲁
塞尔)的信(1846年7月初)268
103. 一位社会主义者(布雷斯劳)给威廉·沃尔弗(布
鲁塞尔)的信(约1846年7月)270
104. 格奥尔格·维贝尔(基尔)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
讯委员会的信(1846年7月3日)273
105. 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给英美工人阶级的信(1846年
7月4日)275

106.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摘录（1846年夏）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9、83—84、535—538、544页）
107. 罗兰特·丹尼尔斯（科伦）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6年7月17日）277
108. 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给菲格斯·奥康瑞尔的信（1846年7月17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7—29页）
109. 伦敦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1846年7月17日）278
110. 乔治·朱利安·哈尼（伦敦）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1846年7月20日）287
111. 关于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的一次大会的报道（1846年7月20日）288
112. 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6年7月22日）289
113. 威廉·沃尔弗对西里西亚社会主义者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所作的摘录（约1846年7月底）290
114. 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6年7月27日）292
115. 莫泽斯·赫斯（科伦）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6年7月28日）294
116. 格奥尔格·维贝尔（基尔）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

讯委员会的信（1846年8月1日）	295
117. 亨利希·毕尔格尔斯（科伦）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6年8月11日）	297
118. 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6年8月14日）	300
119. 亨利希·毕尔格尔斯（科伦）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约1846年8月中旬）	303
120.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6年8月19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36—37页）	
121.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黎）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1846年8月19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0—41、43、44页）	
122. 约瑟夫·魏德迈（里达）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6年8月19日）	304
123. 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6年8月20日）	306
124. 卡尔·沙佩尔（伦敦）给正义者同盟一盟员（莱比锡）的信（1846年8月28日）	307
125. 卡尔·沙佩尔（伦敦）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1846年9月初）	308
126. 卡尔·沙佩尔为《普罗米修斯》写的通讯（1846年9月）	310
127. 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关于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的公开信（1846年9月13日）	312

128.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黎）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
通讯委员会的信（1846年9月16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4—48、49—51页）
129.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
鲁塞尔）的信（1846年9月18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55、57—59页）
130. 关于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成立一周年纪念活动的报
道（1846年9月21日） 317
131.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
鲁塞尔）的信（1846年10月18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67—68页）
132.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黎）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
通讯委员会的信（1846年10月23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69—74页）
133.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
尔）的信（1846年10月23日左右）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75—77页）
134. 正义者同盟人民议事会告同盟书（1846年11月） 323
135. 伦敦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
委员会的信（1846年11月11日） 329
136.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
鲁塞尔）的信（1846年12月底）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78—82、84页）
137. 约瑟夫·魏德迈（希尔德舍）给卡尔·马克思（布
鲁塞尔）的信（1847年1月8日） 335

第三章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创建及其纲领

《共产党宣言》的制定

(1847年1月至1848年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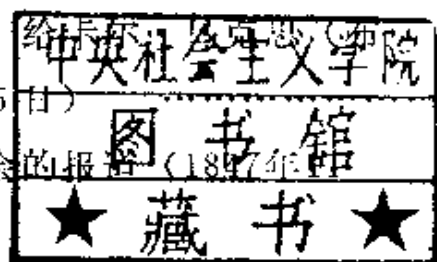
138. 伦敦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 (1847年1月20日) 337
139. 正义者同盟人民议事会告同盟书 (1847年2月) 338
140. 关于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成立七周年纪念活动的报道 (1847年2月8日) 345
141.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共产主义者在普鲁士联合省议会召开以后的任务 (1847年2—3月)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6—65页)
142. 卡尔·马克思 (布鲁塞尔) 给罗兰特·丹尼尔斯 (科伦) 的信 (1847年3月7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89—490页)
143.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巴黎) 给卡尔·马克思 (布鲁塞尔) 的信 (1847年3月9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89—90、91—92页)
144. 卡尔·马克思 (布鲁塞尔) 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巴黎) 的信 (1847年3月15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95—96页)
145. 海尔曼·艾韦贝克 (巴黎) 给卡尔·马克思 (布鲁塞尔) 的信 (1847年6月) 347

146. 章程草案
 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1847年6月9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419—423页）
147. 共产主义信条草案
 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1847年6月9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73—380页）
148. 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致同盟盟员的通告信（1847年6月9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424—437页）
149. 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给汉堡支部的信（1847年6月24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438—440页）
150. 卡尔·马克思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发展（1847年7月初）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7—158、195—198页）
151. 约瑟夫·魏德迈（哈姆）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7年7月7日） 348
152. 斯蒂凡·波尔恩关于他以特使身分而作的瑞士之行的回忆摘录（1847年7月底至10月中） 350
153. 卡尔·马克思所作的关于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布鲁塞尔支部和区部的记录（1847年8月5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71页）
154. 关于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成立和发展的报道

- (1847年8月底至10月底) 351
155. 亨利希·毕尔格尔斯(科伦)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7年8月30日) 353
156. 《共产主义杂志》试刊号, 第1期(1847年9月初) 356
157. 约瑟夫·魏德迈(哈姆)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7年9月1日) 383
158. 卡尔·马克思的文章《〈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一文摘录(1847年9月5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07、210、220—221页)
159. 安得列阿斯·哥特沙克(科伦)给莫泽斯·赫斯(布鲁塞尔)的信(1847年9月5日) 385
160.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1847年9月14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441—457页)
161. 关于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成立两周年纪念活动的报道(1847年9月20日) 386
162.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一文摘录(1847年9月26日至10月3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97、300—303、305—306、311—312、315页)
163. 斯蒂凡·波尔恩《海因岑的国家》一书摘录(1847年9月底) 388
164.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布鲁塞尔)给卡尔·马克思(荷兰)的信(1847年9月28日和30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98—108页)

165. 派尔·约特雷克《论无产阶级及其通过真正的共产主义获得解放》一书摘录(约1847年10月至11月)390
166. 维克多·特德斯科(列日)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7年10月初)400
167. 奥托·吕宁(里达)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7年10月5日)402
168. 莫泽斯·赫斯《无产阶级革命的后果》一文摘录(1847年10月10日)404
169. 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给布鲁塞尔区部的信(1847年10月18日)405
170. 巴黎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反对卡尔·海因岑的声明(1847年10月24日)410
171.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7年10月25—26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08—109、111、113—115页)
172. 卡尔·马克思《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一文摘录(1847年10月28日至11月25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31—332、346—347、355页)
173.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10月底至11月底)411
174. 安得列阿斯·哥特沙克(科伦)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7年11月5日)432
175. 关于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成立大会的报告(1847年11月)437



- 月7日和15日)434
176.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7年11月14—15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17—119页)
177.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7年11月23—24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20—124页)
178. 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告瑞士人民书(1847年11月29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468—470页)
179.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关于纪念1830年波兰革命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大会的报道(1847年11月29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13—415页)
180.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演说记录摘要(1847年11月30日和12月7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471—476页)
181.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1847年11月29日至12月8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04页)
182. 弗里德里希·列斯纳回忆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摘自《一八四八年前后》1898年版)(1847年11月29日至12月8日)436
183.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

(1847年12月8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72—577页)

184. 卡尔·马克思(伦敦)给巴·瓦·安年柯夫(巴黎)的信(1847年12月9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97页)
185. 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给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信
(1847年12月初) 438
186. 关于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的一次大会的报道(1847年12月13日) 441
187. 乔治·朱利安·哈尼(伦敦)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7年12月18日) 443
188. 关于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一次会议的报道(1847年12月20日) 444
189. 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给伯尔尼瑞士联邦议会的信(1847年12月21日) 445
190. 关于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新年庆祝活动的报道(1847年12月31日) 447
191. 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名单
(1848年初) 451
192. 约瑟夫·魏德迈(哈姆)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8年1月2日) 454
193. 关于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的一次大会的报道(1848年1月3日) 456
194. 关于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一次大会的报道(1848年1月9日)

-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478页)
195.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8年1月14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25—128页)
196. 约瑟夫·魏德迈(哈姆)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8年1月17日)457
197.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8年1月21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29—130页)
198.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决议(1848年1月24日)458
199. 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给法国无产者的信(1848年1月31日)459
200. 关于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成立八周年纪念活动的报道(1848年2月7日)463
201. 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委员会给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的
信(1848年2月13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78—580页)
202.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8年2月底)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65—504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0—286页)

第四章

革命时期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及其 在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中的活动

(1848年2月至1849年7月)

203.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黎的革命》一文摘录
(1848年2月27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47—548页)
204.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布鲁塞尔的革命事件和威廉·沃尔弗的被捕 (1848年2月27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68—69页)
205. 共产主义者同盟阿姆斯特丹支部给伦敦中央委员会的信 (1848年3月2日) 477
206.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关于将其所在地从布鲁塞尔迁往巴黎的决议 (1848年3月3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86—587页)
207. 《人民的要求》(科伦共产主义者的传单) (1848年3月3日) 479
208. 关于巴黎的一次德国民主主义民众大会的报道
(1848年3月6日) 480
209. 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支部给巴黎中央委员会的信
(1848年3月8日) 483
210.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布鲁塞尔)给卡尔·马克思

- (巴黎)的信(1848年3月8—9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33—134页)
- 211.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区部会议记录(1848年3月8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88—589页)
- 212.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区部会议记录(1848年3月9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90—591页)
- 213.《人民的要求》(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的传单)(1848年3月10日左右) 486
- 214.卡尔·马克思(巴黎)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布鲁塞尔)的信(1848年3月12日左右)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35页)
- 215.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给巴黎中央委员会的信(1848年3月15日) 488
- 216.卡尔·马克思(巴黎)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布鲁塞尔)的信(1848年3月16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36—137页)
- 217.燕妮·马克思(巴黎)给约瑟夫·魏德迈(哈姆)的信(1848年3月17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624—625页)
- 218.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布鲁塞尔)给卡尔·马克思(巴黎)的信(1848年3月18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38—140页)
- 219.罗兰特·丹尼尔斯(科伦)给卡尔·马克思(巴黎)的信(1848年3月19日左右) 492

220. 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给巴黎中央委员会的信
 (1848年3月22日) 496
221. 共产主义者同盟布鲁塞尔总区部给巴黎中央委员会
 的信 (1848年3月22日) 498
222. 格奥尔格·维尔特 (科伦) 给卡尔·马克思 (巴
 黎) 的信 (1848年3月25日) 499
223. 安得列阿斯·哥特沙克 (科伦) 给莫泽斯·赫斯
 (布鲁塞尔) 的信 (1848年3月26日) 501
224.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 (1848年3月27日左右)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5页)
225. 卡尔·沙佩尔 (伦敦) 给巴黎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
 委员会的信 (1848年3月28日) 503
226. 弗电德里希·安内克 (科伦) 给弗里茨·哈马赫
 尔 (埃森) 的信 (1848年3月28日) 506
227. 关于柏林工人俱乐部成立的报道 (1848年3月30
 日) 507
228. 共产主义者同盟某个盟员 (巴登) 给巴黎中央委员
 会的信 (1848年3月底) 509
229.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反对巴黎德意志民主协
 会的声明 (1848年3月底)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8—7页)
230.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巴黎) 给埃
 蒂耶纳·卡贝 (巴黎) 的信 (1848年3月底)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6页)
231. 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从巴黎返回德国的报道

- (1848年3月31日) 510
232.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收付款单据 (1848年
4月2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第484—485页)
233. 美因兹工人教育协会告全体德国工人书 (1848年4
月5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575—576页)
234. 弗里德里希·列斯纳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参加
伦敦宪章派的示威游行的回忆 (摘自《一八四八
年前后》1898年版) (1848年4月10日) 511
235. 亨利希·楚劳夫 (爱北斐特) 给莫泽斯·赫斯 (科
伦) 的信 (1848年4月10日) 512
236. 约翰·席克耳 (美因兹) 给卡尔·马克思 (科伦)
的信 (1848年4月14日) 513
237. 科伦工人联合会给美因兹工人教育协会的信 (1848
年4月14日) 515
238. 海尔曼·艾韦贝克 (巴黎) 给莫泽斯·赫斯 (科
伦) 的信 (1848年4月16日) 516
239. 路易·海尔贝格 (伦敦) 给莫泽斯·赫斯 (科伦)
的信 (1848年4月17日) 517
240. 威廉·沃尔弗 (布雷斯劳) 代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
央委员会给卡尔·瓦劳等人 (美因兹) 的信
(1848年4月18日) 521
241. 弗·阿·贝尔格曼 (累根斯堡) 给共产主义者同盟
中央委员会的信 (1848年4月21日) 526

242. 共产主义者同盟美因兹支部给科伦中央委员会的信
 (1848年4月23日)529
243. 阿道夫·克路斯(美因兹)给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
 中央委员会的报告(1848年4月23日左右)534
244. 美因兹工人教育协会以德意志工人联合会临时中央
 委员会名义给科伦工人联合会的信(1848年4月
 23日)535
245. 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给莫泽斯·赫斯(科伦)
 的信(1848年4月24日)537
246. 卡尔·马克思(科伦)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
 门)的信(1848年4月25日以前)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41页)
247.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门)给卡尔·马克思(科
 伦)的信(1848年4月25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41—143页)
248. 卡尔·沙佩尔(维斯巴登)给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
 中央委员会的信(1848年4月26日)539
249. 恩斯特·德朗克(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给卡尔·马
 克思(科伦)的信(1849年4月29日)540
250. 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区部给科伦中央委员会的信
 (1848年4月30日)543
251. 恩斯特·德朗克(科布伦茨)给科伦共产主义者同
 盟中央委员会的信(1848年5月5日)545
252.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门)给卡尔·马克思(科
 伦)的信(1848年5月9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44—145页）

253. 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区部会议记录（1848年5月11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577页）

254. 斯蒂凡·波尔恩（柏林）给卡尔·马克思（科伦）的信（1848年5月11日）547

255. 恩斯特·德朗克（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给卡尔·马克思（科伦）的信（1848年5月15日）549

256. 恩斯特·德朗克（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给卡尔·马克思（科伦）的信（1848年5月17日）551

257. 科伦工人联合会给哈瑙工人联合会的信（1848年5月20日左右）552

258. 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卡尔·马克思（科伦）的信（1848年5月21日）553

259. 斯蒂凡·波尔恩撰写的社论（1848年5月25日）554

260. 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给科伦工人联合会的信（约1848年5月底）557

261.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和〈新莱茵报〉（1848—1849年）》（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7—26页）

262. 《新莱茵报》编辑委员会的声明（1848年6月1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13页）

263.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法兰克福议会》一文摘录

- (1848年6月1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14页)
264. 海尔曼·艾韦贝克等人(巴黎)给莫泽斯·赫斯
(巴黎)的信(1848年6月5日)559
265. 《新莱茵报》刊登的《法兰克福激进民主党和法兰克福派的纲领》一文摘录(1848年6月7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7页)
266. 科伦工人联合会给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信
(1848年6月12日)560
267. 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给科伦中央委员会的报告
(1848年6月18日)561
268. 《北极星报》刊登的关于《新莱茵报》出版的报道
(1848年6月24日)565
269. 柏林工人代表大会的邀请书(1848年6月26日)566
270.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关于巴黎六月起义的《六月二十五日》一文摘录(1848年6月29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151—152页)
271. 卡尔·马克思关于巴黎六月起义的社论(1848年6月29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153—157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9—303页)
272. 《新莱茵报》刊登的关于科伦工人联合会领导人被捕的消息(1848年7月3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180页)
273. 民主派兄弟协会关于六月起义的呼吁书摘录(1848

- 年7月4日)569
- 274.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给科伦工人联合会的信
(1848年7月4日)569
- 275.朱利安·哈尼为《新莱茵报》撰写的文章摘录(1848年
7月5日)571
- 276.亨利希·弥勒(科伦)给莫泽斯·赫斯(巴黎)的
信(1848年7月5日)572
- 277.科伦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1848年7月6
日)573
- 278.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莫泽斯·赫斯(巴
黎)的信(1848年7月10日)575
- 279.科伦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1848年7月13
日)576
- 280.关于卡尔·沙佩尔在科伦工人联合会作报告的报道
(1848年7月17日)578
- 281.《新莱茵报》对柏林工人代表大会纲领的看法
(1848年7月25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299—300页)
- 282.科伦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1848年7月31
日)579
- 283.关于召开莱茵地区各民主团体第一届代表大会的通
知(1848年8月4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580页)
- 284.关于卡尔·马克思在科伦民主协会全体会议上反驳
威廉·魏特林的报道(1848年8月4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第500页)

285. 科伦莱茵省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会议记录摘录
(1848年8月13—14日)580
286. 科伦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1848年8月17
日)583
287. 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给柏林工人代表大会的信
(1848年8月17日)584
288. 汉堡圣乔治工人联合会授予卡尔·毕林参加柏林工
人代表大会的全权证书(1848年8月17日)588
289. 科伦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1848年8月28
日)588
290. 关于卡尔·马克思在维也纳第一届工人联合会会议
上作演说的报道(1848年8月30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588页)
291. 关于卡尔·马克思1848年9月2日在维也纳第一届
工人联合会会议上发表演说的报道(1848年9月
2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第505页)
292.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比利时的死刑判决(1848年
9月3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47—450页)
293. 科伦工人联合会全体会议记录(1848年9月3
日)590
294. 巴黎德意志协会的呼吁书(1848年9月10日)595
295. 科伦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1848年9月11日) ...596

296. 关于在科伦法兰克广场民众大会和选举科伦安全委员会的报道 (1848年9月13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591—592、594页)
297. 科伦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 (1848年9月14日)597
298. 关于沃林根民众大会的报道 (1848年9月17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19页)
299. 卡尔·马克思《科伦革命》一文摘录 (1848年9月25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97页)
300. 《新莱茵报》刊登的关于科伦即将举行戒严的消息 (1848年9月26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92页)
301. 约瑟夫·莫尔 (伦敦) 给科伦工人联合会的信 (1848年10月10日)599
302. 《新莱茵报》编辑部关于复刊的声明 (1848年10月12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93页)
303. 科伦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 (1848年10月26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602—603页)
304. 科伦工人联合会给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的信 (1848年10月19日)603
305. 科伦工人联合会全体会议记录 (1848年10月22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604页)

306. 卡尔·马克思（科伦）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日内瓦）的信（1848年10月26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45页）
307. 社会问题委员会在柏林第二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848年10月30日）604
308. 海尔曼·艾韦贝克（柏林）给莫泽斯·赫斯（巴黎）的信（1848年11月1日）609
309. 科伦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1848年11月2日）611
310. 科伦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1848年11月6日）612
311. 卡尔·毕林受德国工人汉堡地区委员会的委托给莱比锡中央委员会的信（1848年11月12日）612
312. 卡尔·马克思（科伦）给斐迪南·拉萨尔（杜塞尔多夫）的信（1848年11月13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509—510页）
313. 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关于拒绝纳税的呼吁书（1848年11月14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24页）
314. 海尔曼·艾韦贝克（科伦）给莫泽斯·赫斯（巴黎）的信（1848年11月14日）614
315. 卡尔·马克思（科伦）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洛桑）的信（约1848年11月中）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46—147页）
316. 科伦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1848年11月16

- 日)615
- 317.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呼吁书(1848年11月18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286—297页)
- 318.科伦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1848年11月23日)616
- 319.雅科布·沙贝利茨(巴塞尔)给莫泽斯·赫斯(巴黎)的信(1848年11月25日)619
- 320.卡尔·马克思(科伦)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伯尔尼)的信(1848年11月29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48—149页)
- 321.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约1848年11月底12月初)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72—577页)
- 322.卡尔·布龙(汉堡)给约翰·菲力浦·贝克尔(俾尔)的信(1848年12月2日)621
- 323.A.里德尔(列日)给卡尔·马克思(科伦)的信(1848年12月5日)623
- 324.洛桑工人联合会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出席伯尔尼工人代表大会的委托书(1848年12月8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681—682页)
- 325.瑞士的德国工人联合会中央委员会(伯尔尼)给三月同盟理事会(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信(草稿)(1848年12月11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516—517页)
- 326.弗兰茨·施彭格勒(慕尼黑)给格奥尔格·基克

- (莱比锡)的信(1848年12月17日)624
327. 奥古斯特·格贝尔特(伯桑松)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伯尔尼)的信(1848年12月21日)625
328. 瑞士的德国工人联合会中央委员会(伯尔尼)给斐维工人联合会的信(草案)(约1848年12月25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511—514页)
329. 弗·施洛特尔贝克(拉绍德封)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伯尔尼)的信(1848年12月29日)629
330. 卡尔·马克思的新年献词《革命运动》(1848年1月1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73—175页)
331. 科伦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1849年1月15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687—688页)
332. 约瑟夫·魏德迈(达姆施塔特)给卡尔·马克思(科伦)的信(1849年1月22日)630
333. 尤利乌斯·李西格诺洛(曼海姆)给伯尔尼德国工人联合会的信(1849年1月23日)632
334. 《新莱茵报》关于布鲁塞尔民主派兄弟协会举行宴会的报道(1849年1月28日)634
335. 《新莱茵报》关于海德堡工人联合会地区代表大会的报道(1849年1月28日和29日)635
336. 科伦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1849年1月29日)636

337. 卡尔·马克思（科伦）给恩斯特·德朗克（巴黎）的信（1849年2月3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519—520页）
338. 科伦工人联合会全体会议记录（1849年2月4日）640
339. 《新莱茵报》关于缪尔海姆工人联合会举行宴会的报道（1849年2月11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692页）
340. 卡尔·德斯特尔（莱比锡）给卡尔·马克思（科伦）的信（1849年2月12日）641
341. 科伦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1849年2月15日）642
342. 关于汉堡工人教育协会成立四周年紀念活动的报道（1849年2月21日）644
343. J. P. 施米茨（宾根）给卡尔·马克思（科伦）的信（1849年2月22日）645
344. 《新莱茵报》关于科伦纪念法国二月革命一周年宴会的报道（1849年2月24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693—694页）
345. 科伦工人联合会全体会议记录（1849年2月25日）647
346. 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卡尔·马克思（科伦）的信（1849年2月26日）649
347. 恩斯特·德朗克（巴黎）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科伦）的信（约1849年3月初）651

348.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科伦）给雅科布·沙贝利茨（巴塞尔）的信（1849年3月8日）652
349. 佐林根民主联合会给马克思、弗莱里格拉特、恩格斯、沙佩尔和沃尔弗（科伦）的邀请信（1849年3月11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第516页）
350. 维尔腾堡工人联合会中央委员会（乌尔姆）给斯图加特工人联合会的信（1849年3月11日）654
351. 弗兰茨·施彭格勒（慕尼黑）给莱比锡德国工人中央委员会的信（1849年3月12日）655
352. 《新莱茵报》关于科伦为纪念三月革命举行宴会的报道（1849年3月19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695—696页）
353. 威廉·沃尔弗《西里西亚的十亿》一书摘录（1849年3月22日至4月25日）656
354. 共产主义者同盟一支部主席（柏林）给奥古斯特·黑策尔（柏林）的信（约1849年3月底）661
355. 共产主义者同盟柏林总区部给伦敦中央委员会的信（1849年3月底）661
356. 卡尔·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摘录（1849年4月5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473—474页）
357. 科伦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决议（1849年4月11日）662
358. 关于民主协会莱茵区域委员会会议的报道（1849年

4月14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609页)

359. 科伦工人联合会全体会议决议 (1849年4月16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607页)

360. 科伦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决议的摘录 (1849年4月17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608页)

361. 科伦工人联合会第一分会反对安得列阿斯·哥特沙克的决议 (1849年4月22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699—701页)

362. 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工人联合会临时委员会召开代表大会的通知 (1849年4月24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703—704页)

363. 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给斯图加特工人联合会的信 (约1849年4月底至5月初)663

364. 科伦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 (1849年5月1日)665

365. 乔治·朱利安·哈尼 (伦敦) 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科伦) 的信 (1849年5月1—2日)666

366. 《新莱茵报》告科伦工人书 (1849年5月4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560—561页)

367. 卡尔·马克思在汉堡为卡尔·布龙开具的前往布雷斯劳的介绍信 (1849年5月6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0卷第408—409页)

368. 《新莱茵报》关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参与组织爱北斐特武装反抗的报道 (1849年5月10—15日)

-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596—599页)
369. 卡尔·马克思关于《新莱茵报》被查封的文章
(1849年5月19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600—603页)
370. 《新莱茵报》告科伦工人书 (1849年5月19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619页)
371. 科伦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 (1849年5月21日)668
372. 弗里德里希·列斯纳回忆科伦工人联合会在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期间的活动 (1849年5月中以后)670
373.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一文摘录 (1849年5月中至7月)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29—131、164、171—172、175—176、178、183—184、189、217—219页)
374. 《新莱茵报》编辑部反对《西德意志报》的声明 (1849年5月31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603页)
375. 卡尔·马克思 (巴黎) 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凯则尔斯劳顿) 的信 (1849年6月7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54—156页)
376. 奥斯渥特·狄茨 (弗兰肯塔尔—普法尔茨) 给弗里德里希·卡尔·海特尔 (维斯巴登) 的信 (1849年6月8日)671
377. 卡尔·沙佩尔在伊德施坦全邦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849年6月10日)672

378.科伦工人联合会全体会议记录（1849年6月18日）	676
379.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科伦）给卡尔·马克思（巴黎）的信（1849年6月22日）	677
380.关于科伦工人联合会纪念六月起义一周年宴会的报道（1849年6月25日）	678
381.弗·格吕贝尔（汉堡）给卡尔·马克思（巴黎）的信（1849年7月2日）	679
382.恩斯特·德朗克（巴黎）给约瑟夫·魏德迈（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信（1849年7月25日左右）	682
383.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斐维）给燕妮·马克思（巴黎）的信（1849年7月25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525—527页）	
384.彼得·格尔哈德·勒泽尔1853—1854年关于1848—1849年革命时期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供词摘录	683
附 录	
a.流亡者同盟章程（“山岭”章程或“营地”章程）（约1834—1835年）	691
b.流亡者同盟章程（“一般”章程）（约1834—1835年）	699
c.传单《流亡者同盟信条》摘录（1834年春）	705
d.传单《流亡者同盟告德国人民之友书》摘录（1834年春）	707
e.泰奥多尔·舒斯泰尔《一个共和党人的思想》一文摘录（1835年）	709
注 释	713

第一章

正义者同盟的产生及其发展

(1836—1844年)

2

威廉·魏特林论正义者同盟的产生

(摘自《和谐与自由的保证》第3版《序言》)

1836—1839年

自由、平等，曾经是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战斗口号。自由、平等、正义，也曾经是1830年之后在巴黎的德国人中少数共和主义者的战斗口号。但是什么样的自由？什么样的平等？它们是怎样规定的？哪些属于个人的部分，这一部分又怎样来衡量？关于这些问题，从最高的理想直到实行累进税都谈到了。一份特别出色的杂志《流亡者》——它是由大约200名德国劳动者出资一直在巴黎出版到1835年的一份月刊——可以为当时的德国共和主义者中的最激进的政治态度提供一个概况。在这个杂志上发表意见的人有费奈迭、莫伊勒和舒斯泰尔博士，舒斯泰尔的论文《一个共和党人的思想》向前走得最远，提出的运动目的也最为明确。这些共和主义的思想也是舒斯泰尔博士的最后的政治思想。¹ 我们推想，他从那时起就退出了政治舞台。很可能，他也在与他具有相同思想的那个小圈子里找到了他的橄榄山和他的哥尔各

塔里。 [……]

当巴黎的德国共和党人从1837年起，通过他们的核心发动了关于财产共有共享原则的口头的和手写传单的宣传并且取得部分胜利之后，许多方面向这个组织的委员会提出建议，印刷一些证明财产共有共享的可能性的宣传品。 [……]

由于共有共享原则的拥护者和反对者都提出了上面这个要求，在同盟的委员**韦森巴赫**和**霍夫曼**热心支持下，并经委员会审查，出版了一本小册子《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它是1838年底在巴黎出版的，发行了2 000册。为了筹措印刷费，当时有少数几个志同道合的人表现了令人深受感动的牺牲精神。有些人腾出住房，另一些人在夜间担任排字、印刷和装订的工作，另一些人出钱，甚至在没有钱的时候把他们的表送进了当铺。

从这时起，为了传播共产主义而在巴黎努力活动的，在德国人中，著名的有**莫伊勒**，而首先是阿伦斯，这个德籍俄国人多年来就把这看作是自己的任务，以他的才能和热忱献身于事业，而对自己的功绩和报酬则表现出十分谦让淡泊，并且竭力支持别人的工作，特别是他认为对这个事业更有能力和贡献更大的人。可惜有这种品德的人不多，但是没有这种品德也就不可能产生任何深入的运动。

从巴黎发起的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潮流，通过劳动者的迁徙流动，在1839年已经面向德国国内发展。1840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被破获的一个政治秘密组织被认为是共产主义倾向同激进的共和主义倾向的杂拌儿，这个结论至少可以从下面的事实中得出：在许多被告那里都搜查到上面提到的那本共产主义小册子。 [……]

① 参看文件9。

威廉·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1849
年汉堡第3版序言第X—XIII页；参看
1979年商务印书馆版第299、300页

摘要

3

海尔曼·艾韦贝克论正义者同盟的产生

（摘自《德国和德国人》1851年版）

1836—1840年

[……] 在巴黎，从19世纪30年代初开始，民主宣传就已十分活跃；反动的路易-非力浦的警察当局未能把外国民主派连根铲除；这个民主派在巴黎的代表路德维希·白尔尼、雅科布·费奈迭（来自科伦）和舒斯泰尔博士²，千方百计同法国、意大利和波兰的领导人建立联系。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们在巴黎创建了德国秘密的**流亡者同盟**；但是，同盟不久就分裂为两派：社会主义派以**正义者同盟**的名义宣布独立存在，另一派还是按照纯政治的、反社会主义的德国爱国主义的狭隘原则继续活动。德国正义者同盟是由格尔曼·莫伊勒医生（莱茵普鲁士人）、亨利希·阿伦斯（俄国里加人）以及其他一些德国人（有的是著作家，有的是工人）创建的。**正义者同盟**盟员几乎全是德国和瑞士的工人，后来又有佛来米、匈牙利和斯堪的那维亚的一些工人相继加入。每个盟员必须掌握德语。普通教材是格尔曼医生等人用德文编写的。严格的道德行为是由章程，而更多的是由大家的团结友爱精神维系的。他们还经常同侨居在法国、瑞士、英国、荷兰等国的德国兄弟保持通信联系。卡贝公民的原则从一开始就成了正

义者同盟的社会主义原则。³ [……]

海尔曼·艾丰贝克《德国和德国人》1851
年巴黎版第588—589页

摘要

4

关于正义者同盟的产生——正义者同盟和流亡者同盟盟 员的供词摘录⁴

1836—1838年

a. 奥古斯特·福茨^①（阿尔歇恩）

[……] 我们本应在大会上表明我们对人权和公民权的看法，可是，在我们的帐篷从一开始^②就出现争论，原因是有人要求我们绝对服从上级，而且还声明，最高领导机关不由选举产生。对此，我们竭力表示反对，我们不愿意绝对服从，并宣布这种做法是荒谬的。否则，说不定最高领导机关就可能利用我们去对付一切。我们一再力劝执行委员会收回成命，而只要求较高的领导机关做到绝对服从就行了。[……]

《关于流亡者同盟、正义者同盟和德国人同盟以及在它们以前的所谓人民同盟等革命组织的调查结果汇编》[1841年美因河

摘要

第一次发表

① 1841年1月6日的审讯。机械师福茨于1832年秋天在巴黎参加了德意志人民同盟，接着先后加入了流亡者同盟和正义者同盟；1840年在巴登前埃滕海姆被捕。

② 指流亡者同盟成立以后，即约1834年底到1835年初。

畔法兰克福油印版] (梅泽堡德国中央档案馆, Rep.77, Tit.509, Nr.47, Bd.2)

b. 威廉·亨利希·约瑟夫·恩克^①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 我在这里住了较长一段时间以后, 约两年半到三年以前, 这位马克^②曾到这里来看望过我。他告诉我, 流亡者同盟内部已发生分裂, 还说分裂是由我上述提到的那个粪门引起的, 此人曾同舒斯泰尔博士发生纠葛。至于分裂的原因, 我过去并不清楚。脱离流亡者同盟的那些人, 据马克对我说, 后来组成了正义者同盟, 马克也加入了正义者同盟。当他为正义者同盟比别人多做了一点工作并稍有一点名气以后, 向我提到了一个叫莫伊勒的人; 我只记得莫伊勒是个读书人, 至于他的详细情况我一点也不了解。除了这个人以外, 马克还特别提到粪门也加入了同盟。[……]

梅泽堡德国中央档案馆, Rep.77, Tit.509,
Nr.47, Bd.2 (副本)

摘要

c. 卡尔·哈特曼^③ 汉诺威

[……] 他离开巴黎以前, 即大约一周前, 他的上司即高等

-
- ① 1840年12月12日的审讯。裁缝师傅恩克于1834年秋天在巴黎加入流亡者同盟, 此后不久, 成了帐篷的领导人; 1835年11月, 他回到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流亡者同盟的组织, 并在附近地区得到了发展; 到1839年为止, 他一直是该组织的领导人。
- ② 恩克在前面说过, 拜洛伊特的白铁匠施彭格勒·马克曾从巴黎到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找过他。
- ③ 1840年10月1日的审讯。书籍装订工哈特曼是1834年深秋在巴黎加入流亡者同盟的。从1836年9月到1837年3月底离开巴黎为止, 他曾是一个营地的主席; 1840年在自己的家乡汉诺威被捕。

法院^①的成员龚门^②曾坦率地告诉他，同盟已分裂成两派，而且部分是由他的煽动引起的。因此，同盟分裂在即。也就是说，像龚门告诉他的，他和其他一些人不能容忍章程强加于他们的“绝对服从”，要求修改章程。

在这些日子里，还有一个从希尔德斯海姆来的排字工人，名叫戈德施米特，此人是兄弟俩中的哥哥；他来找他，并说明自己是上级高等法院或区营地的成员，最后还直率地对他说，龚门再也不能发号施令了。[……]

梅泽堡德国中央档案馆，Rep.77,Tit.509,
Nr.47,Bd.1 (副本)

摘要

第一次发表

d.克利斯蒂安·弗里德里希·威廉·施泰 特尔^③ (斯图加特)

[……]施泰特尔也引证说，关于对上级组织绝对服从这个问题的争论，一度是导致巴黎流亡者同盟分裂的起因，因为许多人都决定，只有同他们的信念相一致的情况下他们才能绝对服

① “高等法院”是“总营地”或“区营地”的旧称。

② 在1840年10月11日的审讯中，哈特曼供称：“他担任营地主席并以主席身分从高等法院那里接受命令期间，作为上级高等法院的代表首先认识了机械师，这里的康拉德·诺伊贝尔，约在1836年米迦勒节[即9月底]诺伊贝尔走了以后，又认识了从科伦附近来的排字工人龚门。”(梅泽堡德国中央档案馆，Rep.77,Tit.509,Nr.47,Bd.1)

③ 排字工人施泰特尔是巴黎流亡者同盟盟员，后为正义者同盟盟员，1840年底或1841年初在斯图加特被捕；对施泰特尔的审讯记录没有保存下来，这里和其他一些地方使用的资料来自普鲁士邦议会驻法兰克福公使给司法大臣的报告复制件，后者又把复制件转给了内务大臣。1841年4月6日的报告又一次提到了施泰特尔的供词。

从，并且已把这个决定通过山岭的主席转告上级机关。此后不久的一天，舒斯泰尔博士、费奈迭和龚门列席了施泰特尔的帐篷会议，并作为中心的代表警告帐篷成员要开展活动，和睦相处，绝对服从；后来，虽然又举行了几次帐篷会议，但组织的分裂这时已不可避免。鉴于章程中规定的绝对服从这一要求，章程中关于武装的条款就成了空话，因为最高领导机关就能决定组织成员去干诸如向萨瓦进军^①一类的蠢事。〔……〕

梅泽堡德国中央档案馆，Rep.77, Tit.509,
Nr.47, Bd.3 (副本)

摘要
第一次发表

e. 约翰·罗伯特·亚历山大·威纳尔^② (莱比锡)

〔……〕1837年6月20日，他在木匠帮工雅科布·勒克尔的劝导下，〔参加了流亡者同盟〕。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1837年6月20日，星期二晚9时，在我的心中升起了一个新的太阳”。——以前，他曾力图对这个新太阳作别的解释。宣誓完毕后有人对他说：“那就去看看你的兄弟们吧”。——于是，他见到了排字工人戈德施米特（哥哥）、汉诺威的木匠帮工布兰德斯（入盟仪式就是在他的家里举行的）、勒克尔、汉堡的木匠施特赖特（据说他已定居巴黎），还有一个书籍装订工贝克尔。戈德施米特任帐篷主席，布兰德斯任书记，贝克尔任司库。〔……〕在威纳尔入盟后约两周参加的第二次帐篷会议（这次会议也是在

① 指马志尼领导的1834年1月至2月的徒劳尝试，即从瑞士进军萨瓦并在意大利北部地区举行起义，德国流亡者也参加了这次进军。

② 根据普鲁士邦议会公使1841年8月26日的报告，机械师威纳尔是1837年夏天在巴黎加入流亡者同盟的，1838年春又加入正义者同盟。

布兰德斯家举行的)上,戈德施米特没有想到,突然来了个同盟三人委员会,其中一人是中心的成员,名叫卡托,是排字工人,另一人是营地的成员,名叫马蒂亚斯,是贴面板剪裁工;他们三人同戈德施米特进行激烈的争论,起因是他们提议推翻中心,最后双方不欢而散,戈德施米特从此脱离同盟,只有贝克尔同他一起离开了,并带走了帐篷的储金。

接着,委员会的一个成员以及布兰德斯谈及了中心的专横和独断,有人说,中心的意图是想滥用德国人为法兰西共和国进行革命;有人说,绝对服从是苛求;还有人说,中心主张,将要建立的德意志国家只需一个人为首脑,即只要一个独裁者或皇帝^①,而人们普遍要求首脑必须由多人组成;于是,这个帐篷决定脱离中心,后来,其他一些帐篷也相继脱离了中心。在1837年整个夏天,一直到11月,都未出现什么新的组织^②;威纳尔由于患眼病住进了医院,当他1838年春天出院时,得知正义者同盟已经建立。^③ [……]

梅泽堡德国中央档案馆, Rep. 77, Tit. 509,
Nr. 47, Bd. 2 (副本)

摘要
第一次发表

f. 卡尔·弗里德里希·霍夫曼^④ (汉堡)

[……] 流亡者同盟的分裂,如上所述,主要是由龚门和迈

① 在其他一系列供词中,也有要求一个皇帝的类似说法。

② 在另一次审讯中,威纳尔说:“流亡者同盟的分裂是在1837年7月发生的。”参看普鲁士邦议会公使1841年4月27日的报告(梅泽堡德国中央档案馆, Rep. 77, Tit. 509, Nr. 47, Bd. 3)。

③ 关于威纳尔加入正义者同盟的情况以及在同盟中的活动,参看文件9b。

耶尔引起的。这是1838年春他们同舒斯泰尔闹翻以后的事。他们首先把章程（其中明文规定要绝对服从上级的命令）搞得尽人皆知⁵，这样，他们便轻而易举地争取了许多拥护者，同时把流亡者同盟的四位首脑——舒斯泰尔博士、戈德施米特（哥哥）、石版印刷工人穆沙尼和多次提到的裁缝贝克尔搞得声名狼藉，后来便建立了正义者同盟。〔……〕

汉堡国家档案馆，C1840,Nr.567,Bd.4

摘要

第一次发表

5

正义者同盟章程⁶

1838年

德国正义同盟章程⁵

这个在施泰因大臣的文件中发现的章程不失为一件杰作，在此奉献给读者，以便有效地参照执行。

德意志共和国印刷所。

1838年7月于慕尼黑⁶

④ 1841年3月15日的审讯。木工霍夫曼1834年在瑞士参加“青年德意志”，1834年10月12日到巴黎，并加入了流亡者同盟，后来又加入了正义者同盟；在同盟中担任领导工作（参看文件9a.），并建立了一个正义者同盟的支部（参看文件11），1839年10月14日离开巴黎，1840年在汉堡被捕。

⑤ 第一次印刷为：正义者同盟章程。

⑥ 这个说明显然是在于掩盖真相，第一次印刷时可能没有印，当时的其他文件上也有类似的说明，如流亡者同盟山岭章程。

前 言

每次吸收新盟员，均有两人委员会负责，委员会人选由支部委派。

支部通过决定吸收某人入盟后，发展对象首先应该宣誓保守同盟秘密。然后向发展对象介绍同盟的组织机构和宗旨。如果发展对象同意这么做，则于预定日期引他到举行仪式的地方，向他介绍盟章盟规。如果发展对象表示承认盟章盟规，则立刻宣誓。如果发展对象要求给时间重新考虑，可以让他回去，但必须向他提出警告：如果违背了庄严的严守秘密的诺言，那他就逃脱不了同盟的报复。

正义同盟、支部、区部、人民议事会等等名称，应该告知发展对象，但有关这些组织的识别标志，只有当他作了如下宣誓后，才能使其知晓。

誓 词

我忠诚宣誓：严守同盟秘密，忠于组织，为实现其崇高目标而准备作出牺牲。如果我违背了誓言，我情愿遭受耻辱和……^①

第一章 同盟的性质、宗旨、组织机构

第 1 条 德国正义同盟由德国人组成。德国人，就是指那些使用德语、保留德国风俗习惯的人。

第 2 条 德国正义同盟是一个绝对秘密的组织。

第 3 条 同盟的宗旨是使德意志从可耻的压迫桎梏中获得解放，

^① 此处遗漏“死亡”一词。

并促进全人类的解放，实现人权和公民权。

第4条 同盟下设支部和区部。

第5条 同盟的首脑机关是人民议事会。

第二章 盟员

第6条 凡被吸收入盟的人均为同盟盟员；依法被判刑事罪而未被开除盟籍者，仍为同盟盟员。

第7条 入盟的必备条件是：

a. 无可指责的生活方式、刚毅的性格、勇敢、善于保密、有牺牲一切的精神和为实现同盟宗旨而进行不倦的、同时又是谨慎细致的工作；

b. 承认组织原则；

c. 说明生活资料的来源；

d. 忠诚老实，保证自己没有参加或从属任何其他政治组织；

e. 一致通过为支部成员；

f. 进行忠诚宣誓。

第8条 凡属下列情节者，均应开除盟籍：

a. 泄露同盟秘密者；

b. 犯有一贯性的不道德行为者；

c. 在履行同盟义务过程中，经常玩忽职守者；

d. 顽固反对组织原则或拒绝实现同盟的目标者；

e. 人民事业的利益所要求开除者。

第9条 开除，可能使被开除者招致耻辱并不排除随之而来的各种惩罚。

第10条 开除的决定，必须由犯错误者所属支部以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并由有关的区部批准。

第11条 每个盟员都必须服从同盟的法规。但因为不能强迫任何人做违背自己的信念和良心的事，所以，在提出的申诉经支部、区部和人民议事会详细审查，证明理由充分的情况下，准许不履行这种义务。

第12条 同盟成员之间完全平等，亲如兄弟，遇有危险和困难，要互相帮助，在任何危急关头，要互相支持，关心盟员中失去父母的亲属等等，这些都应看成是对祖国、对人类应尽的义务。

第13条 每个盟员在入盟时，都必须自定一个战斗的化名。

第三章 支部

第14条 支部由至少五人、至多十人组成。超过十人的支部要重新划分。

第15条 支部极其重要的意义是：吸收那些行为符合道德标准的人参加同盟，并以此来巩固组织；保证对群众的才智和思想感情施以良好影响。其次，对自己的成员要言传身教，振奋其精神；支持和鼓励人民群众痛恨暴政的情绪；尽可能地传播那些旨在准备和加速改变德国，乃至全人类命运的著作和学说；密切关注那些享有激进派名声的人的行动，促进舆论更多地建立在正义原则的基础上，而不要建立在个别人物和权威的意见的基础上；揭露那些两面派，他们在对人民友爱的幌子下，在道德和智慧等美丽词藻的掩饰下，散布的却是奴役和贫困。最

后，既要时刻准备捍卫无辜者，又要经常准备惩处犯罪者。

第16条 每个支部设主席和助手各一名，由支部选举产生。他们的工作对支部负责。主席主持会议，决定议事日程，安排发言顺序，宣读会议记录摘要，负责选举事项，宣布会议开始和结束。在没有委派专门主席时，主席在任何情况下都代表支部。助手负责文书工作，作会议记录和宣读记录，负责财务，收集会费。助手还被授权监督主席的工作，必要时代替主席。由于这个原因，他应被介绍认识区部的一位成员。

第17条 每个支部都设储金处，负责收纳盟员的会费。只有支部才有权支配储金处的款项。同盟领导机关有某种专门需要时，只能请求拨给部分款项。划分支部时，储金处的款项亦应作相应的划分。

第18条 各支部之间相互保密。

第19条 各支部都有自己选定的专门称号。

第四章 区 部

第20条 一个区部包括至少五个、至多十个支部。

第21条 区部所辖支部的支部主席组成该区的区部。

第22条 区部的职责是：负责同盟的法规得以在本区贯彻执行；负责所领导的各支部的安全；安排各支部的工作，并对其决议施加影响；为各支部在其会议上进行适当的活动，提供必要的材料。总的来说，为促进各支部的前进和发展，促进解放的伟大时刻的迅速到来，应该做必须

做的工作。

第23条 人民议事会所在地的区部的职责范围，还包括对人民议事会工作的监督，但监督任务由专门的委员会执行。区部对人民议事会的工作，只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向同盟负责。

第五章 人民议事会

第24条 人民议事会是同盟的中央权力机关，至少由五名成员组成。由于组织的扩大，人民议事会成员的名额亦可作相应的扩大。

第25条 人民议事会由其所在地的区部选举产生，其所在地由人民议事会自行决定。

第26条 区部如果是由两人组成，则选两名成员进入人民议事会，区部如果是由三人或三人以上组成，则选一名代表进入人民议事会。

第27条 被选入人民议事会的成员，有权另行自选一名或两名组织成员参加人民议事会。

第28条 人民议事会的每个成员，只对自己的选民公开。

第29条 由三人组成的常设委员会是人民议事会同其他盟员之间的通讯联络部门，它负责处理和答复盟员来信等事务。该委员会在人民议事会附近，设有自己的固定联络点。委员会只对人民议事会中的两名成员公开。

第30条 人民议事会应该做到：使各级组织遵守同盟的各项法规；促进同盟的发展，保护同盟的安全；利用一切可能，不仅在本国，而且在有德国侨民的其他国家，扩大

同盟组织；最后，要采取一切适当手段来促使同盟宗旨的实现。

第31条 人民议事会的成员应该以自己的生命和荣誉，为履行自己庄严的义务，对区部负责。

第六章 立法

第32条 每个盟员都有立法提案权。

第33条 人民议事会要把所有立法提案转发给各区部。区部连同本身的审批意见再转发给各支部。支部审核提案并作出相应决定。支部把表决结果送交区部，区部再上报人民议事会。区部要重视各支部的多数意见，而同盟则考虑各区部的多数意见；区部负责支部表决意见的分类，人民议事会负责区部表决意见的分类。

第34条 因时间及其他原因，绝对不可能按上一条款中作出的规定行事时，人民议事会有权根据自己的信念和凭自己的责任心，颁布具有法规作用的指令。

第35条 旨在修改章程的提案，只能在每季度的前两周内提出。

第七章 一般规定

第36条 组织的所有权力机关，任期一年，每年5月份进行改选。此外，如当选者辜负选民信任，选民有权随时罢免。

第37条 每个组织的识别标志由人民议事会规定。

德译自德国中央档案馆，Rep.77.Tit.509.

6

卡尔·沙佩尔《财产公有》一文草稿⁷

1838年

财 产 公 有^①

伟大的时刻越来越临近了，两条尖锐对立的原则，即贵族的原则和民主的原则，将开赴战场对峙，开始一场殊死的斗争，只有其中一方被完全消灭，斗争才会结束。

在这以后，不是人类变得自由而幸福，充满人的尊严和喜悦感，互为兄弟，互为同父子女，人人相爱；就是——想起来就不寒而栗——只有主人和奴隶，皮鞭把最后一个竟然还敢于自己也享有权利的呻吟者打得再不敢吭气。我们目前最神圣的职责^②，就是使我们这些自称是正义者同盟盟员的人为伟大的民众觉醒时刻的到来做好准备，而不致对这个时刻的到来感到惊讶，以便知道该把什么东西打碎，如何以其他方式更好地建

① 这个脚注是沃·席德尔在第一次发表时放在括号内的补充说明。关于这个原件，席德尔说：“沙佩尔的草稿保存下来两个稿本。我们把它们称为A稿和B稿，我们将A稿同B稿作了比较后发现，B稿是在A稿的基础上作了修改和扩充的。”（B稿同A稿相比，只有几个地方作了删节和补充，此外删去了一些明显抄错的单词。）本书照B稿印刷，未作删减。凡与A稿有明显差异的有关段落作为脚注印刷。涉及原文行文方面的修改将作出说明，而修改标点的地方不作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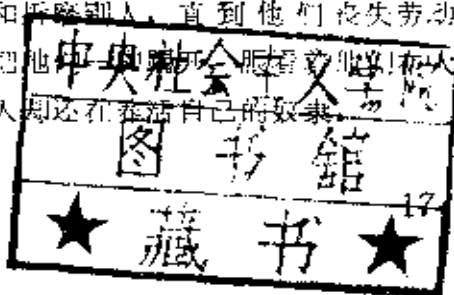
② B稿上删去了“职责”一词。

设。

不要以为我们会犯许多正在从事建立一个未来的共和国的爱国者所犯的错误，而不为革命的发生做一些工作。不会的。我坚决认为，在我们全部计划中斗争占据第一位，我们将带着武器和别人对峙^①。但十分必要的是，我们要认清和坚持我们的基本原则，我们要知道我们打算干什么，以免在战斗结束时，在我们为祖国和自由流了鲜血之后，披着羊皮的狼在报警的钟声四起时，从它们隐藏起来的角落里爬出来，用花言巧语从人民那里骗取人民花了极高代价换得的权利，以免我们摆脱了专制者的奴役之后又受金钱贵族和精神贵族的奴役。这两种奴役同样可恶。因为富有的利己主义者仅仅按人的财产来评价人，利用劳动阶级为其服务，并折磨他们，直至他们过早衰老，丧失劳动能力，然后，只要无损于自己的钱袋，就把他们一脚踢开，无情地让他们死于饥饿和困苦之中。^②精神贵族虽然想摆脱压在他们身上的妨碍他们从事科学工作的重负，但他们不考虑人民，以为他们装满书本知识的大脑比别人好一些，力图代替专制者给人类制定法律和统治人类。他们不希望人民拥有知识，他们也不想劳动，只想让人民去劳动，以便只有他们才有聪明才智，能够更顺当地牵着人民的

① A稿：“不要以为我也会犯我们的许多正在为未来的共和国制定宪法、刑法、民法和继承法的爱国者所犯的错误，而不为革命的发生做点工作。不会的。我把斗争列入了我们的全部计划的首位，我现在的和将来的斗争方式，将是手握钢枪上战场。”

② A稿：“因为富有的利己主义者在利用和折磨别人，直到他们丧失劳动能力。然后，只要无损于自己的钱袋，就把他们一脚踢开，无情地让他们死于饥饿和寒冷，而在专制制度下主人还在生活自己的奴隶。”



鼻子走。^① 金融贵族到处可见。在我们富裕的师傅和工厂主身上，我们工人每天都能看到他们。我们对金融贵族太熟悉了。当他们在德国吵吵嚷嚷的时候，人们还以为他们要发动一场斗争来使自己扬名天下。但是，只要联邦议会发几道威胁性的训令，他们马上就默不作声，表明自己是安分的仆人。^② 因此，不要以为我们仅仅要进行反对各邦君主的斗争。不是的，我们还要进行反对上述金融贵族和精神贵族的更为艰苦的斗争。这是更危险的斗争，因为这些人不是明火执仗地来掠夺我们，而是力图通过贿赂和阴谋夺走我们以血肉换得的自由和权利。因此，我们必须做好同这些人进行斗争的思想准备，确定我们坚信能促进人类幸福的基本原则，然后不左不右，不受这些人的叫嚷和诱惑干扰，开始从事我们伟大的事业。我打算把我坚信能够非常容易、非常可靠地实现人类幸福的原则阐述一下。我认为这些原则是正确的，我将在伟大的斗争中捍卫它们，直到生命最后一息。^③

我的坚定而热忱的信念是：只有当所有的人按民族生活在一个国家联盟中，所有的人对于占有和享受地球上的财富有完全平等的权利，所有的人平等地以任何一种方式为创造和保持大家共

① A稿：“精神贵族同前者几乎一样残暴，因为他们以为自己装满书本知识的大脑比别人好一些，而且不希望人民拥有知识，以便只有他们拥有高深的知识，出人头地，同时使人民相信，好像只有他们有聪明才智似的。当他们有新的材料来撰写历史或其他科学时，他们就认为人民只是被利用的东西。”

② A稿：“我们在暴奴的美国共和派身上看到了金融贵族的例子，而在我们德国学者身上看到了精神贵族的例子。”

③ A稿：“现在我试试简单阐述一下我的原则：我认为，根据我的原则能够非常容易、非常可靠地实现人类的幸福，如果我坚信我的原则是正确的，那么我就认为我的努力是会得到补偿的。”

同的福利而劳动时，也就是说当实行财产公有时，人类才能真正达到自由和幸福。①只有这样，自私自利这个自由的最凶恶的敌人才会被消灭，所有的人才会把自身看成一个大家庭的成员，并尽力促进相互的安乐。

财产公有是一个自由民主共和国的首要条件。没有这个条件，自由民主共和国是不可思议的，也是不可能的。②如果要保留个人财产，那么穷人将由于现在的财产分配极不平等而完全依附于富人。这样一来，法律在一个贵族共和国里会使富人享有比现在更多的自由，他们仅仅通过贸易和手工业就可以发财致富，并且越来越富。而民众最终只能干活谋生，并且必然成为他们富有的主人的奴隶。

如果想通过累进税或其他遗产法来防止攫取过多的财产，那么利己主义者用阴谋和欺骗仍可以攫取多得多的财产。生活得更好，劳动得更少，并且迟早从他们中间将产生一个专制者，把人类拖回到人类当今所处的状态。除恶务尽，要除根而不能只断枝，否则恶便会更加泛滥。

所有的人都必须平等劳动，又都有享受所创造的财富的平等

① A稿：“我的坚定而热忱的信念是：只有当我们带着现在的知识重新回到自然状态，也就是说，当我们所有的人对于占有和享受地球上的财富有完全平等的权利，当所有的人为创造所有人的共同利益而劳动时，当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时，当那些天生具备较多才华的人为了他们的同样也劳动、也生产生活必需品的兄弟的福利而利用地球上的财富时，一句话，当我们实行财产公有时，人类才能真正达到自由和幸福。”

② A稿：“如果我们想建立一个真正的自由的共和国，那么，财产公有就是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就不会有平等和真正的自由，独立共和国也是不可思议的，不可能的。”

权利，因为一个人，如果他劳动，从事某一生产或保存维持生计所必需的物品的行业，那么他对于共同福利来说就是必不可少的。人的生命就像钟表，即使缺少最小的齿轮，也要停止转动。同样，一个最小的行业如果停顿，我们就要吃苦，就不会有真正的福利。既然所有从事生产和保存物品的行业对人的生活都同等必要，不可缺少，那么所有从事这些行业的人就应该具有同等享受的权利。如果有人声称因为我做了这件或那件工作，我就要比其他人的穿得好些，生活得好些，占有得多些，那简直是一派胡言乱语。

但所有的人都必须劳动。因为我们的口号是“劳动和享受”。我们不要游手好闲之辈。

人类的敌人发明了个人的财产，发明了金属货币。自私和嫉妒怂恿人们，一些人想比别人多享受，多占有，强者压迫弱者，剥夺弱者的财产，强迫和哄骗这些弱者为虎作伥，帮助他们再去压迫他人。

压迫多数人的的人自称为君王。随着他们的出现，权利、自由和平等就从地球上消失了，人类的守护神用手掩盖了流着眼泪的面庞。从这时起，兄弟鬩墙，民族相煎，同室操戈，无非是为了靠损害自己的同胞而更多地占有，更多地享受和更少地劳动。^①

君王们在人与人之间制造利害冲突，因为，正如他们所说

① A稿：“人类的敌人发明了个人的财产，发明了金属货币，一个兄弟想要占有同其他兄弟同样多的东西，强者压迫弱者，抢走弱者的那一部分财产，然后再帮助弱者去压迫和掠夺其他人。压迫多数人的的人自称为君王。随着他们的出现，权利、自由和平等就从地球上消失了，人类的守护神用手掩盖了流着眼泪的脸庞。从这时起，子杀父，兄弟鬩墙，民族相煎，同室操戈，无非是为了更多地占有货币和土地，为了自己更少地劳动，让别人更多地劳动。”

的，众人相争，我从中渔利。

以往，他们卑劣的企图一再得逞。但考验的时刻即将过去^①，自由的曙光即将露出。人类必将互为兄弟，相亲相爱。暴君将要遭到灭顶之灾。

勇敢地前进吧，为了自由奋战的男子汉！我们美好的事业必将胜利，因为每天都有新的战士投身到战旗之下，准备参与争取权利的斗争。财产公有制过去由于君主的产生而崩溃，但是，只要看看近年来主张财产公有的人数在不断增长，谁会怀疑它的实现呢。财产公有同其他所有的美好事情一样，很快就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公有制的产生并不像许多人所想象和它的敌人所希望的那样，距离我们甚为遥远，因为在英国实际上已经有人开始实行财产公有的原则了。在那里，许多团体在很短的时间内联合成一个联盟，实行完全的财产公有制；在那里，不时出现一些大人物，他们几乎把毕生都献身于财产公有的原则，为其实现作出了重大的牺牲。^②

这些团体明显地表现出勤奋、守秩序、博爱和节制的优点，仿佛它们就是一所财产公有制的学校。人民的敌人千方百计给它们制造麻烦。这些团体的成员从敌人那里根本听不到一句好话，更不用说从他们那里听到有人要加入了。但这些团体取得了极大的进展，特别是在劳动阶级中。

财产公有制的敌人知道得一清二楚，在实行财产公有制方面

① A稿：“只要有信心，你们的进步的人们即将……”。

② A稿：“在英国已经有人在开始实行财产公有的原则了，现有的许多团体在一些大人物的领导下在短期内就完全实行了财产公有。这些大人物把自己的一生，把自己的不少的个人财产都献给了财产公有的原则。”

只要开了个头，人们亲眼看到它有那么多的优越性，就会全都立即表示赞成，他们的统治也就完蛋了。每个人肯定都愿意生活在这样的团体中，在那里，人人劳动，但比现在的劳动，即比为富有的游手好闲者增加财产，自己却难以糊口的劳动要少，但享受却比较多。如果财产公有制是行不通的，它的反对者就不会那么起劲地反对了，他们就会袖手旁观那些推行者为此奔忙，并加以嘲笑。对手强，人们才会去找对付的手段，对手弱，嘲笑一下就行了。为什么法国政府禁止裁缝联合会联合成一个联盟，实行财产公有制呢？因为他们害怕大家马上会认识到这种联盟的优越性，他们的统治就完蛋了。

在德国，为什么反驳圣西门主义受嘉奖，而赞成圣西门主义受迫害呢？因为圣西门主义宣传财产公有制，各邦政府惧怕德国人看到它的好处，以后不再为君主和王室人员的穷奢极欲卖命，而为自身的福利劳动。

但是，尽管压迫者一味禁止，善和真理将一定胜利，财产公有制将同民主共和国一起诞生，因为它有利于最广大的民众，所以它的好处民众是一目了然的。

有人说，财产公有制好是好，但目前行不通，因为人民没有成熟到这个地步。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人民从来就是成熟的，只要有人把财产公有制的好处给他们明摆出来，他们就能认识。我们只要看看，这一思想在六年前连想也想不到，现在却已经在德国、英国和法国，尤其是在劳动阶级当中取得巨大的进展，就可以知道人民是成熟的。^①

^① A稿：“有人说，财产公有制好是好，但目前行不通，因为人类还没有成熟

只有富人和专吃俸禄的阶级才会灭亡，因为在财产公有制度下他们同样必须劳动才能享受。所以他们竭力反对这种制度，利用他们的财产和地位方面占有的优势施加影响。但正因为财产公有制的道路上障碍重重，我们最崇高的职责，即我们的神圣职责，是以最大的热情为实现财产公有制而努力，任何事情都不能使我们放弃这种努力。如果我们不为此努力，那就什么也得不到。

举个例子。假设有一座大山把两个地方隔开。如果挖通这座山，使这两个地方连接起来，方便这两个地方——所有的人都认为很好，但又认为工程过于浩大，办不成。不过有几个人没有被吓退，他们勇敢地开始了工作，并且要把别人也吸引过来，要通过自己的艰苦工作取得的进展，使众人相信能把山挖通。后来众人支持他们，帮助他们，这项浩大工程很容易就完成了，给大家带来了方便。这两个地方就像被一座自私自利等恶习堆成的大山隔开的人类。许多人认识到，只有打通这座大山，人类才会幸福，但生怕工程浩大而退缩了。而我们，同盟的兄弟，已经毅然决然地献身于我们所追求的自由事业，我们一定要行动起来，坚持不懈，在这一事业中努力奋斗，只有这样，真正的自由和平等

到这个地步。所以，这条公有的原则是完全错误的。的确，人类不会自行成熟，财产公有制也不会自行到来，这只有靠努力争取和对人类实行教育方能实现，因为不劳动就没有工资，不努力就没有享受。而现在，人类已经成熟到足以实行财产公有的原则了，因为每一个人，即使是最坏的人，一旦认识这些原则，就会看到实行这些原则对自己的好处，并拥护这些原则；我们可以看看，现在这些原则在德国、法国和英国工人阶级中取得的成就就是最好的例子。”

才会实现。①

如果我们要问，当某一次革命公开主张财产公有制并着手实施时，谁会投赞成票，谁会投反对票，那么，每个人都相信，凡是从实行财产公有制中受益的人都会投赞成票。只要他们确信可以得到好处，他们就会投赞成票，这些就是占人口大约十分之九的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的阶级。②

投反对票的将是除有勇气将个人财产贡献给全人类的人之外的所有受损者，以及君王、佞臣、官僚阶级、食利者和殷实的工厂主。这些人约占居民总数的十分之一。③

我们的人是受益者，我们必须在我们的人当中做工作，就是说在人民当中做工作，他们是最无瑕、最强大、具有最健全理智的一部分人类。这些人一旦认识到财产公有制的优越性，只要爱国者热忱地工作，那是不难实行的。所以，财产公有制将很容易实行，而又不致遭到反抗。那剩下的十分之一人，如果他们在革命中能幸运地免遭人民的报复，为了不致挨饿就得移居国外或参加劳动。

我们对那些受损者毫无办法，我们无法说服这些冷酷的利己主义者投赞成票，就是说，用和平说服的方法，即使上帝来做也不灵。基督就是我们主张实行财产公有制来造福人类的第一个共

① A稿：“你们作为同盟盟员，已经毅然泅然地献身于你们所追求的美好事业；你们应当开始或继续为这个伟大事业而工作，千方百计地不断为自己争取新的拥护者，然后，你们越是积极工作，你们自己，正是你们自己，就能越早享受到自己的工作成果。”

② A稿：“但争取对象是农民等级、手工业者和市民中间等级，他们占人民总数的绝对多数。”

③ A稿：“受损者是君王及其宫廷佞臣、薪水优厚的地方官员和军队官员、食利者和大工厂主。这些人占居民的少数。”

和主义者和高尚的先驱，他早已有言在先。^①曾经有一个富人是基督的信徒，他说：“主啊，我已遵守了你的全部告诫。我还要做什么，才能做到完全依从你呢？”基督回答说：“变卖你的财产，把卖得的钱分给穷人，然后跟我走。”富人听了，就转身忧心忡忡地走了。基督指着他的背影对自己的门徒说，你们看，他走了，他什么都可以做，就是觉得舍弃他的钱财太难。是啊，骆驼穿过针眼，比富人进入天国还容易呢。这就是说，不可能的事成为可能，也比富人自愿放弃他们财产加入我们的博爱之国更容易。

细心读一读《圣经》就会发现，基督打算建立的正是一个博爱之国，并为此在人民中寻找信徒，因为富人和学者自然是不赞成的。^②他用一个富人办喜庆宴席的比喻证明了这一点。这个富人邀请那些他认为能认识和理解他的原则的好处的朋友来赴宴。可是他们竟不来，而去办其他事情了。^③他们自私，把他们的利益置于人类利益之前。于是他打发仆人去请人民，结果，座无虚席，所有的桌子都坐满了客人，他们穿着喜庆服装，对美好事业怀有纯洁的信念和坚定的勇气。而那位不穿喜庆服装，居心叵测地要趁机谋私利的人则被逐出门外。

从基督的教诲中，我们最能为我们的原则吸取东西，最能对

① A稿：“……基督就是我们主张实行财产公有制……的第一个共和主义者和积极的维护者。”

② A稿：“基督完全实行了我们的原则，并且清楚地认识到，人民是可以争取的，他对他的信徒说，要走遍天涯海角，宣传人民，而他也经常在人民中间。”

③ A稿：“他邀请参加喜庆宴席即人类的解放宴席的朋友们没有来，说有其他事情。”

人民施加影响。人民正确地视基督为他们的拯救者，但由于教士们玩弄了种种诡计，拯救者的意义变了，不是他原先所想的意义了。基督大概认识到有人由于无法消灭他的伟大学说而采取种种狡诈手段加以歪曲，就要他的门徒警惕那些披着羊皮的狼，防止他们在他之后到来并企图伪造他的学说。

基督的原则就是我们的原则，我们信仰他的原则而成为他的门徒，我们要走遍世界，到各族人民中去，宣传并以全力帮助建造基督已用他的学说奠定了基础的博爱之国。^①

实行财产公有制是否需要巨大的精神准备呢？

哪里充满诚实、正直和博爱，哪里就不需要有巨大的精神准备。诚实和正直是建立这个体系唯一必需的。而后，教育将逐步获得比现在远为迅速的发展，而不像现在这样被人忽视。可惜人类社会现在已深深地沉沦下去，因此，即使不是使它从沉沦中奋起而只是使它不致继续沉沦，也需要有精神准备，需要有道德力量。

我们所有的人现在或多或少地都受到目前社会生活的伤风败俗的影响，不再有能力去建立任何一种财产公有制的联盟，而只好用说服和示范的方法去引导我们的后代这样做。这就必须要有教育和道德力量，来使他们的欲念和需要服从共同的福利。

革命是长期的，正因为如此，教育和道德力量具有格外重要的地位，无论在革命结束以后，还是在革命期间，那些促进革命发生的人们要具有充分的教育和道德力量，才能使革命有稳固的

^① A稿：“要有信心，东方已经破晓，基督已用他的学说奠定基础的博爱之国将要诞生。”

基础，才能向人类表明革命是造福人民的。

赞成财产公有制的人在革命开始时就得马上表示赞成，这是否合适？

[文章提纲残稿]①

5. 实行财产公有制需要有巨大的精神准备吗？

6. 赞成财产公有制的人在革命开始时就得马上表示赞成，这是否合适？

7. 如果开始时能成功地获得武器，是否应该处处都用暴力来实行财产公有制？

8. 如果未来的胜利使实行财产公有制有了保证，那么，应当首先在哪些公民中实行？

9. 哪些工人等级是最不可缺少的？

10. 哪些等级是不可缺少的？

11. 哪些等级是无用或是有害的？

12. 在财产公有制中可以有个人财产吗？

13. 艺术和科学会因此繁荣而不致衰败吗？

14. 哪些公民在劳动和生活享受的分配中可以受到照顾？

15. 可以暂时不准哪些成员享受财产公有制的福利？

16. 以后哪些恶习将从社会中消失？

17. 何种共同劳动的分配方式对个人的自由最合适？

18. 用何种方式可以实现生活资料以至全部需要的平等分配？

19. 国家应当赡养所有不能再劳动的人吗？

① 下面的问题是写在另一张纸上的，显然是文章的一个未作进一步阐述的提纲。

20. 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有同等的享受吗？

21. 勤奋和熟练的人享有什么报酬？

沃尔弗冈·席德尔《德国工人运动的开端》1963年斯图加特版第319—327页

7

威廉·魏特林论《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一书的写作和出版

1838年

[……]1838年，我们组织（我不久前才参加这个组织）的人民议事会委托我撰写了一部著作，阐明财产公有的可能性，因为我们组织的成员十分需要这样的著作。当时我还有一个竞争者，但是，中央委员会成员一致坚决赞同我的著作《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这部著作共印了2 000册，当然，我没有为这部手稿支付分文印刷费。我在撰写这部著作的时候，作为一名裁缝帮工，不得不每天工作到晚上10点或11点，而每个星期天则要工作到午夜12点钟。

[威廉·魏特林]：《十二年募捐宣传的收获》，载于1851年《工人共和国》第17期第108页

摘要

8

威廉·魏特林《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一书摘录⁸

1838年

共和国与宪法，
多么好听的名称，
但是仅有这些还不成，
饥肠辘辘的穷苦人，
衣不蔽体，
依然劳累困顿；
再来一次革命吧，
这次应当前进一步，
来一次社会的革命。

[……] 你们从早到晚，年复一年地劳动，你们从土地上赢得的物品堆满了所有仓库；然后你们中的大多数却缺乏最必需的食物、住宅和衣服，分享物质福利最少的恰恰是那些汗流浹背地辛勤劳动以取得这些物质福利的人们。[……]

你们经常埋怨说时代不好，但是很少分析为什么会这样，即使对此进行分析，也很少找到根子所在。工场工人埋怨机器，手工业者埋怨行会的规矩、工业自由和上层阶级的那少得可怜的支出，农民埋怨年成时好时坏，所有的人都埋怨生活必需品价格昂贵；但是，很少有人能击中要害。

产生这种持续的恶劣时代的原因仅仅是产品的分配和享用不平等，以及生产这些产品的劳动的分配不平等；而维持这种可恶的混乱的手段则是金钱。〔……〕

如果你们对你们的正义事业抱有信仰和信心，那么你们就已经获得了一半的胜利，因为你们的信仰能使你们搬动大山。虽然看不见但仍抱有信仰的人是幸福的。然而，引导人们达到目的的不是盲目的信仰，而是出自信念的信仰。

现在存在着一种以基督教义和自然为依据的信念，根据这种信念，不实现下述原则，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人类幸福：

（1）自然法则和基督之爱的法则应为社会制定的一切法律的基础。

（2）把整个人类完全团结成一个巨大的家庭联盟，清除一切狭隘的民族和宗派观念。

（3）对所有的人实行平等的劳动分配，实行平等的生活福利享受。

（4）根据自然法则男女都应享受平等的教育、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5）废除一切继承权和个人财产。

（6）通过普选产生领导机关。这种机关实行责任制并可罢免。

（7）这些机关在平均分配生活福利方面不得享有特权，它们履行职务的时间同其他人的工作时间一样长。

（8）在不侵犯他人权利的条件下，每个人都享有最大限度的行动和言论自由。

（9）向每个人充分提供发挥和完善其精神和物质才能的自

由和手段。

(10) 对犯罪者的惩罚只能涉及他的平等和自由的权利，而不能危及他的生命，只能通过终身驱逐出社会来使他丧失荣誉。

这些原则可以用很少几个字加以概括，这就是：爱他人犹如爱自己。

没有这些原则和不实现这些原则，就别想有人类的真正幸福。在人们为实现这些原则而作出的努力获得成功之前，数千年来迫使人流了那么多眼泪的祸害是不会消失的。

依靠自己双手劳动而过着贫困生活的群众对我们的旗帜是深信不疑的，这一方面是由于我们提供给他们物质利益，也是因为对富有者和权势者的仇恨，他们不能容忍这些人的傲慢和奢侈。

然而，必须有新学说的使徒向群众阐述财富共有共享制度的真实情况，使他们对这种制度的真实情况认识得清晰具体，坚信不移、坚定地抗拒一切诱惑和试探，不因这一美好的事业遭受某种意外挫折而动摇信仰。

必须预先进行阐述，以便在旧制度崩溃之后人民能迅速理解新的社会秩序，不致陷入无政府状态，或者落入别的暴君的掌握之中。[……]

汉堡国家档案馆，
C 1840, Nr. 567, Br. 4u. 5

摘要
第一次发表

9

关于30年代末正义者同盟的发展——正义者同盟和流亡者同盟盟员的供词摘录⁹

1838—1840年

a. 卡尔·弗里德里希·霍夫曼（汉堡）^①

[……] 新旧章程的实质性区别在于，上级由下级选举产生，也就是说，由支部选举产生区部，由区部选举产生人民议事会；他（霍夫曼）也晋升为人民议事会成员，但任期是有规定的，任期届满（他的任期到1839年5月为止）后，仍然是普通的支部成员。^② 在宗旨和性质方面，正义者同盟的章程与流亡者同盟的章程区别甚微或者毫无区别。[……]

我在人民议事会期间，它的成员有上面提到的排字工人龚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贴面板剪裁工迈耶尔、莱茵普鲁士的著作家比尔曼和裁缝魏特林，后者的籍贯不详，我记得是巴伐利亚人。[……]

人民议事会的成员就其使命而言，实际上是区部和支部的公仆，并且由区部和支部选举产生。每个支部选举一人进入区部；同样，人民议事会由区部选举产生；但鉴于只有两个区部，所以

^① 1841年3月15日和4月16日的审讯。关于霍夫曼，参看文件44和11。

^② 恩克在1840年12月12日的供词中也说：“应该说明的还有，在正义者同盟中，各级主席每半年或一年选举一次，本级成员有权选举其主席。”

每个支部都选出两人进入人民议事会，最后再由这四人挑选一人，共五人组成人民议事会。每个支部的成员4—10名不等，但一般是10—11名。人民议事会不负责对各支部成员的注册登记[……]① 每个支部中都有一名支部成员，他了解本支部的所有成员。人民议事会没有固定的开会地点。会议通常在酒店里召开。

当时，要讨论的问题首先是修订和改写比尔曼从法文翻译的教义问答②；此外就是有关济贫工作的管理问题；需要救济者应由设有储金处的支部转呈申请，该支部的申请由人民议事会介绍，其他支部通过后，本支部储金处才能付款。

上述教义问答有一部分内容是道德方面的，有一部分内容是政治方面的，其政治倾向同本组织的倾向基本相同，可是，我对此不能肯定[……]③。据我所知，在我们人民议事会里只有一本教义问答，而且是法文的。比尔曼翻译了其中的几个问题，并提交大家讨论。我记得，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人？”此外，我还能想起的其他问题则有：“什么是自由？”回答：“在广义上，自由就是人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问题：这种自由可以而且必须受什么限制？回答：可以而且必须受义务法规和他人权利的限制”；当时曾提到这样一句古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问题：什么是人民统治？回答：人民的意志所在就是法律”。这种人民统治在这种场合肯定是不会得到认可的，而只会遭到种种限制。对此，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人只

① 手稿缺页。

② 比尔曼翻译的教义问答草稿，1839年在卡尔·沙佩尔家被没收，参看沃尔弗冈·唐德尔《德国工人运动的开端》1963年斯图加特版第55页。

③ 手稿缺页。

[……] ①，而其他人则相反，他们主张君主立宪的国家制度，我本人对这一类问题则不甚明了。从事那些工作并进行讨论的主要目的在于，为正义者同盟建立新的组织；但刚讨论到教义问答的第四部分时，就讨论不下去了。[……]

汉堡国家档案馆，
C 1840, Nr. 567, Bd. 4 und 5

摘要
第一次发表

b. 约翰·罗伯特·亚历山大·威纳尔②

[……] 威纳尔③于1838年5月或者6月未举行任何仪式就加入了由一位名叫吕布萨门的烘焙工人领导的支部，此人在陶器厂工作。威纳尔在该支部接触到五位成员，其中有一位是汉堡的木匠考夫曼。

这个支部起了一个象征战争的名字“朝霞”。——威纳尔由于住得离支部开会地点很远，所以在1838年秋天退出了这个支部，加入了另一个支部，支部主席是莱茵地区的裁缝帮工魏特林。在这个支部里，有来自汉堡的鞋匠赫格尔和雅科比，还有一个鞋匠帮工格奥尔格·巴克，一个油漆工和一个裁缝帮工，后面两人的名字他记不清了。在支部会议上，不仅讲解政治问题，而且还讨论有关本组织法规的各种问题，如每年5月的选举问题，每个成员是否有权对法律草案发表自己看法的问题，能否强迫他人违心从事的问题，以及修改《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等等问

① 手稿破损。

② 这是普鲁士邦议会议员1846年3月26日关于威纳尔的供词的报告（文件4e）的续篇。

③ 威纳尔加入流亡老同盟后，1837年11月至1838年春因患眼疾住院，他出院后听说正义者同盟已经成立。

题。这本小册子是根据傅立叶的著作写成的，书中阐述了本组织应当遵循的各项基本原则。〔……〕

〔1839年春天，威纳尔前往伦敦，1839年5月他又从伦敦回到巴黎。〕这时他发现正义者同盟已今非昔比，同盟的章程是印在8开纸上的，共半个印张，上面标有“在施泰因大臣的文件里发现的，由慕尼黑德意志共和国印刷所印刷”的字样，——因此，这显然就是阿罗尔森的木匠帮工卡尔霍费尔那里被没收的、威纳尔没有见过的那个章程。现在人们已有一个新的认识高度，继续讨论《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一书，以便使该书能在1839年底问世。

人民议事会是否享有在紧急情况下解散本组织的全权，这个问题也是讨论的中心。现在鞋匠赫格尔是一个支部的主席，因为裁缝魏特林和鞋匠雅科比当时已离开巴黎。^①〔……〕不久，当裁缝魏特林回到巴黎时，这个支部就分成两个支部，其中一个支部由魏特林领导，另一个由赫格尔领导。各支部每两周举行一次会议，会上有人作关于区部的各项规定的报告。1839年圣诞节后，正义者同盟内部对于是否与流亡者同盟重新联合的问题未能取得一致意见，而且在1840年初，在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地进行教育这个问题上又出现了分歧。¹⁰1840年3月，鞋匠赫格尔离开巴黎返回他的家乡高地洪堡。于是，威纳尔继任支部主席。〔……〕

梅泽堡德国中央档案馆，
Rep.77, Tit.509, Nr.47, Bd.2

摘要
第一次发表

^① 魏特林约1839年4—11月不在巴黎。

C.卡尔·路德维希·舍费尔^①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那时，恩克和布龙负责这里的组织事务。^②恩克常说，巴黎的组织发生了纷争，组织分裂了，中心也解体了；现在巴黎方面几乎杳无音信，如果有人从这里前往了解一下前因后果就好了。

起初，他本人曾打算为此作一次巴黎之行，但后来[1838年夏天]，我去了一次巴黎。[……]恩克交给我一封便函，嘱咐我交给劳赫，信是封口的，不知道内容是什么。从同劳赫的谈话中，我得知，信中要求那里的人向我介绍有关组织的情况。劳赫向我作了介绍，但他讲的内容，我第一次在巴黎时和这次来巴黎以后就已经听说了。[……]同时，他告诉我，他曾经是流亡者同盟的成员，但后来退出了该同盟，加入了一个法国组织。劳赫可以说是法国人，他是法国公民，担任《流亡者》杂志的主编。除了这封给劳赫的便函以外，恩克还叫我给舒斯泰尔博士带了一封同样是封口的信。到巴黎后我就去找了他。[……]我在巴黎逗留期间，结识了恩德曼，又同于伯勒、利恩哈特和以前的熟人见了面。我还结识了韦森巴赫。他们向我打听恩克的情况，打听他在这里是否建立了组织，我作了肯定的回答。后来，他们向我谈了流亡者同盟解体和正义者同盟建立的经过。他们还说，这样

① 1841年6月12日和14日的审讯。1836年深秋，舍费尔到了巴黎，并加入了流亡者同盟；大约在1837年10—11月，他回到法兰克福，毅然加入了当地的流亡者同盟组织。

② 指流亡者同盟1837—1838年间在法兰克福地区的活动。

一来，大家终于了解到究竟谁是神秘莫测的中心的成员了；以前的流亡者同盟盟员如今建立了正义者同盟，这样，流亡者同盟除了舒斯泰尔和戈德施米特兄弟以及我记得的一个名叫莫沙尼的人外就没有什么别的人了。这几个人无疑就是中心的成员。中心被搞得人人知晓还有另一个原因，据我的熟人告诉我，中心原有一颗刻有手掌标志的印鉴，帕佩尔斯离任时把它带走了，后来拿着它到处炫耀，表明他曾是中心的成员。这个人现在常说，谁，谁，谁都是中心的成员。

上面提到的恩德曼、于伯勒、利恩哈特等人当时曾告诉过我，他们已加入正义者同盟，并要说服这里的组织也加入正义者同盟。我向他们表示，我对此不能作出确切的答复或决定，只表示愿意把此事转达给这里的组织。我经常同他们聚会，但没有参加他们的组织例会。〔……〕

有一次^①，恩德曼突然来到我的住处，对我说，从法兰克福来了一个人，想找我谈谈。那时天色已晚，但恩德曼仍然希望我能同他前往。我跟着他到了郊外，或者说离一条林荫道不远的近郊，他把我领进一个贴面板剪裁工的住所。〔……〕假如我没有记错，这个人的名字叫迈耶尔。除我们三人以外，当时还有韦森巴赫和一个陌生人^②在场。他们向我重复了上次提出的建议，希望我能促成这里的组织加入正义者同盟。但我又竭力回避，没有给他们确切的答复。〔……〕

① 舍费尔先前曾谈过他第二次拜访舒斯泰尔的情况。他说，正义者同盟盟员，特别是恩德曼，曾试图争取他加入同盟。他们首先说明，这是一个“民间”组织，“大家都认识上司”。

② 可能是霍夫曼。

d. 卡尔·弗里德里希·霍夫曼^①（汉堡）

1838年夏天，鞋匠舍费尔前往巴黎，〔……〕旨在促成流亡者同盟与正义者同盟的联合〔……〕。先举行了一次会议，会议是在〔……〕特兰斯若楠路舍费尔的住处^②举行的。参加会议的，除了舒斯泰尔博士外，还有戈德施米特兄弟和几个我不认识的人，一共八人。正义同盟方面只有我一人出席会议，不过，我不是受同盟或者人民议事会的委托，而是应戈德施米特的邀请去参加会议的。我只代表我个人。特别是，分裂是我引起的，因为我反对那条要求绝对服从的命令〔……〕，我始终没有让步。后来，在麦尼尔蒙坦路我的住所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也未取得任何成果。在正义同盟方面，还有比尔曼和一位来自达姆施塔特或洪堡的裁缝韦森巴赫也参加了这次会议。舍费尔那次在巴黎呆了大约三个星期，我先后只见过他三次，一次在舒斯泰尔住处，一次在我的住处，最后一次在他自己的住处。最后一次，我是受正义同盟委托去的，旨在试探一下，我们究竟能否促成同法兰克福人的联合。〔……〕^③虽然联合是不可能的，但他们对我们非常热情，一致要我们相信，那条原则绝对不利于法国等国的目标，而

① 1841年4月24日的审讯。文件缺损严重，无法一一说明，能补的地方尽量补齐了，但由于缺损太多，无法全部补齐；深感遗憾的是，霍夫曼对巴黎讨论的内容曾作过某种解释的地方严重缺损。

② 原件上的备注是这样写的：会议是在舒斯泰尔在家里举行的。

③ 手稿严重缺损。

只有利于德国的目标。 [……]

汉堡国家档案馆，
C1840,Nr. 567, Bd. 5

摘要
第一次发表

10

关于正义者同盟参加巴黎四季社的起义¹¹

1839年5月12日

a. 威廉·魏特林的一篇报道的摘录（1849年）¹²

[……] 比过去所有的关于共产主义原则的口头和文字宣传更为有力、发挥更大作用的举动，是高贵的巴尔贝斯在1839年5月12日所领导的起义。 [……]

300个牺牲者，在6处街垒后面，以不怕牺牲的勇气一直战斗到力竭而死。人民舍弃了他们。晚上9点钟，最后一个街垒被摧毁。巴尔贝斯就在这里负伤倒了下去。当时还有唯一的一个也负了伤的人站在他的身边保护他，伤者是德国鞋匠，留着金色卷发。你们要记住这个坚毅的德国人的名字：但泽市的奥斯滕¹³！他被判处无期徒刑。据报道，若干年前他已在监狱里变成了疯子。 [……]

威廉·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1849
年汉堡第3版序言第XIII、XV页

b. 卡尔·沙佩尔的一篇辩护词的摘录（1850年）¹⁴

[……] 1839年5月12日，1000多名年轻人构筑了著名的

巴黎街垒。这些巴黎街垒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只要看到这些街垒，就可以置枪林弹雨于度外。晚上10点钟左右，在激战中我被步兵团的一个士兵抓获。他们在愤怒和激动之余，竟想把我立即枪毙。这时，一名军官走了过来，命令把我送进一个教堂关起来，我在这里同几百个人一起过了一夜。翌日晨，他们把我带到拘留所。根据帕斯奎首相的命令，我在那里被拘留了七个月。最后，贵族院的一个委员会释放了我，并不再予以追究^①；可是，根据内阁的指示，我被看成是一名危害法国治安的人，被驱逐出法国。〔……〕

《维斯巴登陪审法庭就魏因巴赫指控校对
员和语言教师卡尔·沙佩尔犯有……罪的
辩论（1850年2月8—15日）》1850年维
斯巴登版第316页

摘要

11

关于正义者同盟汉堡支部的建立。卡尔·弗里德里希·霍夫曼的一篇供词的摘录¹⁵

1839年底至1840年初

〔……〕他同流亡者同盟脱离关系，是真实可信的；他加入正义者同盟并且从巴黎回来后几个月就在这里建立了一个支部（虽然不是完全正式的），也确有其事。参加这个支部的，除了

^① 卡尔·沙佩尔于1839年11月14日获释。

他以外，还有格吕贝尔、阿伦斯、科尼希和施塔尔，此外就没有其他成员了。施塔尔是由他（霍夫曼）约于一年前在格吕贝尔当时的住处接收入盟的，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只是在宣读章程以后，接收者和被接收者彼此握了握手，以表示恪守章程。〔……〕

汉堡国家档案馆，
C1840, Nr. 567, Bd. 3

摘要

12

弗里德里希·门特尔关于正义者同盟的供词^①

1840—1845年春

〔……〕在巴黎的同盟盟员中，我能说出下列成员的名字：

1. 裁缝威廉·魏特林，同盟存在一事就是他在1840年告诉我的，他接收我入了盟，并让我宣了誓。魏特林在同盟中的活动情况是众所周知的，通常是同盟出版著作，但主要是接收新盟员。为此，他经常出入于德国工人经常光顾的木栅门^②附近的旅店^③，设法结识他们，并争取他们拥护自己的主张；他曾经是人民议事会的成员，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而且，他同瑞士和伦敦的志同道合者建立了通讯联系。1841年3月，他旅行到瑞士，

① 1847年2月17日的供词。门特尔1840—1845年是巴黎正义者同盟盟员，1845年起为人民议事会成员；关于他的供词，参看注64。门特尔供词的其他两部分，分别见文件65和75。

② 指巴黎的关卡屏障，屏障附近的生活用品比较便宜。

③ 原件上为礼拜堂。

此行的真实目的是在那里从事写作，并使旅居那里的“青年德意志”派尽可能转变成共产主义者；在瑞士，他为自己的目的撰稿，其次是写作贫苦罪人的福音的保证。^①1845年，我在伦敦又遇到了他。关于这次会面以及他在巴黎与同盟发生的纠纷，我早已供述过了。^②

2. 语言教师莫伊勒，据我所知——是他本人告诉我的——是正义者同盟的缔造者之一，早先他是流亡者同盟盟员。他同裁缝韦森巴赫（现在纽约）以及裁缝里克（可能还在巴黎）一起脱离了流亡者同盟，因为他们明确表示不同意履行绝对服从上级这一义务。按他的说法，这是1832年或1834年的事。我在巴黎时，莫伊勒是人民议事会成员，我是1834年进入人民议事会的。那时，他同魏特林有通讯联系，同里昂（据说那里有同盟的支部）和伦敦也有书信往来。同时，他也接收新盟员，即接收加入他的支部。这里我顺便说一下，在接收新盟员时，并不举行特别严格的仪式，甚至也不作任何特别的接收准备。只对接收对象说，什么是共产主义，其次还说，宣传共产主义是同盟的宗旨；如果他们表示愿意入盟，就立即接收入盟，不要求宣誓。誓言是在艾韦贝克入盟后不久即1841年夏天取消的，新盟员只要保证恪守兄弟般的信念就行了；新盟员在听完了“义务”^③后同其他盟员握握手就算入盟了。莫伊勒为同盟出版了许多著作，主要有：《学徒见习期》、《柏林政治来信》、《边陲来信》、《被遗忘的人和事》。

^① 这里把《和议与自由的保证》和《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混淆在一起了。

^② 这部分供词没有保存下来。

^③ 参看文件30。

《民间戏剧、诗歌和思想》以及献给恩人的一本书。最后他担任人民议事会主席。

到1841年还有人^①说，流亡者同盟依然存在，但后来就湮没无闻了，可能是解散了。

3.1840年，艾韦贝克医生到了巴黎，他是科尼斯堡人，在这里当过野战外科医生，这一点，我在本月26日的审讯中已供述过了。^②艾韦贝克入盟并没有按照常规，而是立即进了区部和议事会，这一点，同盟盟员很快就知道了，起初曾引起极大的不满。我和他同是议事会成员。艾韦贝克入盟后不久，据有人告诉我，就为同盟到瑞士去，亲自同魏特林会晤；但他很快就回来了，回来后特别积极地为同盟进行活动。1842年，他前往伦敦，可是，他在那里为同盟进行活动的确切情况我一无所知。顺便提一下，他这次去了几个月。他竭力资助（有一部分钱是他自己的）魏特林及其在日内瓦创建的共产主义者协会；他还同已经脱盟的前盟员保持通讯联系。后来施工海德克尔担任他的秘书。艾韦贝克主要宣扬无神论，并指出，共产主义并不是在今天，而且在遥远的将来才能实现，就这一点而言，他也就给同盟提出了另一种方针。艾韦贝克并没有发表过什么著作，据我所知，他只为几家杂志写过文章。如上所说^③，我在这里〔柏林〕曾收到艾韦贝克的几封信。他千方百计结识来到巴黎的著作家，争取他们拥护他的思想；这些人中有《前进报》的撰稿人^④，但他们并不是同盟盟

① 这部分供词没有保存下来。

② 参看文件73。

③ 门特尔在这里显然首先指的是卡尔·马克思和1843—1844年居留巴黎的亨利希·毕尔格尔斯、罗兰特·丹尼尔森、莫泽斯·赫斯以及格奥尔格·维贝尔。

员。我不清楚，卡尔·格律恩、卡尔·海因岑和海涅与同盟是否有过接触。

4. 旋工海德克尔，出生于巴伐利亚；他也是议事会的成员，我作为同盟盟员也认识他。他同木匠施奈尔一起专门负责在圣安都昂郊区的工场招收木匠帮工。上面说过，他还是艾韦贝克的秘书。我离开后，他任议事会司库，这个职务在我走以前的六个月是我担任的。上次我已详细供述过，把邦议会的决定^①交给我的就是这个人。

5. 裁缝恩德斯和我两人是同时成为议事会成员的。我听说，1843年他与所谓颅相学派^②一起脱离了同盟，但在第二年又加入了同盟，此后，他相继被选入区部和议事会。关于他为同盟的活动，我只知道他经常出现在圣安都昂郊区的木匠们中间，试图争取他们加入同盟。

6. 裁缝施奈尔是伦敦人，我曾听说，他和艾韦贝克都是某个区部的成员。同时，他在圣安都昂郊区也像恩德斯那样进行活动。

在我所属的区部成员中，除了莫伊勒以外，我只能列举出下面一些人：

7. 马格德堡的裁缝贝克，他是圣安都昂郊区手工业者歌咏协会的成员，但该协会的会员并非全是盟员；

8. 图恩的木匠布莱希，也是上述歌咏协会的成员；

① [卡尔·格律恩]《国王对普鲁士邦议会的决定。论时局问题》1846年比尔文肯版。

② 指颅相学的拥护者，这一学派力图创立一门以颅骨形状为出发点的心理学。该学派在19世纪30和40年代成了时髦流派，还形成了许多颅相学会。

- 9.木匠布莱歇尔特，目前在伦敦；
- 10.木匠于贝尔，可能还在巴黎；
- 11.沙福豪森的裁缝施派塞克尔；
- 12.木匠泰伯尔，现在伦敦。

关于上述成员为同盟活动的详细情况，我不太清楚，只知道他们参加会议，他们无疑是某个支部的主席或司库，因为他们是区部的成员。

我所属的区部，在我离开前不久就分开了，因为一部分成员住在很远的圣安都昂郊区。现在，加入由我领导的区部的，还有以下几个人：

- 13.裁缝里克，据说现在巴黎近郊农村；
- 14.加塞尔的裁缝佩希特尔；
- 15.美因兹的裁缝巴尔肯霍尔以及
- 16.哈泽。

这些人在我离开时还在巴黎。关于这些成员的详细情况，我不太清楚，凡是我知道的情况，我在上面谈到其他区部成员时已供述过了。[……]

我所在（巴黎同盟的）支部成员，我所知道的有以下几个人：

- 17.裁缝豪斯曼；
- 18.裁缝钦德尔。

这两个人都参加了我的人盟仪式，我记得他们是证人，而我不能肯定：他们过去是否就已经是盟员，还是同我一起被接收入盟的。钦德尔后来任支部的司库，1843年退出同盟。这两个人的籍贯我说不清。他们俩可能还在巴黎。

19.裁缝霍曼，1842年离开巴黎到瑞士去了，但后来在前往伦敦途中曾在巴黎逗留了几天。从那时起，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他目前（正如我已多次陈述的）还住在科尼斯堡。

20.裁缝米勒，后来曾是这里的近卫军火枪营的军士。正像我在12月30日的审讯^①中所陈述的，经裁缝奥斯滕的介绍，我曾在柏林这里拜访过米勒和另一个裁缝律斯勒；米勒后来把我带到一家酒店，在那里，我向身为盟员的魏特林宣了誓。关于他的活动，我不太清楚，只知道他和其他人一样，也参加支部会议，也是在1841年6月到柏林的。就像我所陈述的，当我在这里访问他时，他奉劝我以后不要再相信共产主义思想了。

21.西里西亚的裁缝律斯勒，是这里沙伦街的裁缝师傅律斯勒的弟弟，同米勒的关系很密切。他被接收入盟的时间比我晚。1841年，他到了伦敦，1843年又回到巴黎时，就不再过问同盟的事了；据说他目前定居在勒阿弗尔。

22.裁缝米勒，目前在布兰克内瑟，他是在我以后被接收入盟的，1841年同律斯勒一道离开巴黎。

23.利珀—德特莫尔德的裁缝迈耶尔，1843年同盟内部出现争吵时，他脱离了同盟。

24.裁缝维贝尔，现在汉堡，我进入支部时，他已经是盟员了，当魏特林的支部一分为二时，他被安排在魏特林那个支部。他在巴黎一直呆到1842年，即在我稍早一些时候被调到格莱兴施泰因支部以后。为什么这样称呼这一支部，我不知道。

25.哥达的裁缝胡佩尔，可能还在巴黎。

^① 这一部分供词也没有保存下来。

26.利珀—德特莫尔德的裁缝威拉尔特，也可能还在巴黎。

格莱兴施泰因支部的成员，我所知道的有：

27.裁缝赛伊费尔特，在我进入该支部时，他担任支部主席，1842年回到了他的故乡格拉。我补充一句，威拉尔特是与我同时被调到该支部去的，并担任该支部的司库；

28.汉堡的裁缝盖埃尔；

29.斯图加特的裁缝哈森海默，已回到故乡去了。他在赛伊费尔特任职期满后，又连任支部主席。从他1843年不再参加支部会议时起，我当选为主席，从那时起，从别的支部调入我支部的有：

30.裁缝格里克，他当选为司库，汉诺威人；

31.汉诺威地区的裁缝沙佩尔，后来我在伦敦又遇见过他。^①

后来由我接收的新成员有：

32.盖尔曼尔斯海姆的裁缝麦茨纳；

33.奥格斯堡附近布赫豪森^②的裁缝贝尔兴赖特；

34.美因兹的裁缝瓦格纳；

35.达姆施塔特的裁缝瓦格纳；

36.鲁平的裁缝舒尔茨，他在这里^③也是同盟盟员。我知道这些人都是同盟盟员，因为我和他们是同时进入同一个支部或同一个区部的，在支部或区部的会议上我曾见过他们。而关于他们为同盟进行活动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

① 这里并不是指卡尔·沙佩尔，而是指另一个同姓的盟员。

② 这是没有根据的；也许是在奥格斯堡以北约45公里处的布赫多夫之误。

③ 柏林。

我还认识一些盟员，他们既不是这个支部或这个区部的成员，也不是巴黎议事会的成员，如：

37. 布格多夫的裁缝黑格，关于他的情况，我在上面已经谈过了。在巴黎，我同他住在一起，我从他的谈话中得知他是同盟盟员；

38. 哥达的裁缝洛贝格，1843年已回到他的故乡；

40. ① 哥达的木匠哈克，可能还在巴黎；

41. 巴伐利亚的木匠雷斯；

42. 巴伐利亚的钟表匠缪林格尔，这两个人在1843年曾是议事会成员，因当时同盟内部发生分歧，他们俩都脱离了同盟；

43. 达姆施塔特的裁缝阿尔特尔；

44. 达姆施塔特的裁缝亚当·威纳尔，他有一个时期与我同属于一个区部；1844年，他到了里昂，根据他写给迈耶尔的信来看，他在那里参加了一个据说由瑞士方面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关于这个同盟，我所能告知的无非是：该同盟大约是由24个成员组成，定期从瑞士得到书籍；

45. 不伦瑞克的裁缝施塔茨，他与莫伊勒和我原先都是同一个区部的成员；

46. 维也纳的裁缝布劳胡特；

47. 裁缝莱宁格尔；

48. 这里的菩提树街的裁缝米勒，是在这里被捕的，我是1843年在巴黎认识他的；

49. 士瓦本地区的裁缝科勒尔，我已补充说明，他和我曾经

① 原件中缺少序号39。

同属于一个支部，我走以后，他就到勒阿弗尔找律斯勒去了，据说目前在里昂；

50. 鞋匠格里克，住在下菩提树街；

51. 木匠马尔滕斯，现在汉堡；

52. 木匠希埃尔^①，也在汉堡。

后者是我本人在巴黎认识的，而前者我并不认识。后来^②，我在汉堡见过他们两个人。

53. 这里的鞋匠施米特，当我离开时他还在巴黎；

54. 布雷斯劳的裁缝甘塞特；

55. 这里的裁缝奥斯特莱希，他可能还在巴黎；

56. 这里的裁缝福尔冈，据说他目前住在这里的贝伦街；

57. 基尔的鞋匠舒尔茨；

58. 这甲^③的旋工布霍夫；

59. 基尔的裁缝施泰因，他们三个人，我都在基尔见过。我听布霍夫本人说，他是同盟盟员。关于其他两个人，我只听说他们都是盟员，其实他们的情况，我也不清楚；

60. 士瓦本地区的裁缝巴茨曾对我说过，他也是同盟盟员。

61. 裁缝贝尔纳，曾在这里彼得里广场的塞洛处当过学徒，可能还在巴黎；

62. 达姆施塔特的裁缝蒙特，据说他现在在美国；

63. 裁缝卡尔克霍夫，他曾在科布伦茨工作，而且可能就是

① 原件如此，也许是希泽尔之误。

② 大约在1845年秋天，参看文件75。

③ 原件中如此，也许是“在同一地方”之误。除非门特尔想说布霍夫是在柏林出生的，但1845年他在基尔工作。

科布伦茨人；

64. 爱北斐特的裁缝施穆克霍夫，这两个人都是由我最后接收入盟的，他们可能还在巴黎；

65. 科伦的木匠阿道夫·云格，据布莱希说，是同盟的成员；^①

66. 瑞士伯尔尼的裁缝梅塞勒曾亲口对我说过，他是同盟盟员；

67. 鞋匠康斯坦茨，他也是康斯坦茨生人，当我离开时，他还在巴黎。他也曾告诉我，他是同盟盟员；

68. 科伦的裁缝迈尔；

69. 裁缝科赫，目前在圣彼得堡；

后者^②是我接收入盟的。后者曾对我说他是同盟盟员；

70. 科尼斯堡的裁缝彭斯基也对我说过，他是同盟盟员；他可能还在巴黎；

71. 同样，哥达的裁缝克拉默也对我说过，他是同盟盟员；我不知道他现在住在哪里；

72. 达姆施塔特的裁缝德克尔也曾告诉过我，他是同盟盟员。当我离开时，他还在巴黎。

这就是所有我目前还能记得名字的巴黎同盟盟员。至于他们为同盟进行活动的情况，从上列第37条起我所在支部的成员除外，我就谈不出什么特别情况了，只知道（通过同他们交谈）他们十分热中于共产主义思想。[……]

^① 1846年，布莱希在柏林访问了门特尔，并从巴黎给他带来了这一消息，参看文件75。关于云格参看注74。

^② 原伴如此，可能是“前者”之误。

最后，对上面的询问，我再补充几句：裁缝加布曾经是巴黎同盟成员，但他已在1843年退出同盟，因为他特别偏袒颅相学派，并由此制造许多争端。费舍医生据说过去是裁缝，并给手工业者讲授过颅相学，据我所知，他并非盟员。关于格里夫，我在上面已经谈过了。[……]

莱比锡市档案馆，统一刑事档案，
Rep. I, Nr. 10, 273 (副本)

第一次发表

13

巴黎罢工裁缝帮工的呼吁书¹⁶

1840年7月

a. 德国裁缝帮工致不伦瑞克和德累斯顿裁缝帮工的呼吁书¹⁷

致高尚同胞的呼吁书^①

先生们：

我们几千名同仁，其中四分之一是德国人，他们宁愿离开自己的工场，也不愿屈服于大多数师傅的压迫，因为他们要求我们出示劳工证书，即一种品行记录本，——我们认为，这个条件太苛刻。这一点暂且不谈，可这还是一个势必使我们越陷越深的陷阱；这帮师傅已经商定在不景气时期压低劳动价格，而没有商定在繁荣时期提高我们的劳动价格。同时还把我们的品行记录下

① A稿上有下列通讯处：不伦瑞克的裁缝帮工公寓，不伦瑞克裁缝业的老伙伴先生——德国的不伦瑞克公爵收。

来，——警察当局并不强求我们出示劳工证书，所以我们一致决定不复工，直到他们作出让步为止。为了比较容易地做到这一点，我们认为有必要向所有高尚的同胞发出呼吁：大多数邻近城市都已捐出巨款，借以证明他们是人道的，所以，我们以前提出的先决条件是，德国的大城市（不是指这些城市中的每一个人，而是指每一个大城市）都应尽快捐款，以表示自己的行为高尚；因为在这个时候，这种行为首先关系到德国裁缝行业的荣誉，甚至关系到同胞们享受自由还是忍受压迫的大问题。

我的伙计们，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明白，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放弃我们的权力，而是要尽量持久地为普遍的幸福而努力。

斐迪南·施米特（柏林） 格奥尔格·弥勒（汉堡）

卡尔·文特尔（沃尔芬比特尔）

奥古斯特·贝克尔

格奥尔格·库格勒

C.古特曼

卡·孔茨

波斯勒

格奥尔格·罗森塔尔

哈佩

舒克

黑德尔（德累斯顿）

艾克哈特

乌美利奇和文特尔

弗雷德^①

通讯处：巴黎科基勒尔街41号，裁缝马丁先生收。^②

手稿A

沃尔芬比特尔下萨克森国家档案馆，

12 A Neu Fb, 5 Nr. 6208

手稿B

德累斯顿国家档案馆，维也纳公使馆，

Nr. 91 (副本)

b. 法国裁缝帮工的呼吁书¹⁸

尊敬的先生们：

我们请求工人们伸出同情之手，帮助我们这些处于困境的人们。我们的雇主利用劳力过剩这一点来压低工资，并要求警察局长采取措施，即：同意雇主不雇佣不持劳工证书的工人；警察局长已同意雇主的要求，并向所有的裁缝师傅发出了通告，要他们照章办事。

目前，绝大部分工场已经关闭，我们决定采取合法手段，全力以赴对抗这种旨在束缚我们手脚的措施。斗争可能是持久的，我们有决心战胜这帮爱钱如命的老爷；他们在我们身上发了横财还不知足，还想置我们于[……]^③的地位。我们都已认识到了自己的尊严，为此，我们请求你们，用你们现有的力量支持我们，

① B稿上的署名：赫夫特、艾克哈特、弗雷德（不伦瑞克）、萨克斯（布雷斯劳）、格奥尔格·勃勒（汉堡）、席克和文特尔贝格（汉堡）、柯赫（汉堡）、勃勒（施内贝格）。

② B稿上的通讯处为：巴黎科基勒尔街41号，席克先生收。

③ 这里明显删去了。

让我们赢得这场胜利；我们的事业就是你们的事业。你们在巴黎的同仁会向你们解释的。

请接受我们的诚挚敬意和衷心感谢。

手稿A

沃尔芬比特尔下萨克森国家档案馆，

12 A Neu Fb,5 Nr.6028

手稿B

德累斯顿国家档案馆，维也纳公使馆，

Nr.91 (副本)

c. 致马格德堡裁缝帮工的呼吁书¹⁹

致高尚的德国人的呼吁书

各位先生：师傅们早就打算用某种方式束缚我们，贬低劳动；可是，巴黎人具有共同的思想，宁愿让首都巴黎忍受饥饿和贫困，也不愿让自己和其他后来的人受奴役。于是，数千名志同道合的工人挺身而出，坚持不懈地反抗师傅，直到他们承认我们的权利为止。因此，我们向你们呼吁（我们已在整个德国、法国和瑞士发出了同样的呼吁），给我们捐款，使我们能够达到我们的目的。如果你们的处境也像我们一样困难，那么，请你们坚定地站在我们一边。立候回复，顺致敬意。^①

[回信地址：]巴黎圣奥诺雷街13号，裁缝帮工魏特林收。

梅泽尔德国中央档案馆，

第一次发表

Rep.77, Tit.500, Nr.10, Bd.3 (副本)

^① 原件上称，下面是三四个人的签名。

14

威廉·魏特林发表在《吁助德国青年》上的呼吁书²⁰

1841年9月

致所有使用德语的人的呼吁书

世间的事，不会总是像现在这样的，也不会永远一成不变的。世界上的一切都各有时限。宗教、语言、法律、风俗和习惯，就像地球的表面一样，在循环过程中都受不断变化这一永恒规律的制约，尽管这种变化按照我们的淡薄时间概念来得十分缓慢。比如，蜉蝣想象不到人的存在及其时间尺度，同样，如果存在更高级和更完善的生物，我们也难以想象它们的存在和时间概念，它们的1 000年时间，按照我们的计算，只不过是一天而已。

因此，我们，正在为振兴人类的伟大事业而工作的我们，要寄希望于这个用我们有限的知觉准确测得的短暂时间，这个时间再长也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我们作为勤劳的工人要在封建的葡萄园里勇敢地翻松旧社会的坎坷不平的土地，扔掉从泥土中翻出来的石头，把基督教博爱的种子撒在新鲜的土地上，虽然下一代才能看到绿色的幼芽破土而出，再下一代才能收获。
[……]

我们也要在公开讨论人类幸福和痛苦时发表意见；因为我们是身穿制服上衣、夹克和工作罩衫的人民，是头戴便帽的人民，我们是天赐广阔土地上人数最多、益处最大和力量最强的人。

我们还要为我们的幸福和人类的幸福大声疾呼，要使人们确信：我们对自身的利益是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即便是我们没有使用拉丁的、希腊的和艺术性的华丽词藻，但我们还是说得相当好，而且是用相当好的德语说的：我们的病自己知道，我们熟悉内情。

我们还要发表意见，因为我们生活在19世纪，况且我们还从来没有发表过意见。

我们还要在大庭广众中发表意见，使大家认识我们，因为直到现在为止，大家确实是不承认我们的。

我们还要发表意见，倾吐我们的衷肠，把我们的正义控诉灌进当权者的耳朵。是不是没有一个人能帮我们的忙呢？[……]

一个不同我们甘苦与共的人，怎能了解这一点；一个不了解这一点、没有这种实际经验的人，又怎能对我们的身体状况和道德状况提出改善的措施并付诸实现呢？

即使这个人真诚的，他也是无能为力的，因为只有经验才能出智慧。

谁要想正确判断工人的状况，他本人必须是工人，否则，他就不可能理解同工人的状况相关的辛劳。

一个人如果无所事事，好逸恶劳，就不可能准确理解单调而机械的手工操作对工人的脑力和体力所产生的影响，就不可能理解各行各业对健康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以及怎样消除这种不利影响。为了能够透彻地评价穷人的状况，我自己就必须是穷人，或者宁愿做穷人，也不愿做那种不为穷人干事的人。

医生只有自己得了病，才能完全了解生病的含义。

社会的上层阶级只会制定令人陶醉的法律，对人民的疾苦，

几乎在理论上也不甚了了，甚至连这些法律的执行者也是如此。这个上层阶级对人民的实际生活不闻不问，只在生活资料的消费方面才知道人民，而对几乎一生都在创造这些生活资料的人民的生活却一无所知。

因此，我们的杂志应当努力使这个阶级至少在理论上了解人民的生活，如果它愿花力气阅读它的话。^① [……]

1841年9月《吁助德国青年》（日内瓦）

摘要

第1期第2—4页（威纳尔·柯瓦耳斯基编

《从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

1967年柏林版第125—129页）

15

安得列阿斯·谢尔策尔（巴黎）给威廉·魏特林（日内瓦）的信

1841年11月15日

尊敬的朋友：

你转达了我对协会的敬意^②，在此我对你的诚意谨表诚挚的

① 接着，魏特林要求社会各阶层，其中包括这个世界上的“头面人物和当权人物”，订阅他的杂志，并为它撰稿。

② 魏特林在出版的杂志《吁助德国青年》（1841年11月）第3期第41—42页上发表了谢尔策尔的题为《巴黎来稿》的一首诗，谢尔策尔在诗中拥护“财产公有”。

感谢。如果你能再发表这一篇文章，我必将无比高兴。^①

我偶尔读了一份美其名曰《德意志人民报》（本月4日）的报纸，该报每周四以四分之一版的篇幅刊登类似的东西；可这是一家什么样的报纸啊，一家地地道道反人民的报纸，一家试图刺探国内外所有工人团体的秘密的报纸，一家把这些团体提出的一切有益建议都简单地说是虚荣和梦想的报纸。

在这家报纸刊登的一篇文章的作者所描绘的所有联合会中产生了这样的印象，他在不久前似乎读过《吁助德国青年》第1期；但是，如果叫他相信，杂志中阐述的傅立叶主义思想就是整个社会的思想，那么，他将感到遗憾；他写道，他不想对吃喝机构方面提出的建议进行任何批评，可是，试验了上百次、失败了上百次这样周而复始的情况，实在是一种不幸。

在国内外成立的所有德国工人联合会，通常都仿照法国的同类联合会，遗憾的是，法国的联合会充其量不过是共产主义的、傅立叶主义的梦幻；法国共产主义者所走的道路，只能导致争吵和暗杀，导致监禁和砍头。该文的作者也许根本不想了解共产主义者这个词的真谛，因为他读过《吁助德国青年》第1期，所以，我请求他也读一读第3期，到那时他就会明白这个词的真谛了，他对这个词的解释竟如此蹩脚，以致连他自己也莫名其妙。^②

① 谢尔策尔在这封信的第二部分，即本书没有刊印的那部分中，详细地论述了在巴伐利亚漫游的手工业帮工的遭遇。魏特林没有发表谢尔策尔的这一封信。

② 魏特林的文章《圣餐仪式和共产主义者》，载于1841年11月《吁助德国青年》第8期第33—39页。

同时他还写道，如果他要建立一个联合会，那么，首要的条件就是全体成员都要避开一切被禁止的东西，避开所有法国人；但是，我感到万分惊讶的是，有人竟对我说：扬言要避开所有法国人的那个作者本人就在法国，他就是从德国逃出去的；他对一个本应感激不尽的民族竟如此忘恩负义。他可能自以为说这种话就能取悦于德国各邦政府，或者已从这个或那个警察当局那里捞到了一官半职；因为否则的话，一个只凭一点经验去了解工人状况的人，写起文章来不可能如此[放肆]。① 避开一切被禁止的东西，也就是说，避开被禁止的不公正，这一点，每一个明白事理的人都能理解，可是，要是避开被禁止的公正，每个人也能理解，他应当干什么。例如，禁止德国工人到法国去，可是，为什么要禁止，为什么德国各邦政府要禁止移居到这样一些国家去，在那里，每个工人，不管他来自哪个国家，都能像当地居民一样，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丝毫不受限制？因此，让我们对德国工人的被禁止东西和被压迫情况进行一番考察，而不去理睬那个撰文反对工人联合会的人，他爱干什么，随他的便。

我以非常惋惜的心情，在您的上上期刊物上读到了一篇关于乞求法律的文章②，这个法律在我们德意志祖国的部分土地上，即在我诞生的美丽的巴伐利亚，实施得分外严格。[……]

无限忠实于您的谢尔策尔谨上

巴黎好人街20号咖啡店老板宅

手稿

节录

① 手稿缺损。

② [威森·德特林，]《请乞讨和战斗》，载于1841年10月《呵助德国青年》第2期第18—25页。

16

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委员会反对《德意志人民报》的声明^①

1841年12月16日

给在瑞士的德国共产主义者的一封信

1841年12月16日子伦敦

亲爱的兄弟们：

你们为正义事业所做的工作，使我们甚感欣慰，并激励着我们全力以赴地履行我们的职责，尽管在我们面前有许多艰难险阻。下星期日，我们将在这里举行集会，讨论我们是否能筹集足够的资金，按照《吁助德国青年》第1期的计划，在伦敦这里建造一座协会大厦。——干这件事，我们不乏良好的意愿和勇气。

《[德意志]人民报》第17号刊登了一篇批评德国现存各团体，特别是批评我们协会的文章，混淆了该报读者的视听；我们认为，有必要借贵报一角发表下列声明，予以更正，以正视听。

在一家名为《德意志人民报》^①的周报上，我们读到一篇关

① 原件注：如果《德意志人民报》有权冠以这一名称，那么，俄国人的历代皇帝，包括尼古拉，也同样有权声明自己为公正的人、慈悲的人、人民的慈父。

于各工人团体的文章。该文表明，它的作者正好不是这些团体的朋友，至少不是干活多于读书、多于说话和思想的人。

谢天谢地！工人阶级只读书而不思考、不检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时，他们之所以认为一切印刷品都是真理，就是因为它们是印刷的；愚昧和谎言只要印在纸上，似乎就带上了真理的光圈。今天，我们成熟了，我们也要试图区分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不错，我们还将更成熟，如果我们看到，有人对我们不怀一点好意，那么，我们就自己帮助自己，自己著书立说。当然，这在思想垄断者心目中确实是一大罪状。

上述文章的作者及其耳目，似乎都对伦敦德意志民主协会心怀不满，这是因为，也就是说，我们相信，这是因为这些耳目在伦敦听说了，大家都认为，只有建立像耶稣基督所宣扬的财产公有制，人类才能得到幸福；同时还因为，尽管有各种深刻的论证，但仍然无人理解，为什么只有爱国的德国人才能扭转局面。当然，这在那些人的心目中又是一大罪状！

这个作者在评论我们的协会时所说的话，明白事理的人一看就知道是一派谎言。有一处地方，作者是这样说的：“在例行的会议等等场合已颁布了命令。”——虽然学者也可能相信和写出一些愚蠢的东西，但我们可不认为该文的作者愚蠢到如此地步，竟相信自己的东西。——如果情况果真这样，那么，我们就原谅他的愚昧和低能；可是，如果诋毁我们的政治见解，或者由于我们拒绝支持他的报纸而信口雌黄，进而试图伤害或者讥笑我们，那就不好了。

这里的德意志民主协会讨论了一个委员会撰写的关于国家制度和国民经济学问题的文章，这是事实。——每个人都有权对此

发表意见，并有权提出修改建议。——不论是委员会提出的还是某个会员提出的所有建议，都要经过表决，而得票最多的建议就被宣布通过，这也是事实；但是，硬说什么协会认为由此就给未来的国家作出了某种规定，就是荒谬的。表决的目的在于：每一个人，即使没有能言善辩的雄才，但也能公开表示自己的意见。这样，各个成员就可得到公开讲演的练习，并由此受到鼓舞，信心十足地参与辩论。

然而，协会有权把自己通过的文章付印出版，同时可以希望影响公众舆论，而作为著书立说者和报纸的撰稿人，所谓《人民报》的撰稿人同样享有这种权利。这是否意味着因此就不必通过公开表决来确定协会的主张了呢？或者说，《人民报》的那位撰稿人是否认为，必须上几年大学才能参与讨论、表决和写作，而这一切都不应属于青年手工业者吗？——看来几乎是这样！

我们虽然没有一个学期又一个学期地泡过和耗过，攻读过和研究过，也就是说，我们虽然缺乏聪明才智，但是，我们具有健全的人的理智，我们要永远敢于利用这种理智为公共福利而工作。

诚然，我们不是可敬的阿伦特和雅恩的门徒，也不是德国大学生社团的忠实学生，凡是不用德语称呼和并非德国人制造的东西，我们都一概反对。——只要是好的东西，不管巴希基伦人还是法国人创造的，我们都接受；我们并不认为不是本国的东西，就一定要敬而远之。

1813年和1814年这样的年头已经一去不复返，阿伦特的影响也随之烟消云散了。

维尔特时代也已成为过去。他的精神决不能超越他的时

代。凡是不能用民族性来治疗的弊病，他都认为是不可救药的。他的智慧蒙住了自己的视线，以致不能理解一个以财产公有化和劳动社会化为基础的社会计划，以致认识不到建立这种社会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认识不到只有在这种社会制度下才可能存在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在他眼里只有民族性、民族德行和民族硬币。谁敢越此雷池一步，他便斥之为狂热、幻想和异端。例如，他在评价英法两国社会主义体系时就是这样说的，参看他的《德国人的政治和宗教改革流派》^①第149页。——如果这些形形色色的社会著作有朝一日译成德文出版，那么，人民就会评价社会主义者的智慧和维尔特的智慧了。仅仅出版自由这一条就能决定维尔特的政治声誉究竟还能持续几天。

现在，再回头来谈谈《人民报》上的那篇文章。

正如今天在知识界流行的时髦一样，那位作者也咒骂共产主义者，特别咒骂法国的共产主义者。就像我们的敌人一样，他的惯技也就是挑剔个别陷入歧途的人的错误，并且称财产共有共享原则就属于这种错误，进而呼吁人们群起而攻之。——啊，当他稍微收敛一下他的虚荣心和利己欲，想花些力气去研究劳动社会化和财产公有化原则，研究实现这一原则的必然后果时，有些人，如扫罗，多么想吹捧他啊！提倡财产共有共享的，难道不是耶稣基督吗？最早的基督教徒难道没有实行财产共有共享吗？财产共有共享原则在婚姻中不是一直保留到今天吗？既然财产共有共享原则在婚姻中是必要的，为什么在国家中就不能实行呢？

^① 约·格·奥·维尔特《16和19世纪德国人的政治和宗教改革流派。论时局问题》1841年康斯坦茨的贝尔维尤版。另见文件27。

按照《人民报》的原则，该报编辑在第17号上对手工业者联合会采取那种无礼态度，理所当然要受到严厉惩罚；可是，按照我们的原则，我们必须宽恕他，因为他撰写那篇文章纯属身不由己，不由自主。我们拒绝订阅这家报纸，可能使那位作者一时冲动，情不自禁地给自己的报纸抹上了他永远也洗刷不掉的污点。

在财产公有的社会条件下，将不会出现这种或类似的弊病。一些可怜的人将保持纯洁，不受指责。因此，财产公有制是医治大多数可怕弊病的灵丹妙药。

本声明发至《人民报》的编辑乃至平等原则的所有敌人。伦敦德意志民主协会委员会委员：

施塔姆茨茨、贝克、鲍威尔、列曼、沙佩尔

为证实本副本的真实性，临时书记沙佩尔签名

1842年2月《年轻一代》（伯尔尼）第2
期第17—21页

17

威廉·魏特林为正义者同盟盟员入盟仪式规定的方针²²

1842年

接收新盟员

我们工人累死累活为懒汉们劳动，而且还要忍饥挨饿，别人则过着纸醉金迷的奢侈生活；我们不愿再让利己主义者把沉重的

负担强压在我们身上，我们不愿再遵守那种使人最多数、用处最大的阶级陷入屈辱、贫困、受人歧视和愚昧状态之中，从而使少数人能任意主宰劳动群众的法律，我们要自由，要使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像我们一样自由地生活，不分彼此，待遇均等，患难与共，和衷共济，也就是说，共同生活在一个集体之中。你们想同我们一样吗？

为此，我们已结成一个同盟，它必须保守秘密，以致即使在这样的国家我们也能进行活动，在那里，如果我们公开活动，就可能给我们的敌人提供迫害和肢解的把柄。恪守我们在会议上讨论的一切秘密，严守同盟存在的秘密，是非常必要的，每个成员务必遵守。你是否和我们一样同意这一点？

为了保持会议的活跃气氛，我们每个人都要履行参加会议的义务。你认为你能尽到这项义务吗？

每个被接收入盟的人都要按月向同盟储金处缴纳会费，至少订阅一份《年轻一代》，直到该杂志停刊为止，你能作出这种牺牲吗？

如果我们中有人失业或者患病，其他人都要每月给他以资助，你同意这样做吗？

其次，我们每个人的任务就是说服尽可能多的人相信我们的原则，并且随时准备接收那些有教养的、一贯遵纪守法、充满牺牲精神的人入盟。你愿意从事这方面的活动和具有这方面的热情吗？

我们每一个人在外出旅行之前，都要向主席报告行期和目的，并且到达某个城市的第一周就要马上把通讯地址告诉自己所在的支部。你愿意和我们共同遵守这一点吗？在你所到之处，你

能尽力接收新盟员，建立支部和联合会，出售著作以及敢于公开传播我们的学说吗？

跟我一起宣誓（全场起立，脱帽）：我宣誓严守同盟的存在
的秘密。

接着，新盟员在接收其入盟的人那里注册登记。

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将来如果建立协会，就首先让那些接收新盟员最多的人参加；同样，如果设立救济基金，那么，每个年满50岁、接收新盟员较多的人就将被安置在到时候能买到的住宅内。有资格享受养老金的实际人数，在养老金发放前一年确定。

手稿

苏黎世国家档案馆，魏特林文件，P.91.1

18

威廉·魏特林为共产主义者在瑞士各工人团体中进行活动而制定的组织计划²³

1842年

共产主义教育协会

协会的性质

本协会是一个为共同目标而进行活动的整体，它由一些大小不等的联合会以及一些零星分散、不同民族、等级和年龄的个人组成。他们满怀热情，千方百计地把志同道合者联合成越来越大的组织。因此，他们每次在离开大陆以前，总要设法弄到每个城

市和每个乡村的志同道合者的通讯地址，又把这些通讯地址告知其他志同道合者；他们两三个人或三五个人随时随地聚会，如果聚会的人数较多，他们就租用专门的会场；如果有人禁止他们在会场开会，他们就化整为零，分散在住所、工场和酒店聚会。总之，他们竭力回避任何暴力行动，不知疲倦地从事宣传工作。任何人都无法遏止善与真的宣传，不能阻止人们在工作、吃饭、睡觉和散步时谈话。

宗旨和手段

博爱。通过恢复使用“你”这个称呼，学会宽宏大量，不咎既往，都能养成惩前毖后的习惯，为了共同目的而采取共同行动。

社会教育。通过对各种社会制度的研究和讨论，提倡社交的、费用低廉的娱乐活动，避免各种豪华奢侈的开支，讲究有规律的生活方式。

宣传。通过同那些还不了解协会目的和手段的人交往，鼓励他们加入协会，支持和传播一切有利于协会目的的著作。

协会章程

目前应尽可能做到在生活的一切负担和享受方面保持**适度**，因为这样一来就有了一种叫做**健康**的法宝，有了一种胜过财富和荣誉的法宝。

不搬弄是非，哪怕其中包含某种真实的情况，搬弄是非是可耻的。如果对某个兄弟的所作所为感到不满，可以同他本人私下交谈，事先不得向别人泄露，其中包括不向公开侮辱和谩骂我们的

人泄露，而要把这个兄弟看成暂时不能支配自己行动的病人；同样，不谴责和蔑视每个罪犯，不谴责和蔑视任何被判处监禁等等的人。在协会内外口头宣传协会的原则。不提前几天向主席报告旅行的行期和目的，以便接受某种委托，就不得擅离协会。

在各个城市，应设法巩固原有的协会或建立新的协会。

至少每三个月给所属的协会写一次信，报告在宣传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

每个月缴纳少量会费，用于购买书籍、文集等等。

入 会 规 章

每个人在入会前两个星期，都须经某个人向协会作介绍，如果没有人反对，就被接收入会。他只须缴纳发给他的各种证件的成本费。在发给他的证件中，有一个会员证，上面有他的姓名、职业和籍贯以及入会的日期，此外还有协会主席的签字。在会员证的背面，每个协会成员都要让介绍自己入会的那些人的名字一一签上（因为这些人还不是大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成员），因此，被接受者也得把自己的名字签在入会介绍人的会员证上。

被接收者要把他的名字写进最早使他了解协会原则并介绍他入会的那个人的协会手册。

因此，每个会员都有一份**具有丰富宣传经验的老会员的名单**。

〔约·卡·布伦奇里〕《瑞士的共产主义者。依据从魏特林处发现的文件》1843年苏黎世版第34—37页

19

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委员会为《年轻一代》写的 通讯^①

1842年3月21日

英国社会制度的进步

1842年3月21日于伦敦

英国共产主义者之父，即最先^②向人民宣传财产共有共享的人，是**罗伯特·欧文**，他以热爱人类和热爱正义而著称；他的学生就像孩子对父亲一样尊敬和爱戴他，而他的原则的敌人则对他感到恐惧甚至敬畏。[……]^③

罗伯特·欧文这样成年累月地坚持活动，试图通过言论和著作向人民宣传他的原则。许多人对他的原则的真实性和可行性确实深信不疑，可是，直到1836年底，他的社会原则的支持者彼此还没有建立真正的联系。今年，曼彻斯特的一些工人，罗伯特·欧文的学生，才建立一个共产主义协会（因为在英国，人们享有结社权）。为此，他们拟定了章程，并把它递交给墨尔本内阁，而且确实得到了批准。共产主义协会被宣布为合法的协会。从这时起，事情有了迅速的进展，目前已有65个地方建立了协会，拥

① 本通讯曾先后两次在《年轻一代》上发表。

② 在第二次发表时，也许是威·魏特林将此处改为“在新时期最先……”。

③ 下面详细论述了欧文从1810年以后的活动。

有几千名会员，他们互有联系，已形成一个巨大的整体。

尽管英国的宗教偏见和政治偏见要比其他任何一个文明国家深得多，但还是取得了上述伟大成就，这主要可以归结为如下一些原因：

1. 通过工商业的联合，也可以说是通过许多人的财产共有共享制度，而这种制度为参加者带来的莫大益处，在英国这样一个以工商业为主的国家，必然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种众人的协作尽管还不太完善，但毕竟是财产共有共享制度的一种，他们为了一个目标把财产汇集在一起，大家一起从事劳动，共同分成。一方面是工商业协作具有这些优越性，另一方面是分散生活的人民陷于极度贫困，这样，理所当然要促使许多人产生这样的联想，协作必然会改善整个民族的状况，消除一切贫困现象；它既有物质方面的益处，也有精神方面的益处。

2. 一方面由于工人阶级的贫困日益加剧，另一方面由于少数人的财富与日俱增，因而使人迫切感到实行社会改革的必要性，甚至使人担心，再不进行这样的改革，就会产生悲观失望的情绪，从而引起可怕的无政府状态。

只有在道义上自由的人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政治自由，只有对公民进行教育，国家才能获得自由；这些正确的原则，主要是由共产主义协会想出来的。这些协会力图尽可能多地向人民传播政治知识和其他有用的知识，但绝不忽视社会原则；此外，还竭力通过道德的和健康的娱乐来摆脱粗野和肉欲。[……] 星期一，通常是打球和听音乐；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和星期六，则参加关于历史、地理、自然史讲座，上绘画课，教唱歌，上数学课以及教授其他有用的科学和文学知识。星期五开讨论会；

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也可以在会上发言，可以反对各项原则。这些讨论会既饶有兴趣，又富有教益，美好的事业取得了光辉的胜利。〔……〕

整个协会已购买了两大块地产，正在那里修建一个可容纳300人的建筑物，工程即将竣工，下个月，即5月就要举行落成典礼。这个真正实行共有共享的纯粹原则的尝试，今年很可能取得进一步的进展。我们已被邀请参加落成典礼。只要有一点可能，我们就将前往参加，以便能准确地把这座富有乡村特色、舒适安逸、令人赞叹的建筑物给你们描绘一番。这块地产就叫梯瑟里。^①

只要有勇气，真理就会获胜，让我们为此欢呼：

即使世界上到处都是想要一口吞噬掉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决不会胆战心惊，事业必将成功。^②

以你们的朋友的名义，

委员会：

E.施塔姆维茨

卡尔·沙佩尔

莫尔

1842年5月《年轻一代》（斐维）第5期第65—69页；载于该报第6期第108—112页（威纳尔·柯瓦耳斯基编《从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1967年柏林版第209—212页）

节录

① 指欧文的“新和谐”公社，参看文件25。

② 这里随意引用了马丁·路德的诗歌《我们主是一个坚固的堡垒》，恩格斯把它称之为16世纪的《马赛曲》。

20

格尔曼·莫伊勒（巴黎）给埃蒂耶纳·卡贝（巴黎）的信

1842年6月1日

尊敬的先生：

我要到埃夫勒去几天，去探望一位身患重病的朋友，所以，我眼下无法完成我答应明天要交给您的那篇文章，更没有时间把它誊请了；不过，我一回来，就马上把它寄给您。

如果我在这次旅行中能为杂志^①的发展做点工作，我一定尽力而为，请您相信这一点。

不久以前，我怀着万分痛苦的心情听了一个报告，其中谈到了您在为人民和全人类的幸福作出高尚努力时所碰到的困难和阻力。我衷心希望您能顶住，坚信真理的力量。

得不到同时代人的承认，是所有伟大人物的命运。我们后代人是会公正地对待他们的，并将挞伐这一群鼠目寸光的批评者和敌人。您也许注定要遭到同样的命运，尽管我实在不希望如此。然而，我感到自豪的是，您一生中对各种复杂情况始终能应付自如，我深信这一点，我随时准备同谬误的鼓吹者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作为您的伟大学说的忠实学生，我将紧跟您进行斗争，直到

^① 卡贝出版的《1841年人民报》。

最后一息；我确信，拯救人类的长生鸟将在人道卫士的灰烬中再生。²⁴

尊敬的先生，请接受我向您表示深切的爱戴和崇高的敬意。

格尔曼·莫伊勒

1842年6月1日于巴黎

埃德蒙·济伯尔纳编《莫泽斯·赫斯和路易·克利柯夫斯基的通信》，载于1960年《年鉴》（米兰）第3卷第615—616页

21

西蒙·施米特（洛桑）给威廉·魏特林（斐维）的信

1842年9月16日

〔……〕我从这里给你写了两封信；第一封信谈了我对您的著作的印张数的意见，而更多地谈了有关地址的事，至于著作本身，你可以不作任何修改：多一个或少一个印张都无所谓。总之，你认为怎么合适就怎么办，这一点，你一定很清楚。²⁵

有一个名叫舒斯泰尔的人从圣克罗瓦途经这里时，委托你给布拉诺尔寄一个通讯地址去。我对他说，他会收到通讯地址的。正如你看到的，第二封信就已用这个地址了。当然，现在已经时过境迁。今天或明天邮包将到达圣克罗瓦。^①光说要一个通讯地

① 指向法国销售《年轻一代》，而这是法国政府所禁止的。有一次，法国当局终于在边境截获了一个内装1200份《年轻一代》的邮包，并在伯桑松焚毁了。

址！究竟要哪个地址？光说要钱！究竟要多少钱？我倒是认为，应提醒你记住我曾经向你提过的那两点建议。

1. 你可以〔委托〕霍曼或者另一个可靠的人，他能作少花钱的旅行，能在伯桑松接到著作并把它转交付印；付给这个人的旅费。或者

2. 著作可以让走私者偷运过境，而不必另找其他某个人，答应给他出一半旅费，其余一半旅费，等著作到了巴黎后再给他；这样，就可以每个月跟同一个人订立协议。

手稿

苏黎世国家档案馆，魏特林文件，P.239.1

节录

第一次发表

22

奥古斯特·贝克尔（日内瓦）给威廉·魏特林（斐维）的信

1842年9月24日

〔……〕在伯尔尼和日内瓦，有人对你的傲慢态度，对你竭力以共产主义的教皇自居感到不满。我则为你开脱，反对这样的指责，而且，只要你坚持这样做，即令别人不支持事业，我将永远站在你的一边。但是，我将支持所有的人，至少是那些我认为像你一样可能对我们和对事业都有利的人。我认为，载勒尔就是这样的一个人。^①他能够通过他的报纸〔通讯〕^②给我们以极大

^① 在信的第一部分，贝克尔袒护了载勒尔，不同意魏特林的责备。魏特林曾要求贝克尔断绝同载勒尔的通讯联系。

^② 文件缺损。

的帮助。目前，《年轻一代》的影响还相当有限。只要巧妙地利用大型报刊，我们就有许多事情可做。〔……〕

现在，我们已创建了一个协会。我们总共有34名会员；我们订了《莱茵报》和《法兰克福报》，还要订阅《邮政小号角》、《〔瑞士〕国民报》和《海洋国家》，可能还会弄到《先驱者》。我们花了10法郎在彼隆路154号咖啡馆里租了一个漂亮房间。照明等等由店主提供。在协会里，巴泰尔斯是发言人，海尔贝克担任主席；霍曼开始时谈锋甚健，现在则沉默寡言。我曾在《德意志信使》报上写了一篇共产主义长文，《邮政小号角》和《海洋国家》也许摘要转载了。

手稿

节录

苏黎世国家档案馆，魏特林文件，P.239.1

23

威廉·魏特林（斐维）给正义者同盟某成员（苏黎世）的信

1842年10月9日

10月9日于斐维

亲爱的兄弟：

前天，我收到了你10月3日的来信，你说没有收到我的信，我觉得很奇怪。

我不知道原因何在。我准备马上写信到伯尔尼查一下，是不是那里的人忘记把信发出去了。

我想向你说明一点，首先，你可以想一下，从现在开始到11月底，我要忙于付排我的著作，而且像往常一样，还要负责杂志的发送工作。当时我是把所有寄往伯尔尼及其近郊的小包裹捆成一个大包裹寄去的，然后由那里的人重新拆开，把各小包裹加封后送往邮局。在给你的包裹里，一共包了三本小册子和几本不配套的杂志。《海鸥》和《人类》我们一本也没有了，所以这次我们未能满足你的要求，不能如数给你寄去，我已给巴黎写信，不知他们那里还有没有《人类》。

我深感不安的是，我把章程^①也一起给你邮去了，当然，还不至于落入他人之手。我一直到两周前才给你写信，是不无原因的，我首先得写信到日内瓦和洛桑，打听一下那里还有没有你所要的小册子。

尽管事情这样不顺利，但使我感到欣慰的是，你对事业确实非常关心；根据我的观察，我们完全可以信任你的热情。不过，我还要提醒你，据说在苏黎世的一个协会中，有许多人暗中是属于“青年德意志”²⁶的，实际上，他们是反对我们的原则的。这帮人不参加理性的讨论，而是拉帮结伙，因为他们在讨论中屡遭失败。如果你对此还不了解，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你总有一天会了解的。

这帮人总是说什么，这是一些过激的思想，或者说，这种平等如果真能实现，那敢情好，但这是无法实现的幻想。讨论这种事，只会有损于出版自由的事业。还有一些人说我们还没有筹划好就想要共和国，等等。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就让他走开，不

^① 参看文件30。

要去同这种人浪费宝贵的时间。精明能干的人有的是，他们会理解你的。此外，这类庸人所到之处，他们的谬误只要一露馅，立即就会遭到人们的公开谴责；人们到处都在捍卫**平等、自由、和谐与博爱**，其他一切都是政治魔术，如果我们不是人人平等，就不可能人人自由。今天，有钱有势的人不管走到哪里，即使到了俄国，也是自由的，他们可以用金钱绕开一切法律。而我们的目的并不是只要**一些人**享有自由，而是要使**所有的人**都享有自由。然而，只有所有的人享受了平等，他们才能享受自由。谁贫困，谁就没有自由，因为他要生活，就必须为富人效劳；谁富有，谁就能享受自由，因为他不需要劳动，他可以用金钱指使别人为他效劳。工人们不懂得这一点，就成了可悲的奴隶；难道不是这样吗，兄弟？

估计那个包裹你能收到，不过，我还是随信又给你寄去了几本章程，你如果发现相当精干的人，就可让他宣誓入盟。在你确信他可靠以后，就先向他宣读章程的前18条，章程的全文以后再给你寄去。

你还可以同伯尔尼的裁缝，现住兰策尔家（市场街79号）的沃尔弗斯取得联系，并同他建立通信关系。他出生在苏黎世，是我们的人。

你的兄弟 魏特林

这封信阅后请立即销毁，以免落入他人之手。

著作一出版，我就给你寄几本。

你务必把章程保管好。

我刚才查通讯录时发现，我把包裹上的人名写错了，于是，我带这封信的信封跑到邮局，取回了我的包裹。

所以我没有把章程随信寄出，因为我想你无论如何会收到上次那个包裹的；取包裹时，只要出示这封信的信封就行了。

手稿

第一次全文发表

苏黎世国家档案馆，魏特林文件，P.239.1

24

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威廉·魏特林（斐维）的信

1842年10月26日

1842年10月26日于巴黎

亲爱的兄弟：

你的著作付印究竟还需要多少钱？随信寄去我曾答应你的100法郎；——这些钱一部分是支部认购的，另一部分是我个人捐献的。现在，尽快把书印出来，它可能产生像大卫·施特劳斯博士的《耶稣传》那样的影响；也就是说，它将彻底改变德国人的本性。因此，现在要不惜任何牺牲。正如奥格斯堡《总汇报》所说的，现在，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确实允许20个以上印张的书籍出版了。但你不要把这件事放在心上。顺便提一下，你要送给普鲁士国王一本，但不要讲恭维话。

我们对高贵的西蒙^①采取宽宏大量的态度感到高兴，他捐助了一小笔钱。不久前，他写信告诉我们，在联合会中发生了何等

^① 西蒙·施米特；关于他为付印《保证》一书所起的积极作用，参看注25。

可恶的事，你终于取得了胜利。²⁷请你告诉他，他说艾韦贝克兄弟已到美国去了，他搞错了；艾韦贝克根本没有考虑去美国，相反，他倒是正在考虑另外一件事。

向霍曼兄弟，即那个勤奋的工人问好。

我们请求你们，对待敌对的“青年德意志”派既要严厉，又要宽容，最后取得谅解。因为现在还不知道：钟明天是否会敲响，钟声一响，大家都得站在一起。

在一年之内，将要出版一批令人瞩目的、有分量的书。现在，德文书就像落潮以后涨潮那样急剧上升，而德国语言也异乎寻常地完善了。

伦敦方面没有寄什么东西来吧？要刻不容缓地警告他们，务必写一些有分量的书，只有这样的书今后才会有销路。奥格斯堡《总汇报》新近对你议论纷纷，当然，都是卑劣的无稽之谈。想必你已在报纸上看到了。

祝你安好。你给杂志^①撰写的文章下一期就要发表。我们正在设法筹款在巴黎创办一家德文月报（不排斥共产主义的东西），旨在准备把这里的80 000名德国人组织成兄弟会；否则，枪声一响（而这是转瞬间就可能发生的事），这里又将发生爱国者互不信任的丑闻。

英国的蛊惑者总是劝告人民遵纪守法，而他们现在竟被合法而安静地关了起来，这简直是作茧自缚。这简直是一群蠢猪。

祝你安好，敬礼并握手

手稿

苏联国家档案馆魏特林文件，F.239.1

^① 指魏特林出版的《年轻一代》。

25

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为《年轻一代》写的通讯

1842年11月5日

1842年11月5日于伦敦

我们好长时间没有给你们写信了。要不是英国的政治事件（你们会从报上看到的），我们早就写信给你们了。今年夏天，英国似乎处在一场政治和社会的大变革前夜，我们的文章已经写好，但还在等待时机，以期给你们提供事态发展的确切消息。

在最近的骚动^①中，贫困的、过于轻信的人民又一次上了当；他们一方面上了政府的当（政府无非就是干了每个政府在有人要夺取它的权力时所干的事情）；另一方面，他们还上了那些夸夸其谈和舞文弄墨的人的当。后者用花言巧语煽动人民，而在危险时刻竟胆怯地把人民抛在一边。——可是，由于我们的报纸是研究当代政治事件的，而不是研究社会事件的，所以，我们对这里所发生的骚动不作进一步的评论，而把我们的研究仅仅局限于英国社会制度的进步。

你们可以想象到，由于人民日益加剧的贫困（最近的骚动又加剧了这种贫困），不仅有越来越多的人希望社会变革，而且也日益感到这种变革的必要性；可是，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用于真

^① 参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12—523页。

正实行财产公有制的捐款比过去大大减少了，因为大多数人找不到工作，现在他们甚至没有钱买面包。

如今，反对社会平等的人绞尽脑汁想利用报纸，散布诽谤性的流言蜚语，甚至采取荒唐可笑的愚蠢举动来遏止进步，可是迄今为止，他们的一切努力反而促进了美好的事业。——财产共有共享原则是无可厚非的，反对者无非是说说空话而已，比如说什么“你们大家都会知道，财产共有共享和世界大家庭是何等可笑”。说得多巧妙啊！有人进行人身攻击，以避开原则之争，比如，有人至少企图伤害这些原则的捍卫者。在这里有人竟对人民说什么社会主义者是不信上帝的，说什么他们指责婚姻，等等。每个人只要参加过一次社会议事厅的会议，就会明白，诸如此类的指责都是无中生有的。〔……〕

梯瑟里的财产共有共享制，或者现在所说的新和谐，产生了极其辉煌的战果。新和谐由全体人员选举产生的七人委员会主管；在那里，人人劳动，共同享受所创造的成果。——我们的许多在那里度过夏天的朋友对这种制度的赞扬可能还不够；他们说，连社会平等的最顽固的敌人，只要目睹那里居民之间的友爱，听听居民之间的谈话，参与居民的劳动和享受，也会得到感化。〔……〕

社会制度的进步，在那里确实是伟大的，要是英国人不如此消极，表现得勇敢一些，那么，许多事情是大有希望的。

我们从报纸上和私人通信中获悉，社会主义原则甚至在德国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最近，《莱比锡报》报道说，在布雷斯劳已经成立一个共产主义者协会，它所遵循的原则也是这样的。——会员们虽然佯称为了基督教的目的聚集在一起，但还是接收

犹太人加入他们的协会！人们终于觉醒了！人们终于开始理解人类拯救者的要求了。

不错，现已进入人类历史的一个崭新的阶段：废除过多的财富，消灭无限的贫困，这是一个战斗口号；有人试图遏止时代精神，总是怀念过去，而不是面对现实，面对自己必须做的事情。这些人的努力是心劳口拙的，非常可笑的，甚至是十分危险的。

话说回来，我们的就餐协会成立以后，情况日益严重了，直到现在，我们面前还有许多困难，特别是，大家居住得非常分散，鞋匠们都在家里用餐；不过我们起草了规章，每周缴纳会费，以便在3月份把事情安排妥当。

向所有的朋友问好并握手

代表委员会：

卡·沙佩尔

约·莫尔

1842年12月《年轻一代》（斐维）第12期

节录

第203—207页（威纳尔·柯瓦耳斯基编

《从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

1967年柏林版第331—304页）

26

威廉·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摘录²⁸

1842年底

[……]幸福在于满足，而满足在于自由。但是光有自由而没

有共有共享，对于某些人从局部来说也许可以，但对于所有的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事。

如果从今天起，地球上的一切穷人都能过着王侯们一样的生活，而王侯们则都过皇帝一样的生活，从而每一个人都生活得比从前好百倍，人并不因此就感到满足，因为在这样一个不平等的组织里他并不自由。〔……〕

任何重大的改革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实现；因为任何旧事物被新事物代替都是一场革命。新的理想的实现，不论它是由人民或是由一个君主所推动的，不论它只是通过物质的力量或是通过精神的力量或是通过两者来争取的，总之，它是一场革命。

革命是永远会有的，只是它不一定永远是流血的革命。

同样，我们的原则也要通过一场革命来实现。但是目前的这种混乱状态持续越长久，革命的经过也就会越可怕；因为这种混乱日益加剧需要和人口之间的极端的失调，从而使一种温和的、和平的、渐进的过渡就越成为不可能。〔……〕

有些庸俗政治家认为，人们必须首先争取一种他们称之为共和国的不平等的状态，人们必须首先进行一场政治革命，也就是说，必须在政府里换一批人，为了精神贵族和金钱贵族的利益必须推翻君主们和贵族们。对于这一点我的意见是：如果我们不得不作一次牺牲，那就最好为了不论对我们或者对社会都是最必要的东西而牺牲。我们，人民，既然不得不自己去动手收拾一切，那又何必要去帮着别人干呢？这些人要是有一天得到他们所想要的东西，他们就会同今天的那些野兽一样，当着掠夺物而对我们龇牙咧嘴的。我们并不把任何党派的利益同全体的利益割裂开来；但是谁不要集体的利益，谁所要求的并不是为了全体的，谁就不

会得到我们的支持。现在，那些有钱人和有学问的人也对现存秩序不满；因此我们要小心，只要我们还有理由不满足，就不要去帮他们满足。不满足的人越多，影响越广，由于这种情况而产生的一种运动的成功的希望也就越大。

对于我们德国人来说，进行一场政治革命要比进行一场社会革命困难得多，因为我们要消除各宗教之间的成见和德国各族人民之间至今还严重存在的相互敌视，只能依赖于大规模的、震惊世界的事件，而首先是**立即向人数最多、最贫困的阶级提供物质利益**。任何能达到这一点的革命都是社会革命。那些政治家们所谋求的德国的统一，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才最有可能。[……]

威廉·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1842

摘要

年斐维版第5、230—231、252—253页（参

看1960年商务印书馆版第63、261、281页）

27

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西蒙·施米特（洛桑）的信

1842年12月5日

1842年12月5日于巴黎

亲爱的兄弟：

你总是在孜孜不倦地耕耘，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不知疲倦地耕耘；你还慷慨解囊，这是我们早已知道的；整个人民议事会对你都满怀敬意，深表赞许。不过，你无论如何要同魏特林

保持友好关系，我们以人民议事会的名义请求你这样做，因为你们两人是由于德国的命运和世界的命运才走到一起的，是相互依存的，彼此不要失去耐心。你们虽然性格不同，但还是可以和睦相处的。〔……〕

魏特林在来信中还谈到了一个奇怪的预言家，叫做阿尔布雷希特。魏特林说，他曾问过你们是否可以同这个人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希望你们像我们一样，严肃地劝告他，因为同一个把旧约全书当作原则、提倡一夫多妻制等等的人进行平白无故的接触，对我们来说，无异于被舆论判处死刑。这样一个傻瓜（当然，他可能是非常了不起的、富于思想的人）是不是在宣扬财产共有共享，同我们有何相干？够了，他在道义上是精神病患者，他将在《年轻一代》上遭到比维尔特^①更为激烈的反对，就像多妻制论者和人文主义的东西遭到卡贝先生的反对一样。否则，我们就会背叛神和人，也就是背叛真理。我们请求你们拿起你们的武器，口诛笔伐，给予无情打击，否则，我们至少在精神上就会失败。

罗森贝格（鞋匠）已从我们这里拿走34个法国法郎、从马尔滕斯那里拿走15法郎当旅费，他答应立即能从瑞士的师傅那里预支到这笔钱并偿还（给你们）。你们要勤催着一点。

敬礼并握手

巴泰尔斯兄弟难道完全离开我们了？看来他是个正直的人。

手稿

苏黎世国家档案馆，魏特林文件，P.239,1

节录

第一次发表

^① 1842年4月《年轻一代》第56—61页上刊登了一篇文章《评维尔特〈德国人的政治、宗教改革流派〉的若干段落》，另见文件16。

格尔曼·莫伊勒（巴黎）给威廉·魏特林（斐维）的信

1842年12月11日

1842年12月11日于巴黎

亲爱的朋友：

一方面由于病魔缠身，另一方面由于事务繁忙，好久没有通信了，今天，我把为《新一代》^①撰写的几行社会诗寄给你。

[……]你寄来的《年轻一代》合订本（到10月号为止）已经收到。我对你为美好事业进行英勇斗争感到十分欣慰，可是有一篇文章——你的能量体系或能力体系^②——我不敢苟同。当然，这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在其他言论和见解方面，还是不谋而合的。我们只要不盲目地去寻求真理，那么，不管是从北边还是从南边出发，迟早会殊途同归。[……]你还没有回复人民议事会的上次信函，它对此感到很奇怪，请你尽快回复。[……]

祝你安好，请相信我对你的爱

你的忠实朋友

莫伊勒

手稿

苏黎世国家档案馆，魏特林文件，P.239.1

节录

第一次发表

① 这是《年轻一代》之误，它有时发表莫伊勒的诗作。

② [威廉·魏特林]《我们的原则的统治形式》，载于1842年7月《年轻一代》第6期第86—95页。

29

奥古斯特·贝克尔（洛桑）给威廉·魏特林（斐维）的信

约1842年12月中旬

亲爱的魏特林：

你为什么不来信？为什么一点也听不到霍曼的消息？书已卖掉七册，赫瑟准备把钱寄去；其他的书还会卖出去的。〔……〕为《德国年鉴》撰稿的都是了不起的人物。他们虽然很富有，但却主张取消货币。他们自己证明，真正的威力的确强于金钱。尊重他们的荣誉——但不是尊重他们的金钱！他们是在哲学思维的道路上走到这一步的，而有些人实际上是在贫困中走到这一步的，——或者说，应当在贫困中走到这一步。〔……〕²⁹

手稿

苏黎世国家档案馆，魏特林文件，P.239.1

节录

第一次发表

30

正义者同盟章程（残稿）³⁰

约1843年1月

义 务

第1条 正义者兄弟会由德国人或说德语的人组成。

- 第2条 本兄弟会的宗旨是拯救人类^①，并确立人人都能享受的平等和义务。
- 第3条 本兄弟会是秘密组织。
- 第4条 所有兄弟彼此都要严格尊重对方的习惯。
- 第5条 谁意识到自己干了某种丢人的事，如不愿可鄙地离开这个高尚的兄弟会，就得及时醒悟，痛改前非。
- 第6条 每个人都要做到：吸收新成员，协助扩大成员的数目。
- 第7条 接收入会的必要前提是：
无可指责的品行；
坚强的性格、有勇气；
勤奋、坚韧不拔、乐于作出任何必要的牺牲。
- 第8条 兄弟之间人人平等；在遇到危险时，负有帮助和关怀死者亲属的义务，这种义务与对祖国和人类的义务同等重要。
- 第9条 兄弟之间要开诚布公；谁要在兄弟会中发表反对某人或某事的意见，他就有责任公开地在会议上发表意见。谗言者为人所不齿。
- 第10条 由个人提出的各项有利于本兄弟会的建议，都应抽出部分时间进行讨论，但不能影响原则讨论的继续进行。
- 第11条 本兄弟会的事务应严格保密。反对者可退出兄弟会。

① 只要把布伦奇里出版的其他资料同原件作一比较，就可以看出，他的出版物中的着重号通常是他自己加的，“义务”这一部分中的着重号看来也是布伦奇里所加。

第11条^① 务必准时参加会议。三次缺少理由充分的请假条者，按自动脱会处理。

第12条 务必每月缴纳会费和病人捐款；除非有充分理由，方能免缴，各支部均备有本《义务》的副本。

[约·卡·布伦奇里]《瑞士的共产主义者。依据从魏特林处发现的文件》1843年苏黎世版第51—52页

31

塞巴斯蒂安·载勒尔（莫拉特）给西蒙·施米特（洛桑）的信

1843年1月2日

1843年1月2日于莫拉特

恭贺新禧！

您上月27日来信说，我的小品文《瑞士报刊。新年感想》尚未在《莱茵报》上发表。我早在12月19日就已将稿子从这里寄出，对此我不得不感到奇怪。唯一的原因可能是我写得太激进了；警察当局已迫使该报编辑鲁滕贝格博士从科伦返回柏林，并已强迫出版者雷纳德公司采取另一种倾向。³¹让政府见鬼去吧！

^① 原件如此。

[……]

我在一周内完成了两本小册子，第一本小册子，即《财产在危急中！或者德国和瑞士为什么害怕共产主义和理性信仰？》，历史地概述了从亚当到格劳夫和德莱克的共产主义。在这里我利用了《年轻一代》上的许多材料，简要地勾画了四位福音大师——孔斯坦、卡贝、蒲鲁东和魏特林——的特征。在这本小册子里，我身为作者只做了一些纯编辑性的工作。这本小册子将给魏特林的书带来很大好处。我在小册子中也谈到了自由的圣经，光凭这一点就足以使德国大喊救命！我们需要的正是这一点！必须给德国敲敲警钟。把自己圈在协会里是愚蠢的。协会固然有它的作用，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主要的是扩大全部共产主义文献的影响。在这方面，魏特林、谷兹科夫、海尔维格、贝克尔、席尔格斯、施米特和载勒尔带了很好的头。[……]

为了向《莱茵报》提出赔偿损失的要求，并考虑到我往后可能要撰写述评，我请您查阅一下该报的索引：从10月底开始，即我去旅行以后，在《瑞士》专栏内，即在《伯尔尼和日内瓦》这一栏内，标上✕这一符号的有哪几篇文章。您可以相信我，如果您把这几号报纸在几小时内用挂号寄给我，我保证在24小时内连同施泰因和拉蓬纳雷耶的著作准时奉还给您。不过，您得马上就办！邮费只要1巴岑。同时，请您把您知道的那几号《瑞士国民报》一并寄来。

请把随信寄来的警告立即投入邮箱！①

① 这句话写在信的第1页边上。

手稿

苏黎世国家档案馆，魏特林文件，P.239.1

节录

第一次发表^①

32

奥古斯特·贝克尔（洛桑）给威廉·魏特林（斐维）的信
约1843年1月中旬^②

[……] 关于预言家阿尔布雷希特，这一次我同意施米特的意见。你可以利用他去做沿街叫卖者；但除此以外，你不要去同他打交道。你要是没有读过他那种滑稽可笑的作品，也许你对他会有另一种看法。这个人简直被圣经弄疯了。他说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以色列12宗系的后代，他似乎早就梦想恢复所罗门的天堂。我知道，他还要实行各种各样的社会变革。在这方面，他已找到了样板，如阿伯拉罕和所罗门的多妻制；众所周知，所罗门拥有一座养着700名妇女的后宫。总之，你不要同他打得火热了。你知道，对于极其严肃的事情来说，最危险的莫过于可笑的东西了——而这个预言家可能在笑话我们和我们的事业。因此，不要去理睬他！³² [……]

我为你的著作写的评论，竟都遭到了厄运。我曾把稿子寄给

① 布伦奇里已在《瑞士的共产主义者。……》1843年苏黎世版第76—77页上发表了该信的摘录。

② 这个日期是根据下面的情况确定的：1842年12月底，《莱比锡报》被禁止在鲁普上发行；1843年1月初，《德国年鉴》也遭到查禁；而该信提到了这两件事。

《莱比锡报》、《莱茵报》和《哈雷年鉴》^①，但第一家报纸和最后一个杂志都已被查禁，《莱比锡报》原来是否准备刊登，我不知道，我从不读它。我给《哈雷年鉴》写的文章，起先是寄给苏黎世的弗吕贝尔的，同时请他从那里寄一本《保证》给奥托·维干德。这事也许办得太晚了。[……]

手稿

节录

苏黎世国家档案馆，魏特林文件，P.239.1

33

海爾曼·艾韋貝克（巴黎）給威廉·魏特林（斐維）的信

1843年1月31日

1843年1月31日于巴黎

亲爱的兄弟：

我们为事情进展得如此迅速而高兴，你向周围地区的胜利进军使我们大家深感欣慰，我们在此为你作出的努力欢呼，并向你表示感谢。此外，我们想请你给我们寄几本书^②来，并顺便寄几期《年轻一代》来。奇怪的是，无论是你，还是我们，以前竟没有想到这一点！你一定要每月寄一本杂志来，不要写信，只要在邮件上写上**印刷品**字样就行了。通讯处：医学院广场1—3号，数学教授仁尼利埃先生收，除此之外，不要附上任何书面的东西，平

① 参看文件22。

② 指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

鄙就行了，这样就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梅克伦堡的施泰因博士春天曾到这里来过，向卡贝详细打听有关原则的问题，他说他要研究并全面阐明这个问题。卡贝高兴地向这位年轻的法学家阐述了一切，并设法给他弄到了参考书。但是，这位法学家同费奈迭也过从甚密，费奈迭带他去找莫伊勒，而莫伊勒让门卫告诉来访者，说自己不在家（也是幸运）。据说这个施泰因现在还在这里。他的著作已在莱比锡（由维干德）出版了，我们已在两号《奥格斯堡》上读到了吹捧这本可鄙的书的评论。³³〔……〕这本书在德国掀起了轩然大波，你的书就是最好的回答，这场风波很快就会平息。对他的那本书进行反驳，现在还为时过早。

别害怕，要忍耐，鼓起勇气；我们比这些乌合之众要高出一筹。

《德国年鉴》是哲学博士卢格在萨克森创办的，最初是纯文学性的杂志，后来慢慢成了哲学、政治、宗教性的杂志，它高举净化了的黑格尔主义的新的（不是旧的、坏的）哲学火炬，把僧侣、贵族和君主政体统统化为灰烬——宣扬共产主义。现在它已经被查封。新年那天，它号召建立德意志共和国。^①这个杂志出版了四五年，在德国知识界和官场中做了大量的启迪工作。它自己也承认还没有做到所要求的那样通俗，但是，知识界无疑受到了启迪；上帝可以作证，它的确忠诚地进行了这种艰辛的工作；卢格（过去是蛊惑者）马上被德累斯顿区选为市参议员，以资报答。我以前曾给他写过信。

你务必在杂志上向读者扼要而有力地披露**这些情况**。

^① 阿·卢格《白由主义的自我批判》，载于1843年1月《德国年鉴》。

据说《莱茵报》也将被查封。³⁴

共济会运动是不能利用的，我本人就在其中；霍曼也会这样告诉你的。他的高尚的活动博得了一致好评。但愿他马上来信，地址是：圣奥诺雷街30号，缪林格尔。你也立即把他的地址告诉我们。[……]

手稿

节录

苏黎世国家档案馆，魏特林文件，P.239.1

34

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威廉·魏特林（斐维）的信
约1843年2月

像赫斯这样一些人^①在他们的圈子里起着直接的作用，在他们的圈子外则起着间接的作用。我们不要独辟蹊径，不要书生气十足，要同他建立亲密的联系，这对你们两人都有好处。³⁵你为什么不来信？你的瑞士各州之行，不致妨碍你给我们和伦敦人写信吧。伦敦人对你的沉默无法理解。你的服装和其他费用共75法郎，他们已从伦敦寄给在洛桑的施米特，他们想知道，你是否已经收到。³⁶施米特已经退盟，这是他在不久前回答我们的问题时告诉我们的，他还谈了一些其他的事情，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一个积极的共产主义者。^②我们

① 信的开头部分显然已散失了。

② 魏特林已开始不信任自己的战友，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病态的。他同施米特的关系，在1843年初又日趋紧张（参看注25），最后完全破裂。

很想知道，我们寄去的75法郎你是否已经收到（那个地址是你提供的）。³⁷ [……]

不要经常派人到巴黎去，应该派人到里昂和布鲁塞尔去。这是两个主要地区。

我再重复一遍，努力做好《年轻一代》的出版工作，同时继续写书，要写大部头的书^①，这是上帝的旨意。

致以问候并握手

手稿

节录

苏黎世国家档案馆，魏特林文件，P. 239.1

35

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威廉·魏特林（斐维）的信³⁸

1843年2月19日

1843年2月19日于巴黎

亲爱的兄弟：

真奇怪，你又忘记把你的通讯地址寄给我们了，而我们正需要你的通讯地址。

你上次写给我们的那封信，使我们感到十分意外，而且很痛心。你犯了一个大错误，你的建议是不正确的，就像主张现在就实行公妻制的兼爱建议一样不正确。变私人占有为公共占有，虽然是我们的原则，但我们选择实现这个原则的手段必须同这个原

^① 参看文件39。

则本身相适应。

问：建议采用的手段足够了吗？

大家知道，“20 000个勇敢机灵的家伙”，彼此之间是各不相同的。有些人因为困苦和绝望，而有些人则因为利诱和癖好。你知道，他们道德败坏。这些人干坏事的时候，你是否认为那些还不是他们同伙的人会羡慕他们模仿他们呢？不，大家会看到，遭难的人，一部分去干偷窃勾当，一部分则不然。古往今来一直如此。然而，其余的人越是害怕原则，在他们中实行原则的困难就越大。当然，不是不可能实行，神圣的东西决不会不可能，而原则就是神圣的，只是被拖延，被耽搁罢了。在这里不妨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加以说明，明斯特再洗礼派的共有共享原则惨遭失败，或许就是由于公妻制这种不幸思想造成的。这是过去的历史教训，未来将会吸取这个历史教训。手段错了，就达不到正确的目标，而且通往目标的道路会越来越狭窄。只有经过长期而艰苦的精神劳动，找到了正确的手段，通往目标的道路才会越来越宽广。

光有上面所讨论的那个手段还不够！甚至还会有害，对它的反应可能非常之大；贪得无厌和掠夺成性在情感上会无限膨胀。这两种欲望（像其他一切欲望一样）是同某种内心要求一致的，即同自我要求一致的。所谓自我要求，就是把外在的东西，不管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只要还不属于自我，就千方百计使它属于自我。

我们不妨把这种要求称为自我实践的或主动的或积极的人生要求，即吸引。——这同用来维护和保卫自身的那种防御要求必然产生矛盾。——但这里的关键是使这种内心的吸引要求变得高

尚，要想到为所有的人和每个人谋求幸福。而有人却在鼓励掠夺和偷窃的欲望，难道这种欲望能使吸引要求变得高尚吗？这种欲望难道同伪善、诡计、谎言、欺骗、忌妒有什么不解之缘吗？这些都是无法净化的同类，应当抛弃它们。

如果这20 000人（这是你信中写的整数）都按这种欲望去行动：什么人，又有什么东西能担保他们不一意孤行，蛮干到底呢？到那时，他们又可能成为美好事业的绊脚石。如果共产主义者同这20 000人混杂在一起，同他们一道行动，那么，谁能区分共产主义者和那20 000人呢？这20 000人中间，只要有一个人被传到法庭，他就会非常准确地、机械地模仿共产主义者的语言，他要是聪明人，就会比一个诚实的、但不擅长辞令的共产主义者更加能言善辩。

这20 000人中许多人容易感染他人的生活，即他们的阔气、鲁莽、懒散一旦暴露出来，这些见多识广之士就会败坏我们这些实实在在地为兄弟们的幸福而活动的共产主义者的名声！因为这20 000人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不光彩的家伙，都会莞尔一笑地说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将要盗窃我们的东西，将要杀害我们，并且将不同无教养的人和臆相处。我们向你承认，我们可能要利用不高尚者的高尚欲望，使他们变得高尚；但是，我们大家都恳求你弄清楚这种还不高尚的内心欲望是怎样产生的。

显然，这种欲望只有在遇到足够的均势时才能产生。那么，这种均势靠什么维持呢？是靠我们的智慧吗？你不是认为，我们的高尚学说可以使这20 000名贪得无厌的人变得高尚吗？你说他们的孩子，也会变得高尚吗？通过这个例子，那种下流而肮脏的

贪婪的流行病也传染给我们的孩子，那该怎么办呢？我们的孩子从小就耳闻目睹我们怂恿唆使那帮强盗和小偷，岂能不变野！

是靠人民维持吗？你肯定不是这样认为的，你根本就没有把人民的智慧放在眼里。

是靠使有产者产生恐惧、使他们产生忧虑，叫他们保住自身利益吗？有产者中只有少数人，很少数人会相信这一点，而多数富人将联合得更加紧密，并为了自身利益把不太富的人也拉过去，同他们更加团结一致地对付偷窃的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不会停留在偷窃上；不会干流血的事。因为还有狂暴的偷窃，而别人当然是害怕流血的。

我们深信，亲爱的兄弟，你错了；人难免要犯错误；但是，心情越激动，理智就越要冷静。

所以，这种手段也是有害的，因为它是不道德的，而且并非解毒的良药。

耶稣教为什么（请记住这一点！）理所当然地令人感到厌恶？（1）因为它追求的是一个坏的目标，即听从罗马教皇的指使，而实现这个目标可以不择手段。（2）因为在它所采取的手段中根本没有任何道德的保证；它求助于极其恶毒的欲望，但它后来又纯粹用耶稣教顺从的教鞭来抑制欲望，而不是使这些欲望变得日益高尚。

我们的目标是神圣的，但我们要防止上述第二点成为我们与耶稣教徒之间的共同点。我们要采纳你为那种手段，我们与耶稣教徒之间简直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我们并没有忽视大局，我们希望，你不但要顾全大局，而且也要照顾到运用极其简单、极其可靠的方式达到目标的手段。我

们希望你不要把我们的指责看成是对你的中伤，但我们请求你也不要再在口头上或书面上像宣扬共妻制那样来鼓吹盗窃。卡贝不是傻瓜，也不是伪君子，他对这些事同样不感兴趣。那么，究竟必须采取什么行动呢？总之，这种方法很可能重蹈覆辙，我们务必更坚决地求助于良心，求助于人们的荣誉，使他们铭记构成我们共产主义核心的新宗教；没有这一条，我们取得的成果就像那些愚蠢到不愿改善任何物质条件的人一样是不完美的。立候回音。

致敬并握手

你在那本社会的书^①里为什么不能使用真正地道的德文词汇，而插进了那么多没有用的法文和拉丁文词汇？这方面的指责可不少；人们对你在最近一期杂志（它是通过仁尼利埃这个地址到我们手的）中使用的文风也有不少看法。你还是像《吁助》面世时所使用的这种地道而纯洁的德语来写作吧。

手稿

第一次全文发表

苏黎世国家档案馆，魏特林文件，P.239.1

① 指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

36

正义者同盟人民议事会一位成员（巴黎）给威廉·魏特林（斐维）的信^①

1843年2月21日

1843年2月21日于巴黎

亲爱的兄弟：

我们还从未收到过你的一封来信，就像这封信一样有这么多的错误，以致我们认为这是十分危险的，尽管我们早已在《年轻一代》上发现了这些错误的迹象，但我们没有想方设法消除。当时我们只以为这是你对蒲鲁东思想的暂时模仿，未曾想到这种危险的观点在你身上竟如此根深蒂固，后来竟偏激到颠倒是非的地步。啊！你说沙佩尔不理解你，不是，是你不理解沙佩尔。他到处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他不仅考虑了好的后果（但在这里根本谈不上什么好的后果），而且也考虑了坏的后果。他认为（甚至每一个对道德作冷静思考的人和朋友无疑都会这么认为），偷窃对每一个心术很正的人来说是可怕的，因此，这只能是无赖们干的勾当。按照你的看法，“蔑视偷窃”的习俗虽然不是固有的习

^① 该信的作者未能考证清楚，信中还有一段艾韦贝克的附言；从这封信的内容看，很可能是人民议事会的某个成员写的，在正字法和句子结构上，存在一些明显的特点和错误，这一点证明，它可能出自一位手工业帮工之手。

俗，但它在当今世界上却已成了大家都能接受的普遍习俗，让直接攻击这种习俗的人见鬼去吧！我们也不能寻根究底地去评判这究竟是权利还是偏见，因为当时的情况和今天的情况已截然不同，一切都已发生了变化，偷窃理所当然也变成了一种最可恶最危险的不道德行为；要是情况没有发生变化，那么，今天完全可以为偷窃打上合法的印记。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证明，正是这种被称为公正和合法的行为是从事偷窃和欺骗的有力武器，因此，它对社会来说是不公正的，危险的，甚至是人类遭受种种不幸的渊源；我们的任务并不是使那些构成人类渣滓、对事实和权利毫无感情的人变成诚实的人。我一旦认为某个人的行为是公正的，那么，这个人本身就理应得到尊重；所以，尊重一个人的行为而蔑视这个人本身是毫无道理的。

你不妨想一想那帮有90 000人之众的无赖，想想他们的头头，他们不是冒险家就是敲榨勒索者；再想想蹂躏瑞士的情景，你再往下想一想，当你在恐怖、复仇、放纵、谋杀和抢掠的现场停留片刻时，就会看到一种乱七八糟的场面。总之，简直混乱不堪，这时你站出来，要你的帮手把他们的抢掠行为放上理性和公正的祭坛，开始实行共有共享原则。噢！这样人们就会笑话你，杀死你^①而后快。而你就将被迫在牺牲者中建立一个新帮，以便反对老帮，重新开始，而且是一如既往地开始那种不光彩的共有共享制。可恶的欲望将从此可怕地扎下深根，以致一切真善美的东西都在社会上消失殆尽，而一切反作用又来得太晚，并且毫无结果。因此，让我们就此止步，不再往前，因为实在太乱太可怕

① “杀死你”三字是后加的。

了，致使人们无法辨明方向。

噢，朋友！你犯了一个什么样的错误啊！你竟想同地狱的复仇女神共建天国，你有这种想法，应该惭愧得无地自容。科学是实实在在的，不讲什么情面的，只有科学才能给你们可塑性和光彩；这一点你似乎还不理解，否则你就会像撒旦一样马上厌恶这种思想。

现在我们还要想到一帮能干的家伙，他们仅仅因为能干才被人说服去干偷窃勾当，给社会制造混乱，因为有人使他们相信，从这种混乱中将会产生非常理想的秩序。一个主持正义的人只有勇于克己，才可能采取这种方法，这一点，但愿你不要反对。所以，具有这种克己精神的人们，能具备比偷窃要可靠得多、完善得多的方法。因此，别再想偷窃了，把你的脑子清洗清洗，这是一种肮脏的勾当。你要大喝一声：别再诱惑我了，让我摆脱这种恶习吧！阿门。

你的大作的第二册我们已经收到了，邮费花了14苏；随后寄来的两件东西也到了，可是你想想，人家为了堵住这条邮路，竟采取什么办法？他们竟要求每件收费23法郎！！这样一来，当然只好把原件退回。

关于通讯地址的事，我们想多收集几个再寄给你，但是，为了取得这些人的信任（许多人可能都以为，他们的朋友或亲属会因此受到株连），请给我们寄几本这方面的书来，好读给他们听听。

我们对你的作品的评论以后再寄给你，我们打开了一看，发现有那么多的印刷错误，深感惋惜。这些错误都是由于排字工人的粗心大意造成的，而且竟粗心大意到如此地步，以致有的错误

乍一看还以为语法错误呢。你应当在《年轻一代》上设法更正。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尤其感到奇怪的是，你在信中针对施米特说了那么多的怪话，看来你是对他有些不满，只是没有明说罢了。如果事情同我们说的差不多，那么，我们希望你能对我们详细谈谈；施米特确实干了一些违背自己职责的事，所以你有责任对我们谈谈这方面的详情，以便我们向他提出责问。如果仅仅是你们私人间的事，那么我们希望别蛮干，以致有损原则。^①

立候回音。

你的兄弟

M. [……]②

关于章程，我们已按你的意思搞了一个，副本下次给你寄去。

现在寄上“义务”^③一节的副本，“组织”的副本随后寄出。“组织”的副本各区部都保存一份，“义务”的副本各支部都保存一份；铅印的章程在壁炉中销毁，这对我们巴黎人来说绝对是绝对必要的。^④

你自然不会再寄你的书了，收费23法郎实在太贵了。

手稿

第一次全文发表

苏黎世国家档案馆，魏特林文件，P. 239. 1

① 参看注25。

② 在这里只有暗示性签名。

③ 文件30。

④ 最后这一句和下面一句是文市贝克的手迹。

37

洛伦斯·彼得逊（洛桑）给威廉·魏特林（伯尔尼附近的朗根塔尔）的信

约1843年4月初³⁹

亲爱的兄弟：

你想引退，不愿在编辑部干了，不愿像以前那样斗争了？你不能那么做，将来也不要那么做。你的兄弟们有权要求你继续干下去；难道多数人看不出你的这种追求和行动并非出于自私？肯定是看得出的，即使在洛桑没有人看得出。^①你走了以后，这里的气氛有了很大的变化，星期三我们不少人又聚会了；我们将忠实地团结在一起，满腔热情地继续活动，请你坚信这一点；外壳虽然没有了，但内核将是永存的。至于已经发生的事，是否引起了忌妒和中伤，草率和误解，你就不必再多加考虑了，这已无法改变；你应该深入调查一下，根据你目前的地位和未来的情况，你怎样做才能对人类有所裨益。这是一项神圣的义务，同时履行这项义务并不是无偿的。或者，你想等待这个可悲的时代给你另一种报酬，也许等待承认你的功绩？你的等待是徒劳的。历史上有过这种先例吗？自我满足，具备履行自己义务的觉悟，抱着为自己的同胞的幸福而竭尽全力工作的信念，除此而外，你生命的最

① 原件如此，句子结构不严谨。

终目标也许就没有什么了吧！至多还有几个忠实的朋友。但是，还有千百万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在绝望地呼救，但得不到安慰。他们的呼救声传到了麻木不仁之辈的耳朵里，你还听得见呼救声，你必须为此继续工作，你不可能有别的办法，难道不是吗？而你要用新的勇气、新的热情去工作，尽管忠实的朋友寥寥无几，但他们将站在你一边。

你曾感到自己有这种勇气，有强烈的渴望，你有才能对你那个等级的成千上万人公开说出别人想到而不能一清二楚地表达出来的东西。你的朋友曾向你提供了这方面的机会，而今后还会向你提供这样的机会，因此，你就重整旗鼓，再鼓起勇气去干吧，你要是在外面遇到挫折，只管回到洛桑来，有不少人的心脏是向着你跳动的。你来为我们工作，我们为你工作，我们同你休戚相关、患难与共，我一定很乐意接待你，不会有一个人不接待你的，相反，还会有许多人接待你，是的，我决不离开你，决不！灾难性的未来。〔1〕是的，如果我离开你，那我无异就离开美好的事业，而我如果不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就不会离开你；时间改变了许多东西，改变了生活中的各种情况，改变了事态。因此，你应该为兄弟们树立一个什么力量也动摇不了的榜样。即使是最严酷的打击也动摇不了的榜样，而你的榜样，你的毅力将增强我们的勇气，你还具备这种能力，你才开始公开露面，却已结出了意想不到的硕果；现在还剩下没有做的，你都能做。时间是宝贵的，生命是短暂的，而需要做的，需要说的，还有很多；要是我能像你一样胸怀事业，完全为事业而活着，那该多好啊！但是，这种美好的时刻是不常光临的，而事业是永恒的。朋友，祝你永远幸福，同时希望你能把为受苦受难的兄弟而

工作视为一种幸福。

祝好

洛·彼得逊

手稿

苏黎世国家档案馆，魏特林文件，P.239.1

38

奥古斯特·贝克尔（日内瓦）给威廉·魏特林（苏黎世）的信

1843年5月6日^①

亲爱的魏特林：

首先谈谈主要的事，言归正传。

我对你提的问题一点也不感到可笑，但我不喜欢你的整个计划。⁴⁰我对这类秘密的事有一种无法抑制的反感。你尽可以把我同“蟑螂”一道扔进火中，但你得先听我说，因为我除了那种基本上是莫名其妙的反感以外还有其他原因。

那就是说，你认为一年以后，即到明年布谷鸟啼叫的时候，我们^②就可能有40万人⁴¹，然后就举行起义和实行变革，而这一点谁都不会发觉的。孩子不会发觉，而你就是孩子。谁都不会发觉这一点!!?这种秘密结社简直就是地地道道的培养叛徒的学校。人们从事活动时所处的半明半暗的环境、令人毛骨悚然的革命恐

^① 邮戳日期。

^② 在“我们”二字前面虽有不易辨认的引号，可是并没有注明是引语。

怖、闻所未闻的举动、铤而走险的行动（因为人们很可能在这种行动中丢掉脑袋）、整个事情并没有成功的把握——这一切都将刺激道德败坏者的邪恶念头，成为培植叛徒的温床；到那时，**一点不会发觉**可能就无从谈起了。只管让下次会议如期举行，我们想看一看，大家是否一点没有发觉。目前，人们正在谈论鲁策恩想要反对共产主义而提出的**瑞士联邦法律提案**。我们的日内瓦大国民议会也遥相呼应，表示希望制定一项对付秘密团体的出色法律。你将会看到，我们的事业不久便将成为公开的秘密，他们将追赶我们，将给我们脸上抹黑，而不允许我们擦掉，并抹到他们的脸上去。这是很可怕的，尤其是在条件不够成熟，你就想把人吸收进这种组织的时候，就更可怕了。几乎每一个笨蛋都会对你说“同意”，而来了另一个人，他就会说“不同意”，要是来一个恶魔并对他面授一番机宜，他就会跟着恶魔走并出卖自己的上司。我的那位含情脉脉、多愁善感的朋友克莱姆^①就是为此出卖我的。

而这40 000人啊！你要是在一个地方有这40 000人就好了。但到1844年他们将躲在哪里呢？一个在这里，另一个在那里；100人在巴塞尔，50人在日内瓦。即使他们能像一个人一样群起反抗，又有什么用。只要用一颗霰弹就能摧毁你的整个空中楼阁。法兰克福暴动时，我们有60 000人的**武装**。但是，暴动失败后他们又在哪里呢？向我开枪吧，我们不能用手里的生铁去占领世界。我们必须先从精神上消灭他们，然后把他们送进坟墓。如果行将就木的人在最后回光返照时拿着刀子向我们冲来，我们就

① 古斯塔夫·克莱姆、古奥斯特·贝克尔等都参加了《黑森信使报》的筹备工作和发行工作。克莱姆于1835年4月21日被捕后，作了背叛性的供述。

可以对他说：“住手，孩子！你不知道孩子们是不允许玩刀的吗？玩剑者必丧命于剑。”这时我们就可以砍下他们的脑袋。

[……]

手稿

节录

苏黎世国家档案馆，魏特林文件，P.239.1

39

佐美尔（洛桑）给威廉·魏特林（苏黎世）的信

1843年5月7日

1843年5月7日于洛桑

亲爱的兄弟：

万事开头难，我的信也是如此，我真不知道究竟该从何说起。所以，我先回复你4月12日的来信，至今我们也没有给巴黎写信，今天我們才从你的信中摘录几段寄去。[……]

书信摘录。

洛克尔，4月13日。福尔默在朗根塔尔可能没有遇见你，为了节省邮资，把钱给你捎来了；他是经苏黎世前往巴登的，要在那里建立一个联合会。

日内瓦，4月20日。海尔维格在日内瓦；同他的亲爱的夫人一起在我们联合会的公共食堂用餐；在联合会里，他们俩直到12点钟还同瑞士法语区的共产主义者在一道。巴黎的私人通讯员报告说，他们认为，你停止写书是对的。⁴²这样也好，否则日内瓦

人还真的寄不出钱了。

拉绍德封。多次警告要小心谨慎，要节约用钱。据旅游者（？）说，你在苏黎世。他们带着20多本《年轻一代》到法国去，每本可卖七八法郎。

萨瓦的莎姆伯里。我们这里的伟大的舍费尔建立了一个由五人组成的支部。他和旅游者把许多本著作藏在靴子等等里面带过了边境。你的书据说在那里很有影响。人们对扩大同盟寄予很大希望。你听说德国人中间出了叛徒吗？四个星期前成立了一个歌咏团，团里虽然不允许谈论政治，但还是有很大余地的。

瑞士的巴登。哈格施特勒姆来信了，要我们给他寄些书去，说是《保证》的销路很好。他要到布鲁克^①去，他已在那里找到了工作。地址：布鲁克^②的鞋匠齐格里斯特寓所，哈格施特勒姆收。目前他住在巴登的哈格施特勒姆寓所。

利斯塔尔。我把阿尔布雷希特给你寄到这里来的三张纸条传出去了。一张贴在联合会里，一张由贝克尔带到日内瓦去了，埃尔夫金格尔那里有一张，我随信给你寄去一张。贝克尔和载勒尔捧腹大笑。

伦敦。这封信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因此，请把你写给伦敦的信寄给我们，先让我们听听你对盗窃、唯灵论和唯物主义的看法。法伊恩也在苏黎世；不知他看了伦敦来信以后有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

请详细告诉我们，哪里还可能有1月号。^③

①② 辨认不清。

③ 指《年轻一代》。

至于我们的联合会，可以说我们都是行家。凯布勒尔在同一个公民发生意外争吵后就宣布退出了。施米特还希望，凯布勒尔再次当一名屠夫，现在还是联合会会员的克耳纳再次成为管理员。还有许多人都要求发表自己的看法。我们在同盟中一致商定选举罗森贝格，并获得了成功，然而这是花了力气的，我们可能因此要得罪米叔茨。施米特从现在开始，在对待联合会事务上采取中立态度。同盟的情况也很好，这个星期我接替约尔斯，担任联合会主席。

日内瓦的贝克尔以联合会的名义来信，要求支持他们的联合会；但我们还不知道应该怎么办，要做些什么，因为他们到目前为止玩弄了不少花招，现在又来了一封彼得逊的信，信中写道：12名核心共产主义者，即来自同盟的共产主义者，已经组织起来，他们要振兴一切，不仅要振兴同盟，而且要振兴联合会。我们等等再说。

日内瓦的贝克尔和裁勒尔星期一在这里作了报告。裁勒尔的钱已被一名上过自己当的玩斯卡特牌的老手骗得精光。

据贝克尔和彼得逊说，巴泰尔斯又变得非常热心了，他原先萎靡不振的原因是个别人操纵了同盟，这一点证明了，这种情况迟早也要在这里发生的。彼得逊给我们寄来了56朵“梅花”，我们把这笔销售款寄给你。

请出给我们来信谈谈：你同罗森贝格在巴黎汇票问题上关系如何，以便我们以后不再提出指责。尽快出5月号。通告信一事究竟怎么样了？

我搞到了秘密签发的护照和路费，准备到伦敦去探望我的已在那里结婚的妹妹，我老担心流亡者在那里会碰到什么不愉快的

事。我准备经巴黎（约在两个月以后）去伦敦；我受同盟委托可能带一些书籍和文件去，事先我也许付不了款，请多关照。我要完成所有的委托，然后将在伦敦加入同盟。我对这次旅行感到无比高兴，对我来说，此行有着双重意义，首先，我可以结识许多共产主义者，同他们相互勉励。尽快给我们来信。

代表我们大家向所有兄弟致敬并握手。

佐美尔

又及：我本想写一封信给富人们，后来就让施米特和米叔茨写了一封，可并不理想。你给我们出出主意，我们怎么写你才能交给富人们。

手稿

节录

苏黎世国家档案馆，魏特林文件，P.239.1

40

伦敦法国民主协会会议记录摘录⁴³

1843年5月8日和15日

1843年5月8日会议

公民苏利说明，在美国的密执安湖地区将成立一个共产主义协会。公民沙佩尔说，我们这一代人根本没有想到命中注定只能宣告和传播学说；他担忧这是徒劳无益的尝试；并强调指出，这类共有共享的尝试，由于学说尚未得到足够的拥护者的支持，

很可能会无法对付社会上的种种坏人、偶然事件、恶意中伤和暴力行为，而社会将千方百计来埋葬，首先是通过贿赂来埋葬这种新生的薄弱的共有共享基础。

必须一开始就坚持不懈地向社会发表庄严声明，以便粉碎使社会偏离自然轨道的反博爱原则，揭露剥削者的原则的危害性。

1843年5月15日会议

[……] 公民沙佩尔提议作出决定，在一个以利己主义为基础的社会上实行共有共享原则的尝试是不好的，至少是不合时宜的。

公民鲍威尔承认，主张在小范围内进行尝试的一些公民所提出的论据可以认为是不正确的。他说，我们不想在沙滩上搞建设，相反，我们要建造一座坚固的大厦，因此，我们必须要有一份经过周密考虑的计划，至少有一个通过讨论得以承受我们大厦的基础。要使人民理解，富人、特权者和贵族同人民相比，在当今社会上享有多少特权，这并不困难；只要把这一点向人民解释清楚，就是向实现平等和消灭阶级迈出了一大步。[……]

经过各个发言者的反复讨论，公民沙佩尔的提议被提交表决并获得通过。

阿尔图尔·雷宁《关于共产主义移民区的伦敦讨论》，载于1952年《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公报》（阿姆斯特丹）第7卷第2期第98—100页

摘要

41

康拉德·特雷布斯（洛克尔）给威廉·魏特林（苏黎世）的信

1843年5月8日左右

1843年5月9日于“F”^①

亲爱的兄弟：

为了我们同盟的利益，我不得不对你说几句。

这里的盟员要求有一种准确的指南和说明，决定性时刻一旦到来，究竟该采取什么态度，我们毫无把握。他们希望你能就这个问题作一点确切的说明，并告知各地的盟员。在这个问题上，即使给一点启发，也是很好的。真的，赤手空拳是抓不到熊的。

这里有些成员非常出色，他们很愿意在别的地方继续活动，然而苦于没有章程，我们只有一本书。

为此，我们请你设法尽快搞个章程，希望尽快听到你关于猎熊的意见。[……]

我们的协会相当强大，但没有歌手，同盟盟员共11个。
[……]

手稿

节录

苏黎世国家档案馆，魏特林文件，P.439.1

^① 原文如此，但邮戳日期是1843年5月8日于洛克尔；“F”可能是指洛克尔附近的万丹。

42

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威廉·魏特林（苏黎世）的信

1843年5月15日

1843年5月15日于巴黎

亲爱的兄弟：

我们很高兴，你比过去更感到满足了；希望你同弗吕贝尔和巴枯宁建立更为明确的联系和密切的交往；这对你（和事业）都有好处。年轻的科伦人赫斯博士发表了一篇评论，施泰因博士终于因此而谦恭些了。他在谈话中曾向赫斯承认，他确实没有考虑到这种情况。此外，那个用哲学的华丽词藻粉饰自己的庸人和正统信仰者也是引起愤慨的原因。^①据说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发表的对施泰因的小册子所作的评论，不乏对他的溢美之词。

在德国没有一家报纸聘用赫斯，而他为之撰稿的《莱茵报》已被查封，因此，他要去投奔弗吕贝尔，后者几天前给他写过信。赫斯对你同他亲近表示高兴，不过对你们的怨气尚未全消。

^① 参看注33。针对罗伦兹·施泰因的《现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书，赫斯发表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文，载于《来自瑞士的21印张》1843年苏黎世版；艾韦贝克使用“正统信仰者”一词，旨在影射施泰因有时同青年黑格尔主义者紧密勾结，他实际上已成为黑格尔派右翼分子，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老年黑格尔主义者。关于魏特林同弗吕贝尔的联系，参看弗兰茨·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1960年柏林版第1卷第206、211—214页。

他昨天回到了科伦；他是一个坚定的“货真价实的”青年黑格尔主义者，因而也是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显然是黑格尔派思想体系的必然结果，早在三年前，即在各种报章杂志上出现这种体系的迹象之前很久，我就清楚地看到了这二者之间的联系。

赫斯在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方面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他用的是概念，而不是观点；因此，对于那些不太有知识的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直到现在为止，德国所有哲学家都是这样。他已认识到这一点，决心加以改进。他还具有一些巴罗克式的艺术风格，比如，他想用这种表现形式宣扬无神论和无政府状态。在这里当然不必去考虑什么道德上的缺陷；无神论就是否认一定的神，否认这个神或那个神，通过这种否认达到真理。今天，有人（如拿破仑）所理解的无政府状态，就是没有政府即没有统治者的一片荒草地。因此，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可是，我至今不明白玩弄这类词藻的目的何在。无非是哗众取宠。

雅各宾党人喜欢在实践上言过其实，与此相比，青年德国哲学家学派（正如德国人爱好无节制一样）则更爱好或者同样爱好在理论上夸夸其谈。总之，这些名称是真正的障碍，因为它们很快就会变成绊脚石、隔墙、套话。我们认为，这种好事至今还是屡见不鲜。赫斯固然有这些弱点，但还是颇为能干的；他说过，一句话，德国的全部年轻哲学将是社会主义的。请注意，他写的德语总是明白易懂的，不用外来语；而你写书就爱用外来语，这是众所周知的。他对你的《和谐》所作的长篇评论将由弗吕贝尔出版小册子①（袖珍小册子）；他在评论中列举了一些你书中的

① 没有出版，连手稿也没有保存下来。

缺点：（1）你片面强调平等原则，而忽略了自由原则；（2）你无视美德，即**最自由的积极的精神运动**；（3）你不仅**割裂精神**，而且仿佛在精神中**一穿而过**，因为你把劳动解释为右，而把享受解释为左；同时，你始终认为劳动是强制性的，而**这一点恰恰就是世人要设法防止的**。其他方面你不妨自己读一读。这篇评论写得对你很有感情，而且明白易懂。

手稿

第一次全文发表

苏黎世国家档案馆，魏特林文件，P.239.1

43

巴黎正义者同盟人民议事会的公开信——答布伦奇里的报告⁴⁴

1843年8月29日

致苏黎世州政府顾问先生，布伦奇里博士。我们反复而细心地拜读了您倾注全力拟就的关于瑞士共产主义者的报告以后，作出如下决定：

您草拟上述报告虽然违背了您本人的意愿，但却为共产主义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由于您的报告在瑞士各州和德国各邦的传播，连无知者，甚至反对者都对它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研究。鉴于您公开践踏我们的原则是为了宣传我们的原则，我们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向您表示诚挚的谢意。如果有必要再版您那拥有众多读者的小册子，我们还乐意向您提供其他文件，让您进一步充实关于共产主义者的报告；不过要劳您大驾在瑞士的《东方观察家》

上声明一下您接受我们提供的文件。同时，但愿您能从上而说过的话中体会到，我们无意对您的做法^①耿耿于怀，甚至对您的鼠目寸光可能产生的鄙视，我们也只采取幽默的形式来表达。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向您这位共和主义者表示祝贺，祝贺您接受^②勋章或者将要接受勋章。

您不熟悉的委员会成员谨上

普通书记

1843年8月29日寄自巴黎

1843年9月15日《曼海姆晚报》第216号

44

伦敦正义者同盟盟员的公开信——答布伦奇里的报告⁴⁵

1843年9月10日

伦敦共产主义者委员会^③致苏黎世州

政府顾问先生，布伦奇里博士

有个瑞士人渴望项链（勋章），

家住乌里州，一副奴才相；

谁认为日本皇权虚妄，

① 《科伦日报》；您对我们本身的告发……。

② 《科伦日报》；从某个北方邦（普鲁士）接受……。

③ 可能是正义者同盟伦敦区部委员会，也可能是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委员会。

谁在日本就有自由享。

伦敦共产主义者委员会的全体成员悉心通读了《瑞士的共产主义者》这本小册子以后，在今年9月10日的委员会会议上一致通过下列决议：

1. 苏黎世委员会，主要由布伦奇里起草的报告《瑞士的共产主义者》，非常适合于用来进一步阐述共产主义的原则，这篇报告所涉及的无论是人还是事，在有些地方使用的毫无意义的骂人话，都能使每一个不太囿于成见的读者认为，共产主义是值得进行更加深入研究的，而这一点恰恰就是共产主义者的热切愿望；

2. 苏黎世委员会，特别是布伦奇里博士理应受到所有共产主义者的感谢；

3. 伦敦共产主义者将按照苏黎世委员会的意愿，以尽可能传播上述报告为己任，最后

4. 书记负责给布伦奇里博士先生奉寄一份本决议的副本，鉴于此人的功绩，代付邮资。

1843年10月1日《曼海姆晚报》第230号

45

弗里德里希·马尔滕斯（汉堡）给威廉·魏特林（马格德堡）的信⁴⁶

1844年8月4日

1844年8月4日于汉堡

尊敬的兄弟：

我们已及时收到你上月23日的来信，从你的来信中我们看到，多谢上帝，你的处境比我们和你本人想象的要好；我们在这里一直提心吊胆，唯恐你会遇到什么不测；你可以想象，我们看了你的来信是多么高兴！你要相信，你的被捕给你带来的威望远远超过天赋贵族和庸人之辈。因此，你用不着为此感到后悔，你已为美好事业作出了十分有益的贡献；没有牺牲，就不能达到我们的远大目标，你要勇往直前。

亲爱的朋友，我们从你的来信中看到，你打算回法国；你难道不认为留在德国活动更明智吗？当然，在普鲁士，我们也帮不了你的忙，可是，你留在这里有什么不好呢？不管怎么说，你在这里最容易为你的著作找到企业家^①；其次，这里的书报检查也不像德国其他地方那么严格，你尽可以做你认为合适的事。总之，我们希望，你如果一定要离开德国，就在这里坐船，我们再促膝畅谈一番。

我们已把你的信转往伦敦，我们估计，你大约在10—12天内能得到回音；我已写信让他们给巴黎写信；为了著作的事，我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这两个地方的回信都将寄到这里来，然后我们再转寄给你。

好样的同胞，我们随信给你寄上10塔勒现金汇票，这是我们以最快速度募集到的，你暂且将就一下，以后我们再多寄一些。我们还要赶紧帮助伦敦和巴黎的人们。你要脚踏实地地工作，要相信，我们中间虽有个别庸人，但同样不乏热忠于真理和权利的人。你提到偿还一事，要不是我们非常了解你的高尚心

^① 指出版商。

灵，准以为你是在伤害我们的感情，下次来信就不要再提这件事了。祝你万事如意，立盼回复。

你的诚挚的朋友们谨上

弗·马尔滕斯

又及：通讯地址：施泰因街49号维贝尔收。^①

梅泽堡德国中央档案馆，Rep.77, Tit.
6, Lit.W, Nr.96 (副本)

46

关于威廉·魏特林同汉堡正义者同盟盟员会晤的供词摘录⁴⁷

1844年8月20日左右

a. 弗里德里希·马尔滕斯的供词^②

(1845年2月)

[……] 魏特林去年夏天外出旅行路经这里时，曾拜访过我，我也到他的住所作过回访，同他喝了一杯葡萄酒。在场的除了我，还有霍夫曼、席尔格斯和木匠帮工莱默。谈话的主要内容是魏特林的遭遇，特别是他的狱中生活和被押送经过。[……]

① 信封上是这样写的：埃海西希先生转交乌格德堡的魏特林先生。

② 关于马尔滕斯和汉堡正义者同盟其他盟员被捕的情况，参看注46。

b. 奥古斯特·维贝尔的供词

(1845年2月)

[……] 我在巴黎住了多年，三年前才离开那里。我在巴黎结识了裁缝帮工魏特林，我到巴黎不久，他就到瑞士去了。

[……]

去年夏天，我在这里的报纸上看到魏特林到这里来了，于是我就到他下榻的维尔斯特旅馆去看望他，并提醒他，我们过去是在巴黎认识的。但是，我记不清，在巴黎时，究竟是我到那里去找他的，还是在大街上碰到他的。[……]

他临走的那天晚上，我曾去他的住所，同他和他的几个熟人一起喝了一瓶葡萄酒。当时在场的有五六个人，其中我只认识席尔格斯和马尔滕斯。后者我只知其人，但不知其名。[……]

恩斯特·巴尼科尔《囚犯魏特林及其“正义同盟”》1929年基尔版第243、245页

摘要

47

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给《德意志电讯》编辑的信⁴⁸

1844年9月21日

尊敬的编辑先生：

我们深信您的自由思想原则和正义原则；您对工人阶级悲惨

命运的同情使我们深受鼓舞，因此，我们不揣冒昧地向您提出下列请求，希望您不要拒绝。

当我们从德国的报纸上获悉西里西亚工人的起义，并了解到导致这次起义的可怕贫困时，我们充其量只能对我们的不幸同胞的命运表示深切而诚挚的同情。——我们应当而且必须同他们血肉相连，风雨同舟，我们的处境同他们一样。我们和我们的妻小的生存都取决于师傅的情绪；我们也是在挣一天钱活一天命；我们也忍饥挨饿，甚至还要继续忍饥挨饿！

是的，我们早有这样的感受，现在仍有这样的感受；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光有感受而没有行动是不会有有什么好结果的，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感情的价值就是促使我们去行动。——我们一些德国工人为西里西亚织工捐了款，在这电我们把募捐到的6英镑寄给您，请设法把它交给死难的起义者或因起义而目前身陷囹圄者的家属。款额虽少，但我们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今天，工人们为了帮助自己的不幸同胞，不得不节衣缩食！

我们为什么决定把我们的捐款只给死难者或身陷囹圄者的家属呢？因为我们认为，他们是当今恶劣社会制度的牺牲品。

当然，我们对于像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这样的起义是深感痛惜的，因为我们很清楚，这种局部的起义不利于我们这个等级获得它力求获得的应有权利。当然，它们是给我们带来了一定损失，但我们从未想到因此而责怪我们的不幸兄弟。——不！我们要控告社会，是它把我们贬为贱民，是它把一切重担强加在我们身上，是它不给我们权利，是它让我们遭受贫困和饥饿。

真的，我们无论如何要支持我们的苦难同胞，支持那些为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制度，尤其为建立一种劳动组织而奋斗的人

们。不管他们抱什么样的政治见解，也不管他们属于哪个等级，我们都信任他们；同时我们预祝他们的努力获得成功，完成19世纪的伟大使命——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的解放。就我们本身而言，我们一定要做到在解放的舆论面前显示我们的价值。我们已经认识到，仅仅在政治上改造一个国家，对我们来说，除了不受现在的师傅的剥削，而受另一个师傅的剥削外，没有丝毫用处。基于这个原因，我们同所有致力于纯粹政治倾向的人是冰炭不相容的。——一个国家，只要以正义为基础，不管它是君主制、立宪制还是共和制，对我们来说都无关紧要。

我们要永远摆脱我们的等级长期陷入其中的烂泥。我们不想通过暴力，而想通过对我们自身的教育，通过对孩子们的良好教育跳出这个泥坑。但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生活条件首先要有保障。只有当勤劳的工人经常有工作并得到同他们的工作相应的报酬时，只有当目前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物质条件得到改善时，我们才能获得精神自由，才称得上获得彻底解放。

编辑先生，这就是深深地打动我们为西里西亚的苦难兄弟募捐的感情，但愿还有许多人以我们为榜样，这就是我们当前的目标，是我们无所畏惧、公开承认的目标；我们坚信，这个目标是正义的，我们坚信它会得到所有正直的人的支持和赞同。

尊敬的编辑先生，这封信是否在贵报发表，由您决定。我们谨向您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以伦敦德意志工人科学协会名义并受它委托的

卡尔·沙佩尔

约瑟夫·莫尔

阿道夫·伦德曼

安东·弥勒

阿·列曼^①

1844年9月21日于伦敦

1844年10月《德意志电讯》（汉堡）第

165期第659—660页

48

关于伦敦欢迎威廉·魏特林大会的报道^②

1844年9月22日

英国和外国共产主义者大会

上个星期天，在约翰街协会会场召开了有英国和外国许多社会主义者参加的大会，热烈欢迎德国共产主义者的领袖威廉·魏特林；他是不久前抵达英国的，由于在瑞士和普鲁士为共产主义事业进行活动而遭到了监禁和迫害。〔……〕

魏特林先生在一片发自内心的、经久不息的掌声中站起来说，他由于英语水平有限，不能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即席讲话。接着他宣读了下面的

宣 言

朋友们：“结果好即全局好！”我又获得自由了，可以自由

^① 原件上为“列德曼”。

^② 关于这次大会，巴黎《前进报》于1844年10月2日和11月13、16日也作了报道。

地活动了，自由地讲话了；我应你们的邀请来到了你们中间，我深感我是受欢迎的人。〔……〕

不久前，共产主义学说在各种文献中还像是广漠荒原上一棵无人培植的幼苗，但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原先不愿意为这种题材提供篇幅或不敢讨论这种题材的报纸，现在都逐步改变了态度，也愿意开辟专栏刊登有关共产主义者和共产主义的评论和报道了。

我们看到，我们的哲学著作和政治著作原先是不敢涉及这类问题的，现在则不能不涉及，而且涉及得越来越多了。我们的新派哲学家因而也成了共产主义者，甚至我们的一部分敌人也开始自我标榜为社会主义者了，公开给他们那种关于政治改革的片面思想披上了讨人喜欢的外衣。〔……〕

甚至人民也能理解他们几乎不太使用的词汇了，而在以前，我们哲学家和政治家的文学语言对他们是讳莫如深的。人民没有钱买书，也没有空闲时间读书。“共产主义”这个对人民来说极为生僻的单词所包括的无比广阔的思想世界，引起了人民的深思。〔……〕

与会者自始至终聚精会神、兴致勃勃地聆听了魏特林先生的讲话，当他回到自己的座位时，全场爆发了一阵阵发自内心的长时间的掌声，向他致敬。

接着，大会主席讲话。

《新道德世界》编辑弗莱明先生说，今天晚上的大会实现了自己对社会主义的夙愿。〔……〕

接着，弗莱明先生扼要地介绍了魏特林先生的经历。他说，去年年底，《新道德世界》刊登了一个生活在英国的年轻德国人

撰写的关于《大陆上的社会主义》这样一组出色的论文，从而使英国读者首次认识了这位改革者；不久以后，《北极星报》也转载了这组论文。⁴⁹这组论文引起了大家对运动的浓厚兴趣。文中概述了运动的本质和目的，而首先是激起了大家对运动的大公无私、坚定不移的创始人和领袖魏特林先生的关注。这组论文还特别告诉大家，魏特林先生因传播共产主义观点曾被苏黎世当局监禁了六个月之久。〔……〕

卡尔·沙佩尔（德国人）说，他以同乡的名义为他的兄弟魏特林先生所受到的由衷而热情的接待，向与会者表示感谢，因为这足以补偿他本人所遭受的一切损失。但他（沙佩尔）首先为有幸参加这次鼓舞人心的大会而感到高兴，因为这次大会向国外所有维护同一种学说的人证明，他们在英国拥有同情他们的朋友和战友。希望那些赞同“天然敌人”之类主张的人到这里来看看，欧洲各民族的兄弟是怎样兄弟般地友好相处的，以此回答那种反社会的学说。在别的地方，那些像在座的与会者一样的其他民族的人就可能被看成外国人，但在这里，他们可以放心，在这里他们就不是外国人，而是兄弟。（热烈鼓掌）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一致认为，共有共享原则只有通过和平手段和自由辩论才能实现。他们在国外只要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有了这两条他们就有了成功的把握。〔……〕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同他们的英国兄弟在下列问题上的想法也完全一致：良好的关系是人们获得高尚情操的唯一途径，而建立这种关系只能通过对社会的彻底改造；因此，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将同英国兄弟团结一致，为消灭人间的真正魔鬼——私有制而共同努力，采取措施，使人类的最大才能得到使用和发挥。他们的事业是理性、真理、正义和

博爱的事业，因而只能通过理性、真理、正义和博爱的传播来实现。我们只要坚持和平的喜闻乐见的宣传，就能为他们的下一代留下一份光荣的遗产，并且在英国，在整个欧洲实现和谐。（热烈鼓掌） [……]

1844年9月28日《新道德世界》（伦敦）
第14号

节录

第二章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建立无产阶级 政党而斗争的开端——共产主义 通讯委员会——正义者同盟的 进一步发展

(1844—1846年底)

55

威廉·魏特林（伦敦）给卡尔·马克思（巴黎）的信⁵⁰

1844年10月18日

1844年10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马克思：

我认为您对《前进报》上的几篇文章所作的估计是正确的，因为我已把它们的精神同您对我说的话作了比较，并向您表示感谢。对此，我就不再多费唇舌了，说得够多了。我们是朋友，而作为朋友就应该经常互通消息，即互相通信。

《前进报》的处境如何，能否维持下去？如果它也遭到早先在巴黎出版的德文报纸的那种命运，那就太可悲了。看起来仿佛是一场失败了的运动。

今天，这里的德国商人俱乐部里有个人对我说，《前进报》极尽猥亵谩骂之能事，他们再也不愿订阅了。据我所知，这也是我来到这里以后未被吸收为共产主义者协会会员的症结所在。我虽然并不太喜欢这样的局面，但是当我被其他〔报纸上〕的超自然王国的胡说八道弄得眩晕不堪时，我就更喜欢这种局面了。

您结婚了吧？请转达我对您亲爱的夫人的问候，祝您安好，请立即给我写信。

您的

威·魏特林

索荷广场巴塔曼大厦5号。

弗兰茨·梅林编《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遗著（1841—1850年）》1920年斯图加特（第3版）第2卷第32—33页（恩斯特·巴尼科尔《囚犯魏特林及其“正义同盟”》1929年基尔版第265—266页）

56

关于伦敦各民族民主之友的一次大会的报道⁵¹

1844年10月19日

各民族民主之友，每月第一个星期三晚上

8时在干草市场大磨坊街20号集会

各民族民主之友坚信，培养各国人民的兄弟般的感情，实现

他们的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具有重要意义；他们相信，各个民族的民主之友只要能为此目的每月欢聚一堂，开怀畅谈，就会实现上述值得追求的目标；人人能读到各国的报纸，给那些被驱逐出自己国土的政治受害者以支持（因为他们代表着人类的自由事业）。此外，经常举行群众集会，倾听各国的民主观点，利用一切合法手段，为人类的伟大友爱原则争取舆论的支持。因此，民主之友敦请各国民主派支持他们实现这些有益的目标，各国民主派如果认为这一点是可行的，就请从各自的组织中派遣一位朋友参加这里每月举行的公开会议，为实现他们的目标给他们提供情报和支持。为了使讨论能够秩序井然、和谐一致地进行，务必遵守下列规定：

为每月的定期例会选举一名主席，负责维持会议秩序并注意根据上述目标进行讨论；注意防止有人提出旨在引起分裂和破坏民族友爱原则的次要问题。每六个月选举一位名誉书记，责成他负责每次讨论的记录工作并履行书记职权范围内的其他一切义务。书记可以改选。每六个月选举一名司库，责成他管理所有会费或支援上述目标的捐款，按规定做好一切收支帐目；司库支付的每笔款项，都须提交每月举行的会议通过并经书记和其他两名成员签字。（如有必要）任命几位委员，负责召集公开会议、创办报纸、筹集资金和促进上述总目标。为了促进友爱事业，各民族民主之友应向会议主席公开自己的身分；为了防止出现秘密勾当和违法行为，这些人应把自己的姓名和住址告诉书记，由他记录在案；这种案卷，每个与会者均可查阅。只要场地允许，让尽可能多的人进入会场，让他们做每月例会的见证人。以上各条规定均可修改或补充，先在一次每月例会上提出修改方案，在下次

例会上再作出决定。——临时名誉书记卡·沙佩尔——1844年10月19日

1844年11月2日《新道德世界》（伦敦）
第19号

57

洛桑工人联合会^①给巴塞尔裁缝帮工的信

1844年11月8日

无产者^②，亲爱的朋友们，兄弟们：

我受联合会理事会的委托，向你们证实你们的来信已经收到，并给你们作如下答复：

明天，将把你们的事提交全联合会讨论，但你们不要因此就确信能从这里得到救济，你们应该采取措施。据理事会所知，多数共产主义者反对这种救济，一是因为原则问题，二是因为确有困难。当然，我们感到高兴的是，你们实际上反对巴塞尔行会庸人们的愚昧无知和恬不知耻，并从此看到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我们并不认为你们能获胜，甚至从来没有想过你们会获胜。试问，如果巴塞尔的裁缝帮工废除了他们行会师傅的繁文缛节，就能促使懒汉参加劳动吗？没有的事！相反，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胜利只会延误伟大事业的胜利。此外，我们还要说，工人群众

① 该联合会也像其他许多在瑞士的德国工人联合会一样，自称是共产主义者协会，想借此表示它们不同于青年德意志派的联合会。

② 原件加注：无产者一词在德语里的意思是穷苦可怜的人。

麻木不仁，竟完全忘记了做人的尊严，对愚昧的带有屈辱性的奴隶劳动的可耻奴役已习以为常，以致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实在可悲！——只能忍受贫困；他们就像小狗一样，只要捡到从富人宴席上掉下来的一根骨头，就感到心满意足；他们甘愿受自由、平等和民族之类的空话的欺骗，只要人家不把刀子插进他们的喉头就行。这种蒙受耻辱的生活必须终止。欺人太甚，物极必反！工人必须认清谁是自己的敌人！

但是，亲爱的兄弟们，我们的这个敌人并不在巴塞尔的受人尊敬的裁缝行会，并不是叫皇帝、国王、贵族和耶稣——不是！简而言之，它就是财富，德语叫**金钱**。如果我们完全认清了这个敌人，胜利就属于我们。到那时，我们就能腰缠万贯，爱怎么花就怎么花。如果我们不再为那些老爷们效劳卖命，他们的钱能派什么用场？什么用场也没有，只能使他们头晕目眩，沮丧气馁，他们就将寸步难行。**果真如此**，我们将比他们更能冲锋陷阵。谢天谢地，我们不久就将轻装上阵，**锐不可当**，我们失去的只是受尽折磨的生活，而得到的将是一切，将是整个地球和天国。兄弟们！请注意，**受骗者一旦认清他们的真正敌人，他们的队伍将比欺骗者的队伍更加强大。**

亲爱的兄弟们，为你们着想，我要对你们说，你们对巴塞尔的可怜的小师傅泄愤是毫无道理的。我们认为，你们不应仇恨这些可怜的人们，而应同情他们。他们也是这个骗人的社会的受害者，同时他们又两眼如盲，不知道自己需要同情。当然，他们靠欺骗你们中饱私囊，他们恶意刁难你们，他们干的活虽不比你们任何人多，却把你们**所得**的一半甚至一半多都攫为已有，但是，你们说，大多数小师傅不也是同你们一样，带着妻子和没有受过教

育的儿女在茹苦含辛，艰难度日吗？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们本身也受别人的欺骗。这些头脑简单的可怜虫如果认识到这一点，也许就不会恶意刁难你们，而会同你们联合起来了。因此，我们认为，你们首先应该设法使这些庸人们相信，你们和他们以及所有属于劳动者阶级的人们，都是天然的同盟者。〔……〕

关于这个问题的一般性意见，今天我就谈这一些。下面我再谈谈它的特殊性。你们希望从我们这里得到援助，联合会可能会答应给你们一笔捐款，但这也仅仅是为了表示对你们的同情，并通过你们再次证明，这种个别尝试是徒劳的。我们知道这种尝试会取得什么样的后果；在巴黎和伦敦，为了实现工人反对师傅的权利，人们白白浪费了几百万。大家何时才能认识到，师傅和工人只有通过社会改革才会得到好处。所以，你们如果得不到我们的援助，也不要因此就认为我们同你们不是一条心。遗憾的是，你们的要求提得不是时候。不久以前，联合会为了能听到**库尔曼**博士（此人你们也许听说过）的出色的讲演，花去了一大笔钱；这个演说不久即将出版，请你们留神⁵²，你们将从中看到社会主义的一个新颖的、光辉的、人道的方面，这个方面将使一切诚实而高尚的反对者保持缄默，并得到和解。兄弟们，你们看，支持这种对大众有利的事业，就是我们的职责。〔……〕

代表共产主义者协会

武器制造工 **卡尔·格莱夫**

1844年11月8日于洛桑

1844年11月21日《巴塞尔州人民报》
（比尔德斯德）第49号

节录

汉堡工人教育协会成立大会筹备会议记录⁵³

1844年12月30日

汉堡工人教育协会讨论记录

1. 筹备会议

12月30日于阿尔托纳音乐堂

工人教育协会是时代的产物，是因掌握和普及一般教育的需要而产生的。在会员中开展社会教育，让他们享用科学，也让汉堡工人像国内外其他城市工人一样，日益明确地意识到人的尊严、人的权利和义务——这就是教育协会创始人所抱的宗旨。1844年12月30日，他们在阿尔托纳音乐堂首次聚会，就他们打算满足的需求作了说明，并立即着手工作：他们选出了由四名成员，即由赫纳、马尔滕斯、冯·德尔·卡默和格·席尔格斯先生组成的临时理事会，受托起草一个章程草案。

第一次会议以及后来的第二次会议都是在阿尔托纳举行的，因为当选的几名成员都住在阿尔托纳，而且我们在汉堡暂时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会址。

梅泽堡德国中央档案馆，
AA I, Rep. 4, Nr. 2058 (副本)

第一次发表

61

弗里德里希·马尔滕斯（汉堡）给格奥尔格·韦森巴赫
（巴黎）的信⁵⁴

1845年2月10日

1845年2月10日于汉堡

尊敬的朋友们：

现在终于又能把我们的一些近况告诉你们了，否则，你们也许以为我们都死光了，或者都被毁灭了呢，其实我们既没有死光也没有被毁灭。我早就想把我们这里的情形告诉你们，而且我曾两次准备写信，可是这段时间要做的事简直千头万绪，把写信的事给耽搁了。不过，现在机会难得，我想赶紧向你们简单地汇报一下我们在这段时间所做的工作。此外，我们这里成立了一个类似日内瓦那样的工人教育协会^①，三周内吸收了来自各个城市的将近80名会员，它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普及真正的启蒙教育和公民美德。我们的维贝尔担任主席，理事会由这里公民中最受尊敬的人，即师傅、帮工和著作家组成，同样，协会会员也几乎全是生意人，因此，在北德意志还非常盛行的等级差别，在我们的协会里已经销声匿迹，一些很有声望的人物都解囊相助，纷纷寄来了捐款。我们只要稍加注意，就能听到那些行为高尚、思想自

① 参看文件39。

由的人对此都很感兴趣：工人想要摆脱自己那一套懒散疲沓的旧作风，使自己成为能够独立思考的自由公民。因此，我们将信心百倍、无所畏惧地沿着我们已经选定的道路迈步前进，尽我们的力量为工人阶级开创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真诚的朋友们，现在我们给你们寄去欠你们的28法郎。这笔款子已拖欠很久，万望见谅。我们不久将送给你们一份报纸，你们有合适的东西也请送给我们，只是不要对送交者说得太详细，因为他是不理解你们的，或说得更确切些，他是不愿理解你们的。祝你们安好，再见，立候回信，请转达我们对所有老朋友和熟人的问候，你们的终生挚友

约·弗·马尔滕斯

我的地址是：汉堡大巴克霍夫街卡尔王宫附近H.尼伯尔斯收。

请打听一下细木工弗·埃尔哈德的情况，他的地址是：新麦尼蒙坦路丹麦街6号，叫他给我们写信。

恩斯特·巴尼科尔《因德魏特林及其“正义同盟”》1929年基尔版第237—238页

64

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讨论⁵⁵

1845年2月18日至1846年1月14日

第一个问题：“人在涉及自己本身时，把什么当作善，把什么当作恶？”（1845年2月18日讨论结束）^①

沙佩尔：“[……]自然界是善的，现在盛行的恶不能归罪于它。因此，自然界产生出来的一切必定是善的；因此，只要人按照自然规律生活，只要和谐支配着这个地球，那么人也是善的[……]但是，当人开始控制自然界时，当他不是出于恶意，而是由于无知而发明私有财产时，人类的幸福就消失，而被各种可怕的不和谐的状况所取代。”

亨·鲍威尔：“[……]对自然规律的任何偏离都是毫无道理的[……]”

得出的答案是：“凡是能够促进人的身体和精神发展的东西都是善，反之便是恶。”

第二个问题：“在当今的社会里什么安排得不好，什么可以改善？”（2月25日—4月1日）⁵⁶

登格勒尔：“[……]自然界希望在这个地球上保持着和谐；因此它赋予每个动物各种特性，它也没有把人抛开不管；但人脱离了自己的自然界范围，一些人凌驾于另外一些人之上，而后者又非常怯懦地忍受着；直到现在人们才睁开眼睛[……]”

魏特林、沙佩尔、普芬德、亨·鲍威尔等人在不着边际的讨论中发了言。

第三个问题：“除了共产主义之外，迄今提出并采用了哪些消除社会弊病的方法？”

简短地讨论了思想方面的建议，劳动的组织，仲裁法庭^②。

① 该特劳注：已知的最早的记录是1845年2月11日的记录，记录了沙佩尔主持的协会成立五周年庆祝大会的发言情况：“所有发言的主要内容是：财产的发现，虚伪的宗教和民族之分给人类带来一切不幸，而只有通过启蒙才能使大地变成花园和使人类变成一个家庭。”

② 指解决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冲突的仲裁法庭。

维尔特的国家工场等。

第四个问题：“共产主义在何时何地以何种形式曾作为消除社会弊病的方法被提出并采用？”（1845年4月24日—5月1日）

这个问题的讨论很快就集中到共产主义是在“小范围内具体实行”还是普遍推广，是在移民区还是在各国实行，是在美洲还是在欧洲实行。

沙佩尔：“不要移居他乡。在欧洲这里进行宣传，就会达到目的。如果我们只限于生活在一个共产团体中，那就得不到人类的支持。为什么最初的基督教徒会增加得那么多呢？这是因为他们在各国传播他们的教义。”

列曼反驳道：“干吗去填一个烂泥坑，难道要在它上面建造家园吗？为什么不直接在坚实的土地上建造呢？[……]为什么不在不受土地法限制的地区，不在人类能更早地成熟到可以达到这个崇高目标的地区呢？”他主张建立一个移民区，人人都可以自由加入，不论出资多寡。

亨·鲍威尔主张靠宣传；他说：“每人每年向10个人宣传，这10个人来往于各地，这些思想就传播开了，我们就可以看到遍地开花结果了。严格说，共产团体，根本没有能维持下来的，似乎继续存在的这类东西也注定要灭亡，因为它不是建立在人权基础上。”

沙佩尔：“在美洲森林建立移民区太困难；这些移民区必然缺少精神食粮。我们在这里是必要的，因为我们将在这里而不是在美洲开始伟大的战斗。”^①

鲍威尔：“没有必要在小范围内实行这些原则；况且这样做

① 引文不全，原书此处缺少开头部分。

也太困难。只有采取宣传的办法我们才能最快地达到目的。”

克利盖^①说：“人生有这样的情况，一些人一生都被流放；这些人是需要帮助的；但不要认为这是一个范例。我们最好是生活在共产团体中；到我们这里来的人应受到欢迎 [……]”

对此沙佩尔认为：“克利盖公民说的意见倒很美妙；1834年流亡者到达瑞士时，就受到友好的接待。但是，流氓、懒汉和破产者全都来了，他们冒充流亡者，结果，把事情搞糟了；在美洲办移民区也会有这种结局。”

第五个问题：“尽管如此，共产主义尚未实现的原因是什么？”（1845年5月19日—7月）

[……] 亨·鲍威尔：“到目前为止存在过的共有共享体都不是共产主义的；这是因为它们是由个别人建立和领导的[……]”

魏特林反驳鲍威尔公民说：“难道家庭不是生活在共有共享之中？共产主义并没有一个固定人数限制，它可以有各个不同的方面。”他还列举出至今妨碍实现这一原则的种种原因。他最后说：“共产主义者之间一些很小的分歧有时也成了妨碍实现这一原则的一个原因。”

沙佩尔：“至今还没有财产共有共享，就是夫妻之间也没有做到；原因是缺少知识，启蒙不够。只有法国革命才开始做一定程度的启蒙工作，1830年加快了这一进程。劳动阶级至今与启蒙无缘，从1842年起，哲学家们公开表示赞成共产主义。——共产

① 海尔曼·克利盖5月12日第一次出席，随后经沙佩尔和魏特林提议成为会员。他是威斯特里政社会主义者，“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1845年初同恩格斯建立了联系，曾在布鲁塞尔访问过马克思，到伦敦后继续保持通信联系。

主义者不依附于任何人；除非我们是宗派〔……〕；共产主义只有通过各种意见的争论才能深深扎根。”

魏特林：“基督教常常遭到反对；它早期有许多好的东西；我认为，人们不应该反对它〔……〕我们应该利用一切东西；用感情能够办到许多人用理智办不到的事情。”（这是针对沙佩尔的“只有用科学”的说法）

沙佩尔反驳魏特林说：“假如有可能把原则建立在感情之上，那么这种感情必须是纯粹人性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各种信仰仇恨，并使它变成仁爱。”

亨·鲍威尔说：“不应该把任何东西建立在感情之上，只有通过思想建立起来的东西才是牢固的〔……〕”

克利盖：“如果理智压抑感情，那就去它的吧；只有当自己的最高要求得到满足时，人才能合理地行动。”

普芬德：“感情按其本性是在刹那间立即行动的；只有理智才检查有待开始形成的东西。因此，只有建立在理智之上的那些国家才能继续存在。”

沙佩尔：“要长期管理国家，感情和理智两者都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只有努力像兄弟一样相互开导，并且用理智和感情唤起联合，才有可能把人类引上较好的轨道〔……〕”

克利盖：“我并不是主张有什么物质上的欲念时必须放纵所欲。我的某一肢体伸到燃烧着的火中，我就要抽回它；我饿了，就吃我能吃的东西。”

魏特林要求给理智和感情下一个定义，沙佩尔下了一个定义。

克利盖说：“只有通过对无产者进行启蒙才能改变人们的命

运；饥饿已开始反对宗教的声音。所缺乏的只是在这方面没有把一个正确的观点告诉人类；否则人类就前进了，收获也为期不远了。”

沙佩尔：“人类不是通过饥馑才能达到目的；世界历史向我们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我们要提防革命，因为革命会把人类重新拉回到受奴役的状态。只有采用宣传的办法才能把人类从他们的耻辱生活中拯救出来。”

6月23日^①，**沙佩尔**说：“共产主义至今没有实现，这是因为没有进行应有的智力教育。这一代人受迷信的锁链束缚太甚，像以前各代人一样，很难实现共产主义。我们的全部活动是为后代进行的；他们有可能实现我们用启蒙宣传的方法只是在理论上传播的东西。”

魏特林：“如果前面的发言人（**沙佩尔**和**C.鲍威尔**^②）的意见得到普遍支持，我们的全部工作就毫无意义了。这等于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永远拖延下去；因为今天有效的东西，明天也会有效。这样的话，我们就一味老调重弹而一事无成。我认为，搞共产主义的时机都已成熟，至于罪犯，他们恰恰是现存社会制度的产物，在共产主义中是不会产生罪犯的。人类必然日益成熟或者不可救药。而后者是我们的敌人常弹的老调。如果我们听从他们，我们必然无所事事，坐等那烤熟的鸽子自己飞进我们的嘴里。不！我们有能力实现共产主义；因此，让我们切实地

^① **波特劳注：**6月16日选克利盖当主席，亨·鲍威尔当书记，从6月23日至7月16日的记录是鲍威尔作的。

^② 在波特劳的记录稿副本中，已将C.鲍威尔同亨利希·鲍威尔作了明确区别；C.鲍威尔同波特劳之鲍威尔很可能是一个人；此人在巴黎时认识了莱宁格尔，后来又同定居伦敦（参看文件65）并认识了那位在1841年给伦敦共产主义者委员会的一个声讨上签名的鲍威尔（参看文件16）。

为此工作吧；光靠宣传是根本无济于事的。”

沙佩尔：“如果人类已经具备搞共产主义的条件，那人类就可以搞共产主义了。魏特林是想切断自由的发展而强迫人类尚未认识就去行动。如果共产社会接纳娼妓、小偷和杀人凶手，群众就必然起来反对他们，把他们监禁、流放和处决。以前没有信教自由；谁不信仰某一宗教，他就被用石头砸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或被烧死。今天有信教自由了，正像那些为争取信教自由殉难的前辈们为我们付出了鲜血一样，我们也必须为我们的后代而战斗。但是，我们不要强迫某个人。广大群众只要深明真理，其余的事自然会水到渠成。

“理智必须思考，思想必须自由。用热烈的言词激发人们追求共产主义，这对我们来说毫无益处，这样激发上去的群众必然会跌回到更糟糕的地步。民族激情和宗教激情很快就会使往日的混乱状态重新出现。不！公民们，只有所有人都相亲相爱，共产主义才会实现。正像我们的先辈是争取信教自由的先锋战士一样，我们是争取个人自由的先锋战士，如果我们不能看到我们努力追求的东西得到实现，我们会以此自慰：善自有善报。偏见会造成不幸；最大的幸福是具有世界公民的高度觉悟。人们为了掩护大军前进而把优秀射手放在最前面，然后是前卫，共产主义也是这样。我们是发起战斗的优秀射手；跟在我们后面的是前卫和社会的大军，其后才是由盲从分子和国民组成的后卫。我再说一遍：我们这一代还没有成熟到可以搞共产主义。拔苗助长是行不通的，同样，强迫人类接受新的思想也是行不通的。我们鄙弃物质的暴力；它是粗野的，人类不需要它；人类自有办法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不需要用物质的手段进行战斗。我们认为，我们是人类

这棵大树上的叶子，后代将会收获我们通过默默无闻的工作所准备好的东西。”

克利盖激烈反对沙佩尔和C.鲍威尔所说的一切，而表示同意魏特林的所有基本观点。因此，他心怀不满地说，他听到的一些说法同他以前只能从警察当局的官员和庸人口中听到的如出一辙。例如，拿“人类还没有成熟”这句话来说，普鲁士文化大臣全部活动的效用就集中表现在这一句话里，对于这种说法，他克利盖迄今当然只是一笑置之。共产主义无非是争取人人都能得到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的食粮。对于一个饥肠辘辘伸手讨面包吃的无产者，他克利盖决不会先滔滔不绝地讲一通无聊滑稽的大话，然后才回答说：“是啊，你还没有成熟到能吃饭；共产主义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在你想要实现它之前，整个人类先要认识这个思想。”对于一个妓女，她在悲惨的生活中突然为启蒙的火炬所照亮，从而不顾死活地愤怒反对那个把她变成一个贱人的社会，他克利盖不能对她叫喊道：“你还没有成熟到可以战斗，你先要等待，一直等到整个人类对此作出决定再说。”他认为，对反动派通过逮捕和流放明显表示出来的对立的危险性视而不见，是胆怯的表现。他由于自己的信念而感到自己同整个现存社会格格不入，就像无产者由于其实际的生活地位同整个现存社会格格不入一样。他感到自己是一个革命者，是这个社会的罪犯，他相信，每个共产主义者必然也有同感。他也坚信，沙佩尔和C.鲍威尔如果深入考虑一下这种看法的后果，是不会坚持他们可悲的看法的。同时他还相信，反对现存社会制度的革命是完全合情合理的。至于宗教改革派，他认为他们的斗争不是为我们的信仰自由，而是为他们自己眼前的幸福，因此他要求沙佩尔也以他们为榜样，即不

要为我们的后代，而要全力以赴为我们自己去争取我们认为在我们的时代可以实现的东西。

弗里茨⁵⁷ [他从1845年4月28日起是会员]：“宗教改革派不是为自己斗争，而是为他们的后代斗争；历次农民战争都证明了这一点。一切革命都是为后代进行的，没有一次革命涉及其自身的利益。人们还觉得共产主义似乎很坏；发展是分阶段的 [……]”

普芬德：“沙佩尔和鲍威尔是完全按照自然规律来阐述共产主义的。而克利盖阐述的共产主义就好比一棵植物在第一道阳光射出时就破土而出，但一露芽就只落得个冻死的结局。克利盖想强迫人们接受他的观点；他对人们说：你们得接受，不接受我就敲你们的脑袋；他们因此反过来敲我们的脑袋，谁最有劲谁得胜。他要求热情。热情有什么用？什么热情都是幻想，都是不能持久的香槟酒的气泡。全部历史都证明，任何发展，来得快去得也快；如果整个人类对此没有深刻的认识，它是存在不下去的。”

沙佩尔：“克利盖的发言是我的一面镜子。我在10年、8年，对，甚至是6年前^①说过的话同他说的一模一样。可是现在，一些痛苦的经验教训使我冷静下来了，现在我不得不完全同意反动派的那种说法：‘人们还没有成熟’；因为他们如果成熟了，那我就不用再这样说了。的确，路德只求为自己的极乐而斗争，但永恒的自然规律另有所求，因而我们收获了他播种的东西。一棵树必须慢慢地把它弄直，否则会把它折断。我不要求给我的工作任何报酬，我只要求自己对所尽的义务应当有觉悟。真理绝不是靠枪托打进脑子里的。克利盖宣传的东西是对良心和社会的可鄙的强制。

^① 沙佩尔在这里指的是他1839年以前的经历。1839年他参加了布朗基的起义（参看文件10）。

他究竟想干什么呢？是要我们移居美洲，以舒舒服服地隐居在一个共产主义移民区为生活乐趣吗？不！我们要为后代工作。我们宣传的真理将纵情驰骋，这是自然规律所使然。我们不要给自己制造幻想；共产主义者在10亿人中大约只有400—500万，同全人类相比只是区区之数。我仍然认为，共产主义的革命是荒谬的，它完全违反共产主义的原则。真理不需要物质的暴力；它本身有足够的力量；如果我在这里能把真理之所赐灌输进哪怕只是一个人的心里，我就感到十分心满意足了。就我个人来说^①我也是坚持要革命的。我最大的愿望向来就是要战死在沙场上。然而我必须克制我的个人愿望；我是属于人类的，为了人类的利益我必须为真理、平等、正义而斗争。而克利盖也许是想同罪犯、小偷、娼妓和杀人犯一起生活吧？可是这些人只要看到他们的私欲再不能得到满足，就会立即背信弃义地把他抛弃。就像在萨瓦进军时^②所有的革命农民一得不到面包就逃之夭夭一样。不！这不是革命！我们要坚持不懈并且勇敢地撕下挡住人类视线的面纱；这就是我们所要做的一切。”

魏特林：“关于真理、自由、正义人们在这里已经说了很多。我们的全部努力是应该奉献给它们的。可悲的是，有一些概念我们还没搞清，至少是人家要求下一准确定义时我们非常尴尬，而我们却为这些概念生活。沙佩尔讲得很长很坦诚；但他

① 在谈话行的文本上为“政治方面”，但是从上下文来看，特别从下面沙佩尔对魏特林的答复来看，这里显然是一个笔误。

② 1834年1、2月，马志尼试图从瑞士出发，向萨瓦进军，并在意大利北部发动一次起义，但没有成功。沙佩尔参加了这次起义，因此被监禁至1834年夏天。

的整个发言无非是：先反对革命，然后赞成革命，后来又反对革命。没有成熟这一说法历来是任何敌视进步的人的贴身武器。其次，人们在这方面想靠多数来解决一切问题，这完全是错误的。我们在这里甚至都不曾有过一致意见，哪里还谈得上有什么整个人类的意见一致呢？即使有一个人受大家的委托担任全人类的导师，原来的意见纷争也会重新开始，获得启蒙以后情况也同现在一样。今后如何？如果得救之福完全寓于启蒙之中，我们怎样才能取得启蒙？我们从哪里取得我们认为必要的启蒙手段呢？撇开书报检查和其他障碍不谈，千百万的人根本没有时间听我们讲。人们一代接着一代地死去，年轻人又得从头做起，启蒙普及不了；它总是只局限于一小部分人。关于我们所希望的东西，克利盖和我根本还没有提出什么特殊的意见；我们只是反对我们这一代没有成熟这一教条，认为以共产主义尚不存在等等为理由是根本证明不了这一教条的。今天没有发生的事，明天就可能发生。革命是像暴雨一样突然爆发的，它的效力谁也无法预料。最后，即使有人，如沙佩尔有这种信念，说出来也是很策略的。这样的信念会打消年轻人的勇气。不应该用这类令人气馁的原理来冷却年轻人的满腔热情。如果希望不再鼓舞着我们，我们的热情又从何而来呢？”

6月30日，克利盖回敬了沙佩尔和普芬德的多次抨击，并继续反对以没有成熟这个教条为根据的牵强附会的和平进化论。他认为：“历史证明不了什么，即使人们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历史也根本没有反对革命的证据。法国革命就完全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就是说整个民族屈服于第三等级即资产阶级，屈服于这个阶级的上帝即金钱。关于萨瓦进军，他反驳说：得不到吃的就逃跑，

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他们的肚子明白告诉他们，这一运动同他们的利益毫无关系。如果革命的目的不同时也是为了参与运动的广大群众的个人利益，这个运动就注定要失败。但共产主义恰恰就是无产者的最大的个人利益，因为它就是要向所有的人提供衣食住的手段；所以共产主义能够并且必定使无产者由衷地卷入革命。至今我们还没有共产主义革命；因此，过去的革命没有留给我们任何成熟的果实，这是很自然的。”

沙佩尔：“首先我必须对**魏特林**公民说，如果我说我作为个人是革命者，而作为社会的一员就不是革命者，这一点也不矛盾。**克利盖**声称，历史为我们证明不了什么；我说相反，历史为我们证明了一切，而且正因为反动派在知识方面超过我们，所以他们才比我们强大。一千年来我们已经有过共产主义的革命，有产者和无产者的对立遍及各地。如在**梭伦**和**莱喀古士**时期的雅典和斯巴达，**扎克雷**起义时期的法国，**瓦特·泰勒**时期的英国。德国的农民战争以及比利时的运动都是社会革命。但是，它们都同**拿破仑**时期、**查理十世**时期和**路易-菲力浦**时期的历次法国革命一样失败了，继短暂的胜利之后便是更大的覆灭，这就是一切革命的命运，因此，我们要当心，不要提出一些对我们的原则极其有害的原理。然而**克利盖**公民想把整个共产主义归结到物质上，即对一些革命者当时所说的话信以为真，共产主义者只是想吃想喝，而把一切解释得庸俗不堪。不，人民应当成为人，尤其是应当成为精神上幸福的人。我们以人类的自由〔……〕平等〔……〕正义的名义在进行斗争；但是这一斗争进展得不会很快；我们首先要开导人民；否则随着外部的毁灭自己也毁灭了。我们从历史上看到这种情况，一切总是以无政府状态和专制统治而告终；群众打死

了高贵的人，最后只剩下庸俗的人。不，我们不能从起点一下子跳到终点。在日常政治中，难道我们不是到处都可以看到极其卑鄙的受贿腐败，不是在所有的角落都可以看到反对理智的联合。现在还根本无法开始实行财产共有共享，那是留给后代去实行的；我们只能进行启蒙、启蒙再启蒙。那么克利盖公民怎能把私人利益说成是共产主义的革命的原则呢？我们恰恰要消灭私人利益！我们是宣传自我牺牲的！如果我追求我个人的利益，就会呈上一份卑躬屈膝的请愿书，祈求君王的照顾。这是一种很危险的思想，不，我只能在大家的利益中寻找我个人的满足，我深深知道，当我在为共产主义进行宣传时，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的兄弟们。要是谁对我说，他只追求他的个人利益，那我不再相信他；共产主义要求牺牲，我乐意为共产主义牺牲。”

莫尔：“如果我对魏特林和克利盖两位公民的话理解得正确，那么他们不是想唤起革命，而只是在革命已经进行时支持革命。但是，我们也必须密切注意，看革命的目的是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迄今的一切革命只对少数人有利，甚至连法国革命对资产阶级都不曾有利；革命的无数次破产向我们证实了这一点。所以，如果我们不能非常准确地预见到革命的结局必定同人民的利益相一致，那么我认为，我们最神圣的职责就是处处宣传反对一切革命。” [……]

魏特林：“我在这里既不能号召革命，也不能宣传反对革命。我是在探讨，仅仅是在探讨革命的效果。各民族都为有自由而自豪，但是，一切自由都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获得。在政治方面除了革命之外，我们认为启蒙是无济于事的，启蒙总是只有在革命之后才起作用。所有国家都无一例外地把它获得自由归功于

革命。用和平的方法进行启蒙是一种幻想；只有在斗争中才能获得所追求的东西。既然我们这里都不能通过启蒙取得一致，而我们又是些自认为是工人当中有教养的核心人物，那么，哪里还能通过启蒙取得一致呢？而革命却是一个取得一致和进行启蒙的极好手段，它给予人们无限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在革命中，人们心里会充满对自己志同道合的兄弟，自己患难与共的兄弟的同情，而他们对于这种同情的力量，过去是闻所未闻，毫无所知的。这时，小偷忘记了偷盗，娼妓忘记了卖淫，裁缝忘记了做他那漂亮的上衣。这时，所有人都亲如手足，所有人都同心同德。这时，理智只是一个可怜的角色；没有感情，理智就什么都不行；这时，感情就是一切，最伟大的行动都由激动群众的感情之力所产生。有人反对物质，但是没有物质基础，所有理智都是极其荒诞的。没吃没喝就不可能进行启蒙。向饥饿的人进行启蒙是荒唐的。可见，首先要满足贫困不堪的人的需求，为此我们必须着手消除无产者对财产的敬重心情，让他们起而革货币制度的命，让他们牢牢记住：如果他们在贫困之中不愿行乞或者挨饿而宁愿偷盗，那他们不是罪犯，而是好汉。”

7月6日，亨·鲍威尔发言说：“摆在面前的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如果把共产主义理解成我们所理解的那样，即建立个别的共产主义团体并不等于共产主义的实现，共产主义只有包括全人类时才算实现，那么，我们的确一方面可以说：人类还没有成熟到这种地步，另一方面又可以说：人类永远不会成熟到这种地步，因为如果共产主义有朝一日遍及全球，那么它的历史就会提供一幅类似今天各民族的政治历史所描绘的那种此起彼伏的图景。如同这里某一民族兴盛了，那里另一民族衰落了一样，将来

共产主义也是此起彼伏的。人们自然可以把原始的人称作共产主义者，因为他们还不知道什么你的我的，他们还没有私有财产的概念，而这种概念现在却成了阻碍实现共产主义的主要障碍。像我们到目前为止具有的那种财产共有的小团体，一方面同压倒它们的另一社会相比太无足轻重了，另一方面又不敢直接出面反对私有财产。占有者的利益会作为不可克服的障碍横挡在对面，阻碍着只用和平启蒙的方法实现共产主义，因为他们只要还有能力，就会维护自己。当然，他们和支持他们的政府是最能促使共产主义实现的；他们干的下流卑鄙的勾当使他们成了最好的宣传者，目前的日常政治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有力的例证。^①这种可鄙的压迫必然会产生一种有力的反抗。这种反抗将一直持续到用暴力摧毁旧社会为止。因此，不应对单纯和平的启蒙抱多大希望。如果没有巨大的实际事件强迫占有者，他们是绝不会让步的。魏特林已经向我阐明，不斗争就什么也得不到；启蒙不断为新的革命作准备；它不可能避免革命。今天我们也处在一个伟大的准备时期；国家法律、政府措施和工业进步正以强大的力量把社会问题推向首位，并不断地施加压力，直到整个民族有朝一日终于理解共产主义并使之成为活生生的现实，到那时，整个人类没有敌对的法律，没有反对共产主义的国家，可以畅通无阻地为自己新的生活原则而欢欣鼓舞。那时，创造一个共有共享制遍布全球的时代将是可能的。现在我们总是有征服的民族和工业的民族

^① 讷特劳注：当时，政府为了镇压8 000木工的罢工，允许军事木工半价劳动。赖德律-洛兰代表工人反对梯也尔和基佐插手干涉，于是，8月底开始联合审讯，贝利耶为木工提供了司法辩护。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人道的民族，它不同于其他民族，它已经开始探讨社会问题，这个民族就是德意志民族。只要我们大胆地工作，使共产主义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传播，共产主义的实现也许就不是像某些人在最近的讨论中想象的那样遥远了。”

沙佩尔：“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中有两个问题很快被提到了首位：1.我们这一代成熟到可以实现共产主义了吗？2.在争取共产主义的斗争中我们必须是革命的吗？我只要浏览一下欧洲的统计，看到欧洲有一半人是文盲，我对这一代人的期望就大为降低。但是，如果一直有条不紊地进行宣传，宣传就有一种巨大的力量。例如，假定德国有2 000名共产主义者，他们每人每年只要向3个人进行启蒙，这样，6年就可以争取到300万人，这相当于整个德意志民族的人数（？）^① [……] 这样，下一代就会成熟到可以实现共产主义，至少是成熟到可以建立较好的社会组织；因为我从来都不相信能够从起点一下子跳到终点。如果在口头启蒙之后，报刊，最后是物质的暴力也接着发挥其作用，这样，成熟的时刻就能到来，同现在似乎出现的情况一样（原文如此！）。我们在最近5年中已经争取到50 000—70 000名共产主义者；让我们再耐心等一下，看下一个5年我们会取得多大成果。所以我对这一代人不寄予什么希望，而对下一代人则寄予很大的希望，尤其是著作家^②正在这方面大胆帮助我们。如果他们借助于我们的帮助，

① 这里显然是记录者记错了，以致纳特劳在此加了一个问号。我们只要注意一下沙佩尔在这里所作的累进计算法，就可以看出，这个数字不应是300万，而是800多万。如果沙佩尔只计算了德国的成年男性人口，那么，这个答案是正确的。

② 原文如此。但是，从下文中提到累进税一词来看，“著作家”一词很可能是“自由派”一词之误。

例如实行累进税制度，我们就能很容易地通过建立纯共产主义的团体进一步推动运动。至于第二个问题，无论如何可以假设有朝一日会爆发某种剧变，它针对过去的混乱提出某种目标；但是这绝不能妨碍我们随时随地谨防革命。我们细想一下就会注意到，政府恰恰总是企图诱使这类剧变的爆发。这些政府如果看到某一运动不仅制止不住，而且它已经把全体人民都吸引进去，它们就采取这样的原则：像医生治病那样，给病人切除溃疡，或者赶快放血。它们派密探钻进对方急躁冒进的营队里，唆使突然起事，分化瓦解爱国者，并通过表面上似乎很有道理的对领导人的反叛，使整个运动完蛋。1832年巴黎的情况就是这样。在里昂，政府的密探被它自己的士兵开枪打死，1839年（5月），我在巴黎亲眼看到一个爱国者把一个暴躁的革命领袖击毙，并从他的口袋里掏出黄色的名片。因此，卡贝慈父的态度使政府感到很讨厌。他到处宣传反对革命，这样，政府根本抓不到什么表面的理由，例如就完全退回到土鲁斯去了。^①在德国，我们也必须抱类似的态度，德国各邦政府已经开始仿效法国警察，西里西亚最近的密谋事件证实得非常清楚。^②随时制止年轻人急躁行事是我们的神圣职责。我们必须通过我们平静的态度迫使政府成为革命的；他们必然不

① 在1843年9月在土鲁斯进行对卡贝的拥护者的审讯中，未能证明被告参加过任何一个旨在武装政变的秘密团体。

② 1845年春，在西里西亚开始了对所谓的希尔施贝格密谋的调查，当时的法院助理施梯伯第一次充当密探。从木工武尔姆处发现的资料，特别是维尔穆特和施梯伯《19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1953年柏林版第1卷第203—208页上刊印的一份呼吁书证明，所谓密谋，实际上是一次为反对西里西亚地区的大土地占有者和资本家出版商而建立秘密团体的尝试。

断进攻；最后达到一定的点，这时，情况完全改变了，这时，一个带来胜利成果的斗争才是不可缺少的。这就是七月革命中的情况。资产阶级从来没有搞过什么革命，它只通过维护其合法的专利权来取得胜利。在德国，我们同样也可以在合法的道路上迈进。对我们来说幸运的是资产阶级也还受压迫。它可以同政府进行最初的斗争；然后，我们无产阶级站在后台并且做得更好，像1830年的法国人那样。只要我们沉着冷静，随时制止年轻人的急躁情绪，把我们目前的全部努力统统用在教育上，那么资产阶级将发觉我们比1830年准备得更好，而我们能够从资产阶级对政府的胜利中得到相应的好处。”

魏特林：“只要一个党还很小，它就必须千方百计使自己强大起来。我们既需要革命者也需要启蒙者。因此，我们目前的政策应当是：不对我们党的阴暗面牢骚满腹。我们没有必要发牢骚。对所有的阴暗面，完全可以置之不理。我们如果不让工人看到我们的原则有可能很快实现，那么，在他们当中进行宣传就极端困难。但是，实现原则只有通过革命，另外，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对我们来说也就是一个完人。敢为一项事业赴汤蹈火，也就敢为这项事业去做一切。革命迅速爆发的希望比和平说教更激动人心。卡贝慈父终究是一位老人，在他的报纸（《人民报》）的订户中，肯定有一半人不赞成他的和平调子，一味和平宣传会减弱勇气和热忱，何况这种宣传一般是极端枯燥无聊的。必须经常掀起革命斗争，哪怕这种斗争只会招来反动派的迫害；这恰恰是最好的宣传。殉难者的荆冕，比诗人和演说家所有的桂冠加在一起更能赢得人心。各国政府也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它们像害怕鼠疫一样害怕悲壮的殉难。例如，当新教遭到天主教迫害的时候，新教具有什么

样的力量啊！现在新教教徒的热忱已经冷却。再没有人争着信奉路德教了，再没有人像从前那样重视路德教了。基督教的遭遇也完全一样。我再重复一遍：一味说教会令人感到厌恶，而且很可能长不了，各国政府会利用我们所有的宣传口号为自己谋利，正像普鲁士国王在1813年利用法国革命的口号为自己谋利一样。我们不要过分夸大我们的经验，不要过分责备年轻人的急躁莽撞。年轻人的急躁莽撞常常比老年人所谓的深谋远虑更合理，炽热的感情比来自全部经验和书本的理智更能得出明白正确的认识。年轻人的大胆行动往往使谨小慎微的老年人的成千上百句金玉良言啼笑皆非。”

第六个问题：“用什么方法最能实行共产主义？”（1845年7月15日、22日）。

沙佩尔发言说：“一般说，共产主义在德国是人道主义的，在法国是政治革命的，在英国，尤其在美国是完全反对革命的和务实的；美国有各种倾向的移民区50—60个。”

他还提及维尔特的累进税制度和“国家工场”的思想：“因为依靠这些，国家可以压制资产阶级的竞争，或者换句话说，私人财产可以成为国家财产，也就是说共产主义必定可以实现”。

魏特林：“要探讨什么是实行共产主义的最有效的方法，我们首先要对过去使用过的一切方法作一番透彻的批判。当欧文派建立新和谐时，他们希望它所获得的物质成就吸引周围的人都加入，并且通过实际宣传逐渐使共产主义占领整个英国。他们的希望落空了。为什么呢？如果一些来自旧社会的人突然被限制在一个小范围内，那他们就立即只看到吸引人的东西，而再也看不到旧社会的恶。他们会由于一些无益的吹毛求疵的反对意见而毁

坏内部的和谐。如果他们能轻而易举地更换地点和团体而又不损害整体和自己本身的物质利益，如果他们能躲开敌人，和谐就会有保证。但是，这在这么小的移民区里比在目前的社会里更行不通。他们故土难离，并眷恋着父老乡亲及其利益，就像妻子眷恋丈夫或丈夫眷恋妻子一样。自由是受限制的。人不会没有激情和情绪。就拿新和谐来说，连兴建也没有能兴建起来。这个团体在想到自己动手干之前，必须先筹集900英镑租金；其次，为了经受住竞争，它必须保留旧社会的全部价格，这样一来，各种主要好处从一开始就没有了，而不能更换地点、社会团体和劳动团体这个主要缺点就会产生更坏的影响。

另外，移居美国的人还完全缺乏精神食粮，他们对此越是习以为常，他们这方面的情况就越严重。他们同整个现存社会相隔离，肯定很快就感到无聊苦闷；他们怀念旧的状况，互相败坏对方的生活。抛弃资产阶级创造的美好的东西而到美国从头开始创造在欧洲全都已经现成的东西，这也是愚蠢的。人们与其长期丧失自由和不得不干毁坏森林之类的事，倒不如在欧洲这里干；至少他们在这里可以干些对事业有利的事。

说起原先的问题，那我必须回答说：我认为每一种实现共产主义的方法都是有道理的。我们不要让无谓的争吵使我们分裂，而要坚决支持有助于我们的一切。如果某人的一种思想受人欢迎，而我们却不同意，那么，我们宁愿完全保持沉默，也不去反对他。我们是一个有明确方向的大党，我们不要因为反对个别不同色彩的流派而失掉我们的时间！只要大方向一致，是用无神论还是宗教，是用移民还是革命来进行宣传，对我们来说反正都一样。我也有我的观点，但是，这并不妨碍我支持别人某种有益于

共产主义的观点，如果别人也同样以容忍为己任的话。”

沙佩尔：谈小移民区内部的匮乏；谈法国人的方针：“法国人想用政治革命来实现一切。**卡贝**慈父也认为，必须先进行一次政治革命，这次革命造就一个**独裁者**，他以其坚强意志、聪明才智和仁爱之心推行共产主义；这样，经过50年的过渡时期，整个民族就可以置身于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之中。”

“**魏特林**说任何能实现目的的方法都是对的，我也这样认为。但在我看来，他心爱的理论（普遍盗窃）从其实际意义来说是以幻想为基础的，即使这个理论像**蒲鲁东**在理论上作过充分证明的那样，是现存社会状况最严谨的结论也罢。如果盗窃成为普遍现象，那自然会出现严重的混乱；我只怕其结果是最可耻的军事专制主义而不是什么共产主义。这时会有几千人被绞死。这样一来，原来虚伪的诚实正直就倒退到更坏的状态。在伦敦这里，我们已经见过很厉害的抢面包抢肉事件；但枉费心机，结果是饥饿的小偷挤满了监狱。人们很狡猾，只要把个别人逮捕起来，然后判处长年流放，别人也就无意步其后尘了，所以，什么方法我都赞成，只是不赞成这种方法，因为从实际来看，我觉得这种方法是完全荒谬的。”

克利盖发言，他“把盗窃说成是现今社会的真实写照，并且特别把盗窃译成战争法规，以此证明盗窃实际上是合情合理的。他以极大的热情维护这种方法的合理性。但是，他认为讨论盗窃问题是不适宜的，对此，他表示了这样一个信念：这一盗窃理论有可能实际推行时，一定会同他一起得到我们团体的每个成员的极其坦率的拥护。”^①

^① 从1845年7月22日起由哥贝尔记录，记得简略；在结束上述讨论时，沙佩尔建议克利盖谈一些哲学著作。

第七个问题：“什么人对实行共产主义最感兴趣？他们中的哪些人拥有最多加速实行共产主义的手段？”（7月29日—8月19日）

[……] **魏特林**：“通过在德国出版的**共产主义的报纸**^①，许多人也许感到自己已从仁爱出发达到了报纸上所宣传的自由。共产主义也能满足有功名欲者和征服者的某些东西，所以有征服欲者和君主将会转向共产主义。如果有个君主疾病缠身，因而学会体恤病人和不幸者的状况，他就会出于对穷人和病人的爱而成为共产主义者。因为一个充分享受健康幸福的富人根本不会赞成共产主义。好活动的年轻人会倾向于共产主义，因为他们如果想为共产主义做点事情的话，他们也可以在这当中满足自己的行动欲望。共产主义的著作也为妇女着想，为穷人谋福利，革命者在其中也获得满足。”

列曼说：“公爵们遭到大的皇室轻视，出于忌妒也会对共产主义产生兴趣。”^②

亨·鲍威尔：“不！是工人将会这样做；如果……他们得到启蒙，就会立即提出自己的要求。”

弗里茨：[……]“**约瑟夫皇帝**^③表明，他对人民有某些好的意见。如果我们想突出某一等级，我们就成宗派了。”[……]“在富人当中有许多高贵的人，如果我们通过我们的好榜样把这些

① 魏特林很可能指《社会明镜》，该杂志于1845年5月底6月初开始出版，但也可能指《特利尔日报》。

② 可能是指不伦瑞克公爵，当时公爵流亡伦敦，支持反对派运动，参看注128。

③ 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

人吸引到我们这边来，他们就会用他们的资金支援我们。”

奇芬德发言认为鲍威尔说得对，他说：“中间等级^①对共产主义有极大的兴趣。我们必须依靠启蒙把穷人和无产者吸引过来。学者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他们已走下讲台去教导人民，因此，他们知道他们应该做什么。” [……]

魏特林：“我们没有弄清应该把哪些人吸引到我们这边来。至于约瑟夫皇帝，他把他的全部财产赠给了穷人和不幸的人。如果约瑟夫皇帝有老弗里茨^②的勇气，他也许能为人民做更多的事。但是，现在他必须为他所做的一切付出高昂的代价。我们必须主要指靠工人，我们也必须用钱进行活动，我们必须拥有一切能使我们实现目的的手段。如果我们用革命的方法唤起共产主义，我们就必须有一个能统治一切的独裁者。为此，这个独裁者不应该比其他任何一个人拥有更多的东西；如果他的活动只是为了普遍的幸福，我们会非常乐于让他担任这个职务。”

1845年8月5日，鲍威尔（发言反对君主共产主义）：“我们必须只限于指靠那个还有点东西的阶级。最底层的民众阶级对一切都麻木不仁，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希望寄托在还没有落到最底层的那个阶级身上；我们曾经看到，这个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最先拿起武器的。如果再来战斗，他们也将知道为什么而战。”

弗里茨反对只限于对工人进行宣传；他说：“我们也必须设法争取富人。”

① 这里的中间等级，从上下文的意思看，可能不是指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中等阶级，而是指工人阶级中的中间阶层，他们的状况略好于早期工厂无产阶级中被累贫困化的阶层。

② 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二世。

列曼：“让我们以学者为榜样，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工业城市。”

鲍威尔：“……”“教育是号召争取比较美好的未来的主要方法；10年前，情况还不像今天这个样子；现在，学者和哲学家同我们携手合作，富人也企图同我们取得一致，我们希望不必经过艰巨的斗争就能看到共产主义的实现。”

魏特林：“我在上次会议上已经谈论过各个等级。富人和学者将会尊崇共产主义。然而，富人即使替共产主义说好话，共产主义对他们来说毕竟不太合适。无产者对共产主义有很大兴趣[……]，但是，十分之九的人还根本不知道共产主义是什么东西。在农民当中，对共产主义的认识还漆黑一团。《快乐而好奇的汉斯》^①一书是一部共产主义的书，这部书在许许多多以前就写出来了，可是人们根本不了解它。”

8月12日，会议继续讨论关于宣传的可能性。8月19日，大家一致赞同魏特林对第七个问题所作的回答，这一回答是：“对现存社会感到不满意而又不想光图自己满意而损害别人的人对实行共产主义最感兴趣，最有远见卓识的人拥有最多加速实行共产主义的手段。”

第八个问题：“手工业者和与手工业者境况相同的人以什么方式才能最有力地促进共产主义的实行？”（1845年8月19日—9月9日）

魏特林和其他人详细地谈了口头宣传的技巧等等。问题的回

^① 雷布曼和他1794年出版的《快乐而好奇的汉斯》，参看纳捷日达·弗拉斯蒂《安·格·弗·雷布曼传》1907年海德堡版和海德维希·菲格特《德国雅各宾派文学和新闻学》1958年柏林版。

答是：“实行兄弟般的团结一致和传播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

第九个问题：“为了尽可能地使宣传统一起来，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规则去做？”（9月9日、16日）

魏特林赞成采取容忍态度，不主张粗暴态度。其他如**鲍威尔**等人不完全同意这种出于策略原因采取的容忍态度。**魏特林**说**鲍威尔**、**莫尔**和**普芬德**的意见是“写出来的东西先要经过审查或表决；但这是行不通的。我碰到这种情况〔……〕试问，该得到谁的同意？我不能把它说成是一个主要方法；因为大家全都意见一致是很难的〔……〕**鲍威尔**公民说，应该写些小传单，但是关于共产主义的小传单已经写得够多了，小传单会被扔掉或撕毁。而书就不会有这种情况。虽然小传单有小传单的好处，但是，如果想写点重要的东西，就不能写成小传单。如果认为这是浪费，认为是为某一个人写的著作花钱，如果我们要建立一个审查委员会，那我们什么书都出不了。”

9月16日，**鲍威尔**：〔……〕“书通常提出体系，我们不能设想，这些体系在财产共有的社会中是将被实行或者是能够被实行的；因为人们总是要根据时代和情况而定。莱喀古士以及早期基督教徒根本没有著书……到现在为止口头宣传搞了更多的东西。

紧接着**魏特林**对此又进行了答辩。

第十个问题：“什么是独立于任何体系之外的最完善的共产主义的实质？”（1845年9月30日—10月14日）

魏特林：“共产主义就是：我为自己做的必须也是别人认为是好的或可以做的，没有人觉得受到阻碍。完整的表述是：自己所希望的，必须也是大家所希望的。”

“无神论是一种片面的原则，而许多笃信宗教的人却是不能改变它。不能强迫信仰，最好听人自便，任何时候都会有人愿意信仰宗教和道德。是否对大家都好？这始终必定是试金石。”

对无神论和〔魏特林所理解的〕共妻制进行了一番讨论之后，魏特林重申了他的观点：“凡是自己所希望的必须对别人也是好的。”而罗森塔尔认为共产主义的实质是：“每一个人都能自由发展并且不再受别人统治。宗教是阻碍共产主义的。因为一个人只要信奉宗教，他就甘愿忍受折磨忍受奴役，而不去关心他的真正幸福和权利。”

沙佩尔同意后面这个意见，然后批评了欧文和卡贝的体系（人们把卡贝的体系同羊圈相比）以及魏特林的体系，说这一体系是“兵营式的”。“如果追本溯源从人的本性出发，那么，人只有在劳动中才能找到他的幸福。劳动和享受互相交替，任何幸福才会变得完全。无须强迫，因为人并不懒惰；人经过相应的教育阶段，就会愉快地劳动。至于宗教，只要人们信奉宗教，他们就会忍受一切，很少关心他们的权利。我并不是想说，我们应当相信没有上帝；但是上帝必须同世俗相一致。我们不需要把上帝拉到我们的事业中来。任何超尘世的东西都不得干预国家事务。让我们设法使每个人都知道，共产主义的实质必须是每个人都能自由发展。”

魏特林提到刚才作过的解释说：“但是，这个人比另一个人有更多的智慧，这个人也就需要较多的精神满足。这个人必须帮助那另一个人；缺乏知识的人必须向知识较多的人学习。”

普芬德：“人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表述。上面讨论的自由；每一个人都能够自由发展，这本身就是平等。在共有共享

中自由和平等是可能的。魏特林公民认为自然界给共产主义设置了障碍。但是，如果我们遵循自然界，人与人就平等，一切都处于共有共享的地方就有节约。” [……]

10月14日，魏特林：“共产主义的实质是这样一种状况。在这种状况下一切都是共有共享的；但这并不在于自由发展。共有共享渗透于一切之中，像一条链子一样把一切都相互连结起来。不能有任何特殊的利益，为了那些被自然界所忽视的人们的利益，我们希望共有共享。人们用基督教编造一切；我们的责任是要注意防止共产主义也发生这种情况。”

鲍威尔：“魏特林公民认为自由不包含共有共享；如果一个人享有自由，他一定也能使自由得到满足。人们必须共同享有自由，否则他们就不能发挥自己的能力。”

沙佩尔：“魏特林公民认为，必须给我所说的原则再加上‘共有共享’。发展的基础必须是人人共有的，我相信，连享受都共同是行不通的。因为这恰似兵营里的士兵的享受一样。我担心我们会因此陷入严重的斗争。其次我相信，我们在自由发展中人人都能幸福。”

普芬德：“没有共有共享，自由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我们能够全面发展自己时，这已经是共有共享了。只要有自由发展，享受也必然是共同的。在我们以后的世代，情况会有许多变化；因为由于有共有共享的和谐，每一个人都能得到他喜爱的东西，并且有很多节约。”

魏特林“认为讨论的内容同讨论的问题不完全吻合。即便是我们现今的社会领导人也可以向我们承认自由的发展；自由的发展并不是共产主义的实质。”

沙佩尔：“我相信，如果我们向德国的自由主义者提出这种自由发展，他们也不会愿意；每一个人必须享有他的完全的自由，而又不反对他人的个人自由。” [……]

第十一个问题：“根据共产主义的实质来检验古今的各种不同体系。”（1845年10月21日—11月11日）

魏特林谈到欧文的体系，大家认为这是最好的体系；一切均应通过共同联合去进行，教育被赋予极其伟大的意义，教育可以造就人的一切。——他在卡贝的体系中没有发现什么矛盾。——然后谈到傅立叶。

沙佩尔：“以前曾经有过一个创造体系的年代；我认为现在不会再有这样的年代了。在这些体系中，人们看到的只是一种兵营生活；何况人们根本看不透人的内心深处。欧文认为：劳动是一种负担，繁重的劳动属于年轻人，老年人最好是负责管理。但是，25—35岁的人是最强壮的，因此也能从事最繁重的劳动。傅立叶的体系在好些方面是可笑的。所有这些人只是探求用什么方法才能够找到最繁重的活可以干。各人有各人的特殊爱好，没有人乐意做强迫他做的事 [……] 我们追本溯源从人的本性出发，我们将看到，一切都将有有条不紊，经过两代人以后，一切都将处于最好的和谐之中。”（10月28日）沙佩尔说：他可以在卡贝的社会制度下生活一个月，但时间不能再长了。“在那里，生活是如此安宁，而过分的安宁会使人类重新成为奴隶。人类要不断地战斗，但是，这个战斗必须向精神方面发展；现在有人已经谴责共产主义者说，在共产主义状况下对更美好的东西不会再有内心的欲望；而那些不去努力追求更美好的东西的人是可悲的。他反对欧文的家长式的制度，认为这是老年人的统治

[……]”

魏特林： [……] “共同劳动和共同享受是有可能的，最有能力的人做的事必须对能力较弱的人有利。经过对各种不同的体系的考察，卡贝的体系是最好的。” [……]

沙佩尔： [……] “不论欧文还是卡贝都是追本溯源从人的本性出发。这是一些最初的体系，这些体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发生变化和变得更好。”

接着还是讨论卡贝，好些人维护他或原谅他，但没有完全赞同他。

第十一个问题^①： “个人对自由的爱一般要求什么？而现今的社会制度一般给这种对自由的爱又提供了什么？”（1845年11月11日和18日）^②

第十二个问题： “争取自由独立的努力给现今的社会带来了什么好处？”（11月18日）

第十三个问题： “在现有的体系中，这些好处得到了多大的保障？”（11月25日）

沙佩尔： [……] “在魏特林的体系中自由也是没有保障的。我认为，真正的体系将会由我们德国新派哲学家建立。当我们讨论完魏特林提出的这些问题^③之后，让我们好好讨论一下德

① 原件如此，这明显是计数上的错误。

② 纳特劳的脚注：这个讨论我未作记录和拷贝，可见，我在查阅时可能认为它没有什么意义，否则我就会对它感兴趣。魏特林自1846年1月7日起就没有再以演说者身分参加讨论。

③ 指关于魏特林提出的问题的讨论。

国的新哲学，并进一步研究我们的主张。”⁵⁸

第十四个问题：“在共产主义国家中个人自由通过什么规章得到体现并同国家的需要相和谐？”（11月25日）

沙佩尔就此问题发言，他没有谈出什么重要的东西。

第十五个问题：“什么是衡量人力的正确标准？什么样的制度是最好的交换制度？”（1845年12月2日）

[……]沙佩尔：“在财产共有共享制中不可能有一个交换制度，这同魏特林的体系所阐述的一样。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抛弃了这种制度，所以也就不能再说什么了。”[……]“交易小时也会带来弊病，这样，有的人就总能比别人更好地满足自己的需要。如果不需要交易小时，人们就需要多少生产多少。”[……]

第十六个问题：“魏特林作为他的体系的基础提出来的对舒适品的管理和对非舒适品的管理的区分能提供什么好处？怎样理解交易小时？在什么范围内交易小时是可能的或不可能的？”

魏特林认为交易小时对生产非舒适品的劳动来说是必要的，但交易小时被大家拒绝了。

第十七个问题：“在过渡时期应当更多地注意什么？是原则的实质呢？还是个人自由？”（1845年12月23日）^①

第十八个问题：“君主政体、立宪政体和共和政体按其本质来说会给人民带来什么好处和坏处？”（1846年1月7日）

魏特林（他的最后一次发言）^②：“君主政体有统一的好处，

^① 纳特劳的脚注：这个问题的讨论在今天看来可能也是适宜的，可惜当时我在查阅时未能看清它的价值。而沙佩尔在这方面的发言恰恰证明，这个问题是魏特林提出来的，并且使人可以想到原文的价值。

^② 纳特劳的脚注：可惜这是粗心的书记员维尔贝儿记下的。

君主政体只根据一个人的话去行动，所以它行动起来能够比一个共和政体有力得多。共和政体要通过选举才能行动，这样一来，根本不能像君主政体那样能够取得统一，这个人要这样干，那个人要那样干，这确实只能造成混乱。在战争中，这种状况毕竟是很不利的，因为通过选举，许多东西会泄露出去，不过，共和制由于有自由确实有许多好处；总之是应该把事情交给像拿破仑那样的一个人去办。”

〔……〕“法兰西共和国确实产生了许多好的东西；也正是通过它才取得自由；但是，它缺少统一，因而整个垮台了。拿破仑通过统一拯救了政府。拿破仑把新的宪法结合在一起，并以此连成统一；只是他的野心毁掉了他。只要原则确定了，共和制同样也能实现共产主义。”⁵⁹

麦克斯·内特劳《伦敦德国共产主义协会的讨论》，载于《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莱比锡）1922年第10年卷第365、386页

65

弗里德里希·门特尔关于伦敦正义者同盟的供词^①

1845年4月至夏天^②

〔……〕伦敦同盟是巴黎同盟（它由流亡那里的手工业者和

^① 门特尔的供词失实，见文件12和15。

^② 门特尔曾到伦敦，参见注61。

负有盛名的著作家组成)的继续,在伦敦同盟的成员中,我认识下列人员:

1.语言教师沙佩尔,我记得他是拿骚人。他同艾韦贝克和莫伊勒有书信来往。我根据艾韦贝克的指示去伦敦找过他。我和他谈话的内容,我已在12月^①30日的审讯中陈述过了。他是同盟的领导人;我听说,同盟当时有两三个支部。关于沙佩尔为同盟进行的活动,我只能引述他对我说过的话,他同瑞士的同盟盟员通过信;

2.钟表匠莫尔,我记得他是科伦人,据我所知,他是伦敦同盟某个支部的主席,有人曾介绍我加入这个支部。他同沙佩尔一起负责对外通讯联络,我已经说过,我在柏林这里有一次也曾收到过他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告诉我,他们以同盟的名义给瑞士寄去了2英镑^②,作为出版^③魏特林的《福音》^④的捐款,尽管这部著作是不符合他们的原则的;

3.著作家克利盖对我说过,他属于由裁缝列曼任主席的那个支部;魏特林在伦敦逗留期间也是该支部的成员。关于这个人我已说过好多次了;

4.裁缝列曼,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地方人;他曾经是巴黎同盟的成员,在巴黎时属于颅相学派。我曾说过,他在伦敦是某个支部的主席,同时又是教育协会的书记;

5.巴伐利亚的鞋匠鲍威尔,最初是巴黎的同盟盟员,后来属

① 原件上写10月;这部分供词没有保存下来。

② 原件上是“马克”。

③ 原件上是“封套”。

④ 威廉·魏特林《一个贫苦工人的福音》1845年柏林第2版。

于伦敦的同盟，我在伦敦时同他谈过话；

6. 我离开伦敦时，手套织工沃珀尔还在那里，我是作为同盟盟员在那里认识他的。

属于我所在的那个支部的还有下列人员：

7. 达姆施塔特的鞋匠贝克尔；

8. 裁缝罗德克，我记得他是德累斯顿人；

9. 裁缝波乔克，现在提尔西特；

10. 锡利斯特里亚的裁缝西蒙尼；

11. 科伦的鞋匠赫尔伯特^①，现在可能还在伦敦。

据有人告诉我，在伦敦，属于其他支部的还有以下人员：

12. 不来梅的鞋匠格罗梅伊以及

13. 他的也是鞋匠的弟弟；他们俩曾属于巴黎支部，而且属于艾韦贝克支部。据说弟弟已回不来梅去了；哥哥在我回来时还在伦敦；

14. 定居伦敦的裁缝施塔姆维茨；

15. 维也纳的裁缝皮卡尔；

16. 曼海姆或卡尔斯卢厄的铜匠雅科布；

17.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地区的裁缝克拉默；

18.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或科伦的裁缝克勒尔，他比我先离开伦敦；

19. 画家洪特，据说他早先曾在慕尼黑工作；

20. 木工德贝尔，根据布莱希说，他也加入过该同盟；

21. 鞋匠凯尔特伯恩，我记得他是科伦人；

^① 很可能就是赫尔伯茨。

22. 卢森堡或者科伦的裁缝法贝尔。

关于这些人的情况，我只是通过谈话才了解到的，他们本人对我说过，别人也对我说过，他们是同盟盟员。至于他们是怎样为同盟进行活动的，更具体的情况我就说不出了。

最后我还想起：

23. 鞋匠基滕巴赫尔，现在慕尼黑，关于他的情况，我早已供述过了。我离开前一天才知道他是同盟盟员，并记下了他的通讯地址。 [……]

莱比锡市档案馆，联合刑事档案，
Rep. I, Nr. 10, 273 (副本)

第一次发表

66

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

1845年6月⁶⁰

亲爱的朋友：

威·魏特林的近况怎样？你能否告诉我，是否你们建议他本月2号访问你们的？你们是怎样接待他的？他不愿同你们通信吗？现在又有谣传，说什么我在你们面前诽谤了他，以致你不愿再同他通信。据说这类友好的谎言是一个名叫克利盖的先生对他说的；听说克利盖现在伦敦，同威·魏特林情同手足。可怎么能说我扮演了诽谤者的角色呢？我请求把你们同威·魏特林的关系

以及他本人的所作所为写信告诉我。

这个人不愿意读书吗？据说他的确说过，他觉得不必再致力于读书。他同伦敦其他人的关系也不和睦。海尔维格募集的捐款还没有到，无产者海尔维格遇到了一些困难。从我这方面讲，我能为威·魏特林做的事都做到了；和解信、援助、善意的建议。我觉得这一切都是白费劲。而他则继续进行不友好的诬告，私下里竟说我诽谤他！

恩格斯的书^①我已看到了，可是没有买到。听说那是一本相当出色的书。这里有100本《社会明镜》，销路不太好；我给罗亚尔宫的阅览室寄去了一本。现在给你们寄去几本。

祝你安好

通讯处：茹尔·奥诺雷街1—4号迈尔收。用双层信封邮寄。

手稿

第一次发表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F.1.0P.5, Nr.72

67

海尔曼·克利盖（伦敦）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
的信

1845年6月9日

亲爱的马克思：

拙作至今还放在这里，因为我没有钱，不能把它寄走，现在

^① 指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莱比锡版。

我不想付排了，我想再作一些补充。

你责怪我吧，怎么责怪都行，现在我不得不到美国去，我这样做实为可笑的不能容忍的家庭关系所迫。我至今还一直希望，如果我临行前能同你面谈一次，那就不难使你相信，这并非激情驱使，并非夸大其词，也并非年轻人对功名的渴求，而是布鲁塞尔的那种令人感到百无聊赖的没完没了的困扰的必然反映。随它去吧，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往事简直不堪回首。你也许会觉得可笑，这一切是何等可悲。因此，你就当我的美国之行已成事实，就只当我在海上跟你谈话。

你谈到欧洲的运动时总拿美洲的运动作对比。而我是个怀疑论者，并没有看到任何运动。你夸奖法国人，恩格斯则赞扬英国人。可我暂时还怀疑 [……] ① 一切，因为我不懂历史。你们最后就拿巴黎和伦敦的共产主义者同魏特林作对比，称他是自然神论者。我听说了，但不完全相信，因为我喜欢魏特林。亲爱的马克思、恩格斯备加赞扬的英国人究竟在哪里？我有幸结识了这里社会主义者的几个头面人物，我不妨告诉你，他们都是我所见到的最微不足道的庸人。这些社会主义者同无数工人群众相比是何等渺小？ [……]

魏特林反对有时在这里②确实存在的那种言过其实的夸夸其谈，反对“人类、理性、心灵、意志、道德、荣誉、自由、平等”诸如此类的空话，他认为共有共享是一种非常固定的朴实的制度，他主张废除私有制，而别的人都在胡扯什么人类的王国。胡扯人类的王国，这不能在多数人决定赞成这种王国以前开始

① 这里有一词无法辨认。

② 指伦敦工人教育协会的讨论（文件64）。

(1)。他绝对不是自然神论者，他的唯一弱点就是不愿放弃“上帝”一词，认为它是内心冲动的表现；他把基督当作共产主义的先知来利用。除此而外，他彻头彻尾都是革命的，竟不知罪犯、道德和荣誉为何物，而这就首先为自己招来了敌人。[……]

亲爱的马克思，你以为我就是这样在德国虚度光阴吗？我读了一些人的著作，就爱上他们了，我不亲眼见到这些人，就觉得忐忑不安，那么，我难道就不能非常明显地表现一下对见到这些人时的激动场面的渴望心情吗？——你就是我要寻找的最后一个人。毕尔格尔斯认为我是想在你身上寻找权威，让他去说吧，因为我知道他无法理解，有人往往只要说一句话，递一个眼色，就能比那些一辈子闭门死抠书本的人更能同别人进行亲密无间、相互信任的接触。不过，我告诉你，这句话就是你的法哲学大作^①的结束语，这句话使我对你爱慕不已。[……]

手稿

第一次发表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F.1,op.5,Nr.71

68

关于筹建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的会议的报道⁸¹

1845年8月20日左右

民主运动——各国民民主主义者在韦伯街布拉克弗拉伊路

① 卡·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3—467页。

“天使”酒家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由查理·基恩先生主持，经库伯先生提议，在公民恩格斯附议下，作出下列决议：“召开一次侨居伦敦的各国民主主义者的公开会议，讨论建立协会事宜；这个协会的宗旨应当是，通过共同的定期聚会，更好地了解在各自的国家中为共同事业开展的运动”；这个决议获得一致通过。公开会议定于9月1日星期一晚上8时在伦敦索荷区韦伯街布拉克弗拉伊路宪章派会堂举行。^①

1845年8月23日《北极星报》（伦敦）第406号

69

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

1845年8月31日

收信人姓名地址：教堂林荫路6号，
海德克尔先生收。

1845年8月31日于巴黎

亲爱的朋友：

我托一个画家顺道把一件令人非常感兴趣的事转告你，你可以把你的答复等等让他带给我。这里的情绪非常低落；法国人已

^① 这次会议是在9月22日，即1792年法兰西共和国成立纪念日召开的，参看文件70。

丧失信心；原来一直自命不凡的《和平民主日报》声明说，德国走到前面去了，美丽的法国正在体面地、但忧伤地完成自己的使命。可怜的《工场》似乎想同我们进行辩论，但它简直虚伪透顶，原来只不过是装模作样而已。在上一期上，它渴望看到我们的文章，对此我们写信告诉它：这种苛求是值得怀疑的〔……〕法国工人进步很大，但我认为不如我们的工人进步那样彻底；关于英国工人的进步，我不能妄加评论，你和恩格斯都去过英国^①，我只能根据你们的体会进行评论。至于我们德国人，我没有按照你在这里和布鲁塞尔得到的那种印象去评价他们。一年来，从这里的德国细木工中又产生了一批新型的激昂的无神论者和共产主义者，他们远比裁缝先进，如果撇开裁缝的若干例外不谈。这批勇往直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善于进行引人注目的讨论，研读费尔巴哈以及其他人的著作，而原来那帮人却成天喋喋不休，庸庸碌碌，除此之外，就是专靠诽谤污蔑、嫉恨学者等等愚蠢举动消磨时光。被舒适安逸的生活方式毁坏了的这帮人对年轻人所抱的态度，同1830年的人们对1840年的人们所抱的态度如出一辙。关于伦敦的年轻人，我们要不断提醒他们研究“古代语言文学”，看来已经是时候了。^②你也许会对他们的生活规律和能言善辩感到惊讶；但是，他们还会那样庸庸碌碌吗？我真担心。对付威·魏特林难道就毫无办法吗？乌培塔尔人刚给我寄来5英镑，给亨利希·海涅寄来10法郎；海尔维格给了50法郎。但按比例计算，手工业者比海尔维格给得多⁶²，他现在海滨浴场。〔……〕

①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1845年7—8月在英国的逗留，参行注63。

② 参行注50。

手稿

莫斯科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I.1,op.5,Nr.74

节录

第一次发表

71

威廉·魏特林（伦敦）给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莫泽斯·赫斯（布鲁塞尔）的信

1845年9月22—27日

1845年①9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伙计：

你们的来信对我来说各方面都很有意义。维尔特突然走了。②今天我到旅馆去看他，听说他前天就起程离开了。本来我想问问他，如果到布鲁塞尔作一次纯粹拜访性的旅行是否同样非得要护照不可；我到布鲁塞尔来，并非为了（虽然我很希望，并且确实想）向人渲染我的狱中生活③，而是想看看你们。我非常想见见你们的夫人，在你们那里喝几杯啤酒，品尝一番你们的饭菜，聆听你们的心声，抽抽你们的雪茄，其他的就更不用说了。

① 原件上是“1844年”。

② 马克思的信是由格奥尔格·维尔特从布鲁塞尔带往伦敦的。

③ 魏特林出狱后就根据记忆记下了他的狱中生活，并试图寻找出版商出版。但未能如愿，直到后来才得以出版威·魏特林《正义、500天的研究》（恩·巴尼科尔编）1929年基尔版。

《社会明镜》在这里很受欢迎。协会^①也订阅了，我也已写了这方面的报道，但是我犯了一个错误，因为我发现，应该捆好了再邮寄，我没有想到不盖邮戳。而我从瑞士和法国收到的未盖邮戳的邮件相当便宜，从瑞士寄来的德文印刷品每个印张为2德尼，法文印刷品为半个德尼。这是很不一定的，平时根本无法估计到。总之，除了协会外，下面的人也要求订阅《社会明镜》：

莫尔，索荷广场大礼拜堂街20号；

鲍威尔，索荷广场第恩街64号；

洪特，圣詹姆斯广场公爵街17号。

现在我不知道，这些订户和未来的订户是否能顺利地收到捆扎好的德国杂志。如果你考虑到通过书商更合适，那么你们就用或让人用下面的地址：西蒂区弗利特街福辛书店老板纳特。但是，你们要把邮包寄给他，就只能通过书店的代理人，即巴黎的布罗克豪斯和阿韦纳利乌斯或汉堡的布拉库施公司。

由于护照不太好办，下次你干脆来信谈谈你们对《社会明镜》的稿酬有什么看法。

沙佩尔问你们大家好。我相信，他的境况不太妙，痔疮还没有治好，听说还要割第五次，已经割过的地方至今还不断出现新的瘻管，而且很严重，这样下去势必要影响他的体力。

维尔特来看我时，哈尼正好也在我家。第二天我们在我的餐厅举行了晚宴，我炒了一盘鸡蛋，做了一盘沙拉，大家喝着啤酒，抽着烟，非常开心。莫尔也在场。

几天以后，星期六。

^① 工人教育协会。

上个星期一我们参加了一次大会。^①大家都认为这次大会比预期的好。你们将在《北极星报》上看见哈尼的演说，我很喜欢这个演说，就像喜欢他这个人一样。看来他是一个政治上非常激进的机灵鬼，这家伙完全有能力带领一批人。

关于维尔特，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只有一点，这位大烟枪给我留言说，他突然离开是由于资金短缺。我很愿意结识这位新人。

祝你们安好。

魏特林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F.1,OP.5,Nr.71

72

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
的信

1845年10月31日

1845年10月31日于巴黎

亲爱的朋友：

您的身体很健康，我很高兴。这里的一切都很顺利，翻译和写作，演讲和检查等等，简直忙得不亦乐乎。[……]

^① 见文件70。

我以为马车夫^①已经死了；我给他写信，而他却不给我回信。我给他去信后大约六个月，终于收到了他的回信，他在信中证明他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在进行活动和从事宣传。他向你们致以衷心的问候，他对丹尼尔斯的狂妄自大感到惊讶，丹尼尔斯竟没有给他写过一封信。马车夫认为霍尔施坦的禁酒协会非常重要，协会会员是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共和国已经成为这些人的口头禅。社会主义则不完全是这样；不过劳动组织化还算可以。他好久没有写信了（在他开始相当勤奋地从事通讯工作以后），因为他的情绪不佳。〔……〕

手稿

节录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F.1,op.5,Nr.78

73

格奥尔格·维贝尔（基尔）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⁶³

1845年11月22日

1845年11月22日于基尔

亲爱的马克思：

前不久，我托我的友人画家拉尔捎给你一封短信。如果你没有收到，今天我把迟复的原因说明一下。〔……〕

^① 指格奥尔格·维贝尔；参看文件73。

在我们这个地方，社会原则正开始冲击资产阶级。在丹麦，农民掀起了小型的社会暴动，反对地主。在基尔，我们建立了一个手工业者联合会，现有160名会员。它正在发展中。这些人都是共产主义者吗？绝对不是。但是，恶劣的社会败坏了良好的道德风尚。

致以衷心祝愿，我再次等待你的来信。

你的

格·维贝尔

手稿

节录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F.1,op.5,Nr.79

75

弗里德里希·门特尔关于正义者同盟在柏林的活动及其同
巴黎和伦敦的联系的供词⁶⁴

1846年

a.我早在12月31日的审讯中，就已经供认^①，由我接收的成员是怎样加入在这里创建的同盟的。除了那天讲的，我再没有其他秘密活动了。这个同盟是我同裁缝弥勒和机器制造工格里夫一道创建的。我们三人商定，我们每周在我家开一次会，讨论一般性的问题；同时还商定，在这里尽可能建立一个类似巴黎同盟的

^① 这部分供词没有保存下来。

同盟组织，因此，我把巴黎同盟的详细情况告诉了格里夫。格里夫虽然也在巴黎呆过，并且在那里与同盟盟员也有过来往，特别是他在那里认识了木匠海德克尔和现在伦敦而原先在巴黎的木匠布莱歌尔特。我虽然不能肯定，但也不怀疑：他也是那里的同盟盟员。

首先加入同盟的有：

1. 木匠贝尔特曼，
2. 木匠施瓦尔茨和
3. 裁缝弗兰克。

我是在手工业者联合会认识贝尔特曼的；他请我星期天去看望木匠狄茨，他的地址我以前问过他，他住在新指挥官街25号雷家。在狄茨那里我还结识了施瓦尔茨和弗兰克，因此，这两个人和贝尔特曼星期一又来看望我。同时，就在他们来看望我的那天晚上，我告诉他们，我们打算创建一个类似巴黎那样的同盟。我还特地对他们讲，我们准备每周开一次会，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并准备购买一些能给我们以启迪的书籍。我还向他们阐明了我们同盟的宗旨，主要是履行为人类幸福而献身的职责，说明工人的切身利益，以及我在上次谈到这方面的问题时已经供述过的那些内容。即使并不是我对他们所讲的原话，但至少是那些原话的中心思想。那天晚上，他们三人还声明愿意加入这样的同盟组织。我们同这三人握手表示欢迎，并说：“我们以全体同盟盟员的名义欢迎你们，兄弟们！”这就算入盟了，此外并没有举行别的仪式。

这三个被吸收入盟的盟员为同盟进行的活动是：

1. 出席每周的会议并参加会上的讨论；

2. 自愿缴纳会费，以备购书和通讯之需；起初我负责收集会费的工作，后来，同盟分成四个小组或支部时，弥勒则成了司库，从此，他负责收集各支部司库上缴的会费；

3. 招收新盟员。

我负责购买供传阅用的书籍，事后到弥勒处报销。

除此而外，这三人不论在同盟中，还是为了同盟，并没有进行别的活动。此外，他们也不可能干别的事情，因为对外通讯都是由我一人负责的。接着入盟的有：

4. 印染工费舍是由科尼斯堡的霍曼介绍给我的；霍曼在第一封信中告诉我费舍加入了科尼斯堡市民协会，叫我去那里找他。我在那里找到了他，并邀他到我家去。他就是在他参加的第一次会议上入盟的，入盟仪式同其他人的入盟仪式一模一样。

5. 印染工奥斯蒂纳参加了一次同盟会议。奥斯蒂纳也同他的先行者一样，听取了关于同盟及其宗旨的介绍，他以同样的方式在当天晚上就入了盟。但他在这期间只出席过几次会议，后来就不参加了。这样一来，他实际上就脱盟了，因为他说，他不能说明理由，这件事使他很苦恼。印染工费舍也只参加过四五次会议，后来他便回到家乡科堡地区去了。有一次，他从那里给我写了一封信，我记得他在信中说，他住的地方（地名我忘了）有一个手工业者联合会。

6. 接着，木匠帮工维希曼通过与他住在一起的施瓦尔茨的介绍不久就参加了同盟。在我们的邀请下，他参加了一次会议，在会上，我们发现他颇为能干，于是便接收他入盟。上次我说过，上面提到的狄茨也参加了那天晚上的会议；现在我必须更正，在后来的一次会议上，狄茨在我的邀请下才参加了在格里夫家举行

的（一次会议）。我对狄茨说，我们想要举行秘密集会，要进行讨论。不久，施瓦尔茨和贝尔特曼就带他来了，可是，当他知道这样的集会已有很长时间时，他竟生气了，他在得知关于同盟的情况后，立即走了。

7. 还有木匠帮工施米特也是在上述那次会议上被接收入盟的。我们以前在狄茨家里就已认识他了，所以决定争取他。有一次，我同他，还有其他几个人一块到莫阿比特散步时，我同他走在一起，我向他介绍了同盟的情况。当他表示愿意加入同盟时，我们立即握手，接收他入盟，我邀请他参加下一次会议。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我刚才已讲过了。

8. 木匠帮工劳施和

9. 木匠尼克尔

相继加入了同盟。我经维希曼的介绍在手工业者联合会认识了劳施，我们决定接收他入盟。我在这里顺便说一下，当时我们作出如下决定：每个被推荐的人员在入盟之前首先要介绍他同支部的老成员认识。由于有狄茨的前车之鉴，我们还决定，今后不再在支部会议上接收新盟员，而是在一个特别委员会上接收新盟员，我、弥勒和弗兰克都当选为该委员会委员。在这期间，并没有严格执行这两项决定，后来主要由我一个人负责。因此，劳施和尼克尔是在我家中被接收入盟的，从此他们就参加了历次会议。尼克尔和劳施住在一起，是后者介绍他入盟的。

他们两个人，据我所知，在同盟中一直坚持到最后，他们的活动也像其他盟员一样，这一点我在上面专门供述了。

10. 木匠帮工布莱希是我在巴黎认识的同盟盟员，他在今年〔1846年〕复活节和圣灵降临节之间来看过我，当时他是从巴黎

经里昂和瑞士来到我这里的。他在这里住了大约八个星期，我带他参加了这里的同盟会议。我们没有为他举行其他人盟仪式，因为他本来就是巴黎同盟盟员，而在我看来，这里的同盟仅仅是巴黎同盟的扩展。

11.裁缝帮工勒德尔是我在手工业者联合会里认识的。在从手工业者联合会出来的归途中，我就像对其他人一样，也向他泛泛地介绍了同盟的宗旨以后，就在大街上通过握手的方式接收他人盟。在这段时间里，他也像其他盟员一样在同盟里进行活动。

12.木匠毕林是由盟员布莱希介绍来的。有一个星期天，他按布莱希的提议并应我的邀请访问了我。我立即向他介绍了同盟的情况，特别是向他讲了手工业者必须自己培养自己，必须学会讲话，以便行使自己的权利。他对这一切也都表示赞同。我同他一起到弥勒家，在那里举行了支部会议，会上接收他人盟。毕林入盟以后，盟员人数迅速增加。他首先介绍

13.鞋匠帮工黑策尔入盟。一两周以后，他在我家被接收入盟，当时弥勒也在场。他在同盟中也像其他人一样进行活动。

在接收黑策尔入盟时，我们决定：支部会议每两周举行一次。在这期间又介绍了一些新人加入同盟。经我接收的盟员首先有：

14.织工恩格斯；

15.织工洛伦茨；

16.织工耶尼施；

这三个人都是我在手工业者联合会认识的，并应我的邀请来到我家里，相继入盟的。同时，他们三人都参加了下一次支部会议。在这段时间里，我大概还接收了下列人员入盟：

17. 家住中央大街的木匠巴特以及

18. 住在科赫街和弗里德里希街拐角处的裁缝舒尔茨。巴特是经劳施或维希曼的介绍认识我的，我在我的住所把他接收入盟。他可能与木匠帮工尼克尔同时入盟的。而舒尔茨原来就是巴黎同盟的盟员，但正如他告诉我的，最后由于意见分歧而脱离了巴黎同盟。因此，我们没有为他举行入盟仪式，在我给他介绍了这里的同盟情况后，就请他参加下一次会议。他在巴黎就认识我了，是他到这里来找我的。

目前，同盟已有了很大的发展，因此，我们决定划分成四个支部。我们随即决定了各支部成员的名单，我和木匠施瓦尔茨、施米特和尼克尔在一个支部。此外，我们还决定，各支部单独开会，并立即选出一个支部主席和一个司库。接收新盟员的工作仍然由弥勒、弗兰克^①和我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在这期间，该委员会主要由我一个人负责；不久我们就决定，由各支部的主席自己负责该支部新成员的接收工作。我当选为我所在支部的主席，而木匠施瓦尔茨则被任命为该支部的司库。不久加入我这个支部的有：

19. 机械师帕肯贝格，我是在手工业者联合会认识他的，经黑策尔介绍，是由我在我的住所接收他入盟的；

20. 木匠凯默勒尔以及

21. 木匠霍夫麦斯特由我同时接收入盟。这两人都是由施瓦尔茨和维希曼介绍给我的；

22. 鞋匠施米特是我通过黑策尔和毕林在手工业者联合会认

① 原件上是弗兰茨。

识的，我请他入盟，他很快就入盟了。

在这里我再讲几句，这四个主席和四个司库（他们的名字我在前几次审讯时已说过了），组成区部会议，也是每周举行一次会议；但在这期间并没有严格执行。区部对各支部实行监督，购买支部成员的学习用书，负责与同盟外部的通信联系。在这期间，我当选为区部主席，负责对外联系；弥勒担任区部的司库，可是他在这方面的活动只不过是：接收各支部司库上缴的会费，向我支付购书款子和每次通信的费用。他还负责每六个月报一次帐。

23.机械师海兰德是我通过木匠凯默勒尔的介绍认识的，后者还介绍他入盟，于是我在我的住所接收他入了盟；在这期间，他只参加了两三次支部会议，后来就不参加了，实际上就脱盟了，他本人并没有直说。

24.木匠普福，我是在手工业者联合会认识他的，并邀请他入盟；如果我没有记错，我是在家里或大街上通过握手接收他入盟的。

25.排字工人波尔恩也是我在手工业者联合会认识的，后来经黑策尔介绍，接收他入了盟。我在这里顺便说明一下，区部会议负责使各支部成员的人数大致保持相等。根据这一决定，每个接收对象首先被介绍给支部会议，接着再由支部主席向全体会议介绍，全体会议最后决定，他该到哪个支部去，但这条规定并没有严格执行。我的这个支部人数最多。

就这样，我把波尔恩安排在区部会议。他只出席过两三次支部会议；后来就到莱比锡去了。他在给我的信中告诉我，他受奥托·维干德和阿尔诺德·卢格的委托，前往马格德堡和汉堡办理

同样事务，特别是传播大众读物；不过我得说明一下，他在信中并没有直截了当地说传播大众读物；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是这么说的，他的这次差使是经营大众读物。稍后，他从莱比锡给我来了一封短信，说他已经起程，同时寄给我96本《国王对普鲁士议会的决定》^①，这些书是从巴黎经莱比锡尤拉尼书店转给我的，同包寄来的另外100本《决定》已被波尔恩在莱比锡出售了，这是他在给我的信中说的；我相信书商李希特尔也在那里。波尔恩在信中说，他把收到的一半书款用作旅费，到巴黎（他也打算去巴黎）后再还给海德克尔。另一半书款，等李希特尔举办新年书籍交易会以后再给我寄来。此后，我再也没有得到过波尔恩的消息。

在我被捕前的一个星期天，我介绍汉诺威的裁缝帮工吕霍夫（现为海尔曼的领班，家住下菩提树街22号）参加了支部会议。我是在巴黎认识他的，他也是那里的同盟盟员；他到柏林来找过我，在这之前他从汉堡给我写过一封信，请求我为他找一处住房。

由我接收入盟的还有：

27. 利宁街的木匠施瓦尔茨；

28. 指挥官街19号的木匠沙尔夫和

29. 利宁街的钳工博茨勒尔。^②

施瓦尔茨和沙尔夫都是我们大家在手工业者联合会认识的，

① 【卡尔·格律恩】《国王对普鲁士议会的决定。论时局问题》1846年比尔文肯版（另见文件129）。

② 原件上是博茨勒尔。

我们决定吸收他们入盟，向他们介绍了同盟的一般情况，接着就在我家里，我当着弥勒和弗兰克的面吸收他俩为盟员，当时新盟员发展委员会还存在。沙尔夫加入了弥勒领导的支部，而施瓦尔茨则加入了毕林或者黑策尔的支部，我记不太清楚了。

博茨勒尔^①原来是手工业者联合会合唱团成员，由黑策尔和毕林介绍他入盟，不过我们早已认识他了。我是在我家里还是在炮兵街手工业者联合会的花园里接收他为盟员的，我已记不清了。他被安排在毕林的支部。最后还有：

30. 裁缝皮尔施和

31. 鞋匠帮工格龙德，他俩被黑策尔吸收进了他的支部，这是黑策尔告诉我的。他们两人同我是在手工业者联合会认识的，但他们不知道我是同盟盟员，因为有这样的规定：一个支部的成员只能知道本支部的成员，但不知道其他支部的成员，也不认识区部会议的成员。可是，这一规定并没有得到严格遵守。

最后，木匠毕林还吸收

32. 一个叫伯克尔的木匠帮工进了他的支部，毕林告诉我，他和伯克尔在一个车间工作。有关这方面的更详细情况，我就知道了。

以上就是这里的同盟的全部盟员。

发展新盟员的形式都是大同小异的，我在昨天以及在去年12月31日的审讯中都供述了。

关于同盟的其他情况和它的宗旨，我都没有告诉他们，特别是我没有把巴黎同盟的真正宗旨告诉他们；巴黎同盟的宗旨中有

^① 原件上是巴茨勒尔。

这样的规定，尽可能使工人们认清他们的权利，使他们在有机会改造国家和社会的状况时能独立提出这些权利。而这并不是我们同盟的宗旨，因为在我们这里还不可能指望这样的改造。

关于每个盟员为同盟进行的活动，我只能重复我昨天说过的话。这些活动包括：参加支部会议和参加这些会议上的讨论，学习由我让他们传阅的书籍，自愿缴纳会费，物色和接收新盟员。只有支部以及区部会议的主席和司库还有其他一些职责，而这些我基本上都讲了，主席的职责主要是主持会议讨论。除此而外，每个同盟盟员还为同盟做了些什么，我已在上而一一交代了。

起初，会议都是在我家，即当时的鲜花街27号举行的。但从1月14日起改在格里夫家举行，一直到复活节之前不久；从复活节开始则在菩提树街弥勒家举行。划分支部以后，我领导的支部会议也改在弥勒家召开，原因是由于我的家庭关系，不能再在我家召开这样的会议了。

b^①。我上次已经说过^②，机器制造工格里夫是我为同盟争取到的最大的^③同盟盟员之一。他为同盟所做的工作也同其他盟员一样，他准时出席会议，也参加讨论，但由于他听觉迟钝，听起来有些吃力。此外，今年复活节刚过，他就走了，接受博西希的委托去参加汉堡铁路的修建工作。大约在我被捕前六个星期，他因病又回到这里，在他害伤寒病期间，我也常去看望他，但由于他有病，他已认不出我了。关于他参与同盟的其他情况我就知道这些。据我所知，就我一个人同盟购买书籍，供同盟盟员传

① 原件上没有a段。

② 这部分供词没有保存下来。

③ 可能是抄写错误，应为：第一批。

阅。我不知道其他盟员是否和怎样为此目的购买过书籍。我只知道，这些人，特别是毕林为此目的从我这里取过书；可是，毕林对我说过，早在他入盟之前，他就曾收到过用包裹邮寄的魏特林的著作了。这是否属实，而且他是怎样弄到这些书的，我都不清楚。我占有的并在盟员中传播的那些书，大部分都是我的代理人施奈德尔从这里的施勒德尔书店弄来的。关于我同他的交往，我在1月27日审讯（这一审讯你们刚才已向我宣读了，我再次表示同意）中漏掉了，关于他的更详细情况我确实无法作证。

此外，我还同一个书商即莱比锡的尤拉尼书店老板有过联系。10月或11月，我收到了巴黎的海德克尔写来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告诉我说，在莱比锡的尤拉尼那里有两三百本《国王对普鲁士议会的决定》，但是，这个尤拉尼肯定是胆小如鼠的人，因为他并不理解这部著作为什么不能扩散的原因。但是，海德克尔听说，尤拉尼已经把其中的100本左右寄往布雷斯劳去了。同时，海德克尔给我一个书面说明，他授权这个说明的传递者接收尤拉尼那里的这批书。我在这个说明的背面又写了一个说明：把这些书交给波尔恩；当波尔恩到莱比锡时，我又向他作了同样的说明。我在上面已经说过，波尔恩曾通过他的兄弟考夫曼·波尔恩（我并不认识他）给我寄过96本。除此之外，我同尤拉尼书店没有任何联系。但我不知道，这批书是不是从巴黎来的。我只记得，图恩的木匠布莱希曾对我说过，《国王对普鲁士议会的决定》是卡尔·格律恩撰写、由同盟出资在伯尔尼付印出版的。

此外，我只同这里兄弟街上的克列曼—拉萨尔^①书店有过这

^① 原件上是拉查尔。

样的接触：梅因博士告诉我，这家书店要买《国王对普鲁士议会的决定》，于是我就卖给它两本；但书店的人对我说我还可以多卖给它几本，据说书店里还有《一个科伦人给他同胞的信》和《上帝致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这是在我被捕前一天的事。

除此之外，我没有同任何书店有过交往。

候选人贝伦兹，我是在手工业者联合会的会议上见到他的，但只知其人不知其名，他现在是印刷业主克劳泽的股东。他被逐出手工业者联合会以后，我听说他同一些朋友和熟人在海尔特饭店聚会，但据说他们的聚会无非是消遣消遣而已。时事问题讨论会，其实是在今年米迦勒节^①以后才在海尔特饭店开始的，而且是由贝伦兹发起的；最初他在星期五的一次会议上发起了讨论会，讨论的内容我记不清了。我顺便说一句，这种星期五会议据说在贝伦兹离开联合会时就已开始举行了。我本人是今年夏天才开始参加会议的，最初是由毕林的熟人、图恩的木匠布莱希领我到那里去的。读书社大约是在8、9月间，即在上述讨论会开始以前成立的。贝伦兹主持了最后三四次讨论会，他走了以后，就改由我负责主持，这在当时，一般都是由读书社决定的，而不是由某个人决定的。贝伦兹回来以后，仍然由我主持。只在我被捕前最后一个星期五，讨论会才由印刷工林德纳尔主持。我在海尔特饭店才见到了贝伦兹；我同他经常在这个饭店里谈话，除此而外，我同他没有别的个人接触。据我所知，他并不了解我们同盟的情况。我不知道，贝伦兹是否给读书社的图书室送过书。这种讨论会在海尔特饭店开始前大约一个星期，手工业者联合会的许

^① 即从1846年9月29日以后。

多会员因为事先约定下乡远足，所以星期天都来到利宁街132号的饭店，在饭店里他们又商定，每星期天都要到这里聚会。在第二次会议上首先进行讨论，是由我主持的。此后每星期日都召开像海尔特饭店那样的讨论会。然而，我只能每两周去一次，因为其他星期日我要去参加在炮兵街30号希勒饭店举行的讨论会，在那里，波尔恩、贝伦兹和克劳泽商定，他们的讨论会优先允许妇女参加，每两周在上述饭店里举行一次。他们在这样商定（据说这是在海尔特饭店的一次会议上商定的）时，我不在场，因此，关于发起人的情况，我不能作出确切的证明。但这种会议我每次都参加了。每次会议都有人作一个报告；第一个报告是由来自洪堡“宇宙”的贝伦兹作的；第二个报告是由梅因博士作的，谈的是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第三个报告是由沙斯勒尔博士作的，谈的是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问题；第四个报告则是由画家施泰因海泽尔作的，他与沙斯勒尔博士谈的同是一个题材，不过含义是截然相反的；最后一个报告谈的是妇女解放问题。

施泰因海泽尔的报告不是在炮兵街作的，因为饭店老板希勒不可能再给我们腾出地方，据说手工业者联合会已占了房子。因此，这次会议也是我被捕前不久的最后一次会议，是在莱比锡街33号瓦斯曼的饭店里举行的。每次报告作完以后，都对报告进行讨论，只有贝伦兹的报告是例外，因为在第一次会议上大家都忙于选举一个委员会。此外，贝伦兹还参加利宁街的讨论。关于讨论的内容，由于相隔的时间太长了，现在我已不能详细列举了。我只记得在利宁街上曾经讨论了公平待人问题，当时在讨论中提到，每个人都必须以公正的、乐于助人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同胞。此外，贝伦兹学识渊博，我无法转述他在讨论中所说的话。最后，

我还要补充一句，贝伦兹和克劳泽都曾经说过，他们并不完全信任市法律顾问黑德曼。

印刷业主克劳泽是我在手工业者联合会的一次会议上认识的，在那里，当他听到我同弥勒讲法语时，就先开口问我有关巴黎的社会状况。而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还说他认识语言教师莫伊勒，说他们曾在巴黎的同一个印刷所工作过。至于莫伊勒在印刷所是干什么的，我记不清了。

克劳泽还参加了利宁街上海尔特饭店、希勒饭店和弥勒饭店的讨论会。有一个星期六，作家莱辛带着我从手工业者联合会来到格尔特劳登街拐角的一家饭店，在那里我也见到了他和贝伦兹，而且在那里我很快打听到，这是一个名叫“哥特利布”的作家联合会在聚会，该联合会每星期六在这家饭店的一个单独房间里聚会，据我所知，是集体娱乐、购买书籍和学习材料的。除了上述几个人，我在这里还见到了作家艾希霍尔茨、奥滕索瑟、奈奥、雕刻家托特、阿巴班奈尔^①博士以及几位我不相识的人。梅因博士也是这个联合会的成员，但他一个晚上也没有去过。我们讨论了《许布纳尔狩猎法报》，并谈到了狩猎法同现状的关系。由于与会者使用各种不同的语言，所以，讨论的内容我不能完全理解。因此，我在这里无法详述。讨论中没有涉及政治问题。

爱德华·梅因博士，我是在海尔特饭店认识的。这一点我早在作梅因博士一案的证人宣誓以前就说过了。我还曾经收到一个名叫克吕格尔的人从伦敦寄来的一封信，并且我

^① 原件上是“阿巴鲍姆”。

在海尔特饭店向梅因博士转达了克吕格尔的问候。梅因参加了海尔特饭店的讨论会。他经常带一些新出版的书来，特别是皮特曼的《纪念册》和《虔诚灵魂的喜悦和安逸》，以及海因岑的《反对派》、《官场一幕》和《致德国自由派的呼吁书》^①，还有其他一些我忘了书名的著作。通常他都要朗诵一段他带来的著作，特别是朗诵一段皮特曼《纪念册》中海涅的诗，其中包括《织工之歌》，朗诵《喜悦和安逸》中的片断和海因岑《反对派》中的中国式皮影《国王陛下和他的神父》^②，还朗诵弗莱里格拉特和海尔维格的诗篇。他每次都把带来的著作通过毕林送给读书社图书室。

我在上面已经说过，梅因也在炮兵街的饭店里作过一个报告。在列宁街弥勒的饭店里我从未见过他。此外，我顺便说一句，有一天他在海尔特饭店请我订阅最近预告的海因岑的《德意志代言者报》和皮特曼的月刊^③。他还对我说过，他同卡尔·格律恩有通信联系，正像他所说的那样，有一次他曾为我替一个读禁书的读书社买过几本《国王对普鲁士^④议会的决定》。我同他并没有其他联系，只是我在被捕前找过他一次，那是为了通知他，警察当局将要干涉在海尔特饭店举行的会议，而他已经知道

① 可以确定，指的是下列一些著作：卡尔·海因岑编《反对派》1846年曼海海版；卡尔·海因岑《官场一幕或“公务”体会》1846年黑里骚版；卡尔·海因岑《给德国自由派的警告》1846年黑里骚版。

② 《反对派》中不包括这一篇。

③ 《普罗米修斯。社会改革报》，由海尔曼·皮特曼1846年在黑里骚出版。

④ 原件上是波兰。

了。我本人是从贝伦兹和裁缝吕霍夫那里知道的，据说吕霍夫又是从莱辛那里知道的。

我在手工业者联合会见到过作家艾希霍尔茨，他在那里作过几次报告。^①当他因他的著作过剩[?]而离开联合会——这至少可以说是他离开的原因——的时候，我偶而在街上碰到过他。最后，我在上面已说过，我在格尔特劳登街和罗斯街拐角处的饭店举行的作家联合会会议上也碰到过他。但除此之外，我同他没有任何联系。我不知道他是否还同手工业者有来往。梅因博士是否同手工业者有交往，我也不太清楚。

作家莱辛是我在手工业者联合会开会时认识的。我在海尔特饭店和希勒饭店见过他，还有在利宁街弥勒饭店也见过他一次。他也参加过上述两家饭店的讨论会，我已经说过，他还领我去过作家联合会。此外，我同他没有更密切的交往，我也说不清他同其他手工业者的关系是否密切。

雕刻家托特我只在手工业者联合会会议上见过面，还有莱辛领我到作家联合会去时见过一次，除此而外，我同他没有更深的交情。

阿巴班纳尔博士在手工业者联合会作过几次关于物理学的报告，但在一般讨论会开始以前，他也到海尔特饭店去过一两次。我在作家联合会也见过他，他也参加了在希勒饭店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会上贝伦兹作了关于“宇宙”的报告，不过我必须补充

① 见埃伦赖希·艾希霍尔茨《基督徒及其教义；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1846年在柏林手工业者联合会的报告》1846年柏林版和《在柏林手工业者联合会的报告》1845年柏林版。

一句，我记不太清了，他究竟参加了这家饭店的第一次会议还是第二次会议。除此而外，我对他没有更深的了解，也不知道他是否同其他手工业者有来往。

经济学家弗拉林多次出席了海尔特饭店的会议，他非常积极地参加了讨论会，尤其主张废除私有制。他要求人们在各手工业者联合会中间传播合适的书籍来实现这一思想；为此，他立即发起募捐，很快就募到了三四马克，而他本人就捐助了一二马克。这笔钱后来是由贝伦兹交给我的，到现在还没有用掉。弗拉林还提议，星期三在雅科布街贝克尔饭店讨论这个问题。然而就在这个饭店举行第二次会议时，我们都被捕了。弗拉林经常同我一起聊天，他告诉我，他认识作家赫斯和一个曾在《社会明镜》共过事的名叫卡尔克希尔的人。他还说，这两个人拥有一家报纸，或者他们至少懂得怎样秘密利用这家报纸。我不知道弗拉林在这里跟谁最熟悉。我本人同他没有其他接触，但我得补充一句，他也参加了利宁街希勒饭店的讨论会。我还记得，有一次他这样说：他想为我编造一个关于德国工人状况的统计表并把它传播出去。

商行助理奥滕索瑟，我在手工业者联合会、海尔特饭店、弥勒和希勒饭店都见过他。他踊跃地参加了各种讨论会，一贯拥护财产税，同时他希望劳动状况得到改善。他在海尔特饭店朗诵了弗莱里格拉特的题为《就这么办》的诗篇，还朗诵了《漫游之前》一诗。有时，他也朗诵所谓他自己创作的诗篇。我不知道，他除了弗莱里格拉特的著作以外，有没有带其他书籍到海尔特饭店或其他饭店去，是否也在那里朗诵过。奥滕索瑟自愿为我兜售几本《国王对普鲁士议会的决定》，他自动提出兜售6本，我也就交

给他6本，其中3本他付给我25银格罗申；他告诉我，每本售价是10银格罗申，其他两本则各卖7.5银格罗申。另外那3本他还没有退还给我。在利宁街弥勒饭店的一次星期日会议上，奥滕索瑟宣读了海因岑的《德意志代言者报》的广告，并公开呼吁订阅这家杂志。有一次，他还对我说，他收到莱辛寄来的2马克，要把它交给梅因，再让梅因寄给海因岑。除此之外，我同奥滕索瑟没有其他联系，也不知道他与其他手工业者，特别与同盟盟员是否有密切交往。

商行助理奈奥，我以前在手工业者联合会会议上见过他，后来又在海尔特和弥勒饭店里举行的会议上见过他。他也参加讨论会，但一般都不发言，而且持保留态度。他也送书给设在海尔特饭店的读书社，我看到许多书上都有他的署名，这也就说明许多书都是从他那里来的。可是，具体情况我不清楚。除此之外，我同他没有更密切的交往，也不知道他同其他手工业者接触是否频繁。

神学教师海因策，我只在手工业者联合会会议上见过，他在会上作过几次报告。在他退出手工业者联合会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我早就说过，我在柏林这里创立这个同盟，只是为了履行我在巴黎所承担的扩展巴黎同盟的职责。艾韦贝克和莫伊勒也再三嘱咐我向他们提供我认为对同盟有利的消息；今年狂欢节的前夕^①，我第一次给巴黎的莫伊勒写信，告诉他我在这里创建了一个同盟，还向他介绍了这里的手工业者联合会及其活动情况。接

^① 即1846年2月。

着，我收到了艾韦贝克的回信，他建议我购买一些书籍，特别是卡尔·格律恩等人的书籍——这一点我在1月27日审讯中已供述了。我又马上写信到巴黎（收信人是裁缝莱宁格尔，这是艾韦贝克告诉我的），通知他们说，我已收到了裁缝寄来供同盟使用的书，并要求他们在巴黎创立一个手工业者联合会，同时我还描述了这里手工业者联合会的创建纪念日活动。后来，我就《国王对普鲁士议会的决定》一事写信给海德克尔（他的地址是木匠布莱希告诉我的），而我在本月27日审讯^①中提到的书后来已寄到施勒德尔书店去了。同这些书一起寄出的一封信没有寄到这里来，后来^②我才收到海德克尔的一封信，他在信中通知我，在莱比锡的尤拉尼书店里有两三百本《国王对普鲁士议会的决定》，均由我处理。同时他还告诉我，在巴黎的同盟盟员中间已出现了意见分歧，因此，人民议事会现已从巴黎迁往伦敦。海德克尔还写信叫我把《国王对普鲁士议会的决定》的书款马上汇给他，因为他们要用这笔款子印刷一本打算散发的新的大众读物；最后他还说，卡尔·格律恩在木栅门前的一个公开场合向手工业者作报告；著作家恩格斯^③已从布鲁塞尔来到巴黎，同格律恩讨论国民经济学，并打算写一部关于这一题材的著作。

大约在我被捕前四个星期，我收到了艾韦贝克的一封信，他通知我说，他已把一包书通过席尔格斯的介绍经由汉堡给我寄到施勒德尔书店去了。这就是我在本月27日审讯中提到的那批书。

① 原件上是会上。

② 即1846年10月或11月。

③ 原件上是恩格尔。

除此之外，我再没有收到巴黎的来信。我在被捕前不久还写信给莫伊勒，请求艾韦贝克写信给科伦的赫斯，通过他去了解一下，弗拉林是否可靠。这件事是由贝伦兹提出的，他向我打听过弗拉林。他觉得弗拉林这个人可疑。伦敦也成立了一个巴黎同盟的支部，我并没有直接给伦敦写过信，但我在圣灵降临节^①前后收到过那里的一个同盟盟员即钟表匠莫尔的一封信，他告诉我说，我给莫伊勒的第一封信已从巴黎转给他了，并让他们传阅了。他还说，魏特林已去布鲁塞尔，他因与同盟盟员为敌已被开除出同盟。除此之外，我并没有收到过伦敦来信。我本人只有一次应施奈德尔的请求给在伦敦的语言教师沙佩尔写过一封信，并请他把这封信转给纽约的克利盖（据说他是《人民代言者报》的编辑），叫他给这里的施勒德尔书店寄几本他的杂志来。而木匠布莱希已从巴黎带来了一本《国王对普鲁士议会的决定》以及一册《人民代言者报》，我把这事告诉了施奈德尔。除了布莱希以外，还只有裁缝舒尔茨（我在上面把他作为同盟盟员排在第18号）对我口述过巴黎的同盟情况。伦敦方面，没有来过一个同盟盟员。

马格德堡的裁缝贝克原来就是巴黎的同盟盟员，我在前往马格德堡途中曾去访问过他，这一点我在以前，特别在本月25日审讯中已交代过了。^②他在马格德堡并没有创建同盟。刚才你们在副本中向我提到的今年4月15日和5月4日的两封信是我写给贝克的。

在副本中提到的书我留在贝克家里了，它们主要是魏特林和

① 即1846年5月底左右。这是魏特林被开除出正义者同盟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确证，他在巴黎的追随者被开除出盟一事参看文件120和148。

② 这部分洪词没有保存下来。

莫伊勒的著作，此外还有哈拉^①的著作，一个剧本以及《前进报》。我在今年4月15日的信中所说的给巴黎的6封信，是指我从伦敦和汉堡给巴黎的信，其中第二封信是由木匠劳施转交的。除此之外，我是否还给贝克写过信，已记不清了。

我在今年复活节给科尼斯堡的霍曼写过信，他的地址是装订工贝伦兹从科尼斯堡回来后告诉我的。我在信中向他叙说了我的旅行、巴黎同盟最近发生的几件事以及我的家庭关系，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还告诉他，我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同盟。有一次，我还收到了霍曼的一封信，鉴于我的家庭关系，他在信中提议我到科尼斯堡去找他，同他一起做生意。除此而外，他没有跟我谈到那里的其他情况。后来，我给他写过许多次信，请他把那里的情况告诉我，但我没有收到他的回信。不过我记得，以前霍曼曾让贝伦兹给我捎过一封信，信中他向我叙述了那里举行的市民大会的情况，还说他准备移居得克萨斯。至于先前的市民大会成员聚集在咖啡馆进行讨论一事，究竟是他写信告诉我的还是装订工贝伦兹对我说的，我已记不太清楚了。

对于你们提出的询问，我还要补充一句，贝克带我到马格德堡拜尔宫的酒店去，在那里我认识了魏特林的一个好友，即海辛医师，还认识了手套织工克勒尔，他们都是贝克的熟人。

你们在副本中提到的今年6月29日给贝伦兹的信^②，也是我写的，送信人可能是木匠尼克尔。

木匠布莱希约于今年7月回到他的家乡图恩去了，后来我们

① 原件如此；可能是哈罗·哈林之误。

② 见文件100。

还通过信，他告诉我那里有一个市民联合会，而我则向他介绍了这里的情况。海德克尔在从巴黎给我写的最后一封信中附了一个给布莱希的便函，是由我转交给布莱希的，布莱希给海德克尔的复信也是由我转交的。布莱希在复信中只谈了他的旅行和这里手工业者联合会的情况，并请他在巴黎也创建一个类似的联合会。同时还声称，他们到时候要利用一个名叫李宾特罗普的先生，因为他很熟悉巴黎的工人情况。我不清楚这个李宾特罗普是何许人。

我还要补充一点，艾韦贝克在给我的一封信中附有一个密封的便函，是给科尼斯堡一个神学教师的，他的名字我忘了（好像叫克利格尔或类似的名字），我立即把信转交了。

裁缝弗兰克告诉我，洛桑的裁缝毕希勒是瑞士的同盟成员，而且是魏特林在那里创建的那个同盟的成员。我和弗兰克同时写信给毕希勒，向他介绍了这里同盟的情况，并请他也把那里的情况告诉我们。我也收到过他的两封信。他在第一封信中说，在那里的同盟中产生了意见分歧；还说这里的木匠狄茨已被吸收参加那里的同盟，也就是说，狄茨只是在柏林这里生活，他的出生地是士瓦本。毕希勒在第二封信中写道，区部已迁往拉绍德封。后来，我再也没有同他通过信。不过，我在给他的信中附了两封分别给裁缝于伯萨克斯和裁缝黑格的信，请他转交给他们两人；于伯萨克斯在巴黎时我就认识了，据我所知，那时他并不是同盟盟员。我在信中向他介绍了我的旅行情况和一些熟人。而黑格则是巴黎的同盟盟员，因此我认识他。我在巴黎时就给他写过信，那时他在伯尔尼州的比安，可是我没有收到他的回信。我在那封信中曾提醒他给我写信。

鞋匠基滕巴赫尔，我是在伦敦认识他的，他是在那里加入同

盟的。他先我离开伦敦，目前在他的家乡慕尼黑，同他的父亲（据说是宫廷鞋匠）在一起生活。今年新年，他给我来信，谈了他的旅行情况。后来又来信对我说，他为工场争取了25名成员，据我理解，这就是他创建的同盟。此外，他还说，他从瑞士弄到了魏特林的《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我给他回了信，向他介绍了这里的同盟情况。

布莱希告诉我，有人在斯图加特也创建了一个类似这里的同盟。据我猜测，这个同盟也许是由裁缝哈森海默创建的；他是1843年从巴黎回到家乡斯图加特的，并且他原来就是巴黎同盟的成员。不过，这仅仅是我的猜测而已。

最后，对于你们提出的询问，我作如下补充说明：我不知道，除我之外，是否还有另外一个盟员同外部的同盟盟员有通信联系或者关于同盟的通信联系。[……]

莱比锡市档案馆，统一刑事档案，

第一次发表①

Rep.I,Nr.10,273 (副本)

① 供词的其他部分，见文件12和65。

罗兰特·丹尼尔斯（科伦）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

1846年1月30日

1846年1月30日于科伦

亲爱的马克思：

〔……〕你知道，我们之间的团结须经努力才能维持，这是由来已久的事了。近来我们融洽多了。尽管如此，我们在舆论面前还是拥有多数。你也许知道，荣克已到柏林去了。而你还不清楚他是反对我们的，我要向你透露的就是这一点。他设和解盛宴向这里的熟悉的资产者告别以后，没有向我们打个招呼便突然离开这里了，我们除了一些马路新闻之外，对他的这一决定毫无所知。

他的朋友贝尔根罗特则相反，正如荣克夫人在离开这里时所说的，是一个可爱的人。近来，我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并对我们讲了他去柏林的动机。他说，在那里更能为自己的思想从事活动。关于荣克，你要详细了解一下，怎样才能为他消除在这里的老朋友中间所引起的背叛嫌疑，然后通知我们。

你倘有什么东西要带往德国，弗伦茨^①一定会帮助你的。请你也把赫斯、恩格斯和日果介绍给他，他很想结识他们，同时也

① 丹尼尔斯的表兄；丹尼尔斯给马克思的这封信就是由他转交的。

请你代我向他们问好。毕尔格尔斯的工作进展缓慢，但很可靠。
他向你问好。

向你的夫人问好。

你的

丹尼尔斯

我们准备停止出版《人民总汇报》⁶⁵，或者说，准备让它同
即将出版的《卢森堡日报》^①合二为一。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F.1,op.1,Nr.179

节录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

77

关于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成立六周年纪念活动的 报道

1846年2月9日

德意志工人民主主义教育协会（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 周年纪念宴会

伦敦有一个协会，它理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得到《北极星报》读者的更深刻了解。这个协会的名称，上面的标题已作了说明；至于它的起源，主席在演说中也已作了阐述；如果我们在这里确认它是从1840年2月7日开始存在的，那也就够了。它是由

^① 这个办报计划没有实现。

很少几个工人在令人沮丧的困难条件下成立的，而这类困难主要是由1830—1834年“德意志民族运动”遭受失败造成的。“德意志民族运动”毁灭的原因，与其说是德国独裁者的暴力和恐怖，倒不如说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愚昧无知；因此，新协会的创始人也断言，他们要取得胜利，首先必须采取措施，对工人进行宣传教育，从而使他们不依赖自己的领班，在暴君的进攻面前不致受到损伤。这个协会成立时，在分崩离析的德国流亡者队伍中，惊慌失措、怀疑绝望和漠不关心的情绪到处蔓延。然而，协会的创始人却得到了每一个新会员的满腔热情的支持，他们的顽强毅力和不可战胜的坚韧不拔精神使协会的橡实破土而出，成长为一棵茁壮的橡树，它虽然还没有完全成熟，但日益挺拔，一大批流亡伦敦的德国工人现在都成了这个协会的会员。协会这一组织的定期会议是在大磨坊街红狮子院召开的，但这个院的大厅对召开会员会议来说简直太窄小了。协会有一个阅览室，订了10种德文、法文和英文的报纸，还有一个图书室，收藏了500册书、地图册、地球仪以及其他科学资料和乐器等等。这里还定期举行有关天文、历史和地理等等讲座，给会员开设教授音乐、绘画和语言等等课程，每周都有集会，讨论政治和社会问题。我们还想补充说明的是，有一些会员在每隔一周的星期天晚上6点钟，同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的民主派济济一堂，讨论政治问题，交流情报；他们的原则在各自的国家中究竟取得了哪些成就。这个协会的伟大原则就是共产主义。毋庸赘言，共产主义必然包括英国人民所指的“极端民主主义原则”。

本月7日是该协会成立六周年纪念日，但是，因为这一天不太适宜举行公开庆祝活动，所以把庆祝晚宴改在9日，即上个星

期一举行。庆祝活动是在伦敦最漂亮的大厅之一，即白水道旅馆的宽敞明亮、富丽堂皇的大厅里举行的。大厅的正面悬挂着一幅闪闪发光的透明画，画的上方绘着查士提提亚^①端立在“地球”之上，画的下方则是分别用德文、法文和英文书写的刻印文字：

“人人皆兄弟。”

大约250人参加了这次晚宴，其中还有不少妇女。最多的当然是德国人，其次是法国人。再其次是若干英国男人和女人，此外还有波兰人、瑞士人、西班牙人、匈牙利人、丹麦人、瑞典人、比利时人、挪威人、俄国人和土耳其人。我们不能不在这里提一下，该协会拥有一个大约由30人组成的合唱团，团员们演唱了悦耳动听的德国自由歌曲，他们那令人赞不绝口的歌声为晚会大大增添了和谐与欢乐的气氛。美中不足的是晚会时间拖得稍长了一点，在其他方面简直是完美无缺的，整个晚会自始至终秩序井然，有条不紊，令人叹为观止。

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卡尔·沙佩尔是一个颇为能干的主席，充当他的右手的是朱利安·哈尼，充当他的左手的则是奥博尔斯基上校。[……]

接着，主席分别用德语、法语和英语致辞，每次都博得热烈的掌声。下面就是他所作的英语致辞的简要内容：各国的朋友们、兄弟们、姊妹们，你们对德意志协会成立六周年纪念活动给以支持，我向你们表示感谢。像今天这样的纪念活动将增进我们的相互了解，我们彼此以兄弟相称，因此，我们将能更好地改善我们

^① 罗马神话中的正义女神。——译者注

的状况，在各国实现人权。（鼓掌）当1830年各国人民从沉睡中觉醒的时候，德国人也觉醒了。他们记得，假慈假悲的国王们在艰难时期求助于人民时所作的要把他们从拿破仑的铁蹄蹂躏下解放出来的种种诺言；他们记得，这些诺言从未兑现过，王国的叛徒在摆脱法国的统治以后给予为之浴血奋战、流血牺牲的人民的酬谢，并不是自由，而是暴政和唾弃。（听，请注意听！）每当我们想起这类事，就感到无比激动。事实上，在不伦瑞克、加塞尔以及其他一些地方都爆发了一些小规模革命，都撵走了一些德国诸侯（这并不算最糟的）。（鼓掌）德意志民族运动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我们，普鲁士人、萨克森人、巴伐利亚人、不伦瑞克人等等，都希望形成一个伟大民族。当国旗的颜色采用黑、红、黄三色的时候，我们举行了公开集会，发表善意的演说。我们欢呼雀跃，甚至吹起黑红黄的口哨，当时，我们无比激动了一阵子；但是，政府终于开始迫害我们的领导人，他们中间许多人被关进了监狱，有些人被流放，还有些人不敢再继续维护自己的原则。普遍的放逐已被提到日程上来；许多人都离乡背井，远走异邦；而那些失去了领导的、很少知道自身权利和义务的落后群众，则感到悲观失望和遭到冷遇遗忘。流亡者又聚集在黑红黄三色旗的周围，但人家是不会让他们长此以往的。瑞士受到了威胁，被迫拒绝对流亡者加以保护。路易-非力浦只准备满足德国独裁者的愿望，就连比利时也不给流亡者提供避难场所。德意志民族运动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土崩瓦解的。尽管如此，我们并没有完全放弃美好事业。坚定不移的爱好自由的朋友们发现他们以往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对工人阶级缺乏教育。因此，他们开始创建工人教育协会。甚至在不允许建立任何政治团体的国家，

这种协会也以歌咏团体的形式建立起来了。于是我们根据时代的精神在1840年作了建立现在这个协会的尝试；这个尝试居然获得了成功。我们同形形色色令人丧气消沉的困难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并一一加以克服。（鼓掌）接着，主席描述了协会当前拥有的力量和手段，这一点上面已经提到了。现今协会的创始人总结并吸取了经验教训，变得越来越聪明了，他们决定把教育定为他们的运动的基础，不是以领袖，而是以原则为指导。（鼓掌）我们的伟大领袖就是普遍的兄弟般关系，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其他领袖。（热烈鼓掌）我们欢迎各个国家的人参加我们的协会。谁也不会问他是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还是俄国人，而只简单地问他：“你是一个诚实的人吗？”（热烈鼓掌）最后我希望这样一个时代尽快到来，到那时，对所有的人来说都将只有一个祖国——世界，只有一个家庭——人类，而且只有一种宗教——正直和为真理服务。（热烈鼓掌）

接着合唱团高唱《自由之歌》。

紧接着，主席请“我们的法国民主派的朋友和兄弟米歇洛”讲话。演讲者用法语表达他的观点。[……]尽管有饥荒，但地球上生产出来的东西足以使它的儿女们吃饱，因为在各个地方，商店里都摆满了可吃的商品，但穷人没有钱，只能忍饥挨饿。我们的反对者问：“这是我们的罪过吗？”是的，这是你们的罪过！因为这是现存社会制度的罪过，而你们是这个制度的维护者！（鼓掌）我们因为力图要消灭这种可怕的社会制度就有罪过吗？我们要在平等、自由和博爱的基础上建立另一种社会制度。这种新制度将消除一切征服人们的痛苦，因为它将把本来就属于人们的地球归还给人们。（热烈鼓掌）而我们应当怎样来完成人

类的这个伟大使命呢？通过革命的大屠杀？不行，不行，绝对不行！我们将这样来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对人们进行宣传教育，向群众指出他们的权利和每个人应尽的义务。（鼓掌）如果社会的最底层都认识到了这一点，革命就会成功，人类就会获得完全的幸福。（热烈鼓掌）

主席宣布，接下去他要介绍一位英国朋友，我们的兄弟朱利安·哈尼。（鼓掌）

乔治·朱利安·哈尼发表了相当长的演说，下面的一段话反映了他的演说的要点：民主派姐妹们，兄弟们，我享有参加这次会议的特权，深感荣幸。亲耳听到了主席阐述你们协会的教育和宗旨，我感到无比高兴。知识是群众迫切需要的东西，而无知即使不是原罪，也肯定是传统灾难，因为除了许多人的无知，还有什么能使少数人把许多人置于受折磨的境地呢？（鼓掌）〔……〕资本家以占有资本而自吹自擂，炫耀自己，他们硬说什么，没有资本就没有职业，工人就无事可干，就不得不灭亡；这种资本不就是劳动的创造物，劳动的积累物吗？（鼓掌）这种状况不仅在英国，而且在整个欧洲都存在。少数人专横跋扈，许多人遭受奴役，这在各国虽然程度不同，但基本情况到处都是一样的。（鼓掌）任何不以改变这种弊端为宗旨的政治变革，都只不过是政治欺骗而已。富人占统治，甚至富人和穷人同时并存的所谓共和国，无非是一种“讽刺、欺骗和圈套”。（鼓掌）在所有的国家，种植小麦的人却以土豆为生；饲养牲畜的人却不知道肉食为何物；栽种葡萄的人却只得到琼浆玉液的沉渣；生产服装的人却衣不蔽体；建造楼房的人却住简陋茅舍；生产各种生活必需品、消费品和奢侈品的人却贫困不堪。各国的工人们，你们的忧虑和

别人强加给你们的不公平，不是到处都一模一样吗？而你们的美好事业不也是完全相同的吗？我们允许有不同的看法，至于手段，不同的情况必须采取不同的手段，但是，人类的真正解放这个伟大的最终目标却是我们大家的唯一目标，我们大家必须为此而共同努力。（鼓掌）最后我为你们祝酒：“博爱 是道路，自由、平等和普遍幸福是目标；但愿各国工人阶级和睦相处，团结友爱，争取他们的共同事业获得胜利。”（热烈鼓掌）

合唱团演唱德国工人之歌《永远前进！》，

（我们没有获悉关于其他人的致辞的报道，因此，我们只能大致地叙述一下它们的内容。）^①

亨利希·鲍威尔（德国）在致辞中对协会创始人为促进这个团体的繁荣昌盛和实现它的目标所作的巨大努力表示感谢。他谈到了协会取得的卓越成就，他在致辞结束时朗诵了一首他自己为这次庆祝活动而作的诗。这首诗博得了所有懂德语的人的热烈鼓掌。（我们听说，这首诗准备用德文发表，以满足协会的许多会员和朋友们的愿望。）

奥博尔斯基上校（波兰流亡者联合会民主派支部）用法语致辞。他说，他能有机会参加这次周年纪念日活动而感到高兴；他和他的同胞能为人类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而将始终感到幸福。

[……]

接着，**卡尔·普芬德**（德国）谈到了对工人阶级进行教育的必要性，以便消除把他们引入歧途的那种教育带给他们的成见，从而依靠他们把目前的运动进行到底。（鼓掌）

^① 参看文件86。

缪尔姆（母斐）用德语致辞，他表示，他为这个由各国工人阶级组成的团体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欣慰。他说他了解自己国家和德国的某些情况；还说，尽管这两个国家的全国性政党发表了出色的声明，但他仍能肯定，工人们根本不关心这类原始斗争；他们知道，他们只有通过博爱才能增进他们的真正利益，因此，他们务必联合起来。（鼓掌）

纪念活动在高唱几支歌曲和喜闻乐见的诗歌声中，在一片三呼主席万岁、三呼博爱万岁声中结束。接着，把大厅重新布置一番，开始跳舞，群情激昂，一直跳到第二天凌晨。

1846年2月14日《北极星报》（伦敦）第
431号

节录

78

罗兰特·丹尼尔斯（科伦）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
的信

1846年3月7日

亲爱的马克思：

直到现在，我才想出一个办法，使我的信件直接到你的手里而免遭拆开的危险。这就是我迟迟没有回复的原因。[……]

关于赫斯，你谈得很少。^①你把他称之为“一块海绵”，简

^① 马克思的信可能是1846年2月底写的，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从丹尼尔斯的这封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那时就已在考虑出版一个共产主义的杂志，丹尼尔斯也曾为它写过一篇文章。马克思设想先出季刊，后改为月刊，为此他一直

直再恰当不过了。我非常欣赏这个说法。这个人由于具有海绵的特性，在爱北斐特也呆不长；他必须有一个他能赖以汲取思想的人，否则他就会头脑僵化。我听说，现在他又感到得心应手了。注意，他竟把关于你的区区琐事拿来款待我们，实在幼稚可笑。你的信使我明白了这一点。为了“审查”共产主义的哲学，你想必已把再作一次出版《德法年鉴》[……]^②的尝试告诉他了。于是他立即就写信对我说：“我们下一步将进行‘审查’，以便区别精华和糟粕”！！他还说了一些带有侮辱性的话，主要是针对我们科伦人的。此外，你在给我的信中还说，你打算到列日去。赫斯早在几个星期以前就写信到威斯特伐利亚说，“春天，我们将前往列日”等等。这一些以及诸如此类微不足道的琐事，除了令人发笑的一方面，还有另一方面，否则我就不会来打扰你了。特别是审查计划，赫斯在给我的信中说，在措辞方面还存在某种有害的、家长制的东西。看来你要把布鲁塞尔变成共产主义的继承者，而赫斯则充当大祭司（他非常适合扮演这个角色）。我所以对你说这些，因为你必然要平白无故地遭到人家的攻击——这里我并不是指我和毕尔格尔斯两个人^③，——而这正是由此产生的后果。

关于《德法年鉴》，我不明白你怎么能把这件事同你信中提到的那两个人联系起来，因为至少我在赫斯那里见到的无非是哲学。收拾了他的青年学派是件大好事。恩格斯也反对使用这个人

考虑到1847年底甚至1848年初，但这一设想未能实现。参看文件80、155和174。

② 这里有一词难以辨认。

③ 这个插入句是丹尼尔斯后加的。

来批判哲学，何况他还是哲学家。因此，相信赫斯的就只有你了。我也认为资产者^①要合适得多。我记得，他曾经满腔热情地解释过这种思想。不过，他本人会给你写信的。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这里干的事情很少。搞宣传鼓动我们还没有想到，我相信，我们是能更好地利用在这方面所必需的时间的。目前，我们正在编写一个年鉴。这里的我们，也就是指毕尔格尔斯和我。我同意荣克对德斯特尔大夫的评价。《人民总汇报》已经停刊。情况很奇特。如果荣克的“同情”强烈到足以采取行动，那就会有救了。

最新的消息是，预言家库尔曼博士^②几天前已来到这里。这个家伙头脑非常简单。起初他只相信个人的作用，对我们非常粗暴，好为人师，老教训我们；他想争取我们[……]^③，在我们公开向他表示我们对他的看法以后，他终于变得[……]^③。尤其是，资产者经常同他在一起大吹大擂。我对这个家伙马上感到厌恶。结果他在这里的一家小酒馆里喝得酩酊大醉，我们不得不把他弄回来。不过他也会渐渐清醒过来的，在这个时代，预言就像直接的宣传鼓动一样糟糕。

我非常乐于接受你的友好邀请，到你们那里去一次，但是，我们大家正在煞费苦心地进行的工作暂时还不容我脱身。如果4月份有可能，我一定去。

我们渴望在这里看到你的国民经济学。我深感惋惜的是，插进来的这项工作竟妨碍了你，尤其是在这个节骨眼上简直是对你

① 指亨利希·毕尔格尔斯。

② 关于库尔曼，参看注52。

③ 手稿缺损。

的剥削。请你注意《德法年鉴》！^①你谈到荣克给资产者写信一事，这里并没有收到这封信。

如果你觉得不再需要布鲁塞尔的图书馆，你可以前往列日。那里的周围环境简直是一个乐园，对你夫人的健康一定大有好处。到列日去，我还可以给你介绍 [……]^② 一个年轻律师，共产主义俱乐部的成员。^③同时，你那里距离边境很近，而从这里到布鲁塞尔却需要一天的路程。 [……]

毕尔格尔斯也要给你写信^④，因此，我就此搁笔，余言我乐意面谈。 [……]

你的

丹尼尔·斯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20,op.1,Nr.1

节录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

① 这句话是后加的。

② 手稿缺损。

③ 可能是维克多·特德斯科。

④ 毕尔格尔斯的信保存下来了，它虽未标明日期，但肯定是在丹尼尔·斯的信以后写的（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1,op.3,Nr.86）。

关于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的一次会议的报道

1846年3月15日和17日

民主派兄弟协会会议

3月15日，星期天晚上，该协会在上述会场^①召开了一次例行会议。整个会场座无虚席，与会者几乎都是来自欧洲各国的民主主义者。6点半钟，约翰·肖主持会议，开始讨论。为了保持协会的特点，为了防止不合适的人钻进协会，会议提出、赞成并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登记民主派兄弟协会会员姓名；本次会议以后，凡愿加入协会者，须经两名会员介绍，并得到多数通过方能入会。但是，每个会员可以介绍一位朋友，同时把朋友的姓名通知主席，如果这个朋友还不是协会会员，就不得以任何方式参加讨论。除上述决议外，任何“规则或规定”一律作废。同样，原来有关会费的规定也一律作废，因为会议认为，除特殊需要外，经费已经够用，而特殊需要的开支，光凭每个民主主义者根据自己的财力自愿缴纳的会费就足以解决。关于任命官员的问题，会议认为，不必设立议事会或委员会，因为民主派兄弟协会不是联合会或政党，而仅仅是由来自各国的人们为了相互交流情报而结合成的团体。但会议认为有必要任命一位审查有待发表的文件

^① 指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在大磨坊街的会场，上面一篇报道中已提到该会场。

的常务书记，并在会上选举了6名书记：英国、德国、法国、斯拉夫、斯堪的那维亚和瑞士各一名。〔……〕

乔治·朱利安·哈尼说，他在上次会议上曾经谈到，他打算在这次会议上把“印度战争”^①问题列入议事日程。但是，情况已发生了变化，不得不改期讨论这个问题，而致力于研究遭到不幸的波兰的起义⁶⁶问题。（请听，请注意听！）接着，哈尼相当详细地报告了这次起义的经过，并特别强调了克拉科夫临时政府发表的宣言，因为这个宣言是唯一能使波兰人自由、强大和幸福的原则基础。最后他建议呼吁：“热切希望英国人民能尽快举行示威，公开声援波兰的爱国者；这次会议立即开始募捐。”

卡尔·沙佩尔赞同这个提案。他相当详细地阐述了强加给波兰的不公平，阐明了每个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应对波兰爱国者给以真诚援助的义务。最后他告诉大家，昨天晚上，德意志协会已经开始募捐，它的会员虽然全是工人，而且其中许多人还没有工作，但他们已经捐出4英镑10先令6便士。（热烈鼓掌）

接着开始募捐；共捐得2英镑2先令3便士。必须指出，民主派兄弟协会的会员都是工人，其中许多人同时又是德意志协会的会员，昨天晚上已经捐过款。

这时一位杰出的波兰流亡者来到会场，感谢民主派对他们的同情，并担保说，当前的革命如果取得成功，将带来民主主义原则的胜利。

卡尔·沙佩尔说，法国把为波兰起义所捐助的款项寄给支持波兰起义的报纸。因此，他提议，把这次会议募集的款项交给

^① 1845年，英国人在印度开始了征服旁遮普的战争，1845年2月旁遮普被并入英国印度殖民地。

《北极星报》：请该报所有者作为司库来保管这笔钱。沙佩尔受权声明，德意志协会会员也将把他们募得的捐款寄给《北极星报》。（鼓掌）

莫尔兄弟赞成这个提案；这个提案被一致通过。

这时得到消息说，伦敦南区的宪章派也已开始行动，并准备马上召开一次支援波兰起义的大会。这个消息在这里引起了热烈欢呼，会议任命了一个代表团，以表示民主派兄弟协会的支持。

接着，会议宣布延期到星期四晚上再继续举行。

民主派兄弟协会延期举行的会议

[……]上次会议任命的代表团接受委托，带着民主派兄弟协会、德意志协会和法兰西协会的捐款去拜访菲·奥康瑞尔先生，卡尔·沙佩尔以代表团的名义报告他们同奥康瑞尔先生会谈的情况。这个报告使大家深感满意。

查理·基恩报告他同伦敦南区宪章派会谈的情况，他说，现在他们有几个人出席了会议；此外他还说，宪章派执行委员会的多伊勒和威勒尔先生也出席了会议。

宪章派伦敦南区的奈特先生来到了会场，并担保他的宪章派兄弟将给予支持，并提议利用伦敦南区会堂举行一次支援波兰起义的集会。（热烈鼓掌）

多伊勒先生提议，接受伦敦南区宪章派的建议，下星期一晚上在伦敦南区会堂举行第一次支援波兰的集会。

威勒尔先生提议，在“王冠和铁锚”饭店举行第一次集会。

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亨利·罗斯提议，威勒尔先生附议，任命一个委员会，以便在3月25日，即星期三晚上，在“王冠和

铁锚”饭店举行一次公开集会。^①这个提案获得通过。

接着,民主派兄弟协会、伦敦宪章派包括其执行委员会委员在内的下列人员被选出组成委员会,并受权接纳其他人员:沙佩尔、奥康瑙尔、哈尼、多伊勒、威勒尔、麦格拉斯、克拉克、米歇洛、霍尔姆、涅梅特、于贝尔、罗斯、基恩、敦纳奇、鲍威尔、胡贝尔斯、方塔纳、奈特、安德鲁斯、弗莱彻、米尔纳、穆尔登、休伊特、敦纳奇第一、里德赖、苏特尔、肖、库法伊、桑普森、斯凯尔顿、斯托伍德、帕克斯、莫尔和博凯特博士等先生。

根据卡尔·沙佩尔的提议,大家鼓掌通过了致菲·奥康瑙尔先生和宪章派执行委员会委员的感谢信。

乔·朱·哈尼提议,“我们真诚地恳求宪章派公会全国执行委员会向英国人民发出支援我们波兰兄弟的请愿书”。这一提议获得通过。

多伊勒先生作了回答,同时保证,执行委员会将真诚地支持会议的召开。(鼓掌)

接着,大会通过决议,民主派兄弟协会向英国人民发表一个公告。⁶⁷ [……]

1846年3月21日《北极星报》(伦敦)第
436号

节录

^① 在这一天举行了一次由“波兰之友委员会”召集的公开会议;参看文件80。

80

乔治·朱利安·哈尼（伦敦）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布鲁塞尔）的信

1846年3月30日

1846年3月30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①：

已欠你两三封信^②没有回复，我担心我的沉默会使你生气，尤其是因为至今尚未回复那封非常重要的来信。下面我准备着重谈谈这封信。我一直都很忙，而波兰起义又给我添了好多事情。我日夜不停地干着发动群众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成就。伦敦大会^③终于开完了，我这才喘了一口气，马上就提笔给你写信。

先谈谈几星期前维尔特转来的那封没有注明日期的很长的信。听到你们打算出版季刊，我很高兴。不知是否已经如愿以偿了？[……]

我对你关于英国很快就会发生革命的推测有些怀疑。我认为，在德国，革命变革肯定会发生，而且有可能迅速到来。在法国，这种变革同样肯定会发生，而且很可能在路易-菲力浦这个

① 写给恩格斯的这封信是附在哈尼给日果的信中的，地址是：比利时布鲁塞尔博登布吕克街8号。

② 这些信没有保存下来。

③ 参看文件79。

老流氓死后很快就接着发生。然而，我实在看不到英国有发生这种变革的可能，至少是在英国不仅受到内部的而且受到外部的推动之前。你关于我们将在年内实行宪章^①以及三年之内废除私有制的预言肯定不会实现。后一点尽管有可能实现，而且我也希望它会实现，但我确实相信，无论是你还是我都看不到这一天了。至于奥康瑞尔近来就“物质力量”^②问题所谈的一切，我认为没有什么价值的。英国人民不会接受库伯的和平与不抵抗的奴隶见解，但他们也不会按照相反的主张去行动。他们可以在公开集会上为这种主张鼓掌，但仅此而已。尽管在1839年人们曾经大谈“武装起来”，可是人民并没有武装起来，今后也不会武装起来^③。[……]

现在，我来谈谈你3月5日的来信。这封信已经不在，它已经按照你的旨意离开人世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对你3月5日来信中谈的全部问题一一加以评述。我无法判断你们那个计划^④的策略性和现实性。对此，你和你的同胞应当是最好的判断者。就我本人来说，我不仅相信你的热情，而且相信你的判断能力，我愿意在我微薄的能力和允许的情况下，按照你的要求来帮助你。你该记得我关于自己的欠缺之处所谈的那些话吧。^④所以

① 指实现宪章中提出的要求——普选权。

② 奥康瑞尔当时认为，要实现宪章，不仅要使用和平的议会的手段，而且要采用一切斗争的手段，其中包括武装起义。

③ 1839年爆发了广泛捍卫宪章的运动，许多地方同时进行了武装起义的尝试，但是，威尔士矿工首先爆发的起义遭到了镇压。

④ 在这里，哈尼试图反驳恩格斯对他的夸奖，因此，他没有把自己看作工人运动的领袖。

说，我虽能在某些方面为这个事业效劳，却没有能力在另外一些方面为它效劳。在我正式开始做你希望我做的事情之前，有一点我必须搞清楚，这就是，你们的计划是否得到了德国运动中那些深受信任、忠贞不渝、勇于献身的人^①的支持。我必须告诉你，我已在几星期之前参加了德意志协会（最近有一些英国人陆续加入了这个协会，因此协会的人数每星期都有所增加）。如果你们的计划没有告知这个协会或者至少是它的一两个最可靠的成员的话，我就要考虑一下是否参加你们的活动。因为，你们的计划一旦传开，我就会遭到误解，很可能被看作是反对人民利益的阴谋分子。我非常信任沙佩尔，如果你们不同他商量，我就不明白我怎么能参加你们的活动。你能肯定你们的计划在伦敦还无人知道吗？我是按你的要求行事的，除我之外谁也不知道你3月5日来信的内容。然而，在接到你这封信的前两三个星期，我就听说你们（在布鲁塞尔的著作家）成立了一个协会，参加者只限于你们自己，不吸收工人。^②如果这个协会就是你在信中所说的协会，那么你瞧，已经有人知道它了，它已经在正直的人们中产生了不好影响。如果这个“协会”不是你们计划中的，而是别的什么组织，那么，不管它是什么组织，它已经在这里产生了不好影响。你要想使这里的德国人接受你3月5日来信中的那些观点，首先必须努力消除这些影响。至于魏特林，他在伦敦协会中可能有些

① 指在伦敦的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

② 看来，哈尼不仅参加了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而且参加了正义者同盟。

③ 这种错误说法显然出自魏特林，参看文件95。

朋友，但肯定不是多数。沙佩尔是领导人，而且确实是这样。他拒绝当“领导”。然而，上天把某些人塑造成领袖，并且已经赋予他们各种必要的条件。

星期六我收到了维尔特转来的你的一封长信，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两封信。给《北极星报》的那封信^①我很欣赏，本星期将刊出。我把它的日期2月20日改为3月20日，这样它就不会显得太过时了。

同那封公开信一起寄来的给我个人的信使我很感兴趣。有关法国的那些事实非常重要，我准备把你划线之前的那一部分在《北极星报》上加以利用，但可能不是在这个星期。如果我在一篇社论中用了这些事实，请不要感到诧异。你关于英国和法国的中等阶级的见解，我完全同意。你关于“可爱的英格兰”的见解都很正确。你说“我正巧来得及附上几项决议，我们认为应该通过这些决议以反对库伯”。可是，在你的信中并没有什么决议。

略谈几句英国的情况。反谷物法运动已近尾声。皮尔一定会通过上院批准他的议案^②，谷物法注定要被取消，彻底废除它的日子不远了。随之而来的将是中等阶级的全面统治，宪章运动的高涨，无产阶级和中等阶级的彻底分裂，以及那种既是政治的又是社会的冲突的开始。[……]

我已经告诉过你，德意志协会正在发展。关于这个协会的年

① 恩格斯的通讯《给〈北极星报〉的第三封信》刊登于1846年4月4日《北极星报》第438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43—653页）。

② 废除谷物法的法律草案于1846年6月获得通过。英国从1815年开始为了大地占有者的利益，实行了谷物法，根据这个法律，英国限制或禁止粮食进口。废除谷物法是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胜利。

度晚宴的报道^①受到了你的朋友们的赞赏，我很高兴。我已看过纽约出版的那份德文报纸。^②你大概已经看到，“民主派兄弟协会”正在取得进展。我相信，尽管有许多困难和障碍，我会在这方面获得成功的。我们一度受到宪章派很不公正的对待和猜忌，但这种情况正在过去。波兰事件对促进这一转变起了很大作用。看到其他党派都不准备行动，我们决定先开始行动。^③我们的工作刺激了宪章派执行委员会，他们害怕我们会从他们手中夺走对人民的领导权，便前来找我们。他们一来，我们立刻就说：“你们领导，我们跟着干。”我们的方针并不是要突出我们自己，而是要推行我们的原则，迫使其他人接受我们的原则。因此，这两派工作得很和谐，组织了一个联合委员会来筹备群众大会。我受委托起草决议和请愿书，我决心使两个文件都具有彻底民主主义的精神。在委员会中我完全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行事。这两个决议案已在群众大会上一致通过。沙佩尔受到非常热烈的欢迎，我们得到的掌声同我们思想的民主程度恰成正比。与会的几个波兰贵族因受到我的猛烈抨击悻然离开了会场，他们咬牙切齿地诅咒我是“长裤汉”。这个大会成绩斐然，至少有3000人出席了会议。在骗子们（洛维特之流）密谋召集一次上流社会的波兰民族主义大会时，我们插进去挫败了他们的阴谋。他们现在绝对不可能举行大会了。《泰晤士报》、《纪事报》、《晨报》、《每日新闻》、《地球报》和《太阳报》都报道了我们的大会。《晨报》

① 文件77。

② 海尔曼·直利盖出版的《人民代言者报》。

③ 参看文件79。

和《太阳报》发表社论对它加以赞扬，而《泰晤士报》和《每日新闻》则对它加以谴责。你看到《泰晤士报》的那篇谴责了吗？非常重要，特别是因为它是在《泰晤士报》“社论”声称“宪章主义幻想”已经破灭和消逝之后不几天发表的。这次大会将在英国的运动中开创一个新纪元。从今以后仅仅限于宪章运动是不够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彻底民主将是我们宣传的目的。今晚将在伦敦南区召集一次大会，那些日报当然是不会报道这件事的。我要就此搁笔了。请快些来信。我一两周内再去信。玛丽向恩格斯夫人和你本人问好！代我向马克思、日果等人问好！

你的情同手足的
朱利安
(今后简称“朱”)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信, F. 1, op. 5, Nr. 91

节录

81

巴·瓦·安年柯夫关于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一次会议的报告

1846年3月30日

[……] 第一次会面，马克思就邀请我参加第二天晚上在他那里和裁缝魏特林（此人在德国曾得到相当一批工人的支持）举行的一个会议。会议的任务是在可能范围内确定工人运动领袖们

的共同行动方式。我立即接受了这一邀请。

裁缝鼓动家魏特林长着金色的头发，是一个漂亮的年轻人，穿着一身很讲究的大礼服，留着风流的小胡子，与其说他是一个严厉而易怒的工人（我曾以为他是这样的一个人），还不如说他是一个跑腿的伙计。我们很快地相互作了介绍，看来，魏特林这个人是很有礼貌的。我们坐在一张绿色小桌旁边，马克思坐在桌子的一端，手里拿着铅笔，低着他那狮子般的头在看一张纸，同时他的不可分离的同伴、宣传工作上的助手恩格斯这位身材高大、气宇轩昂、像英国人那样傲慢而严肃的人，宣布开会。他说，凡是献身于改造劳动的事业的人必须了解彼此的观点，并制定一种共同的理论，作为所有那些没有时间或机会来研究理论问题的后继人的旗帜。恩格斯还没有讲完，马克思就抬起头来，直接向魏特林提出问题：“魏特林，你在德国大叫大嚷地鼓动，请你讲一讲，你根据什么来证明你的活动是正确的？你根据什么来确定将来的活动？”这一尖锐的问题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这个问题在小组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不过现在回想起来，讨论并没有继续多久。看来，魏特林是想使会议只停留在一般的清谈上。他带着一种严肃和忧虑的表情，开始解释说，他的目的不是要创立新的经济理论，而是要用一种更有效的方法，如像法国的经验所提供的那样，使工人们看清自己的可怕处境，识别执政者和各种组织对他们的一切不公平言论，不要轻信后者的任何诺言，而要靠自己的力量建立民主的和共产主义的社团。他讲了很久，但使我惊讶的是，他的讲话与恩格斯的讲话完全不同，讲得既零乱，又粗俗，语无伦次，而且常常修正自己的话，好不容易才作出结论，可是又离题太远。这时他的听众不是那些经常在他周围工

作的人，也不是那些阅读他的报纸和抨击现代经济制度的文章的人，他已经不能自由自在地思想和谈话了。要不是马克思皱着眉头愤怒地打断他的话并发表自己的意见，他大概还会说得更多。魏特林的讽刺性演说无非是想激动民众，但又不给他们以任何可靠的、深思熟虑的行动根据，这完全是在欺骗他们。马克思接着指出，刚才所谈的这种激起人们虚幻的希望的做法，只会把受苦受难的人们引向最终的毁灭，而不能拯救他们。特别是在德国，如果没有严格的科学思想和正确的学说来号召工人，那就等于玩弄空洞虚伪的传教把戏，一方面是一个慷慨激昂的预言家，另一方面只是一些张着嘴巴听他讲话的蠢材。突然，他对我做了一个有力的手势补充说：“有一个俄国人在我们这里。在他的国家，魏特林可能产生他最大的作用，不过，在那里确实只能存在并继续存在糊涂预言家和糊涂追随者之间的联合。”马克思继续阐述他的思想，他说，在一个像德国这样的文明国家，如果没有进步的理论，就什么都做不成，事实也是如此，至今除了喧嚣叫嚷、有害的感情冲动和使事业遭到失败，什么事也没有做出来。魏特林的苍白的脸上泛起了红晕，他又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他用激动得发抖的声音辩驳说，一个为了正义、团结和兄弟般的互助而把几百个人集合在一面旗帜下的人，不可能是头脑空虚的无用的人；他魏特林为了摆脱今天的攻击，会用回忆过去从祖国各地寄来的几百封感谢信来安慰自己；他认为他的平凡的工作也许要比抛开苦难的人民来进行批判和空洞的理论分析，更有助于共同的事业。马克思听到最后几句话时，气得再也忍不住了，他使劲捶了一下桌子，桌上的灯都震得摇晃了，他跳起来说：“无知从来也不能帮助任何人！”我们也都跟着他站起身来。会议结束

后，马克思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简直是怒不可遏。我很快就同他的交谈者们告别回家，我看到和听到的这一切都使我万分惊讶。

[……]

巴·瓦·安年柯夫《美妙的十年（1838—1848年）》，载于1880年《欧洲通报》第4期第497—499页

摘要

83

威廉·魏特林（布鲁塞尔）给莫泽斯·赫斯（斐维）的信

1846年3月31日

亲爱的赫斯：

昨天晚上我们又全体聚会在一起。马克思带来了一个人，向我们介绍说是个俄国人^①，这个人整个晚上一言未发。讨论的问题是：如何以最好的方式在德国进行宣传。这个问题是裁勒尔提出来的，但他声明，他今晚不便细说，因为会触及一些微妙敏感的问题等等。马克思一再催他说，但是徒劳。两个人都发火了。马克思声色俱厉。最后，马克思阐述了这个问题。结论如下：

1. 必须着手清洗共产主义的党。
2. 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批判对党无用的分子，切断他们的财源。
3. 这种清洗目前是为共产主义的利益可以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① 指巴·瓦·安年柯夫。

4.谁能在资本拥有者那里赢得声望，谁就有可能排挤别人，并利用这种可能把事情办妥。

5.必须同“手工业者共产主义”、“哲学^①共产主义”⁶⁹作斗争，对感情应当嗤之以鼻，这些全是胡说八道；以后不应当再进行任何口头宣传和组织任何秘密宣传，“宣传”一词应当根本废弃。

6.在最近的将来谈不上实现共产主义。首先应当由资产阶级取得政权。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方面非常激烈地反对我。魏德迈心平气和地也讲了几句。日果和埃德加尔^②一言未发。海尔贝格以中立立场发言反对马克思；最后载勒尔也发言了，但语调令人奇怪地平静和怀有苦衷。我激动起来，马克思比我更激动，特别是在最后，大家全都十分激动，在房间里踱来踱去。马克思对我的结论特别恼火。我是这样说的：总之，从我们的辩论中只能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谁能弄到钱，谁就可以随意写。

某些意见无非是第四点的意思，那样有把握地把这些意见抛出来，使我不得不认为，在马克思的影响下，我将被排挤出拟议中的出版企业，他得知的某些消息可能使他打算这样做。

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我进行激烈的原则批判，是无疑的了。我不知道能不能像我希望的那样为自己辩护。没有钱，马克思就不能进行批判，而我也就不用辩护了；但是，如果我没有这笔款子，情况再紧急也没有用。我相信，马克思和恩格斯将通过

① 第一次作这种划分的是马克思或别的一个什么人，反正不是我。——魏特林注

② 指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

他们的批判来批判他们自己。我发现，马克思的头脑简直是一部无所不包的百科全书，但不是天才。他的影响是通过他的为人来产生的。富人使他成了编辑，如此而已。当然，乐于牺牲的富人有权在他们要资助的著作中筛选或被筛选。这是他们可以支配的权力，而著作家，不管如何贫穷，也有一种权力，那就是有权把他的信念不受金钱的影响所左右。我就能够把我的信念奉献给这两者的统一。当我发现从各方面掀起反对我的体系的呼声时，我就撤回了我的体系。但是，当我在布鲁塞尔获悉，有人正在以优惠的稿酬用各种文字创造伟大体系时，我也随即完成了我的体系，并试图将它公开出版。如果我的这个体系得不到支持，那么，这完全是人们的故意安排，就是人们所说的筛选。我这个蠢驴始终认为，我们应当用我们的特点去对付我们的敌人，并且要特别支持这些在斗争中要引起追究的特点。我认为，我们应当影响人民，真正成为人民的一部分，以期传播我们的通俗著作。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却不这么认为，他们有他们的富有的追随者的支持。这也好！非常好！简直好极了！这是我亲眼所见。这样的事我见得多了，往往对事业有利。

艾韦贝克又来了一封未付邮资的信，总共一页纸，一页巴掌大的纸，邮资1法郎，而内容仅仅是叫我们给波兰人寄去曾经答应的20法郎。我根本没有答应，只说将来有可能的话给他们寄一些钱去。我把这封信的一半或者全文附上。我几乎快付不起邮资了。

你的魏特林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84

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关于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一次大会的报道⁷⁰

1846年4月14日

1846年4月15日于伦敦

附件 I

我遇到过许多重要的事，但几乎都没有记录下来，因此，现在在我得下决心给我的一篇篇旅行札记大致补充若干事实材料，以免一些栩栩如生的印象变得模糊，以至于淡忘了。下面可以说是对伦敦德意志共产主义者俱乐部的记述，昨天我参加了它的一次会议。

前天，我的朋友迪芬巴赫偶而遇见了该协会的理事，或者至少是该协会的主要成员，并向他介绍了我的情况，他和我马上都得到了参加昨天主要会议的口头邀请。我们俩约定，晚上7时以后在雪茄烟店碰头，然后一起赴会。迪芬巴赫在这些入中间虽然混得很熟，但他还从来没有参加过一次共产主义者会议。因此，我们几乎同样怀着期待和急切的心情于8时半到达协会所在地。这座房子的底层是一家普通酒店，出售黑啤酒和其他高级啤酒，我似乎没有看到专供顾客就座的位子。我们穿过店堂，拾级而上，来到了一个类似大厅的房间，里面排列着桌椅，大约可容纳

200人。20桌个人一组，分散地坐着，共进简便的晚餐，每张桌子上的陶土烟筒里都放着烟卷，面前都摆着酒杯，有的人还站着；大门不时地开启，让新来的人进来，因此，很明显，大会要到很晚才能开始。从大多数人的外貌就可以看出，他们虽然穿得十分讲究，但都属于工人阶级；他们的一举一动虽然无拘无束，但气氛仍然很庄严。人们大多用德语交谈，有时也能听见讲法语和英语。在大厅的一角放着一架大钢琴，上面还摆着乐谱。这在非音乐之乡的伦敦就足以向我们证明，我们找到的是个相当阔绰的房间。我们不认识前来开会的人，因此，我们就在大门对面，黑板旁边，在一个不太显眼的地方坐下，要了一杯黑啤酒和一盒大众化的香烟（每盒1便士），等待邀请我们的熟人沙佩尔。过了不多久，进来一人，他个子高大，体魄强壮，精神焕发，年纪在36岁左右^①，留着黑色的小胡子，两眼闪闪发光，炯炯有神，举止高傲。此人朝迪芬巴赫走过来，后者向我介绍说，这就是沙佩尔，他原来是法兰克福的宣传家，后来参加了向瑞士和西班牙的进军，或者更确切地说，参加了革命。^②他会见我时显得非常矜持，但很友好。我暗中觉得，他有点自负，看不起我这个教授。他请我们同他一起坐在大厅的一角，并请我们看贴在房间里的一大张纸，上面写的是协会章程，标题是《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章程》。按这个章程规定，每一个安分守己地挣钱糊口、没有干过见不得人勾当的人都可加入协会，但是，在每次接收前，都必须听取一个会员的介绍并由第二个会员提出确证。协会领导由一名主席、一名书记、一名图书管理员和一名司库组

^① 沙佩尔当时34岁。

^② 指沙佩尔参加了马志尼领导的向萨瓦的进军；沙佩尔不曾去过西班牙。

成。会员分为两类：一是参加创建共产主义者协会的原有会员和注册入会的会员；二是只参加教育课程学习的自由会员。只有第一类会员才能参加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会议，选举理事会并在吸收新会员时进行表决；第二类会员没有被选举权，不能参加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会议，只缴纳会费；如果耽误教育课程学习，还要受到处罚。整个协会的最高原则是，通过思想教育使人达到自由和自觉。因此，每天晚上都安排了课程。星期一：英语课；星期二：地理课；星期三：历史课；星期四：绘画和物理课；星期五：音乐课；星期六：舞蹈课；还有星期日：特设共产主义政治课。课程内容每半年变换一次，上地理课时往往还要加进自然科学的内容。每人每周缴纳学费5银格罗申或6便士，就能上各门课程，生病的学员每周缴纳7先令（2塔勒10银格罗申）。除此以外，还有各种罚款，这些罚款全部上缴给总储金处。这就是我走马观花似地看到的章程的大致内容。

我们坐在指定的位子上；这时整个大厅挤得水泄不通，主席（我不太认识他，不过有人告诉我，他是医生）宣布大会开始。全场顿时鸦雀无声，每个人都拿下叼着的烟斗，此后书记（一个裁缝帮工，他的口才实在令人钦佩不已）宣布：公民希尔德布兰德和公民迪芬巴赫是由公民沙佩尔介绍来的客人，并问是否有反对意见。接着就开始讨论当前的政治问题。公民沙佩尔作一周事件述评。他的报告真切动人、透彻全面和富有教益。可见，他的和协会的对外通讯联系都是很广泛的；他特别对马德里的一封来信内容作了述评，描绘了克里斯蒂娜^①僧侣统治制度力图推翻军事专

^① 玛丽亚-克里斯蒂娜1829—1840年和1843—1854年为西班牙王后和摄政女王。

制政体的情况，信中所列举的事实比报上所披露的更详尽更细致。报告中当然充满了强烈的共产主义色彩，而无产阶级问题则真正成了贯串整个报告的一根红线。我坦率地承认，我虽然能容忍充分的自由主义，但有些地方我听了还是感到毛骨悚然。在加里西亚问题上，报告人完全站在农民一边，阐明了波兰人为争取一种粗鄙的、具有本能的欲望的爱国主义，非常细致而敏锐地分析了梅特涅的外交政策。他说，这种外交政策总是卑鄙无耻地企图维持贵族和农民之间的敌对状态，不致使依附关系解体。他感到遗憾的仅仅是，农民们没有把皇室官员统统杀光。在爱尔兰问题上，他为那些用武力取得地盘的人辩护。在德国事务上，他是自由派和金融贵族的敌人；更有甚者，他竟号召共产主义者，宁愿联合他们的公开敌人——耶稣教派，也不愿联合他们的秘密敌人——那些只想通过宪法等等扩大金融政治统治的金融自由派。

整个报告给会议留下了强烈的印象，报告结束时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接着，书记宣读了上次共产主义者会议声讨基督教可耻行径的记录。这个记录十分详细，记下了代表各种不同意见的发言的主要内容，因此，我在这里很快就领会了这个协会的信条。他们批判基督教的教义，因为它是同科学，特别是同自然科学冰炭不相容的；他们批判基督教的道德，因为它（1）把人从此岸引导和指向虚无缥缈、子虚乌有的彼岸；因为它（2）在行善时，为了永恒的幸福，宣扬赤裸裸的唯我主义。记录说，人的唯一领袖是理性，而理性在客观上存在于不断发展的科学之中；因此，人应该尽可能利用现有的科学使之得到训练，并在自己的整个行动上、思想上维护现存的真实。

接着开始讨论一周前就已经发出通知的新题目，即“在共产

主义国家应当怎样安排儿童教育”^①的问题，当时我惊讶地获悉，在与会者中至少有一半人是已婚男子。可惜讨论没有超越常规，为了满足我的迫切心情，我只了解到，他们既抵制共妻制又抵制妇女解放，在他们看来，女人是男人的精神补充，而婚姻是一种道德规范，按照这种规范，男女双方虽然权利平等，但由于天赋、使命和活动范围各异，双方还是截然不同的。教育是物质的和精神的、个人的和政治的教育，而且务必早在出生前就开始。

这时已是夜深人静，所以，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推到下星期再继续进行。我同沙佩尔还就他仇视自由主义的态度问题私下进行了非常严肃的讨论；我还会见了另外几个会员，其中有一人是西里西亚的木匠帮工；我还参观了协会图书室，并买了几本共产主义的著作，其中有一本是瑞士的奥古斯特·贝克尔的著作，这是现有一切著作中最中肯地为共产主义辩护的著作。^②与会者相互间亲密无间，以致“你”这个普遍的给人以信任感的称呼，看来不仅已应用于协会的章程中，而且已铭记在每个会员的心坎上。

为了总结这个晚上所取得的成果和我对共产主义的体会的主要之点，我还要再说几句：

首先我体会到，凡是有共产主义者的地方，特别在伦敦（沙佩尔）^③、瑞士（奥·贝克尔）、比利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和

① 参看注59列举的讨论题。

② 奥古斯特·贝克尔《共产主义者要求什么？》1844年洛桑版。

③ 原件上是，人名在地名上面。

巴黎（舒斯泰尔），德国政治流亡者都成了共产主义的领导人，只有在巴黎，德国人的比重总是提不高，因为在天赋极高的德国流亡者中有一个叫法伊恩（名人）的人竟是流亡者的死敌。^①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明摆着的。那些政治流亡者是地地道道的无产者，他们的体力和智力都很旺盛，就是囊空如洗，所以他们始终陷于为生存斗争而不能自拔的境地。他们一定会极其强烈地表现出无产阶级觉悟。再者，他们在德国都上过大学，都是在哲学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天生具备思辨的才能，因而以越来越大的干劲掌握新的观念世界。反正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都搞过政治，他们了解到，德国群众是缺乏接受政治思想的能力的，并对国内政治生活的改善抱着某种绝望情绪。他们的政治理想与其说是来源于实践，倒不如说是来源于哲学，因此，他们很快也就发现了其他国家的弊端和阴暗面；他们看到了爱尔兰在英国土地贵族制度下遭受的痛苦，看到了七月王朝的贪得无厌，看到了正在崛起的金融贵族的压迫以及瑞士耶稣教派的企图。还有什么比他们把自己的爱国愿望和理想变成世界主义的愿望和理想更顺理成章呢？

现在就可以预先得出结论说，德国人参加这次会议对共产主义的发展不是没有影响的，但关键在于要专门认识这种影响。到现在为止，我在这方面已得出了下列结论：

第一，我感到非常高兴，德国流亡者在共产主义中处处承认科学。物质生活只应是达到精神生活的手段。共产主义制度应立即取代古代的奴隶制度，应立即把全人类从物质劳动，或者更确

^① 对巴黎的这个说明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切地说，从物质劳动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奥古斯特·贝克尔说，雅典灭亡了，因为它不懂共产主义；斯巴达灭亡了，因为它蔑视科学。我不想对他的这句话妄加评论，我认为这是个人的观点，如果我不〔……〕^①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F.20,GP.1,Nr.101

85

约瑟夫·魏德迈（希尔德舍）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⁷¹

1846年4月30日

1846年4月30日于希尔德舍

亲爱的马克思：

我至今还在枉费心机地盼望你的来信，照例我该收到了。很遗憾，我在同迈耶尔会面之前很需要这封信。你已在正式函件中看到，这里的情况简直糟透了；不过我相信一切都会井然有序的。因此，请你把尚未寄来的手稿^②尽快寄来，不管怎样，最好由我们把它送到目的地去。〔……〕

① 这篇投道的结尾部分没有保存下来。

② 指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

我觉得我在上封信^①中有点冤枉丹尼尔斯了；关于缴纳会费的事他已同那些人谈过了。此外，他能否满腔热忱地干这件事，我有些怀疑，因为他对那些人的冷漠感到厌恶，对其他狭隘的警察式的和中世纪的关系感到恼怒。你说什么批判“施蒂纳”是多余的这样一种观点，我在另一些人那里也领教过了，尤其是毕尔格尔斯，我同他为此进行了长期的争论。相反，我觉得这种批判的必要性比以前更显而易见了。那种观念在那些人的头脑中，特别在共产主义者本身的头脑中还是根深蒂固的；这种荒谬的想法虽然不像施蒂纳的思想表现得那么明显，但在一些具有现实内容的著作中也不乏范畴学和结构学，在这些著作中真实思想是比较容易掩盖和伪装的。唯一者，即你的唯一者^②的绝大部分，我和路易莎^③都已看过了，她很喜欢。此外，整个改写的部分可以说是写得最出色的。

魏特林为《威斯特伐利亚汽船》写的文章简直拙劣不堪，关于爱尔兰问题的论述，他全利用了报纸的报道，除此之外，他在上述文章中还用了可能是从某个旧书商那里搞到的古代英国的消遣作品中的摘录，同时他以通常的诙谐方式攻击我们的现状，这样的段落不下100处。我立即把我的看法告诉了吕宁，现在我已知道，我的多半看法他是不会接受的。我想再去同他谈谈，可至今一直没有机会；但《汽船》眼下将是我们唯一可以利用的月刊，我

① 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

② 魏德迈从布鲁塞尔带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手稿，这里指的是该书批判麦克斯·施蒂纳及其主要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第3章《圣·麦克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7—529页）。

③ 路易莎·吕宁。

们无论如何要设法完全掌握它。如果不成，我们往后就必须创办一个新月刊。请你马上告诉我，你现在的经济状况怎样，或者更确切地说，你需要多少钱。出版社的事虽然还没有眉目，但迈耶尔仍然要求预支必要款项。你务必要把国民经济学尽快搞完；实际上，对这些人不必作任何说明，他们很想读一些关于共产主义的货真价实的东西，因为他们已经不满足于一般的空话，不相信具有一般的文化知识就能读懂关于共产主义的东西。《德法年鉴》（如果还能弄到的话）和《神圣家族》实际上已经透彻地阐明了这个问题。我在这里暂时还干不了什么，而且，我还要到几个地方去走走，在此之前，看来是干不成什么事情了。除了翻译，我很想写一本关于普鲁士现状，特别是财政现状的迎合资产者的小册子。^①因此，你尽快给我搞一些论述这个问题的英国书籍，此外，给我提供一些你所熟悉的资料。[……]

祝你安好，立候回复。

你的

约·魏·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F.1, op.1, Nr.5533

节录

第一次发表

^① 魏德迈曾在《威斯特伐利亚汽船》（1847年4月号第189—196页）上发表《普鲁士的财政》一文。

正义者同盟一领导成员（伦敦）给海尔曼·克利盖（纽约）的信^①

1846年5月1日

5月1日于伦敦

亲爱的兄弟：

我们从《人民代言者报》上看到，我们的运动在美国也有了蓬勃发展，我们完全同意你们提出的措施。祝你们的活动取得卓越的成绩，并希望你们无所畏惧地走自己已经选定的道路。尤其是关于工人的文章向我们表明，还并不是所有人都已堕落成粗鄙庸俗的财迷，并不是所有人都已变成锱铢必较的美国佬。自从你离开我们以来，我们已取得了很大成就，教育协会会员总数已达180人之多；在纪念我们的协会成立五周年之际，我们举行了一次晚宴^②，有300多人参加。主席用英语、德语和法语宣布晚宴开始，他说，5年前的2月7日，协会成立时，只有7个人，他们向自己提出这样伟大的任务，要在我们工人中传播文化知识，那时我们首先必须同其他协会的嫉妒，同各行业之间的成见，同一切可能遇到的障碍、困难和一般偏见作斗争；尽管如

① 作者可能是卡尔·沙佩尔。克利盖将该信作为一篇通讯摘要发表在他出版的《人民代言者报》上，并冠以《一个工人的私人信件摘抄》这样一个标题。

② 参看文件77。

此，我们迄今的活动已取得了出色的成绩，现在我们已经拥有140名会员，我们不仅关心大家的科学文化知识，而且还开展喜闻乐见的文娱活动。为了提高科学文化知识水平，我们每星期天交替安排一次关于地理、天文和基础化学的讲座，星期二讨论财产公有制，星期三上语言课（学习英语）和绘画课；我们还有一个图书室，有500多册图书，其中有法文、英文和德文图书。我们在星期四安排音乐课，星期五安排舞蹈课，以加强文娱活动；星期六是晚会，我们自己备有钢琴。每个会员每周只要缴纳5先令就可以享受所有这些好处，如果会员生病，每周只需缴纳3便士的区区费用就够了。由此可见，联合起来的力量是威力无比的。还有许多人在晚会上用法语、英语、德语发表演说，其中有鞋匠亨·鲍威尔，他在演说结束时朗诵了一首他专为这次晚会作的诗^①；2时正，大家搬开桌椅，开始跳舞，一直跳到第二天凌晨。

波兰起义的最新消息一传到这里，我们马上于星期六在我们的协会里组织捐款，当场就捐到了1英镑10先令；星期天、星期一和星期二又分别在各个班组织捐款，在作出其他决议以前，我们把捐款交给了这里的《北极星报》。我们在“王冠和铁锚”旅馆同英国人联合举行了一次集会，与会者有两三千人。关于这次集会的详细情况，你可能已在《北极星报》上看到了。^②现在，我们还每周定期同英国人在我们协会里聚会讨论，星期一晚上7—9时半则在法国协会^③里进行讨论。

① 鲍威尔的这首题为《献给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成立纪念口》的诗和此信都发表在同一号《人民代言者报》上。

② 参看文件71。

③ 指法国民主协会；参看文件40。

我们在这里对世界主义协会^①寄予厚望，首批宪章派，特别是《北极星报》编辑哈尼，已经完全倾向共产主义，并公开为它辩护；宪章派的主要领导人^②虽然很难转向我们，但我们只要同他和平共处，不去干扰他，他就能做我们要求他做的一切事情。

由我们发起、由英国人召集的“王冠和铁锚”旅馆的大会，虽然在形式上也给一些议会议员发了请柬，但只有工人参加。这些自由派金融家考虑到，在波兰革命中没有谷物、棉花等等生意可做，因此他们不愿赏光。但是，他们完全理解，波兰人的请愿已威胁到他们的钱袋和地产。于是他们小心翼翼地龟缩在自己的洞穴里不敢出来，因此，在英国这里，除了我们协会外，根本没有办法认购公债。在这样一个历史上也许不会再出现的大好时刻，居然哪里也没有举行类似法国那样（声援波兰）的示威游行，简直太令人惋惜了。欧洲和美洲的全体人民，我真想说半个世界的人民都在同情波兰，虽然目前还只有在匈牙利、西里西亚、意大利等等掀起了一些人民运动。而这样一来就可能导致一场斗争，一场同王权、钱袋和偏见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现在，这场斗争并没有结束，而只是延期而已，因此，我们寄希望于未来！等等。

1846年5月30日《人民代言者报》（纽约）第22号

① 指民主派兄弟协会。

② 指菲格斯·奥康纳尔。

89

约瑟夫·魏德迈（希尔德舍）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

1846年5月14日

1846年5月14日于希尔德舍

亲爱的马克思：

有关出版社的问题^①，日果将会通知你的。我希望这件事很快就能办妥。[……]我在迈耶尔那里只呆了几天，不过我最近还要去。我把你们手稿中的《政治自由主义》^②读给他听了，他感到很满意。总的说来，我们深感遗憾的是，你们又介入了这样一场争论；这里的人，就连那些相当能干的人也确实对一切稍有名声的人，如鲍威尔兄弟、施蒂纳、卢格表示同情，同时对他们又有极不舒服的感觉。这些家伙都明哲保身，唯恐棍棒打到他们自己头上；如果这种防范措施失灵，他们就对执行者摆出一副怒不可遏、咄咄逼人的面孔。为此，前几天，我在一次乡村远足中，同好些人，其中包括雷姆佩尔进行了相当激烈的争论，首先涉及的是上面提到的那三个权威。不过攻击首先应当坚持纯学术性的，完全心平气和的，就像讲台上的老师，绝不能对学生讽刺

① 参看注76和79。

② 这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针对施蒂纳的那部分的小标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11—224页）。

带挖苦，因为讥笑一个写了20个印张的书的人，简直就是一种犯罪行为，而这种犯罪行为按照叛逆罪首先是应受惩罚的。我确实感到由衷的高兴，你们的批判将在德国各地引起令人不满的大叫大嚷。真的，如果有朝一日要我写一篇批判文章，我就要尽可能地使用恶言恶语，借以激怒我亲爱的同胞们。他们那非常脆弱的神经需要强烈的刺激，才能最终抛掉他们那过分的敏感。糟糕的是，我们这里的党派斗争至今只是文字斗争，还没有形成党派热，或者只有很少几个人有这种党派热，因此，对这些人再体谅也无济于事。最敏感的一点就是人格，即使只攻击一个著作家在他发表的著作中所表现的人格，那也是极大的不公平；但是，如果连他的私人关系也在攻击之列（而且情况的确如此，因为私人关系很能说明一个人在公开场合的特征），那简直是活见鬼。就连迈耶尔这样一个平时从不注意这类琐事的人（他是我在这里认识的所有共产主义者中最能干的人），也不会忘记，海涅曾那样无情地揭露过白尔尼同女人的关系。〔……〕

有机会请给我寄几份克利盖的《人民代言者报》，这里的人喜欢读它，而我的几份肯定遗忘在科伦了。〔……〕

祝你安好，永远爱你的

约·魏德迈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F.1, op.1, Nr.187

节录

第一次发表^①

^① 弗兰茨·梅林曾把该信摘要发表在《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遗著（1841—1850年）》1920年斯图加特（第3）版第364—365页。

90

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
的信

1846年5月15日

1846年5月15日于巴黎

忠实的朋友：

你的信我已收到，你的朋友巴维尔·安年柯夫带着介绍信也已到了。我答复如下：

你写的有关魏特林的事，我并不感到十分意外。可惜事情这样发生了，但我早已预料到。对魏特林该怎么办，我不知道。他的外来语词典是动人的。看是否很快会出更好的，这是大家都在谈论的话题。但是，如果你们能够阻止出版他写的荒谬的东西^①，那就请吧。他在德国工人中不再有那么大的威望了。特别是在细木工（这里干脆把他们只叫做乡下来的小伙计）当中，他们十个月来在嘲笑这位独裁者以及其他独裁者候选人和准候选人。请注意，亲爱的朋友，现在我不得不再向你说不一遍，关于你对格律恩的恼怒和怨恨，我不敢苟同，原因之一，我不知道你们私人间有什么纠葛；原因之二，我是根据他在这里的细木工（他们应感激他）中的功绩客观地评价他的影响的。^②朋友，如果你认为我

^① 指威·魏特林《普通的逻辑和语法及人类通用语言的基本特点》。

^② 关于格律恩在巴黎的德国工人中的恶劣影响和艾韦贝克所受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观点的影响，参看文件120和128。

的看法有些牵强，——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如果你对我的看法毫不介意，那我反而会感到惊讶——那么，我恳求你，19世纪的亚里士多德（我一直是这么称呼你的，而且现在和将来仍然要这么称呼你），甚至以你所说的我们所追求的目标——幸福和人类的名义恳求你不要误认为我是在为格律恩评功摆好。你也许会笑话我“人情味太浓”，闲话少说，反正我不太看重这一点。我对你不止说过一次，自从去年冬天开始在细木工和制革工人中间开展的出色的宣传工作是我和他的唇舌之功，在这种时候，我宁愿让人说我是人情味太浓的人，也不愿让人称呼我别的。在文字宣传方面，我们主要是使用你们知道的著作，我们作出“通俗的”解释，也就是说，去说服别人！是的，我们是在说服别人，你不要笑话。长话短说，你我都讨厌罗唆。我们的手工业者当时干了一些该诅咒的事。请你细细听，格律恩在这里可至今没有干出有损宣传的事。他说得好，他对宣传工作简直着了迷。他主要是在大学生中间开展工作，由于警察和地方当局阻止在巴黎搞宣传，所以大学生们三四个月才得以在学生会上见我一次，他们自己一周聚会一次，脱了鞋安安心心地讨论问题，如：**在人性的社会里或人性化的社会里还存在法律吗？否，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是唯一的劳动法律。**第二个问题他们讨论了三次，其中一次唱了歌，并朗诵了卡尔·贝克的《穷人之歌》中的某些段落，等等。格律恩带这些大学生中的优秀分子去参观罗浮宫不下20次，给他们作关于艺术的演讲。你也许会感到可笑，可我敢向你证明他们在人道主义世界观、人生观方面取得的进步。这些小伙子都纷纷回到家乡去搞宣传，而新的一批又来了，我每周给他们讲授自然、历史和地理；同他们一起朗诵挑选出来的诗歌，这样做并非为了

教育他们（这样做不行），而是为了尽可能地填补他们那永不满足的欲望。这一点我成功了。现在我们规定每星期天晚上不顾警方禁令公开讨论四个问题。铁匠、裁缝、制革工和细木工在这个大城市里组成四个所谓的行省，它们定期相互拜访和作客。难道这样做不好吗？这样比较好，真的，我很清楚。但是，不吉利的刀叉共产主义的影响正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而人类自由的、国民经济学、美学的人生观正在日益扩大影响。你向你派到我们这里来的那位好样的俄国人描绘德国工人时，简直把他们描绘得太可怜了！！！应当注意，德国人不可能有政治上开展的法国人和英国人可能有的那种共产主义，因为他们已远离政治300年了；但他们很努力，正在批判魏特林，正在摆脱那种“仇恨学者”的阴暗心理，这是有书面的、口头的，甚至是实际的证据的。格律恩的歌德^①，我已经读过了，虽然我也应当（注意）像你的来信中那样，对它进行批评，但我还是要说，这本书还是不错的。你指出的那些错误，我也认为是中肯的。我想的首先是不受拘束。如果这是一个不恰当的证明，那可以批判，不管这种批判是长矛，是投枪还是大刀都无所谓。这无须多说；如果我有著作出版，我甚至希望得到最严厉最苛刻的批判，而且毫无顾虑。但是请你三思，旧社会各个阶层一定会被腐蚀，因而一定要使用各种防腐剂。这就是我的观点，我历来的观点，而且是不可动摇的观点。[……]

马车夫^②在基尔十分愉快，那里比他担忧的要好多了；他对待工人（二三百）非常公平。柏林同样是工人的天下，他们从书

^① 卡尔·格律恩《从人的观点论歌德》1846年达姆施塔特版。

^② 格奥尔格·维贝尔。

商那里买到所有被查禁的著作。最近，拉福里想来看你，他是共产主义者，心情开朗，精力十分充沛，办事练达严肃，讲话锐利尖刻。你会喜欢他的。〔……〕

毕尔格尔斯在干什么？丹尼尔斯和恩格斯在干什么？代我向他们以及日果、你的内弟^①和沃尔弗，一句话，向那个出色的通告信^②的支持者问好，特别要代我向你的夫人问好，孩子们都好吗？

再见

艾韦·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F.20，op.1，Nr.8

节录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

91

罗兰特·丹尼尔斯和亨利希·毕尔格尔斯（科伦）给
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

1846年5月15日^③

亲爱的朋友们：

你们的来信和关于英国的有趣分析，我们已经收到了。我首先想谈谈我对你们准备发表我那封关于格律恩的信的看法，我担

① 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

② 可能指《反克利盖的通告》（文件38）。

③ 该信末尾注明的日期不易辨认，也可能是5月18日。

心信中有些不确切的地方会给格律恩提供为自己辩护的把柄，否则我绝不会反对以私人信件的名义发表的。在这封信的前面是否可以加个按语，说明格律恩观点中某些也许是错误的论述方式，正是他本人对歌德的处理方式^①的真实反映。此外，我再次请求你们，给我的文章署上同我名字相近的名字，这一点在你们看来也许是可笑的，但对于收入微薄的我来说却是必要的。〔……〕

预言家赫斯现在在这里。看来他的处境确实不妙。在斐维，他感到厌烦。《社会明镜》也不景气，他正在为它寻找一条新的出路。特别使他感到不安的似乎是准备同你们分道扬镳。〔……〕他硬是弄不明白，你们为何要同他闹翻。他对资产者^②说明了他离开布鲁塞尔的动机。他说，他在理论方面同你们是一致的，可是，他不能同意你们当时对魏特林的态度，但他并不认为魏特林是对的。还说他本人对魏特林从来不抱任何幻想，但认为，马克思对他未免太偏激了，如此等等。关于这件事，我们从你们那里，以及通过租佃者^③了解得更清楚了。^④鉴于赫斯目前的处境不利，我们敦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不让他参与计划中的翻译工作。他曾经向资产者透露过，如果他的一切都成了泡影，那么他等双亲谢世后，就要去得克萨斯。

不久以前，《特利尔日报》的所有者收到了厚厚的一叠文

① 指卡·格律恩《从人的观点论歌德》1846年达姆施塔特版。参看恩格斯《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第二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44—275页）。

② 亨利希·毕尔格尔斯。

③ 约瑟夫·魏德迈。

④ 这句话是后加的。

件，题目是《**检察官关于警告〈特利尔日报〉的动议**》，该报必须在四周内向高等稽查法庭对此提出辩护。〔……〕

十此外，政府目前似乎还没有对报刊社会主义者采取严厉的措施。它正在利用他们的一般的，当然是一些不能说明回击资产阶级进攻的实际情况的空话，比如，政府在自己的报刊上称赞布尔是一个前途无量的社会主义者；说他只是没有克服否定的观点，不过他不久便将认识到建立一个强盛王国的必要性。在一般问题上兜圈子仍然是德国社会主义者的显著特征，他们研究国民经济学同法国人研究德国哲学如出一辙，而现在亟待解决的问题是，让马克思立即向他们阐明通过实际研究关心实际社会状况的必要性。思维方式的普遍性也已经在明白事理的人身上产生了作用；一方面，人们对我们的社会状况的虚幻只有一般的认识，而且对连结贫困社会的经济纽带也缺乏清醒的认识，这就导致了人们意志消沉，百无聊赖，甚至懒散成性；而另一方面，也缺乏来自外界的促使严于律己的动力。资产者^①正在静候宪法的制定。

从上面的十到这里，都是资产者的苛求，我不敢苟同。只是对百无聊赖这一点，我是完全赞同的。这是当前的一种传染病，至少是一种接触性传染病。这也许是在期待着一场等待已久的灾难？（资产者^①不满意这种自然哲学的观点，倒认为这是良心的谴责。）不管他怎么认为，事实毕竟是事实。这种百无聊赖正在日益蔓延，正在波及各个等级，各个地区。已讨论了很久的制宪一事肯定不会带来任何结果。根据我的看法，资产阶级本身不会因此而活跃起来。资产者^①认为，资产阶级必然像土耳其人一样，

^① 亨利希·毕尔格尔斯。

在战争中遭到人民的讨伐。但是，目前我们这里还不存在参与讨论社会问题的人民。因此，关于宣传的事，目前还难以想象。所以，没有行动的声明以及由于缺乏令人满意的实际活动而产生百无聊赖，对我们来说，也是难以想象的。总之，我们不该对当前的流行病感到不满，因为它无疑是我们的同路人，同时，如上所述，它又是对我们整个状况感到厌恶和表示下意识不满的一种预兆。下次再详谈。你们的善良的

制皂工人

1846年5月15日于科伦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F.20，Nr. 2

节录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

92

古斯塔夫·阿道夫·克特根（爱北斐特）的通告⁷²

1846年5月24日

我们德国共产主义者为了灌输、宣传和运用我们的思想，迫切希望建立强有力的联系，并通过巧妙地应付当前的各种情况，就能顺利达到这个目的。可是，这样的联系至今尚未建立起来。作为勤奋的思想工作的成果或作为由于从内心同情普遍贫困而产生的某种需要，我们所追求的既合理又合法的共有共享制，将从我们的社会内部脱颖而出，这是历史的必然性，我们应该采取联合而明智的行动，教育和感化那些麻木不仁或愤世嫉俗的不幸者，教

育和感化那些愚蠢而胆怯的冒险者，以便缩短可能无法避免的可怕的苦难和斗争，为后代人创造一种更美好的生活。

当然，我们还不能像所希望的那样，进行教育和活动；但我们已能满意地证明，许多善意的事是可以做到的；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对一切神圣化的胡说和褻渎来说虽然是大逆不道的，但在酒馆饭店里却未被禁止；《社会明镜》和《威斯特伐利亚汽船》在当局的同意下正在日益勇敢地宣传共产主义，因为当政者不敢再用极其粗暴的手段对宣传严肃的思想和令人喜欢的观点进行恶毒而放肆的报复。我们为宣传共产主义，也许可以找到更多的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手段，即连我们最隐蔽的敌人也不敢用武力来消灭的手段。迄今为止，用于宣传我们观点的最重要的手段是书籍，然而，共产主义书籍所起的作用还不够，因为那些可怜的愚昧者无钱购买而且也看不懂那些昂贵的书籍，而生活富裕的人又大多是自私自利者、敌对分子和鲁莽之辈。所以，我们必须尽力定期提供一定资金，保证那些撰写优秀的、便宜的、通俗易懂的书的作者们像样地生活；必须创办和资助杂志和读书会，宣传我们的观点；必须谨慎地与我们的志同道合者保持书面联系，以便加强、鼓励讨论一些重要问题；必须起草一个出色的专题报告，证明我们所作的努力既是合理的，也是合法的，要求掌权者以理智和仁爱的态度认真仔细地帮助受虐待者和不幸者摆脱苦难；提出明智的措施，让许多善良的人签名，向下届邦议会、普鲁士国王或联邦议会提出警告。我们虽然暂时不能指望立即“建成”共产主义，但我们期待撰写这种报告的勇气和诚意一定会产生良好的影响，通过各种讨论和争论来教育和鼓舞愚昧者和不幸者，有效地向政府和掌权者证明社会的观点和要求，

指出盲目敌视的危害性，并乐意提出适当的准备措施。

我们请求我们的志同道合者立即举行会谈，以便为取得我们事业的胜利，共同来验证这些措施和其他一些措施，并开展有力的、与我们信念的实质相适应的、真正有机的活动。为了让马克思和魏特林都能参加，我们希望在边界的某地举行会谈，这一点我们觉得很重要；我们认为赫斯所在的斐维是比较合适的会谈地点，并以第一批签名者的名义，期待尽快得到消息，以便消除某些可能出现的障碍，尽快确定日期和地点；同时希望有更多的志同道合者愿意参加会谈，致以兄弟般的爱。

代表乌培塔尔的一些共产主义者

古斯塔夫·阿道夫·克特根

1846年5月24日于爱北斐特

手稿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F.20，Nr.4

93

莫泽斯·赫斯（斐维）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
的信⁷³

1846年5月29日

1846年5月29日于斐维

亲爱的马克思：

刚才我收到了哥特沙克和他的朋友们，而不是勒尔根派^①从科伦寄给魏特林的一张汇票，现随信寄给你，请你转交给魏特林，因为我不知他是否还在那里。我想，即使他走了，你也可能知道他的地址，请你把这封信转交给他。

至于你在上次来信中使用的那些令人愤懑的语言，我决不会计较，因为我在给你的信中也说了一些偏激过火的话。你有权表示忿怒，恩格斯就没有这个权利，我的信根本不是给他的，而是向他的玛丽的“问候”。

此外，即使你是正确的，认为私人的贫困同党内的争论没有任何联系，但这两者足以使人对这个党的共同活动感到扫兴；尽管你对前者无能为力（因为你本人就吃够了贫困的苦头，而我与其说是由于我的私人贫困，倒不如说是由于你的私人贫困确实在**指责我们的党**），但你仍然有助于阻止后者，即党内的争论。你天生就“头脑清醒”，而我也许天生就是一个十足的“和事佬”。——“人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我们有空时，不妨“常常”给卢格和桑科写写信。

祝你幸福！同你个人之间，我还想保持密切的交往，但同你的党则根本不想再打交道了。〔……〕

你的 赫斯

手稿

节录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F. 1，op. 5，Nr. 101

^① 指以毕尔格尔斯、丹尼尔斯和德斯特尔等人为首的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科伦人，他们曾在啤酒厂主和酒店老板约翰·亚当·勒尔根家里聚会。

罗兰特·丹尼尔斯和亨利希·毕尔格尔斯（科伦）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①

约1846年5月底6月初

自从我们上次去信^②以后，一直没有收到你们的回信。在此期间，我们仅从拉福里先生那里了解到你们的一些情况，他从巴黎到布鲁塞尔旅行，在那里同载勒尔先生进行了交谈。马克思也许还记得拉福里这个人，他至少还记得马克思在唯一的一次谈话后就骂他是个傅立叶主义，他对此者感到伤心。因此，他现在已到耶拿任教去了。他从载勒尔那里带来了你们反对《人民代言者报》的决议的一个副本^③，可惜只有我们两人看过这个副本。因此，我们希望再给我们搞一个来，让这里的人都看一下。其他情况，拉福里一无所知。对于你们的协会，他避而不谈，据说是因为他不同意你们同格律恩之间发生的分歧。在这方面，他只看重人的关系，并说，艾韦贝克对党内的分歧也感到很恼火。但是，我们很快就说服了拉福里。艾韦贝克似乎仍然没有认识到揭露格律恩先生的真正原因和必要性；他甚至表现得过分知足，竟然竭力使拉

① 该信出自罗兰特·丹尼尔斯的手笔，亨利希·毕尔格尔斯可能参与了起草工作。

② 文件91。

③ 文件88。

福里确信，格律恩在巴黎短暂逗留期间在手工业者中间所产生的影响超过了她经过多年努力所产生的影响。好在事实并非如此。一位在这里作过短期停留的巴黎工人⁷⁴在向我们讲述格律恩先生的影响时却完全相反。他承认，格律恩对那些初次接触共产主义观点的人，对那些 [……] ^① 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他在讲述总的原则时善于投其所好，而年纪较大的人就不喜欢他了。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初学者也对他那一套老调子和许多内容贫乏的话感到索然无味了。年轻人喜欢找到某个对格律恩的看法同他们一致的人。在最近一段时间里，格律恩竟向工人们朗诵席勒的《玛丽亚·斯图亚特》。工人们似乎还通过艾韦贝克转告格律恩，说他们需要比较实惠的东西。而艾韦贝克“一向喜欢到处充当中介人的角色”，他总是用花言巧语安慰他们，让他们翘首以待，但总是毫无结果。总之，令人惋惜的是，至今还没有能使工人们比较深刻地认识社会状况。于是就出现了下面这种现象，只知道片言只语、自以为问题已经解决的那些人，实际上并不理解旧世界如何能维持这么长久，到后来，这些人由于产生了急躁情绪，因而或者感到灰心失望，或者要求进行革命（如魏特林朋友！）。但是，如果说工人们已经一眼就能看穿格律恩其人，并称他为空谈家，那么，这要归功于他们还没有理解艾韦贝克的那种人道的新宗教。我们通过拉福里搞到了第2期《未来报》，下面我们准备向你们转述其中最精采的段落。我们希望你们今后多关照他，告诉他我们对他的学说的看法，使他确信，我们对他本人并无恶感，向他转达我们的衷心问候。

^① 这个词辨认不清，可能是：新手、初学者。

艾韦贝克找到了社会主义者中间出现分歧的原因。他不愿长期为这种分歧感到惋惜，他以我们的时代就是批判的时代而聊以自慰，并因此把实践上的分歧变成理论上的分歧。他把批判变成了一种独立的东西，并以不着边际的空话来衡量批判在这个世界上的利和弊，而他又只承认利的一面。[……] ①

此外，来到这里的那个工人还保证说，艾韦贝克没有做任何有害的事，因为在这方面工人并没有留下丝毫印象。

鼻祖②到科伦来了，他想到他老头子的商行去工作。[……]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F.20，Nr.88

节录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

95

伦敦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③

1846年6月6日

1846年6月6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你的来信④以及你们的反克利盖的通告，我们已经及时收

① 接下去是一大段摘自《未来报》上发表的艾韦贝克的匿名文章中的引文，这段话统统是华而不实、模棱两可的空话。

② 莫泽斯·赫斯。

③ 该信从笔迹看无疑是沙佩尔起草的。

④ 该信没有保存下来。

到。我不能一人贸然地同你们通信，所以我邀集了这里几个最能干的共产主义者，向他们宣读了你的来信^①。并要他们谈了各自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同你们建立通讯联系，并竭尽全力支持你们的计划。建立一个总的宣传组织，在各国共产主义者中进行思想交流，是非常必要的，所以，每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都将乐于给以帮助。对我们来说，你们的来信很重要，也使我们格外高兴，因为你马上想到，我们从威·魏特林那里得到的消息必将激起我们的无比愤怒。他虽然说什么你们只考虑到工人的安全，而把他们排除在你们的协会之外^②，但是，在这里也产生了一种侮辱性现象，因为人们因此就会说，对工人什么也不能相信。但我们以为你们有意建立一个学者—贵族的协会，并从你们的新宝座上居高临下地统治人民。当你们来信时，我们已采取了预防措施，你们的来信使这些措施成了多余的东西。你们的来信太及时了，否则，在学者和工人之间本来快要消除的仇恨又会极其激烈地表现出来。这也许是威·魏特林的意图。

至于密谋计划，我们早已克服了这类愚蠢行为，到目前为止，密谋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而只对我们的敌人有利。我们高兴地看到，你们也持这种观点。诚然我们相信，一场严峻的革命是不会也不可能避免的，但是，试图按照魏特林的密谋和愚蠢宣言来进行革命，那是再可笑不过的了。现在业已开始的精神革命

① 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在伦敦建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建议，参看文件80。

② 关于这个错误观点，另见文件80、83

一结束，如果当权者不屈服，物质革命便将自行到来。我们的任务是教育人民，宣传财产共有共享；但愿你们也这样做，也就是说，让我们携手并肩，团结一致，为一个美好的未来而奋斗。

至于你们同威·魏特林的分裂，我们早已预料到这是不可避免的，尽管他的最初两封信还表现出非常兴奋。威·魏特林同任何人都格格不入，只有那些盲目服从他的命令、非他写的书不感兴趣的人是例外。这里发生的事情同你们那里发生的完全一样。起初，我们友好地接待了魏特林，六个星期以后，他便不信任我们了，接着便玩弄阴谋和进行诽谤；当他遭到失败时，竟认为所有的人都讨厌他，无一例外；于是他郁郁寡欢地引退，最终离开了这里。可惜，魏特林以为自己是绝顶聪明的人，这是千真万确的；他以为只有他才掌握真理，只有他才能拯救世界，而别人写的东西都是拙劣之作；因此，他不搞研究，也不要自己的信徒搞研究，只要他们满足于他的福音。在我们协会里，只要有人提出购买一本科学书籍，或要求听一次科学讲演，他总是表示反对；他说，大家主要应当悉心钻研共产主义，其他一切对工人都是无济于事的。在这里，我们也反对魏特林的那套可笑的交易小时体系⁷⁵和他的那种宗教胡说，但我们不能同他展开辩论；他不接受任何忠告，只要有人同他的意见不一致，他便大发雷霆，不过，他在这里也找到了自己的人；现在，我们已完全中断了同他通信，而且将来也不想再同他打交道。

下面我们准备简单地同你们谈谈本协会的情况和活动范围，至于详情以后再谈。目前，本协会约有250名会员，每周举行三次集会。每星期二是当前的政治问题报告和讨论，每隔一个星期二，我们逐章讨论费尔巴哈的未来宗教，中间的一个星期二则讨

员会员们提出的问题。^①我们最近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在共产主义国家中对青年进行教育的问题。^②在这方面，我们打算给所有会员们提供机会，就我们原则中他们觉得还不明确的每一个问题展开讨论，从而使他们自己弄清问题。星期六晚上是唱歌、音乐、朗诵和阅读报纸上的好文章；星期天举办有关古代史和近代史、地理、天文等等的报告会；此外，每隔一周讨论一次工人的当前状况以及他们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在古代史部分，最近一次报告谈到了莱喀古士的立法问题；关于近代史的报告则谈到了宗教改革及其结果。最近我们还讨论了现代社会中工人和师傅的关系问题以及他们的相互义务和权利。

每星期一法国协会讨论共产主义体系的日子，这里虽然还有共和主义的味道，但我们在这里也得到了启迪，并有机会向法国人介绍我们的思想。

我们每两周同英国人（民主派兄弟协会）聚会一次，可以说，这种聚会对我们双方都获益匪浅。哈尼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们大家都很喜欢他，尊敬他。他将会而且必将会成为英国一次新运动的奠基者。本协会约有130名德国人，40名斯堪的那维亚人，20名匈牙利人、波兰人、俄国人、意大利人、瑞士人、比利时人、法国人、英国人等等组成。

每星期三晚上是音乐课；每星期四是语言课和绘画课，星期五是舞蹈课。我们的图书室约有500册图书，此外，我们还有地球仪、天球仪、地图以及德文、法文、英文和斯堪的那维亚文报

① 参看文件64和注58、59。

② 参看文件84。

纸。我们同法国、瑞士、斯堪的那维亚、匈牙利、德国、美国等建立了联系，在这些国家里，有些人曾经是本协会的会员，目前，他们经常向我们报告在其所在地取得的成就。

在最近四周内，我们在伦敦倾注全力搞宣传鼓动，否则早就给你们写信了。我们的会议厅太小，所以，我们在霍尔博恩车站德罗利巷三间房租了一个大厅，租期为两年；这个大厅可以容纳300人，我们每周支付5先令租金，下星期二我们就准备搬迁。此外，我们作了不懈的努力，试图在住着数千名德国人的怀特湖泊^①建立一个立足点。我们终于获得了成功，上星期五我们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协会，作为本协会的分会，现在我们对它寄予厚望。这些男人和女人接受新学说的喜悦之情简直溢于言表。让我们奋勇前进吧！

关于书的事，请将你们认为合适的各种书籍都寄一点来，每种书先各寄一本。如果受欢迎，而且价钱也不贵，那么，我们就接收一些，设法卖出去。瑞士人和巴黎人至今还在拿我们卖不出去的一批书纠缠我们（其中有125本是库尔曼-耶稣的《新世界》）^②，所以我们不得不谨慎从事。

最后，我们还要请你们把你们的计划详细告诉我们。你们虽然说过你们打算干什么事，但没有说打算怎么干，你准备吸收什么人参加，以及通过什么方法使他们和衷共济。在这里，我们竭尽全力支持波兰革命^③，因为我们认为，有朝一日发生了什么事

① 位于伦敦东区，是伦敦工人最集中的地方。

② 参看卷52。

③ 参看文件79。

情，人们就不该往后退缩，而是应该提供帮助；在这种时刻退缩的人，多半是貌似聪明，实际上则胆小如鼠。

祝你们安好，请立即写信给卡尔·沙佩尔、罗森塔尔、约·德珀尔、哥贝尔、亨·鲍威尔、施廷、阿·列曼、格·凯尔特伯恩、约·莫尔。

巴门的威·奥特贝格来过这里；我们都很喜欢他。这个人同工人很合得来，比他们的哲学家要强。^①

又及：你们对克利盖是不是太严厉了，除了你们的通告，友好的警告是不是不再起作用了？！我们私下也给他写过信，提醒他正视自己的错误。克利盖还年轻，还能学习。

手稿

第一次全文发表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F.20，Nr.83

97

罗兰特·丹尼尔斯（科伦）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

1846年6月24日

1846年6月24日于科伦

亲爱的马克思：

公民云格^②（在巴黎的科伦工人，是一位想象力极其丰富的

① 这段和下面一段是写在信纸边上的。

② 在原件上是“云根”；关于云格，参看注74。

年轻人)准备给你带去这封短信。威斯特华伦(他正在为接受他申请到的职务而前往莱比锡的旅途中,或者说是 在见习旅途中)同我讲了关于你想在这里借款的打算。很遗憾,我对这件事实在无能为力。在我的所有具备外借能力的熟人中,我只能向唯一的一个人开口。我跟他讲了,结果也等于零。毕尔格尔斯已给你写了信,也许已向你介绍了云格,这是我同意的。云格是我在巴黎结识的所有人中最能干的一个。我的信就写到这里。你知道有关威斯特伐利亚的情况吗?我觉得,威斯特伐利亚的那帮老爷简直是一群蠢驴。

向你的夫人和其他熟人问好。

你的

丹尼尔斯

手稿

第一次发表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 F.1, op.5, Nr.109

98

亨利希·楚劳夫(爱北斐特)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布鲁塞尔)的信

1846年6月28日

1846年6月28日于爱北斐特

亲爱的恩格斯:

施纳克已把你的信交给我了。今后你给我的信,请封好后寄

给这里的卡尔·奥古斯特·济贝尔，在我们取消这一条约定以前，这样做比较稳妥。对你的上一封来信和魏德迈从布鲁塞尔的来信，我想不用回复了，你们在信中也并没有明确要求回复。此外，我由于诸事缠身，不能遵嘱到比利时去旅行了，哪怕去几天也不行。前不久，赫斯来过，是住在我家里的，但他基本上是不信任我的，对你则更无信任可言。

我希望得知魏德迈的详细情况，这是他在匆匆去威斯特伐利亚途中同我短暂会面时答应了的，当我们分别的时候，他只对我作了一些暗示性的解释，因为他在奥特贝格家吃完午饭后，就同施纳克一道起程了，在吃饭的时候没有谈到什么特别事情。总的说来，最近我们的事都是从那开始秘密处理的，以致人们只要偶尔听到一鳞半爪消息就会感到庆幸。我从奥特贝格家回来后，还始终没有弄清你们早已打算同魏特林分裂的原因，特别是你们同赫斯分裂的原因，对此我已大倒胃口。舒尔茨也曾向我们谈过这个问题以及你们打算修改对待德国共产主义者的原则问题。你们竟生我们的气，认为我们没有从这里反对克利盖的《人民代言者报》；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也很简单：我们是在奥特贝格从伦敦沙佩尔那里带回这份报纸以后才知道它的；现在我们当然同意你们的反克利盖的通告^①，可是在当时，在德国很难搞到这份报纸，因此几乎没有人读过它；当初我们之所以认为你们发表这么一个通告对于你们进行广泛讨论来说是不必要的，那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有这样一份报纸，更何况我们以为你们肯定会支持这份报纸。另一方面，你们认为我们组成集团，而不公开表示反对立场。这种情况在有的地方可能是存在的，但肯定不是普遍现

^① 文件88。

象；我们完全明白古斯塔夫·阿道夫·克特根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区别。克特根大约在两周前起草了一个可怜的通告^①，它首先提出，在斐维召开一次这里的和威斯特伐利亚的共产主义者大会；以便使流亡者马克思和魏特林都能参加；它同时呼吁每年定期捐款，用以救济急需用钱的共产主义的著作家和传播这些思想。这个通告实在可怜，我觉得古斯塔夫·阿道夫·克特根的大脑似乎不正常。我当然断然拒绝在通告上签名，因为我不明白这个蹩脚的通告究竟有何用处，按这个通告办倒是更适合于把我们卷进警察当局的调查中去。更有甚者，他还公开表示，他要请我们的模范共产主义者和合法的进步派先生们捐款。他完全忘了布兰克兄弟在为赫斯募捐的时候好不容易才捐到微不足道的几个钱，我把钱还给了他们；黑克尔也完全以同情的目光藐视他的通告，把通告还给他而没有捐一分钱。克特根还把通告寄给了吕宁和迈耶尔，但他们两人却不知道对这种不得体的行为应当说些什么。他在这里也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我记得他去过奥特贝格那里，但后者也表示反对；诺伊豪斯也不同意。诗人舒尔茨虽然在通告上签了名，但第二天就立即提出请求，希望把他的名字去掉，因为他对自己的私人讲话感到意外，并且当时他不想给他以否定的回答。因此，这个蹩脚透顶的通告将成为一纸空文；他的“自我”虽然低声下气，但他并没有获得成功：他的利己主义是天生的，根深蒂固的。但是，总的说来，我们在这里并没有开展令人瞩目的活动，对此，你大可不必感到奇怪。我们的情况和能耐，你不是不知道，你将会赞同我的意见：在把理论搞得相当混乱之后，我们

① 文件92。

的事业就已进入一个使我们的活动越来越没有成效的阶段。我们财力有限，即使同其他人合作也无力创办一家秘密报纸，当然准备工作在我看来绝不会带来比我们的鬼精灵所想象的那么危险。魏德迈上星期给我写了几封信，我不得已回信对他说，我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已作了巨大努力，现在需要休息一段时间。由于迄今为止共产主义人士四分五裂，大伤元气，以致我们这里的协会暂时还不可能有什么大的作为。施纳克把他从《社会明镜》拿到的稿酬花去了一半，但是还不够，我又借给他22.75塔勒，借期为两周，而至今已三个月过去了。过了三个月，他更还不起这笔钱了；这样，我的计划全都落了空。不过，诉这么多的苦有什么用呢！前几天，皮特曼寄给我一份为他的杂志《普罗米修斯》认股的广告，叫我在这里为他兜售股票，但我想暂时放一放，如果我们能恢复一些元气，我更愿意为我们共同的真正的目的募捐。

致以衷心的问候

你的

海因茨

第一次发表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F.1, op.5, Nr.111

99

约瑟夫·魏德迈（贝克罗德）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⁷⁶

1846年6月28日

1846年6月28日于鄂斯纳布鲁克
附近的贝克罗德

亲爱的马克思：

〔……〕我把反克利盖的通告^①一事搞错了，我以为你们要把通告寄给克利盖，让他在他的杂志上发表，是为了让公众看的。也就是说，他很可能不会发表，我想，然后你们准备在另一家美国报纸上发表。显而易见，现在《威斯特伐利亚汽船》也不会刊登这个通告，但它会刊登其中的一大部分，而读者又不知道这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这样就不会有什么害处。⁷⁷克利盖在这里是很有名气的，而且他的同伙也几乎都是这个地方的人，他们给这里写的信，在描述他们那巨大影响时无一不是令人厌恶的夸夸其谈，因此，读者如能详细了解关于他们活动的某些情况，无疑是件大好事。《社会明镜》上，我们没有看到有关这方面的文章。第10期刊登了一篇极可悲的批判《人民代言者报》的文章^②，下一期还没有出版，至少我们还没有收到。你如果认为我上封信

^① 文件88。

^② 指赫斯出版的《社会明镜》1846年第10期第55—56页《消息和札记》专栏刊登的一篇歪曲评论《人民代言者报》前三号的文章。

中的那句话的意思是说赫斯发表了一篇东西，那你是误解了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第10期上的第一篇文章^①很好地利用了反克利盖的通告中的部分内容。

我确实不知道，格律恩散布的流言蜚语，至少在同你关系比较密切的人中间还能有多大影响。这里的大门对他们是完全封闭的。艾韦贝克的近况如何？他倾向于哪一方面？[……]

你如能再给我寄几份反克利盖的通告（我只发给可靠的人）我将非常高兴。[……]

祝你安好。代我向你夫人致以衷心的问候，请立即回信。

你的 魏德迈

迈耶尔也向你问好。

请把附信转交给沃尔弗。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F.1，OP.1，Nr.192

节录

第一次发表

100

弗里德里希·门特尔（柏林）给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贝伦兹（马格德堡）的信^②

1846年6月29日

1846年6月29日于柏林

① 弗·维达尔《法国的社会主义者》。

② 关于门特尔与正义者同盟马格德堡支部的关系，关于该信的送交者，参看注64。

亲爱的朋友贝伦兹：

我趁此机会告诉您有关柏林的一些近况。

这封信的送交者对手工业者联合会的情况非常熟悉，他能向您谈很多有关这个联合会的详情。

他还将向您讲述我迄今为全人类的幸福而进行的活动以及我的其他种种情况。

因此，我不必给你写得太多。

祝您安好！

您的朋友

克·弗·门特尔

又及：我每天在等待科尼斯堡的霍夫曼的回信，他在上次来信中曾问您好。

维尔穆特和施梯伯《19世纪共产主义者的
阴谋》1853年柏林版第1卷第37—38页

101

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
的信

1846年6月30日

1846年6月30日于巴黎

亲爱的朋友：

云格刚好到我这里来，这太好了。我对弗里茨^①的到来也甚感

①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欣慰。我现在已把我的住处——奥德翁街33号告诉他，他可以到那里去跟我谈谈，但是，只有在紧急情况下，写信才能使用这个地址，如果信在路上多走几天也没关系，那就按下列通讯处写信：小草坪街，哈森托伊费尔先生寓所，恩斯特·哈尔蒂先生收。

我们现在才听说威·魏特林已经走了：现在，我们只好悄悄把上个星期给他写的信烧掉，因为你可能也不清楚他的确切地址。

[……]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20，Nr.6

节录

第一次发表

102

罗兰特·丹尼尔斯（科伦）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

1846年7月初^①

亲爱的马克思：

^① 关于这封信所注明的日期有下列根据：这封信是丹尼尔斯在1846年6月24日给马克思的信（文件97）以后写成的，它谈的是云格1846年6月30日回到巴黎一事。丹尼尔斯在1846年7月17日给马克思的下一封信（文件107）中说，他收到了马克思7月15日的信，也许马克思当时还没有收到上面说的那封信。

通过维尔特^①，我们知道了关于你的点滴消息，还有关于恩格斯及其妻子的一些我们颇感兴趣的^②消息。我们迫切地在等待你的回信，简直望眼欲穿。巴黎的情况变得越来越有利了，也就是说，我们对云格寄予很大希望。你难道一点没有听说吗？两卷集的出版情况怎样？你自己的著作进展如何？等等。〔……〕

巴黎的艾韦贝克给这里的赫斯写了一封信，从信中可以看出，他要同格律恩决裂。而格律恩似乎同皮特曼建立了联系。随信附上关于这个人的新近一套设想的一份说明。如果现在《社会辩论报》工作，我们对此非常高兴。他的外交才能将使他轻而易举地把该报的主要领导权抓到手。

致以亲切的问候，盼即回信。

丹^②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F.1, op.5, Nr.110

节录

第一次发表

① 丹尼尔森的这封回信也是通过维尔特带到布鲁塞尔去的。

② 落款只有一个字母D。

一位社会主义者（布雷斯劳）给威廉·沃尔弗（布鲁塞尔）的信^①

约1846年7月

[……]我没有把这里的情况告诉你，请你不要因此而责怪我们，同时，我想谈谈你的来信的最主要内容，谈谈把共产主义者组织成为政党的问题，谈谈读书会和讨论会的建立；建立这种读书会和讨论会不仅是为了宣传，而且可以把它们当作道德法庭，用来首先是检验协会会员；如果他们的信念和信仰经不起检验，就向协会中的纯洁共产主义者控告他们，然后再像你向我们控告卡尔·格律恩那样，通过通讯的方式向其他协会控告他们。我也为格律恩募了捐，并付了款，而且今天我还准备为他募捐和付款，尽管募捐是一件讨人嫌的差使，尽管除了其他开支以外，就我目前的收入而言，也很难付款。

首先请允许我把你关于团体的价值和作用、关于党的联系的价值和作用等等的观点，同我的观点作一比较，以便秘密地达到规定的目的。在我看来，在任何自然的或人为的机构中活动的生命必然发生作用，因此它的目标是，一旦发生它拥有力量加以克服的冲突，就吸收或消灭一切在机构以外的生命。[……]人类

^① 这是给威廉·沃尔弗的一封信，沃尔弗的信没有保存下来，沃尔弗在给他的西里西亚的朋友的信中呼吁他们建立通讯委员会。

的历史也是如此，也就是说，尽管存在各种团体，但人们不仅创造它们，而且还要给它们以生命。不可否认，各种团体，正如它们所打算的那样，将始终对生命的力量产生一些影响，但不是你所期待的那么大的影响。

你可能看到，虽然密谋活动或多或少有它的好处，但我们也不能对它带来的坏处视而不见。亲爱的朋友，你也许会向我承认，秘密团体就是为了把文化人，即组织的核心，拱手交给它秘密与之作斗争的敌人，因为经验告诉我们，这类团体的活动除了其生存外是比较有保障的。秘密活动总会被发现，而频繁的通信联系，又是秘密活动不可避免地被发现的原因。〔……〕

然而，这对普鲁士，对布雷斯劳来说尤为困难，你在比利时和英国逗留期间，似乎已把德国及其各邦完全置之脑后。在这些邦里，连九柱戏球道社都在警察的监视之下。请你回忆一下各种团体遭到的厄运，它们在这里竟都落了个共产主义的名声。有一个团体，它的存在是经警察当局同意的，尽管如此，它仅仅存在了半年之久；还有一个团体，即没有任何章程的读书会和讨论会，警察当局还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它就自行解体了，它本来不必担心有任何危险，因为不可能提出真正构成犯罪的事实即组织机构来对付它。在目前的条件下，我看最好应慎重地考虑一下人们所做的事情，不要再让共产主义去欢庆这种胜利，因为这里，甚至连佩带蓝色鹰徽的客人们，对共产主义的兴趣都已相当淡薄。〔……〕

此外，在筹集资金方面还存在不可忽视的困难，因为正如你所确信的，我们只能从几个经济上很不富裕的朋友那里弄到资金，而且，至少在开始时只能指望数目很小的定期捐款，而这

些捐款的总数无论如何都不足以填补巨大的开支。因为按照制定的计划，不可否认，费用是不小的；而且，团体的数目越增加，经常有新的协会同它们建立联系，这种费用也必将越巨大。只有不断扩大资金来源才是行之有效的办法，因为如上所述，现在我们仅仅指望多半在经济上不富裕的参加者捐款，能不能正常支付主要取决于捐款的多寡。

你也许能迅速排除一切障碍，我承认，我以我的力量和见解只能缓慢地达到这个目的。只要有一些人相互间保持交往和联系，就是很大的胜利。因此，在这里，共产主义完全是一个幽灵，不过只对敌人而言，按照密谋活动的计划，它也只能是幽灵。但是，我并没有发现这样做有什么不好。这样一个幽灵是十分令人厌恶的敌人，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这种东西在它作为巨大形象精力充沛地从黑暗走向光明以前，越不被人看清，危险性也就越小。

你现在已了解我的观点，在此以前，你的两位朋友也同意我的观点，我等待你对我的话进一步发表意见。我和你所有的朋友向你表示衷心的问候，祝你的状况得到尽可能大的改善。

祝你安好！

你的朋友

B1

[……]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F.20，op.1，Nr.87

节录

第一次发表

104

格奥尔格·维贝尔（基尔）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

1846年7月3日

1846年7月3日于基尔

这么说来，你们要在德国建立一个共产党；这个党建立以后，该做些什么？自从我重返德国以来，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信，德国依然必须根除立宪派的捣乱，这是我在巴黎时就经常坚持的主张。我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像德国人民那样不经过中间的过渡时期便进行飞跃。请别对我说贫困的加剧会导致人民的共产主义行动。物极必反嘛。此外，英国有许多血统，贫困还在无止境地加剧，而古老的英国还要继续存在下去！德国的暴动没有受任何一个政党的领导。要人们发现还有一个党，那正好是各邦政府的盘中餐。到那时我们可就成了经过改造的新一代阴谋蛊惑者了。难道你们把大学生塞饱以后还要让可怜的手工业者分享这种欢乐吗？我认为，这是没有道理的。无论以何种方式组织手工业者，迟早都会被政府发现，尔后，他们仅有的一点勇气就会丧失殆尽。还是让事情任其发展，不要让手工业者去担风险。我一开头就问，有了政党以后干什么？我认为，英国人正在日益巧妙地行动，他们为了实行联合已规定了一个有限的目标。而这个目标无疑可以首先达到。相反，德国提出的目标实际上是立宪制，在立宪制

下取得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的权利。然后，用这种方法再消灭立宪制，建立一种更为理想的制度。我们这里没有立宪制，只有等级议会。然而，反对联邦法律就等于把建立人民议会，讨论给等级议会的申请书的权利拱手交给政府。如果我们确立了真正的立宪制，那么，在这样的人民议会里就有了进步的武器。总之，我认为，不能把弓拉得太紧，以致超过它的负荷。关于基尔的情况，我可以这样说，这里根本不存在共产主义协会。这里有一个协会。主要由手工业者组成，一小部分是工人，他们在别的地方曾参加共产主义协会；还有几个承认共产主义原则的“学者”以及为数不少的共产主义的反对者和中派人物。在这个协会里，经常争论的中心问题自然是社会问题。该协会是为普遍的共产主义运动服务的，仅此而已。在这个版图上，可以进行宣传，但不能为秘密目的筹集资金。关于捐款的事，你来信说得太笼统，我实在不知道你究竟需要多大的数目。说协会方面无人认捐，那也不尽然，照我看，也许有几个（三四个）人会参加。不过，在我能说出准确的人数以前，我必须知道必要的捐款数量；至今我还没有要求任何人捐款。

顺致最良好的祝愿！

请让恩格斯（因为他更具备商人气质）给我寄个地址来，来信请寄：基尔雪茄厂主A.维贝尔。

手稿

第一次发表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

F.20, Nr.6

105

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给英美工人阶级的信⁷⁸

1846年7月4日

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致英美工人阶级

“人人皆兄弟！”

[……]英国和美国的工人们，我们在结束这封信的时候，还想就不久前由“和平之友”提出并热情推荐的一项建议说几句。我们认为，他们建议召开一次各民族的代表大会，争取在大会上友好地解决各民族之间的种种意见分歧。这种想法本身固然很好，但我们担心，按照世界现状，这种建议可能会遭到激烈反对。在目前情况下，这样的代表大会，至少对欧洲而言将不可能是各民族的代表大会，而是各国政府的代表大会，而这些政府并不代表在其统治下的各民族的权利和利益。我们不能不担心这样的代表大会敌视进步和民主，——结成一个美国不能与之合作的新的“神圣同盟”。

在“战争”问题上，我们并不是那种高喊“不惜任何代价争取和平！”的人。我们从心里钦佩1776年的美国英雄们，是为了不做空泛的信仰的牺牲品。我们担心，是因为“永久的、普遍的和平”的时代尚未到来。有些民族带着沉重的锁链，我们无法想象，它们不使用刀剑就能砸烂自己身上的锁链。波兰和意大利就是这方面的令人信服的例子。我们的原则主张，各个民族“千方

百计”摆脱奴役和贫困是正义的事业，而且还主张，帮助弱小民族是每个强大民族的义务。〔……〕

当博爱主义者奋起反对由纯粹民族争端引起的、在他们看来并非为民族的生存和自由而进行的战争时，但愿他们提高警惕，不要犯按和平方式满足于“现状”的错误，从而使压迫者强大，使被压迫者绝望。

如果各民族都获得自由；如果英国人民得到那些无疑是属于他们的权利；如果法国人取得他们为之英勇献身50年之久的成果，结束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人民的真正主权；如果3 500万德国人成了一个自由、统一的国家；如果意大利获得自由；如果波兰重新成为波兰，如果千百万被奴役的奴隶砸烂他们身上的锁链；如果希腊恢复其原有疆界，取得比原来更多的自由；如果西班牙获得解放；总而言之，如果欧洲成为它必须成为而且想要成为的欧洲，到那时，各民族的代表大会才能带上欧洲进步的桂冠。到那时，各自由民族的代表才能通过轮流在新旧两个大陆开会而把两个大陆的利益结合在一起；到那时，才能最终消灭战争，实现永久和平。

在这期间，各个相互联系和共同合作的民族的进步之友可以为实现我们的使命的两个目标——自由与和平——而做大量的工作，以便使将来发生的战争不可避免地成为维护人权的战争，而不致成为满足王室的掠夺欲或民族虚荣心的那种残酷的战争。

英美工人们，全世界的工人们，如果你们学会摒弃民族反感和民族成见，那么，自由与正义，尤其是和平与幸福就将呈现在你们面前。你们自己可以做那些政府不会为你们做的事情：

“起来，结成最神圣的同盟！”

各民族，真诚地团结起来！”

主席 约瑟夫·莫尔（德国）

书记 乔·朱利安·哈尼（英国）

卡尔·沙佩尔（德国）

让·奥·米歇洛（法国）

彼得·霍尔姆（斯堪的那维亚）

A.涅梅特（匈牙利）

昂利·于贝尔（瑞士）

1846年7月4日

1846年7月11日《北极星报》（伦敦）

节录

第452号

107

罗兰特·丹尼尔斯（科伦）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

1846年7月17日

1846年7月17日于科伦

亲爱的马克思：

你7月15日的来信我们已经收到。威斯特伐利亚的老爷们的所作所为远远超出了我们的希望。我们原来只以为他们胆怯愚蠢，但不以为他们卑鄙无耻。在这种情况下，新书的出版，即使不被完全拒绝，暂时也可能要放一放。⁷⁹

恩格斯在来信中谈到格律恩的小花冠^①，我们对此一无所知，但我可以打听一下。赫斯已放弃《社会明镜》。（我们猜测恩^②可能在巴黎）。赫斯准备搞半年研究工作。

祝你安好！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F.1，OP.5，Nr.114

节录

第一次发表

109

伦敦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

1846年7月17日

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亲爱的朋友们：

你们上月22日的来信^③，使我们感到十分高兴。你们曾答应告诉我们有关德国哲学运动的情况，因此，请切莫让我们久等。在详细回答你们信中提出的问题之前，我们先简要地介绍一下

① 原件上关于小花冠的脚注很滑稽，卡尔·格律恩的追随者很能可作了想在科伦站稳脚跟的尝试。但这方面的详情不明。

② 可能是指恩格斯。

③ 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但是，这里刊印的这封信中的一些论述表明，那封信中所谈的问题也就是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1846年6月15日给爱北斐特共产主义小组的信（文件96）中所谈的问题。

我们这里的情况。

自从上次去信^①以来，我们已经有许多成员，大约60名。从这里起程了，可能还有20多名将要离开伦敦。你们也许知道，春季是旅游旺季，各国工人都要涌向伦敦，但是，这个旺季在7月份一结束，他们就要回去，以便在空闲的冬季不致没有饭吃。然而，今年的旺季却不旺，我们的许多成员，大部分是裁缝，因为没有旅费，不得不留在伦敦。为了帮助这些人渡过难关，我们开始在他们中间组织小共同体；也就是说，让他们五六个人生活在一起，租两间小房子，买一些炊具，自己动手做饭。这样，一人花五六先令就能生活一星期，否则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一人有什么活干，那么，大家一齐动手，得到的报酬归共同体的储金处；每个小共同体选举一名司库，把他的姓名、职业和住址记入共同体的记名册；如果某个成员需要什么，或听说某个成员需要什么，就去找这个司库。此外，我们还决定每个共同体选举一名朗读者；这个朗读者在一天的某个时候朗读共同体选定的书，然后，大家就所朗读的内容进行讨论。我们的图书室目前藏有500册图书，所以，各个共同体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进行选择。这样，可以同时兼顾成员们的体育和智育。第一个共同体已经组成，其成员主要是裁缝；第二个共同体正在筹建中。难道不应劝告德国各大城市的无产阶级也这么做吗？此外，我们还建立了一个新的储金处，要求每个成员量力捐献，等到储金处有了足够的资金以后，我们将成立一个专门的俱乐部，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开会，向那些没有工作的成员提供食宿，并为全协会谋福利。这个储金处

^① 文件95。

还要资助需要帮助的成员，每一个正式被吸收入会的成员如有必要，都可以要求帮助，不管他是否居住在英国。如果在国外的成员仍需要储金处的帮助，那么，他一年至少给协会写一次信，并尽可能寄缴会费。这样，我们希望，外出的成员同协会保持经常性的联系，不断扩大我们的通信联系，详细收集各地区和各国状况的消息，向那些因自己的原则而受到政府迫害的无产者提供帮助。

我们协会现已有250名成员，而且每一次会议都吸收新成员，或者推荐新成员。巴黎方面给我们派来了一名想研究英国学校制度的德国教授和一名海德堡大学生。他们两人都十分积极地参加了我们的讨论，并且，特别是那位教授，是坚定的无神论共产主义者，或确切地说，人道主义者。此外，巴黎方面还给我们派了一个名叫李宾特罗普的男爵。此人也给《独立评论》撰稿；关于他的情况，我们似乎还不甚了解，尽管他通过同卢格、艾韦贝克等人的交往了解到一些德国的思想。他虽然出生在法国，但他是德国血统，讲德语。你们认识他吗？几周以后，我们将把那个海德堡的大学生派到你们那里去；他出生在巴登高地，并想为人民在那里出版一份报纸，我们想同他保持通讯联系，以便尽可能在那个地区扩大我们的影响；所以，请你们好好接待他。那位教授将同我们保持通讯联系，如果你们愿意，我们也可以叫他同你们建立联系。他是一位很能干的人，名叫西韦尔斯，哥达人。

我们协会的成员已经出发了，他们主要到法国、德国、斯堪的那维亚各国和匈牙利去。在他们协助下，我们将能够在汉堡、阿尔托纳、³马格德堡、莱比锡、柏林、科尼斯堡、哥德堡、哥本哈根、勒阿弗尔等地建立通讯委员会。在这些地方，我们已经交

了朋友。因而就派遣了一些成员到那里去，建议他们赶紧成立委员会，并立即同我们建立积极的通讯联系。布鲁塞尔已成立委员会一事，我们尚未告诉对方。因为想等到他们的回音之后，再告知有关我们今后的计划。

我们协会正在十分活跃地讨论费尔巴哈的著作。特别是，自从来了一位十分熟悉其著作的教授，讨论就显得更加活跃了。

在怀特柴泊我们虽然只有58名会员，但我们还必须同那里的德国僧侣进行斗争。我们必须首先击败这帮家伙，才能指望变得强大。现在，他们已经派出自己的走狗到各工厂监视，并警告工人不要接近协会；他们说，我们是一帮既不信神也不信鬼等等的人。在西区这里，他们的影响已荡然无存，而在怀特柴泊，有三个德国教会，工人（制糖工人）大部分没有受过教育，所以这帮家伙还有相当一批追随者。不过，我们希望，他们对我们采取这种态度会把一些比较有理性的人推到我们一边来；至于那些一听到僧侣们的愚蠢鼓噪就吓得发抖的人，我们本来就没有寄予多大的希望。

我们同法国人还一直保持友好关系，这一点你们可以从《北极星报》上关于7月14日宴会^①的报道中看出来。然而，遗憾的是，这里的法国人未能发挥多大的作用，他们缺乏足够的热情，并且，他们身上还存在着宗教的脏东西；我们非常希望蒲鲁东派能派遣一个能干的人到这里来，他在这里会有所作为的。

^① 7月14日，法国民主协会为纪念法国1789年革命举行宴会，参加这次宴会的大约有200名来自各国的代表，其中有沙佩尔、莫尔、鲍威尔、哈尼、琼斯。1846年7月18日《北极星报》对这次宴会作了报道。

哈尼将向你们汇报有关英国状况的消息和民主派兄弟协会的情况。

你们对哲学的和伤感主义的共产主义流派所作的斗争是正确的。因为这些流派的观点是片面的，或者正在变成片面的，而且，他们还奢望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但是，你们本身也应该避免片面性。你们仅仅根据工人贫困的日益增长，机器的不断完善等等，就想证明共产主义可以实现，那你们自己也就陷入了片面性。让哲学家去科学地深入研究自己的共产主义吧；让他们去说什么我们至今还没有了解清楚人的天性吧，何况，哲学家在这方面并不是完全不对的，让他们去指点什么必须恢复，或者，更确切地说，必须建立人、社会和自然界之间的和谐关系吧。我们看不出，这里面有什么同共产主义观点矛盾的东西，也看不出有什么反自然的东西。当伤感主义的共产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在幻想人民的兄弟之爱时，不要把他革出教门。你们不是不愿扼杀人的感情——人的心吗？你们自己判断一下吧，人，在很大程度上，不就是具体环境的产物吗？德国人那种肤浅的伤感主义文学作品，就是这种一知半解的伤感主义的共产主义流派的孽根。因此，请你们不要立即把他们革出教门，而应竭力去纠正这种状况。请你们甚至为宗教共产主义提供可能，让它表现自己，不要急于谴责它，而应努力冷静地去证明，这种共产主义是站不住脚的。并非所有的人都像你们那样，全是伟大的经济学家。因此，你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能像你们那样理解共产主义。我们认为，所有这些流派都应该表明自己的观点，也只有召开这些流派都有代表参加的共产主义者代表大会，经过冷静的、兄弟般的讨论之后，才会使我们的宣传工作统一起来。

至于说学者同工人之间的关系，那么请别以为，德国工人想在他们两者之间划清界限。当任何一位学者来到工人中间，参加他们的会议，同他们一起辩论，友好地努力纠正他们的错误时，在这种情况下，这位学者，哪怕他并不是无产者，人们总会像对待朋友和兄弟一样对待他。还是举那位在这里的德国教授为例吧。他受到了普遍的爱戴和尊敬，就再好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请你们也别以为，工人仇视学者，是因为某些所谓的学者曾经欺骗过他们。如果你们有类似的想法，那就大错特错了。在某些工人中，还存在着某种对学者的愤懑情绪，那是由于某些学者的高傲——对不起，请原谅我们使用这个字眼——引起的。他们看到别人的错误时，不加以解释，不予以纠正，而往往是马上抓起笔杆子，想用语言置人于死地。在遇到工人时，他们就搬出学者的炸弹，而给自己的头上罩上圣灵的光环。他们不善于争取工人的友谊，不善于把工人争取到自己一边来，而是推开他们。而你们，布鲁塞尔的无产者们，在很大程度上，还保留了这种可憎的学者的高傲。你们旨在反对克利盖的演讲就能证明这一点。你们的这个行动，可真没有得出一点好结果来。克利盖在工人中有许多朋友。你们可知道，他们说什么来着？（我们收到了许多美国的来信。）他们说什么“布鲁塞尔的学者先生们把任何持有不同观点的人，都从哲学讲台上革出教门，莫非他们真的以为，他们是全部智慧的化身？这些人说，克利盖不是共产主义者，因为他持有与我们不同的观点。他们究竟是何许人呢？我们可不了解他们，关于他们的活动，我们知道得很少，或者是一无所知。而克利盖——这个似乎不是共产主义者的人，却同我们生活在一起，他是我们的朋友和兄弟，他同我们一起在为共产主义而奋斗”。这

就是旅居美国的德国工人所说的话。的确，朋友们，像你们这种狂妄行为，正在工人和学者之间造成分裂和敌对情绪。在传播自己的观点时，请你们好好地宣传，在批评别人的观点时，尽可能不要嘲讽具体的个人。因为这不是共产主义风格，同时，也不要动辄挥动你们的鹅毛笔。请你们相信，那样做是不妥当的。好啦，这方面已说得够多了。

你们通讯委员会的成立，就像实现整个计划一样，使我们极为高兴。但使我们最为高兴的，还是你们打算召开的共产主义者代表大会。⁸⁰我们认为，这是振奋精神并使我们的宣传工作取得统一的唯一办法。当所有共产主义小组都派出代表时，当来自各国的工人和学者都聚集于代表大会时，许多目前还阻挡我们前进的障碍，就会一扫而光。在这个大会上，共产主义的各种流派的观点将进行心平气和的讨论。而真理当然会占上风，并且一定会取得胜利。在这个大会上，可以而且需要制定一个大家都必须遵循的计划。我们共产主义者虽有千百万，但我们却还没有建立起政党，从这一点也足以看出，这方面的必要性已成熟到了何等地步。立宪派、改良派、共和派，人数虽比我们少得多，而实际上，他们的力量却比我们强大很多，这是因为他们掌握组织，按照总的计划行事。难道我们的组织建设就像蜗牛爬行似地一直拖到暴风雨来临的时候嘛！可到那时就已经太晚了。在暴风雨期间，什么组织建设也搞不了，因为那时我们要战斗，而共和派、改良派等等却要收获我们播种的成果。

那么，朋友们，该着手干起来了，而且要越快越好；任何拖延都孕育着危险。只要有一点可能，代表大会就应该在今年举行。但愿那些殷实的共产主义者慷慨解囊，让他们资助那些穷困

的代表去参加大会，但愿每个人都力所能及地作出贡献，因为这是有益于一个大党，有益于人民的大事。请你们通知各地，让他们把代表选出来；你们还应把提交大会讨论的主要问题告诉他们，同时拟定出组织草案的要点，并通知他们，这样，到时候代表们就能有权代表自己的选民来审批了。你们有了良好的开端。为了我们能够向前发展，希望你们顽强勇敢地继续进行下去。

如有可能，代表大会最好在我们这里——伦敦举行。因为在这里，我们有最大的安全保证；在这里，我们一定能够把各项决议形成书面文件，而不用担心警察当局会抓住我们。诚然，在伦敦召开代表大会，开支会比在比利时大一些。但是，在这么重大的问题上，可不能计较那些微不足道的琐事。请认真考虑一下我们的建议吧。我们认为，不论在比利时还是在德国，我们都不可能集中在一起进行几天的讨论，而不引起警察当局的注意和免遭逮捕。

至于说递交请愿书的事，我们认为，在我们尚未组织起来的时候，需要劝同志们不要那样做。而在我们组织起来以后，那就是我们应该做的第一件事。首先，我们应该有自己的刊物，因为我们再也不能长此以往了。假如我们没有能力出版日报或周报，那就让我们搞一个月刊吧。这个月刊将捍卫共产主义思想和报道它的成就。每一个地方组织都应该为这个刊物撰稿，哪怕是一个月一篇文章或一篇报告都可以。真正可悲的是，现在如果想发表一些共产主义的东西，必须把它改头换面，夹入某家不引人注目的报纸发表，而这家报纸难免会遭殃。你们看看傅立叶派，这帮可怜的人，他们的体系完全没有根据，根本站不住脚，然而他们有自己的日报，他们可以在报上进行宣传，同时攻击、歪曲、诽

谤共产主义，而我们却不能予以回击，并向公众指出，他们是诽谤者。傅立叶派每年为他们的《和平民主日报》支付10多万法郎，我们的殷实的共产主义者为何不能捐献几千塔勒，让我们创办一份实实在在的刊物呢？

你们在莱茵省取得的进展确实是令人兴奋的。这些消息真是好极了，它们给我们增添了更多的勇气和干劲。事情嘛，就应该这样。我们应该互相竞赛，每一个地方组织都应该努力使自己的宣传工作超过他人。现时，我们尚无可能把人派到爱北斐特去，请你们尽可能从特利尔派一个干练的人去那里吧。同瑞士方面我们已没有什么联系了。还在瑞士活动的魏特林的信徒们，显然是在搞反对我们的勾当；他们终止了同我们的通讯联系，傅立叶派也在那里活动，并且想把我们排挤掉；我们要努力尽快在那里重新站稳脚跟；为此，我们已写信给在巴黎的艾韦贝克。请尽速给我们回信。

祝一切顺利！

代表伦敦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签署

卡尔·沙佩尔

约瑟夫·莫尔

亨利希·鲍威尔

1846年7月17日

第一次全文发表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F.20,N184

110

乔治·朱利安·哈尼（伦敦）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

1840年7月20日

1846年7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兄弟们：

请原谅我一直没有给你们写信，就是现在也只能简单扼要地写几句。

你们上次的来信当然是十分令人满意的；你们给沙佩尔的那封剖析魏特林的“指责”的信已完全消除了这里的德国人对你们“委员会”的误解。我听说你们已经同意接收伦敦的朋友加入你们的组织。既然这样，我当然会毫不犹豫地尽力支持你们。

[……]

民主派兄弟协会在不断地取得进展。然而，除了《北极星报》以外，没有一家报纸愿意刊登他们的东西。我希望在今后的六个月里，我们能够变得更加强大，而且在全国各地都能有通讯员。

你们大概已经看到，上星期六的《北极星报》上刊登了一篇关于法国民众派晚宴的报道。^①我曾经认为有必要抨击一下法国的共和派，而恩格斯一再告诫我没有必要这样做。他说，共和派

^① 见本卷第281页脚注①。

是少数，共产主义者在人数上要多得多，并且他们不是那种“激烈而又伟大的人”。如果说，共和派十分活跃，因而带有危害性，而共产主义者则是默不作声的，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说话，为什么不表明他们仍然存在，并且有资格充当未来法国的代表呢？我打算尽快写一篇致法国工人的呼吁书，我们将直率地阐明我们对法国、欧洲和未来的观点，并且请他们也这样做。〔……〕

手稿

节录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F.20，Nr.85

111

关于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的一次大会的报道

1846年7月20日

民主派兄弟协会

该组织的这次例行会议是7月20日，即上星期一晚上在德鲁利巷的白鹿酒店举行的。由厄内斯特·琼斯主持会议。〔……〕

朱利安·哈尼提出下列决议，以期通过：

希望促进平等和博爱事业，但由于不住在伦敦因而也许难以参加本协会会议的那些民主主义者，只要通过出席一次正常会议的多数会员决定，就可以被吸收加入民主派兄弟协会。每个希望加入本协会的人，不管他住在伦敦还是别的什么地方，都必须经两

名会员提名，提名者同时负责介绍民主主义原则和被提名者的品行。

上述决议经过附议后获得一致通过。〔……〕

会上宣读了《布鲁塞尔的民主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给菲格斯·奥康瑙尔先生的信》^①，这封信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威廉·敦纳奇提出的提案，在查理·基恩的附议下获得一致通过。

这次会议非常满意地听取了《布鲁塞尔的民主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给菲格斯·奥康瑙尔先生的信》，因为这封信进一步证明了各国民主派在争取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的伟大斗争中凝成的兄弟情谊和日益临近的联合所取得的进展。〔……〕

1846年7月25日《北极星报》（伦敦）第
454号

节录

112

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

1846年7月22日

〔……〕关于基尔的朋友维贝尔的近况，我不太清楚，他似乎正像他自己所说的，正在“拼命干”。我从报上看到，基尔人正在进行十分紧张的讨论（约有200人参加），甚至引起了汉堡

^① 文件108。

人的忌妒。朋友Y^①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他刚刚周游了德国南部的几乎所有极乐乡，并赢得了巨大的支持。我们的小麦长势虽然良好，但不知何时才能收割？[……]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F.1,op.5,Nr.117

节录

第一次发表

113

威廉·沃尔弗对西里西亚社会主义者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所作的摘录⁸¹

约1846年7月底^②

“你建议我们成立一个共产主义协会，关于这一点，我几乎不敢想象在我们这里能建立什么协会。你知道，许多人或者说多数人都谨小慎微，你也许会承认，我虽然可以每月收取他们的会费，但他们无疑不会去参加例行的会议和讨论。关于宣传鼓动的事，现在并不需要联合，而需要每个人独当一面，干自己力所能及的事，谁不这么干，那他即使在最好的协会中也分文不值。不过，对这件事，我们还要作进一步考虑，我并不认为有必要使你确信我们的良好意愿，我只想同你谈谈我在阅读你的来信时产生

① 可能是正义者同盟的特使。

② 这里刊印的第一篇摘录未注明日期，但很可能是在7月中或7月底作的；第二篇摘录注明的日期是1846年7月24日。

的一些顾虑。下星期我要去会见派纳特^①，同他进行磋商，可是，他现在几乎已失掉勇气。昨天我在他那里，发现他的情绪十分低落。他打算去漫游。至于我本人，我什么都愿意干，不过，我不能保证在我这个地方能取得什么成果；我虽已争取到了几个人，可以同他们马上着手干，但是，人民根本不好接近，他们说话颠三倒四。^②现在，我们这几个人只要有可能，就根据需要聚集在一起，每个人干自己能干的事。因此，我们除了每月收缴会费外，没有多少组织工作可做。B.被吊销了家庭教师许可证，对我来说，这事还没有解决，不过，解决与否并没有多大关系；我们当不成家庭教师，就做家庭朋友。[……]昨天，我从赖辛巴赫来到了这里的印染帮工和工厂伙计协会，他们在谈到工厂状况时个个义愤填膺，并预言在不久的将来要彻底‘破坏工厂’。我打算从这里渡过尼斯河前往格雷芬贝格，到那里住几天。[……]派纳特将在格雷芬贝格同我碰头，然后我们一起通过伯爵领地前往瓦登堡地区”（沿途居住的全是贫困的工厂工人和纺织工人）。

7月24日于弗兰肯施坦

[……]“至于你提出的要建立一个协会的建议，你在提出这一建议时，肯定没有把普鲁士或德国考虑在内。在这两个地方，这类计划目前都失败了。我用不着再向你详述这里遇到的无比巨大的困难或者说棘手程度，我只想提醒你考虑一下你以前所在的那个省。假如我们尽力争取建立协会，那么，你不是早已

^① 关于派纳特在西里西亚从事的社会主义活动，参看注48。

^② 原件上这里有括号，括号内有这样的话：“缮写者补充：指波斯大公国的一个地区。”

预见到，婴儿尚未呱呱坠地就会遭到窒息吗？不是有几千只警惕的眼睛在注视着我们的每一个步骤吗？所以，我只想尽量秘密活动。道路要是平坦，万事一帆风顺，那该是多么令人欢欣！我相信，以前曾有人向你提出过这样的建议，你当时的想法也许同我刚才所说的一样。我只想提醒你一下，看看布劳厄尔那个不足10人的小小读书会，就可以说明一切！尽管到处死气沉沉，但告密的事却层出不穷。请想一想**书记阴谋**！

“所以，请不要把我对这个问题的否定答复归咎于我缺乏善意，而要归咎于目前的情况。

“著作可以安排出版，也可以进行募捐。大约需要多少？当然，在这里和尼斯河地区募捐额是有限的，请你考虑到这一点。你寄来的通讯地址固然很合适，但我更愿意自付邮资，将信寄到你家里去，这在寄发时就可以办妥。——关于你不在时发生的政治和社会事件，布雷斯劳方面肯定有人会告诉你的。[……]”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F.20,OP.1,Nr.86

节录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

114

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
的信

1846年7月27日

1846年7月27日于巴黎

最亲爱的朋友：

请原谅，我又来打扰你了。刚才接到伦敦人的来信说，他们已经同你们建立了你在半年前曾经兴致勃勃地对我提到过的那种联系。^①根据你的嘱咐，我立即销毁了文件；我当时也认为（坦率地承认），这对巴黎人可能不太合适。在此期间，这里的有些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我觉得比以前好多了；但愿云格也是这么对你们说的。现在，伦敦人认为这样活动很合适，这件事（如上所说）通过人事变动和其他发展在巴黎已有所改善，在一些人中间已不复存在像当时盛行的那种绝对尊敬了，所以，我请求你把新的宣传方式尽快通知我。请你把此事单独写在一张纸上，不要同信上的其他事情写在一起。让你再写一次，我感到遗憾，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请相信我，我在这里定将坚持我的奇特的进军，并可能改变我以往的一些想法。

此外，我们正直的伦敦的朋友们已把主要情况告诉我了，所以，我只请求你把最迫切的问题再扼要地对我谈一下。

我的通讯地址仍然是：

小草坪街银行附近哈森托伊费尔寓所，恩斯特·哈尔蒂先生收。

如果这种通信联系切实可行的话，我还想知道，你们的活动究竟要达到何种规模。这一点，如果不便讲，那就算了。我打算秋天去拜访你；可是又担心坐火车发生意外。真的，多可笑！

我非常希望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能到这里来。

祝你顺利。大家同魏特林根本合不来；还有别的什么办法吗？

^① 指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联系，参看注68。

此外，看来他还过得不错；可以说过得很好，而且还过得非常好。

赫斯来信说，他希望同你保持经常联系。我也希望这样；但是，我在给你的信中已经提到一个原因，为什么我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满足这个愿望；其他原因我以后写信另告或与你面谈。

再见

你的 艾·

我的朋友拉福里从科伦和耶拿都给我写过信，他很能干，同时也十分诚实；他十分尊敬你。

手稿

第一次全文发表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20,Nr.7

115

莫泽斯·赫斯（科伦）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

1846年7月28日

【……】我完全同意你新近对丹尼尔斯所谈的关于共产主义创作的观点。起初，共产主义目标同德国意识形态相结合是必要的，而如今根据历史和经济条件加以论证同样也是必要的，否则我们既对付不了“社会主义者”，也对付不了形形色色的敌人。^①【……】

^① 赫斯想同马克思恢复关系的种种尝试，参看注73。

手稿

摘要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F. 1, op. 5 Nr. 115

116

格奥尔格·维贝尔（基尔）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⁸²

1846年8月1日

1846年8月1日于基尔

[……] 你们以为我误解了你们的来信；我想我并没有误解。你们计划建立一个靠大家捐款维系在一起的政党。如果行得通，当然很好。德国其他各省如何看待这一点，我不清楚，反正在我们这里是行不通的。你们从我上次简短的描述中可能已经看到，这里根本不存在什么政党，说这里有政党，那都是人们的猜测。这里也从来没有要求人们捐过款。当然，我们这里也像其他地方一样，有无产者，但并没有无产阶级，并不存在极度的贫困。真正愿意在这里工作的人，家贫如洗是罕见的。人们的日子过得太好了，以致不再要求更好的生活。由于这个原因，共产主义在这里扎根是极其缓慢的。而你们却总是侈谈什么“计划”和“有计划地”。但我恰恰希望从你们那里得到关于你们设想的计划。在这一方面，你们却一再说什么这完全取决于个人的**自愿**。我们想做某件事，就必须知道我们想做什么**事**。如果人们对我提出某种要求，我首先必须知道，要求我**什么**，然后我才能答应。因

此，我再一次问你们：1.通讯联系应当怎样建立？一个地方的通讯员应该**定期**通信和定期收到信吗？

2.每一站（恕我这样表达）负担多少钱才能进行这样的通讯？你们光说**自愿**，哪怕几个**格罗申**都行等等；话不能这么说，因为这种费用总得有人负担，而怎样负担这笔费用，必须**统筹安排**。否则这件事就不太好办。让各站各自支付邮资吗？到那时，每一站得支付一笔相当可观的费用。总之，这件事究竟该怎么办？

如果在基尔这里能搞一个组织，参加者也至多三四十人，而我连这几个人也不敢担保。请你们在下一封信中不妨谈谈这个问题，好让我也同一些人通通气，首先请你们对组织方面的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至于这里的情况，几乎没有什么可谈的，简直像一潭死水，令人感到绝望，而基尔还算是最有生机的呢！

就此搁笔，再见。

维·

手稿

莫斯科苏联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1.0p.1, Nr.197

节录

第一次发表

117

亨利希·毕尔格尔斯（科伦）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

1846年8月11日

1846年8月11日于科伦

亲爱的马克思：

我们一直担心邮路不安全，特别是担心关于委员会事务的信件的安全问题，否则我们早就回复你7月29日的来信了。现在，我让厄尔万根人、维尔腾堡的陪审推事霍尔德尔将当前的一些情况转达给你。这个人是我昨天晚上在赫斯的协会里见到的，还谈不上熟悉；可是他马上就要起程，所以我只能谈一些最重要的事情。

关于在这里建立通讯委员会一事，我们，即我和丹尼尔斯，经过反复考虑后确认，就目前的条件看，让这里的人发表一项关于目前形势的明确声明，是不会成功的。如果我们问他们是否愿意参加这个拟议中的委员会，那无疑没有人会拒绝，但是，除了德斯特尔以外，可能没有一个人会积极参加通讯活动。这就是目前的症结所在。他们听说过以前人家写的东西，听说过我们，即丹尼尔斯和我，可能还有德斯特尔的通讯内容。这种情况越早改变越好，因为这些人根本无讯可通，首先必须加以引导，使他们感到有集体讨论的需要，认识到以某种方式有效地参与宣传鼓动

的必要性。他们中间的有些人也许根本是不可救药的。最近，这里群情十分激昂，一是因为对市议会选举展开公开辩论，二是因为最近发生了军警暴动。⁸³关于这两件事容后再详谈。这里只谈谈德斯特尔的事；由于这两件事，他成功地博得了这里小资产阶级领导人的信任，甚至好感。我认为这一胜利很重要。上面所说的那些人已经认识到，他们同这里公然以克莱森、奥本海姆、屈韦特尔、律师赫尔伯茨等人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不过，仍然可以看出，他们尚未明白他们二者利益之间的真正区别；他们试图通过自己的政治信条同那些人——他们切齿痛恨的金融贵族和精神贵族^①——实行公开的决裂，但纯属徒劳。这时，德斯特尔擦亮了他们的眼睛，使他们在公开集会上表明，当前的社会贫困是由“资本的力量造成的”，他们赋予未来市议会的使命是投票支持不加任何限制的出版自由，投票支持以普选权为基础的人民代议制；今天他们要投票支持征收累进所得税（这在各方面看都是毋庸置疑的了），投票支持“能确保全民各阶级的福利的劳动关系和货币关系的改革”。这些意见是他们中的一个人在我们的鼓动下提出来的，但愿不致遭到太多的反对，因为德斯特尔由于最近几天的事件，在他们中间已赢得了很高的威望。真的，他在几天以前参加了一次主要是这些人参加的晚会，会上，他们要求他下次作共产主义的报告。如上所述，这是他们自己提出的要求；当德斯特尔保证他肯定能争取他们拥护他的思想时，他们几乎一致表示赞许他的保证。

这些小市民虽然孤陋寡闻，但多数人心地并不坏；只要他们愿

^① 破折号内的这句话是后加的。

意发挥一些另外的作用,其自然地位就会迫使他们支持第三、第四等级;如果说他们对社会关系关心不够,那主要是由于他们被迫越来越多地考虑自身生存问题;我是说,如果我们能够通过经济研究把这些人争取到我们一边来,那么,我们的党就会在这里得到很大发展。可是我不想沉醉于未来的幻想之中。

所以,我有时这样想,还是让我们一如既往地通讯。如果以前那种讨论会有朝一日得以恢复(奇怪的是,在这里,有些微不足道的情況竟然起着决定性作用),那么,其他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了。

还有一点,雷姆佩尔先生最近让人一再恳求我和丹尼尔斯,把为《威斯特伐利亚汽船》募集的捐款给他寄去。早在你们同他们完全破裂^①之前,我就为他们募捐了,那完全是缺乏资金的缘故。吕宁博士先生在一周前的一封来信中竟然对我说:“如果您收到恩格斯先生和马克思先生写的反对[……]^②和迈耶尔等人的声明^③(据我所知,在这个声明中,后者竟被卑劣地贬称为资产者和剥削人的资本家,而原因只是他们本想出于好意资助办一家出版社,但没有办成),那么,您在答复以前先作一番评价。这篇东西似乎是恩格斯的狂妄和虚荣的产物,而马克思则完全是听信了一面之词。”

你看,这些人似乎想进行自卫;对此,我什么也没有回答,但我也没有中断联系;我觉得,在我们这方面使年轻人脱离这种关系,也许更好些。这一点也许会为那个出版社计划,即赫斯别

① 参看注79。

② 手稿缺损。

③ 参看文件122。

出心裁地称之为私有财产的出版社计划提供最好的理由。我对你谈这些，无非是想避免因反对这些人而引起对我的误解。关于赫斯，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想这里的“革命”简直快想疯了；他热衷于极其可笑的可能性，大谈什么市民用武力占领科伦，什么莱茵省的起义和社会前景，等等。他对这些胡说异常认真，简直太可笑了。

手稿

第一次全文发表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F.20,Nr.89

118

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

1846年8月14日

1846年8月14日子巴黎

亲爱的朋友：

首先我向你转达贝尔奈斯和莫伊勒对你的问候。你的来信我已经收到了，我为你们的身体健康而感到欣慰，但同时我也要坦率地告诉你，我也感到忧虑。我知道，你同威斯特伐利亚人决裂了。这简直太糟糕了。这样一来，我们的美好事业就要受到损害。我只认原则而不认人，我只是从你的来信中了解到一些详细情况，不过请你三思，你们的这种决裂是毫无好处的。我们的共同敌人从来就是那么几个！现在就连一些讨人嫌的家伙也来反对

我们，这些家伙只有通过联合一致的活动才能消灭，但不是用决裂的办法来消灭他们：——海因岑这个人我不太熟悉，不过听说他虽然心胸狭隘，却是一个性格刚强的人；值得指出的是，格律恩激烈反对他。为什么？我不知道；这同我没有什么关系。可是，这么相互攻击，岂不可悲？格律恩在苏黎世拜访了卢格，不过他们俩似乎谁也不为此感到高兴；有人说，卢格又想回到这里来！据说，他在那里呆腻烦了。我同他没有什么联系。在这些人看来，“党”已经彻底垮了。我知道，你们在布鲁塞尔曾经风雨同舟，和衷共济，可我不知道你究竟为什么又同威斯特伐利亚人决裂。如果你不告诉我，我是无话可说的。考虑到你本人可能有被人误解的危险，我请求你尽可能不要把你同至少还有高尚意志和金钱的资产者之间的裂缝搞得太深了（也许他们并不太明智，尽管我对他们并不了解），因为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出版你的著作。出版一个批判性的季刊也是好事，可我不能想象，他们竟对这种评论性季刊突然感到厌烦了！而他们起初是完全同意的！朋友，如果我们这帮穷人不再使用对我们友好的资产者的财力（尽管这一数量少得可怜！），结果将会怎样呢？

我听说，你是不满意费尔巴哈的功绩的，当然是因为他没有坚决而彻底地走向社会主义。在此期间，他在补遗^①中直言不讳地说：他在研究脑病病理学，而脑病往往就是胃病的起因。因此，你也许不愿给他作序，关于这个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恕我下次再详谈。我在这里等待恩格斯，但我不希望等得很久。

^①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宗教的本质》，载于1846年《爱比格尼》（莱比锡）第1卷；参看恩格斯1846年8月19日和10月18日给马克思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37—38、63—67页）。

这里需要他。现在，我正在定期地在晚上作报告（历史和自然史），每周三次，讲稿就是我的手稿。另外，我也讲一点国民经济学，可恩格斯和赫斯（听说他也要来）才是这方面的行家！格律恩可能不再愿意作他的美学报告了，他的报告没有引起特别大的兴趣。可见，我一个人不能肩负这么多的重担，因为朋友莫伊勒是个不能承重的支柱，体弱多病，被家庭困扰拖垮的，不过他愿意承担文学史。我的报告首先必须打好基础，我是非常严格地按规定做这件事的，听众可作记录，而且我要检查。这一切，请注意，当我需要同时做两件大事的时候，我往往奋不顾身，全力拼搏。我几乎忍受不了，而且我还要摆脱一切旧的管理框框。我想，但愿这些人最终能自己管理自己；他们已学了10年。^①我只想从现在起在这里当个老师。此外，警察又在鬼鬼祟祟地活动了，在里昂正在迫害卡贝分子和我们的人。在里昂，我们的人的家里遭到了搜查和卑劣的询问，拆检巴黎的来信和书刊等等。在这里，两个细木工因深更半夜在巴士底广场用德语私下议论法国国王而被监禁了三个星期，并被注销签证，遣送伦敦。这一切都使人感到恼怒和愤慨；外加上面提到的我们党内无尽无休的争吵，我简直生气极了，你感到奇怪吗？达摩克利斯剑从长远看是一种坏东西。

祝你安好。向大家问好，代我向你亲爱的燕妮问好。孩子们在干什么？

你的 艾·

^① 艾韦贝克在这里显然是指正义者同盟的组织方面的领导工作，秋天，这里的组织由伦敦组织领导，参看文件134。

手稿

第一次发表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 F. 20, Nr. 8

119

亨利希·毕尔格尔斯（科伦）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

约1846年8月中旬

[……]我在上一封信^①中谈到的提案，经过这里选举大会的激烈辩论获得了通过。尽管有人无聊透顶地污蔑在经济一章中阐述的共产主义，这个提案还是以压倒多数通过了。资产者们气得咬牙切齿，像挨了打的狗一样在城里乱窜，对惊讶不已的公民们说，我是这里共产主义者协会的主席（我在这次有利于提案的辩论中取胜，是一个偶然事件促成的），而说德斯特尔是主要鼓动家，是受人欢迎的宣传家。对这种可笑的说法你能说些什么呢？此外，这次辩论已经取得圆满结果。我在辩论中尖锐地抨击了自由派的德文报纸，它们为资产者的利益而无视社会问题，从不鼓励对社会状况的研究，而且还充当保护关税和自由贸易的庸俗无聊的工具等等。[……]

手稿

节录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 F. 1, op. 5, Nr. 120

第一次发表

^① 参看文件117。

122

约瑟夫·魏德迈（里达）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
的信⁸⁴

1846年8月19日

1846年8月19日于里达

亲爱的马克思：

我的住处很不固定，所以给我的来信往往很久才到我的手里，我今天才给你回信，也是这个原因。

有人估计，我在回答你们的抨击时，曾想同你大闹一场，这一点确实使我十分惊讶，但我实在不知道该从何谈起。如果我有意同你闹翻，只要干脆中断通信就行了，因为你们直接给迈耶尔和雷姆佩尔写信，我的调解就成了多余的了。你们之间的纠葛确实令人不快，我也不例外。可我始终不认为这就是导致党内分裂的原因。我想第一个原因是误解；我写这封回信的主要目的就是消除这些误解。因此，我在获悉关于谈判的确切日期以前，我不能发出这封信。我不想同你辩解，而是想用从另一个侧面完全反映这一整个事件的事实来驳斥赫斯的论断。^① [……]

关于你们信⁸⁴中的某些不得体的地方的修改问题，我看你就

① 下面概述了关于出版社问题的谈判，特别描述了赫斯在谈判开始前作的发言，参看法84。

② 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参看文件117中关于《声明》的说明。

不必进行修改了；至于别人对我怎么看，我无所谓。你信中的某些地方只伤害了我一个人，因为我觉得你是有意这样伤害我的。你认为迈耶尔的话是什么意思，如果我像你一样激动，很可能得出同你一样的结论。迈耶尔说这类话即使很隐晦，但我也看得出。
[……]

反克利盖的通告在《威斯特伐利亚汽船》上几乎是逐字逐句发表的；你对此不必再有什么顾虑，因为《人民代言者报》已全文刊登了这个通告。不过在《汽船》上发表时删去了署名。⁸⁵我告诉过你，结束语是吕宁写的，这样你以后就可以作出判断，《汽船》的批判究竟有多大必要⁸⁶：“如果细心的读者在这个结束语的某个地方发现了《汽船》的自我批判，那我们一点不觉得羞愧。我们从来没有声明我们的阐述是总结性的，我们要共同对时代、对现实的人的运动、对现实关系进行研究和学习。我们一贯认为，不能停顿，不能退却，只能勇往直前。此外，外部情况常常迫使我们不能说大实话，而说一些华而不实的漂亮话，这使我们感到十分难堪”。[……]

如果这种纠葛会影响我们的私人关系，那会使我感到异常难受。但是，按照我的信念，我不能采取别的行动：如果你想招致党的分裂，那我会不假思索地就知道该站在哪一边。在这个问题上，我只能说这就是你们的过错了。

祝你安好

你的

约·魏德迈

附信请转交给沃尔弗。

手稿

节录

123

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 的信

1846年8月20日

1846年8月20日于巴黎

忠实的朋友：

我很高兴地在这里见到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他来的那天，我刚把我的信^①寄出去，而他立即把事情经过告诉我了。所以，你就当没有收到那封信，现在，关于威斯特伐利亚人^②的一切我都知道了，这就够了。此外，关于格律恩其人的禀性，我现在也更清楚了；我刚刚读完他的《我被驱逐出巴登》^③，这部拙劣的著作使我长了不少见识。现在，对这个人，我已同意你们的看法。余言以后再谈。

再见。我谈这些，是想避免误解。弗里茨向你和你夫人问好。

你的 艾·

① 文件118。

② 参看注79和84。

③ 卡尔·格律恩《我被驱逐出巴登，被武力引渡出莱茵巴伐利亚的经过和我在德国人民面前的辩护》1843年苏黎世—温特塞尔版。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F.20，op.1，Nr.9

124

卡尔·沙佩尔（伦敦）给正义者同盟一盟员（莱比锡） 的信⁸⁷

1846年8月28日

〔……〕我们虽然同许多正直的人建立了联系，但我们认为，在各个国家尚未达到真正的团结，还缺乏联系，这一点必须予以弥补〔……〕^①因此，我们计划明年初在伦敦这里召开一次大规模的共产主义者代表大会^②，邀请欧美各国的代表参加。在这次大会上，我们力求心平气和地、卓有成效地讨论我们的原则，以期各国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达到联合。所以，我们请你让我们在德国的、同你有联系的兄弟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并且希望你和你的一些朋友愿意出席这次代表大会。〔……〕^③我们还要告诉你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瑞士的青年德意志派已经同共产主义者达成联合。⁸⁸到处都在前进，无产者到处都在显示自己的实力；现在，一个普遍的联合，一个组织，一支宣传队伍已经

①：删节号是原件中原有的。

②：这里是关于同盟领导计划召开一次共产主义者代表大会的日期的第一个比较肯定的表述（另见文件109、125和134）。

③：删节号是原件中原有的。

出现，无论上帝还是恶魔都休想阻挡我们达到目的。[……]

德累斯顿国家档案馆，莱比锡行政区档案，Nr. 2393（副版）

摘要①

125

卡尔·沙佩尔（伦敦）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

1846年9月初②

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请求你们尽快把这封信转交给魏特林；这是克利盖寄来的，而且是急件。我们不知道，魏特林目前在哪里，否则我们就把信直接寄给他了。

这里的通讯委员会对你们久久不来信感到很惊讶；你们最终没有再放弃你们的计划吗？我受托请你们把这方面的情况尽快告诉我们。③我们的宣传鼓动到处都取得了可观的成效；我们唯一感到不足的是缺少一个组织。如果我们取得一致意见，并组织起来，那么，任何恶魔也无法阻挡我们。

① 在副本中读到此为止。

② 该信的日期是根据普鲁士公使冯·本生1846年9月8日的信（弗兰茨·本生《詹姆斯·劳安·卡尔·约瑟亚斯·本生男爵传》1859年莱比锡版第2卷第344—345页）确定的。本生的信证明，本书刊印的这封信中提到的“外国人福音公会”是1846年9月3日在伦敦建立的。

③ 关于这一点，参看文件136。

现在，伦敦这里很热闹；德国的牧师们在虔诚主义者本生的带领下，终于挥戈上阵了。他们为了从毁灭中拯救出尽可能多的羔羊，已经成立了两个所谓的福音青年会。

为了建立一个大型的“外国人福音公会”，这些圣者于上个星期四在汉诺威大厅召开了一次大会。本生说，伦敦有3—4万名德国人，他们有的陷入极度贫困，所以需要得到宗教的慰藉；有的正遭受极其严重的诱惑，必须设法使他们免遭诱惑。他继续说道：“但是，比这更糟糕的是，社会思想在工人中间的系统传播。是的，工人们不仅开始接受这些思想，而且还满腔热情地试图在各国传播这些思想和实践无神论。如果我们继续袖手旁观，那么，欧洲就将爆发一场史无前例的社会革命。唯一的拯救办法是，一切善良的基督教徒联合起来，挫败这种不信神的企图，用基督教公会代替社会俱乐部。”这一番话是普鲁士公使本生在一次公开的大会上说的。你们对此怎么想？这些家伙害怕了。

我们的人情绪非常高涨；我们办了一份石印报纸，以便向这里的德国人发出呼吁和宣言，并要求他们不再继续上牧师们的当和使自己的理智受到压制，而是让他们到我们这边来，获得真正的人的教育，共同为人类的物质解放和精神解放而工作。这帮家伙终于暴露了真面目，他们害怕社会革命；而他们阻止这种社会革命，是为了改善无产者的状况吗？否！他们建立基督教青年会，是为了使忍饥挨饿的工人屈从、忍耐和断念。让这帮无赖见鬼去吧！我们将向他们证明，我们不再是百依百顺、唯唯诺诺的羔羊。

难道你们就不能在德文报纸上揭露这个虔诚主义者公使的行

径吗？这帮家伙可能想在德国兜售像这里所说的这类蹩脚货色，劳驾你警告那里的人，向他们揭露这个披着羊皮的豺狼。尽快来信。

你们的朋友

卡尔·沙佩尔

手稿

第一次全文发表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F.20, Nr.91

126

卡尔·沙佩尔为《普罗米修斯》写的通讯⁸⁹

1846年9月

9月，伦敦。努力争取对事物的社会改造的运动正在迅猛发展。宪章派又举行起义了，他们准备进行旨在使人类得以复苏的斗争。这一可怜的人类被牧师和当权者当猴耍得太久了：诸侯们对它进行了良好的训练，以致它主动地恭恭顺顺地把它自己的东西放进了他们的口袋；而牧师们则指定一个超感觉的鬼怪充当它的守卫者，而保卫他们大干偷盗和阴谋勾当。但是，诸侯和牧师还不完全是致使我们贫困的罪人，他们只是利用了把一个人变成另一个人的敌人的那种现存关系。除了他们以外，我们还养活成千上万的人，金钱赋予他们无限的权力，他们的恶劣行径一点也不亚于君王。如今，德国牧师正秘密潜入自由的英国，宣讲陈旧不堪的卑劣福音；托路克和契尔斯基声嘶力竭，要在普鲁士国王的

庇护下把这里的德国人赶进羊圈；本生是一个忠诚的公使，他放牧福音的羊群，用王室的金钱四处游说。古老的基督教的黑暗年代应该再来，自信的人们应该再变得虔诚，因为信仰使人幸福。富人们天天感到这种幸福：他们相信金钱的力量。可我们这些穷苦的工人呢，福音书除了给我们甜言蜜语之外，就不会有什么更好的货色了！前人的无知应当理解为后人的需要，而后来人没有预感到这一点。老天爷欺骗轻信的人们已达1800年之久，它现在也应麻痹19世纪了！你，哈雷的托路克和你，本生，福音国王的基督教普鲁士的仆人，你竟心劳日拙地给我们唱古老的摇篮曲。你们的圣经会和宣传福音的小册子，以及你们的权力欲和钱袋再也帮不了基督教的忙。基督教已老态龙钟了，让它安静休息吧！

我们的教育协会所接收的大多数是德国和斯堪的那维亚的工人。以《北极星报》编辑朱利安·哈尼为首的宪章派现在比过去更接近我们了；他们追求的目标基本上是同我们一致的。目前，我们在伦敦有两个协会，一个在西区，一个在东区，人家越反对我们，我们就活动得越起劲。已婚会员不再带子女去找牧师了，因为我们不再是基督徒，而是人，因此我们不带子女上教堂，而是带他们到协会，到那里去给他们起名字，让他们加入人类的同盟而不是加入基督教的同盟。在德国，他们早在前几年就想破除教会形式，但由于德国人谨小慎微才没有破除。你们是否每次都必须先问问你们的政府？如果这同你们的老爷没有什么关系，那首先是你们的信仰同他们毫不相干。我们自己对我们的幸福负责，因为“人间的”幸福已够我们操心了。我们认为，我们有义务公开表明，我们不再是基督徒，我们有某种比过时的信仰更

好的东西，因此，那些要结婚的人可能不久就不再去找牧师司结婚礼，而是到协会来声明彼此永远相爱，甘愿竭尽全力使婚后生活美满幸福。欧洲的共产主义者还不够团结，立宪派、共和派虽然在数量上远不如我们，但实力强大，他们结成了强有力的政党，因为他们联合起来了，因为他们有一个组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为什么不拿他们做榜样呢？我们的事业是人类的事业，这个事业太神圣了，因而我们不能不为了事业的胜利而倾注我们的全力。因此，我们打算明年初在伦敦这里召开一次大规模的共产主义者代表大会，几乎欧美各国的人们都会对它表示同情。在这次大会上，我们将心平气和地、卓有成效地讨论我们的各项原则，促成各国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联合一致。我们必须把未来行动的步骤安排妥当，本世纪的精神将锐不可当地呼啸而来，我们不知道这种精神将怎样迅猛地为自己开辟道路。因此，我们必须有所准备。

1846年《普罗米修斯。社会改革报》（黑里骚）第1/2期第38—70页

127

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关于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的公开信⁹⁰

1846年9月13日

伦敦教育协会致德国无产者

“人人皆兄弟”！

兄弟们，不久前，我们在伦敦“德意志读书会”致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居民的信上签了名，该信的标题是：《伦敦的德国人致他们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同胞》，它的目的是对后者所具有的那种无愧于德国人的坚定性表示应有的承认和赞赏。你们知道，这不是给他们的第一封信，从波罗的海和北海的海岸到阿尔卑斯山麓，从波兰的被奴役的国土到自由的德国莱茵河畔的整个德国仿佛都沉浸在一片令人欢欣鼓舞的狂喜中，都在以同样的方式向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德国人所作的努力表示敬意。这里的读书会一般是以伦敦的德国人的名义讲话的，同样，祖国的德国人则是以整个德国人民的名义讲话的，而且像读书会一样，他们都不是面向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某几个阶层，而是面向整个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德国居民的。当然他们假定，或者表面上假定，人民同国内各阶层可以划等号，而后者确实是，而且应该是人民的代表和仆人，他们永远只关心人民的幸福。

兄弟们，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密切注视了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运动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看到了它现在已被推到这样一个高度，以致我们也要说话，但并非为某一个王族或某一个民族的利益说话，而是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说话，即为人类的利益说话。各国人民老是受骗，被骗走了他们的遗产，因为他们漫不经心，而且不能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德国的兄弟们，现在有人又

要来欺骗你们了，这是他们的惯技；他们要把你们武装起来，以使用你们的鲜血去换取那种你们不能享受的利益，而且他们还相信，能够卓有成效地使用30年前曾使他们达到目的的那种手段。

“祖国、荣誉、正义”又成了伟大的口号，就像从前欺骗你们的祖先，两次欺骗你们的邻居，欺骗为自由和平等而战的英勇战士们，就像欺骗英国不幸的无产者一样，今天他们也想利用这个口号来欺骗你们！好一个祖国！这究竟是什么样的祖国啊？一些人为了它的声誉而战斗，而另一些人却希望得到它的帮助。这就是德意志祖国，就是在30多个诸侯面前吓得魂不附体的、被这30多个诸侯结成的同盟束缚得紧紧的而且还乞求得到该同盟帮助的德国，它的统一早已成了全世界的笑柄。兄弟们，就算它是一个统一、伟大和自由的国家，是令人备加颂扬的德国，这同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无产者从何时起有过祖国？脑满肠肥的钱袋的主人为了使自已脑满肠肥而对祖国歌功颂德，祖国给他们饭吃，衣穿，让他们受教育，并为他们装满钱袋；我们可不知道，祖国给过我们饭吃，给过我们衣穿和给过我们教育，倒是记得它打过我们，关过我们，甚至把我们驱逐出境；如果我们唯命是听，竟让我们和妻子儿女都忍受极端贫困——这样的祖国我们还应该热爱吗？我们还要为它献出鲜血，还要一味赞扬它吗？确实，即使我们的好心的自由派把他们所有的主子都从宝座上推下来，自己登上了宝座，我们在英国和法国这两个为人称颂的自由之地的兄弟们的苦难已向我们充分表明，我们到那时也闻不到玫瑰的芬芳。

各国人民总是受骗，他们的遗产都被骗光了。因此，你们要警惕，要紧密团结！

这种为正义和荣誉发出的极其微弱的哀鸣意味着什么呢？这

种不是发自人们肺腑的、因而为一切人所共有的权利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完全意味着荣誉！是的，你们这些好心的德国人，我们虽然有时在你们的信中看到这样的思想：一个人的遗传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他羞怯地表明，人权是不可转让的。但是，在你们的信中也潜伏着某种危险，从你们的话中可以得出你们不喜欢的结论，因为你们又在加速恢复历史的权利。只要你们不相信你们手中那些陈旧的古代文献（它们向你们提供了为某个德国君王服务的权利，而不为某个外国君王服务的权利）那么，你们在一片反对丹麦人的叫喊声中就会默不作声。要不然，你们这些德国的撰写宣言的好汉们，为什么在看到高尚的意大利人被迫堕落、波兰人被迫在无谓的战斗中阵亡的时候，保持沉默呢？是的，被压迫者是德国人，你们作为德国人所享有的荣誉，你们天生对正义的热爱必然使你们到处进行干预。当汉诺威国王肆意妄为地践踏历史的权利，普鲁士国王拒不解释他那行将就木的父王所说的话时，你们做了些什么？

兄弟们，你们看，你们的信简直空话连篇，个别地方也许带有诚挚的热情，但是很清楚，多数地方你们说的全是空话。你们在私下盘算贸易的增长，甚至“德意志舰队”会给你们带来多少好处。

因此，你们要警惕，要紧密团结！不要被闪闪发光的广告牌弄得眼花缭乱，不要卖弄荣誉、正义、祖国这类华丽的词藻，不要轻信什么你们的民族自豪感受了损害之类的胡说八道；作为德国人，谁今天有民族自豪感，谁无疑就是傻瓜，由于民族自豪感在今天荒唐透顶的，所以，谁有民族自豪感，谁就是一个双料的傻瓜。民族自豪感之所以荒唐透顶，因为我充其量只能为自己

的长处而自豪。而民族自豪感不仅荒唐可笑，而且非常有害，因为正像它把一切成见都变成狂热主义一样，它已经把无限的贫困带给了人类。我在属于某一民族之前，首先是一个人，我是作为人，而不是作为德国人降生的；作为人，我属于人类社会，而不属于德意志联邦，当你们只记得作为民族的权利，而忘了作为人的权利时，这个德意志联邦才愿意看我们一眼；作为人，我拥有人的利益，没有别的利益，当其他的什么利益同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我就为了人的利益而牺牲其他的利益。这还不清楚，不好理解吗？兄弟们，有人想使你们懂得，只有德国人是你们的兄弟；有人想挑拨你们，让你们去反对像你们一样的人；有人想挑动你们的狂热去反对像你们一样的人，让你们用这些人的鲜血来沐浴。为什么呢？就是要让别人也享受到亲爱的德意志祖国的自由。兄弟们，你们不能要这样的自由，你们不能陶醉于既不能改善你们的外部状况，又不能满足你们内在欲望的这种思想。否则，你们将一如既往，仍然是奴隶，你们否认你们已经忘记了“人人皆兄弟，相爱是纽带”这条真理。你们看，我们这些人是在国外对你们讲这番话的，尽管我们中间有德国人、丹麦人，甚至有欧洲其他各国的人的代表，但我们并不自称是德国人或者丹麦人。我们都是人，我们通过消除使民族与民族之间互相隔离、互相为敌的一切偏见，日益接近人类的理想。你们也可以这样做；不要赞成你们的所谓代表的可笑叫喊，你们的代表同你们的君王相比，更是而且还将长期是你们的压迫者；如果你们提高警惕，你们就会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决的爱和恨来消除你们同邻邦之间的隔阂，就会像我们在这里所做的那样，同丹麦人握手言欢，就会把自己武装起来，共同反对你们的真正的敌人。

兄弟们，各国人民总是受骗，他们的遗产都被骗光了，就因为他们漫不经心，不能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如果你们真诚地想要得到你们自己的幸福和人类的幸福，你们就要警惕，就要紧密团结！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给德国无产者的公开信》1846年伦敦版〈传单〉

130

关于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成立一周年纪念活动的报道

1846年9月21日

民主派兄弟协会于9月21日即上星期一开始举行纪念该协会成立一周年的活动，因为这一天是1792年法兰西共和国成立纪念日。庆祝活动以大会餐的形式在伊斯灵顿白水道旅馆举行。欧洲各国民主派都参加了庆祝活动，从而实现了“人人皆兄弟”这一协会的口号。根据菲格斯·奥康瑙尔、让·奥·米歇洛、朱利安·哈尼、卡尔·沙佩尔、奥博尔斯基上校、西韦尔斯教授和赛米尔·基德的提议，由贝利耶-封丹医生担任大会主席；根据菲力浦·麦格拉斯和亨利希·鲍威尔的提议，由托马斯·克拉克担任副主席。〔……〕

接着，朱利安·哈尼起立宣读了下列“信件”：

民主派兄弟协会致各国民主派

“人人皆兄弟”

同胞们：

在我们举行本协会成立一周年庆祝会之际，即在一个已经载入欧洲进步史册的事件的周年纪念日，你们同我们欢聚一堂，我们认为，这是扼要阐明本协会的起源、原则和宗旨的适当时机。

[……] ①

我们的唯一宗旨是实现上面宣布的原则。在遵循这一宗旨的时候，我们力求增进相互了解，努力宣传普遍友好合作的原则。我们总是明确地指出，我们拒绝任何试图建立一个“政党”的思想，即建立一个对目前已在英国存在的政党的附加政党。我们不想同任何人竞争，而是支持一切真诚团结、完成人民解放事业的人们；鉴于这个宗旨，凡是深信我们的原则正当，深信我们的动机纯洁的人，我们都欢迎加入本协会。无论如何，我们今后也要按照我们的义务来行动，我们相信，这都是我们对同胞们应尽的义务，我们让他们根据我们的行动对我们作出评价。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所作的努力，由于深得英国和大陆的一些杰出爱国志士的赞同而得到了补偿。我们给美国人民的信^②在该共和国的工人报刊上发表，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同伟大的宪章派的合作中，我们维护了不幸的波兰人的事业。^③我们相信，

① 下面是对原则的说明，这个说明在作了细致的文字上的修改以后已收入1847年12月的章程的总纲，参见注115。

② 见文件105。

③ 参看文件79。

我们所作的努力并非毫无收获。我们的一些会员现在已返回他们在大陆的故乡，有的目前正在欧洲各地旅行。我们的兄弟们，他们将在所到各国宣传我们的原则，并告知我们在其他国家的同胞，在不列颠群岛的首府已经结成了一个男儿组织，他们谴责苦难的过去和仍然不幸的现在所产生的犯罪行为 and 欺骗伎俩，渴望有一个比较幸福的未来，并为它工作，所以，这一组织将是正义、千百万人的解放和各国的友爱取得胜利的见证。

书记签名：

乔·朱利安·哈尼（英国）

卡尔·沙佩尔（德国）

让·奥·米歇洛（法国）

彼得·霍尔姆（斯堪的那维亚）

雅·沙贝利茨（瑞士）

路德维克·奥博尔斯基（波兰）

N.涅梅特（匈牙利）

1846年9月21日

[……] 卡尔·沙佩尔说：姊妹们，兄弟们，各国的友说这一祝词，我是由衷赞成的，因为我深信，文明欧洲的被压迫者，只要相互联合，一致要求他们的权利，要求正义，就能赢得这种友爱。是的，他们不必使用暴力就将赢得这种友爱，因为文明的、团结的、强大的人民要是提出这种要求，世界上任何一个暴君也不敢加以拒绝。（热烈鼓掌）本协会的宗旨是，根除民族仇恨，消除民族成见，宣传人人都属于一个大家庭、人人皆兄弟这一伟大原则，我们在人数方面虽然还是少数，但我们有希望，有勇气，因为我们的原则是正确的，是正义的，真理和正义在我

们一边，因而我们最终必将获得胜利。不管，我们将获得胜利。因为像菲格斯·奥康瑙尔先生、麦格拉斯先生和克拉克先生这样的人都在我们中间，亲临赞助本协会的目标和原则，所以我们可以说未来是属于我们的。奥康瑙尔先生和宪章派执行委员会委员们不久将成为议会议员，我希望，他们成为国王的顾问，然后为被压迫者谋福利，暴君遭殃等等的日子已为期不远了。（鼓掌）

“愿法国革命的光荣原则迅速在全世界复活”。是的，我希望，我向往这一点，但是，从这次大革命开始以来，已经57年过去了，现在，我们对先辈们所提出的要求已感到不满足，我们还要提出更多的要求。我们不但要从僧侣和贵族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而且还要从路特希尔德公司的老爷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鼓掌）；总之，要从钱袋公司的老爷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鼓掌）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时代，当时圣母是万能的，她统治全世界，她惩罚人，但养活了人。贵族和人民联合起来，推翻了她的权力；但是，胜利以后，贵族占据了圣母的位置，竟拿更大的棍棒去打击人民，给人民的食粮更少；现在，贵族又被推翻了；我们看到，钱袋统治着文明世界，拿铁棍打击人民，让人民忍饥挨饿。人民曾为教会、为贵族、为钱袋作过斗争，但遭受它们的虐待，而遭受钱袋的虐待最深。现在，人民开始为自己而斗争，为土地而斗争，他们将获得土地。（热烈鼓掌）一个人的价值将不再而且不应再由他的钱袋来决定。我们不愿意再说，他值1000英镑或者他值100万英镑；不再这样说了，我们要根据一个人的内在价值来评价他；我们将要说，他有一点价值，因为他是一个诚实的人，否则，他就毫无价值。姊妹们，兄弟们，让我们联合起来，权利和正义就会实现，人类将获得自由和幸福，人间将变成天堂。前进吧，

胜利将属于我们。（热烈鼓掌）

朱利安·哈尼说：「……」德意志联邦议会决定要迫害德国共产主义者，把共产主义定为谋反罪。而德国共产主义者的原则就是今天晚上在我们的信中宣布的原则，因此，我们必须同情我们的被迫害的兄弟。（鼓掌）德意志各邦政府已经向人民宣战，因此，人民必须向它们宣战。（鼓掌）我们同情德国人，还要给他们出主意。有一个傻瓜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为德意志民族大发雷霆。他说，德国将对丹麦宣布一场殊死战争。相反，我们则要向德国的朋友们提出忠告：让丹麦安宁，而要对自己的可恶的各邦政府宣布一场殊死战争，同时友好地请丹麦人以他们为榜样。（热烈鼓掌）民主派兄弟协会还处于初期发展阶段，它还仅仅是一颗橡树的种籽，但它一定会长成一棵高大挺拔的橡树；它还仅仅是一块不到巴掌大的云团，但它终将给世界上的王权蒙上阴影，并用它的巨雷击倒人类的压迫者和破坏者。（热烈鼓掌）

接着，**约瑟夫·莫尔**领唱著名的《马赛曲》；全场兴高采烈地同声和唱。〔……〕

亨·鲍威尔先生也用德语向与会者讲了话。下面是他讲话的主要内容：兄弟们，我们今天的纪念活动有双重意义：我们在这里聚会一是纪念法兰西共和国的成立，二是庆祝民主派兄弟协会成立一周年。宣布人类国际友爱的虽然是法兰西共和国，但由于当时条件所限，法国未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个原则。我们也宣布同样的原则，你们看，本协会也遵循这一原则。我们的人虽然还不多，但是，一条崇高的原则绝对不需要强迫很多人来承认。原则只需要真实，而不需要别的。（鼓掌）但是，光有原则还不

够，还必须加以实行，必须使它成为事实。本协会在达到其目前这种地位以前，克服了很大的困难；但我们很顽强，当我们环顾四周时，就可以自豪地说：“你们看！请看这里的一个事实，各国之间的友爱已成为现实！”（鼓掌）欧洲各国的代表已经在这里联合起来，彼此亲密无间，和谐一致；请相信我，如果我们继续改善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协会，使我们这些有着兄弟情谊的人团结得紧密更紧密，那么，我们就将给各国树立一个榜样，让他们最终仿效这个榜样。如果我们使我们的协会这个实际榜样成为一个既成事实，不辞辛劳，利用一切可能向全世界宣布我们的原则，如果我们做到这一点，那么，兄弟们，毫无疑问，世界各国就会像我们这些来自欧洲各国的人在这里联合起来一样，在不远的将来忘记它们彼此之间的争端和战争，结成普遍的兄弟联盟，为了一个目标而联合起来——通过普遍的兄弟般的友谊实现人类的普遍幸福。（热烈鼓掌）

普芬德先生也用德语讲了话，他的讲话博得了热烈的掌声。

[……]

1846年9月26日《北极星报》（伦敦）

节录①

第463号

① 除了这里提到的几个发言者外，托·克拉克、让·奥·米歇尔、菲·奥康瑙尔、麦格拉斯、施特劳斯（德国）、奥博尔斯基上校、西韦尔斯教授和赛·基德也相继讲了话。

134

正义者同盟人民议事会告同盟书⁹¹

1846年11月

兄弟们！

我们受托担任最高领导，所以认为把这个同盟书寄给你们，乃是我们的责任，请你们对它给予应有的重视和尊重。

1.如果我们放眼看一看当前欧洲的形势，特别是德国的形势，那就不能否认，社会的和共产主义的思想到处都取得了可喜的胜利。无论哪一个党派，如果不或多或少地坚决要求改革现存社会，那么，它就不可能得到赞同。

促使当代这个波澜壮阔的运动取得更大的发展，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领导它——，这就是我们的任务。因为只有通过这样的途径，我们才能缔造一个坚强的党，才能顺利地开展对敌斗争。遗憾的是，至今却一事无成。强烈反对当代社会秩序，或者更确切地说，反对当代社会混乱，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愿望是一致的。但是，在斗争方法上，我们却存在分歧。起初，人们认为，应该借助于提出共产主义的社会体系来进行工作，但很快就弄明白，这是一条错误的途径。值得高兴的是，现在大家已经完全不兜售这样的体系了。尽管如此，在这方面还是没有统一。对待宗教派别和激进的资产阶级应采取什么态度，我们还不清楚。能给大家起路标作用的、简单的共产主义信条还没有制订出来。这样一来，在许多地方，我们本来应该齐心协力地工作，可我们却常

常相互争吵不休。这种有害的做法，应该而且必须抛弃。但是，依靠书信往来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所以，我们打算在1847年5月1日召开一次代表大会。每个〔区部〕都应该派出一名代表。其次，只有一个支部的地方，应该联合其他也只有一个支部的地方，共同选出一名代表。如果这一点办不到，那就尽可能从本支部选出自己的代表。请你们注意，应该选十分熟悉当地的思潮，并且在其发言中贯串这些思潮的人当代表。会议期间，保证解决代表们的食宿问题。这次会议将是1848年国际共产主义者代表大会的前奏。届时，世界各国的新学说拥护者都将被公开邀请参加大会。⁹²我们希望，那时我们将能达到这样的统一和具有这样的力量，即能给我们整个事业指出一个正确的方向。

2. 你们大概已经知道，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比利时等国，激进派公开同无足轻重的旧自由主义决裂并打出了自己的旗号。激进派主要由小资产阶级组成。小资产阶级日益遭到不断壮大的金钱贵族阶级的排挤，并且看到，自己的末日正迅速逼近。它不仅不拒绝社会改革^①，而且承认这种改革的必要性。我们认为，当前，无产阶级去接近激进派是适宜的，也是必要的。因此，我们认为，应该处处设法同激进派建立联系，但在原则问题上不让步。我们应该尽量向他们指出，他们被抛入无产者队伍中去的时刻已为期不远，只有社会改革，才能避免其灭亡的命运。如果我们能使激进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实行联合，那么，一个史无前例的波澜壮阔的新时期很快就要开始。所以，兄弟们，是时候了，着手干吧！

^① 在德国和法国还没有达到这一点。

3.某些共产主义者寄予德国天主教派和“光明之友”⁹³的希望显然是不能实现的。我们从不指望这一点，因为这是修补千疮百孔的老房子——白费力气。所以，请你们设法使那些至今仍抱有这种想法的人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我们不对旧的东西有过多的期望，也就不会幻想，束缚人们头脑和热情的旧世界的各种形式能够转到新世界中来，——因为这是不可能的。

4.请你们注意傅立叶派的阴谋诡计，并且要求你们，不论在哪里，只要这些卑鄙小人一出来表演，就坚决同他们斗。他们本身并不危险，但他们有钱，到处派特使，更主要的，他们竟拼命歪曲共产主义学说。因此，对他们，我们不应该再掉以轻心了，而是要公开向他们进击。他们那种把自己当成真正的基督徒的可笑企图，他们的军事设施和无数的法令，为了使劳动吸引人而建立的资本联合体，——这一切就提供了同他们斗争的足够材料。他们荒谬地拜倒在傅立叶的脚下，自我吹嘘，却不懂得，他们对人的一切生活关系实行调节，恰恰剥夺了人的自由，把人变成了温室里的不会开花结果的植物。他们不懂得，这个时代的全部愿望就是要求摆脱无数的法令和规章制度形成的桎梏，因为我们不愿像苍蝇被束缚在蜘蛛网中一样，而他们只想把我们更紧地束缚在这个桎梏里。这些可怜的人，在谈论使劳动变成吸引人的手段时，似乎不知道，在以自然规律为基础的社会里，劳动就是生命的活动，个人的活动，根本不需要任何吸引人的手段，劳动本身就是一切能够存在的事物中最能吸引人的事情。

5.请你们特别注意基督教日耳曼普鲁士派的阴谋。这个新教耶稣教派的信徒，是当代的蒙昧主义者。他们依靠自己浅薄而又冷酷无情的教义，无法战胜这新兴的、充满活力的运动，可又决心

不惜代价地把人民按捺在奴役的深渊之中，就只好到处呼叫：警察！警察！如果这一招还不奏效，他们就妄图依靠歪曲社会原理，或者对传播该学说的人进行诽谤，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必须撕下这帮人的假面具，让大家看清他们的真面目而疏远他们。他们现在的全部打算是：在无产者中间寻找自己的支持者，在我们之间挑起不和，而在转折关头，建立一支民众的队伍。这支队伍，就像1792年的万第人那样，以上帝和救世主的名义向正义的思想观念宣战。为了避免血流成河，必须制止这种事情发生。请别以为我们把这件事情看得轻而易举。这帮人是得到各邦政府和牧师用金钱和警察支持的。他们已经在柏林、汉堡、斯图加特、巴塞尔、巴黎、伦敦等地建立了基督教手工业者联合会。他们相互保持联系，派遣工人当特使，必要时，甚至打着共产主义旗号，以便招徕支持者。因此，我们应该在所有报纸上，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刻不容缓地揭露这些人。在伦敦，他们的阴谋活动是明目张胆的，因为，被共产主义者的成绩吓破了胆的牧师们，同普鲁士驻伦敦公使本生——一位笃信宗教的骑士，勾结在一起，已经组织了两个基督教手工业者联合会。其人数虽不足20，但因得到四方的支援，所以它产生一定影响。也就是说，他们知道自己的教义吸引不了任何人，所以，他们许诺人们死后可以升入天堂，同时，特别是许诺人们今世能得到物质利益，正像人们所说的，本生以及当地的牧师和德国的银行家，已拿出了一笔相当大的款子。不久前在伦敦逗留的普鲁士公主也给了25英镑（60法郎），并且答应以后每年汇给同样的款额。最后，还有普鲁士国王陛下，虔诚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也答应每年捐献60塔勒。他们又在组织一个基督教日耳曼图书室，并已向书商、虔诚的本生

订购了150塔勒的图书，而本生已承担这个义务并说将通过最优惠的途径搞到这些书。其次，他们还往巴黎、汉堡、柏林、巴塞尔写信，委托在该地的特使对那些打算去伦敦的工人说教育协会的坏话，向他们介绍在基督教联合会可以得到的好处，并让他们在到达之后，去找那些可以立即带他们去见牧师的人。这帮人甚至还想，在明年春天派人去船埠欢迎到来的工人，并送他们去基督教联合会。因此，我们号召你们，不仅要就地狠狠打击蒙昧主义者的这些阴谋活动，而且要使那些要去伦敦的工人警惕新教基督教派的阴谋。普鲁士公使馆在当地的主要代理人有：一个是被人骂作博士的埃伦鲍姆，此人企图在有60名成员的德意志读书会里歪曲我们的原理；其次，是一些德国新教牧师，他们手里的王牌是一个候补博士文采尔，并领导基督教手工业者联合会；最后就是那个名叫胡伯特的德国流亡者。此人虽然不同本生一个鼻孔出气，但其卑鄙下流的程度并不亚于前者，是一个地道的基督教日尔曼人。兄弟们，你们看，我们必须同各个方面进行斗争。因此，不管你是什么人，都起来战斗吧！正义和真理将是你们的战斗号召，让我们勇敢地同人类的敌人作斗争吧！请你们相信：斗争越困难，胜利的果实就越香甜。

6. 我们要求你们，每两个月向我们详细报告一次你们的成绩和你们那儿发生的事情。收到报告后过一个月，我们再向各地详细报告有关整个组织的工作成绩和发生的重大事件，报告中的特别重要之点，将逐字逐句地转引。

我们希望，你们准确无误地实现我们的这个要求，而我们也尽最大可能履行我们的责任，我们希望你们也同样做到这一点。如果有地方发生重大事件，请立即报告我们，以便我们能采

取紧急措施。

7.今后我们请求你们，如果你们之间出现不和现象，一定要立即消除。在对敌斗争中要紧密地团结起来，牢记：团结就是力量。

意见分歧将在代表大会上设法解决，而在这之前，则需要等待。兄弟们，你们每一个人，只要他真正珍视我们的神圣事业，就一定懂得，现在不是计较个人得失的时候，相反，应该把它置之脑后。所以，你们要警惕，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如果你们之中有人把个人利益置于我们原则的胜利之上，那就尽快把他清除出去。

8.收到这个告同盟书以后，请立即向我们提供一份有关你们当地的情况的详细报告，以便我们能建立一个总的普遍的组织。

9.请你们尽自己的能力，对在瑞士出版的杂志^①给以支持。因为我们认为：关于在什么地方，采取什么方式创立总的机关报的问题，应提交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讨论决定。

10.因为迫切需要让大家确切知道我们的现状，所以请你们就以下三个问题在各支部进行讨论：

第一个问题：无产阶级对待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我们接近小资产阶级或激进资产阶级是否适宜？如果适宜，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实现它最容易、最正确？

第二个问题：无产阶级对各宗教派别应采取什么态度？无产阶级去接近这个或那个派别是否有可能？是否适宜？如果可能，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去接近最容易、最正确？

第三个问题：我们对社会党派和共产主义党派的态度是什么？

^① 很可能指《普罗米修斯》，参看注89。

同所有的社会党派实行普遍的联合是否适宜、是否有可能？如果可能，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才能最快、最正确地做到这一点？

为使所有区部主席都能就这些问题给下属各支部的讨论以适当引导，请你们事先在〔区部〕酝酿。我们对这些问题不作进一步的分析，因为在确定我们的方针之前，想先了解大家的意见。我们对目前形势的看法，你们可以参看这个告同盟书第1、3和4点。

讨论一结束，请把盟员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和愿望立即告诉我们。

迫切希望你们勇敢地、积极地支持我们的工作。向你们大家致以兄弟般的问候！

◀ 1848年民主手册 ▶

1847年莱比锡版第282—290页

135

伦敦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①

1846年11月11日

11月11日于伦敦

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亲爱的朋友们：

由于各种事务缠身和经常不断的斗争，我们一直未能向你们

^① 卡尔·沙佩尔起草。

报告王军：现在我们思尔普这个难关。

你们10月13日的来信^①，使我们很感兴趣和非常高兴。我们的原则在德国取得的胜利，令人异常振奋；要在反对普鲁士公使馆和本地牧师们的阴谋诡计的斗争中经受住考验，这种振奋是必不可少的。在伦敦，事态变得严重了：普鲁士国王、笃信宗教的骑士木生、德国的牧师们、银行家们等等，为了对付几百个贫穷的无产者而结成了联盟。他们感到自己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进行斗争，就在教堂的讲台上向上帝求援，求它保佑在伦敦的德国青年人的心灵不受无神论和共产主义的毒害，求它挥动力大无穷的手掌粉碎我们的图谋不轨。可他们至今一无所获，反而火上浇油。我们这些毫不知名的人竟变成大名鼎鼎的人物了。现在，人人都想认识一下可怕的共产主义者，都想亲眼看看我们究竟是不是真的像魔鬼一样，头上长角，脚上有蹄，屁股上拉条小尾巴；因此，每逢晚上我们开会，会场总是挤得水泄不通，我们的房东现在不得不扩大房间。你们当然想象得出，在讨论时我们说话并不那么客气；我们对他们说，他们有本事的话，完全可以当众反驳我们的原则；有几个主要的伪君子，已经光临过我们的会议，但是，他们即使光临了，至今却只会翻翻白眼，以基督教徒逆来顺受的态度无可奈何地叹息几声。这些笃信上帝的先生们恐怕常常叹息，叹息他们总是盼不来一支当然比上帝更能保佑他们的几百人的普鲁士宪兵队。因为在这个糟糕透顶的英国，警察简直是瞎子，宪章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其他各种各样的“主义者”在他们的鼻子底下走来走去，他们也注意不到，只会追捕骗子——太糟糕了！！

^① 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

这些人看到自己的主张不奏效，所以就用物质利益引诱人们。现在他们拥有相当多的资金；可惜在今天的社会里，金钱是至高无上的，万能的，因此我们要紧密地团结起来，赢得这场斗争。本生已捐献了应捐的钱；普鲁士公主（前几天在这里）捐了25英镑，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寄来了60塔勒，并答应今后每年捐献60塔勒。他们已经收到这些钱并且得到了德国的马屁精的50英镑资助。你们看，这个所谓的基督教德意志青年会已经拥有相当可观的资金，足以用来同我们抗衡；可是，它至今还只有40名成员，其中15--20名是工人，其余的是牧师、学者和商人，这些人很少参加会议，只是躲在幕后。

此外，这里还有一个德意志读书会，其主要代表是资产阶级分子；现在它大约有60名会员，它的宗旨是传播和继承德意志文化和思想！它的大部分成员是共和主义者。在这个读书会里有普鲁士公使的一个走狗，名叫埃伦鲍姆博士，据说这不是他的真名。他的任务是歪曲我们的原则，这一点他自然没有得逞。该会的许多会员不倾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我们想尽我们的力量对这些人施加影响。

在这个基督教青年会中，有一个名叫文采尔的候补博士，此人在这起着主要作用，也就是说，他被秘密委员会任命为牧羊人；此外，还有一个名叫胡伯特的德国流亡者，此人虽不同普鲁士公使一个鼻孔出气，但其卑鄙下流的程度并不亚于前者。这个人在他们中间，也可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此人时而也暴露出一些立宪主义和共和主义的思想，因此他往往不能取信于他人，从而成了他们行动的障碍。他们的委员会会议通常在德国牧师施泰因科普夫家里召开，他们在会议上决定如何行动；谁该进入委员会

等问题，其他会员不能过问，正像不能过问委员会的决议一样。

他们同柏林、汉堡、斯图加特、巴塞尔和巴黎的基督教工人联合会有通信联系，并请求这些联合会会员警告想到伦敦去的工人不要受可怕的共产主义者的影响，把他们的会址告诉那些工人。此外，他们还打算派特使到轮船码头，把他们带往我们的魔爪伸不到的地方去。这就要求我们写信给所有与我们有通信联系的地方，请我们的朋友把我们的地址告诉将要到伦敦来的工人。所以我们也请你们给德国所有同你们有联系的地方，告诉他们，我们的地址是：霍尔博恩车站德罗利巷三间房191号，将要来的工人可以在那里得到食宿，只需支付相当便宜的费用。

当初，基督教兄弟们允许任何一个外国人参加他们的联合会，而不需要任何人介绍。我们听说以后，我们中的一个人就前往那里，同这帮家伙进行讨论，把他们逼得几乎绝望。两星期以后，我们又派了另外两个人去，这两个人通晓圣经。他们把那帮人说得哑口无言，直至反唇相讥。心平气和地、严肃认真地向他们讲清了道理以后，他们无言以对，于是就开吹胡子瞪眼睛，怒发冲冠，祈求上帝保佑，最后仰天长叹！上帝，共产主义者不是疯子，将来也不会变成疯子。他们得到的回答是：我们宁愿同共产主义者一起在疯人院里生活，也不愿同你们一起生活在天堂里。现在，在他们阵营里充满恐惧；他们自然害怕我们再派人去，在那普鲁士国王赞助的联合会里宣扬共产主义，最后使那些尚未完全被愚弄的工人同他们疏远。他们举行了一次秘密的委员会会议，据说他们在会上决定，将来，外国人必须经人介绍才能进入他们的联合会；第二，允许我们的协会会员无条件进入。这是有据可查的。

青年会决定购买150塔勒的书籍，而本生承担了这个义务，他说将通过**最优惠的途径**搞到这批图书。你们看，对他的孩子简直关怀备至！！！！

现在来谈谈我们的协会。我们的大厅现在扩大了，坐400人绰绰有余。有几个艺术家是我们协会的会员，把大厅布置得很讲究，真是帮了我们协会的大忙。尽管现在是淡季，在这里的工人少，我们仍然有300人左右。我们定期开会，热烈地讨论未来的宗教以及协会会员提出的问题。^①每两周有一次学术报告会。在上一个星期日，我们协会的会员，诗人厄内斯特·琼斯用德语向我们作了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报告；会员们都说报告作得很好。星期日，即11月30日，哈尼将用英语向我们作关于英国宪章运动的产生及其成就的报告。在这次报告之后，再过两周，贝利耶-封丹医生将用法语向我们作关于法国无产阶级状况的报告。

看到我们协会的会员们那么热心地参加讨论，真是令人高兴；很多还不善于当众发言的人，先把自己的意见写出来，然后在会上宣读。我们已经听过几篇很出色的文章，并准备把它们寄给《人民代言者报》发表。工人们每天要工作10—12小时，要定期参加会议，要学习英语，学习绘图等等，每天晚上还从自己的睡眠时间中挤出几小时来写自己的意见，这确实是了不起的事。

我们的许多会员还写诗，其中大部分诗虽然不按韵律，但从内容上看都是非常出色的。我们随信给你们附去安德斯的一首诗。安德斯徒步漫游了欧洲、亚洲和非洲，经历了许多冒险的事情；现在他非常热心地拥护我们的原则。他是排字工人。

^① 参看注58和59。

从7月开始，我们协会有120名会员离开了这里，他们目前都在欧洲各地传播我们的原则。

东区的协会，同我们协会是一样的，现在已有120多名会员，如果今后它还这样发展下去，很快就会超过西区的协会。我们这边经常派人到那边去作报告和参加讨论。东区的协会和基督教青年会都是在7月成立的。

有人从美国写信告诉我们，说魏特林要到那里去，他从明年起将担任《人民代言者报》的编辑。他已经走了吗^①？有人劝我们同他恢复友好关系，但在目前情况下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相信，魏特林在美国呆不上三个月就会同所有的人吵翻，因为任何一个正派人都不会盲目听从他，而同他能够和睦相处的只有那些盲目听从他的人。

巴黎和瑞士的情况，恩格斯大概已经告诉你们了。我们从德国，特别是从汉堡和柏林获悉了非常令人可喜的消息。所有的工厂都在热烈讨论共产主义。

我们有责任提醒你们注意傅立叶派。这帮人现在到处游说，试图传播他们那种淡而无味的学说。最近，孔西德朗在洛桑和日内瓦作了演讲；一个名叫埃纳坎的人也在法国游说；就是在这里，两周以前，也有人在英国人中间成立了一个傅立叶协会。他们的学说是多么乏味，他们为把自己说成是唯一的真正的基督徒而作的努力是多么可笑，他们试图创立一门社会科学的狂妄劲是多么无聊，要不是他们在其每一次讲演中开始……^②，我们完全可以

① 1846年12月底，魏特林从欧洲启程之前，在巴黎作了短暂停留，当他1847年初到达纽约时，《人民代言者报》已经停刊。

② 手稿至此中断。

不予理采。

手稿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F.20，Nr.96

137

约瑟夫·魏德迈（希尔德舍）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

1847年1月8日

1847年1月8日于希尔德舍

亲爱的马 思：

这次又有一封魏特林的信落到了我的手里，这封信他虽没有公开通过书店，而是私下寄给克利盖的，但克利盖并没有完全把它当作私人信件处理，而是郑重其事地把它寄回了欧洲。据我对信的内容和对魏特林的性格的一般了解，我能猜到其用意，但是，有些事实，不了解其详情，就很难对付。我把这封信寄给你，希望你给我和这里的人说明一下，应该怎样处理这封信。同时你将从中看到，美国方面最近可能会对我们全党，特别是对你发起什么样的进攻，因为魏特林目前在那里亲自出马，加强了克利盖的实力。但是，如果你不在这封信上另作文章，至少不供给报纸使用，我将很高兴。看来魏特林以为我们这里除了反对他就无事可做了，其实，除了鄂斯纳布鲁克的那一帮手工业者外，几乎没有人把他放在心上。据我所知，《人民代言者报》也只有有

那里生存,自从它刊登那篇批判文章^①以来,我再也没有读过它。

[……] ^②

请把信中的附条转交给沃尔弗。

请转达我对日果的问候。埃德加^③躲到哪里去了?

祝你安好!

你的

约·魏·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 F20, Nr.10

节录

第一次发表

① 文件88。

② 下面是魏特林1846年5月15日给克利盖的信的一段。

③ 埃德加·冯·威斯特华伦。

第三章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创建及其纲领 《共产党宣言》的制定

(1847年1月至1848年2月)

138

伦敦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⁹⁴

1847年1月20日

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下列署名的伦敦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成员授权公民约瑟夫·莫尔,代表他们同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进行会谈,并口头转告伦敦方面的情况。同时,建议布鲁塞尔委员会对公民莫尔——他是我们委员会的成员——就所有重要问题作出准确的解释,并把你们要转告伦敦委员会的一切告诉他。

卡尔·沙佩尔

亨利希·鲍威尔

卡尔·普芬德

弗里德里希·德珀尔

阿尔伯特·列曼

卡尔·莫尔

约翰·哥贝尔

1847年1月20日于伦敦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F.20，Nr.99

139

正义者同盟人民议事会告同盟书

1847年2月

亲爱的兄弟们！

我们承担起主持工作的责任^①以后，曾希望得到各方面的有力支持。但我们的希望落空了。因为有些地方甚至没有给我们写过一封信或一个报告。这种不正常的做法应该结束。目前，当地平线上笼罩着乌云的时候，当无处不表现出生机勃勃的时代精神的时候，当我们显然是在迎接着一场波澜壮阔的、决定人类世代命运的革命运动的时候，可不能睡大觉，一刻也不能突出个人。不！现在人类要求每个战士都应履行自己的职责。

人形魔鬼吞下了不幸的波兰的最后部分，现在他们联合起来，胡作非为，试图消灭法国人民的自由精神，随时准备攻击瑞士和意大利；他们不是公正地对待各国人民，而是用霰弹和刺刀

^① 参看注91。

强迫他们保持沉默。成千上万的俄国蛮子驻扎在德国边境，随时准备吞并中欧和西欧各国，并把我们的父老兄弟赶往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糟蹋我们的妻子女儿。兄弟们！我们能袖手旁观吗？我们能光有言论，没有实际行动吗？我们能缩着脖子，屈服于奴役吗？！不能，我们听见了你们大家的呼喊，我们或者胜利，或者死亡。因此，兄弟们！在人民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如果战斗就在这个春天打响，那么，就请投身到正义的战士的最前列中去，并且表现出我们能像掌握语言那样好地掌握武器。同时，你们走到哪里，就要把共产主义原理传播到哪里，人民一定会高兴地欢迎这个卓越的学说的，因为这个学说使他们有希望从苦难中获得彻底解放。如果暴君要在今年春天发动进攻，那么，这就是我们必须给你们提供的一点意见。到那时，我们的作用也将告终，而我们最后的一项任务将是，以我们的言行来促使那些掌握共产主义原理的人进入临时政府。如果相反，敌人今年还不动手，那我们就该全力以赴，认认真真地来组织我们的党。只有在欧洲无产阶级的帮助下，人类才能获得自己的解放。因此，我们的神圣职责是：尽快组织起我们的战斗力量，并尽速地使无产者摒弃信口雌黄的自由派的影响。因为自由派可能会参加政治革命，目的是能够戴着总统的冠冕去占领君主的王位，他们愿意使我们摆脱君主的暴政，是为了置我们于钱袋的专制统治之下。

我们在第一个告同盟书^①里曾提出在5月初召开一次共产主义者代表大会。但现在我们不得不把它推迟到今年6月1日。^②因

① 文件134。

② 在原件中有这样的脚注：关于代表大会的讨论将在以后报道。

为发生了一些不测的事情，必须采取特别的预防措施。

建议你们赶紧选出参加大会的代表，并为他们筹集必要的旅费。为了能在6月1日召开第一次会议，全体代表应于5月30日报到。大会上，我们将首先报告工作，并授权代表们决定我们今后的常设机构所在地。

第二，必须进行彻底的改组。人类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前发展，人们的意识正在觉醒，随着这种意识觉醒的是人们对自由的渴望，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到人们的各种需要，不要强使他们屈从于违背自己意愿的各种法律。

第三，需要制订一个简明的共产主义信条，用欧洲各种文字印刷出来，并在各国广为散发。这一点十分重要，因而，请你们集中注意力，认真讨论下面与此有关的一些问题，以便我们能最终一劳永逸地弄清楚，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

第四，应该谈一谈有关创立一种能全面代表我们党的报纸。^①你们大概不难理解，没有专门的机关报，一个党是难以存在的。因此，我们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全力以赴保证这个刊物于6月份开始出版。全体代表都必须搞清楚，在他们本地区能有多大的销售量。

最后一点，也就是第五点，任命将要分赴各地去进行组织工作的代表。因此，请把你们知道的德国和斯堪的那维亚的全部联系地址，以及至今没有向你们报告工作的人的地址，告诉你们的代表。把这几点和你们打算提交大会的问题，一起讨论一下，并把必要的细则告诉你们的代表。

^① 参看文件140。

至于当前的状况，那么，我们虽然可以说，成员的数量确是不少，但遗憾的是，还必须承认，我们既缺乏紧密的团结，又缺乏和谐的工作。而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永远不可能对事物的进程施加真正的影响。很遗憾，共产主义者还没有组织坚强的政党，还没有建立一定的牢固的根据地，因而在那些共产主义者还不够坚定的地方，他们就经常依附于其他党派。他们说，反正这些党派也是要求进步的，可不能对人家过于求全责备。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当前，我们是站在运动的前列，我们就应该有自己的旗帜，而且一定要时刻团结在这面旗帜的周围，不应该湮没在庸夫俗子的汪洋大海之中，如果我们的队伍能紧密团结、奋勇前进，那么，其余的人就会跟随我们前进。如果我们是四分五裂、依附于其他党派的话，则必将永远一事无成。我们应该以站在英国运动前头的宪章派为榜样。他们提出了六点宪章，并声明：“谁不支持我们，谁就是反对我们。”起初，虽然庸夫俗子们都因此发出绝望的狂吠，但现在呢，这些人开始越来越向他们靠拢了。我们也应该提出自己的目标，提出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并坚持这些目标和原理，而需要讨论的只是，采取什么办法能促使这些目标更容易更迅速地实现，你们到时候就会看到。我们在前头走，凡夫俗子大军就会尾随而来。

我们从瑞典方面得到了十分喜人的消息。共产主义思想在那里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只是还杂掺着一些基督教的色彩，就像我们当初的情形一样。但是，这一定会妥善解决的。我们的不少兄弟打算在瑞典各地组织公开的无产阶级联合会。在斯德哥尔摩，他们已经着手干起来了。

不论君主或牧师采取什么办法来反对我们，一切都会对我们

有利的，因此，勇敢地前进吧！

在法国和比利时，我们按新的方式暂时组织起来了。我们希望，至今还是我们主要宣传阵地的巴黎，将来依然如此。我们希望并要求巴黎的兄弟们在将来同样要严格履行自己的职责，开办一所学校，以培养能在世界各地传播我们学说的人才。

伯尔尼传来了喜讯：我们的兄弟将在那里出版一种共产主义杂志。^①请你们给予支持。对瑞士来说创办一个代表我们党的刊物是极为必要的。但十分遗憾，由于近两年来恼人的意见分歧，在那里我们处于涣散状态。信奉基督教的共产主义者向非基督教徒，或者说，向所谓的无神论者进行了一场极为残酷的战争。这场战争主要是由威·魏特林挑起的，他企图在瑞士组织一个党，因为到处碰壁，结果一事无成。我们希望瑞士方面的兄弟们懂得，我们是在地球上建立生活，我们不需要地球以外的辅助手段。

我们得到洛桑^②的兄弟们的消息说，他们正在勇敢地、干劲十足地工作，并且为我们的正义事业已取得了很大成绩。

在伦敦，事情进展顺利。伦敦东区和西区的两个协会日益壮大，现在，成员已发展到500名左右。德国牧师在教堂的讲台上绝望地哀鸣（这恰好帮了我们的事业的忙），否则就无声无息地呆在几乎完全丧失了活动能力的青年会中。他们得到这种下场，可能是因为虔诚的日尔曼基督徒、德国的本生眼下也帮不了他们的忙。因为，他当时为了在英国内阁和英国国内掩饰骗子的交易

① 这个计划未能实现。

② 也可能是莱比锡。

和普鲁士外交上的招摇撞骗而忙得不可开交。关于英国宪章派的活动和奥康瑙尔的土地计划的报告，我们下次再谈，否则这个告同盟书就太长了。顺便提一句，这个计划我们绝不同意，相反，我们认为，它是荒谬绝伦的一派胡言，是愚蠢透顶之作。

现在提出下列三个问题供讨论，并请你们尽速把对这三个问题讨论的结果以及对我们在第一个告同盟书中提出的三个问题讨论的结果一并告诉我们，以便我们在下一个告同盟书中向你们概述各种不同的意见。

(1) 什么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者追求的是什么？

(2) 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追求的是什么？

(3) 通过什么途径才能最迅速、最容易实行共有共享制？

下面是我们的看法，可作为引子。你们知道，共产主义是一种体系，依照这个体系，土地是全民的公共财产；根据这个体系，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能力劳动，即“生产”，根据自己的力量享受，即“消费”。可见，共产主义者的目标是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制度，并用崭新的制度去代替它。

“社会主义”一词来源于拉丁文 *Socialis* (有关社会的)，因此，社会主义，如这个名称本身所表明的那样，是研究社会制度、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但它不提出任何新的体系，而主要是给旧楼做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给因天长日久而出现的缝隙上抹上灰浆，以掩人耳目，或者，充其量也就是像傅立叶派那样，在老朽的、称之为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增盖一层新楼。“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是那么含糊不清，甚至连一切监狱改革的发明者、办公大楼、医院、廉价食堂的创办者，统统都可算作社会主义者。正因为“社会主义”一词实质上并不表明确切的概念，所以它既是

表明一切，又是什么也不表明。所有浅薄之徒和幻想主义者以及所有想有所作为、但却缺乏行动勇气的好汉们，都聚集在这面旗帜之下，辱骂那些不愿缮修旧楼，而要建立崭新大厦的共产主义者。但是，任何一个明智的人都不难理解，修补和装饰陈腐不堪的社会制度，简直白费时间。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共产主义”这个字眼，并勇敢地把它写在我们的旗帜上，然后再来清点集合在这旗帜周围的战士人数。当我们听到说什么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基本上是一回事的时候，特别是近一个时期来，这种说法更流行；当有人建议我们用“社会主义者”这个称号来代替“共产主义者”的时候（“共产主义者”这个称号把某些神经不很坚强的人吓住了），我们决不能沉默。相反，我们应该对这类谬论给以有力的反击。说到共有共享制，那么，主要问题是，它是否可以立即实行，还是我们应该有一个过渡时期，以便在这个过渡时期对人民进行教育。如果应该这样，那么，这个过渡时期需要多久？其次，应该而且必须大规模实行，还是首先进行一些小规模的试验；在实行时，要采用暴力，还是通过和平方式进行改造？我们认为，在此已为你们的讨论提供了一个引子，最后我们再次重复一下上一个告同盟书告中提出的要求：不论傅立叶主义（其目的是保留用糖衣裹着的奴役劳动）在哪里出现，都要起来为捍卫我们神圣的原则而斗争。此外，我们要求你们，要同浅薄的幻想主义作斗争。遗憾的是，这种幻想主义在一些地方显然已经渗透到共产主义者的队伍中去了。困难的时刻正在来临。因而，我们需要的是强有力的男子汉，而不是幻想家。幻想家不是诅咒人类的贫困，拿起剑去战斗，而只会抛洒廉价的眼泪。最后我们还要进一言：要当心叛乱、阴谋、购置武器等诸如此类的胡说八道。我

们的敌人将采取一切手段，挑起街头骚乱然后再进行镇压；用他们的话来说，这就是恢复秩序和实现自己的魔鬼计划。严肃的、镇静的态度，将迫使暴君抛弃假面具，到那时——不是胜利，就是死亡。

再见，兄弟们！请速回音。

《1848年民主手册》

1847年 莱比锡版第290—299页

140

关于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成立七周年纪念活动的报道^①

1847年2月8日

2月8日，星期一晚上，“手工业者教育协会”在其装饰得焕然一新、宽敞明亮的大厅（德罗利巷三间房191号）里隆重庆祝协会成立七周年纪念日。该协会现在已拥有300多名会员，并在去年争取到了一个强有力的同盟者——在伦敦东区怀特柴泊诞生的姊妹协会；这个协会成立刚八个月，会员人数就达到169人。^②晚宴结束后，卡尔·沙佩尔以主席身分首先以强有力的语气向协会致词，他扼要地描述了协会在过去一年中的活动情况，并呼吁

^① 雅科布·沙贝利茨的日记（参看注95）表明，这篇报道是他写的；《威斯特伐利亚汽船》（1847年第3年卷第5期第266—267页）也发表了一篇关于协会成立纪念日的报道。

^② 1847年2月25日《德意志—布魯塞尔报》第16号也刊登了这一段。

会员们继续努力，决不畏惧主要由这里的德国牧师向协会发起的攻击。教育协会早在上次会议上，同姊妹协会取得了联系以后就作出决定，要建立一个印刷所，出版一个定名为《无产者》的月刊（非政治性的），其宗旨应是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⁹⁵这个决议在各方面都很重要，它将取得不可估量的成果。接着是《北极星报》编辑朱利安·哈尼讲话，他向与会者报告了刚刚收到的关于普鲁士宪法最后通过的消息，并对宪法作了尖刻辛辣的评论，在这里他引用了下列名句：“大山分娩，生个耗子！”^①

接着，公民米歇洛、毕茨、厄内斯特·琼斯博士、普芬德、施特劳斯、亨·鲍威尔等等相继讲了话，也同前两个人一样博得了热烈的掌声。[……]两位丹麦人以他们同胞的名义许下诺言，将来要在斯堪的那维亚宣传协会的原则。接着，公民约·莫尔在一片欢呼声中不得不演唱了《马赛曲》，当他唱到叠句时全体与会者报以欢乐的喝彩声。公民沙贝利茨还为行将出版的协会机关刊物《无产者》举杯祝酒，爱尔兰人多伊勒为工人阶级的事业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1847年2月12日《德意志伦敦报》
第98号

节录

^① 贺田氏《诗论》第139行。

145

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

1847年6月

1847年6月于巴黎

亲爱的：

我已经很久没有写信了，因为恩格斯可以处理一切事务。不过我今天去信是想打听一下你的健康情况，打听一下你亲爱的夫人和孩子们的近况。正像你从恩格斯那里知道的那样，这里发生了很大变化：过时的施特劳宾人^①已被恩格斯和他的一些积极拥护者搞垮了，这一点，我之所以办不到，因为我现时已是老朽无能；在立宪国家中，老朽无能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必须换个新官上任去放三把火。另一方面，我想，有目的地同卡贝老爷子建立更密切的联系是必要的。我相信我是了解这个老撒旦的，所以我认为这是再好不过的事了，因为，只要你对他献一点殷勤，他就会对你有很好的看法，比如你不妨从他把《人民报》改为周刊的那个月起就订阅该报；他改出周刊已有好几个月了，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他的实力，经济实力和其他实力都大大地加强了。[……]

^① 施特劳宾人是德国的手工业者帮工。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这个名称来称呼那些在很大程度上还受着落后的行会意识和成见支配的德国手工业者；马克思和恩格斯也用这个绰号来称呼某些参加德国工人运动、暴露小资产阶级的宗派主义倾向的人。——译者注

请你不要对我的建议感到奇怪；它对卡贝将会产生良好的影响。我觉得他在我们中间物色反对傅立叶派和蒲鲁东派的同盟者。[……]

矮子^①的情况我一点也不知道。恩格斯为他吃尽了苦头，这一点我可以作证。自去年秋天以来，我就没有见过他。目前，我同莫泽斯·赫斯根本没有什么来往。他多次邀请我，可我总同他见过三次面。我知道他是肺结核病患者，理应给以同情，但我不能同情他。他满嘴尽是谎言，一味毫无意义地吹嘘，为此我很讨厌他。不过，你们似乎对这种喜欢饶舌的人已习以为常了。他独断专行，不时往卡贝那里跑，关于这一点，无论他还是卡贝，对我和恩格斯只字不提，还自以为有理。要留神。

尊敬的牧师卡尔·格律恩博士我只是在明信片上见过。有一次他在给我的信中称我为莫逆之交，我严词拒绝了，同时还附带说明了理由。我受人愚弄已够多了，再也不想同干这种事的人称兄道弟了，今后我要加倍小心。[……]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P.20，Nr.11

节录

第一次发表

151

约瑟夫·魏德迈(哈姆)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

1847年7月7日

1847年7月7日于哈姆

① 指卡尔·路德维希·贝尔奈斯。

亲爱的马克思：

吕宁带着年轻的夫人到瑞士旅行去了，我目前代替他的职务，所以你的来信暂时由我答复。但我马上把你的信寄给吕宁，以便让你尽快得到满意的解释。至少我不相信，吕宁会拖延答复。⁹⁶ [……]

关于你再次谈到发表批判《人民代言者报》的那篇文章一事^①，在你向我表示不希望发表时，我早已把文章交给吕宁了。同时，《人民代言者报》已刊登了那篇文章，吕宁不认为你的顾虑有充分的根据。⁹⁷但考虑到文章所产生的效果，我还为他没有顺从你的顾虑而感到高兴。我的文章所表述的观点本来就是在你的激励下产生的，甚至完全有赖于你才产生的，我随时随地都是这么认为的，如果有机会，我还将公开声明这一点。我如果不在布鲁塞尔逗留，那我从国民经济学家的研究中所获得的收获恐怕连一半都没有，是的，我也许根本就写不出这样的文章，对于你的悉心指导我将永远感激不尽，铭诸肺腑。

请转告沃尔弗，希望他把通讯^②的续篇，至少是7、8两月的续篇寄到哈姆来，因为我在那里以测量专家的身分参加科伦—明登铁路线的工作。关于他的稿酬问题，我已写信给书商。但请他把你反对蒲鲁东的书直接寄往瑞士。

祝你安好

你的

约·魏德迈

① 文件88。

② 为《威斯特伐利亚汽船》写的通讯；并参看文件157。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 F.1, op.3, Nr.139

节录

第一次发表

152

斯蒂凡·波尔恩关于他以特使身分而作的瑞士之行的回忆 摘录⁹⁸

1847年7月底至10月中

[……] 今年10月, 我受伦敦中央委员会的委托, 访问了里昂和瑞士的“支部”, 向它们作了几个报告, 把它们引向社会发展的新阶段, 为即将发生的事件作好准备。天空乌云密布, 预示着宗得崩德战争的暴风雨即将来临。[……]

在巴黎一个交易所的院子里, 我同恩格斯握手告别。[……]

我在里昂时就有人告诉我, 我所到之处, 即我要去完成我的使命的地方, 保证像在里昂一样受到友好的接待。几天以后, 我可能前往日内瓦继续旅行。[……]

我不愿充当像机器一样运转的游说者, 我要找工作, 而且已找到了工作。为了在经济上自主, 我在日内瓦多呆了几周。[……]

在秋高气爽的夜晚, 我和新朋友们一起散步, 向他们介绍了我的新感受, 简直就同逍遥学派的讲课一模一样; 每个星期天, 我们都登上萨莱维山, 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觉得幸福, 所以四个星期以后我才满怀喜悦的心情穿越纳沙泰尔山脉, 前往当时已有近

两万人从事钟表生产的大镇拉绍德封。

纳沙泰尔州当时由于君合国的缘故还同普鲁士王室有联系，因而它还有一些机构会使人想起该君合国。瑞士的任何地方都不像这个州，竟用一种警察式的警觉眼光死死盯住外国人的一举一动，特别是死死盯住按照法国模式组成社会主义团体的那些德国工人的一举一动。因此，秘密的夜间集会就得在汝拉山里举行。

[……]

我的下一站是伯尔尼。 [……]

我在雷策尔^①的印刷所找到了工作，我征得“老板先生”的同意，在印刷所排印我在晚上写成的批判海因岑的著作。^②雷策尔先生虽然是个地道的保守分子，但在我缴纳了必要的费用后，他就同意在他的刊物上发表该著作，而我则把它寄往伦敦，广为传播。 [……]

斯蒂凡·波尔恩《一个四八年战士的回
忆》1898年莱比锡版第54—62页

节录

154

关于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成立和发展的报道⁹⁹

1847年8月底至10月底

[……] 迄今为止，德国工人在布鲁塞尔都居住得很分散，

① 在原件中是雷佐尔。

② 文件163。

彼此不相往来，没有集会的场所，他们充其量也只不过在星期天和不上班的星期一在这家或那家小酒馆里小聚一番，在一块喝喝酒抽抽烟而已。除此之外，一般说来，多数人都互不相识，同样，他们对德国故土所发生的事情也一无所知。他们只能看懂德文报刊——因为那时工人们没有钱光顾咖啡馆——看不懂比利时报刊。由于大多数人根本不懂法文，或者说他们无法充分利用法文报刊；因此，在一个大城市里，不懂法语和对佛来米语又懂得很少的人或多或少是孤独的。

两个月前，一些工人决定创立一个团体，以满足社交愿望。于是，37人在8月底集体讨论了一次，结果便成立了一个名叫“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的团体，全体与会者（37人）全都注册入会，成了会员。他们起草了章程；章程规定，该协会的宗旨是联合迄今或多或少孤独生活在布鲁塞尔的德国人，在指定的白天或晚上进行社交活动（唱歌、朗诵等等），讨论共同感兴趣的问题。

现在，两个月过去了，协会已拥有70多名成员。会员们在每个星期天和星期三（目前都在市政厅附近的天鹅旅馆）集会。每星期日都有一个会员综述上周在德国和其他国家发生的最重要事件；接着便是唱歌、朗诵等社交活动。现在，有不少妇女也来参加集会。星期三晚上，讨论由某个会员在上周提出的并得到多数人同意的的问题。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关于采用机器和实行工厂制度对工人阶级状况的影响问题，关于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制度等问题的几次富有教益和生动活泼的讨论。

协会现有一个小图书室，内藏65册图书和小册子，还有1本地图册和若干幅地图；协会订了3份德文报纸；我们专门规定星

期五为读报日。此外，为了娱乐，由会员们自编自演的剧目，博得了不参加演出的会员们异口同声的喝彩。 [……]

1847年10月28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
第86号

节录

155

亨利希·毕尔格尔斯（科伦）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

1847年8月30日

请注意：

写于收到你8月28日的来信之前。^①

亲爱的马克思：

我早就打算给你写信了，特别是最近，你批判蒲鲁东的那部著作写得精彩极了，我读后觉得是一种难得的享受，为此我特向你表示感谢。

我们被迫列为公开辩论的各种问题，竟得不到任何人的理解。德国资产阶级还根本不知道自己就是我们所说的资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它还受着博爱主义的影响，而博爱主义尚未预料到从属于它的阶级的抗争。比如，在科伦从事生产和商业的人们中间，可称之为有知识的坚定资产者的也许不足10人，大部分人

^① 这句话是后加的，马克思1847年8月28日给毕尔格尔斯的信没有保存下来。

在实践的推动下才会认识他们的阶级立场的后果。当然，人们只要进一步考虑一下德国的无产阶级，这一点是不难得到解释的。这里的绝大部分人都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的状况和前途，简直令人不可思议。少数人在法国或英国的那种社团式的与外界隔绝的手工业者学校里虽然学到了一些东西，但他们很快就消声匿迹了，他们的抽象意识在德国的实践中毫无用处。只有赫斯和魏特林这样的人才对此抱有幻想；德国的工厂工人和施特劳宾人^①还在自始至终地倾听相互进行激烈竞争的资产阶级的那一套笨拙的饶舌，以便接受从世界市场的行情中推论出来的宣传。因此，我根据日果的指示上报了详细情况，而他似乎也没有对我们作出如实的答复。

不过，如果有谁凭空想象德国有一个共产党，那确实是个天大的误会，据我们观察，这是没有影子的事。因为人们根本不会认为皮特曼的改革年鉴^②的观点就是共产主义！当然，比如在威斯特伐利亚，有许多人都顽固地自封为共产主义者，还有目前正在布雷斯劳出版《人民明镜》的柏林候选人尤利乌斯·贝伦兹，看来也自以为共产主义者。但是，人们日益看清了其中的奥秘；结果是什么？是费尔巴哈和施蒂纳的混合物，是关于人性的人的一套空话，关于爱是同竞争即利己主义相对的社会准则的一番空话，关于无产阶级包括赫斯的贫困编年史^③在内的思辨体系，这就

① 见本卷第347页脚注①。

② 指皮特曼于1845年和1846年出版的《莱茵社会改革年鉴》。

③ 指赫斯1845—1846年出版的《社会明镜》，它主要报道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阶层的贫困状况。

是一切！这些人也自以为非革纛命，急于并拢双脚向前一跃便进入共产主义；由于目前还做不到这一点，于是他们就辱骂资产者和禁止娱乐活动的警察，而且在谈吐和穿着方面都非常有伤风化。如果他们最终失去耐心，就前往美洲。如果说这些共产主义者主要不是由格律恩的蒲鲁东^①造就的，那么，就是由纯粹的惰性造成的，因为声明“扬弃”财产，然后把它看作是不值得一提的东西，根本不再为它费心劳神，要比探索经济学范畴甚至研究各种生产关系更加省事。很明显，依靠这样的共产主义者不能建立任何政党；他们完全置身于实际运动之外；他们在实践中有可能被证明是精明能干的资产者。我说的是比雷菲尔德人，他们这样发展下去，只有两种可能：或者带着模糊不清的博爱主义倾向完全倒向资产阶级一边，或者远走异邦，流亡国外。

再说一遍，在实际生活中谁也不知道在德国有什么共产党，因为我不相信德国其他地方竟与这里和威斯特伐利亚有什么不同，这一点，我可以担保。〔……〕

我正想结束这封信的时候，收到了你28日的来信，我很想把开头的三分之二删掉，但我终于没有这样做。你至少会清楚地看到，我欣然同意你准备主管评论性月刊的计划。我想，为了使你的活动重新转向德国，还需要作一些介绍，我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而感到高兴。至于你所说的杂志的领导权问题，认股问题以及计划性、对你的绝对信任和立即出版的必要性等问题，我都没有意见。我只对第一点，即经费问题有些想法。如果

^① 指格律恩翻译的蒲鲁东的著作《经济矛盾的体系……》的德译本，该译本以《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或贫困的必然性》为书名于1847年在曼海姆出版。

要建立自己的排字车间、印刷所和发行部，那势必又要同书商建立联系，而这样一来就会产生一个问题：购置印刷所的设备及其必要附件的经费是否准备从杂志的利润中提取？为杂志^①争取一个同时靠出版其他著作获利的书店或印刷所，价钱是否更便宜？当然这是后话。 [……]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F.20, Nr.12

节录

第一次发表

156

《共产主义杂志》试刊号，第1期¹⁰⁰

1847年9月初

试刊号

共产主义杂志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第1期

1847年9月于伦敦 售价：2便士^②

引 言

各政治党派、各宗教团体出版了数以千计的报章杂志，因而都有了自己的喉舌；唯独无产阶级，即一无所有的大众至今未能

① 该杂志的出版计划最终还是落空了，参看文件174。

② 下面编辑部有关编辑部的地址的说明和该杂志在其他国家的售价见注100。

创办一个持久的、能够完全维护自己利益的、特别是可以当作工人自修指南的刊物。虽然无产者迫切需要这样的刊物，而且很多地方已经作过出版这种刊物的尝试，可惜都没有成功。在瑞士有人先后出版了《年轻一代》、《喜讯》和《现代报》；在法国有《前进报》和《未来报》；还有莱茵普鲁士的《社会明镜》等等。然而，没过多久，这些刊物就全都销声匿迹了。有的是由于警察的干涉，编辑部被查封；有的是由于缺少必要的资金，不能继续发行。无产者对此爱莫能助，而有产者又不愿资助。继这些不幸事件之后，有人从各个方面向我们呼吁，要求我们再作一番尝试，说我们在英国可以享受完全的出版自由，不用害怕警察的追究。

学者们、工人们虽然答应资助我们，可是，我们仍有些犹豫不决，因为我们也担心办起不久就又没有维持刊物长期出版的必要资金。最后，有人建议我们自己办一个印刷所，这样，这一筹办中的刊物就可以有保障了。预订开始以后，伦敦两个教育协会的会员们给了我们力所能及、甚至力所不及的帮助。我们很快就凑到了25英镑，我们用这些钱到德国预约了必要的稿件。我们协会的排字工人义务排印。于是，我们的刊物的第一号就这样与大家见面了。我们的刊物还得到来自大陆的一些资助，长期出版将是没有问题的。目前我们还少一台印刷机，一俟我们筹足资金买到这台印刷机，我们的印刷所就完全能除了印刷我们的杂志外，还印刷其他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书籍。我们决心稳妥行事，所以发了这个试刊号后，暂时还要等一段时间，看看能从外界得到多少资金，然后再继续出版。我们希望到今年年底能得到一个准确消息，然后决定我们的杂志出半月刊还是周刊。目前暂时每月出

一期，资金大部分来自伦敦。现在每一期的价格定为：2便士、4苏、2银格罗申或6克罗泽，但是，等订数达到2000份，每期的价格即可大大下降。

无产者，现在是你们开始行动的时候了，请给我们送稿件，根据你们的经济能力订阅我们的杂志，利用各种机会传播我们的杂志。这是一种神圣的正义的事业——正义反对非正义，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的事业，我们相信真理，反对迷信，反对谎言。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一切，都是无偿的，不拿报酬的，这是我们应尽的义务。无产者，你们要获得自由，就要从沉睡中觉醒，互相紧密团结！人类要求每一个人尽到自己的义务。

无产者！

我们把你们称作无产者，可这个词的来源和含义，你们中的大多数人大概还不知道，所以我们在此先对这个词作一个扼要的解释。

早先，罗马国家日趋昌盛，达到高度文明的时候，它的公民便分化成了两个阶级：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产阶级向国家缴纳直接税，无产阶级把自己的孩子交给国家，国家用他们来保护富人，让他们在无数的战场上流血丧命，以巩固有产阶级的政权，扩充他们的财富。拉丁语Proles的意思是孩子、后代。于是，无产者构成了除贫困和孩子以外一无所有的公民阶级。

随着现代社会越来越文明，随着机器的发明和大工厂的建立，随着财富在少数人手里越来越集中，无产阶级人数也越来越多。少数享有特权的人占有了全部财富，广大人民群众则除了贫困和孩子以外一无所有。今天，我们无产者和我们的孩子，像在罗马

国家时一样，被迫在兵营里、机器旁受苦受难，保卫压迫他们的压迫者，按照压迫者的旨意去流血死去；我们的姊妹和女儿也像那时一样，被迫去满足那些淫荡的富人们的兽欲；被压迫的穷人也像那时一样，对富有的压迫者怀有刻骨的仇恨。不过，现代社会的无产阶级，比起罗马国家的无产阶级来，条件要好得多。那时的无产者没有具备自己解放自己的手段和必要的文化，他们除了复仇和在复仇斗争中死去以外，没有别的办法。而今天的无产者，谢谢有了印刷技术，有许多人受过很高的文化教育，其余的人也每天越来越多地奋起为联合而斗争。而当奋起斗争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互相团结得越来越紧密的时候，特权阶级就在我们面前显出一副极端自私自利、道德极端丑恶的面孔。现代文明提供了足以使全社会的人幸福的武器。因此，现代无产者的目的，不仅仅是破坏、复仇，在死亡中寻求解放，而是要建立一个使每个人都能自由而幸福地生活的社会。现代社会的无产者，就是一切不靠资本生活的人们，即工人和学者，艺术家和小资产者。小资产阶级虽然还占有一点财产，但是很明显，由于大资本的可怕的竞争，他们正在迅速下降到同无产者完全相同的地位。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把他们算作是我们一边的人，因为他们同我们一样十分关心不致落到我们也必须摆脱的那种一贫如洗的境地。我们双方必须团结起来，互相帮助。

本杂志的宗旨是：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而斗争，促使无产阶级的解放尽快实现，鼓舞一切被压迫者联合起来。

我们把杂志命名为《共产主义杂志》，因为我们深信，而且懂得，要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必须对现存的所有制关系实行彻底的变革。一句话，必须建立一个公有制的社会。为此，我们打

算写一个简单的大家容易理解的共产主义信条，信条草案已经写成。从今以后，这个信条就是我们的宣传准则，极其重要，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首先把草案寄给大陆上的朋友们，好听听他们对草案有什么意见。等听了朋友们的意见之后，我们即对草案作出必要的修改和补充，并在下一号上发表。

关于共产主义运动，许多人都把它理解错了，有些人甚至故意诽谤和歪曲，所以，我们不得不在此根据我们对运动的认识和参加的情况，为共产主义运动说几句话。我们主要想在这里声明一下，我们不是什么样的人，以便预先驳斥人家可能对我们进行的种种诽谤。

我们不是某一体系的兜售者。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光对未来社会应采取什么制度进行讨论和冥思苦想，而完全忽视能引导我们走向这个制度的途径，是十分无谓十分荒谬的。如果哲学家和学者们能为建立一个未来社会提出体系，我们认为那是一件有益的事；但是，如果我们无产者一本正经地去讨论未来财产公有制条件下的工厂制度和管理形式，甚至在服装的剪裁、打扫厕所的最好方法等问题上争论不休，那就太可笑了，我们也就该戴上人家常常加在我们头上的不切实际的梦想家的桂冠了。我们这一代的任务是寻找和创造建立一个新型大厦所必需的建筑材料，下一代的任务将是建设这座大厦。我们深信，到那时将不乏其建筑师。

我们不是沉湎于爱的梦想的共产主义者。我们并不在月光下为人们的苦难痛哭流涕，也不沉湎于向往金光灿烂的未来。我们知道，我们的时代多灾多难，它要求每一个人都努力奋斗，爱的梦想完全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消沉，而每个自我消沉的人必定无所

作为。

我们不是现在就来侈谈永久和平的共产主义者，我们在各地的敌人正在磨刀霍霍。我们完全明白，我们用暴力取得政治权利以前，大约除了英国和北美的自由国家外，要达到一个美好的世界，是绝不可能的。也许有些人会骂我们，骂我们是革命者，我们都不在乎。至少是我们不想欺骗人民，而是要向他们讲清事实，提醒他们注意即将来临的风暴，以便他们能够有所准备。我们并不发誓说要在某一个预定的日子开始革命或杀死君主。但是我们也不是百依百顺的绵羊，毫无怨言地忍受种种苦难。我们完全清楚，大陆上的贵族派和民主派一定会进行一场战争，我们的敌人也知道这一点，而且正在准备。所以每个人都有义务作好准备，防止敌人对我们进行突然袭击，把我们消灭。这将是一场最后的严重的斗争。如果我们党能赢得这场斗争，那么，我们所希望的永远不动刀枪的时代就会到来。

我们不是那种以为斗争一胜利，便可以像耍魔术一样立即实现财产公有制的共产主义者。我们知道，人类没有捷径可走，而只能一步一步地前进。我们不可能在一夜之间从一个不和谐的社会跨进一个和谐的社会。根据不同情况，这里还需要经过一个长短不定的过渡时期。私有制只能逐步地转变为公有制。

我们不是主张消灭个人自由，并把世界变成一个大兵营或一个大习艺所的共产主义者。诚然，有这样一些共产主义者，他们只图省事，认为个人自由有碍于和谐，主张否定和取消个人自由。但是，我们不愿意拿自由去换取平等。我们坚信，而且在下几号上还要证明，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比公有制社会有更大的个人自由。

我们已经说明我们不是什么样的人；在我们的信条里我们将要说明我们是怎样的人和我们该做什么。现在我们还要对属于其他政治党派和社会团体的无产者说几句话。我们大家都反对压迫我们、把我们置于苦难之中的现代社会；可遗憾的是，我们不去想这些，不团结起来，却常常同室操戈；让我们的压迫者幸灾乐祸。我们大家不是携起手来共同行动，建立一个各党派都可以在其中通过自己的言论和著作为自己争取多数的民主国家，却每当我们取得一次胜利时，就在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问题上争来争去。这不禁使我们想起了猎熊者的故事：他们还没有见到熊的影子就为抢熊皮而争吵不休。现在是时候了，我们必须捐弃前嫌，携起手来，共同维护我们的利益。要做到这一点，各党派的著作家们必须立即停止对不同意见的刻薄指责，立即停止对各党派的拥护者的恶毒辱骂。就我们而言，我们尊重每一个人，即使是一个自以为正确而固执己见的贵族和虔诚主义者也罢。只有那些戴着某一个政治党派或社会团体或宗教团体的假面具，心目中却只有一个卑鄙的自我的人，我们不能宽容。每个正直的人都有义务尽快揭掉这些伪君子的假面具，把他们的丑恶灵魂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中。一个人有时维护一种错误的观点，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只要他认为这种观点正确，并忠心地捍卫它，我们就不能歧视他。从这个角度来看，比如卡尔·海因岑就没有权利像他在《德意志代言者报》第2号上那样攻击共产主义者。看来，卡尔·海因岑如果不是对共产主义一窍不通，那就是由于在他本人同一些共产主义者之间存在敌对情绪而放肆地辱骂了一个始终站在民主大军最前列的大党。我们读了他攻击共产主义者的文章，感到十分惊讶。可是，他的辱骂无损于我们，因为他笔下的

共产主义者事实上根本不存在。显然是他根据自己的想象臆造出来，然后供他消灭的。我们说我们感到惊讶，还因为我们不理解，一个民主主义者怎么可能把不和的火种扔到战友的行列里去；更使我们惊讶的是，我们读到他的文章的末尾时发现，他所提出的九点要求¹⁰¹同共产主义者的要求几乎完全一样。我们之间的唯一区别是，卡尔·海因岑公民认为，他的九点要求是建设一个新社会的原则基础；而我们认为，这是我们走向完全的公有制社会的过渡时期的原则基础。因此，我们大家联合起来，达到卡尔·海因岑的要求，是明智的。如果我们到了这里人民就满足、就让步，那我们就要服从人民的意志；但是，如果人民要同共产主义者一起继续前进，那海因岑公民要反对恐怕就没什么理由了。我们知道，海因岑公民眼下火气很大，因为我们的压迫者正在想方设法追究、诽谤和污蔑他。因此，我们绝对不会在这时指责他，相反，我们决不拒绝伸出来的团结之手。团结就是力量，只有团结才能使我们奔向目标。

因此，我们各国无产者要联合起来——在法律允许的地方要公开联合，因为我们的行动是光明正大的；但在暴君专横地下令禁止的地方要秘密联合。那些禁止人们集会讨论时事和要求权利的所谓法律，是暴君们的命令。尊重和恪守这种法律，就是胆小和可耻；蔑视和破坏这种法律，就是勇敢和光荣。最后，我们还要说明一点，我们的杂志将不给那些个人争论提供篇幅，但要辟出篇幅表扬那些尽到自己义务的人。无产者要是受到压迫和虐待，他们尽可以来找我们，我们将勇敢地维护他们，把他们的压迫者的名字交给公众舆论去唾骂，而在公众舆论面前，就是最顽固的暴君也会发抖。

公民卡贝的移民计划 102

巴黎的公民卡贝向法国的共产主义者发出了一个呼吁书；他在呼吁书中说：我们在这里遭到政府、牧师、资产阶级甚至革命共和派的迫害、诽谤和诬蔑，他们甚至企图切断我们的生路，从肉体上和精神上毁灭我们，所以，让我们离开法国，让我们到伊加利亚去；他希望有两三万名共产主义者愿意跟随他到世界的另一边去建立共产主义移民区。卡贝想迁移到什么地方去，他并没有明说，但可能是北美的自由国家，或者是得克萨斯，或者也许是不久前才被美国人占领的加利福尼亚，他打算在那里建立他的伊加利亚。

我们无疑也像所有共产主义者一样，乐于承认卡贝以不知疲倦的热情和值得钦佩的毅力为受苦受难的人类的事业进行了斗争，而且是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我们乐于承认他告诫人们反对一切阴谋，为无产阶级立下了不可估量的功勋；但是，这一切并不能使我们容忍他安安稳稳地走下去，因为我们认为，他走的是一条错误的道路。我们尊重公民卡贝这个人，但我们反对他的移民计划。我们坚信，如果他提出的移民计划得以实现，那么，共产主义原则将会受到莫大损害，各国政府将获得胜利，而卡贝的最后岁月将因此感到痛苦、灰心失望而黯然失色。

我们持这种观点，其理由如下：

1. 因为我们相信，如果在一个国家里无耻透顶的贿赂盛行，人民遭到极其卑鄙的剥削和压迫，权利和正义不再发挥作用，社会开始分解为无政府状态（就像目前的法国那样），那么，正义和真理的维护者务必主动承担义务，留在国内，对人民进行宣传教

育，使意志消沉者鼓起新的勇气，为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组织奠定基础，勇敢地同流氓无赖作斗争。如果想把正直的人，想把为美好未来而斗争的战士统统搬走，想给蒙昧主义者和流氓无赖腾出地盘。那么，欧洲将会而且必定会沦丧；欧洲正是世界上由于统计学和经济学的原因而能最先最容易实行财产公有制的地方，而贫穷的人类还要经受几百年之久新的战火和贫困的考验。

2. 因为我们深信，卡贝的计划是在美洲建立一个伊加利亚，即建立一个以财产公有制原则为基础的移民区，而今这个计划尚未能实现，也就是说：

a. 因为所有愿意跟卡贝一起移居国外的人，尽管是热情的共产主义者，但因其所受的教育还带有当今社会的种种弊端和偏见，他们的目的是在进入伊加利亚时能抛弃这类弊端和偏见；

b. 因为他们在进入移民区的初期，势必由此产生争执和摩擦，而且，外部的强大的敌对社会以及欧洲各国政府的间谍还会日益加剧这种争执和摩擦，直到它们导致这个共产主义社会彻底瓦解为止；

c. 因为大多数移民是手工业者，但是那里首先需要的是身强力壮的农民，从事开垦和耕种荒地，而使一个工人变成一个农民，可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么容易；

d. 因为气候的变化而造成的贫困和疾病会使许多人失去勇气并考虑退出移民区。现在，许多人只看到这个计划的好的一面，所以满腔热情地接受它，但是，如果他们看到了严酷的现实，如果发现什么东西也没有，如果大家失去了赤贫工人在欧洲暂时还能得到的那一点点文明的舒适东西，那么，许多人的悲观失望就会代替原来的满腔热情；

e. 因为对于那些承认（伊加利亚人肯定也是这样做的）个人自由的原则的共产主义者来说，建立财产公有制，而不经历过渡时期，即民主主义的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个人财产将逐步变为公有财产），就像农民不播种而想收获一样是不可能的。

3. 一个尝试，比如卡贝打算搞的尝试，遭到了失败，固然不可能影响共产主义的原则或者永远阻碍这个原则的实施，但是，可能使成千上万共产主义者丧失勇气，脱离我们的队伍，因此，忧心忡忡的无产阶级很可能还要忍受一代人或者几代人的贫困；最后，

4. 因为几百人或者几千人根本不能建立财产公有制，而这种公有制如不像美洲的拉普的公有制等等那样接受某种完全与世隔绝的宗派的性质，就休想维持下去。但是，建立这样一种公有制，既不是我们的意图，也不是（我们希望）伊加利亚人的意图。

此外，我们还要提到一点，伊加利亚人在美洲，如果想同外界保持联系，很可能要遭到，甚至几乎肯定要遭到迫害。但愿每一个想随同卡贝到美洲去的人先读一读那篇关于摩门教信徒遭受迫害的报道；摩门教是一个宗教共产主义派别，它在那里曾遭到了而且现在仍然遭到迫害。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认为卡贝的移民计划是有害的原因，我们号召各国的共产主义者：兄弟们！让我们留在古老的欧洲这个突破口吧！让我们在这里工作和斗争吧！因为现在只有在欧洲这里已经具备了建立财产公有制的各种因素，也只有在这里，而不是在其他什么地方，首先建立这种公有制。

[威廉·沃尔弗:] 103 《普鲁士邦议会与普鲁士
和全德国的无产阶级》

从1815年以来，德国的资产阶级，即中等阶级就为夺取政权，同中世纪封建的无限王权的统治制度，即“天赋”制度进行斗争。由于其他国家对所有工业关系和交往关系进行日益广泛的改造（德国羞羞答答地缓慢地跟在那些国家后面匍匐爬行），这种斗争已经成为必要。新形势要求采取新形式：建立在资本和自由竞争之上的资产阶级的日益增长的力量，不想再而且也不能再扮演一个从属的哑角了。但是，不能迅速赢得胜利，其障碍不仅由于德国资产阶级那种天生的胆怯，而且更由于它的四分五裂和互不联系。资产阶级分成38个地区和邦，彼此不相往来，甚至相互嫉妒，它时而在我们德意志祖国的这个地区，时而又在那个地区，单枪匹马，试图达到它所希望的目的。它在许多地区都订立了条约——美其名为制宪或宪法——，并多少获准参与了各邦的行政管理。在这期间，它所获准的东西尚属纸上谈兵，实际上始终保留着那个“天赋”制度以及与之相结合的那些夸夸其谈，专横跋扈的土地贵族和官僚。

发生后一种情况，是因为德国各邦诸侯发动一个又一个整体战役来对抗矛盾重重、四分五裂的资产阶级，对抗它所作的零零散散的努力和孤立无援的进攻，而诸侯的一系列战役都是在梅特涅这个大恶棍的指挥下进行的，并且善于利用这种整体性，全面战胜一切反抗企图和进攻。而德意志联邦议会是由德意志各邦诸侯和溜须政客拼凑而成的，因而是唯一被人用来再去吃掉资产阶级力量在这个或那个大小邦暂时取得的那些东西的职位。上面所

说的那个“邦父”由此得益匪浅：他每次可以假仁假义地担保，他本人是非常自由主义的，乐意批准一切，乐意恪守一切诺言，但邦议会不允许他这样干，为此，他很苦恼，云云。他认为他的邦要对抗强大的普鲁士，强大的奥地利，就显得太势单力薄了。于是人们不得不忍受他深感遗憾的东西。而这个“邦父”却在幸灾乐祸，暗中窃喜。

正因为如此，普鲁士目前发生的政治运动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普鲁士拥有1 600万人口，这一点在德国的天平上是举足轻重的，而且，要是同一个只有三四百万人口，甚至只有6 000人口（如利希滕施坦—瓦杜兹公国）的德意志祖国相比，那普鲁士的作用就更不同凡响了。它的1 600万人口可以说比分散在33个邦的其他2 800万人口的意义还要重大。普鲁士资产阶级取得的每一个胜利，同时就是德意志其他2 800万人的胜利。如果普鲁士资产阶级等于改掉它那波茨坦的“基督教日耳曼”国王的怪脾气，并采取严厉的惩罚手段使他服从自己的意志，那么，德国其他地区的资产阶级也就能立即放手去干。那时，德意志联邦议会的专制主义就会破产。德国整个资产阶级正在逐步采取联合行动，正把“天賦”国王和中世纪地主老爷送去见鬼，除此而外，这帮人只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和成员还能享有席位和表决权。

让我们粗略地看一看普鲁士邦议会的工作。柏林白厅发生的事件表明了普鲁士各党派的现状，清楚地反映了普鲁士的政治运动对整个德国其他地区的重要性。我们只有首先说明召开邦议会的原因，才能理解邦议会的工作方法。波茨坦的国王终于同意他自从登基到最近一直愤怒地明确表示反对的措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不管谁试图在普鲁士报纸上阐述帝国各等级的必要性，不

管谁要求那个波茨坦的统治者兑现20多年前许下的诺言，不是都遭到书报检查机关无情删节和阻挠吗？每个在公开演说中对帝国各等级的要求进行辩护的人，难道没有被指控为国事犯而遭到惩治吗？而现在，波茨坦的那个统治者忽然自己变成了国事犯，他证明他的过去是撒谎，竟干起他曾经那么不厌其烦地强烈表示决不愿意干的事情！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如此一反常态呢？

无非是已经枯竭的国库，加之得不到帝国各等级的支持；国库是再也无法填满了。尽管已有30年的和平期，尽管每年的收入持续上升，尽管劳动人民要上缴各种苛捐杂税，但是，由于国王和宫廷挥霍无度，由于军费开支庞大，由于本来就很有钱的文武百官还寡廉鲜耻地领取退休金，由于整个国家行政管理机构的无能和浪费，所以，所有的钱财被搞得一干二净。国王及其大臣们挖空思想出的各种办法均不奏效；甚至王国银行的最后计划也只取得微不足道的成功，只得到一点暂时的慰藉。因为普鲁士政府惊讶地发现，它还是一如既往地得不到分文贷款。啊呀！1820年的那项法律中有一段太死板，太令人讨厌了，以致非加以修改不可，否则，那些曾经同意给普鲁士政府哪怕预支1塔勒的国内外资本家必定要更加执拗地改变初衷。

因此，“基督教日耳曼”的国王陛下煞费苦心，终于抛出了二月三日诏书，各个方面都构思得那么圆滑，那么巧妙，仿佛专制王权就要得到正是它迫切需要的一切东西，而又不致使它迄今所拥有的权力遭到丝毫损伤。从这一目的出发，这个诏书考虑得十分周详，不仅给小学生一般的邦议会预先规定了“至高无上的”行为准则，而且照顾到了元老院的整个发明。这个由一帮愚蠢透顶、十分殷实、狂妄自大的王子和一帮最大、最高贵，因而

最反动、最卑劣的恶霸地主——显然违背了原来的法律——组成的元老院，肯定成为第二元老院的绊脚石。第二元老院本身已经拥有大量封建地产，因为贤明的国王喜欢把所有八个地方等级的大杂烩称为第二元老院。至于这个元老院的其他成员，可怜的选举法已有明文规定，什么人都可使用，唯独不能使用既有知识又有充沛精力的资产阶级。因此，弗里德里希-威廉先生在议会演说中口气极为强硬，态度极为粗暴，试图吓倒那些对“仁慈的”政府的可恶良心稍感忧虑的人们。他作了这一番表演以后，竟感到洋洋得意，自满自足。对他来说，重要的是捞钱，并且亲眼看到他的政府的早已丧失殆尽的信用重新恢复。他对实现自己的希望充满信心。“如果我掌握5 000万到1亿贷款，在资本家中间恢复我的信用，那么，我就可以安安静静地把这帮善良的年轻议员送回老家，我将使他们难以马上再召集议会。这是我对付各委员会的权宜之计；让他们出色地为我效劳。要对600名议员行贿，代价实在太太大，如果我只贿赂几个委员会成员，事情就好办多了。一个基督教政府的勋章、金钱、奉承和其他手段，定会发生作用。我只要有金钱和信用，就能成为‘永不衰竭’的国王，以上帝的名义继续支配我的爱好和情绪，一如既往，随心所欲地拔掉我的忠实臣民——羔羊身上的毛。”波茨坦的那个统治者就是这样对他的亲信说的。邦议会怎么回答呢？

邦议会的回答是，它拒绝一切涉及钱的提案，拒绝关于地租银行的法案，拒绝关于贷款建设柏林—科尼斯堡铁路线的法案；它同时声明，它可以批准向政府提供资金，但条件是，政府必须恢复二月三日诏书中被贬抑的土地权利，定期召集帝国各等级会议，向他们充分解释国家收入的使用问题，总而言之，政府必须

永远放弃那种可笑的“天赋”要求，转到立宪的或符合宪法的轨道上来。关于废除进餐税和屠宰税以及关于实行所得税的法律草案也遭到类似的命运，即遭到了议会的拒绝。这方面的决定性原因有一部分如上所述，有一部分则在于富有的议员们反对比过去加重国家负担。元老院的一大部分议员都是因为是这样的议员而特别出了名的，其中有王室最富有的王子（如阿尔布雷希特亲王等等）以及全国大多数高贵的地主。此外，还有许多议员投反对票，因为他们对普鲁士官僚们的残忍、高傲和无耻暴政了如指掌，以致在公民的收入问题上他们不愿把新的宗教裁判权拱手让给普鲁士的官僚们，只要他们穿着“天赋”外衣而不依赖资产阶级。

这些事件发生以后，人们本来可以期望，邦议会也将顽固坚持它屡次都肯定地作为等级的权利所要求的東西。可是，它并没有这样做。在7月26日邦议会会议结束以前不久，国王给议会作了答复。这个波茨坦的统治者在答复中对“忠实的”等级的一些要求作了让步；至于其他一些更重要的要求，他在“慎重考虑”以后把它们推迟了，还有一些要求他根本没有提到，最后，关于“委员会”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他命令，根据二月三日诏书的规定马上选举委员会。

各等级怎么办？他们都服从了。莱茵省、西里西亚等地的一些议员忠于自己的观点，并拒绝参加这次选举；另一部分人参加选举，但只是为了抗议和反对等级的权利罢了；其余的人则是作为日耳曼统治者的驯服走狗参加选举的。

如上所述，德国资产阶级所固有的怯懦本身对邦议会改变结论起了很大的作用，这种改变对于邦议会来说当然是非常可耻的。自由主义反对派的许多成员的勇气看来经受了过分严峻的考

验，他们的勇气变得消沉了，因此，他们终于来了个向右转！一些被看成是自由派首领的阴险奸刁的议员也起了同样恶劣的影响，冯·奥尔斯瓦特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许多场合，特别是在申请出版自由（这种自由暂时已成为泡影）的时候，早已充分证明自己是地地道道的政治扒手和骗子。此外，如果考虑到等级的整个构成，考虑到中世纪地产的优势，考虑到盘踞在第二元老院里的大量王室官员，再估计到使用王室这块招牌、说奉承话、满脸堆笑所起的作用，再加上其他更加有效的宫廷手腕，那么，对于这个最后结果也就不必大惊小怪了。

但是，即使目前取得的成绩看起来还是微不足道的，执政党还是那么兴致勃勃，但是，那种成绩立即会带来迥然不同的让步，而这些让步很快就变成悲哀，因为负责国债的代表团和各个“委员会”境况不佳，未能给政府作出任何使它感兴趣的业绩。尽管舆论反对，它们也不敢损害帝国各等级将得到的权利。代表团和各个“委员会”的多数人表示支持政府，自由派成员落选了，即使在这种未必真实的情况下，专制王权也不会前进一步。任何一个资本家都不会如此幼稚天真，在邦议会进行谈判以后，在反对派一再表示抗议以后，面对原先的至今没有付诸实施的法律条文，竟把自己的钱袋拱手交给政府。如果资本家还是把钱袋交给政府，那么，当他们的一切要求在短期内遭到拒绝（本来就该遭到拒绝）时，就只能怪他们自己了。

这里的关键首先就是钱。王国没有足够的钱，而它又非常需要钱，所以资产阶级将会而且一定会实现自己的要求。此外，所谓“永不衰竭”的王权也无力顶住现代“时代精神”那带有破坏性的惊涛骇浪。普鲁士邦议会的不同凡响的重要性是不能按照弗

里德里希-威廉先生最近向邦议会发表的声明来衡量的。邦议会的谈判之所以重要，因为普鲁士舆论在11周内有了很大进展，而如果没有邦议会，要取得这些进展非要花多年时间不可。在这里，普鲁士资产阶级仿佛第一次在舆论面前同官僚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斗争，沉重打击了这两个敌人，使它们遭到了惨重的失败，以致战败者不久便无条件地向胜利者让步。在此之前，一个大臣在普鲁士，无论哪个方面，都被看作是至高无上的，以致一个普通公民几乎不敢正视他一眼。而今，就连这种目空一切的大人物也不得不屈从于邦议会，凡是参加过辩论的大臣们，无一不暴露出自己的无能。在11周内，大臣们一个接一个受到了嘲弄；他们因自命不凡，头脑简单，带有中世纪的狂妄自大以及对邦事务的拙劣管理，时而受到尖刻的讽刺，时而受到蔑视，时而受到愤怒声讨等等惩罚。这帮“国王顾问”所起的作用如此可怜，真可谓史无前例。可悲的埃希霍恩连同他的“基督教国家”在邦议会面前惨遭失败；不懂历史的萨维克不得不羞羞答答地把他的历史胡说塞回了口袋；他的那本古代法兰克货色得不到一个买主的青睐，因而受到了更多的冷嘲热讽。梯勒、杜厄斯堡、博伊恩等人的处境与此也大同小异。甚至连博德尔施文克的厚颜无耻也不能保证原先围绕在内阁头上的光环有一点点安全感。而波茨坦的那个统治者同样也遭到了大臣们所遭到的一切打击。从来没有一个就职演说像他4月11日的就职演说那样，几乎遭到了每一次邦议会会议的讽刺。大家虽没有说邦议会的会议就是对这个就职演说的抗议，因为它没有讽刺性和严肃性的论据，但是，邦议会的辩论本身就是对这位“基督教”国王的就职演说的一份长篇抗议。现在，辩论的内容已全部公布于众，共计数百页之多，

其中有探讨，有阐述，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情况：引起了公众对国家事务的关心，而在过去，只有在个别地方，首先在一些较大的城市才有这类情况。现在，关心国家事务，在全国范围内已经相当普遍，原先那些只扫自家门前雪或者对本地区以外的事务几乎不闻不问的人，而今也关心起国家大事来了。是的，现在，整个德国都像普鲁士一样，密切注视着柏林发生的事件。人们已经感觉到，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每一个胜利也就是整个德国资产阶级的胜利；同时已经感觉到，普鲁士实行的一切也必定在德意志联邦的其他各邦迅速发挥作用。

然而，我听说我们中间有许多人在叫喊：我们无产者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有什么兴趣？难道资产阶级不是我们最厉害的敌人？难道他们不正在普鲁士邦议会又一次明目张胆地蔑视我们吗？在对待工人阶级的请愿问题上难道没有暴露出明显的居心叵测吗？中等阶级即资产阶级能否夺取政权，同我们有什么关系？甚至有人说，阻止资产阶级的胜利，拥护政府而不是反对政府，对我们来说不是更必要更有利吗？

在我们中间，提出这类问题和持这种观点的人，对资产阶级的仇恨是正当的，然而这些仇恨心理蒙住了他们的眼睛，以致既没有看到无产阶级的状况，也没有看到使无产阶级获得彻底解放的手段。

资产阶级是我们的敌人，这是毋庸置疑的；它的全部力量的支撑点是私有财产、资本以及其他与此有关的东西。而我们无产者要获得解放，只有废除私有财产，消灭作为阶级的资产阶级，进而一劳永逸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因此，资产阶级同我们之间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不仅是要使用言论，而且是要使

用拳头和毛瑟枪的斗争。

光凭我们德国无产者就能走得那么远，以致能按照我们的利益彻底改造社会制度，即马上推翻资产阶级，实现共产主义原理吗？除了资产阶级，而且早在资产阶级以前，同我们势不两立的不是还有另一个敌人吗？我们要打倒资产阶级，不是首先要打倒那个敌人吗？这另一个敌人，就是专制的、无限的王权，它自诩“天赋”王权，以上帝的名义剥削我们，使我们落到中世纪地主的魔掌中，把我们禁锢在“基督教日耳曼”国家里；每当我们被奴隶的锁链弄得遍体鳞伤并试图挣脱锁链时，它就向资本提供警察、宪兵、牧师和大炮给以支持。它真的要我们去感激，要我们支持它去反对资产阶级吗？为了从我们这里得到感激和支持，它究竟干了些什么呢？仅仅为了考虑这个最新的时代，它在30年和平时期的军费开支就达8.5亿塔勒；它用我们缴纳的税金养着芭蕾舞女和王室妓女^①，用我们的钱豢养了一支越来越庞大、越来越粗鄙的官僚大军，给本来就富有的人支付了高得出奇的养老金，从所谓的救济金中抽钱支持放荡不羁的贵族地主，给贵族以越来越多的特权，把我们的生活降低到还不如领主的牲口，让我们这些人听凭警察任意宰割，为我们制造打人机器和建造监狱，使我们的劳动服从于资本和自由竞争，通过高明的抽税泵把我们口袋里的劳动所得的最后一点剩余吸得一干二净，只为我们的肚子规定了阳光这一最廉价的食物。这种专制王权难道不能为我们多做一些事情吗？当然能！波茨坦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先生（也

① 在原件中有这样的脚注：可是能搞女人的难道不是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之流吗？

被称为威廉四世)曾经证明,“慈父般的”统治艺术也懂得为无产阶级做一点好事。由于警察当局颁布了1845年的工商业管理条例,工人阶级同以前相比就更受资本家和雇主的操纵了。有人曾试图联合起来,积聚力量,以期抵制降低工资或维持较高工资(这样做至少能满足最迫切的需要),但这类尝试在实施这个新的管理条例以后竟受到了严惩。而资本家只要同情政府,就不允许给工人以任何自由。在新的雇工条例中,“慈父般的”政府允许面包业雇主不仅可以给雇工加上形形色色带侮辱性的绰号,而且还可以任意鞭打,只要不使挨打者致残就行。而被迫侍候人的人只要不被打成残废,就不得申诉和控告。在1844年6月14日的一份秘密诏令中,波茨坦的那个“基督教”国王命令书报检查部门压制各种杂志讨论无产阶级同有产阶级的关系,不允许把工人的状况同中世纪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状况相比较。1844年,当西里西亚山区数千名织工不甘忍受贫困和绝望,奋起反抗工厂主时,“慈父般的”国王就下令把其中的一部分人枪毙或用刺刀刺死,把另一部分人投入监狱,而给大多数人则施以20—40棍棒的严刑拷打。我们无产者把这种仁政善举归功于“基督教日耳曼”王权。

1847年是个歉收年,它使我们经受了进一步的考验。莱茵省、威斯特伐利亚、西里西亚、波兹南和东普鲁士的成千上万名无产者忍饥挨饿,成了饥饿病的牺牲品,而“基督教日耳曼”国王及其走狗却一如既往地寻欢作乐、耽于酒色、逍遥自在。这时,国王忽然心生一计,他也要摆摆救济灾民的架势。于是他颁布了禁止用马铃薯酿酒的法令和若干类似的规定,企图以此蒙蔽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正在日益使人感到畏惧,柏林等地发生粮荒骚乱以后,更是如此。“慈父般的”政府正是出于这种畏惧心

理，正在努力“改善工人阶级的福利”。那么这种努力表现在哪里呢？首先从柏林派一名政府要员前往不来梅，责成他尽快地而且无条件地购买6 000担粮食，立即运往柏林等等。这位要员找到了不来梅的德利乌斯^①商号，向他出示了全权证书；由于他要不惜任何代价买到6 000担粮食，所以粮食经纪人涌向四面八方去抢购，以致每担粮食的价格在两小时内就提高了4金塔勒。价格还在上涨。在不来梅，只能买到1 500担，于是，粮食经纪人把在什切青、但泽等地买到的、还存放在那里的粮食以惊人的、由那位普鲁士政府要员自己哄抬起来的价格卖给了他。这次在不来梅哄抬粮价造成了严重后果，整个德国北部的粮价在几天之内都上涨了，迫使工人阶级比原先多付三分之一的钱去购买面包，而且作为纳税人还不得不承担由于政府笨拙地做粮食生意所造成的损失。用德语说，这就叫做“慈父般的仁政善举”；作为永不衰竭的“天赋”国王施这种仁政的基础是：如果那些挨饿的工人像在柏林、什切青等地那样竟敢聚众闹事，就实行镇压和枪杀；同时，“慈父般的”国王却让人用工人阶级的钱制造了价值50多万的盾牌，作为一份王室玩具送给他伦敦的教子，一个几乎还不会擦鼻涕的孩子。

如果要一一列举这个“专制”王权的全部罪名，那实在不胜枚举，但愿仅举这几个例子就够了。从这些例子中就可清楚地看出，王权至少同我们的敌人一样，比资产阶级为自己攫取更多东西。但是，资产阶级为了建立自己的统治，就需要政治自由，而这是“专制”王权绝对不会同意的，我们无产者到那时则能利用

^① 在历史上是德林斯。

较多的政治自由，作为我们加速地推翻现存制度的杠杆，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一点，那就不言而喻，我们当然有兴趣参加现今的政治运动，我们的利益要求我们帮助加速消灭王权。我们同资产阶级一道走就到此为止，不再往前走了！如果消灭了“天赋”敌人、“基督教的”警察国家和“慈父般的”政府，那么，我们就要同最后一个对手即资产阶级作斗争了；到那时，我们就更容易认清战场，满有把握地制定作战计划。

当然，只要我们相互之间还不亲近，只要我们无产者还缺乏联系，还没有组织起来，还没有用联合一致的力量改造我们的状况，那我们就既不可能对“慈父般的”统治制度，也不可能对资产阶级取得某种可观的胜利。直到现在为止，我们在德国既没有维护我们利益的出版自由，也没有公开集会的权利，借以相互讨论和阐明社会状况，讨论和阐明一切同无产阶级有关的问题。毫无疑问，上述政治自由定会促进解放事业，无产阶级借助这类政治自由，就能加速地组织起来，因此，现今的政治运动，其中也包括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的权利，对我们具有巨大意义。当然，在取得那些权利以前，我们不要那么愚蠢，在那里袖手旁观，耐心等待。凡是法律禁止我们干的事情，我们偏要同法律对着干。法律是我们的敌人，是“慈父般的”政府为了富人和有产者的利益制订的；法律之所以能约束我们无产者，就因为我们太软弱。凡是人家公开禁止我们干的事情，我们就秘密地干；在这方面，非法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就是合法的。我们遇到的艰难险阻越大，我们就越要有更大的毅力，越要开展更多的活动，排除艰难险阻，把自己组织起来，采取共同行动。有一句古话说得好：“好汉不求人”；说实在的，我们无产者如果不起来自己解放自己，谁也

不会也不能解放我们。

现在，我们无论对“天赋”王权还是对资产阶级都已无所畏惧了；我们感到恐惧的是，我们的人几乎没有什么联系，而只有频繁的同室操戈和自相残杀，只有无知，甚至不懂得团结就是力量的道理！柏林的几百名无产者不就是这样？他们没有计划，没有一致意见，没有共同目标，就参加了那次使整个首都胆战心惊，使地方当局甚至最高当局半天不知所措的粮荒骚乱。两位政府高级官员不是也承认，无产者只要稍微懂得使用自己的力量并采取共同行动，柏林即使拥有再多的军队，也早已在无产者的控制之下了吗？是的，柏林掌握在人民手里甚至达5小时之久，只是人民自己并不知道罢了。在普鲁士的其他地方，在德意志的其他邦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一些为数不多，而且没有计划、没有商定采取统一行动的无产者，就能给现存制度带来如此危险。显而易见，只要我们组织起来，联合一致，万众一心，那么，什么力量也不能夺走我们的胜利。我们由于四分五裂，甘当软弱无力的奴隶，所以就得忍受贫困和苦难，忍受上等人 and 富有者的歧视，乞求他们慈悲；我们要组织起来，联合起来，砸碎私有制或者“基督教日耳曼”政府缠在我们身上的像干柳条一样的锁链。

德国的移民

早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向往一个更加美好的新世界，在那里，他们期望得到幸福，即使在今天，他们仍然一心希望这样的新世界。可惜，希望也只不过是希望而已，这种希望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人们长期以来明知那里找不到新世界，却还在老地方寻找；少数人甚至今天才知道，才理解，这个更加美好的新世界

离我们近在咫尺，只要被压迫者联合起来，只要坚持不懈地努力，就能找到这个新世界。当然，那些认为只要到美洲去寻找，就能找到新世界的人是极端错误的。这个更加美好的新世界是找不到的，必须通过斗争才能得到，我们只有坚定地站在一起，自己帮助自己，上帝才会帮助我们。

从前，数百万欧洲人拥向东方，以期摆脱封建领主的暴政，以期走出地狱，进入天堂，因为他们还希望，在换了他们的拯救者的地方，在人间就能与上帝同喜；但是，只有少数人到达了他们预定的目的地，而大多数人则由于疾病和土耳其人的刀剑在见到耶路撒冷以前就归天了。

现在，数百万欧洲人又拥向西方，他们认为在西方能为自己和家属找到一片自由的乐土和幸福的未来；但是，大多数人的希望都落空了。几千人挤在脏乱不堪的轮船上，由于疾病，还未见到美洲海岸就一命呜呼了；几千人死在合众国的街头和习艺所，当然他们不是死于土耳其人的刀剑，而是在被骗子和无赖抢走了所有财物，在肉体上精神上受到彻底摧残后死去的；几千人为维持生计，不得不向美国资产阶级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们在那里和在欧洲一样受剥削，甚至受到更深重的剥削。他们的体力完全耗尽的时候，就像在欧洲一模一样，只要能死在某个医院或习艺所，就感到高兴了；能维持自己和家庭生活的人为数极少。

善良的德国人生活在一个统一而自由的有幸获得34个独裁的大小领主统治的德国，心情自然不十分好，因此对迁徙异国他乡心驰神往，可惜，在所有的移民中，其他国家的人都没有像德国人那样遭到欺骗、抛弃、掠夺和虐待。

在德国、荷兰、比利时的一些城市，在伦敦、纽约以及在德

国移民起程和到达的所有地方，都有那么一批人自成一帮，骗取这些多半没有经验的德国移民的财物。英国人称这帮人为地头蛇。这种称呼十分恰当，因为他们贪得无厌，不管是穷人的十字币^①，还是比较富裕者的杜卡特^②，他们都要统统吞下，以肥私囊。比如在伦敦这里，移民们一到，就被这帮地头蛇团团围住，然后被带到某个地方。只要移民身边还有一些钱财，就很难逃脱这帮地头蛇的手心。那些事先已经交付渡洋费的人还算是幸运的，他们至少还能前往美洲，而另一些人不得不留下来，到头来，迫不得已，也只好干起抢劫自己同胞的勾当，就像他们被抢劫一样。有人可能会惊奇地问：出现这种事，警察干预了吗？回答很简单，英国法律有明文规定：“没有原告的地方，就没有法官。”这些可怜的德国人语言不通，在这个大城市人生地不熟，几乎没有人收留他们，所以，他们中很少有人能找到偷窃他们财物的那些人并把他们交给法庭审理。地头蛇们只需从一个洞穴迁到另一个洞穴，暂时在那里藏身，等被窃者乘坐的船只一起航，又可以爬出洞来重操旧业，继续干他们的勾当。一个移民即使能把一个地头蛇交给警察当局，也是得不到什么好处的；小偷虽然被送进了监狱，但被窃财物已经无影无踪了，并且陪审法庭尚未开庭，轮船就拔锚起航了，而被窃者要继续赶路，于是没有原告出庭，地头蛇也就被宣判无罪释放。伦敦这儿是这样，哈佛、安特卫普、鹿特丹等地也是这样；几千人大多数都落到了那里的地头蛇手里，他们还算是幸运的，还带了一点东西前往纽约。这帮地

① 十字币是1300—1900年在德、奥、匈通用的辅币。——译者注

② 杜卡特是1300—1900年在欧洲通用的金币名。——译者注

头蛇对德国移民干的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坏事，几乎都是人家告诉我们的，我们将在我们的下一号报纸上刊登几篇这样的报道，借以全面告诫移民。我们请求住在本市东区的朋友们，把他们听到的有关移民们受骗上当的经过告诉编辑部。

在德国，许多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在伦敦有不少公使和领事，他们怎么不收留本国移民？

英国人和法国人，不管是旅游者还是移民，到处都能得到他们本国的领事和公使的保护、劝告和支持；德国人，至少德国的无产者就不是这样，他们一旦退出所谓的臣民协会，一旦离开德国，就没有一个德国公使或领事再关心他们了。德国驻英国这里的公使和领事（德国人民每年在他们身上要花10万之多）有别的事情要干。虔诚的本生建立了青年会和福音教会，使无产者不受无神论和共产主义的毒害，并把他们赶进“基督教日耳曼”国家的大羊圈；其他人有时派遣特务打进各个工人团体，寻欢作乐。

现在还有谁来关心无产者，况且还是想要成为共和派的无产者呢？

战友们，顺便说一句！如果你们原来不向那个遥远的美洲的共和国迁徙，在旅途中不受虐待和勒索，而是在德国稍微联合在一起，不信“基督教日耳曼”的胡说，不听你们的最仁慈的邦父们的劝说，前往友善的乐土（也许就是虔诚的兄弟们非常乐于派你们去的得克萨斯和中非），或者去寻找更适合于你们体质的气候（大约是俄国），在德国建立一个人人愿意劳动，能生存的共和国，情况会怎么样。——嗯！你们认为怎么样？这种尝试是值得花费力气的，这样可以节约许多时间和金钱，同时肯定会比进军那个新大陆少牺牲百分之九十的人。

无产者，想想这个问题吧！

1847年9月《共产主义杂志》（伦敦）第
1期（试刊号）第1—15页

157

约瑟夫·魏德迈（哈姆）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
的信

1847年9月1日

亲爱的马克思：

我和吕宁终于幸运地先后收到了你的书。^①这次拖延的主要责任不在邮局，尽管我曾委托里达邮局把所有寄给我或吕宁的邮件立即给我寄往哈姆；这一次，应负主要责任的是那些在里达收到了这个邮件并误认为是吕宁的邮件的人。我几次去信才把书给我寄来。

几天后吕宁就回来了，我把你的愿望^②告诉他了，以后的事由他张罗。

尽管我确实知道，我的信件被拆开过好多次，但是，我还是不怕经常利用普鲁士邮局。这帮人不敢利用他们所读到的东西，因为他们不愿公开承认他们破坏通信秘密。只要尽量避而不谈密

① 指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参看文件150。

② 可能是指在《威斯特伐利亚汽船》上发表一篇评论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的文章的计划。华迪南·沃尔弗撰写的题为《马克思反对蒲鲁东》的评论文章，刊登在该杂志1848年1月号 and 2月号上。

谋的事，我相信，利用邮局是不会有什麼危险的。截取信件的事我还根本没有碰到过。

在我们这里，我最指望利用铁路进行宣传鼓动，不久以后，我们威斯特伐利亚人通过铁路将无往而不至。有了铁路，这里迄今为止的死气沉沉、与世隔绝的生活才会复苏。有些能干的人还分散地蛰居在小圈子里；到头来他们一定染上了庸俗习气，因为他们只得永远生活在庸人中间。而今人们聚会就方便了，因为情况总会发生变化的。就是英国，也只允许我们拥有很小一块地盘去发展工业无产阶级，情况是会变化的。第一台织机至少已在威斯特伐利亚制成。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的近况怎样？我听说你们要支持它；以前的情况我是知道的，它实在太可悲了，人们哪有兴趣传播它；就连我至今也还不信任冯·伯恩施太德先生，以致不敢给他寄去文章。我相信，其他人的情况也不会更好，否则决不会缺乏经费。¹⁰⁴

请来信谈谈这个问题。

祝好

你的

约·魏德迈

书报检查官又开始卑鄙可耻地删节了，沃尔弗只要把他在9月号上发表的通讯同8月号上发表的通讯作一比较就肯定会发现这一点。^①

^① 指威廉·沃尔弗的两篇通讯《布鲁塞尔，7月18日》和《布鲁塞尔，8月22日》，载于1847年《威斯特伐利亚汽船》第8、9期第477—482页和537—538页。

手稿

第一次全文发表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 F.1, op.3, Nr.144

159

安得列阿斯·哥特沙克（科伦）给莫泽斯·赫斯（布鲁塞尔）的信

1847年9月5日

亲爱的朋友：

[……] 一个适合我口味的小团体，终于建立起来了，而且是由安内克夫妇建立的；我们每周聚会两次，读报、唱歌和讨论，不言而喻，我们也搞一些零星的宣传鼓动。¹⁰⁵ 我们希望，至少在《德国旁观者》上刊登一则发行马克思的书^①的广告，广告一登出来，我就把它寄给你。[……] 代我向马克思以及我认识的所有人问好。向你的夫人致意。

你的

哥·

节录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 F.173, op.1, Nr.2632

^① 指卡尔·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一书。

关于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成立两周年纪念活动的报道

1847年9月20日

9月20日，德国、英国和法国的一些民主主义者在伦敦白鹿酒店举行友好宴会。

伦敦宪章派委员会委员琼斯先生首先为人民主权干杯；他说，人民主权是我们唯一承认的主权。

接着为法兰西共和国^①的诞生祝酒。

《北极星报》（英国最好的人民报纸）编辑哈尼先生讲了话并表示希望能看到正在复活的法兰西共和国的原则在全世界取得胜利。

伦敦德意志工人协会主席卡·沙佩尔先生补充说明了意大利人今天为这些原则而进行斗争的情况。他说，他们要通过这些原则重新取得民族独立，撵走奥地利的专制君主。卡·沙佩尔先生大声疾呼，让所有这些可恶的暴君灭亡吧，他们竟同加里西亚的卑鄙刽子手相勾结，镇压意大利的高尚的蓬勃发展的运动；意大利，从阿尔卑斯山到塔伦特海湾同仇敌忾，群情激昂，一致反对外来的统治。

接着卡·沙佩尔先生也同琼斯、哈尼和其他所有到会的民主主义者一样，坚决反对向美洲的移民。他说，这是一个理论

^① 原件上是革命。

家^①的梦想，这种移民同逃亡毫无二致。106

伦敦的民主主义者对你们说，我们应该在欧洲同专制主义作斗争。如果你们在法国的处境不太好，就到意大利去，帮助我们在那里的兄弟们砸烂他们那沉重的锁链，人们就不会再把你们称为人民事业的叛徒。

因此，这个非常正确的观点就给卡贝先生在巴黎提出的反民主主义的移民计划判了刑，顺便说一句，卡贝将永远不能实现他的计划。

接着，基恩、奥博尔斯基上校和普芬德三位先生相继祝酒，祝各国人民的民主繁荣昌盛！

接着为工人的解放祝酒：愿各国无产者团结在一起。捍卫自己的权利——他们的幸福就是奖赏。^②每一次祝酒都有马赛曲和其他爱国歌曲为之伴奏。

又及：

27日晚上，在布鲁塞尔这里举行的民主宴会也想到了伦敦的兄弟们，我们虽在海洋两岸，但我们的心是连结在一起的。

1847年9月30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78号

① 指埃蒂耶纳·卡贝。

② 在《北极星报》上发表的报道中，狄克逊的祝酒词是这样说的：“为了劳动的解放，愿各国无产者共同行动，争取实现自身的社会解放！”

斯蒂凡·波尔恩《海因岑的国家》一书摘录

1847年9月底

[……] 但是，如果说真的存在国家变革的需要，如果某些迄今被压制的利益想要产生效果，那么，只有孩子们才会相信（他们以后也会感到失望），有人想要实现“永恒的自然规律”或“永恒的真理”或“理想的国家”。手握武器的阶级希望获得自由，而要获得自由，就必须夺取政权；这个阶级想把自己的利益变成国家的利益。因此，它进行革命，但并不是为了某种理想国家的所谓伟大思想。

在任何时代，国家都是统治阶级镇压其他弱小阶级的阶级组织，无论是共和制，君主制还是君主立宪制，都是如此；而且现在如此，将来仍然如此，我们不要寄厚望于未来。

你们要革命吗？为什么？你们要建立被压迫阶级的统治吗？统治！统治！这是突然发出的什么样的呼救声啊！我们不要任何形式的统治！庄重的共和主义者要同一些昏昏欲睡的社会主义者试比高低。

但是，我们主张，国家就应该是统治阶级镇压其他弱小阶级的组织，一点不错，就是为了镇压！

海因岑不满意，我也不满意。他要革命，我也不甘落后。但是，究竟谁应该进行革命呢？

难道是所谓被奴役或被歧视的德国？真是一个妙不可言的回答！

哪个阶级应该而且能够成为统治阶级？

全体人民！又一个庄重的共和主义者叫道，统治属于全体人民！〔……〕

海因岑可能厌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词，可惜我们不能为他创造新词。

这就是在普鲁士宪法通过以后在这里也势必相互对立的两派。如果我们走得这么远，那么，海因岑就只有两种选择：或者收回他的文章，转向资产阶级，或者站到工人阶级一边。但是，工人阶级根本不想知道他的国家，它要成为统治阶级。我告诉你们，到那时谁不愿在理智上屈服于这个统治阶级，谁就要倒霉，这将是一种非常严肃的统治。我们敢于直截了当地断言，到那时谁不愿服从工人阶级的法律，就要强迫谁服从，我们有权这样做！谁不愿把自己算作工人阶级的一员，不愿为国家劳动，谁也就不能享受国家的任何福利。如果海因岑被迫承认，这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这是为了保障它的物质幸福所必不可少的，土地不是个别人的财产，而是公共的财产，那么他就不能要求工人阶级像他一样不彻底，宣布一切其他财产为圣物，并一味加以限制，除非土地的所有者非常客气地感谢这种公正的照顾。〔……〕

没有教养的工人和本文作者一样，从未想到根据哲学的原理来建立国家，更确切地说，他们把社会上的伟大运动理解为党派斗争；这些工人属于一个被压迫的、现在正变得强大的阶级；他们同一个德国作家相比，必然更有兴趣进行这样的斗争，他们

说，他们现在每天都要受 12—14 小时的折磨，而用于独立发展的时间则少得可怜。他们深信，废除私有制不可能成为他们个人发展的障碍，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没有私有财产，而公平合理地分工以及越来越多地使用机器对他们必然有利，因为他们赢得更多的时间和手段用于他们的自我培养。 [……]

〔斯蒂凡·波尔恩〕《海因岑的国家。

节录

斯蒂凡的批评意见》1847年伯尔尼版第

6、11—12页

165

派尔·约特雷克《论无产阶级及其通过真正的共产主义获得解放》一书摘录¹⁰⁷

约1847年10—11月

论无产阶级及其通过真正的共产主义获得解放

引 言

普遍的误解以及在关于真正的共产主义及其学说和目标的演说、小册子和报载文章中到处可见的愚昧无知，就是本书出版的动因。

共产主义，这个无产阶级的福音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原始基督教，也就是说，它与基督教有着共同之处，即它的学说不是通过高等学校，而是通过穷人的工场和住所来传播的；基督教福音曾经使犹太人非常恼火，使希腊人非常难堪，而共产主义必然使

特权阶级十分恼火，必然使世俗观念十分难堪。

瑞典的共产主义者请求，除了这本小册子中论述的各项原则以外，将来再不要把其他原则强加给他们和他们在国外的志同道合者；他们最大的希望是，但愿这些学说和原则尽可能成为每个人自己思考的对象，而且成为普遍而公开讨论的主题。

如果他们从现在起公开阐述自己的信条，那么，他们希望今后不再听到这样的话，即叫他们承担下列任务：推翻社会和王权、在社会成员中分配财产、用暴力剥夺现今的所有者、废除家庭生活和婚姻等等，因为每一个喜欢阅读这一著作的人也许都会明白，他们什么也不要，只要由民族意志准备好了的、通过合法途径取得的改革。他们听命于人类的整个秩序，而且是为了上帝及其事业。〔……〕

无 产 阶 级

无产阶级是专靠自己的劳动，而不是靠某一种资本的利润赖以生存的社会阶级，因此，这一阶级的祸福、存亡都取决于总的经济情况的繁荣或萧条，总而言之，取决于竞争的激烈程度。

在古罗马，被称为无产者的是这样一些公民：他们收入低微，以致不得不免缴国家的各项税收，他们除了把自己生的孩子交给国家以外，对国家一无用处。他们特别热衷于从事活动，即为了出价最高的人们的利益参加各种革命运动，因为他们作为罗马公民把各种和平的劳动都看成是同他们格格不入的。因此，他们与绝大部分属于工人阶级的当代无产者相比并没有多少共同之处。

任何时代都有穷人和工人阶级，而且从事劳动的人几乎总是穷人，但无产阶级并不是一向就有的，正如竞争也并不是一向自

由一样。

无产阶级是由于机器的使用而产生的，机器是在18世纪中叶发明的，其中最主要的机器是：蒸汽机、各种纺纱机和织布机。这些价格昂贵、因而只有富人才买得起的机器排挤了当时的工人。这是因为机器制造出来的商品比工人用不完善的纺纱机和织布机生产出来的更便宜。这样一来，机器使一些最重要的工业部门完全转移到了大资本家的手里，并且使工人仅有的那一点薄产，主要是工具、织布机等等变得一钱不值，资本家垄断了一切，不给工人留下一点东西。

从此便实行了工厂制度。

资本家发现这种制度对他们非常有利，于是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发展其他劳动部门。他们日益在工人中实行分工，以致以前能制造整个产品的工人现在只能制造这个产品的某一部分。因此，工人本身就变得像一部机器，并且通过这种分开的简单化劳动可以比以前更快地生产出更便宜的产品来。人们终于发现，这种有生命的机器或工人在许多情况下可以同机械的机器相交换，以致几乎在每一个劳动部门都能使用机器。因此，任何一个使用机器的劳动部门，完全像过去的纺纱厂和织布厂一样，也落到了大资本家的手里，而工人仅存的一点独立性也被剥夺了。我们渐渐发现，几乎所有的劳动部门，尤其在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都实行了工厂制度。这样一来，原来的中间等级，特别是小手工业师傅就日益破产，工人的原来状况完全改变了，从而产生了两个逐步吞没其他阶级的新阶级，即：

1. 大资本家阶级，现在他们在所有工业发达的国家里几乎是一切生活所必需的日用消费品以及生产这些日用消费品的工具

(机器、工厂、车间)的经营者。这就是**资产者阶级**或**资产阶级**。

2. 完全没有财产的阶级，它被迫向资产者阶级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只是为了换取生活必需品。但是这两种人在这场交易中所处的地位并不是平等的，好处总是在资产阶级一边，所以，无产者不得不屈从于资产阶级提出的苛刻条件。这个依附于资产阶级的阶级叫**无产者的阶级**，或者如上所述，叫**无产阶级**。

下面让我们把**无产者**同他们的每个近亲——**奴隶**、**农奴**和**手工业者**分别比较一下。

奴隶是一劳永逸地被出卖的，而无产者不得不每日每时地出卖自身。奴隶是某一个主人的财产，因此，尽管生活极其困苦，却是有保障的；而无产者可以说是整个资产者阶级的奴隶，而并不是某一个主人的奴隶，所以生活没有保障，因为凡是不需要他们的劳动力的人，是不会去购买他们的劳动力的。奴隶被看作是一件物品，而不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成员，因此，奴隶的生存条件可能比无产者好一些，但从社会角度看，无产者正处在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奴隶只有变成无产者，在一切所有权关系中只有废除奴隶制关系，才能获得自身的解放，而无产阶级只要彻底废除所有权就能获得自身的解放。

农奴有权占有一块土地，也有权占有的一些生产工具，也就是说，他们多少是用一部分收入换来的。无产者也用生产工具从事劳动，但这种工具是属于另一个人的，这个人为无产者的劳动转让一定份额的产品，但这种份额的大小是由竞争决定的。工人的份额在两种情况下是由他自己的劳动决定的，也就是说，他作为农奴，就由他自身决定，作为无产者，虽说也由他自身，但主要

由竞争，即首先由资产阶级决定的。农奴的生存有保障，而无产者的生存却没有保障。农奴获得解放的途径是，或者他的封建主把他释放，或者赶走他的封建主；如果是前者，他将变成无产者，如果是后者，他将变成所有者本身，也就是说，他自己介入竞争，加入有产者的特权阶级行列。而无产者获得解放的途径只能是废除私有制、竞争和一切阶级差别。

手工业者除了自己的劳动技巧和劳动力以外，大多数人一开始就没有什么别的资本，因此，他实际上是属于无产阶级，但一般说来，他只在一定时期才是无产者。他的目标是自己挣得资本，以便有朝一日能自己使用他人的劳动力。这个目标，在还有行会的地方，或者职业自由尚未导致按工厂方式去经营手工业，从而还没有导致激烈竞争的地方，他很快就能达到。但是，一旦在手工行业中也实行工厂制度，展开十分激烈的竞争，这种希望就会付诸东流，手工业者本身就会每况愈下，变得像无产者一样。手工业者获得解放的途径是，或者在有利的经济繁荣时期成为资产者，或者直接转变为中产阶级，或者，如果他（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由于虚假的经济繁荣，由于竞争而被迫成为无产者，那么就更加接近无产阶级，即或多或少不自觉地更加接近共产主义的前进运动。

现在我们已考察了当代无产阶级的产生，并把它同过去各个被压迫的社会阶级作了比较。自无产阶级产生以来，至今还不到一个世纪，如果我们更详细地考察一下当前的各种社会情况，我们就会发现，无产阶级已经相当强大，以致可怕地威胁着社会大厦。无论政治家还是慈善家，对如何排除这种危险都感到束手无策。他们惊讶地看到，无产者的人数在对自由的国家宪法宣传和

阐明得最多的国家，也就增长得最多。甚至在北美合众国这样一个拥有最自由的国家宪法的国家里，群众的贫困也是与进步同步增长的。而且，那里和欧洲完全一样，一场无产阶级革命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只要不是共产主义运动（它们在那里的发展比任何地方都快）与民主派领导人一起实行压制革命改革的那种和平改革。在个人主义能一如既往地使法律去保障它的特权的那些国家里，必然产生这样的结果。一个国家财富的增长只对少数享有特权的人有利，只有加强宣传教育才能使被压迫群众更清楚地认识到他们的人权和公民权，认识到拒绝他们的权利是不公正的行为。政治家和慈善家只要顽固地坚持个人主义及其法律保护下的所有权，那么，不管采取什么手段，也无法排除这种危险；只要他们不想向它的对立面——共产主义转变，修改立法，实现财产公有制，它在万不得已时就随时会用所有权去代替它的所谓合理分配。社会的两大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鉴于不同的社会地位和不同的利益，迟早要作为两股敌对的力量相互对立。斗争是无法避免的。这场斗争关系到社会，关系到人类及其未来，花时间去调和是徒劳的。如果事先不通过和平途径实行改革，那么，一场暴力颠覆，一场革命就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当代的政治家无非就分成两派：他们或者是改革的朋友，或者是革命者，这些有极为充分的理由迫使我们把保守派算作后者，因为他们比谁都起劲地进行顽固的反抗，从而使局势更为恶化。

还有某个政治学派的追随者也是改革的朋友，该学派的学说在最近10年中以惊人的速度得到传播和同情，特别在新旧大陆各国的工人阶级中得到了传播和同情。但是，尽管如此，无论是上述所谓聪明的国务活动家还是世俗的和教会的学者，通常都称该

学派为癫狂或渎神；然而，危险越临近，就可能越为人们欢迎和接受。这些改革的朋友被称为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及其财产公有制，在那些无法摆脱由教育和社会制度铭刻在他们心灵上的一套关于当代个人主义所有权观念的人看来，是毫无意义的，不公平的，不可能的；这绝不是什么特殊现象；反对日益强大、受压迫日益深重的无产阶级的任何法律，到头来也保护不了这种所有权。

在共产主义中，也像在其他体系内部一样，都存在各种不同的派别。[……]

德国共产主义者，其中包括斯堪的那维亚的共产主义者，同上述伊加利亚共产主义者相比，只有一些细小的区别，但绝没有原则上的区别，他们特别反对后者的移民运动。

无论是法国的共产主义者还是德国的共产主义者，都不承认同傅立叶派有任何联系，而傅立叶派也不承认人们相互之间的基督教平等，他们的目标是这样来组织劳动：让资本家能够有更大的把握从中得到好处。除此之外，他们还通过非宗教和非道德的原则排斥一切宗教上和道德上的志同道合者。

我们的意图是通过真正的共产主义来阐明无产阶级的解放，因此，我们首先要探讨前面提到的共产主义前进运动，这一运动想通过和平途径来实现当今社会制度的改革，还是想通过过渡时期的共产主义来实现上述改革；然后，我们要把共产主义看成是完善的社会组织（就与当前的社会组织的比较而言）。

过渡时期的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者的奋斗目标，是这样来建立社会：让每个社会成

员都能够完全自由地发挥和运用自己的全部才能和力量，但不得因此而损害他人的权利，他们想通过废除私有制，用公有制取而代之，从而达到这个目标。

为了能达到这个目标，共产主义者要求建立在完全民主原则基础上的选举改革，要求运用被基督教神圣化了的平等和博爱的原则。

此外，共产主义者还要求完全实行民主，但不允许用暴力剥夺任何人的私有财产，以便把它变成公有财产；他们只要求人民代议制容忍一种过渡时期制度，它日益缩小公民相互间的不平等并日益扩大平等，首先它将有利于那些愿意加入共同体的人们。

共产主义者希望公民愿意参加这种共同体，并希望在每一个人的意识中或感情上都有一定的不容更改的原则。这些原则不需要任何证明，因为它们的历史发展的结果。其中有一条原则可以表述为下面一句话：每一个人为得到幸福而努力奋斗；也可以表述为这样一句话：个别人的幸福同所有人的幸福是密不可分的，等等。

共产主义者相信，这种有益于所有人的财产公有制是能够实现的，即使人数增长许多倍。他们的根据是，工业、农业、商业和移民区的发展创造了大量生产力和生活资料，而且机器和化学等等辅助手段的应用还可能无限增加生产力和生活资料。

共产主义者想对无产阶级进行宣传教育、改善他们的道德状况并使他们联合起来，从而实现向这种财产公有制的过渡。

历史告诉我们，共产主义观点过去在各国人民中间也曾经发挥过作用；历代的一些极其正直、聪明过人的先哲也宣扬过公有制的学说。但是，不管这种学说对人类如何重要，但很快就销声

匿迹了，因为它遭到了利己主义和权力欲的激烈反对。这种学说在公元最初几个世纪里就已有非常明确的表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个人主义对共产主义的胜利，也被基督教彻底消灭了。这种学说只有当机器和其他发明能够向每一个社会成员展现全面教育和幸福生活的前景时，才能指望取得完全胜利。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者的解放的学说，而不是关于奴隶、农奴和手工业者解放的学说，因此，共产主义不可避免地属于19世纪，在以往任何时代，它都不像现在这样，由于需要而成为必不可少了。

如上所述，共产主义者要通过对无产阶级进行宣传教育、改善他们的道德状况并使他们联合起来以传播财产公有制，他们的奋斗目标并不是通过任何暴力颠覆和进行革命，因为他们深信，一切密谋行动都是无目的的，都是有害的。同样，他们也知道，没有明确的目的，不具备条件，革命是无法进行的，不管何时何地，革命总是完全不以个别政党或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人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但是，他们也明白，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公民权都受到有产阶级的暴力压制，这样一来，共产主义者的敌人无异用暴力导致一场革命。如果被压迫的无产阶级由此被卷入革命，那完全是正常的，即使共产主义者用行动，就像以前用言论一样来维护无产阶级的事业。广大群众在遇到这种灾难的时候，越是能了解和平的博爱的共产主义原则，就越不会对革命通常带来的复仇、残忍和恐怖感到心惊胆战。

此外，共产主义者的目标不是立即实行财产公有制，因为群众发展的时间是不能预先确定的，财产公有制是由群众在其中生活的社会条件决定的，因此只能逐步实行。

实行财产公有制的第一个主要条件，就是通过民主的国家宪

法实现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只有达到这一点，才有可能确保无产阶级的生存。而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

（1）通过立法实现对私人所有权的限制，逐步变私有制为公有制，比如通过累进税、通过有利于国家的对继承权的限制等等；

（2）通过工人在国家工场和工厂以及在国有农场的就业；

（3）由国家负担费用，对所有儿童进行教育，使他们从不需要母亲照顾的时候起，就在国家开设的学校里受到教育、照料和训练。

只要现存制度干扰新的社会制度，共产主义者就要干涉丈夫和妻子间的私人关系，甚至干涉家庭生活。此外，他们完全清楚，各个不同历史时代的家庭关系在各个不同发展时期是随着所有制关系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因此，私有制的废除对此也有很大的影响，它的最重要结果将是**妇女的解放**。

至于**民族**，它在根据公有制原则联合起来的各国人民中间，由于这种联合而必然被同化或消灭，就像各个等级和等级差别由于它们的根源——私有制的废除而消失一样。

此外，还讨论了**宗教**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地位并且就共产主义者对现存宗教抵制到何等程度这一问题作出答复。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所有现存的宗教仅仅是各个民族和人民群众的历史发展的表现，所以，它们将由于公有制原则而融合在一起，因为共产主义正是赋予社会制度本身的一种完全的宗教性质的历史发展阶段。社会制度的统一和财产公有制必然导致宗教精神的统一和爱的普遍性。共产主义教育全体公民，彼此之间以兄弟相称，都看作是一个家庭的成员，一个父亲的孩子；共产主义使那些同这种

政治的和宗教的观点没有必然联系的教条变成多余的。共产主义者千方百计地避免有关宗教教义的一切争执，因为他们很清楚，宗教教义在任何时代都在人们中引起分裂与不和。从保罗给提摩太的信中可以看出，最初的真正基督徒就遵守这条原则；他在信中写道：“但你要抛掉俗不可耐的无聊寓言，应该笃信宗教。”

（第4页第7行，参看第1页第3—6行、第4页第3行、第6页第3—6行，以及参看第二封信第2页第23行、第4页第3、4行。） [……]

[派尔·约特雷克]《论无产阶级及其通过真正的共产主义获得解放》1847年斯德哥尔摩版第1—15页

节录

166

维克多·特德斯科（列日）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

1847年10月初

亲爱的马克思：

我趁此机会让拉比安给你捎去一封短信。一周后你们将收到列日区部的半月报道。消息很好。德国人支部一共有7个成员，我是其中之一；现在，我们正在为联合会寻找会址。民主协会^①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们15个年轻人已经签名加入。民主派的名流不

^① 指“共和民主协会”，即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列日分会。

愿意参加；巴耶派则断然拒绝，因为他们认为，只要举行几次会议，人民就将要求采取行动，但采取行动的时机尚未成熟。

我下决心不予理睬；不幸的是，几个年轻人因巴耶派的拒绝而感到犹豫不决。

我收到了你的几份演说¹⁰⁸，并分发给大家。巴耶曾答应我对此发一篇报道，顺便提一下《哲学的贫困》。当我向他要回我的文章时，他对我说，他的兄弟已把我的文章要走了。我原想把文章寄给《社会辩论报》的，而迈因茨竟把此事忽略了。

卡·格律恩想让人在分会^①中介绍他人会，但是，我详细介绍了他的情况后，大家一致表示拒绝。他的兄弟讲了一次文学课，并且，为了办成此事，为《自由报》写了一篇歌颂巴耶的长文，以表示支持。根据我的请求，巴耶把该文锁进了抽屉的底层。有人为了格律恩的事提过十来次申请，但全是枉然。而他们的协会至今什么也没有干，这个协会全是由那些缄口不谈政治的小商人组成的。

至于我，事情办得很糟糕，我看我的事还要糟糕很长一段时间。

里德尔还没有找到工作。

再见，我的朋友，我希望你夫人和你保持对我的真诚的好感。^②

手稿

第一次全文发表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F.20，op.1，Nr.13

① 很可能指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支部。

② 接下去是草书签名。

167

奥托·吕宁（里达）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

1847年10月5日

尊敬的先生：

我赶紧给您回信。关于代表大会的文章^①我是很欢迎的，但由于第10期的版面已经排满，所以我不得不请求你把它压缩一下（约 $\frac{1}{2}$ 印张）；也就是说，主要批判这件事本身，而对那些人，即各篇演说只要提一提，点缀一下就行了。不过论据要像车夫的老马一样脚踏实地。此外，布雷斯劳的沃尔弗^②也寄来了一篇这方面的通讯^③，最迟在两周内就发表！

关于你的小册子^④的出版问题，我已写信给克吕韦尔。您将收到的这封信，就是他转来的。如果他没有写什么，那是由于他没有时间或者对此事不感兴趣。我也担心，检查机关看到某些论述（关于无产阶级的必然革命的态度等等的论述）时也许会提出严厉的非难。[……]

鉴于书商方面的原因，《威斯特伐利亚汽船》1月号不得不

① 指马克思的关于讨论自由贸易问题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文章，该文没有在《威斯特伐利亚汽船》上发表。

② 威廉·沃尔弗。

③（布格茨尔，9月22日），载于1847年《威斯特伐利亚汽船》第10期第594—599页。

④ 指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克吕韦尔出版社出版。

在今年12月中出版发行。您愿意转告布雷斯劳的沃尔弗，让他（除了他自己知道的为11月号写的通讯^①外）再为1月号写一篇很详细的内容比较一般的通讯^②（如果没有特殊内容的话），在11月15—20日连同为12月号写的通讯一起寄来呢，还是您愿意自己写？请同沃尔弗商量一下，您只要别忘了在11月20日左右把两篇通讯一起寄来就行。

还有一个请求。《人民手册》^③今年不出版了，书商认为办不到，这样一来，第四年卷要到1848年中才能出版。我很喜欢巴黎的沃尔弗，我准备把他写的关于您的小册子的文章^④，收入《汽船》1月号；这样，无论如何要比在《人民手册》上早发表。文章一发表，克吕韦尔将马上支付稿酬。劳驾您转告一下，好吗？

魏德迈前天同我的妹妹举行了婚礼；他向您问好。眼下我简直无法脱身，只要有可能，我就去看望您，先向您和异教徒沃尔弗^⑤致以亲切的问候。

您的

奥·吕宁

手稿

第一次发表

-
- ① （布鲁塞尔，10月22日），载于《威斯特伐利亚汽船》1847年卷第11期第667—668页。
- ② （布鲁塞尔，11月），载于《威斯特伐利亚汽船》1848年卷第1期第22—26页。
- ③ 指吕宁编辑的《人民手册》年刊，第1、2年卷（1845和1846年）1845年在比雷菲尔德出版，第3年卷（1847年卷）1847年在帕德博恩出版。
- ④ 费迪南·沃尔弗《马克思反对普鲁东》，载于1848年《威斯特伐利亚汽船》第1期第7—16页、第2期第51—63页。
- ⑤ 威廉·沃尔弗。

168

莫泽斯·赫斯《无产阶级革命的后果》一文摘录¹⁰⁹

1847年10月10日

布鲁塞尔, 10月10日。当前, 我们的朋友需要讨论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 无产阶级在推翻了统治阶级, 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以后, 必须采取什么措施。这个问题在两个方面可以说是我们的生存问题; 要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必须明确, 1. 我们常说的受到许多指责的“激进派阵营”的分裂是不是不能调解或对我们有害; 2. 我们的敌人非常担心的、而我们非常希望并努力争取的、而且迟早定要爆发的革命, 我们说, 这次革命是否只对资产者老爷有利, 或者, 是否对**人民**, 对**工人**有利。为了有助于我们在这里, 在激进派机关报上回答这个问题, 为了让我们的外国朋友也了解即将开始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 我们愿意在本报报道有关讨论的情况, 同时作一些述评。[……]

1847年10月14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
第82号

摘要

169

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给布鲁塞尔区部的信

1847年10月18日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847年10月18日于伦敦

中央委员会致布鲁塞尔区部

兄弟们！

你们就告同盟书^①给我们的回信，已经收到了。比利时方面取得的成绩是可喜的。自从发生不愉快的误解（那次误解，正像我们希望的，已经被遗忘）以来，你们的来信总是十分勉强和冷淡。什么原因，你们最清楚；至少我们不明白，我们在哪些方面使你们采取如此冷淡的态度。

布鲁塞尔区部派代表参加下次代表大会，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将要决定，同盟作为一个整体应该分崩离析呢，还是应该从中切除在许多地方存在的溃疡。我们的意见是：如果我们想有所建树，后者是我们能够采取的唯一办法。当前，同盟内一片混乱，成员中有那么多鼠目寸光者，他们总想不惜任何代价突出自己。真是活见鬼。

沃尔弗大概1月初就要完全迁居伦敦，所以，**如果马克思能**

^① 文件160；布鲁塞尔区部的回信没有保存下来。

亲参加大会 那我们一定会感到满意。我们一定尽力而为，减轻你们的开支。贡献出你们的全部力量吧，如果我们能克服这次危机，就一定能胜利。

你们批准买印刷机的款项，为何还不给我们寄来？

我们得到了来自美因兹的消息。我们的特使已经在那里和支部成员见了面。你们想想，被开除的魏特林分子竟已写信去美因兹，以最无耻的语言诽谤我们，要当地的支部同我们断绝关系而归并到他们那里去。我们怎么也弄不明白，他们是怎么搞到美因兹的地址的。他们的信发出不久，莱宁格尔就亲临美因兹，使尽浑身解数，动员美因兹人脱盟。他们的目的虽未达到，但由于魏特林分子的无耻游说，我们当地的成员还是被搞糊涂了，陷入了惶惶不安之中，也就是说，意志消沉了。幸好我们的特使及时赶到，重新纠正了一切。他在美因兹和维斯巴登为我们进行了扎扎实实的工作。

瓦劳到布鲁塞尔时，（他说是受美因兹支部的委托）就给我们写了一封信，报告了那里的十分可喜的消息。而现在我们感到十分惊奇，我们的特使说，瓦劳在美因兹期间，连一次支部会议也没有参加。现在你们接受他参加了你们的区部委员会，所以我们要求你们调查一下，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如此玩忽同盟盟员的职守，并把有关情况告诉我们。

汉堡方面还没有来信。一位从那里来的同盟盟员说，马尔滕斯对我们十分不满，原因是我们曾经劝告汉堡支部别再傻里傻气。在汉堡，那个习惯于侈谈爱的日耳曼基督徒席尔格斯，就像一块铅砣似的挂在同盟（他是同盟盟员）的脚上。汉堡是我们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据点，那里有我们的优秀分子，但是我们要想在

那里尚需建树，首先必须让那老的一帮滚蛋。

在巴黎，已经发生了分裂。有一个支部，除两人外，全都表示反对共产主义原则，因此，我们把这个支部暂时开除出了同盟。一个头脑不清的名叫恩德斯的人是支部主席，他读了格律恩翻译的蒲鲁东的书^①，就把这些人的头脑搞糊涂了。其余的支部为了同被开除的魏特林分子重新联合，已同他们进行会谈。我们一了解到这种情况，就严厉禁止他们继续进行这种会谈，因为代表大会已经开除了魏特林分子，所以任何个人都不能擅自同他们联合。我们向他们解释说，如果他们认为重新联合是适宜的，那也应通过他们的代表向下次代表大会提出这个提案，因为只有代表大会才有权作出决定。真可悲，有些人想成为共产主义者，也想懂得共产主义的原则，可是连民主主义者都不如。他们不遵守民主原则，就是证明。

鬼知道，瑞士方面在搞什么名堂。在伯尔尼，就有那么一个姓厄博姆的瑞典人，是支部主席。他糊涂得惊人，目光短浅，以对学者的无比仇恨而闻名。这大概是由于他本人实在过于愚蠢，成不了学者，可又十分想当学者的缘故。这个人以前曾给我们写过信，毛遂自荐，要当我们杂志的编辑——这真是难以形容的无耻。要知道，他连一个正确的句子都不会写呢。自然，我们对这样的自荐无从回答。从此，他对我们就怀恨在心了。他总是在寻找合适的机会，以便对我们泄私愤。结果，这样的机会终于找到了。当伪君子霍恩舒如泣如诉地向他**哀求公正的支持**时，这个厄

^① 比·约·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或贫困的必然性》，由卡尔·格律恩译成德文，1847年达姆施塔特版。

博姆，不顾我们特使^①的抗议，竟把霍恩舒作为魏特林派的代表，介绍给支部全体成员，并把我们臭骂了一通，还使支部通过了一项决议，号召我们立即重新联合。自然，警告信是委托厄博姆写的。据我们的特使说，这封信一开头就把魏特林派吹捧了一番，接着，又把我们狠狠地侮辱了一通，最后，要我们重新联合，并威胁说，否则，伯尔尼支部就要退出同盟。其次，还说了什么一切罪过都在于学者，应该把这些骗子从我们队伍里驱逐出去；什么接受一个学者入盟，就无异于向警察当局告我们的密，因为十个学者里总有九个是叛徒，等等等等。

经过激烈的斗争，我们的特使终于使大多数人都反对发出这封卑鄙而又毫无意义的信。可厄博姆这家伙，当时就摆出独裁者的架势，站起来说，他一定要发出这封信，并心甘情愿承担一切风险，包括不利的选举结果。就这样，伯尔尼的组织分裂了。由于伯尔尼支部是瑞士方面的主要支部，这次分裂就可能对我们在瑞士方面的工作产生不利的后果。在日内瓦，有很干练的人，我们同他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我们一定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并给瑞士各支部发出专门的通告。溃烂的组织必须切除。

阿姆斯特丹支部有八名成员，而且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还要成立区部。一个月之后，一名全权特使将去鹿特丹组织教育协会和支部。

我们有意告诉你们这些详情，以便让你们明白，你们必须派代表参加代表大会。目前，伦敦和布鲁塞尔是整个同盟的顶梁柱，如果这两根顶梁柱动摇或倒塌，那整个大厦就要土崩瓦解。

^① 可能是斯蒂凡·波尔恩。

我们收到了西里西亚弗兰肯施坦方面的来信。他们还要30份试刊号。^①

等待你们的回信。

敬礼并握手。

代表中央委员会，并受其委托

约·莫尔 卡尔·沙佩尔

亨利希·鲍威尔

又及：两周后，你们将通过书商蒂姆收到25—30份试刊号。^①请伯恩施太德从10月1日起将《[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寄给东区的协会。该协会已决定不订《德意志伦敦报》，改订《布鲁塞尔报》。请转告伯恩施太德，让他写信告诉我们，这半年的报费寄给谁。

又及：《[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的挞伐号¹¹⁰我们在这里是以每号4苏的价格出售的。他如若愿意按这个价格再给我们寄100份，我们将很高兴。

手稿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F.20, Nr.116

^① 《共产主义杂志》，文件156。

170

巴黎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反对卡尔·海因岑的声明

1847年10月24日

声 明

（迟到的声明）

最可尊敬的伯恩施太德先生：

刚才我在贵报上看到海因岑先生反对弗·恩格斯的一篇长文^①，他在该文中提到共产主义者时竟使用了带有极端侮辱性的语言，因为他在这里再次故技重演，竟把共产主义者同奴才和警察相提并论，这次他竟然如此寡廉鲜耻，甚至胡说什么巴黎的德国共产主义者已把他的一批小册子（顺便说一句，这些小册子无非就是喋喋不休地毫无意义地呼吁人们采取暴力行动，至于暴力行动结束后应该怎么干，都未作任何说明，而为了不致重蹈1830年法国人的覆辙，竟为资产者老爷们自相残杀。这个说明是非常必要的）直截了当地交给了警察局。这种事情根本没有发生过，而且永远也不会发生，尽管上述海因岑的小册子对总的事业有百害而无一利。这些小册子鉴于上述原因早已被退回。〔……〕

关于海因岑嫁祸于共产主义者的其他事情，那实在太可笑

^① 卡·海因岑《共产主义的一个“代表”》，载于1847年10月21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84号。

了，以致不值得再一次在这些报纸上作出回答，因为那样做无异是浪费时间。此外，如果海因岑先生再这样攻击共产主义，那么他在共产主义者工人中不难找到敢于同他拼搏的战士。我希望能借贵报一角发表这篇短文。

致以崇高的敬意

工人共产主义者C.兰格^①

代表许多共产主义者

1847年10月24日于巴黎

1847年11月4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
第88号

节录

173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¹¹¹

1847年10月底至11月底

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共产主义？

答：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

第二个问题：什么是无产阶级？

答：无产阶级是专靠出卖自己的劳动而不是靠某一种资本的利润来获得生活资料的社会阶级。这一阶级的祸福、存亡和整个生存，都要看对劳动的需求而定，也就是要看生意的好坏，要看无法制止的竞争的波动而定。一句话，无产阶级或无产者阶级就

^① 可能是阿道夫·克路斯在同盟内部使用的化名，参看文件242。

是19世纪的劳动阶级。

第三个问题：是不是说，无产者不是一向就有的？

答：是的，不是一向就有的。穷人和劳动阶级一向就有，并且劳动阶级通常都是贫穷的。但是，像上述那种生活条件的穷人、工人，即无产者，并不是一向就有的，正如竞争并不是一向完全自由和不受限制一样。

第四个问题：无产阶级是怎样产生的？

答：无产阶级是由于产业革命而产生的，这一革命在18世纪后半期发生于英国，后来，相继发生于世界各文明国家。产业革命是①由蒸汽机、各种纺纱机、机器织布机和一系列其他机械装备的发明而引起的。这些价钱很贵、只有大资本家才买得起的机器，改变了以前的整个生产方式，挤掉了原来的工人。这是因为机器制造出来的商品要比工人用不完善的纺车和织布机制造出来的既好又便宜。这样一来，这些机器就使全部工业落到大资本家手里，并且使工人仅有的那一点薄产（工具、织布机等）变得一钱不值，资本家很快就侵占了一切，而工人却一无所有了。从此，在纺织方面就实行了工厂制度。机器和工厂制度一经采用，这一制度很快就推行到其他生产部门②，特别是印花布、印书、陶器和金属品的制造业等部门。工人之间的分工也越来越细了，结果，从前完成整件工作的工人，现在却只做这件工作的一部分了。这种分工可以使产品制造得更快，因而也就更便宜。分工把

① 这里删去了“上个世纪的”几个字。

② 这里删去了“和化学辅剂”几个字。

③ 这里删去了“当其他工业部门的资本家发现，这是多么有利可图”一句。

每个工人的活动变成一种非常简单的、老一套的机械的操作，用机器不但能够做得同样出色，甚至还要好得多。因此，一切生产部门都像纺纱和织布业一样，一个跟着一个地受到了蒸汽、机器和工厂制度的支配。这样一来，所有的工业部门完全落到了大资本家的手里，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也就失掉了最后的一点独立性。工厂制度的统治不仅逐渐地扩展到道地的手工工场，而且也日益侵占了手工业，因为这里大资本家也在不断挤掉小师傅，建立可以大量节省开支和实行细致分工的大作坊。结果，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所有文明国家里，工厂生产几乎已在一切劳动部门中建立起来，手工业和手工工场几乎到处都被大工业排挤掉了。于是，从前的中层等级，特别是小手工业者，日益破产，劳动者的状况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产生了两个渐渐并吞所有其他阶级的新的阶级。这两个阶级就是：

一、大资本家阶级，现在他们在所有文明国家里几乎是一切生活资料以及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必需的原料和工具（机器、工厂）的独占者。这就是**资产者阶级或资产阶级**。

二、完全没有财产的阶级，他们为了换得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只得把自己的劳动出卖给资产者。这一阶级叫做**无产者阶级或无产阶级**。

第五个问题：无产者是在怎样的条件下把劳动出卖给资产阶级的？

答：劳动和任何其他商品一样，也是一种商品，它的价格和其他商品的价格一样，也是由同样的规律决定的。正像我们在下面将看到的，在大工业或自由竞争的统治下，情形都是一样，商品的价格平均起来总是同这种商品的生产费用相等的。因此，劳

动的价格也是同劳动的生产费用相等的，而劳动的生产费用也正好是使工人能够维持他们的劳动能力并使工人阶级不致于死光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数量。工人的劳动所得不会比为了这一目的所需要的更多。因此，劳动的价格或工资将是^①糊口所必需的最低额。但因为买卖总是有时清淡有时兴旺，工人所得也就有多有少，正像厂主卖出商品所得的钱有多有少一样。如果把旺季和淡季平均起来，厂主卖出商品所得的既不多于他的生产费用，也不少于他的生产费用，同样，工人平均得到的也是既不会多于这个最低额，也不会少于这个最低额。大工业越是在所有的劳动部门占统治地位，工资的这一经济规律也体现得越充分。

第六个问题：在产业革命前，劳动阶级是怎样的？

答：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劳动阶级的生活条件也各不相同，它在同有产阶级和统治阶级的关系上所处的地位也各不相同。在古代，正像现代在许多落后国家、甚至美国南部一样，劳动者是主人的奴隶。在中世纪，劳动者是土地占有者贵族的农奴，直到今天这种农奴在匈牙利、波兰和俄国都还残存着。此外，在中世纪^②，甚至在产业革命前，城市里还有在小资产阶级师傅那里做工的手工业者帮工，随着手工工场的发展，就渐渐地出现了受大资本家雇佣的手工工场工人。

第七个问题：无产者和奴隶有什么区别？

答：奴隶一次就被完全卖掉了，无产者必须一天一天、一小时一小时地出卖自己！每个奴隶是特定的主人的财产，由于他们

^① 这里删去了“一个小家庭”几个字。

^② 应改为“中世纪末”，后又改为“宗教改革时期”。

与主人的利害攸关，他们的生活不管怎样坏，总还是有保障的。而一个无产者可以说是整个资产阶级的财产。他们的劳动只有在有人需要的时候才能卖掉，因而他们的生活是没有保障的。只有对整个无产者阶级来说，这种生活才是有保障的。奴隶处在竞争之外，无产者处在竞争之中，并且亲身感受到竞争的一切波动。奴隶被看作物件，不算是市民社会的成员。无产者被认为是人，是市民社会的成员。奴隶能够比无产者生活得好些，但无产者属于较高的社会发展阶段，他们本身所处的发展阶段也比奴隶为高。在所有的私有制关系中，只要废除奴隶制一种关系，奴隶就能解放自己，并由此而成为无产者；无产者却只有废除一切私有制才能解放自己。

第八个问题：无产者和农奴有什么区别？

答：农奴拥有并使用生产工具和一块土地。为此，他要交出自己的一部分收入或者服一定的劳役。无产者是用别人的生产工具做工，他们就是为这个别人生产，从而换得一部分收益。农奴是交出东西，无产者是得到报酬。农奴生活有保障，无产者生活无保障。农奴处在竞争之外，无产者处在竞争之中。农奴可以通过以下各种道路获得解放：或者是逃到城市里去做手工业者；或者是交钱给地主代替劳役和产品，从而成为自由的佃农；或者是把他们的封建主赶走，自己变成私有者。总之，农奴可以通过不同的办法加入有产阶级的队伍并进入竞争领域而得到解放。无产者则只有通过消灭竞争、私有制和一切阶级差别才能获得解放。

第九个问题：无产者和手工业者有什么区别？^①

^① 在恩格斯的手稿中，以下是空白，没有第九个问题的答案，参看文件147，对第十二个问题的回答。

第十个问题：无产者和手工工场工人有什么区别？^①

答：16—18世纪，几乎任何地方的手工工场工人都占有生产工具，如：织布机、家庭用的纺车和一小块在工余时间耕种的土地。这一切，无产者都没有。手工工场工人几乎总是生活在乡下，和地主或雇主维持着或多或少的宗法关系。无产者通常生活在大城市里，和雇主只有金钱关系。大工业使手工工场工人脱离了宗法关系，他们失去了仅有的一点财产，因此才变成无产者。

第十一个问题：产业革命和社会划分为资产者和无产者首先产生了什么结果？

答：第一，由于机器劳动不断降低工业品的价格，以前世界各国的手工工场制度或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工业制度，完全被摧毁。那些一向或多或少和历史发展不相称、工业尚停留在手工工场阶段的半野蛮国家，现在已经被迫脱离了它们的闭关自守状态。这些国家开始购买比较便宜的英国商品，把本国的手工工场工人置于死地。因此，那些几千年来没有进步的国家，例如印度，都已经进行了完全的改革，甚至中国现在也正走向改革。事情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今天英国发明的新机器，一年以后就会夺去中国成百万工人的饭碗。这样，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准备好地盘，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因此，如果现在英国或法国的工人在解放自

^① 恩格斯在这里把“第十个问题”误写为“第十一个问题”，后来涂改了，并加上第十个问题。

^② 这里删去了“和中国”三字。

己，这必然会引起其他一切国家的革命，并迟早会使这些国家的工人也获得解放。

第二，凡是**大工业**代替了手工工场的地方，产业革命都使资产阶级最大限度地增加了自己的财富和扩充了自己的势力，使它成为国内的第一个阶级。结果，凡是完成了这种过程的地方，资产阶级便夺取了政治权力，并挤掉了以前的统治阶级——贵族、行东和代表他们的君主专制。资产阶级废除了长子继承权或不许出卖领地的禁令，取消了贵族的一切特权，这样便消灭了特权贵族、土地贵族的权力。^①资产阶级取消了所有行会，废除了手工业者的一切特权，从而打垮了行东的威风。资产阶级用自由竞争来代替它们；在自由竞争这种社会状况下，每一个人都有权经营任何一个工业部门，而且，除非缺乏必要的资本，任何东西都不能妨碍他的经营。这样，实行自由竞争无异就是公开宣布：从今以后，由于社会各成员的资本多寡不等，所以他们之间也不平等，资本成为决定性的力量，而资本家、资产者则成为社会上的第一个阶级。但是，自由竞争在大工业发展初期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只有在这种社会状况下大工业才能成长^②起来。资产阶级这样消灭了贵族和行东的社会^③威力以后，也就摧毁了他们的政治权力。资产阶级在社会上成了第一个阶级以后，就宣布自己在政治上也是第一个阶级。这是通过实行代议制而实现的；代议制

① “权力”二字是后加的。

② 这里删去了“和小资产者”几个字。

③ 这里删去了“和发展”三字。

④ 这里删去了“政治”一词。

是以资产阶级在法律面前平等和法律承认自由竞争为基础的。这种制度在欧洲各国采取君主立宪的形式。在君主立宪的国家里，只有拥有一定资本的人即资产者，才有选举权。这些资产者选民选出议员，而他们的议员可以运用拒绝纳税的权力，选出资产阶级的政府。

第三，产业革命到处都促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以同样的速度发展起来。资产阶级越发财，无产者的人数也就越众多。因为只有资本才能使无产者找到工作，而资本也只有在使用劳动的时候才能增殖，所以无产阶级的增长是同资本的增长完全一致的。同时，产业革命使资产者和无产者都集中在最有利于发展工业的大城市里，广大^①群众聚集在一个地方，就使无产者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后来，随着产业革命的发展，随着挤掉手工劳动的新机器的不断发明，大工业就把工资越压越低，把它降低到上述的那种最低额，因而无产阶级的处境也就越来越不堪忍受。这样，一方面由于无产阶级不满情绪的增长，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力量的壮大，产业革命便孕育着一个由无产阶级来进行的社会革命。

第十二个问题：产业革命进一步产生了什么结果？

答：大工业创造了像蒸汽机和其他机器那样的工具，这些工具使工业生产在短时期内用不多的费用便能无限制地增加。由于生产的扩展这样容易，大工业的必然后果——自由竞争也就很快就达到十分剧烈的地步。大批资本家都投身于工业，生产很快就超过了消费。结果，生产出来的商品卖不出去，所谓商业危机就索到了。工厂只好关门。厂主破产，工人挨饿。到处出现

^① 这里删去了“无产者”一词。

可怕的贫困现象。不久以后，过剩的产品卖光了，工厂重新开工，工资提高，生意也渐渐地比以往更好起来。但这是不会长久的，因为很快又会生产出过多的商品，新的危机又会到来，这种新危机的发展过程和前次危机完全相同。由此可见，从19世纪初期以来，工业经常在繁荣时期和危机时期之间波动。这样的危机几乎定期地每5—7年就发生一次，它总是给工人带来可怕的灾难，激起普遍的革命义愤，并给整个现存制度造成极大的危险。

第十三个问题：这种定期重演的商业危机会产生什么后果？

答：第一，虽然大工业在它的发展初期自己创造了自由竞争，但是现在它的发展已经超越了自由竞争的范围。竞争和个人经营工业生产已经变成大工业的枷锁，大工业要粉碎它，而且一定会粉碎它。大工业只要还是按照现今的原则经营，就只有依靠每七年出现一次的普遍混乱才能维持生存，每次混乱对全部文明都将是一种威胁，它不但将无产者抛入贫困的深渊，而且也使许多资产者破产。因此，或者必须消灭大工业，——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或者是承认，大工业造成一种绝对必需的局面，那就是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组织，在这个新的社会组织里，工业生产将不是由相互竞争的厂主来领导，而是由整个社会按照确定的计划和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来领导。

第二，大工业及其所引起的生产无限扩大的可能性，使人们能够建立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将生产得很多，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力量和才能。由此可见，现代社会中造成一切贫困和商业危机的大工业的那种特性，在另一种社会组织中却正是消

灭这种贫困和这些有害的动荡的因素。

因此，以下各点便得到完全令人信服的证明：

(1) 现今的一切贫困灾难，完全是由已不适合于时间条件的社会制度造成的；

(2) 用建立新社会制度的办法来彻底消除这一切贫困的手段已经具备。

第十四个问题：这种新的社会制度应当是怎样的？

答：首先将根本剥夺相互竞争的个人对工业和一切生产部门的管理权。一切生产部门将由整个社会来管理，也就是说，为了公共的利益按照总的计划和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这样，竞争将被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所消灭，而为联合所代替。因为个人管理工业的必然后果就是私有制，因为竞争不过是个别私有者管理工业的一种方式，所以私有制是同工业的个体经营和竞争密切联系着的。因此私有制也必须废除，代替它的是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和按共同协议来分配产品，即所谓财产共有。废除私有制甚至是工业发展所必然引起的改造整个社会制度的最简明扼要的说法。所以共产主义者提出废除私有制为自己的主要要求是完全正确的。

第十五个问题：这么说，过去废除私有制是不可能的？

答^①：不可能。社会制度中的任何变化，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

^① 原先的文本是这样的：答：不可能，第一，因为私有制本身不是固有的，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从村社所有制、封建所有制和行会所有制中产生出来的。现代的所有制是工业的产物。这是一种可行于工场手工业和大工业发展初期的所有制形式。所以，这种所有制虽然根本不存在或者仅仅作为普通情况下

次变革，都是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相适应的新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私有制就是这样产生的。私有制并非一向就有；在中世纪末期，产生了一种手工工场那样的新的生产方式，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已经超越了当时封建和行会所有制的范围，于是这种已经超越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手工工场便为自己创造了新的所有制形式——私有制。对于手工工场和大工业发展的最初阶段来说，除了私有制，不可能有其他任何所有制形式，除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不可能有其他任何社会制度。只要生产的规模还没有达到既可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又有剩余去增加社会资本和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就总会有支配社会生产力的统治阶级和另外一个阶级即贫穷和被压迫的阶级存在。至于这些阶级是什么样

的一种例外存在于世，但也是不可能废除的。

第二，废除私有制，就像社会制度的每一次变革一样，只有在它因旧的社会制度而产生的生产力成为必要的时候才有可能。当工业中产生出不适应封建的所有制和中世纪的行会所有制时，这种新的生产力才能产生私有制。大工业中产生的生产力日益表明，私有制对它来说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它要摆脱这种私有制，只有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才有可能废除私有制。

第三，消灭私有制，首先需要数量众多、生活贫困的无产阶级，即受私有制压迫的阶级，另一方面，必须存在日益集中的大量资本和容易增长的生产力；无产阶级只有掌握生产力，并自身不断发展，才能获得自身的解放。私有制被废除以后，要建立公有制，首先必须能为社会每一个成员准备足够的产品，也就是说，要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大资本的高度集中为前提。同样，被压迫阶级因为私有制而受压迫，并且不再像封建所有制和行会所有制时代那样在建立私有制和建立私有制以后的结果中看到自身的解放，而是在废除私有制过程中看到自身的解放。然而，这二者，正如我们已经证明的那样，只有通过大工业才能完成；因此只有现在才能……。

子，那就要看当时生产所处的发展阶段了。在以农业为中心的中世纪，是地主和农奴；在中世纪后期的城市里，是师傅、帮工和短工；在17世纪是手工工场主和手工工场工人；在19世纪则是大工厂主和无产者。非常明显，在这以前，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能以足够的产品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同时私有制也还没有成为这些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和障碍。但是现在由于大工业的发展：**第一**，有了资本和规模空前的生产力，并且具备了能在短时期内无限提高生产力的手段；**第二**，生产力集中在少数资产者手里，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却越来越多地变成了无产者，并且资产者的财富越是增加，无产者的境遇就越加悲惨和难以忍受；**第三**，这种强大的容易增长的生产力的发展，已经大大超出了私有制和资产阶级的范围，以致经常引起社会制度极其剧烈的震动。因此，现在废除私有制不仅可能，而且完全必要。

第十六个问题：能不能用和平的办法废除私有制？

答：但愿如此，共产主义者也会是最不反对这种办法的人。共产主义者很清楚，任何密谋都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他们很清楚，革命不能预先随心所欲地制造，革命在任何地方都是完全不以个别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但他们也看到，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的的发展都受到强力的压制，共产主义者的敌人这样做无异是想尽方法引起革命。因此，如果所有这些最终把被压迫的无产阶级推向革命，那时，我们共产主义者将会用实际行动来捍卫无产阶级的事业，正像现在用言论来捍卫它一样。

第十七个问题：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废除呢？

答：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

建立公有经济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征象显著即将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存社会，并且只有在废除私有制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创造出来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

第十八个问题：这个革命的进程将是怎样的呢？

答：首先，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在英国可以直接建立这种统治，因为那里的无产者现在已占人民的大多数，在法国和德国可以间接建立这种统治，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民不仅是无产者而且还有小农和城市小资产者，小农和小资产者正处在分化为无产阶级的过渡阶段，他们的一切政治利益的实现都越来越依赖无产阶级，因而他们一定很快就会同意无产阶级的要求。为此可能还需要新的^①斗争，但是，这次斗争必定以无产阶级的胜利而告终。

假如无产阶级不能立即利用民主来实行直接侵犯私有制和保证无产阶级生存的各种措施，那么，这种民主对于无产阶级就会毫无用处。这些从现有条件中必然产生出来的最主要的措施如下：

1. 用累进税、高额遗产税、取消旁系亲属（兄弟、侄甥等）继承权、强制公债等来限制私有制。

2. 一部分用国营工业竞争的办法，一部分直接用纸币赎买的办法，逐步剥夺土地私有者、厂主以及铁路和海船所有者的财产。

3. 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举行暴动反对大多数人民^②的叛乱

① “新的”二字是后加的。

② 原为“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

③ “大多数人民”五字是后加的。

分子的财产。

4. 组织劳动或者^①让无产者在国家的田庄、工厂、作坊中工作，这样就会消除工人之间的相互竞争，并迫使残存的厂主所付的工资同国家所付的一样高。

5. 直到私有制完全^②废除为止，对社会的一切成员实行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农业方面的产业军。

6. 通过拥有国家资本的国家银行，把信贷系统和银行业集中在国家手里。封闭一切私人银行和钱庄。

7. 随着国家所拥有的资本和工人数目的增加而增加国营工厂、作坊、铁路、海船的数目，开垦一切荒地，改良已垦地的土质。

8. 所有的儿童，从能够离开母亲照顾的时候起，由国家机关公费教育。^③把教育和工厂劳动结合起来。

9. 在国有土地上建筑大厦^④，作为公民公社的公共住宅。公民公社将从事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将结合城市和乡村生活方式的优点而避免二者的偏颇和缺点。

10. 拆毁一切不合卫生条件的、建筑得很坏的住宅和市街。^⑤

11. 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的遗产继承权。

12. 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人民手里。

① “组织劳动或者”是后加的。

② “完全”二字是后加的。

③ 这里缺少恩格斯原来加的注。

④ 原为“公民公社大厦”。

⑤ 这里加上后又删去：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农业方面的产业军。根据上述第十八个问题的答案中的第五点修改。

自然，所有这一切措施不能一下子都实行起来，但是它们将一个跟着一个实行。只要向私有制一发起猛烈的进攻，无产阶级就要被迫继续向前迈进，把全部资本、全部农业、全部工业、全部运输业和整个交换都越来越多地集中到国家手里。上述一切措施都是为了这一个目的。无产阶级的劳动将使国内生产力日益增长，随着这种增长，这些措施实现的可能性和由此而来的集中化程度也将相应地增长。最后，当全部资本、全部生产和全部交换都集中在人民手里的时候，私有制将自行灭亡，金钱将变成无用之物，生产增加了，人也改变了，那时，旧社会的各种关系的最后形式也才会消失。

第十九个问题：这种革命能不能单独在某个国家内发生呢？

答：不能。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的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致使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着另一国家的事变的影响。此外，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得不相上下，以致无论在什么地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它们之间的斗争成了我们这一时代的主要斗争。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工业较发达，财富积累较多，以及生产力较高而定。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特别^①加速它们原来的

^① “特别”二字是后加的。

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第二十个问题：彻底废除私有制以后将产生什么结果？

答①：由于社会将剥夺私人资本家对一切生产力和交往工具的支配权，也将剥夺他们对产品的交换和分配权，由于社会将按照根据实有资源和整个社会需要而制定的计划来支配这一切东西，所以同现在实行的大工业制度相联系的一切有害的后果，将首先被消灭。经济危机将终止，扩大的生产在现今的社会制度下引起生产过剩，并且是产生贫困的极重要的原因；但是到那时候，这种生产就会显得十分不够，并一定要大大扩大。超出社会当前需要的生产余额不但不会引起贫困，而且将保证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将引起新的需要，同时将创造出满足这种新需要的手段。这种生产余额将是进一步前进的条件和刺激，它会实现这种进步，同时也不会因此（像过去那样）而造成整个社会秩序的周期性混乱。摆脱了私有制束缚的大工业将来的发展规模十分宏伟，相形之下，目前的工业状况将显得非常渺小，正像手工工场和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工业相比一样。工业的这种发展将给社会提供足够的产品以满足它的全体成员的需要。现在由于私有制的压迫和土地的分散而很难运用现有的改良和科学成就的农业，将来同样也会进入繁荣的新时代，并将给社会提供足够的产品。这样一来，社会就将生产出足够的产品，可以组织分配以满足全体成员的需要。这么一来，社会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相互敌对的阶级也就是多余的了；这种划分不仅是多余的，甚至是同新的社会制

① 这个回答的开头原先是：首先将由此产生在当今社会引起一切危机和贫困的生产过剩。

度互不相容的。阶级的存在是由分工引起的，到那时现在这种分工也将完全消失，因为要把工业和农业生产提高到上述的那种水平，单靠机械的和化学的辅助工具是不够的，还必须相应地发展运用这些工具的人的能力。当18世纪的农民和手工工场工人被吸引到大工业中以后，他们改变了自己的整个生活方式而完全成为另一种人^①，同样，用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共同经营生产和由此而引起的生产的新发展，也需要一种全新的人，并将创造出这种新人来。生产的社会管理不能由现在这种人来进行，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只隶属于某一个生产部门，受它束缚，任它剥削，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只能发展自己能力的一方面而偏废了其他各方面，只熟悉整个生产中的某一个部门或者某一个部门的一部分。就是现在的工业也渐渐不能使用这样的人了。由整个社会共同地和有计划地来经营的工业，就更加需要各方面都有能力的人，即能通晓整个生产系统的人。因此现在已被机器动摇了的分工，即把一个人变成农民、把另外一个人变成鞋匠、把第三个人变成工厂工人、把第四个人变成交易所投机者的这种分工，将要完全消失。教育可使年轻人很快就能够熟悉整个生产系统，可使他们根据社会的需要或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教育就会使他们摆脱现代这种分工为每个人造成的片面性。这样一来，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将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地发挥他们各方面的才能，而同时各个不同的阶级也就必然消失。因此，根据共产主义原理组织起

^① 这里删去了“以便能从事大工业；同样，现在的人也将发生彻底变化，以便全面发挥当代的大工业和现代的适合于大工业的工农业生产力和其生产方式”一句。

来的社会一方面不容许阶级继续存在，另一方面这个社会的建立本身便给消灭阶级差别提供了条件。

由此可见，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也将消失。从事农业和工业劳动的将是同样的一些人，而不再是不同的阶级。单从物质方面的原因来看，这已经是共产主义联合体的必要条件了。乡村农业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业人口的集中只是工农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表现，它是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这种障碍在目前已经深深地感到了。

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而有计划地尽量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全体成员需要的规模；消灭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情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这一切都将是废除私有制的最主要的结果。

第二十一个问题：共产主义制度对家庭将产生什么影响？

答：两性间的关系将成为仅仅同当事人有关而社会勿需干涉的私事。这一点之所以能实现，是由于废除私有制和社会负责教育儿童的结果，因此，由私有制所产生的现代婚姻的两种基础，即妻子依赖丈夫、孩子依赖父母，也会消灭。这也是对道貌岸然的市侩关于共产主义公妻制的悲鸣的回答。公妻制完全是资产阶级社会特有的现象，现在的卖淫就是这种公妻制的充分表现。卖淫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它将随着私有制的消失而消失。因此，共产主义组织并不实行公妻制，正好相反，它要消灭公妻制。

第二十二个问题^①：共产主义组织将怎样对待现有的各民

族？

——保留原案。^②

第二十三个问题：共产主义组织将怎样对待现有的各宗教？

——保留原案。^③

第二十四个问题：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有什么区别？^④

答：所谓^⑤社会主义者可分三类：

第一类是那些封建和宗法社会的拥护者，这种社会已被大工业、世界贸易和由它们所造成的资产阶级社会所消灭和日益被消灭。这一类社会主义者从现代社会的苦难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应该恢复封建的和宗法的社会，因为它没有这种种苦难。这一类人的一切主张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为了这一目的。共产主义者随时都要坚决同这类**反动的**社会主义者作斗争，尽管他们假惺惺地表示同情无产阶级的苦难和为此而洒出热泪。因为这些社会主义者：

(1) 追求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2) 希望恢复贵族、师傅、手工工场主^⑥以及同他们相联系的专制君主或封建君主、官吏、士兵和僧侣的统治，他们想恢复的这种社会固然没有现代社会的各种缺点，但至少会有同样多的其他灾难，而且它也不会开辟通过共产主义社会来解放被压迫

① 这里删去了“共产主义者的态度是什么？”一句。

② 参看文件147和第二十一个问题的回答。

③ 参看文件147和第二十二个问题的回答。

④ 这里缺少恩格斯加的原注。

⑤ “所谓”二字是后加的。

⑥ 原为“手工工场资本家”。

工人的任何前途；

(3) 当无产阶级成为革命的和共产主义的阶级的时候，这些社会主义者总要暴露出他们的真实意图。在这种场合下，他们马上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

第二类是现代社会的拥护者，现代社会必然产生的苦难，使他们不得不替这一社会的存在担心。因此，他们力图保持现代社会，不过要消除同它联系在一起的苦难。为此，他们中有的人提出了种种简单的慈善办法，有的人则提出了规模庞大的改革计划，这些计划在改组社会的借口下企图保存现代社会的基石，从而保存现代社会本身。共产主义者也得同这些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作不懈的斗争，因为他们的活动有利于共产主义者的敌人，他们所维护的社会正是共产主义者所要推翻的社会。

最后，第三类是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和共产主义者同道，他们希望实现〔第十八〕个问题中所提出的部分措施，但他们不是把这些措施当作导致共产主义的过渡办法，而是当作足以消除现代社会中的贫困和苦难的措施。这些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①，或者是不够了解本阶级解放条件的无产者，或者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直到争得民主制度和实行由民主制度产生的社会主义措施为止，这个阶级在许多方面都与无产阶级有共同的利益。因此，共产主义者在需要行动的时候，只要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不为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效劳和不攻击共产主义者，就应当同这些社会主义者达成协议，并且要尽可能与他们采取共同的政策。当然，共同行动并不排除讨论那些存在于他们和共产主

^① 原为“社会主义者或民主主义者”。

义者之间的分歧意见。

第二十五个问题：共产主义者怎样对待现有的其余各政党？

答：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里将采取各种不同的态度。在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英国、法国和比利时^①，共产主义者和各民主主义政党暂时还有共同的利益，并且民主主义者在他们现在到处都坚持的那些社会主义措施中越接近共产主义者，即他们越明确地坚持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越加依靠无产阶级，这种共同的利益也就越大。例如在英国，由工人组成的宪章派就要比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或所谓激进派更接近共产主义者。

在实行民主宪法的**美国**，共产主义者必须支持愿意用这个宪法去反对资产阶级、并利用它来为无产阶级谋利益的政党，即主张全国土地改革的政党。

在**瑞士**，激进派虽然本身也是个成分极其复杂的政党，但是共产主义者只能同他们达成协议，其中瓦得和日内瓦的激进派又是最进步的。

最后，在**德国**，资产阶级和君主专制之间的决战还在后面。但是，共产主义者不能指望在资产阶级取得统治权以前就同资产阶级行进决战，因此共产主义者为了本身的利益必须帮助资产阶级尽快地取得统治权，以便随后能尽快地把它推翻。在自由派资产阶级同政府斗争中，共产主义者始终应当支持自由派资产阶级，但同时也应当提防不要跟着资产阶级自欺欺人，不要去听他们那一套娓娓动听的说什么资产阶级的胜利会给无产阶级带来良好

① 这里删去了“和美国”三字。

② 原为“人民”。

结果的花言巧语。共产主义者从资产阶级的胜利中得到的好处只能是以下这些：（1）得到各种让步，使共产主义者易于捍卫、讨论和传播自己的原则，从而使无产阶级易于联合成一个紧密团结的、准备战斗的和有组织的阶级；（2）使他们确信，从专制政府垮台的那一天起就将开始资产者同无产者斗争了。从这一天起，共产主义者在这里所采取的政策，也将同在资产阶级已占统治地位的那些国家里所采取的政策一样。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F.1.op.1,Nr.22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0—227页）

174

安得列阿斯·哥特沙克（科伦）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

1847年11月5日

11月5日于科伦

尊敬的先生：

我没有及时答复您的友好来信，您不要归因于任何其他情况，而只要怪我的拖拉作风。昨天，我又会见了亨·毕尔格尔斯。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我们为计划中的评论^①暂时只能答应12

^① 参看文件165；从哥特沙克1848年1月26日给马克思的信（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1.op.5,Nr.158）中可以看出，出版该杂志的计划因1847年底1848年初的严峻形势而未能实现。

个股份，但我们相信，只要您详细讲明交款的方式或者能够出版第一册，认购的人还会大大增加。同时我们认为很有必要告诉您，那12个股份都安排给了这里的小资产者，也就是说，没有安排给前《莱茵报》的任何一个股东或领导人；德斯特尔医生至今还没有恳请这些先生入股。因此，您也许认为有必要直接求助于其中的一位或几位先生。

我们迫切等待着您的反蒲鲁东文章的译文^①，我可以担保销售很多本，如果这种担保对该书的出版能起到某些作用。奥·韦勒尔已在他的《民主手册》中发表了反蒲鲁东的结尾部分，译文相当蹩脚。^②我们希望，在我们试图竭尽全力出版您和朋友们的著作时能抵制卢格—格律恩集团的阴谋。^③因此，我已嘱咐安内克夫人写信给阿恩斯贝格的舍费尔，并建议他一开头就发表您的著作或由赫斯翻译的巴贝夫和德萨米的著作译文^④；原来他是《威斯特伐利亚瞭望台》杂志的编辑，计划创办一个出版社。他的回信一到，我就马上告诉您。莱比锡的奥·韦勒尔也写信对我们说，他完全不受阿·卢格的影响。我们将在可供我们使用的各家报纸上戳穿格律恩的牛皮，给《杜塞尔多夫日报》附上文章^④

① 参看文件167；译文没有完成。

② 指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即从“我们应当把资产阶级”开始的最后八段，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为题发表在《1848年民主手册》1847年莱比锡版第215—217页。

③ 莫泽斯·赫斯当时没有发表他的译作：泰奥多尔·德萨米《公共法典》（1842年巴黎版）和非力浦·邦纳罗蒂《为平等而密谋，又名巴贝夫的密谋》（1823年布鲁塞尔版）。赫斯1840年才开始着手翻译这两部著作。

④ 参看注112。

可以证明这一点。反蒲鲁东一书的详细广告已经寄给《德国旁观者》，另一份将在《威斯特伐利亚汽船》（顺便说一句，它要经受非常严酷的斗争）上发表，第三份将在《布雷斯劳人民明镜》上发表。

我以尽快获得您的消息为荣，请接受我的由衷敬意。

安·哥特沙克

手稿

第一次发表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F.1.op.5,Nr.152

175

关于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成立大会的报道¹¹³

1847年11月7日和15日

【……】11月7日和15日，以各国人民的团结和友谊为目的的民主协会相继召开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全体代表会议。在这两次会议上成立了新的协会，任命了常务局，通过了为期三个月的临时章程，会员人数明显增加。会员中有来自比利时各城市的人，他们是艺术家、工人、律师、房产主、商人、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教授、著作家等（特德斯科、迈因茨、若特兰、斯皮特霍恩、阿·皮卡尔、费德尔、丰克、马萨尔等先生，来自列日、根特、布鲁塞尔等地的律师、阿格奈桑协会的主席¹¹⁴、梅利奈将军、日果、凯洛博士、内兰），许多波兰人（列列韦尔、科达契夫斯基、扎累夫斯基等等），好些德国人（马克思、莫·赫斯、科尼

斯堡的弗·克吕格尔、布雷斯劳的威·沃尔弗、柏林的布赖埃尔医生（现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编辑阿·冯·伯恩施太德、波尔恩、施洛特曼），马赛的《人民主权报》前任编辑安贝尔等等。

常务局是在第二次全体代表会议上最后成立的，梅利奈将军被提议为名誉主席^①，这个建议经鼓掌欢呼通过。

若特兰律师先生被一致推选为主席。安贝尔和马克思先生为副主席（鼓掌）；阿尔伯·皮卡尔先生为书记；丰克律师先生为司库；列列韦尔、迈因茨、斯皮特霍恩和格奥尔格·维尔特为翻译。^②（鼓掌）

协会的下次会议将在28日星期天举行，地点届时另行通知。

在两次会议期间始终保持秩序井然。有40人出席了第二次会议，他们在28日的会议上才能被吸收入会。[……]

1847年11月18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
第92号

节录

① 这个提议是由威廉·沃尔弗提出的。

② 会议记录表明，当选者得到的票数分别为：若特兰得47票，安贝尔得37票，马克思得36票，皮卡尔得35票，丰克得46票，列列韦尔得35票，迈因茨得35票，斯皮特霍恩得33票，维尔特得25票。

182

弗里德里希·列斯纳回忆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

（摘自《一八四八年前后》1898年版）

1847年11月29日至12月8日

[……]①卡贝离开伦敦以后，不久，在1847年11月底又举行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卡尔·马克思也出席了大会。他和恩格斯从布鲁塞尔到伦敦，目的是要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捍卫科学共产主义的原理。大会一共进行了10天。各次会议只有代表参加；我不是代表。但是我们知道谈的是什么问题，所以我们非常关切地期待着讨论的结果。不久我们就听说代表大会一致赞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阐述的原理，并且委托他俩起草宣言。后来，1848年初，当《共产党宣言》手稿送到伦敦时，我把手稿送到印刷所，并从那里取回清样交给卡尔·沙佩尔校对，也算为发表这一划时代的文献尽了一份力。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俩给我的印象是永远不会磨灭的。

马克思当时还很年轻，约莫28岁的样子，但是他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中等身材，结实有力，肩宽额高，满头密密的黑发，目光炯炯，能洞察一切。就在那时他的尖刻的讽刺已足以

① 在上文中列斯纳还描述了与卡贝的讨论情况（参看注102）。

使他的论敌丧胆了。马克思是天才的人民领袖。他发表的演说简洁而有条理，逻辑性很强；他决不浪费笔墨，一字一句都有深刻的涵义，都是整个论据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在马克思身上嗅不到一点空想家的气息。我对魏特林时期的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宣言》的共产主义之间的差别了解得越深刻，就越明确地感到马克思是成熟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代表。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马克思的精神上的兄弟，一望而知是典型的日耳曼人。他体格匀称，动作灵敏，有金色的头发和漂亮的胡子。他不大像一个学者，倒像一个年轻有为的近卫军上尉。

恩格斯本人对现代社会主义的创立和传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他常常强调他那不朽的朋友的作用。像恩格斯这样的人，你只要对他了解得越深刻，也就会越加敬爱他。

他们俩是以无产阶级的事业为己任的人。

当时，我们在伦敦工人教育协会里，有点过于激动。我们深信必须立即“行动”了，根本没有考虑到，要使无产阶级能推翻资产阶级世界，还需要进行大量的教育和组织工作。〔……〕

弗里德里希·列斯纳《一八四八年前后》，
载于1898年《德意志言论》（维也纳）第8
期第108—109页

摘要

185

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给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信^①

1847年12月初

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致布鲁塞尔 “旨在团结各国人民的民主协会”

1847年12月初

民主派兄弟们，本协会的会员和朋友们在1847年11月29日举行的纪念不幸然而光荣的1830年波兰革命的公开大会^②上宣读了你们1847年11月26日的来信。

你们的代表，我们的可敬朋友和兄弟马克思博士将向你们报告他出席大会并在大会上宣读你们的来信时受到热烈欢迎的场面。一双双眼睛都闪耀着喜悦的光芒，大家异口同声地高喊“欢迎”，每个人都伸出双手，以真挚情谊的无比温暖欢迎你们的代表。

你们委员会的名称博得了我们的会员们的赞同。人类理应感谢你们的建议者，感谢他们为自由事业作出的功绩和牺牲。一个协会只要有了英勇的梅利奈将军和著名而廉洁的爱国者列列韦尔

① 1847年12月26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103号也刊登了这封信。这里刊登的译文，有些地方与原文稍有出入，但未作说明。关于民主协会对这封信的答复见文件201。

② 参看文件179。

这样的人，就定能赢得各国民主派的信任。至于我们，我们将非常乐意接受你们提出的联盟。〔……〕

在我们的上次（9月22日）创立纪念会上，我们提出了联合召开一次各国民主派代表大会的建议，我们非常高兴地获悉，你们也提出了一个类似的建议。国王们搞阴谋诡计，必将遭到各国人民的一个相反同盟的反对。不管何时召开民主派代表大会，你们可以把英国民主派计算在内，它将会参加大会。你们协会的任务将是同我们的协会建立联系，使我们在整个欧洲的兄弟的代表们聚集一堂。

你们的代表马克思博士，将向你们报告我们与他共同为尽可能有效地加强我们两个协会之间的联系而采取的各项措施。

让欧洲各国被压迫的人民自己想方设法实现自己的解放；允许他们对试图建立的自由政治制度的特殊形式持不同意见。他们在为实现自由所必需的社会改革中出现不一致的意见，是可能的——在这个问题上不可能也不必要达到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完全一致。但是，对于各国民主派来说，有两点是完全一致的，即**人民的主权和各民族的团结**。各国民主派要求，一定要在全体人民中建立起名副其实的国家政权——确立和改变社会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权力。同样，无愧于这个名称的一切民主派都承认，在所有国家中，**人民的利益都是相同的**，各个民族在为正义的斗争中必须相互支持。因此，**人民的主权和普遍的团结**这两条原则使各国真正的改革者结成一条战无不胜的严密阵线。

我们真诚地祝愿你们的协会取得成就，祝愿你们的会员们幸福——我们向你们表示兄弟般的问候并向你们保证，我们将永远支持你们，以便促进光荣原则的实现，而我们的协会就是为传播这

些原则而创立的。

我们十分清楚，我们必须求助于**真正的人民**，求助于无产者，求助于那些在现今的社会制度强加给他们的奴隶制度下流血流汗的人们；我们十分清楚，要实现普遍的团结，我们必须着眼于这些人。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兴趣是肢解各个民族，而到处遭到这些吸血鬼^①压榨、被这帮强盗夺走劳动果实的无产者的兴趣却是相互联合。他们定将联合起来。他们将从织机旁，从铁砧旁，从耕犁旁，从茅屋里，从阁楼间，从地窖里走出来，是的，他们**现在**已从各处走出来了，他们是博爱的天使和人类的拯救者。

民主万岁！各民族的友谊万岁！

书记和委员会委员签名^②：

乔·朱利安·哈尼

厄内斯特·琼斯

查理·基恩

托马斯·克拉克

让·奥·米歇洛

H.贝尔纳

卡尔·沙佩尔

约瑟夫·莫尔

雅·沙贝利茨（巴塞尔）

H.克莱尔（隆采恩）

} 英国

} 法国

} 德国

} 瑞士

① 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的译文中，吸血鬼为资产阶级。

②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的签名同本书刊印的《北极星报》上的签名有显不同。

彼得·霍尔姆	} 斯堪的 那维亚
彼得·隆特贝格 ^①	
路德维克·奥博尔斯基	} 波兰
卡尔·博泽 ^②	} 俄国
勃鲁姆	

1847年12月11日《北极星报》(伦敦)
第529号

节录

186

关于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的一次大会的报道

1847年12月13日

民主派兄弟协会

上星期一晚上，该协会在德罗利街日耳曼大厅举行了一次大会，大会由约翰·奥弗顿主持，朱利安·哈尼在会上就章程修改草案等向全体会员作了说明。经过短时间的讨论，该草案获得一致通过。（章程附本在报道后面）¹¹⁵

大会确认迄今为止各位代理书记的职务，即：乔·朱利安·哈尼和查理·基恩为英国书记；让·奥古斯特·米歇洛为法国书记；卡尔·沙佩尔为德国书记；雅·沙贝利茨为瑞士书记；路德维克·奥博尔斯基为波兰书记以及彼得·霍尔姆为斯堪的那维亚书记。此外，卡尔·博泽当选为俄国书记。

^① 文件199为：古斯塔夫·隆德贝格。

^② 文件199为：卡尔·波泽。

根据章程第5条，会上还选出另外一些成员，他们同书记一起行使一个特别委员会的职权，当选为委员会成员的有：厄内斯特·琼斯和托马斯·克拉克代表英国；贝尔纳代表法国；约瑟夫·莫尔代表德国；克莱尔代表瑞士；隆特贝格代表斯堪的那维亚；索斯诺夫斯基代表波兰，还有勃鲁姆代表俄国。然后大会作出决定，责成委员会于1月1日星期六晚上8时举行一次会议，以便准备在下星期一召开的每月例会的议题。^①

大会经过热烈而有趣的讨论，根据公民沙佩尔和隆特贝格的提议作出决定，“委托书记起草并发送一份致瑞士联邦议会的告人民书”。¹¹⁶

根据公民沙佩尔和布恩翰的提议，大会作出决定，“英国派四名会员，其他在协会有代表的每个国家各派两名会员在告瑞士人民书上签名”。根据公民沙佩尔和基恩的提议，大会还决定，“把这份告人民书交给《北极星报》发表，另外再单独印成一页，以每份1便士出售”。

朱利安·哈尼报告说，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一致决定：

举行一次各国民主派代表大会¹¹⁷是人心所向；

恳请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与本协会共同负责会议的筹备工作，上述代表大会定于明年9月25日，即比利时革命周年纪念日在布鲁塞尔举行；

恳请布鲁塞尔协会准备将要提交代表大会讨论的议题；其他被公认的民主派团体有权对议题中的提案提出附议；

向第一次代表大会提议，第二次代表大会（1849年）应在伦

1. 参看文件193。

敦召开。

根据朱利安·哈尼和约翰·阿诺特的提议，大会批准了委员会的这些决议。

然后大会作出决定，任命公民哈尼、沙佩尔、奥博尔斯基、琼斯和基恩组成代表团，就民主派代表大会的召开向宪章派执行委员会和宪章派伦敦代表委员会提出建议；任命公民沙佩尔、莫尔、贝尔纳、布恩翰和阿诺特组成代表团，向德意志民主协会^①提出同样的建议。[……]

1847年12月18日《北极星报》（伦敦）

节录

第530号

187

乔治·朱利安·哈尼（伦敦）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

1847年12月18日

亲爱的马克思：

我的身体至今一直非常不好，所以这里只能告诉你，关于明年9月在布鲁塞尔举行民主派代表大会的提议^②已经在民主派兄弟协会、德意志工人协会、首都宪章派委员会和宪章派执行委员会的每月例会上一致通过。

^① 指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

^② 见文件186。

1848年的第一周再给你写信。

乔·朱·哈·

1847年12月18日于伦敦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F.20，Nr.14

188

关于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一次会议的报道

1847年12月20日

“民主协会”12月20日的会议（在布鲁塞尔的一家旧式庭院里召开）空前活跃。海牙、列日等地纷纷来信，要求建立分会。① 有才智的、感情炽烈的律师特德斯科接受委托前往列日完成这一使命；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接受委托前往巴黎，同那里的法国民主派取得联系（鼓掌），他已经接受了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的类似委托。

卡尔·马克思在与会者的一片热烈掌声中向布鲁塞尔协会报告了伦敦协会来信一事。② [……]

1847年12月26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
第103号

节录

① 1848年1月27和30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301和302号报道了关于1848年1月23日根特分会创立纪念日的情况。参看文件201。

② 文件185。

189

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给伯尔尼瑞士联邦议会的信¹¹⁸

1847年12月21日

尊敬的先生们：

你们对扼杀自由的派别采取坚决而有力的态度，我们对此深表钦佩。 [……]

自由瑞士的敌人曾经公开声称，宗得崩德是在为欧洲的王权而战斗；而我们却声明，瑞士人是在为欧洲的自由而战斗。只要战斗在继续，我们认为，我们就不得干预瑞士的内部事务。但是，我们现在不能忘记，当一切爱好自由的人们心中充满胜利喜悦的时候，还有**孤立无援的孤儿寡母**正在为自己在战斗中阵亡的保护人和养育人哭泣；还有**伤病员**，他们已无法继续维持生计。在这里，用言论和行动解除他们的痛苦，是每个民主主义者的职责，不管他是哪个国家的人。

因此，我们在我们的协会中，为了在反对耶稣教徒的战争中受伤和阵亡的瑞士人的寡母孤儿募了捐，现把**100法国法郎**捐款寄给你们，请把这笔捐款交给你们任命的救济委员会去支配。

我们都是工人，而且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或多或少受到了席卷英国的商业危机的冲击，陷入了可悲的境地。因此，尊敬的先生们，请你们谅解，我们能够寄给你们的捐款数目虽小，但代

表我们的深情厚意。 [……]

瑞士共和国，欧洲自由的堡垒万岁！

以“工人教育协会”的名义并受其委托

主席：亨利希·鲍威尔

副主席：古斯塔夫·比伯尔

书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司库：梯·约·皮茨

图书馆管理员：阿舍尔曼

以在协会中有代表的所有国家的名义：

阿·格罗什（匈牙利）

I.尼什特拉伊（匈牙利）

J.索斯诺夫斯基（波兰）

F.利希蒂（瑞士）

盖诺兹（波希米亚）

约翰·奇克（英国）

阿·列曼（德国）

J.D.涅伊曼（俄国）

彼得逊（丹麦）

哈默林德（瑞典）

A.安德森（挪威）

扬森（比利时）

杜沙尔（法国）

1847年12月21日于伦敦

手稿

节录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190

关于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新年庆祝活动的报道

1847年12月31日

[……]“德意志工人协会”决定,31日晚上8时半左右举行宴会,届时协会全体会员和协会同意邀请的所有客人都可参加。

……]此外,协会还邀请了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名誉主席梅利奈将军、主席若特兰、书记皮卡尔以及经受了半个世纪考验的波兰民主主义者和闻名欧洲的伟大学者约阿希姆·列列韦尔。所有的人都高兴地接受了邀请,以表热烈的同情之心。民主协会副主席安贝尔(法国人)同时也是德意志工人协会的会员,他和全家人一起参加了宴会。[……]

瓦劳主席首先站起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谈到了博爱民主的原则、无产阶级的目标、对剥削的仇恨、对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念,他的讲话不时被兴高采烈的与会者的一阵阵暴风雨般掌声所打断。

然后,卡尔·马克思发言,并用法语为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祝酒;他在清楚和确切的分析中强调了同专制制度相对立的比利时自由思想派的使命,正确评价了一部自由主义宪法的良好作用和一个公民在其中可举行自由讨论、拥有结社权的国家的良好作用,

同时还说，博爱主义的种子将撒遍整个欧洲。^①（热烈鼓掌）

皮卡尔先生以民主协会的名义高度赞赏布鲁塞尔的德国人、他们的目标以及对创建民主协会的推动作用。他的讲话令人信服、充分民主，而且形式上也相当成功，尔后他为德意志工人协会的繁荣昌盛祝酒！（热烈鼓掌）

然后，高龄的列列韦尔站起来（全场爆发了经久不息的暴风雨般的掌声），以民主波兰的名义，对民主的德国表示同情，希望它成为统一、伟大、强盛、摆脱诸侯无赖、自己支配自己的国家，成为波兰的友好邻邦，而对在压迫者诸侯和当前剥削者的统治下的官方德国表示深恶痛绝。他的讲话宣告了波兰人民和德国人民的联盟，不时被热烈掌声所打断。尔后，列列韦尔为一个自由的、解放了的新德国的强大，为德国人民的安康祝酒。（长时间的鼓掌）[……]

接着沃尔弗^②发言。（热烈鼓掌）他的发言通俗易懂，刚健有力，充满信念和烈火般的感情，既有真正民间的幽默，又有对柏林等地国王的困境满怀仇恨和深刻蔑视。发言者描述了正好是一年前的今天在布鲁塞尔这里创办一个维护德国无产阶级事业的刊物的情况，这个刊物逐步得到发展，生机盎然，现已成为欧洲唯一的一个真正自由思想的德国刊物，因为在德国，由于书报检查制度和其他障碍，甚至连最出色的报纸，如《德国旁观

① 在原件上有这样一个注：在德意志工人协会前几次举行的会议上，卡尔·马克思有一次在会上就“什么是工资”这个重要问题发表了演说：他讲得清楚、实事求是和浅显易懂，他引用实际的证据十分尖锐地批判了现存的情况，因此我们打算在最近把这个演说介绍给我们的读者。

② 威廉·沃尔弗。

者》、《威斯特伐利亚汽船》和曼海姆的《晚报》，也不能完全公开表达真正的民主思想。现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是唯一能完全明确地表达无产阶级的观点、愿望、需要和希望的报纸。（鼓掌）它战胜了巨大困难，发挥了编辑的牺牲和献身精神，它将继续这样做下去，而所有志同道合者的责任是，支持该报的努力，并到处承认它在这一年里所发表的一切。沃尔弗在结束讲话时说，因此，我为《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及其编辑伯恩施太德的安康干杯。（全场热烈鼓掌和三呼万岁）

布鲁塞尔报编辑站起来说：我只说几句话，因为为我们的报纸的事业而进行斗争和作出牺牲的并非我一个人。当我们缺少资金时，在这里，我们的朋友、无产者、工人和排字工都无偿地提供资金，我们大家同心协力，和衷共济，奔向同一个目标，遵循同一种精神：他们和我们的优秀同事们能如此大公无私地从事活动，因为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神圣使命，理应对他们高呼万岁！

（为这些真正的无产者热烈鼓掌）

接着日果发言，并为两家真正的民主报纸——英国的《北极星报》和法国的《改革报》祝酒。（热烈鼓掌）

继日果祝酒后，有人给奥格斯堡女人^①、《科伦日报》和《莱茵观察家》发出了三声刺耳的“嘘嘘声”。

斯蒂凡·波尔恩接着发言。（鼓掌）他阐述说，组织领袖云格^②的离去将给工人协会带来巨大损失。云格是最卓越的会员之一，他既有刚强坚定的性格，又有不可动摇的信念，这个明天（1月1日）早晨就要离开此地的与会者，前往安特卫普，当天

① 指奥格斯堡《总汇报》。

② 关于河道夫·云格，参看注74。

从那里坐船前往美国（纽约、波士顿）。余协会都为这位坚定的朋友云格热情地欢呼祝酒！波尔恩希望云格不久重返欧洲，并坚信他将到处为无产阶级的不可阻挡的解放事业进行宣传。

云格要求发言，全场发出了暴风雨般的掌声表示欢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种场面是多么可贵，大家都是他的朋友，他所讲的话有根有据，清晰明了，真实可信，刚毅果断。

云格说：我不管到什么地方都将继续干同样的事情，我还是同一个人。我在青年时代就参加了革命，我将终身永葆革命本色，将参加未来的欧洲革命。（热烈鼓掌）当解放的警钟敲响时，不光是我一个人回来，而且还有其他许多人同我一起回来。

（好极了！好极了！）接着云格朗诵了一首讽刺普鲁士国王的诗，这首诗引起了哄堂大笑，它证明了，无忧宫的“骑士英雄”已成为欧洲滑稽可笑的化身，但同时也成了蔑视的化身。[……]

马赛《人民主权报》前编辑安贝尔为劳动组织（在他看来，这是进行一次新的社会改革的基础）发表了一篇言简意赅的祝酒词。他是先前法国人权社的具有影响的创始人和社员之一，所以他的这一讲话博得了一片掌声，受到了热烈欢迎。

比利时阿格奈桑协会^①主席、钳工梅斯肯斯为德意志工人协会祝酒；瓦劳主席向他致答辞，他向我们的兄弟们、比利时工人和阿格奈桑协会高呼万岁。[……]

宴会后是音乐，接着是戏剧节目，在演出中马克思博士夫人发挥了非凡的朗诵才能^②；接着跳舞，舞会不时被轻松愉快、严

① 参看注114。

② 在原件上有这样的脚注：杰出的妇女们为无产阶级的教育所起的作用，给人们留下了十分欣慰的印象，也给人们树立了值得学习的榜样。

肃认真的合唱和独唱所打断。晚会一直延续到第二天早晨6点钟左右；在晚会上，莫·赫斯也讲了话，向前来参加晚会的妇女们表示感谢，并有充分理由强调，参加协会和赞同协会目标的妇女人数将逐月增加（鼓掌并高呼妇女万岁！）[……]

1848年1月6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
第2号

节录

191

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名单¹¹⁹

1848年初

- | | |
|-----------|-----------|
| 1. 阿·恩格尔 | 14. 卡·马克思 |
| 2. L. 恩斯— | 15. 亨·弥勒 |
| 3. G. 费舍 | 16. 奥内曼斯 |
| 4. 日果 | 17. 阿·里德尔 |
| (5. 哈默) | 18. 施泰因根斯 |
| 6. 豪泽尔— | 19. 施洛特曼 |
| 7. 豪埃尔瓦斯 | (20. 蒂默) |
| 8. 鲍恩斯 | 21. 福森 |
| 9. 考施克— | 22. 瓦劳 |
| (10. 克勒尔) | (23. 文齐希) |
| 11. 洛尔— | 24. 威·沃尔弗 |
| 12. 吕德克— | (25. 克罗嫩) |
| 13. 阿·列曼— | 26. 席克耳 |

- | | |
|------------------|--------------|
| 27. 莱维 | 52. 查·沃尔弗 |
| 28. 许纳拜恩 | 53. 瓦伊阿沃 - |
| 29. 布拉赫滕多夫 | 54. 乌尔里希 |
| 30. 罗伊斯 - | 55. 许特 - |
| 31. 康拉第 | (56. 拉斯曼) |
| 32. 弗兰克 | 57. 布洛斯 |
| 33. Ch. 勒德尔 - | 58. 希尔施比勒尔 |
| 34. 范克伦 + (被开除) | 59. 埃伯尔 - |
| 35. 扬森 | 60. 科奇 - |
| 36. 奥特贝格 | 61. 波尔恩 |
| 37. 德托马 | 62. 海尔贝格 |
| 38. B. 弥勒 (手饰工人) | 63. 道姆 (+) - |
| 39. 格罗尔 | 64. 彼得逊 |
| (40. 贝嫩卡姆布) | 65. 罗特迈耶尔 |
| 41. 沙尔特斯 | 66. 福格勒 |
| 42. 威·霍夫曼 | 67. 沙勒 |
| 43. A. 德尔哈伊 | 68. 洛吕茨马赫尔 |
| 44. 安贝尔 | 69. 鲁卡斯 |
| 45. 赫斯 | 70. 海嫩 |
| (46. 希尔茨) | 71. 弗·库尔温德 |
| 47. 勒德尔 (鞋匠) | 72. 索霍夫 - |
| 48. 克吕格尔 | 73. 迈耶尔 |
| 49. 斐·沃尔弗 | 74. 施奈德尔 |
| 50. 伯恩施太德 | 75. 比尔克霍芬 - |
| 51. R. 库尔温德 - | 76. 尼布林 - |

- | | |
|------------|------------------|
| 77. 卡岑堡 | 85. 佩尔西尔 - |
| 78. 钦克 - | 86. 萨托里乌斯 - |
| 79. 黑泽曼 - | 87. 福伊格特 - |
| 80. 林德纳 | 88. 维内克 - |
| 81. 雷库姆 | (还没有会员证) - |
| 82. 凯尔夫兴 | 89. 约翰·马克思(同上) - |
| 83. 施米特龚斯特 | 90. 里姆普 (同上) - |
| 84. 施米茨 - | 91. 范海普 (同上) - |

路易·福尔克^①由布拉赫滕多夫和舍尔^②介绍，
 克拉默由沃尔弗和莱维介绍，
 勒费夫尔由鲍恩斯和沙尔特介绍，
 利德尔由列曼和里姆普介绍，
 希奥由弥勒和赫斯介绍。

手稿^③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F.20，Nr.197

① 这个人下面几个人的名字是用铅笔写在另一张小纸片上的，他们可能是计划人会的人，因为在他们各个人后面有两名会员，即介绍人和担保人的名字。

② 这个人的名字难以辨认，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张名单上没有此人的名字。

③ 手稿复制品：朱利安·科伊佩斯《威廉·沃尔弗和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1847—1848年）》，载于《社会史文库》1963年汉诺威版第3卷第104页等。

192

约瑟夫·魏德迈（哈姆）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
的信

1848年1月2日

1848年1月2日

致以衷心的新年问候，亲爱的马克思！感谢你又给我提供了一点关于你的生活信息。[……]这里的一切虽然有些进展，却缓慢得可怕。如果在此之前没有什么来自外界的巨大干扰，无疑我们能等待来年第二届联合省议会的召开；资产阶级甚至会战胜封建主义，但到目前为止，反动派还是那么恬不知耻，趾高气扬。而最可悲的是，在资产阶级同专制制度之间的这场胜败未决的斗争中，我们党根本不能有什么表现，当然，正式建党就更不可能了。我们到处都只有几个人聚集在一块儿，也就是说，到处都只有一个领导人懂得把年轻资产阶级中的一些革命分子聚集在自己的周围。只有一次享有了像巴登那么多的自由，只召开过一次奥芬堡大会^①，而这些事情错综复杂。但人们不得不以德国式的耐心来伪装自己，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直到取得更大的斗争场所为止。我还没有放弃我的办报计划，我想立即抓住书报检查制度刚刚实行的时刻，呼吁在莱茵省创办一家民主报纸。我的奋斗目标至今还是通过对外通讯为自己获得必要的生活资料，使我不再受

^① 1847年9月12日，巴登的民主派在奥芬堡提出了一项资产阶级民主纲领。

外来工作的影响，致力于研究和宣传。我是否能成功，还不得而知。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我只有几号，而且我只读了一篇你反对海因岑的文章。^①它颇合我意。不过从1日起，我们就有几份报纸了。你们掌握了这家报纸，简直太棒了，我相信，它不久也就会征得足够的订户。我们无产者为保障它眼前的生存能捐赠多少，就应该捐赠多少；当然只能捐助少许钱，但是我想，这少许钱也是值得欢迎的，何况同别人的少许钱加在一起，也许就足以保证它的生存了。你们也将会从我们这里收到通讯，不过，要是信件付邮资不被列为通讯员的必要条件，至少不被列为有名通讯员的必要条件就好了。请尽快通过可靠的途径给我答复，再把可靠的通讯处告诉我。你如能给我搞到一本去年第四季度的《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我将非常高兴；我原先根本没有这份报纸，但我很想从头至尾拜读你的大作。〔……〕

格律恩这个无赖还没有给我答复。^②我早已估计到，我把此事泄露给编辑部^③会激起极大的义愤，对此我很高兴；但是，如果没有必要的话，我可以对他不屑一顾。他的污点是够多的，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立即防止同他接触，以免玷污我们自己。

我的夫人和我向你和你的全家表示衷心的问候，并请转达我对日果和沃尔弗的问候。巴枯宁现在可能也在布鲁塞尔吧；他没有从俄国抢救出什么财产来吧？

① 见文件172。

② 指在《威斯特伐利亚汽船》上刊登马克思的批判文章；参看注98。

③ 指泄露给90年代中威德迈曾担任过编辑的《特利尔日报》。

请尽快回信。

你的

手稿

节录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第一次发表

档案馆, F.1, op.5, Nr.156

193

关于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的一次大会的报道

1848年1月3日

[……] 朱利安·哈尼宣读了告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工人书^①并建议大会通过。

约翰·阿诺特附议通过这个告工人书。

卡尔·沙佩尔 [……] 衷心赞同告工人书中的每一句话,但是,给工人谈有关宪章运动问题,是否属于协会职权范围,他表示怀疑。他担心协会的动机可能会引起误解;有人可能会这样想,民主派兄弟协会想要代替宪章派执行委员会的职能。^②

菲利浦·麦格拉斯请他的朋友沙佩尔相信,民主派兄弟协会和宪章派执行委员会之间不可能发生任何摩擦。他说,他和他的同事幸运地得到了协会的支持;执行委员会委员就是协会会员,

^① 《民主派兄弟协会告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工人书》,载于1848年1月8日《北极星报》第533号,1848年1月20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转载了这封告工人书。

^② 参看注115。

同时他保证，今天缺席的兄弟委员将同他一样，赞同这封出色的由他的朋友哈尼起草的告工人书中的每一句话。他说，告工人书中说的是真理，而真理是强大的，并且终将取得胜利。他认为这样的告工人书极其重要；他说他表示衷心支持。（鼓掌）

主席表示赞同他的朋友麦格拉斯所说的每一句话。他说，由于这个告工人书的真实性，由于它的健全原则，由于它善于辞令，所以他由衷地表示赞同。（鼓掌）

卡尔·沙佩尔说，他的朋友麦格拉斯和主席的特别出色的讲话打消了他的唯一顾虑。

最后，这个告工人书经过表决获得一致通过。[……]

1848年1月8日《北极星报》（伦敦）

节录

第533号

196

约瑟夫·魏德迈（哈姆）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

1848年1月17日

1848年1月17日于哈姆

亲爱的马克思：

现给你寄去20本《威斯特伐利亚汽船》的试刊号¹²⁰，请把其中的一部分交给沃尔弗^①，如果你们对它的传播有些兴趣，

① 可能是斐迪南·沃尔弗。

请寄几本到伦敦去。如果20本不够，还可以再给你寄一些。目前，我正在为了宣传和革命的目的而忙于筹建一个储金处，我想，这样一来，至少可以在我们党内建立这里的条件所允许的那么多组织。吕宁也赞同我的建议，所以，我想，我们不久就能拥有比以前更多的经费。在这里，我们正在为《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的发行而共同奋斗；该报非常适合于事先耕耘这块土地。

[……]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F.1, op.5, Nr.157

节录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

198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决议¹²¹

1848年1月24日

中央委员会致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

1848年1月24日决议

中央委员会决定委托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通知卡·马克思：如果今年2月1日（星期二）之前，他不把在最近召开的代表大会上承诺起草的《共产党宣言》寄到伦敦，那就要对他采取其他措施。如果他不打算起草《宣言》，中央委员会要求他立即退还代表大会提供给他的各种文件。

代表中央委员会并受其委托

签名：
沙佩尔
鲍威尔
莫尔

1848年1月25日于伦敦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F.20，op.1，Nr.15（副本）

199

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给法国无产者的信^①

1848年1月31日

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致法国无产者

“人人皆兄弟”^②

法国的人们^③，——

时代的特征预示着巨大规模的、对你们的等级^④具有重大意

① 这封由夫利安·哈尼提议、由约瑟夫·莫尔、亨利希·鲍威尔和卡尔·沙佩尔附议的信不仅在《北极星报》上发表，而且还在1848年2月18日《德意志伦敦报》第151号上发表。德译文中出现的在内容方面的重要差别，均在脚注中加以注明。

② 《德意志伦敦报》上没有这句口号。

③ 《德意志伦敦报》上为：法国的无产者。

④ 《德意志伦敦报》上为：阶级。

义的变革即将来临。

我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密切注视着那些进步的群众集会和人民胜利的先兆——改革宴会，不久前你们的一些最愛国的公民在这些宴会上表现了坚韧毅力和卓越才能。“制度”^①现在简直就像一个吸血鬼，正在吮吸着法国心脏的血液，它心劳日拙地企图通过诽谤和暴力阻挠这些群众集会取得胜利。诸如此类的企图只会加剧危机，而在危机中，人民主权的强大威力将证明变节者和叛徒们是微不足道的。我们没有必要充当预言家，预言你们将很快就摆脱受屈辱的、灾难性的桎梏，最近17年来，法国就是在这种桎梏下辗转呻吟的。〔……〕

在这个国家（大不列颠），千百万工人已经同骑在他们头上的各阶级彻底决裂，日益获得政治认识和政治权力；他们在坚持自身解放的同时，对暴力斗争并不采取漠不关心的旁观态度，他们的战场就是欧洲大陆。〔……〕

这个国家的人民任劳任怨、不知疲倦的劳动及其在机器和化学工业方面完成的各种了不起的发明和改进，为统治阶级创造了巨大财富，而给工人们却只带来了绝望的生活^②、褴褛的衣服、忍饥挨饿以及种种可怕的贫困。工厂主和商人及其同盟者——高利贷者积累了大量财富，而千百万人却日益贫穷化，这就是这个所有民族中于最富有的民族创造的奇观。在这个民族中，最勤劳阶级的千百万人的社会财富被掠夺一空，而他们所在国家的制度再对人们抬高这些财富的价格。

因此，我们对那些占有一切的人同那些一无所有的人之间横

^① 《德意志伦敦报》上为：可耻的“制度”（路易-菲力浦）。

^② 《德意志伦敦报》上为：工人家庭生活的绝望毁灭。

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能感到奇怪吗？

大不列颠的千百万劳动者同一切凌驾于他们之上的阶级之间就存在这样一条鸿沟。

政治事变使这条鸿沟成了无法逾越的鸿沟。

1830年，**资产阶级**欺骗并坑害了你们这些法国无产者，同样，资产阶级在宣传“改革法案”时也欺骗并出卖了这个国家的工人。自由贸易派新近取得成功使这个阶级的无耻谎言更加放肆，也使少数工人擦亮了眼睛。在此之前，他们是不相信他们的“正派的”、“自由主义的”引诱者的叛卖行为的。

这个国家的民主运动完全是无产阶级的运动，其结果将是一场使政治平等成为现实的社会变革。^① [……]

法国的好男儿们，每个国家的无产者相互表明自己是自由的，并作为公民真诚地联合起来的时代已经到来。

在任何国家里，工人们都在政治上都遭到排斥并受尽社会苦难；他们的敌人是共同的敌人，他们的利益是共同的利益。

因此，让我们各国无产者忘记以往的那种可耻的流血冲突，而达到相互谅解，为将证明其解放的那个幸福未来而共同工作。

“民族荣誉”并不是对千百万人失去自身权利和遭受社会苦难的补偿；相反，国际间的战争只能日益加剧他们的不幸。如果英国的军队在亚洲取得胜利，或者法国的军队从非洲凯旋，这同工人阶级有什么关系呢？ [……]

国王们已开过多次大会，让今年成为召开一次各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见证。让各民族的团结来隆重庆祝^②这次大会，让过去那

^① 《德意志伦敦报》上为：一场社会改革和一种社会状况。

^② 《德意志伦敦报》上为：宣告。

种可笑的恶感和野蛮的敌视见鬼去吧。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①、斯堪的那维亚人、波兰人、俄国人、意大利人以及其他各国的人们，我们呼吁你们以兄弟情谊相互拥抱，在争取平等、自由和博爱的斗争中肩并肩地奋勇前进。[……]

书记和委员会委员以协会名义并受其委托签名：

乔·朱利安·哈尼 ^②	}	大不列颠
厄内斯特·琼斯		
查理·基恩		
托马斯·克拉克		
让·奥·米歇洛	}	法国
J.贝尔纳		
卡尔·沙佩尔	}	德国
约瑟夫·莫尔		
雅·沙贝利茨	}	瑞士
克萨维尔·克莱尔		
彼得·霍尔姆	}	斯堪的那 维亚
古斯塔夫·隆德贝格		
路德维克·奥博尔斯基	}	波兰
卡尔·波泽	}	俄国
J.涅伊曼		

① 《德意志伦敦报》上为：德国人、瑞士人。

② 这份名单的英文文本引自《北极星报》，德文文本引自《德意志伦敦报》；在《北极星报》上此处为：H.贝尔纳，而在《德意志伦敦报》上此处为：J.贝尔纳。

P. 尼特拉伊 ·

R. 格罗什

} 匈牙利

1848年1月30日于伦敦

1848年2月5日《北极星报》(伦敦)

节录

第537号

200

关于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成立八周年纪念活动的报道

1848年2月7日

伦敦工人教育协会八周年纪念

共产主义运动的未来历史学家需要进一步阐明的是，工人团体已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建立了多大的业绩；他们将有责任证明，这些团体撒下的种子已经生根发芽，将来势必要长出一个新型的更加美好的社会；他们要阐述，这些团体不仅是大门敞开的募兵站，源源不断地从这里给无产阶级大军输送新兵，而且（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还是使无产者得到自我训练的学校。这个学校不管外部状况多么恶劣，都使他们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深刻地理解到自身的需要和利益，从而使他们成了革命者，成了反对现存制度的不公平和荒唐的自觉战士，并为他们增加了战斗勇气和胜利信心，确实使他们明白，这一次他们将要享受自己的斗争果实，他们将不再为别人去火中取栗。可是，完全承认这些工

人团体的功绩和成就虽然是下一代人的事，但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亲自置身于运动和团体的人也能很好地评价这种结社的重要意义。

2月7日晚上，在协会租用的一个普通饭店里，装饰得焕然一新，洋溢着节日气氛，200多人欢聚一堂，参加一次简朴的晚宴；鉴于工业危机已经使许多协会会员感到压力沉重，所以有意把晚宴的价格定得非常低，每人1先令。晚宴时的服务人员，也像布鲁塞尔工人协会举行新年庆祝活动^①时一样，全由协会会员自己担任。在参加晚宴者中间，还有许多民主派兄弟协会会员（如基恩、奥博尔斯基等等）和一些德国人，他们虽然没有完全加入共产党的行列，但对协会始终采取友好的同情态度。另一方面，遗憾的是，这次晚宴尽管价格低廉，但由于工业危机，许多协会会员还是无法参加；晚宴结束后，大厅里才挤得水泄不通，因此，在晚会的娱乐活动中，出席者竟远远超过300人。晚会期间由约·莫尔担任主席。

物质需要满足以后，在晚会上，首先由训练有素的协会合唱队唱了一支应时的歌曲，接着卡尔·沙佩尔发言。

〔……〕“兄弟们，我们的座右铭始终是：各尽所能。本协会的会员们本身都能证明，他们就是这么做的。八年前，我们只有几个人，现在已经有好几百人了，如今是一个协会，下设两个分会（一个在这里，另一个在本市东区），法国、德国、比利时、斯堪的那维亚、波兰，甚至美国，总之，凡是有无产者的地方都知道我们。

①：参看文件190。

“但是，达到这一步，并不是轻而易举的，而是用斗争换来的，不仅是对外斗争，而且是对内斗争。你们中间那些从协会成立以来就加入协会的人都知道，协会存在还不到一年，由于劳动关系和所有制关系，在协会内部就发生了无休止的争吵，使协会濒临解散的边缘。当时，由于一些人付出了巨大努力，进行了艰苦的百折不挠的奋斗才得以保全协会。自那以后，经常有人企图从外部分裂我们，可是我们幸而挫败了这类企图，协会每年在力量上、会员的数量上都有所增长。德国公使馆官员，特别是把我们的存在看做眼中钉的普鲁士公使馆官员，反对我们，往我们中间派遣密探，企图消灭我们。但是，我们揭露和驱逐了密探，使协会更加茁壮健康、更加生机勃勃地向前发展。当他们发现这种隐蔽的狠毒手段无济于事的时候，就试图同我们展开公开的竞争。形象可悲的骑士（本生）创立了一个青年会，即一个基督教日耳曼的羊圈，在这里，工人们可以免遭时代思想的灾祸。但是，这种青年会虽生已死，在活着的时候就已可悲地死亡了，而我们却欣欣向荣，精神抖擞、自由自在地继续生存。（热烈鼓掌）

“但是，我们还不得不经受其他内部的思想斗争；我们进行了许多思想方面的斗争和劳动，最终才认识到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状况。有人曾经企图把陌生的、同无产阶级毫不相干的思想塞进我们的队伍；我们中间混进了一些捣乱分子，混进了一些爱好虚荣的利己主义者，他们把无产阶级的事业置之脑后，而只关心自己眼皮下微不足道的个人利益。但是，我们幸而克服了这一切，我们取得了内部斗争和思想斗争的胜利，如同取得了对外斗争的胜利一样；现在我们懂得了我们将来要做和必须做的事情，

懂得了目前和以后在关键时刻要做和必须做的事情。我们懂得了，无产阶级的事业才是发展中的事业，当前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帮助无产者认识到，我们要废除私有制，就是坚持不懈地同各种把人类分成阶级的行为作斗争，为无产者找到幸福和解放。我们懂得了，现在就是宣传这些总的思想，为建立另外一种以这些思想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作准备的时代；但是，逐一立法的时代，彻底改组社会的时代离我们还非常遥远。我们懂得这一点，因此，我们幸而也顶住了体系创造者对我们的种种诱惑（他们企图把我们置于他们早已准备好了的社会制度的奴役之下）。我们已把这种索然无味的、所有奴役中最有害的奴役拒之于千里之外，因此，我们取得了并非微不足道精神胜利。

当然，在这些斗争中也不是万无一失的，在这种不流血的战场上也有人倒下了；因为有些变节者和胆小鬼半途裹足不前了，再也不敢同我们继续携手并进了。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就失去勇气，因为尽管如此，我们仍然看到我们的队伍在日益壮大；一个战士倒下去，十个新战士就继续站起来。我们之所以没有丧失勇气，是因为我们深知，在我们伦敦的几百人后面，有英国和整个大陆的千百万无产者做我们的后盾；我们之所以继续进行斗争并且取得胜利，是因为我们内心充满本世纪的精神，正是它在不可阻挡地把我们推向前进，它也活在我们千百万无产阶级兄弟的心中，让他们和我们永不停步，直到我们在反对任何形式和任何名目的压迫和暴政的斗争中取得胜利为止。（鼓掌）

“但是，八年来取得成就的，不仅仅是我们，而且还有资产阶级，它在这期间也大大扩展了它的统治，它现在统治着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从塔霍河直到尼门河，从埃特纳火山和维苏威火

由直到瑞典和丹麦，到处几乎只有立宪王国，即资产者的有组织的统治。专制主义在文明的欧洲几乎到处都已破产或者行将破产，因为奥地利君主国境内的各个民族这时更加激烈地在进行反对梅特涅专制主义的强大斗争，这种斗争与其说是一场民族的斗争，倒不如说是一场资产阶级利益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而我们可以深信，资产阶级将像在其他地方一样，也将在这里赢得胜利，因为专制君主们很快就会明白，他们只有向资产阶级让步，只有把自己交给资产阶级的统治去任意摆布，才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柏林的香槟酒弗里茨^①和维也纳的笨伯斐迪南^②（他们现在不得不向俄国的暴君^③乞求金钱）很快就会认识到，立宪王国要合适多了，有利多了；他们将从法国的资产者^④搜刮到的几百万、西班牙立宪制的摄政女王^⑤盗窃来的几百万、英国傀儡女王^⑥轻而易举地每年从工人口袋里窃取的几百万中找到诱人的范例，并将同资产者握手言归于好。所以，让我们作好准备，看看资产阶级的统治很快就会在整个欧洲繁荣昌盛；让我们对我们的老压迫者——诸侯和僧侣同我们的新剥削者——资产阶级即将结成恶党作好准备；让我们为今后的暴君不是以成千上万计，而是以十万计而作好准备。

“现在，我们丝毫也不要被这种前景吓破了胆（鼓掌），甚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② 斐迪南一世。

③ 尼古拉一世。

④ 路易-菲力浦。

⑤ 玛丽亚-克里斯蒂娜。

⑥ 维多利亚。

至也不要因此而妨碍我们在反对共同的敌人——封建的、官僚的和僧侣的专制主义的斗争中同资产阶级站在一边。（请听！请注意听！）需要使整个社会实现这种尖锐的分化，需要使它这样地分成两大阵营；资产阶级即金融巨头的统治是必要的，以便使无产阶级认识到，它必须反对和消灭金钱，反对和消灭私有制。

（鼓掌）我们的行动只是为了我们自身的利益，只要资产阶级为反对王权和僧侣而斗争，我们就支持它，借此促进更快地实现上述那种社会的尖锐分化。此外，我们要扎扎实实地工作，要坦率地告诉资产阶级：‘是的，我们将同你们一起走一段路，但只因为这符合**我们的利益**；是的，我们要帮助你们取得政权，但我们实在不愿让你们长期占统治地位；你们的享受只能是短期的，然后就轮到我们无产者，千百万人，我们将颁布人类的新宪章。这个新宪章的第一句话就是：**消灭阶级差别的限制，废除私有制，我们实现人人一律平等，人人一律有劳动的义务，不劳动者，不得食**’。（热烈鼓掌）

“兄弟们，今天的情况就是如此。因此，我们要为我们势必进行的伟大的最后的斗争作好准备。这将是一次比以往历次斗争都更高尚的斗争，因为以往进行的任何一次政治革命，其目的仅仅是排挤掉旧的统治阶级，取而代之的是新的暴君；但是，我们要进行的革命，将不再有被压迫者和统治者；我们要使人人自由，人人平等，人人按照自己的需要分享大自然赐予的一份丰盛食物，我们不给任何人以特权，不让任何人囤积居奇，也不让任何人忍饥挨饿。（鼓掌）

“但是，我们要达到这个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不能不通过激烈的暴力斗争，不能不通过反对人的斗争，因为有人说，你们

应该反对制度，不应该反对人。而在我们看来，制度是由人来代表的，只有人才同我们作对。我们不应说奉承话，通过和平的方式劝说资产者放弃他们的上帝——钱箱。不，只有当头给资产者最后一棒，只有死神松开了他们紧紧抓住的权柄，他们才会放弃金钱。因此，我们的口号仍然是：**革命，革命！**我们只需再加一句：**振作起来，振作起来，再振作起来！**（暴风雨般的掌声）

“我不否认，以前我也曾经相信和平运动的可能性，甚至本协会也曾公开声明：我们只想通过和平结社、宣传等等手段进行活动。但是，我们摒弃了这个幻想，我们已经完全明白，资产者（我们曾主要希望为了他们的利益对事物进行和平的改造）根本不愿知道这个地球上的财产也有无产者应得的一份。说穿了就是这样：如果你们资产者不愿改变现状，那么我们就要成为革命者，就要利用手中的武器同你们作斗争。你们不要以为我们这才秘密地或公开地购买武器，不，不是的，我们将只听从诗人的忠告^①，在关键时刻，拿起你们堆存在武器库里的、是我们用自己的劳动帮助换来的武器，因此，我们的口号仍然是革命：我们要公开承认革命；我们要让资产者对短期统治的高兴变成扫兴；他们应该听到和知道，‘现代的野蛮人’即将来临。我们要宣扬对我们的敌人的恨，而这将是一种神圣的恨，因为它将点燃我们心中的烈火，激励我们为开创自由平等的王国而斗争，激励我们为人类及其自由的毫无阻碍的发展而斗争并赢得胜利。”（经久不息的、雷鸣般的掌声伴送着演说者回到自己的座位）

路易·海尔贝格继卡·沙佩尔以后发言：“兄弟们，无产者

^① 指斐迪南·弗莱里格特；暗示他的诗作《不管怎么样》。

们！刚才我们听了关于刻骨的恨的有力发言，现在请允许我来唤起这种恨所需要的那种感情，以便达到真正的恨，抒发爱的感情。因为只有爱得实实在在的人，才能有真正刻骨铭心的恨；这一对矛盾就像在其他许多事物中一样，在这里也是相辅相成的，构成一个恰当的整体；只有对朋友和志同道合者有极其强烈的爱的人，才能对敌人有不共戴天的恨。我想谈爱的问题，就是这个意思，但我所说的并不是那种稀里糊涂的、萎靡不振的爱，它只表现在空洞而虚伪的言辞中，各国僧侣几个世纪来一直向我们喋喋不休地鼓吹，而从来不去实行。我说的并不是那种娇滴滴的脆弱的感情，有人正打算让我们沉醉于这种感情，让我们在这种感情的陶醉下不能觉察到有人重新在加紧给我们锻造锁链。不，趁此难得的机会我想要在你们中间，在我的朋友们中间，有力地激发所有的无产者为其共同事业而进行联合和合作的感情；我还要提醒你们，这是联系全世界所有无产者的纽带；对我们来说，今天的晚会应该成为日益巩固这种联系的又一次机会。〔……〕

“我们的外部情况是这样的：我们中间的许多人今天还在这里，但在一周以后也许已在远离这里几百里之外的德国、法国或另一个国家，在那里人们还刚刚可以向暴君争取结社自由，而暴君们知道得很清楚，这种自由是一种置他们于死地的武器。因此，归根到底，我们当中的那些在这里或那里通过自己的观察已经认识到结社具有无比优越性的人们，也有义务在他们的新居留地展开活动，直到取得这种权利。而这种活动是每个人力所能及的。我们无产者不仅能够并且必须在所有这样的国家里加入那个争取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党（尽管这也是这个党的最终目的和它今后对待我们的态度），而且能够并且必须首先经常地向我们

的兄弟、各国的无产者说明结社的本质和作用。我们必须设法在各地创立联合会，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而无论如何，我们不会同警察局的刽子手发生无益而危险的冲突。我们只需要利用现有的聚会良机；我们只需要在工场、宿舍、饭馆、酒店向我们的兄弟阐明我们的需要和利益，阐明我们这些幸运儿已经取得的地位和权利。〔……〕最后，请允许我在这里谈谈我难以忘怀的一种感情，今天的晚会特别强烈地拨动了我的这种感情，也就是回忆起我们的兄弟们在布鲁塞尔的协会。（喝彩和鼓掌）它像这里的协会一样，开始时人数也很少，但在它存在几个月以后所取得的成果足以证明，它的前途是光明的，同这里的协会的过去相比可以说毫不逊色。几天前，我们大家满怀喜悦和同情的心情读到了关于根特（无论在资产者的工业方面，还是在无产阶级的革命方面，根特都是比利时的曼彻斯特）的大规模民主示威游行的报道。这次示威游行就是德意志工人协会所取得的成果之一。因为这次示威游行是由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发起的^①；而这一民主协会本身又是由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创建的。也就是说，德意志工人协会会员在这方面不仅起了间接的作用（因为德国工人也在其比利时的同事中宣传了协会的精神和对协会的优越性的认识），而且非常直接地推动并参与了该协会的创建。但是，民主协会在短期内不但在布鲁塞尔和比利时的其他地区扎下了茁壮的、不再被根除的深根，而且向荷兰伸展了强有力的分支，也在荷兰撒下了民主运动的种子。因此，让我们在今天的晚会上由衷地友好地纪念这个布鲁塞尔的兄弟协会，让我们为它和全世界其他所有无

^① 参看文件201。

产者的团体（不管是秘密的还是公开的）高呼万岁。所有无产者万岁，万岁，万万岁！”〔……〕

亨·鲍威尔〔……〕这位发言人举杯祝酒，为未来的社会革命干杯，并发表了如下祝词：

“有些事物是无法阻挡的；愚蠢地企图加以阻挡的人，就会被运动的巨轮碾得粉碎。未来的社会革命也将是这样的。迄今为止，虽然进行了两次伟大的革命，一次是宗教革命，一次是政治革命，但是没有一次革命是成功的；教皇和教士依然存在，一些被压迫的国家仍在同专制制度作斗争，争取资产阶级的统治。只有资产阶级在到处都取得了胜利，并组织了资产阶级的政府，社会革命才会出现，而这就是我们的希望之星。（热烈鼓掌）

“单纯字眼上的革命曾经是一种可怕的幽灵，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这个字眼在千百万人心中正唤起喜悦和希望，在他们陷入贫困时给他们以力量和勇气；对于千百万一无所有者来说，革命是最后的救命稻草，是导致摆脱不堪忍受的贫困桎梏的最后手段。（热烈鼓掌）

“资产者反对专制制度和僧侣的历次革命，当然对我们是有某些好处的，它们给我们提供了促进我们的利益的某些手段。但是，如果资产者完全取得胜利，他们本身从一个还比较革命的阶级变成一个保守的阶级，那么毫无疑问（现代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他们将像过去和现在的专制制度一样也对我们实行反动。

（请听，请注意听！）

“通过宣传教育抵制上述情况，是我们的当务之急，我们的主要职责。只有所有的无产者理解自己的需要，即使不是所有无产者，起码也是大多数无产者（因为其他部分受本能或客观情况

的驱使同我们分道扬镳了)理解自己的需要,革命本身才可能爆发并带来丰硕的成果。但是,无产阶级的多数只有受到教育和团结一致,胜利才肯定属于我们。到那时,任何人为的力量都无法阻挡,就像以前不能有效地阻挡宗教革命和政治革命一样,因为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鼓掌)然而,社会革命是什么,它的要求是什么?它要开创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人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完全满足自己的需要;那时任何人不损害他人就能享有特权并拥有财产,那时人人都把自己的劳动贡献给共同的事业,因为劳动资料也是大家共有的,因为劳动本身不再像今天这样是换取一点外在报酬的雇佣劳动,而满足内在的活动急需才是劳动的本来目的,劳动的本来报酬。总而言之,社会革命要把所有的人都变成人。”(全场完全赞同)

接着,列斯纳在晚会上朗诵了一首他为晚会所作的诗。

[……]

弗伦克尔,伦敦东区的、不久前重新改组的工人协会会员,把该协会看成是一个大协会的雏形,呼吁大协会的会员经常到东区去,友好地支持这个新建的、当然还很幼小的协会,通过作报告和提供消息的办法促进该协会的发展。他说,我们的人数固然还很少,大概同你们八年前的人数差不多;但是,进步的精神也鼓舞着我们,我们也不断地关心纠正自己的看法,使自己受到教育;我们也完全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精神,资产阶级越是竭力压抑各个无产者,运动就越是昂首阔步地向前发展。通常由于不利的外部条件,由于无产阶级的大多数人都缺乏各种外在的手段,无知和愚昧还是司空见惯的;但是,尽管如此,一些人还是努力走过了我们的压迫者总想永远把我们抑制在其中的无知的长夜;此

外，这些人往往还竭力把知识和教育之光带给其他兄弟们。兄弟们，这种情况不仅在这里以及其他享有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国家里发生，而且更多地是在以读书和歌咏等等团体作掩护的大陆上不自由的国家里发生。在那里，一种使资产者和诸侯们感到惊恐万状的精神在无产者中得到传播，在那里，天边也已雷声隆隆，电光闪闪，预示着社会革命即将来临。但是，为了使这次革命（我们衷心希望它的来临，因为在这次革命中只有我们将使自己发展成为人），我是说，为了使这次革命真正对我们有利，为了使革命的果实不再被人从我们手中夺走，为了我们不再重蹈以往历次斗争的覆辙（那时无产者血流成河，但他们却不知道为什么流血，以致资产者得以迅速地轻易夺走胜利果实），为了防止这一点，首要任务就是通过一切宣传手段，即通过演说和著作来教育无产阶级，准备无产阶级。无产者必须学会认识自己的目标是什么，通向目标的途径又是什么，尤其还必须认识和坚信，他们只有团结一致，克服一切无谓的争吵，抛弃一切个人的虚荣，才能取得胜利；无产者必须学会夺取最艰巨的胜利，即战胜自己心中的有害热情，然后也就能轻而易举地战胜外来敌人。”（热烈鼓掌）

普芬德。发言者就协会八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同这段时间里外部的社会发展之间，并同思想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之间的联系讲了几句开场白以后，便谈到现在协会内盛行的观点和思想。在这个问题上他是这样说的：

“今天晚上，我又一次听到，革命及其必要性的问题是作为一种新事物来谈的，但我认为，我们多少年来就是革命者，凡是在考虑自己状况，设法提高和改善自己状况的人，就是革命者，

因为他的目标始终是要推翻现存制度。有的人就像听话的牲口一样，不管偶然事件使他陷入什么境地，他都心满意足、怡然自得地吃着自己的一片面包，其他什么也不想，只有这种人才不是革命者。（鼓掌）

“在这个意义上，每个有思想的人一般都经历过一次革命，他一般开始进行的革命是反对我们在童年时代接受的思想，即反对阴暗模糊的观念。如果这个人通过一次精神革命摆脱这种令人窒息的思想，以致他能以纯真的眼光观察这个世界的状况，那么，他就会看到，在人类社会里，各派之间是截然对立的。开始时，年轻幼稚的人还难以采取旗帜鲜明的态度，他们以为通过爱的途径是可能达到和平调解的。但是，只要不是出自虚伪自私的意图而闭目塞听的人，不久就一定会明白，这与爱的说教毫不相干，喜欢经常说这个词的人通常在他们的行动上也至少会想到这个词的。然后，人们不久就会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已经有了这种认识，也就是说，与爱毫无关系；这个词竟被如此恣意滥用，以致使它信誉扫地，人们最好把它从语言中，从男人相互关系中清除掉，把它及其牺牲之类的派生概念更多地用到男女之间的关系上，但是，对男人来说，应当相互尊重对方的权利，说得正确些，应当把人人享有的权利和尊重视为社会关系的基础。（热烈鼓掌）

这一点在某些人看来似乎有些生硬和粗暴，但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无产者必须鼓起勇气，生硬粗暴地抵制外界的各个生硬粗暴的派别。革命已发生过多次，而且，只要不是所有人都能充分享受人的权利，即不是所有人的本质都能得到充分发展，革命还要不断发生。（鼓掌）至于这种革命是迅猛的还是缓慢的，流

血的还是不流血的，则取决于无产阶级在卓有成效地开始外部的革命以前，事先必须经历的精神革命。因此，光记住先进战士的义务还不够，还要运用他们的一切力量，经常从精神上提高并造就他们的兄弟们，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革命成为它应该成为的那种革命，即最后的、得到解救的、真正的人的革命。”（热烈鼓掌）

晚会上还有几个人发表了简短的祝酒词。沙佩尔为操德语但非德意志民族的、加入该协会并参加其讨论的全体成员祝酒。

[……]

1848年2月17日和18日

节录

《德意志伦敦报》第150号

第四章

革命时期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及其 在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中的活动

(1848年2月至1849年7月)

205

共产主义者同盟阿姆斯特丹支部 给伦敦中央委员会的信¹²²

1848年3月2日

1848年3月2日于阿姆斯特丹

阿姆斯特丹支部致中央委员会^①

我们的兄弟扎勒已动身到你们那里去了，因此我们不无遗憾的是，还不能说明，我们可以从支部储金中为中央委员会捐献多少钱，然而，当我们说被奴役的无产阶级也要像多尔一样捐献一小份时，你们就会理解的。因此，我们向法国人欢呼，祝愿他们以及现在的临时政府幸运，因此，祝愿该政府继续以温和的慈父般的声音说话，这种先例不久就会为其他国家所理解。（这里有人对我们说，路易-菲力浦无声无息地溜到英国去了。）现在，

^① 字迹不清，也可能是：伦敦中央委员会。

卡贝究竟应当干什么，移居伊加利亚，简直谈何容易，他可以在法国建立他的伊加利亚。

兄弟们，由于多尔兄弟事先没有把12古尔登^①寄给我们，我们只得设法由支部支付，让扎勒兄弟查收这笔预付的钱。这样我们支部就支付了两笔钱。因此，我们请求你们不要忘了我们在上几封信中对你们说的话〔……〕在四至六周内支付尽可能多的钱。到那时，你们就可以把这笔钱用于维持那里的《共产主义杂志》^②，我们保守这个秘密；我们这里的邮资由我们付，同样，你们那里的邮资则由你们付，如果这件事办成了，那么，今后我们还需要订立一个这样的协议。

多尔这个人非常马虎、轻率，他曾经答应在两周内把钱寄来。在我们这里，都还是新盟员，如果有人领导人面前犯了这种过错——极端的拖拉作风，就一定会失去新盟员们的信任；要是换了别人，我们就要对他另眼相待了。每次讨论时，他或者上床睡觉，必须由别的盟员去把他接来，或者干脆不来。这一点，我们对他也太苛求了，超过了你们对我们的信任，因为谁都知道，他是一个极其诚实的盟员！

杂志还没有到。传递人是同盟盟员，你们可以放心，他是一个有道德的人！

Fr. ^③ · 许布勒尔

汉克

① 古尔登，德国古代金、银币的名称。——译者注

② 这里可能不是指1847年9月就已出版的《共产主义杂志》（文件156），而是指《共产党宣言》。

③ 字迹不清，也许是兄弟（Bruder）的缩写。

手稿

第一次发表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 1^o, 20, op. 1, Nr. 117

207

《人民的要求》（科伦共产主义者的传单）¹²³

1848年3月3日

人民的要求

1. 要求人民掌握立法权和管理权，在各村镇和各州实行普选权和普遍被选举权。
2. 要求言论和出版的绝对自由。
3. 要求取消常备军，实行全民武装，由人民选举指挥员。
4. 要求自由结社权。
5. 要求保护劳动并保障所有人的生活。
6. 要求对所有儿童实行完全免费的教育。

传单

柏林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 St. 6/1

关于巴黎的一次德国民主主义民众大会的报道

1848年3月6日

巴黎，3月7日（讯）昨天晚上，巴黎的德国民主主义者在瓦伦廷大厅集会。德国在法国还从未有过如此隆重的集会〔……〕第一次集会就获得成功，这是出乎意料的，因为在如此庄严的时刻，集会搞得不隆重不宏大，倒是一个难题！有4 000多德国人参加了集会。伦敦派来了代表团，即宪章派的代表团，伦敦各团体的德国人的代表团，其中，我要特别提到的是他们的朋友沙佩尔、厄内斯特·琼斯、麦格拉斯、哈尼、莫尔和鲍威尔。从布鲁塞尔来的有维尔特、伯恩施太德、瓦劳以及马克思^①和若干随行的流亡者，他们是比利时王家警察局大约在三年前从巴黎的老丈人路易-菲力浦那里接收过来的，而今又把他們遣送回去，以示抗议；此外，法国人、意大利人、俄国人和匈牙利人都渴望知道，德国人在其成年时期将有什么样的表现。他们一向勇敢，这是大家公认的。会议开始，先是由德国的男声合唱。接着，格奥尔格·海尔维格主席宣布开始讨论。他有力地强调说，今天召集德国民主主义者开会，旨在通过一封只能是民主意义上而不能是别

^① 1848年8月12日《柏林阅览室》第62号报道说：“还有马克思博士，由于比利时政府的一纸驱逐令，他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后，就带着妻小来到这里，主席在委员会出给了他一个荣誉席位。”

的意义上的公开信，所以现在开展的每次讨论，也只能在民主的范围内进行。〔……〕^①

来自伦敦的沙佩尔先生最先对这封宣读的公开信表示赞同，并提请大家注意，比利时人、英国人、美国人和波兰人等等在七月起义以后不久的进军中，有的通过公开信，有的通过代表，早就对法国革命表示同情，而德国人在这次运动中不应该退却。他和他的几个朋友刚从伦敦来到这里，伦敦方面已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为新的共和国尽情欢呼。最近这次革命的思想是各国人民的思想。这次革命由于其社会性质为现在所面临的那些伟大变革开辟了道路。一切意见，一切建议，不管是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或者其他形式的，都不妨试一试。人人都有机会畅所欲言，阐明自己的体系的优点。同时，人们在这一次集会中不要袖手旁观，而应在德国人中间建立一个持久性的组织，让他们在适当的时候拿起武器返回祖国，为祖国的自由而战。^②演说者提醒大家注意，当前从人民出发的革命，只能为人民、为无产阶级来进行；他让大家记住西里西亚和德国其他地方工人的贫困，并认为：这一点充分证明，对德国无产阶级来说，最后也举行大规模起义，已经是刻不容缓了。德国这个名字遭到了蔑视，曾经到处都是德国人，他们压迫邻国人民，比如压迫伦巴第人和波兰人，德国人甚至还企图强占自由的瑞士。许多事情需要德国人来纠

① 接着，海涅维格论证了由他提出的一封《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报道转述了该信的全部内容；它的结束语是：“自由、平等、博爱万岁！民主万岁！欧洲共和国万岁！”

② 沙佩尔在这里所代表的关于向德国武装进军的观点，立即遭到了共产主义者的坚决抵制。

正！这一点应该做到，沙佩尔先生要求大家在这首次集会中**团结一致**，然后立即有力地采取下一步骤。演说者讲话结束时反复高呼：“德意志共和国万岁！”

继他（沙佩尔）之后，**瓦劳**先生发言。他以布鲁塞尔工人协会主席的身分向**这里的**工人讲话。他说，我们的公开信是针对德国的过去发出的一份抗议书；对于德国的过去，我们不愿承担责任，我们要忘了它，而且要通过我们未来的行动使其他国家的人民也忘了它。〔……〕¹²⁴

双方对这封信反复地进行了辩论（尽管毋庸置疑，公开信将为自己争得大多数票）以后，大厅左右两侧分成了两派，开始表决。最后右侧的人纷纷拥向左侧，民主的公开信终于以六分之五的多数获得通过。

当然，由于这种分化，团结势必受到了干扰，必须恢复团结，不能让那个条顿堡森林人^①看到团结完全遭到破坏而幸灾乐祸。琼斯先生——这是一位英国的宪章主义者，他的民族的骄傲，我们全体与会者的喜悦，——这次建立了丰功，他的讲话不时被经久不息的掌声所打断（可惜，由于版面有限，我们不得不在下一号上才刊登他的讲话¹²⁵）。团结恢复了。大家同样欢欣鼓舞地高唱《马赛曲》和节奏明快的德国歌曲《奔向远方！》。一个意大利人通过主席声明，德国的诸侯们企图使人相信，似乎意大利人憎恨德国人——简直是无耻的诽谤！每个人都有权憎恨他的压迫者，同样，意大利也憎恨它的奥地利压迫者，但是，每一个意大利人都是**德国人民**的朋友。

① 埃利布·费奈透。

一个匈牙利人也发表了类似的声明，另外还有许多人纷纷起立，相继发言，内容大同小异，可惜我们不能把所有发言一一引述。伯恩施太因先生在会上的讲话博得了热烈的掌声，他的讲话我们也必须留待下一号刊登。¹²⁶

最后，我们为我们的主席三呼万岁，他以自己的全部勇气和令人信服的才能捍卫民主事业！

大会决定，明天把这封信郑重地递交给临时政府，并决定组织一个民主俱乐部；除了少数人以外，每个人在回家时都对巴黎第一次德国民主主义者集会所取得的结果感到高兴。自由、平等、博爱万岁！欧洲共和国万岁！

1848年3月10日《德意志伦敦报》

节录

第154号

209

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给巴黎中央委员会的信

1848年3月8日

伦敦区部委员会致中央委员会

兄弟们：

今天晚上，我们收到了你们的简短有力的来信。我们全体与会者现答复如下：

你们到巴黎是必要的，而且肯定会有很大好处。

来自德国的消息固然非常有利，但各家报纸上的说法却大相

径庭。

星期天〔1848年3月5日〕我们举行了全体会议。半热情的同盟盟员，如哈克马斯特尔等等没有出席会议。其他人都表现出良好精神，全体与会者或多或少都参加了讨论并表示愿意紧密团结。大家对一切事情都很注意。后来讨论十分活跃。海尔贝格坚持并首先重复他以前说过的话，接着就被大约八个发言者驳得体无完肤，淋漓尽致，因而不复锋芒毕露，并友好地表示悔改。

昨天，在讨论“共产主义者在当前运动中应采取什么态度”这一问题时，海尔贝格认为，固然可以手握毛瑟枪或与共产主义者身分不相称的军刀，但笔杆子这一锐利的武器，同样能干出惊天动地的事业来。这个热心人引起了哄堂大笑，他到时候会得到同情的。海尔贝格认为，即使在德国举行起义了，绝大部分协会会员都离开伦敦，但仍然要把这个协会维持下去。不幸的是（？），许多非同盟盟员，甚至一些同盟盟员几乎都持这种观点。或者密切关注事态发展，或者彻底推翻章程等等。同盟即使可以完成时代提出的要求，但大家的耐心已丧失殆尽了。

现把我们收到的信一并寄去。50法郎请明天给我们寄来，因为这里很需要这笔钱。收据以后另开。

英国的运动：

在这里，宪章派已寂静无声了，而在格拉斯哥，宪章派则一直坚持到现在。

特拉法加广场的集会被警方禁止，中等阶级的律师柯克伦没有参加集会，但是流氓无产阶级在会上聚众闹事，殴打警察（而是警察自己先打人的），砸烂窗户和路灯，冲击韦斯明斯特的几家面包店，昨天又搞这种恶作剧，而且今天仍在继续。

宪章派的两次大规模露天集会，参加的人很多，而且也很顺利。

敬礼和握手，就此搁笔。

受委员会委托

卡尔·莫尔^①

卡尔·普芬德

弗伦克尔

T.佩茨

迪策

布格哈德

列曼

罗森塔尔

1848年3月8日于伦敦

又及：

奥地利公使让人通过一书商从布格哈德那里取（买）走一本宣言。

附言：

你们再写信时，最好直接写给区部委员会，因为这样有利于增进信任和加强团结。

米歇洛通过他夫人给我们协会写来一封信，并寄来两本书（他的小说）作为会费，同时还附带谈到，要向各俱乐部写一封信。米歇洛的这封信看来是很早以前写的，是寄给你们的。两本书我们已收下。至于通告信以及其他关于你们的消息，我们就不

^① 卡尔·莫尔同时又是这封信的执笔者。

谈了。

我们也把阿姆斯特丹的来信^①寄给你们，因此，你们应该把决议发给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执行这些决议了。

照旧。

(签名) 同上^②

手稿

第一次全文发表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F.20,Nr.118

213

《人民的要求》（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的传单）¹²⁷

1848年3月10日左右

人 民 的 要 求

国家为人民而存在，而不是人民为国家而存在。政府及各级机构都是人民的公仆；它们必须视为人民谋福利为己任。如果它们做不到这一点，人民就有绝对权力予以废除，而用更好的政府及各级机构取而代之。

德国人民长期以来总是满足于徒劳地为他们有权要求的东西去请愿，可是，现在他们也已失去耐心。德国人民在法国的光荣革命鼓舞下，终于也敢于强有力地反对一贯以自由来欺骗他们的

① 文件205，并参看文件215。

② 这些签名非常潦草，难以辨认。

诸侯们了。而加冕的诸侯们，比如在科伦，企图用刺刀去征服人民的意志，使其保持沉默，但愿诸侯们的这种企图不能到处得逞。人民的儿子怎能摧残自己的亲骨肉呢？

人民的好男儿们，不要被诸侯们吓唬住，他们只能逞凶一时！你们一开始就为全国人民谋求幸福，确有困难；你们应该首先在精神上、物质上支持科伦市民打算向普鲁士的“尚存一息的”王权提出的各项要求。

他们要求：

1. “人民掌握立法权和管理权”，因为自由的、不愿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继续忍受剥削的人民，同样需要只考虑人民利益的法律，需要以人民的幸福为自己最高目标的政府官员。他们要求，“在各村镇和各州实行普选权和普遍被选举权”，因为只有人民中的每一个成年的成员能参加选举和被选举，才有真正的人民代议制可言。

他们要求：

2. “言论和出版的绝对自由”，这是普遍的人民代议制的最可靠的支柱，是普遍的人民教育的必不可少的手段。

他们要求：

3. “取消常备军，实行全民武装，由人民选举指挥员”，因为全民武装完全足以保卫国防，而常备军只是暴政和镇压的工具，维持常备军就等于加在全体公民身上一付沉重的负担。

他们要求：

1. “自由结社权”，因为只有在不自由的国家，其公民的结社才有危险。

他们要求：

5. “保护劳动并保障所有人的生活”，因为许多人极度贫困，难以聊生，而另一些人却穷奢极欲，挥霍无度，这正是天大的不公平。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实行的不合理分工和对劳动的剥削，大大阻碍了商品的生产，以致不能满足每个人的需要。因此，国家应当剥夺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进行的生产，而为了所有人的利益去管理生产。每个人都享有劳动的权利，同样也有权得到一份与他的需要相适应的报酬。

他们要求：

6. “对所有儿童实行完全免费的教育”，也就是说，使每一个儿童都能受到完全的培养，而不是使他们因此而屈服于某种新的强迫，使他们服从某种总的框框或者残忍地使他们背井离乡，流离失所。人人有权要求一种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的教育，这无疑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必须承认的首要权利。

传单

科布伦茨国家档案馆，

Abt. 403, Nr. 2550

215

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给巴黎中央委员会的信^①

1848年3月15日

1848年3月15日于伦敦

^① 当时卡尔·许芬德是书记员，这封信也可能是他执笔的。

伦敦区部委员会致中央委员会

兄弟们：

我们已于昨天早晨收到了你们的来信。你们在来信中附给沙贝利茨的信已于昨天下午交给他了，并嘱咐他立即给你们回信。

沙贝利茨到公爵（应叫他彼得）¹²⁸那里去过了，并给我们捎信说，彼得卧病在床，不能接待来访者，叫我们把信或者通过邮局寄给他，或者通过沙贝利茨转给他。针对这一点，我们对沙贝利茨说，**我们的意见是把信直接交给彼得**。接着，再一次要求沙贝利茨向彼得介绍情况，并在今天晚上以前让彼得直接答复我们；由于彼得不能亲自见我们，所以我们想先听听你们的意见，你们是否愿意让沙贝利茨转交这封信。

我觉得这件事有些蹊跷，我几乎认为，彼得小脑瓜里有一个大计划，我甚至觉得，彼得现在想要独自达到当时你们说通过我们可以达到的那个目的。我得出这个结论，其理由如下：昨天我把信交给沙贝利茨时，他对我说，彼得真是个奇怪的家伙；他认为，邀请几千名法国人到德国去，帮助在那里建立共和国，是完全必要的。彼得很可能认为，他一个人就能建成一个德意志共和国，甚至能成为一个拿破仑。彼得的答复附在后面。我们认为必须将上述情况通知你们，因为这家伙很可能已在脑瓜里构思出一个愚蠢而狂妄的空中楼阁。

2.至于宣言和盟章，明天就寄出，**最迟**（？）后天就寄出。

用邮包寄出可能比较贵，可是通过邮局邮寄是最安全可靠的。我们就特地把这封信通过邮局寄出，我们相信，这样办要好一

此。

又及：邮费大概比较贵，可能需要每个委员会分摊。^①

3. 你们关于阿姆斯特丹的建议^②，我们将照办，因此，明天我们就给那边写信，稍后即把宣言寄出。

你们在巴黎作出的努力似乎没有白费，因为像我们看到的那样，我们的事业在那里重新走上了正轨。在巴黎的德国人最清楚不过地向我们证明，管理不善可能而且必定会带来多大危害，挽回糟糕的局面需要花费多大力气。

兄弟们，请相信，这里的人们很镇定，正以无所畏惧的情绪等待今后事态的发展。大多数人都宁愿在今天，而不愿在明天开始行动，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处处谨慎从事，不愿由于操之过急而毁了事业。

现在，无产阶级有要求，而且有一种强烈的要求，幸好，教育已经证明，这种要求需要由理性和思考来引导。

关于英国的动乱，各党派至今没有从政治上作出重要的论证。宪章派走的是一条可靠的道路，他们的集会井然有序，因而群众蜂拥前往参加，而且有条不紊，正因为如此，比那些轻易就能被镇压下去的起义更使英国政府感到难堪。但是，如果人民的愿望到4月3日或10日得不到满足，那我几乎认为，英国政府将无法对抗数量如此庞大的人民群众。¹²⁹

这里的脓肿也破裂了。

另外：沙贝利茨刚才来信说，他已说服彼得接待一个人。说

^① 这句话是后加的。

^② 参看文件209。

他一定要通过第三者将信交给他。

现在，他愿意接待一个人，但绝对不接待两个人，而且在明天夜里10时左右。

沙贝利茨指名要普芬德去。我们就此事进行讨论，卡·莫尔表示要么去两个人，要么一个也不去，而普芬德和其他几个人则认为有必要去两个人（因为，如果遭到反对，就要由一个人承担全部责任），最后，我们为了**我们的事业**同意让普芬德明天夜里单独前往。去一个人总比不去强。^①

这件事的结果我们将立即写信告知¹³⁰，今天就写到这里，随信附去一封给**鲍威尔**的信。

顺便再提一下：本来你们一下就能从彼得那里收到一笔相当可观的款子。可他不会再上当了，因为这个家伙已从惊恐中苏醒过来。不过我们还要看看结果如何。

那天，我们住的德罗利巷的饭店老板来寻找他的执照，大家不让他找，几个邻室的客人抱怨外国人大声喧闹等等。这可能是一种借口；他不过想来看看我们所在饭店的大厅里有没有发生什么事。他们想利用这个借口，以便名正言顺地派一名警察或侦探到正在开会的会场去，亲自看看大家的举动究竟如何镇定自若，如何井然有序。但是，这种人来到会场，无论如何是出自政治原因，因为英国政府已开始盯上这些人了。（要监视外国人同英国人在一起聚会）。因时间关系，我们就此搁笔。

此致敬礼

你们的兄弟

^① 这句话是后加的。

卡·普芬德
布赫
弗伦克尔
卡尔·莫尔
布格哈德
T·佩茨
迪策
罗森塔尔

又及：我们收到款子后，用什么方式，通过哪家邮局等等寄给你们？

手稿

第一次全文发表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F.20，Nr.119

219

罗兰特·丹尼尔斯（科伦）给卡尔·马克思（巴黎）的信

1848年3月19日左右

亲爱的马克思：

昨天，我收到你的信^①以后，从信中看到在巴黎有这样的谣言，说什么富尔德要破产。因此，我觉得向他购买期票没有把

^① 马克思的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

握，而最有把握的是把你的期票兑换成钱，这样一来，你当然会受到损失。

半年来我一直没有得到你的直接消息，这次总算让我知道了一些。

你不想申请公民权并参加国民议会的选举吗？

我听舍勒尔小姐说，你计划创办一家报纸¹³¹，你想在巴黎还是在德国创办？

费奈迭总想在《科伦日报》上把你描绘成伯恩施太德的副官，并带着惋惜的口吻说你受了蒙蔽。你应该给这个阴险的家伙一记耳光。

你一定很想知道柏林事件的详情，我们在这里也一样，因为我们至今没有得到十分确切的消息。政府首相发出的据以恢复安定^①的电报遭到了几篇通讯的驳斥。杜蒙^②什么也没有发表。他愿意发表的一些东西才能通过书报检查。只有银行家和商人才保持私人通信，康普豪森前天在市议会上宣称，不能公开他的通信，因为它会在人民中引起很大震动。我所知道的关于博尔夏特大夫的那封私人信件，谈到了军队竟干出意想不到的暴行。他们驱散了在克罗尔饭店举行的旨在递交请愿书的民众大会，把通过下菩提树街的勃兰登堡门的民众赶往皇宫广场。大街小巷都挤满了人，而当人群被赶到皇宫广场时，就遇到了骑兵队并被冲散。据说国王在他的阳台上发布了驱散集会的命令。据另一则谣言说，当时集结了两个团的兵力。在人群中施放霰弹一事，已被来此旅

① 指1848年3月13日以来在柏林出现的骚乱。

② 《科伦日报》的出版者。

行的人所证实。在他们起程时，隆隆炮声已经响了半个小时之久。据谣传，死了好几千人；而《普鲁士总汇报》只提到“一些人受了伤”。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18日^①下午5点钟，还听到大街上有枪声，杜蒙的通讯员就是这么说的，但他没有多说，或者像另一个编辑昨天对我说的那样，他由于职务关系，不能有什么说什么。总之，这里的一切都处于混乱和紧张状态。全城居民都想干点事，但是，究竟怎么干又没有把握。掌握来自柏林的消息的人们不敢拿出来发表。资产者已经决定向国王递交一份请愿书，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提出的要求得到批准，就会恢复信用，如果他们是可信赖的，他们心爱的肮脏交易和琐碎事务就能重新走上正轨，那他们甚至明天就会宣布成立共和国。但是，在革命时期，财产可能遭受损失，因此，昨天这里召集了一次会议，讨论了建立武装市民自卫军的问题。他们派出一个代表团去会见政府首相，首相问他们想武装谁，武装所有的人还是仅仅武装有产者？代表团回答说武装所有的人，因为首相对他们说过，如果仅仅武装有产者，看起来好像资产者要把自己武装起来反对无产者。这个问题当然只能得到否定的回答。这里的居民的当前状况是这样：只要市议会宣布共和国成立，他们就将同意一切。而同意是不会带来危险的。另一方面，如果货币危机继续下去，工人们就不再工作，而饥饿将导致革命。在市议会开会时，就几次有数百名工人成群结队地聚集在市政厅门前要求工作。许多人都得到了工作。但是，如果这里的工厂再不能开工，市议会也就无法让所有人都有工作。明天，我们的市议会的代表团就要回

^① 在原件上是：17日。

来了。它带着否定的答复回来，很容易促使一些资产者盲目地愤怒地煽动自己的亲骨肉，即煽动他们的钱袋。“如果只有老爷们想要武装”，那么，劳工们立即严阵以待。昨天晚上，军队在这里占领了布瓦塞雷锯木厂，因为正像布瓦塞雷的一个伙计向我保证的那样，全体工人已经“一致”决定焚毁该锯木厂。自从得到柏林的最初消息起，这里的一切都陷入了莫名的期待和紧张状态。其他城市的人都指责科伦人无所作为，胆小怯懦，但真正的原因是科伦的资产阶级大多数非常明智，他们明白，在革命中他们所憎恨的其他一些人可能会起作用，因此，对科伦人来说无非就是冷静等待，让其他城市去为自己火中取栗。再见。

你的^①

代我衷心问候你的夫人。斋戒日以后我就将举行婚礼，你夫人认识我的未婚妻。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缠身，我将作巴黎之行。我希望到时候在巴黎见到你，但我希望事先能收到你的回信。

你的^②

手稿

第一次发表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F.1, op.5, Nr.165

① 后面是一个模糊不清的签名。

② 下面是一个难以辨认的签名。

220

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给巴黎中央委员会的信

1848年3月22日

1848年3月22日于伦敦

伦敦区部委员会致中央委员会

我们已于昨天收到了你们本月19日的来信^①。中午我们告诉了沙贝利茨，他已把信转交给彼得^②，并且晚上就得到了答复。彼得的答复是：他不再愿意捐款，让别人去捐；如果临时政府不允许征兵，他愿意等待，等到有更好的机会再说，云云。

真正的理由是：起初彼得是被你们镇住了，他就像一头被吓坏了的公牛，所以你们要求什么他就给什么，而现在，他完全想成为德意志共和国的独一无二的上帝；不给不恭顺地承认他这种身分的人做任何事情。现在他顽固得像一头挨了打的公牛，一步也不肯往前走，根本不愿会见任何人；而我认为，他是怕我们的。昨天夜里，我们跟沙贝利茨谈的时候，他建议我们再给彼得写封信。今天早晨我们已把信发走了，我们想看看，今天晚上之前能得到什么结果。

这件事只能等等再说。

下面谈谈最近的情况，虽然是支部的情况，但很重要，因为

① 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

② 卡尔第二，前不伦瑞克公爵，参看文件215。

将来一定会显出它的重要性来。

星期一〔3月20日〕晚上民主派兄弟协会举行会议，发出了告法国人民和临时政府书。哈尼和厄·琼斯的讲话很精彩，他们要在4月10日之前把宪章派完全组织起来，等等。^①——一切都是合法、正当的，而且有警察的特别保护，警察私下也参加了。
〔……〕

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得到彼得的答复，可能也不会得到理想的答复。在这件事上，我们认为，要想让彼得再捐一点出来，只有让我们的兄弟沙佩尔和莫尔^②（他们刚好路过这里）先去同他谈。^③我们认为并且相信，你们如果也碰到这种情况，为了我们事业的利益，你们也会采取这种有利于我们的事业和荣誉的措施的。

我们一得到彼得的答复，就马上转寄给你们。

就此搁笔，等待你们的其他消息。

敬礼并握手

卡尔·莫尔：请立即亲自答复，
这是事业的需要。

阿·列曼
罗森塔尔
迪策
布格哈德
弗伦克尔

① 参看文件234。

② 约瑟夫·莫尔。

③ 关于这件事的结果，参看文件225。

普芬德

T. 佩茨

星期六 [3 月 18 日] 《宣言》销售了 1000 册。

手稿

节录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 F.20, Nr.121

221

共产主义者同盟布鲁塞尔总区部给巴黎中央委员会的信

1848年3月22日

1848年3月22日于布鲁塞尔

马克思先生收

十万火急

布鲁塞尔总区部致同盟中央委员会

在昨天同盟会议上, 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后, 通过了一个决议: 目前德国境内所发生的事件, 已部分地具备了共和政体的性质, 或者, 在不久的将来可能有这种转折。因而, 形势要求旅居这里的德国共产主义者**积极参加**。由于对德国事态的关注, 请求中央委员会即刻告知布鲁塞尔, 在这方面, 巴黎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你们认为必须向我们发出什么指示。我恳求你们**刻不容缓地**回答。25日, 星期六, 我们将重新集会。请告诉我们有关德国民主匪帮的全部真情。这伙人急于投入战斗, 把我们这里的人也搞

得晕头转向。请施加你们的个人影响，拯救这里的临时领导吧。特德斯科也出席了。

菲力浦^①

手稿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F.20，Nr.16

222

格奥尔格·维尔特（科伦）给卡尔·马克思（巴黎）的信

1848年3月25日^②

1848年3月25日于科伦

亲爱的马克思：

我来到科伦已有好几天了，这里的一切全都武装起来了，人们不相信柏林的诺言，他们只有争得普选权、绝对的出版自由和结社权才感到满足。旧的邦议会在人民心目中已成了一具僵尸，而现在还能见到的不完全民主的所有前议员都被撵下了台；今天有五名议员前往柏林，去向国王汇报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情况。而人们只同意通过普选产生的新的邦议会。至于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人们也将采取措施，派几个人到那里去，严密监督其议员。

① 菲力浦·日果。

② 这封信包括一小段3月26日或27日来自布鲁塞尔的附言。

尽管这里所实行的一切相当民主，但是，只要一提起共和国这个词，人们就感到毛骨悚然。而这里是不会欢迎巴黎的德国人进驻的。

与此相反，据说科布伦茨和上莱茵河一带则比较赞成共和国。

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字眼，共产主义者如果公开抛头露面，有人可能会用石块把他们砸死。丹尼尔斯、毕尔格尔斯和德斯特尔正在商量创办一家新报纸。^①他们认为可以筹得基金，但我觉得还值得怀疑。

你别呆在巴黎了，如果你到这里来，肯定会有好处，如此等等。因为目前在这里无论如何有许多事情可做。警察当局是无能为力的，到现在为止，大赦似乎已为期不远。

致以衷心的问候

你的维·

特德斯科又到布鲁塞尔去了。迈因茨和我们都在科伦。科伦人可能要派毕尔格尔斯去美因河畔法兰克福。^② [……]

手稿

节录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F.1，op.5，Nr.167

① 参看注131。

② 参加1848年3月31日至4月3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的所谓预备议会的科伦议员，除了亨利希·毕尔格尔斯外，还有卡尔·德斯特尔。

223

安得列阿斯·哥特沙克（科伦）给莫泽斯·赫斯（布鲁塞尔）的信

1848年3月26日

亲爱的朋友：

我奉劝你根本不要参加海尔维格的进军行动，因为我认为你受不了这种进军的紧张强度；我尤其奉劝你不要采取这种行动，因为“共和国”这个字眼还没有完全流行，无产阶级至少在这里还没有强大到足以能独立登台表演的地步。我们暂时能够而且必须对已经取得的東西，即以宪章运动（主要在英国）为基础的王国感到满足，努力争取出席不久即将举行的立法议会，在议会里，忍受着社会危机痛苦的知识分子是唯一占压倒优势的力量，同刀剑的锋芒相比，他们将更能实现我们的原则。我将尽力以这种方式作出我的一点牺牲，以致我能以候选人的身分出现；即使我不能获胜，但施奈德尔律师和毕尔格尔斯可能会成功。德斯特尔因以狡猾著称而腐朽堕落下去了；所有党派都反对他。如果马克思愿意回到特利尔，恩格斯愿意回到巴门，设法在那里以候选人的身分出现，那当然是好事情。

看来，像德国目前形成的这种君主立宪制，将导致德国各民族联合成一个整体，而不会导致目前正在进行的建立共和国的尝试。你不知道，我们的资产者对共和国这个词是多么害怕，在他

们眼里，共和国一词与强盗、谋杀、俄国人的入侵是同义词；而你们的军团将被斥之为是一群杀人放火的匪徒，以致只有很少的无产者能充实你们的队伍。〔……〕

维利希和安内克听从了我的劝告，留在这里了。如果军队已经宣告成立，那么，就应当给它配备以前那些被驱逐的反对派，以便使它与君主专制制度永远冰炭不相容，进而使资产阶级有一定的安全感。我坚信，这样，人们将向我们的朋友们敞开大门，而他们就得以回到那块因好感等等仍然属于他们的、可以进行广泛活动的国土上去，因为他们是在为未来进行准备工作。那两个人并不属于我们^①；诺特荣克也不是我们的人，他是在我被赞德库尔监禁期间得到任命的。要是我在场，是决不会同意的，因为我了解他，此人好争吵，而且自私，等等。我曾经想在这里把他搞得声名狼藉。如果他要回来，我将感到遗憾。让他到巴黎去吧，不要让他到科伦来，这样做可能是上策；我认为他什么坏事^②都会干得出来，而从来不干好事。从现在起，我让我们的俱乐部以工人辩论协会的名义公开活动^③，也就是说，表面上在别人领导下，而不是在我领导下公开活动，因为“我们党”^④这个词已成了名副其实的稻草人。我在这里的工人中有很大影响，而资产阶级自从在市政厅见到我和这些工人群众在一起以后，就吓得失魂落魄。〔……〕

① 在修改前为：“不属于同盟”。哥特沙克后来在他的原稿上作了一些更正，或把语气改得缓和点。

② 在修改前为：“背叛行为”。

③ 参看注136。

④ 在修改前为：“共产主义”。

诺特柴克可能已向你阐述了那次晚会^①的情况，所以我在此就不赘述了。

手稿

节录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F.173，op.1，Nr.III/2634

225

卡尔·沙佩尔（伦敦）给巴黎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信

1848年3月28日

烦特使转交中央委员会

兄弟们：

没有什么可谈的！没有什么可谈的！

同那个顽固的老混蛋^②简直没有什么可谈的！他谁也不见，而且已经带着他的金钱和贵重物品逃之夭夭了。^③

我在星期日夜里11点半来到伦敦，因为中午12点我才有机会离开布伦，而在福克斯顿我又因为带的行李出奇地被扣留了很长时间，结果火车早已不见踪影了，我只好等到6点半钟。

我一到就立刻派人去找卡尔·莫尔。他在参加协会的会议，

① 参看注123。

② 卡尔第二，当时的不伦瑞克公爵。

③ 参看文件215和220。

过了一个钟头才来找我，并且情绪非常激动，因为在协会的会议上一致决定把认捐的款项收集起来，连同武装和装备运往巴黎，从那里同我们一起再运往德国。

遗憾的是，我不得不给他的热情泼冷水，的确，一开始他很不高兴，但最后还是同意了我的意见。随后我邀请了沙贝利茨、普芬德、列曼和其他一些人。这些人昨天早晨在我这里集会，因为在我从前的住所里还空着一个大房间，我们就租用了一个星期，供常务委员会开会用。沙贝利茨已经知道我们的事，所以昨天已**隆重地**把他吸收入盟，以便使他同我们的关系更加巩固。随后他受委托去找这个坏蛋，并争取让他会见我。沙贝利茨听了一番认真的叮咛嘱咐之后走了，过了好久，到6点才终于回来，带回来的是令人失望的消息：“**已经完全没有办法了。**”

彼得这个无耻的坏蛋说，如果他出钱，大家就得听他的，然后由他当头头。还说，我们只是想他的钱，否则把他看得分文不值。他想干什么，他会去找英国人和法国人想办法的；说这两个国家的人还是服从指挥的，他还允许他们自行去纵火抢劫；他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恢复无政府状态，而我们共产主义者什么用处也没有，等等。

你们看，同这个卑鄙的家伙是无法再打交道了；为了搞到钱，我可以不惜代价，或者听从这个可怜的家伙，或者我请求给他一点厉害看看。——会见沙佩尔，他说，我可以无条件会见他，看他能把我生烤不成，说到底，在我的家里他能拿我怎么样。——问他要那些信件时，他说，那是我不能出让的财产。接着，沙贝利茨按我们的约定吓唬他。这个骗子回答说：“我得提防一点，暂时不回德国去。在那里，那帮人不会为我做什么的。

此外，我知道，那帮人同英国的宪章派有联系，他们可能会仿效英国事件的样子来对付我。为此我已操了不少心。我的金银首饰和其他值钱的东西现在还安然无损。因此他们至多毁了我的宫殿，不会得到更多的东西，起码他们抓不到我本人。”

现在你们看到，我们碰到的是个骗子和狡猾的狐狸，这只狐狸蛰居在它的洞穴里，并且还侮辱我们。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只有好好地记住这一切，一有机会就给这个下流胚一点厉害。

这里再留不住人了，因此，为了使住在这里一无工作二无生计的德国人能够回国，我已同意募捐——但只是在德国人中间。

今天7点钟开委员会会议，明天开全体会议，后天在第恩街开群众大会。我将想尽办法来推动我们的事业，同时不使我们丢脸。读书会已定于星期四召开德国人大会，要搞个告德国人书。丑角海尔贝格已经写好了这份东西，并在这出蹩脚的滑稽剧中扮演主要角色。

我从我们这些人的妻子们那里要来几英镑，给了路特希尔德，以便鲍威尔和莫尔能够缴付房租，他们俩哪怕有一个能够来伦敦也好，他们出席这里的大会是极为必要的。我今天只能顺便和哈尼谈谈，晚上他再来；可是，看样子希望很小。

我怎样才能离开，真见鬼，至今还不知道，但不管如何，我反正要走，哪怕不得已卖掉自己的床。请立即给我回信，那样我还可收到。

敬礼并握手。

你们的兄弟

卡尔·沙佩尔

普芬德的情况并不像我们所担心的那样糟。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F.20，Nr.122

226

弗里德里希·安内克（科伦）给弗里茨·哈马赫尔（埃森）的信

1848年3月28日

1848年3月28日于科伦

亲爱的胆小的弗里德：

[……] 关于对我们的预审，我要对你说的话并不多。我只被提审过一次，据我所知，别人也没有常被提审。当局审问了一大批证人，非要我们承认这些证人的证词。证人说了些什么，我不知道。可能他们说得不会太多。参议院考虑到时间关系，认为结束案件，释放我们是上策。^① 整个关押事件是一项纯政治性的措施。弗里德，现在亟须到处都保持生气；全国都拥护制宪议会，即由普选产生的制宪议会。如果我们争得了普选权和必要的生存条件，即通信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和人民武装，那我们就达到了必需的一切。但愿这一切都是同科伦决议相吻合的！可惜，看来柏林已经完全丧失理智，或者说根本没有理智。如果不找别的途径来确立民主的国家基础，那我们的志愿

^① 参看注123。

军就要赴柏林。

确定整个德国的形式，来日方长。人民联邦议会不要召开得太早，最好晚一些召开，以便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能更早更多地埋葬君主们和稻草人。

在这里创办一家民主报纸的条件还不成熟。^①不过，只要推倒旧的^②出版法，条件就会变好的。但愿在一周内就能废除旧的出版法。[……]

今天晚上，维利希应邀前往海德堡组织市民炮兵。[……]

手稿

波茨坦德国中央档案馆，哈马赫尔遗著

节录

第一次发表

227

关于柏林工人俱乐部成立的报道¹³²

1848年3月30日

工人俱乐部在艺术家咖啡馆成立

昨天晚上，这里举行了一次约有150名工人参加的大会，其目的是成立工人俱乐部。

吕霍夫^③先生当选为临时主席，他宣布大会开始；当时他分析说，谁真正干了革命，这是无关紧要的，关键在于用联合起来的力量去维护已经取得的成果，而维护这些成果也许比取得这些成果更困难。因此，他不想强调与会者即工人同其他所有等级和

① 参看注131。

② 原件上为：新的。

③ 原件上为：李霍夫。

政党之间的矛盾；他说，关键在于组成对付反动派的统一战线。此外，人们现在不迈出第一步，今后就绝不能迈出第二步。所以他提议，现在暂不谈工人即一个特殊等级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而是根据民主原则先把俱乐部建立起来。

黑策尔先生作了内容相同的发言，他指出，目前应当很好地依靠现有的各个政治俱乐部，尤其要依靠俄国人旅馆里的那个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同其他俱乐部相比，在处理问题时具备更敏锐的洞察力和更深奥的专门知识。但是遗憾的是，经验告诉我们，知识要得到充分发挥，毕竟需要思路敏捷的群众；他们愿意为自由的事业再次献出鲜血和生命，但是，首先希望每一个战士也要完全懂得为什么而战。因此，首先必须努力对工人阶级进行深刻的政治教育。不过他现在认为，不能通过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来达到上述目的；他主张实行他们早已作过若干次试验的链式体系。

在他讲话后，关于原则问题的讨论就宣布结束，继而开始一般的形式问题的讨论。**弥勒**、**米夏埃利斯**、**约翰**、**施拉姆**和**恩格尔哈特**先生全都表示赞成链式体系；而**韦夏尔特**、**格尔克**先生和报告人则主张举行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此后，**黑策尔**先生再次发言，他说有些人不懂政治；由于缺乏政治教育和政治主张，我们的群众大会暂时还没有意义。他暗示了星期日〔1848年3月26日〕在丽人门前举行的群众大会，并提醒大家注意，**沃宁格尔**博士先生也曾证明，对于没有受过政治教育的群众来说，最大的危险莫过于巧妙的提问，因此，我们只有在范围较小的俱乐部内习惯于议会形式、习惯于逻辑地分析问题，才能预防这种危险。此外，关于实际效果（有时是必要的）问题，他也肯定链式体系的优点；他认为，只要好好组织，这种链式体系就能轻而易举地在

24小时内达成共同决议，并根据决议采取协调行动。这就是链式体系必定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根据主席的提议，会议决定，全体与会者组成一个临时中央俱乐部；要求一些成员组成基层俱乐部，允许他们派出自己的代言人或主席作为代表，出席将来中央定期召开的代表会议。

下次集会暂定于星期日〔1848年4月1日〕晚上举行，人数不限。

值得注意的是，整个晚上的讨论自始至终没有偏离讨论的主要问题。当有人引导某个发言者谈到工资问题时，黑策尔和普尔茨勒尔先生就立即声明，有关提高一定工资的要求在当前是一种不公正的要求，这无非是叫工人的师傅，最后叫工人本身遭到毁灭。

H.马隆

1848年3月31日《柏林阅览室》第77号

228

共产主义者同盟某个盟员（巴登）给巴黎中央委员会的信¹³³

1848年3月底

致同盟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兄弟们：

我们收到你们的信以后不久，这里就开始了大逮捕，我和布

拉^①以及我们的许多人都没有幸免（不过那封信并未落入狗崽子们手里，还可以迅速抢救出来）。我们在拘留所里呆了三个星期，借助于伊茨施太因和黑克尔的力量才得以获释，当然，如果全体工人群众不站在这两个人一边，他们的努力也是枉然的。他们威胁说，要是我们在24小时内不能得到自由，他们就要捣毁拘留所。因此，我们得到了自由；一直守卫到现在的那帮看守人员可能也不相信军队，所以他们要把我们作为国事犯释放。

我还有许多话要说，可没有时间了。但我请求你们回到德国来。

我们向你们大家，你们的家属致敬。

德意志共和国万岁。

手稿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F, 20, Nr. 123

231

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从巴黎返回德国的报道¹³⁴

1848年3月31日

[……]今天信奉共产主义的德国人^②也离开了巴黎。但是，他们不像德国民主派那样队伍严整，而是每个人都独当一

① 字迹辨认不清，可能是布劳。

② 该通讯员以前曾批判地报道过巴黎的海尔维格军团。

面，零星前往各个不同地方去的。临行前他们以宣言的形式发表了下列声明^①：〔……〕

1848年4月6日

摘要

《柏林阅览室》第82号特别附刊

234

弗里德里希·列斯纳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参加伦敦宪章派的示威游行的回忆

（摘自《一八四八年前后》1898年版）

1848年4月10日

〔……〕4月初，在伦敦召开了宪章派公会，它的任务是比较以前更强硬地向议会提出请愿，要求实现工人多年来提出的政治自由。请愿书应于4月10日交到，并且不是像从前那样经过一些全权代表转交，而是由工人群众亲自递交。这样做是要使议会懂得无产阶级准备在必要时用武力满足自己的要求。

4月10日早晨，伦敦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情景。所有工厂、商店都关了门。伦敦的资产者们拿起武器来维护“秩序”。这些武士中也包括小拿破仑即后来的威廉堡^②公民。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决定参加示威游行。我们用各种武器

① 下面是《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文件224）。

② 威廉堡是加塞尔附近的一个城堡，路易·波拿巴（法国皇帝拿破仑第三）在色当战役（1870年）失败后被普鲁士人俘获后囚禁在这里。

装备起来。我们清楚地记得格奥尔格·埃卡留斯的那一副滑稽相，他拿着一把闪闪发光的、锋利的裁缝大剪刀给我们看，说他打算在警察进攻时用这把剪刀自卫。

工人们已经在肯宁顿广场集合起来准备向议会前进。可是，我们突然听说组织这次示威游行的菲格斯·奥康瑙尔不主张结队游行，因为政府准备用武力对付我们。不少人听从了他的劝说，但是其余的人仍勇往直前，结果宪章主义者同警察之间发生了流血冲突。既然游行群众的团结已因奥康瑙尔的失策而动摇，自然也就不可能获得成功。这一点我们当即就明白了。我们万分失望地离开了这个广场，而一小时以前我们来的时候还是满怀希望的。〔……〕

弗里德里希·列斯纳《一八四八年前后》，载

摘要

于1898年《德意志言论》第3期第110—

111页

235

亨利希·楚劳夫（爱北斐特）给莫泽斯·赫斯（科伦）的信

1848年4月10日

1848年4月10日于爱北斐特

亲爱的赫斯：

在我动手办报以前，请你回答我，听说毕尔格尔斯早已着手准备创办《莱茵报》并且不久就将出版¹³⁵，是否真的？如果是

真的，我想，这对你们的计划简直太糟糕了，因为你的支持人安内克，不管他如何真诚，但他在文学方面还没有多大名气，因此，特别新近在那里发生的事件^①以后，他不可能被提名，即不可能宣布他担任编辑。请你别责怪我，这很有些浓厚的利己主义味道。我觉得，关键是要弄清楚什么是可靠的，你们无疑是可靠的作者。据我所知，马克思将在美因兹出版一份报纸。对这种四分五裂现象深感惋惜！各派之间最好能加强团结。

请速来信，但愿你能在我所希望的方面给我一种有益的启迪；如果能给我启迪，那我将尽力而为。

你的

亨·楚劳夫

埃德蒙·齐伯纳编《莫泽斯·赫斯通信集》1969年海牙版第184页

236

约翰·席克耳（美因兹）给卡尔·马克思（科伦）的信

1848年4月14日

1848年4月14日于美因兹

亲爱的马克思：

我在曼海姆我弟弟那里逗留了几天，今天刚从那电回来，到家后发现了一封你夫人的来信，为此，我急忙寄给你。从这里我

^① 即1848年3月3日的示威游行，参看注123。

没有什么译讯告诉你。美因兹人就像所有这些德国南部的黑红黄三色蠢驴一模一样，全是可鄙的、怯懦的，却是爱吹牛皮放大炮的蠢猪！在这群流氓中间，我感到深恶痛绝，必须经常同他们作斗争。在这里，一个人如果以共产主义者的身分出现，肯定就会被人用石头砸死，尽管这群蠢驴对什么叫共产主义一窍不通。但我由于不善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信仰，或者说不善于说服这些家伙收回他们的那一套胡说，所以我并不怎么喜欢这个地方。工人—资产者联合会有300名成员，瓦劳任主席，而我总觉得这一切都非常滑稽，就像一所小学，工人在那里学习读、写和算，而卡利施每周上一堂课，也使这群蠢驴学习说话！这简直是发疯！同盟组织进展缓慢，因为必须谨慎从事；施土姆普夫在非常积极地活动，我也是，可该死的美因兹笨蛋呢？如果我还在这里呆下去，又要开始变成傻瓜了。我什么也不想，只一心想回到你们身边，紧跟你，就像从前信徒们紧跟他们的基督那样！噢，赶快使我摆脱这帮可怜的自由派资产者和共和派蠢生吧，否则我就要被这帮人感染了。

代我向兄弟恩格斯和德朗克等人转致衷心的问候，祝好，别忘了永远忠实于你的

约·席克耳

写于奥古斯丁纳巷

下周我将给恩格斯寄去他的最后一笔存款；给我写信！

手稿

第一次全文发表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F.1，op.5，Nr.171

237

科伦工人联合会¹³⁶ 给美因兹工人教育协会的信

1848年4月14日

致美因兹工人协会

兄弟们：

通过3月18和19日的光荣街垒战，柏林人民证明了：他们在政治上业已成熟，对普鲁士以及对整个德国来说，他们已进入这样一个时代，大家把几十万人在莱比锡和滑铁卢战场上用紧张努力和鲜血保证的允诺，不仅已写在纸上，而且已付诸实现了。他们的自由的力量经受了34年的压制，如今像汹涌澎湃的江河冲垮了堤岸；人民从压在自己身上的重压下站起来了，在争取自由庇护所的流血斗争中显示了崇高精神和英勇气概，这一点明显地证明，对人民判断错误是何等卑劣，到现在为止，对他们隐瞒了多少东西。在街垒上撰写历史的并不是自豪的贵族、高傲的官僚和见钱眼开的资产者，而是人民中间的这样一些人，即工人，是这些长期遭受蹂躏的人，他们用鲜血浇灌了幼小的自由之树；给德国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使美丽的朝霞放出耀眼光芒，随之而来的将是自由而无限的精神运动的艳阳天。因此，鉴于时代精神的要求，我们仿效姐妹城市美因兹，也组成了一个工人联合会，它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始终从政治事件入手来解决社会问题。我们要为工人的权利和利益提供保障，以便使每个工人都能生活自

由，身体健康，安居乐业；以便我们成为在数量上、质量上都能显示实力的人。在追求这个目标的过程中我们向你们伸出友谊的手；团结就是力量，而我们必须有力量，以便我们能够捍卫德国革命所取得的成果和所争得的权利，反对任何专制主义的死灰复燃。我们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通过人民，我们的口号是：**自由、博爱、劳动！**

科伦工人联合会

1848年4月23日《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刊》

第1号

238

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致莫泽斯·赫斯（科伦）的信

1848年4月16日

4月16日，星期日

亲爱的赫斯：

我立即给你复信。我首先要对你说的是，你必须向我保证，不再给本来已经四分五裂的党制造新的分裂，我才能苟同你的建议。也就是说，你不得再妨碍马克思的事业。^①如果马克思的事业不再受到妨碍，我才能勉强同意定期为你的亚琛的报纸提供

① 指创办《新莱茵报》。艾韦贝克后来是《新莱茵报》常驻巴黎的通讯员之一。

② 赫斯试图暂时在爱北斐特或亚琛实现他本想在科伦办报的计划，参看注131。

通讯；但要避免使用《莱茵报》这个名称，这一名称只会引起人们的误解。天哪，还愁没有名称！〔……〕

科伦的沃尔弗^①还在这里，我估计他要为马克思的报纸写通讯；也就是说肯定不会为你的报纸写通讯。祝你安好；我应该什么都对你说，而我宁可什么也不说；我相信，你将从我的通讯中得到一些我对世界上孕育着的事物进行探讨的东西，而这是不便在书信中探讨的。再见。

埃德蒙·济伯纳编《莫泽斯·赫斯通信集》1959年海牙版第186—187页

节录

239

路易·海尔贝格（伦敦）给莫泽斯·赫斯（科伦）的信

1848年4月17日

1848年4月17日

于伦敦德罗利巷153号

请您注意保存这封信，鉴于我对共产党（党内也许即将发生一些变化）的态度，所以该信对我十分重要。

亲爱的赫斯：

14日晚上，我的挚友弗莱里格拉特把您本月9日和11日的珍贵来信都已及时交给我了。您信中提出的建议至关重要，使我感

^① 斐迪南·沃尔弗。

到由衷的高兴，而我有必要对此进行一番深思，因此，我一直拖到今天才给您回信。由于同样的原因，我的回答也不能是无条件地同意或不同意，而我要接受您交给我的、既光荣又重要的职位，就必须考虑到某些条件或起码的前提。下面我想向您简单扼要地陈述一下这些条件或前提。

我肯定没有弄错，如果我假定您并非想恢复出版1843年在阿尔宁^①的暴力措施下停刊的《莱茵报》；我过分相信您对时代关系和世界形势有正确的认识，以致我不能不这样想，您像我一样都认为，1843年和目前之间不仅仅相隔五年时间，而且在这其间发生了一场世界革命，今天的情况与1843年的情况已迥然不同了。您本人在您发表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的那篇杰作《无产阶级革命》^②中极其明确地指出，现在，在世界历史上已出现了一种崭新的原理，以致我用不着再详细地向您阐述我与您的那篇文章中完全一致的观点了。任何东西都不能使我认为，您不想在您新创办的报纸上继续发挥和捍卫在那篇文章中已经包含的思想和观点，直到得出它们的最后结论，即**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什么东西也不能使我认为，您现在与在布鲁塞尔时有何不同，而我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尽管如此，您在《科伦日报》上发表的呼吁书^③中说：您想在新创办的报纸上“**[彻底]**^④讨论社会问题……绝对不根据某些理论、思想、原则和体系的观点，而只根据对现有实际情况的**实事求是的看**

① 冯·阿尔宁—博伊岑堡当时为普鲁士内务大臣。

② 海尔贝格指的是赫斯的连载文章《无产阶级革命的后果》，见文件168。

③ 参看注131。

④ 海尔贝格删去了这个词。

法”；即使您觉得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不把共产党的旗帜当作贵报的旗帜，但我仍然不会因此就认为您背离了共产主义原则。我只发现一种办法，也许可以暂时避免一次确实很严重也很危险的某些问题的争论，不过这些问题的最后解决要等到非常遥远的将来。我本人虽然认为，共产党作为与纯政治的共和派对立的一个党，必须完全公开自己的旗帜和名称；虚伪的名称，比如社会民主党就更没有什么价值了，因为它在党派斗争的第一个风暴中就将撕去这块面纱，可是这个党到那时仍将以共产党的面目存在，除了枉费心机地掩饰以外，还将不光彩地隐瞒其真正的旗帜。但是，最后问题还是涉及**事业**，而且名称成了次要的东西，所以，我在此表示愿意担任贵报编辑，只要您和弗·安内克向我**书面声明，贵报的任务将是捍卫和发展所附传单中提出的17条要求**^①（由于时间的推移和条件的变化，要求已有了少许改动，但并不涉及原则问题），同时让报纸的读者随时随地加以监督，这些要求是否用**共产主义**这个名称来表示。

这17条要求，就像您会轻易确信的那样，具有非常**真正革命**的、民主共产主义的性质，为新闻活动和人民演说家活动提供可用于今后10—15年的非常丰富的资料；17条要求是某种独立政策的相当完善的纲领，所谓独立的政策就是这样一种政策，它是强有力的、高瞻远瞩的和十分全面的，足以将德国引入一种强大而繁荣昌盛的状态，并能为我们的下一代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开辟道路。这些要求同时又是**我唯一能为之效力的纲领**，由于您希望我的合作不仅仅从英国报纸上作摘录，而且还要参与总的编

① 文件224。

辑，即还要编辑有关德国问题的文章，所以，我不能不把接受这个纲领作为必不可少的条件。我请求您和弗·安内克两人签字，因为，一家报纸的编辑部即使不能成为日常斗争的战场，大方向一致也是必要的，因此，一旦您和弗·安内克愿意立即给我书面说明：这17条要求（其中多数目前正在法国付诸实施，而且英国的运动派中的最有才干的思想家也都赞同它们）也是你们的纲领，并答应我在这种意义上撰写文章的完全自由，那么，您可以认为我已加入您的编辑部，您也就有权以我的名义同书商取得联系；并且立即可以从我这里得到一份我资助试刊号的捐款。要是不答应，那就算了。〔……〕至于你们同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反目，这纯属私人问题，而不是什么原则问题，我本人同他们两个人也不是十分融洽，但在原则问题上几乎完全一致；除了一些纯粹形式方面的次要问题以外，我完全赞同他们的意见。〔……〕

致以亲切问候

海尔贝格

手稿

节录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F.173，op. 1，Nr. 2643

240

威廉·沃尔弗（布雷斯劳）代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给卡尔·瓦劳等人（美因兹）的信¹³⁷

1848年4月18日

致瓦劳等人

马克思、恩格斯、德朗克等现在在哪里？

不管他们现在哪里，请把他们的地址寄给我。

4月18日于布雷斯劳

我从本月13日来到这里。正如你们知道的那样，我从美因兹到了科布伦茨。在那里过了一夜。我觉得，施土姆普弗转交给雕塑家的通告信没有多大意义。因此，我整个晚上在几个小酒馆里同小资产者和工人就当前大家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交谈。首先我使他们相信，组织工人联合会和在一般的民众大会上进行讨论是必要的。

第二天早晨我前往科伦。晚上6点到了那里之后，我就去找哥特沙克，在他那里碰到了克吕格尔。克吕格尔在为继续旅行筹款。我还拜访了安内克，并参加了一次讨论“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两海之间”^①的民众大会。然后，我就只好回去睡觉了，等天亮继续赶路。科伦的情况大致如下：

从哥特沙克的话中我了解到，同盟已陷入绝境，一切联系都已中断。哥特沙克已答应把这项工作积极地抓起来。我把美因兹工人协会的告德国人民书^②交给了他，而他要促成科伦工人联合

^① 见·恩·其姆尼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联盟之歌》中的第一句。

^② 文第233。

会与它合并。在轮船上我同许多人进行了交谈和讨论，发掉了许多份告德国人民书。同时我结识了一位非常精明的工人，他叫勒韦尼希，他想去科伦找工作，我就把哥特沙克的地址给了他。

赫斯、安内克、哥特沙克等人刊登了办报启事^①，正在忙于招股！！赫斯又耍了一个花招。顺便说一下，法兰克福的费舍（同我们一起在布鲁塞尔呆过）正在巴门。我留下了一份美因兹工人协会的告德国人民书，让哥特沙克寄给他。

我从科伦到了汉诺威，在那里住了一夜，并把上述告德国人民书交给了当地工人联合会的一个会员。在这个工人联合会中，资产阶级占大多数，而无产阶级只占极少数。他们已答应提出加入美因兹工人协会的建议并给那里写信告知此事。我在火车上一路进行宣传，简直没有闭过嘴。

柏林。我在柏林呆了3天左右，时间太紧，很多事都没有来得及做。我先去看波尔恩，他一开始就想成为柏林临时政府的阿尔伯·公民、马斯酒店（塞巴斯蒂安街）的工人联合会^②主席。我见到的第二个人是黑策尔。他向我承认，柏林的同盟组织只是个空架子。由于长期与外界隔绝，致使同盟组织内部相当涣散。他们自从收到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告同盟书^③以来，没有收到伦敦方面的任何东西。他说，这里勉强还有20来名盟员，这些人虽

① 参看注131。

② 此处把波尔恩比作巴黎的工人领袖、法国二月革命后的临时政府成员马丁·阿尔伯（亚历山大·阿尔伯）。

③ 参看文件227。

④ 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告同盟书见文件148；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告同盟书没有保存下来；至于伦敦中央委员会1848年初的通告信，只有格贝尔特在1848年12月1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提到过。

然互相保持联系，但实际上没有任何组织形式。我想把这些人召集在一起，详细研究一下存在的问题。但是，我由于出席一系列的民众集会和会见工人代表团等等，这件事未能办成。不过，黑策尔肯定地答应我立即向美因兹方面写信，恢复联系，使工作逐步走上正轨。他是一家工人报^①的编辑。现在各种报纸，周报和日报纷纷出版，犹如雨后春笋，而你读这些报纸时就可以看出，它们的编辑和撰稿人脑子里简直一塌糊涂。

黑策尔的地址是：宫廷后齐格尔街25号，鞋匠黑策尔；

波尔恩的地址是：下菩提树北街28号。

13日白天我到了布雷斯劳。我在柏林时弄到了一位同盟盟员的地址，所以我一到那里就找到了他。组织虽然不存在了，但工人中不乏有识之士，必须同他们一起工作并且吸收他们参加我们的事业。为此需要花很多时间，可我们现在很忙，诸如选举之类的事占用了我们所有的时间，且不说为了把这里的情况搞清，为了到时候不致像俗语所说的“抓瞎”，我不得不经常会见人。14日，这里成立了工人联合会。我自然立即声明加入。今天又开会，我要发表演说，要谈许多问题，其中包括美因兹的告德国人民书。

随后，我又加入了大约两周前成立的民主俱乐部。俱乐部的大多数人具有共产主义倾向，或者确切些说，具有社会主义倾向。这一点，只要看看他们的许多小册子就可知道；至于少数人，一部分是以前的立宪派，他们现在有了更多的民主色彩，一部分是以前的共和派。杂乱无章、乱七八糟的事情很多。此外，这

^① 《德国工人报》（柏林），参看文件254。

里还有一个立宪派俱乐部，由格雷夫斯领导；这个俱乐部现在有1400名会员，而民主俱乐部只有180名会员。所以它的活动很多，而且在全省都建立了分部。选举的时候，它可望为它的候选人争得大部分资产者的选票。民主俱乐部正在做它力所能及的事，它在省里也已建立了几个分部。我们俱乐部的告城乡全体选民书已印了30000份，它应当而且一定会产生特别的影响。我们现在在上西里西亚地区印了15 000份，准备在奥得河右岸地区的人民中间散发。

如果我现在不是忙得四脚朝天（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必须有分身法才能同时在几个地方活动），那么，我就要把这里的种种情况，各党派的态度等等详细描述一番。然而，我必须草草结束，以便争分夺秒地到几个选区去组织工人预备会，同他们讨论选民的选举事宜。因此我只能简略地说几句话：这里跟柏林一样，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常常是疯狂的敌视和怨恨。我无须强调，资产阶级是局势的主宰，但它还不很强大，只要出现什么预料不到的情况，它就可能失去自己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它的对手缺乏组织性就会帮它的忙。可以说，民主党派只是二月革命以后才产生的；人们在此之前满足于立宪。现在缺乏的只是，几个民主派抓住有利时机，到处采取应急措施，因此我们现在已有了共和国。我非常清楚地知道，柏林和布雷斯劳的情况也是这样。可惜上述有关地区的民主派玷污了这个名称，这个人民早已熟悉的、很可能成为领导者的名称。

但是，现在资产阶级已经取得了大部分胜利，而另一方面，在西里西亚这里（当然，其他省份也是这样），土地贵族和官僚反动派及其同伙在战战兢兢地活动。在农村，农民受了邦议会和

地主老爷的挑拨，在反对城市居民，反对城里的共和派。总之，为了选举，一切手段都用上了。如果我们采用直接选举制，那么，我能在一天之内，甚至在一次选民大会上就戳穿所有这些阴谋。因为要使农民相信他们的利益所在并不难。可是现在，我们在西里西亚的选举中必须战胜一大批反动派和腐朽的立宪派。目前，只有上述那个告人民书使我寄予希望，其他几场选举能得到另外一种结果，现在已不再由县长老爷们秘密商定了。

前天，这里发生了小小的骚乱，因为几百名无产者给资产阶级的若干头人，即**济比希**和**米尔德**这两位每况愈下的联合议会的议员，还有**格赖夫**（市参议会议长，一位大腹便便的守财奴和顽固不化的资产者）和市议会议员、面包师傅**路德维希**、**瓦赫勒尔**（君主反动派）以及其他几个臭味相投的人演奏了几支十分刺耳的乐曲。现在这里已有9 000多人武装起来了，他们是清一色的资产者。无产阶级派只拥有一支用长矛、火枪或步枪武装的200人左右的“志愿军”。他们的领导人**海尔维格**、**伯恩施太德**等人由于自己的志愿军计划不周，给了各地的、包括西里西亚的反动的立宪派不少好处。

致以衷心的问候

你们的 海德

手稿

第一次全文发表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F.20，Nr.125

241

弗·阿·贝尔格曼（累根斯堡）给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信

1848年4月21日^①

1848年4月于累根斯堡

致中央委员会^②

亲爱的兄弟们：

我终于又能给你们写信了；除了洛克尔的格贝尔特给我提供了一些有关你们的消息外，长期来对你们简直一无所知。几天前，他给我寄来了地址，我就按照地址给你们寄去这封信。我本想立即写信的，但由于那篇文章迟迟不发表，所以我怀疑我是否还能等到一个回音。现在我又在开始写另一篇文章，大约要花两周时间，因此，如果不一拖再拖，及时作出答复，那我就能等到回音。我以拉绍德封区部的名义收到了格贝尔特和谢林格尔的两封信（3月19日和31日）；我从信中看出，现在已经是指出这一点的时候了：我们不仅要用漂亮的言论来维护我们的原则，而且我们也能够拿起武器采取行动了。¹³⁸我也收到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③的一个副本，按照这些要求我可以进行出色的宣传了，不

① 邮戳日期。

② 信封上写着：“美因兹伦滕巷（圣灵）听宰师傅诺伊贝克先生寓所，实习教员F. 菲力浦·诺伊贝克先生收”。该信于4月23日到达科伦中央委员会；参看文件243。

③ 文件224。

过，在结尾部分，有些话似乎显得太生硬，恕我用这个词来表达。

我呆在这里，真感到不是滋味，尤其在应该而且必须尽可能集中我们的力量，以便卓有成效地为我们的事业而斗争的时候；另一方面，即使有时候一个人呆在这种地方（在这里，我们的原则在所谓下层民众眼里还是新鲜事物，加之还有人故意从上往下地歪曲这些原则），确实也不无好处。因此，我从大家的利益出发，愿意听候你们的调遣，你们想叫我干什么，我一定尽力而为。我在这里简直闭目塞听，什么消息也得不到，因为我只能看到两份糟糕透顶的报纸，一份是资产阶级保守派的喉舌；另一份是官僚贵族的传声筒，它们极其放肆极其无耻地怀疑所有人和取得的每个进步。比如其中的一份报纸说，共和派在巴登高地已日暮途穷，黑克尔带着80多个无赖已无影无踪，大家都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司徒卢威也带了大约300人从多瑙埃申根逃之夭夭，而且四处散开了。但是，这一切也表明，所谓的“上层等级”感到惶惶不可终日，甚至把法兰西共和国描绘得那么令人可恨和那么卑鄙无耻，似乎非“上层等级”的人不行。想象不到的形形色色谣言不胫而走，到处流传，目的就是要欺骗人民：法国人是人民的“宿敌”，掠夺欲望是克服不了的，除非法国换一个国王。比如三个星期以前竟有人散布说，40 000—60 000法国强盗入侵了巴登和维尔腾堡地区，他们所到之处都实行抢光、杀光和烧光；昨天和前天（目前议会正在开始选举，可能也正因为如此）出现了一种流言蜚语：法兰西共和国已经垮台，他们已换了一个国王。但是，这样做的目的根本没有达到，因为谁也不相信这种流言蜚语。如果叫我分析它（资产阶级）最后求助于这种谣言的原因，我会得到热烈的赞同，因为这些人是非常明于事理

的，但是，你们不妨好好想一想，一票不过是沧海一粟；因此，我非常希望你们能给我寄一些供宣传用的著作来，这可能会取得较大的成功。此外，我们虽然只有三个人，但是，把我们组成一个支部，也是办得到的。因此，如果你们想让我继续留在这里，就把章程^①等等寄给我。

还有，请来信谈谈志愿军团的情况，因为要让人们知道应当进行什么样的宣传，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如果不是我们占据优势，或者说变革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愿进行，那么，更好的办法就是设法像以前那样科学地启发人民，鼓励他们共同进行斗争。到那时，我们又可高唱那首古老的歌，又可把人民当作达到目的的手段。此外，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们能争取到很大一部分人民；就像我从慕尼黑获悉的，共和派仍然是当今占统治地位的派别。今天我就写这么多，因为我与其说向你们汇报，倒不如说希望能得到更多的消息。

问候并握手

弗·阿·贝尔格曼

（格尔巴赫^②）

我的地址是：累根斯堡施莱纳尔旅馆交弗·阿·贝尔格曼。

又及：请立即回信。

请来信告诉我，赫斯和斯蒂凡^③现在在哪里。

手稿

第一次全文发表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

中央党务档案馆，F.20,Nr.126

① 文件183。

② 格尔巴赫可能是贝尔格曼在同盟中的化名。

③ 斯蒂凡·波尔恩。

242

共产主义者同盟美因兹支部给科伦中央委员会的信^①

1848年4月23日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美因兹支部致中央委员会

我们今天才同你们建立联系，你们可能会认为已晚了一点。我们耽误了这件事，一方面是由于我们自己的过错，但另一方面则由于这动荡不安岁月的外部情况。此外，我们更感到有责任鼓足干劲和奋斗不息。我们先寄上最近几天的会议记录。

1848年4月20日会议。

出席巴黎工人联合会的来宾有：莫里茨·萨克斯和约瑟夫·许茨。

从伦敦来的卡尔·沙佩尔宣布会议^②开始，并以科伦中央委员会全权特使的身分接收施特赖特曼为同盟盟员。老盟员莱茵费尔斯重新加入同盟，他答应在下次会议上还将介绍3名前盟员。支部宣告成立，施米策当选为支部主席，朗格当选为助理。会议还规定，每人每月的会费至少12个十字币^③，并拟定了下列几封信：

① 此信不曾通过邮局邮寄。信封上写着：“科伦大布登希1号路易莎·莫尔小姐收”。

② 参看文件248。

③ 十字币系1800—1900年德、奥、匈的辅币。——译者注。

致中央委员会的信，寄往巴黎方面和伦敦方面的信。

会议根据沙佩尔和莱茵费尔斯的建议，决定暂时还保留同盟内的化名。支部成员是：

施米策、奈波穆克、朗格、莱茵费尔斯、施特赖特曼、森泽尔。^①

下次会议定于4月23日，星期日下午1时半举行。

这次会议（4月23日）刚刚举行，会上还接收了3名成员，还有若干名成员可望下次接收。此外，我们还谈到了一个准备下星期三交给工人联合会讨论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有产者反对共和国，而中间等级和无产者却拥护共和国？我们一致同意对这个问题作出答复。

这里的工人协会约有400名成员，而且委员人数仍在不断增加。在理事会中，有3名盟员代表我们，多数人将永远站在我们一边，因此，协会完全可以说是在我们的领导之下。通讯掌握在我们手里，因为同盟的助理和工人协会的书记员是同一个人。^②我们安排了写、算、绘画、统计和练习上台讲话等课程，旨在吸引广大群众，同时通过教育使广大群众了解并熟悉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因为大家都很喜爱我们。每星期三举行会议，就日常问题提出报告并进行讨论。我说这些，是为了使你们中间某一个准备启程来此的人能

① 1848年4月底，美因兹支部的成员有：哥特弗里德和保尔·施士姆普夫、阿道夫·克路斯、热尔曼·海特涅、菲力浦·诺伊贝克和约翰·雷克耳。他们各人使用什么化名，都不清楚，总之，施米策是保尔·施士姆普夫，朗格是阿道夫·克路斯。

② 阿道夫·克路斯。

安排在这一天来到。

至于我们就我们以德国工人联合会临时中央委员会的身分所作的介绍，我们可以向你们宣布，到目前为止，我们收到的报到信相对地说还是很少的。我们得到了布莱斯高的弗赖堡附近的托德瑙、普福尔茨海姆、海德堡、曼海姆、达姆施塔特、奥芬巴赫、哈瑙、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奥登海姆（莱茵巴伐利亚）、布鲁赫萨尔（巴登）等地成立工人联合会的消息。不久以前，一个手工业者从波恩给我们来信征求意见，后来我们也向他提了意见，但至今还没有收到其他消息。据德朗克说，在科布伦茨也创建了一个工人联合会，而我们没有得到该联合会的其他消息。收到的报告表明，很有必要多搞一些宣传品，甚至向德国南部派遣特使，也是必要的。同样，凡是通过书信能做到的事，我们都倾注了不少心血，使各联合会把握了应有的方针；而个人露面以及与一些头面人物接触，也是大有益处的。除了沃尔弗外，我们还派了另外一名特使（门克尔）前往德国北部。他是同老约翰一块儿去的，可后者并没有留住他，他很快就走了，所以，走前未来的及入盟；他一回来，无论如何要加入同盟；他虽然只是为建立联合会出力，但他的旅行暂时对我们还是很有好处的。

请尽快通知我们，我们对召开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应采取什么态度。如果我们在此立即采取行动，使议会里的先生们头脑发热，那么，这是个机会；但是，如果参加示威的联合会太少，那么，到头来示威游行将是弊多利少。有鉴于此，还不如等到维尔腾堡、巴伐利亚、萨克森、汉诺威、普鲁士等地的一些联合会来报到以后再举行示威游行，这些联合会以后至少在你们那个地区又能开展活动；只要还有几个邦不参加，这个空白未免就太大

了。所以，如果你们还主张推迟大会的召开，那么，我们今后仍将消息的来源告诉你们，以便听取你们对大会的地方选举的意见。我们已经答应业已建立的各个联合会尽快举行大会，因此，甚至已有人向我们提出询问。奥芬巴赫、哈瑙和法兰克福也许想立即召集10 000名工人并擅自派一名代表去法兰克福。这些联合会反对开除工人，要求让工人继续留在五十人委员会^①，并随信附来一份备忘录；但委员会认为此事无关紧要，就把此事转交给各邦政府去处理。

这里的体操协会目前大约有750名会员；在该协会中还是资产阶级在掌权，不过，不久将有不少无产阶级的代表在其中活动。现在，体操协会对工人联合会的态度大致就像激进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态度一样。但是，这些人只要接受一些比较高尚的东西，就会完全变样。

致兄弟般的问候并握手

以支部的名义

理事会理事：施米策

助理：朗格

1848年4月23日于美因兹

又及：刚才我们从布雷斯劳收到了附上的一封来信^②，我们在此通知你们。请你们给我们寄几份宣言^③和章程^④以及其他东西来，因为我们这里只有几份宣言和几份章程了。

① 该委员会是由法兰克福预备议会于1848年选出的。

② 文件240。

③ 文件202。

④ 文件183。

维斯巴登的印刷工人们已派瓦劳作为代表前往海德堡参加代表大会去了；他们想建立一个大约类似英国印刷工人的团体。¹³⁹瓦劳大约两周来就已在维斯巴登开展工作。并已当选为那里的一个印刷(凸版印刷术)工人联合会的主席；可我们希望他仍然回到美因兹来；目前他在这里找不到工作。如果他在美因兹名气再大一些，几天前他也许就被选入市民委员会了，他得了很多选票。沙佩尔仍在维斯巴登，我相信他在那里干了一些事情。

同上。

地址：美因兹奥古斯丁纳街约翰·席克耳先生收。

别忘了解决约翰的问题。我们不愿将助理的地址当作通讯员的地址来使用，因为此人把还不明真相的警察的耳目当作工人联合会的书记引到了身边。

手稿

第一次全文发表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F.20,Nr.127

243

阿道夫·克路斯（美因兹）给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报告

1848年4月23日左右

附信^①

刚才我们收到一封附在累根斯堡的来信中的附信^②，我从信封上未能看出这是给你们的信。我们之所以擅自拆阅，因为信封上这样书写的信通常是有关工人联合会事务的信件。

还有一些工人联合会的地址如下，其中有关的人也许是同盟盟员：

曼海姆的鞋匠雅科布·罗特魏勒尔；

海德堡的高中教师莱布蔡泽尔；

普福尔茨海姆的首饰匠 E. 弥勒；

奥芬巴赫的鲁道夫·安施帕赫；还有 C. 弗·施托伊瓦尔德；

住在布鲁赫萨尔的织袜工彼得·梯也里家的工人约翰·谢费尔；

达姆施塔特的木匠帮工 W. 非·克兰茨；

① 标识“附信”的这种信是拍没有写明通讯地址的仓促写成的信，该信可能是附在美因兹支部4月23日给中央委员会的信（文件242）中的。

② 文件241。

波恩的制刷匠弗·卡姆·jr^①

奥登海姆（莱茵普法尔茨）老皇宫的亚当·朔伊埃尔；

日内瓦炉篋街39号，住在拉姆泽尔小姐家的卡尔·迈耶尔；

住在布莱斯高的弗赖堡附近托德璜造纸厂，J.M.托马家的
埃德蒙·贝尔。

朗格

手稿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F.20,Nr.22

244

美因兹工人教育协会以德意志工人联合会临时中央委员会名义给科伦工人联合会的信

1848年4月23日

致科伦工人联合会

兄弟们：

一贯不相往来、互不联系的几百万德国工人，现在已能一呼百应。“在维也纳、柏林、布雷斯劳和德国其他许多城市，工人们为美好的未来播种而倾注了鲜血。”但是与此同时，已有一大部分工人坚信，必须毫不迟疑地设法保障工人们取得的成果，确保被非人道榨取的血汗不为那些人贩子增加财富和榨取工人血汗服

^① 在原件上无法辨认。

务，而是为工人争得独立地位撒下种子，向工人指明其在人类社会中应有的地位。这种思想，早在这里的联合会诞生不久，我们决定对联合德国工人采取果断行动时就已经有了；我们高兴地看到，力气非但没有白费，而且在一些真正的民众心目中引起了反响。我们已经从许多城市，如布莱斯高的弗赖堡、普福尔茨海姆、布鲁赫萨尔、海德堡、曼海姆、达姆施塔特、奥芬巴赫、哈瑙、法兰克福、日内瓦等地收到了来信；我们希望，也能从边远地区得到消息。总而言之，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德国工人已经开始在世界历史上发挥作用。我们一天天看到，工人的阶级教育，无产阶级的阶级教育到处都非常明显地取得飞速进步。工人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这给了我们以安慰和信心。我们还没有挣脱专制政体和世袭贵族的魔爪，又落到了金融贵族的手心。

我们应当尽我们的力量，为一些人的这种朦胧预感投以闪烁的光辉。我们要唤醒工人，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贫困状况和争取到美好生活的使命，以便实现对人的状况的渴望，即实现摆脱我们所处奴隶地位的渴望。如果实现这一点，我们的敌人就不敢再像最近几天所干的那样，把我们几百万人排除在德国议会的代议制以外；我们将派我们的人参加议会，并随时准备强调他们的主张。

你们给我们的两封信^①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我们至今也一直在追求这个目标，并试图采取同样的手段达到同一目标。你们的口号是：

“自由，博爱，劳动！”

这一口号从此以后也成了我们的口号。在这个口号下战斗，我们

^① 只保存下1848年4月14日的信，文件237。

的努力必将硕果累累。

如果我们在这里能为传播你们的工人报纸效劳，那我们是非常乐意的。我们也已开始将我们每周例会的记录在《美因兹日报》上摘要发表。此外，我们还可以利用最近出版的由卡利施编辑的星期日报《民主主义者》。这两家报纸^①的编辑都是我们协会里非常积极的会员。

我们希望同你们保持经常联系，就像在你们中间一样，致以兄弟般的问候并握手。

工人教育协会以德国工人联合会临时中央委员会的名义

理事会：

第二发言人 格·施土姆普夫

书 记 员 阿道夫·克路斯

1848年4月23日于美因兹

1848年4月30日《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刊》
第2号

245

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给莫泽斯·赫斯（科伦）的信

1848年4月24日

1848年4月24日于布鲁塞尔

^① 《美因兹日报》由卡尔·毕尔格和路德维希·迪贝尔格编辑。

尊敬的赫斯先生：

“德意志工人协会”终于又在这里恢复了，我受其委托，冒昧地问您一下，您编辑的《莱茵报》^①何时出版，我们考虑马上就要预订一份。

协会非常团结，现在约有30名会员；我们先前的委员会所受到的损失眼下虽然难以弥补，但对纯粹民主事业的热情却已提高了，以往的教训得到了总结和发扬。我们希望，贵报的出版，特别是在目前动荡不安的条件下，能为我们提供可靠的根据。协会让我向您表示由衷的感谢，感谢您将来给协会赠送《莱茵报》，并希望您现在就像以前在国外关心全民福利，特别是工人阶级的福利一样，随时随地发挥作用。

同时，如果您需要一名通讯员，我就冒昧自荐充当通讯员，为您效劳。

我们希望您的计划马上实现，所以我们请您立即给予回信。

受协会委托

书记 施洛特曼

撒马利亚人街4号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F.20,op.1,Nr.163

^① 参看注131。

248

卡尔·沙佩尔（维斯巴登）给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信

1848年4月26日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848年4月26日于维斯巴登

致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

兄弟们：

我来到美因兹以后，得知瓦劳到维斯巴登去了，并在那里工作。我询问了同盟的情况，听说在美因兹尽管有很多同盟盟员，但这里至今还没有建立起支部，我大为吃惊。我会见了一些人，得知有5名同盟的老盟员可以吸收参加，我就派人把他们请来，进行选举等等，简而言之，建立支部。^①随后我同梅特涅联系，他成了支部的成员。

在美因兹有个工人协会，协会的工作很出色，它有700多名会员。但是我当时没有机会参加这个协会的一次会议。在美因兹有良好的基础，那里可以取得很大的成绩。

在复活节前的星期五^②，我同工人协会的书记^③，一个漂亮的年轻人和兄弟，起程来维斯巴登。到了这里以后，我查明瓦劳

① 参看文件242。

② 1848年4月21日。

③ 阿道夫·克路斯。

确实同印刷工人恢复了联系，并被他们选为参加在海德堡召开的印刷工人代表大会^①的代表。但此外，他什么也没有做。我决定搞清所有的情况，并且很快就确信，共和派在这里已完成失去了影响，因为它的成员很多是愚蠢的牛皮大王，而其他一些人，本身倒是些好人，有见识，但非常缺乏做实际工作的能力。

我能做的都做了——同这些人一起建立工人协会，现有约100名会员，并组织了支部。可惜，情况不允许我在这里再呆一个星期，但是我希望，没有我事情也会就绪，因为基础已经打好了。

今天我就要离开，但还要想一下我还能做些什么。

敬礼并握手。

你们的 席尔^②

手稿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F.20，Nr.128

249

恩斯特·德朗克（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给卡尔·马克思
（科伦）的信

1849年4月29日

4月29日于法兰克福

① 参看注130。

② 卡尔·沙佩尔。

亲爱的马克思：

我有意这么长时间没有写信，因为我总希望能有更好的消息告诉你。就拿股份^①来说吧，到现在一份也没有征到，或者说同没有征到一样。现在，这帮狗崽子就是抓住他们的钱不肯松手，好像他们知道将来不付给他们利息似的；而我愿意与之共担风险的少数几个人则首先要一个计划，你知道，一个银行家所理解的计划并不是什么报纸的出版计划，而是财政上的计划。怎么办？我争取到的都是订户，而就连这些订户也总是表现得那么可怜，似乎他们只想证明是在为办报效劳。在法兰克福这里，如果你们愿意给我寄一份由一名**银行家**签字的价目单或预告之类的东西，我也许还可以争取到一些人认股。莫泽斯^②在这里，我总觉得这个人阴险狡猾；我没有见过他本人，但我还能得知，他在勒文塔尔和老奥本海姆那里干了些什么。

我在科布伦茨创建了一个同盟组织，当然它现在还很弱小。我把这些人指派到美因兹去；但我后来发现，美因兹人漫不经心到了极点，而且已陷入无政府状态，因此，我在返回科布伦茨的时候，将让这些**非常需要监护**的科布伦茨人到科伦去。在法兰克福，我已经找到**两个人**；并委托他们从手工业者联合会中招募人员，因为那里有能干实在的人，但我却把这些人列为美因兹人，真可悲；不过，如果报纸不马上出版，我将亲自再去一趟，设法使这个组织长期维持下去。在美因兹，这些汉子全都不满意梅特涅，为什么，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与此相反，我曾到班贝尔格（此人可能会被选入议会，而不会是齐茨）那里去过，我认为

① 为《新莱茵报》征股。

② 莫泽斯·赫斯。

他是可以被吸收入盟的；这一点，对于美因兹同盟组织的存在十分重要。我没有到哈瑙去，因为我同我老头子完全闹翻了，他在经济上把我弄得非常拮据，体面扫地。明天我回科布伦茨，继续办理我的国籍问题^①；我到那里以后，如果你愿意把有关报纸的消息（现在正需要）告诉我，我将非常高兴。在哥特沙克处，我已给你留下我的地址：“考夫曼·A.多米尼库斯。”〔……〕

在科布伦茨工人俱乐部的成员中，有非常优秀的工人，成员总数已达150—200人，并且还在迅速增加。如果对这个俱乐部的领导人进行适当的监督，该俱乐部是不难控制的。有关情况我在这封信中就不多谈了，因为我按照哥特沙克处的地址写给你的信通过邮局可能不太安全。详情来日面谈。

向你和你夫人致以由衷的问候！

你的矮子

又及：恩格斯知道奥托·维干德已将他的书^②的第2版寄出去了吗？我觉得斯蒂凡^③在柏林扮演了颇为可疑的角色？！如果你给我来信，请详细谈谈这一切。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 20, Nr. 17

节录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

① 试图重新获得普鲁士国籍。

② 实际上指的是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第1版的剩余部分，1848年，维干德为这部分加了新的书名，并作为“第2版”出版。

③ 斯蒂凡·波尔恩。

250

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区部给科伦中央委员会的信

1848年4月30日

1848年4月30日于巴黎

我们区部今天举行了会议，现在我们立即汇报会议讨论的结果。

我们区部在从一封私人信件中了解到马克思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希望得到有关巴黎支部的消息以后，这个支部一方面对它给美因兹寄去的一份详细报告至今没有得到答复不禁感到惊讶，另一方面，对人们根本不让它知道我们的同盟在德国的情况不禁感到诧异。

在这篇报告中，我们谈到了这一支部的令人满意的进展情况，并请求中央委员会同它保持经常联系，尤其是因为巴黎区部鉴于其特殊的地位可能对法国人具有一定的意义。现在这个猜测已经得到证实，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在这里能得到承认，我们只得感谢斐·沃尔弗兄弟。沃尔弗兄弟以饱满的热情，以在私人交往方面的丰富知识在法国一些俱乐部中分析了实际的工人运动，这截然不同于人们白天在街头巷尾、晚上在许多俱乐部中思考和议论的其他一些理想的和空想的体系，不同于那些从狭隘观点死板地论述工人问题的流水帐。

这里的区部委员会虽然乐意听到在科伦即将诞生一家共产主义的刊物的消息，但是，如果我们的兄弟斐·沃尔弗的因此就必

须放下这里的工作^①，那么，这里的支部只得表示遗憾。要是在这里，这位勇敢的支部成员虽然几周以来都不得不同多方面的困境作斗争，但在这里无疑很快就会得到应有的地位。眼下他的穿着很糟糕，而且债台高筑，这个问题亟待科伦方面帮助解决。
[……]

特别是艾韦贝克兄弟，他正忙于同手下人一起详细整理有关巴黎各种事件的报告；他还要对各种报刊批判地加以阐明，突出它们的倾向。即使把一塔勒兑换成最小的零钱（九生丁），并且把每份报刊的价格降到最低限度，也几乎不够开列这些报刊的清单。

主席 艾韦贝克

又及：巴黎区部每周都在壮大，它今天正式希望斐·沃尔弗兄弟留在这里，因为面对格律恩派和魏特林派等等，他的作用在这里是绝对必要的。

艾韦贝克兄弟刚才让人将宣言译成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但为此需要60法郎，有鉴于此，他要求中央委员会承担这笔费用。
[……]

因为时间很宝贵，所以我受特别委托单独在这封信上签字。

主席 艾韦贝克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F.20,Nr.129

节录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

^① 斐迪南·沃尔弗于1848年6月底7月初到科伦任《新莱茵报》编辑。

251

恩斯特·德朗克（科布伦茨）给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信

1848年5月5日

致同盟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兄弟们：

根据你们的要求，我在这里向你们汇报我的科布伦茨和库尔黑森之行的成果。

1.在科布伦茨，我创建了一个支部，至今共吸收了四名成员：文德林·尼克斯（一个非常革命的人）、一个名叫费尔巴哈的商人和两名工人。手工业者联合会主席、市参议员加布里埃尔·德里姆博恩，尽管他非常愿意加入支部，但我没有吸收他，因为我讨厌他那么爱虚荣；我还要再等等，看该怎么办，因为这个德里姆博恩在这里很有影响。由于这里要进行选举，所以日前这些人都忙得不亦乐乎；过几天我让支部给你们写一封信。

2.在法兰克福（有人如果承认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就几乎会被人用石头砸死），我已争取到了两个非常能干的人，至于其他人还需要观察一段时间。如果我在那里建立了支部，我将专门向你们作详细的汇报。

3.我在库尔黑森没有能采取行动，因为我在法兰克福就没有钱了；不过我确切了解到，在哈瑙和加塞尔（这里不是已经有一

个支部吗？）可以创建同盟。你们是否要派一名特使到那里去，我听凭你们决定，你们可以将下面的通讯处告诉特使：哈瑙：谢特奈尔和弗吕格尔；加塞尔：克耳纳博士。

4.在美因兹，我发现在同盟中，地地道道的无政府状态露头了；当时，瓦劳在维斯巴登，诺伊贝克在预定开会的日子则在咖啡馆玩多米诺骨牌；梅特涅简直忙得不可开交，至于事业，似乎根本不在他的眼里。只有席克耳和施土姆普夫在积极活动。于是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叫瓦劳从维斯巴登回到美因兹；我同《美因兹日报》编辑^①本人谈了话，此外还委托他把瓦劳安排在美因兹一家印刷所工作。我认为，如果你们再给那里写封信，那就更好了。美因兹人委托我请求你们派一名特使到巴登高地去，据说那里有许多事情要做，而他们自己又没有这方面的人。

5.各个工人俱乐部简直都沉不住气。他们说，现在不是已经到了在各城市提出像宪章派那样的请愿书，为社会^②议会签名的时候了吗？他们并不考虑“要求”^③，却提出了一个六至八点的工人请愿书，并附有要实行的备忘录。

如果工人又开始谈请愿书，我该怎么说，请给我指示。

致敬并握手

弗兰茨·梅林《卡尔·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序言》1914年柏林版第16—17页

① 路德维希·班贝尔格尔。

② 原件上是“所谓的”一词的缩写，可能被误认为“社会的”一词的缩写。

③ 文件224。

254

斯蒂凡·波尔恩（柏林）给卡尔·马克思（科伦）的信

1848年5月11日

1848年5月11日于柏林

亲爱的马克思：

你也许已从某家报纸上获悉，我在这里同警察当局进行了斗争，因为他们蓄意驱逐我。¹⁴⁰这就是我没有顾上立即给你复信的原因。我急忙要回答你的三点要求。

1. 这里现有四家报纸。《福斯报》和《施本纳报》是你知道的，它们还是老样子。《柏林阅览室》革命一结束就大搞激进主义，因而失去了许多订户，看样子，它维持不了多久了。还有一家新出版的报纸，即鲁滕贝格编辑的《国民报》，这家报纸要维持下去似乎也很困难。它向各党派卖弄风情，是一家带有温情主义色彩的非常灰色的报纸。这四家报纸都愿意刊登我的文章。至于杂志，这里有：（1）为工人出版的《人民呼声报》，非常无聊，眼看着就要完蛋了；（2）《德国工人报》（有一个由手工业者组成的编辑委员会）^①，是一只喇叭，人人都可以去吹，因此我离开了编辑部；（3）施略费尔^②的《人民之友》，一般

^① 《德国工人报。工人和雇主的刊物》每周出版两次，它的编委有：比斯基、黑策尔和施瓦茨以及波尔恩（从1848年5月20日第13号起），吕籍夫为它捐了一些款。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普力图那尔曾为该报的方针，未能成功。

^② 古斯塔夫·阿道夫·施略费尔深受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在该报奉行革命民主主义政策。

说来还算健康、有时充满激情，不懂经济学问题，总的说来，它是主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因此，无产者喜欢读它。另外还有几家报纸，但都不值一提。我编辑的工人报纸《人民报》从6月1日起每周出3次。我在这里有很多熟人，因此可望受到欢迎。

2. 各党派逐步开始清醒，它们日益分化，不久每个人就将知道自己属于哪个党派了。立宪派俱乐部（银行家、枢密顾问、教授、犹太人、交易所的行情、法律、丑闻、流言蜚语、柏林的俏皮话，这些就是它的内容）变得越来越无聊了，特别是在选举以后，他们在选举中一败涂地。政治俱乐部（荣克、邦议会议员迈耶尔、施略费尔、扎斯、大学生、马拉派和罗伯斯比尔派和反对一切庸人的人）现在似乎在争取博得激进派的好感。社会主义在一切阶层（柏林的资产者们——酒店的常客们除外）中间获得很大成绩。慈善事业打开了门路，把人们手中的金钱拿过来让工人分等等。整个无产阶级革命意气昂扬。因此，我尽量阻止发生无益的暴动，但同时又处处把分散的力量组织成一支强大的力量。可以说我在这里领导着工人运动。资产者们相信我的组织才能，他们不了解我正在把工人团结起来，目的只是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惊慌。他们反对驱逐我的意图。我是这里的类似由很多行会和工厂的代表组成的工人议会的主席。¹⁴¹ 商业大臣^① 现在和我们建立了联系。^② 此人不知道他该干什么，正在瞎干一气。总的说来，激进派最近取得了成绩，这些人不再害怕共和国这个字眼了。

3. 关于同盟本身（它在这里现有的那种样子）的情况，我现

① 帕托夫男爵。

② 波尔恩、比斯基和柏林市议会的成员一起参加了商业、工业和公共工程部的一次会议，会上讨论了下层的劳动问题。

在无可奉告。谁也没有时间按照从前的方式去建立一个巩固的组织。它瓦解了——它在各地，并且没有一个地方不是如此。这一点在目前并不使人感到遗憾，因为每一个人都在尽他的义务，等稍微安定一些，有了时间再干也不迟。

我欣然接受你提出的为你的报纸写通讯的请求。我只希望看到你的计划立即付诸实现。向你的夫人以及哥特沙克和恩格斯问好，把你那讨厌的议员、大主教^①派到我这里来，我要管教管教他。

忠实于你的 斯蒂凡

于下善提树街28号

手稿

第一次全文发表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F.1,op.5,Nr.173

255

恩斯特·德朗克（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给卡尔·马克思
（科伦）的信

1848年5月15日

5月15日于法兰克福

亲爱的“丘必特”：

刚才我收到一封你4月份写的信，它经过富尔达、科布伦茨，最后到达这里；此外，我还收到了一封你本月8日写的信，它似乎只在科布伦茨耽搁了一段时间。

^① 勃德斯特尔，他在迈恩地区当选为出席1848年5月22日在柏林举行的普鲁士制宪会议的议员。

关于股份的事，我没有什么新的情况可以告诉你，无非就是我暂时在一些庸人那里碰了钉子，**不过我确信**，如果你们给我寄一份由一名银行家签字的正式计划来，我就能争取到大约25股，**但这件事要尽快办！**

在科布伦茨，我已经吸收那里的手工业者联合会主席、市参议员 F.加布里埃尔·德里姆博恩入盟，并嘱咐他**尽快**给你们写信。这时，这些人都在忙于他们的牧师事件。在选举中，牧师们获胜了，赢得了一名候选人，当然这一候选人是一文不值的。你的朋友^①赖辛施佩格也当选了。〔……〕

我被迫回到了法兰克福，因为我急需钱用，并且要为某一书商写一本关于《普鲁士法律的归宿》的小册子。你下一封信请寄到我用午餐的“维尔腾堡饭店”。我可能要到哈瑙去一次，在那里呆一天，设法在那里建立一个支部。法兰克福的成员在我不在的时候，由尤利乌斯·弗吕贝尔先生带头干了一件背信弃义的事，而我从昨天开始就跑遍了全城，寻找两个巴黎工人，据说他们在这里，要在这里帮助建立同盟。

恩格斯在干什么？我在轮船上从一个商人（他把恩格斯说得很可怕）那里得知，前一段时间他回巴门去了。沃尔弗^②在科伦吗？

许多人都准备为预订报纸的事而在摩塞尔河流域，在科布伦茨及其周围地区，还有在库尔黑森积极活动，事情一有眉目，我就把他们的通讯地址告诉你。〔……〕

① “朋友”一词在这里是带讽刺性的，指的是奥古斯特和彼得·赖辛施佩格兄弟中的一个，他们俩作为反普鲁士的天主教教权主义的代表均被选入了柏林普鲁士立法国民议会。

② 这里指的是斐迪南·沃尔弗还是威廉·沃尔弗，难以确定。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 F.20, op.5, Nr.18

节录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

256

恩斯特·德朗克（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给卡尔·马克思
（科伦）的信

1848年5月17日

5月17日于法兰克福

亲爱的马克思：

如果你在收到这封信时尚未回复我前天写的那封信，那就请立即给我回信！我只能在火车鸣笛启动前赶紧向你报告一下：

1. 弗吕贝尔和爱德华·佩尔茨那个蠢驴想征股在这里创办一家报纸（《民主》）；如果你不立即给我寄一份出版《新莱茵报》的正式计划来，这帮畜生将从我这里夺走仅有的一点股份来源。（在科布伦茨，我起码能征到10—15股）。

2. 请考虑一下，如果报纸在一个季度开始前一个月出版，会得到怎样的好处啊！第一批订户总是不太多的，因此，如果出版后四周订户扩大了，那么，损失就会减少。

3. 今天晚上，在美因兹举行工人集会；佩尔茨(!)要去参加，以便要求人们加入一个法兰克福佩尔茨—弗吕贝尔中央委员会！^①

^① 当时在法兰克福工人联合会中起领导作用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埃塞伦、弗吕贝尔、勒文施坦和佩尔茨，试图把该联合会变成德国工人联合会的组织中心。

我立即作了安排,今天也要前往美因兹,参加为今天准备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辩论,以便推迟佩尔茨的提案,如不行,就直接进行抨击。但是,我认为必要的是,你们可以通过中央委员会决议,指示同盟各支部,争取工人联合会,让他们(工人)不要同法兰克福建立联系,而同美因兹人(瓦劳、克路斯)建立联系。

4. 瓦劳被安排在美因兹工作,即安排在那里的《莱茵报》工作!《美因兹日报》出版人察贝尔恩根本不想过问他的事,目前,他在哪个印刷所工作都无所谓,可他偏在美因兹《莱茵报》工作!

尽快给我来信!

恩格斯在干什么?你夫人在干什么?

你的 矮子

第一次全文发表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 F.20, Nr.19

257

科伦工人联合会给哈瑙工人联合会的信

1848年5月20日左右

致哈瑙工人联合会

朋友们, 兄弟们:

我们已经荣幸地收到你们17日的来信。¹⁴²我们为这封信和为你们对我们明白表示的态度,向你们表示感谢。但是,我们不能回

意你们至今还像来信地址所写的那样称我们为**德意志工人联合会**。只有在德国全部或大部土地上都已建立了工人联合会，我们才愿意承担召集所有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的任务。到那时，代表大会才有权组建一个**德意志工人联合会**。在此期间，我们有幸把你们想要的几期报纸寄给你们，请把你们的报纸通过书商寄给我们，并殷切希望同你们保持真诚友爱的频繁交往。自由、博爱和劳动的胜利已经为期不远了。

**工人联合会主席
书记和
委员会^①**

1848年5月28日《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刊》
第6号

258

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卡尔·马克思（科伦）的信
1848年5月21日

[……] 我同你简单谈谈这里的情况；要是你觉得我这么谈还可以，那我可以经常同你这么谈，只要你愿意。

请你也来信同我谈谈德国的情况，让我借此去见弗洛孔和《改革报》，而不致让无赖们霸占报纸。贝尔奈斯在拉马丁那

^① 在原件上，下面是签名。

里，后者派他到巴登去，以全权代表身分负责对法国的商务工作；据说现在这个小人竟以此四处炫耀，简直让人无法容忍。我觉得，我们党已被那帮人狡诈地利用了；我越来越感到讨厌，而你还明确地让我留在这里充当什么副代表。你的报纸出版了，我们的工人对此非常高兴；工人的人数增加了，他们的积极性也提高了；我们讨论了宣言^①，沃尔弗^②在非常积极地活动，并且很讨人喜欢。

祝好

艾韦贝克

（向你亲爱的夫人问好）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F.1,op.5,Nr.174

节录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

259

斯蒂凡·波尔恩撰写的社论¹⁴³

1848年5月25日

我们的要求

我们是怎么会把我们的报纸命名为《人民报》的，这一点我

① 文件202。

② 斐迪南·沃尔弗。

们要首先声明一下，同时我们想在这个声明中陈述我们编辑出版这个报纸将要遵循的方针。

我们所说的人民，通常是指全世界范围内的人民，但是，我们这个报纸主要只代表一个国家中的一个特定的阶级，即**工人阶级**。我们选择《人民报》这一名称的前提是，只要阶级差别还存在，这个名称就始终指社会上的那个被压迫的、依靠工资和面包过活的阶级，只要这个阶级的劳动和工资是给予的，它的生存就不会有保障；这个阶级仅仅是为了明天才活着的，它除了**贫困和绝望的反抗**没有任何前途。

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责难那些为人民的利益而写作的人，说什么他们只看到这些阶级差别，只看到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对立，而在一个保证人人都享有平等权利来行使国家权力的自由国家里，实际上并不存在这些对立。我们的大臣们在这几天给我们提出的宪法草案使我们改变了看法；我们发现，在我们的国家里，由于大量占有财产这一特征还存在一个高贵的卫队；如果不是这种情况，如果我们的人民代表不作财产调查就实行一院制，那么，就连这些对立也消灭不了；这些对立就是各国人民的历史发展，并不是我们创造的。

我们的论敌认为，当资产阶级剥夺贵族的特权、贵族的特殊优先权时，贵族就融化于资产阶级，同样，当人民获得参加政府权利，财产失去了在国家中还仅存的代表资格时，资产阶级也必然融化于人民；他们认为，到那时国家的全体成员都可理解为“人民”。

目光何等短浅的历史观！我们难道没有看到，人民取得政治上的自由以后，他们同资本家阶级的社会对立就表现得更加明

显，他们还要全力以赴争取社会的自由！

社会中的一个阶级只要取得统治，它的生存、它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也就要发生变化。我们看到，历史赋予我们的每一次强大的革命，各文明民族的全部生活状况也就跟着发生变化；资产阶级推翻了贵族统治以后，不仅取得了政治上的权利，它的整个生产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而贵族则把行会制度，慢慢地还把中世纪野蛮的最后残余一起带进了它那带有浪漫色彩的坟墓；随着资产阶级的产生，由于自由竞争出现了资本的统治；而人民获得政治上的解放以后，我们并不否认，我们又要迎接一场对全部生活状况的改造。人民有权在议会中投票表决，有权参与立法，今后他们就不愿再向他们的同胞索取工资和面包，也不愿再静静地忍饥挨饿，接受同情者的解囊、施舍，而必然要创造一种崭新的有保障的生活。从这时起，我们要牢记，就不再**进行任何暴动**，而要进行**革命**！

我们认为，在德国，资产阶级到处都或多或少地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自由的发展，这种发展在现在的革命运动时期将越来越迅速；何况我们的法兰克福议会将会成功地废除比如在各汉撒城市、汉诺威、不伦瑞克、梅克伦堡和萨克森的部分地区还残存的中世纪行业关系，从各个方面唤起我们祖国在各种制度上的统一；我们的议会还将成功地消灭贵族统治的最后残余。但是，在达到这一目的以前，本报总应该勇敢地为此进行斗争。因此，我们在德国面临着非常广泛的任务。一方面，在反对贵族制度、反对中世纪、反对天赋神权的斗争中支持资产阶级；另一方面，支持小手工业者和工人，以反对资本的势力和自由竞争的势力，并且要永远勇往向前，必须为人民争得每一种尚未得到的政治权

利，以便使他们拥有更快地取得社会自由和独立生存的手段。

因此，本报的宗旨是，为民主，即为人民统治这个词的最广泛的意义上作好准备；同时我们将防备狂热空想者的高谈阔论（他们永远握有断头机的绞索，因为他们本身不会丢掉脑袋），还要防备一切哭哭啼啼的含情脉脉的社会主义。为了有助于认识同社会各阶级状况以及整个国家状况有关的工人现状，通过阐明当前状况来促进人民自由的继续发展，这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在此我们希望得到公众的支持。

1848年5月25日《人民报。柏林工人中央委员会机关报》试刊号第1—2版

260

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给科伦工人联合会的信

约1848年5月底

致科伦工人联合会全体会员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兄弟们：

我们一向从科伦的消息中获悉，时代精神的呼声并没有徒劳地召唤你们；你们倾听了时代的警告，对自由的爱以及对摆脱旧桎梏的渴望，点燃了你们心中的火焰。你们建立了自己的联合会，从而卓有成效地参加了伟大运动，毋庸置疑，你们的努力必将取得非常出色的成就。

我们的敌人，守财奴们及其同伙，早已直接或间接地联合起来，以便更容易地保卫自己而反对人类社会里的这一个天天遭受剥削的阶级；他们策划于密室，反对这个肩负着国家的全部重担的阶级，反对这个生产全部产品的阶级，富人们用这一阶级的血汗修筑自己的宫殿，过着穷奢极欲、纸醉金迷的生活。因此，这正是我们劳动者要刻不容缓地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敌人，砸烂残酷的奴隶制桎梏的时候了；很久以来就统治着我们的监护权，如今必须废除，我们不能再而且不应当再深信不疑地把我们的事情交到别人手里，我们必须独立自主，自己处理自己的事情；工人阶级的利益必须上升为国家利益。为了做到这一点，无产阶级必须成为国家的执政党，推翻旧的社会制度；但是，要达到这个目标，只能通过这样的途径：全世界的工人联合起来，与共同的敌人作斗争，因为我们只在单个城市联合，而脱离其他各个地方去实现我们的目标是不够的；各地存在的联合会相互间必须定期通讯，以便到处都能按照一个共同的计划开展活动。因此，我们提议，从现在起，同你们建立每月通讯联系，相互报告至关重要的事情。

你们伦敦的兄弟们向你们致敬并握手。

受伦敦工人教育协会委托

约·格·埃卡留斯^①执笔

1848年8月4日《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刊》

第7号

^① 原件上为：欧亚留斯。

264

海尔曼·艾韦贝克等人（巴黎）给莫泽斯·赫斯（巴黎）的信¹⁴⁴

1848年6月5日

6月5日星期一于巴黎

亲爱的：

我已把你来到巴黎的消息通知这里的支部会议了，全体与会者对你没有出席会议普遍感到惊讶。会议不计较私人恩怨（也就是说我按照你的言行认为不说的某种私人恩怨），何况与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有私人怨恨。

此外，我指名的那个人是第一个自愿放弃一切私人恩怨的人，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也在这封信上签了名。

本支部今天直截了当地邀请你，会议在铁铺街1号举行。

祝好！

艾韦贝克（主席）

施内贝格尔

施米特

沃尔弗^①

埃德蒙·济伯纳编《莫泽斯·赫斯通信集》1959年海牙版第196页

① 斐迪南·沃尔弗。

266

科伦工人联合会给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信

1848年6月12日

致伦敦工人教育协会

兄弟们，

我们从德国的远近各地区收到了关于新建工人联合会的来信。我们仅举以下几个城市：杜塞尔多夫、爱北斐特、哈姆、波恩、美因兹、特利尔、亚琛、哈瑙、马尔堡、莱比锡等等，我们同这些城市的工人联合会建立了经常性的、极其紧密的联系。但我们坦率承认，任何消息都没有像我们从伦敦的兄弟们那里得到的消息使我们如此兴高采烈；它向我们证明，工人教育协会多少年来一直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卓有成效地、积极地作出努力和开展活动，而且今天仍然在为美好事业而满腔热情地从事活动。

我们非常高兴同海峡对岸的兄弟们保持经常性的联系，这样一来，我们就能联合起来从各方面维护我们的权利，代表我们的利益。

我们顺便提一下，我们联合会的会员数目已超过6 000人，而且这个数目还在与日俱增。本周还将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各工人联合会、民主协会和体操协会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将导致全德国所有团体更紧密的联合。¹⁴⁵

兄弟们，让我们再一次紧密地团结起来，携手并肩地战斗，

审慎从容地反对我们那丧心病狂的敌人的攻击和反动贪婪，不知疲倦地追求我们的目标——工人阶级的胜利和统治。

此致问候并紧紧握手

科伦工人联合会

第一书记 **严森**

(签名)

1848年6月12日于科伦

1848年6月18日《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刊》
第9号

267

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给科伦中央委员会的报告^①

1848年6月18日

**伦敦区部向共产主义者同盟
中央委员会作的季度工作汇报**

兄弟们！

自中央委员会迁出伦敦后，至今已有三个月了。我们竭力忠于职守，因此，现将我们的季度工作汇报如下。

I 概 况

在2月下旬的那些日子里，中央委员会迁出伦敦，并建立区

^① 报告出自约·格·埃卡留斯之手，它的结尾部分没有保存下来。

部委员会来代替它。此后，区部的处境，正像可以预见的那样，是极端困难的。^①伦敦区部中断了同运动发祥地的联系。大家都紧张地等待着以后事态的发展。许多人相信，凡在法国能够做到的，在德国同样也能够，并且也应该马上做到。另一方面，有人试图用空话来扼杀人们的热情（这方面，你们已经知道的那位海尔贝格在教育协会的讨论中有出色表演）。现在必须对这股热情之火加以引导，以便使巴黎中央委员会所采取的步骤同时也符合伦敦区部的愿望。

在同盟本身，人们也异常紧张，不讨论别的，只讨论法国和德国革命、法兰西共和国以及当前一般事态。教育协会的会议因饭店关闭而中断了。^②为恢复被中断了的会议，同盟作了巨大的努力，因而也只有几个晚上浪费了一部分时间。当时，我们这里突然流传一种不可靠的谣法：“国王弗里茨被赶跑了”，“在柏林，宣布成立了共和国”，“全体德国人正在像武装部队一样由巴黎向德国挺进”。为制止这种谣传同盟采取了一些措施，即由它出面在协会里成立了五人委员会，负责收集捐款，以便在必要时组织盟员奔赴德国。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应该首先向巴黎的朋友们了解运动的详细情况。

同盟打算以这种方式在各方面紧跟中央委员会，同时控制协会的非盟员。第二天，中央委员会的特使沙佩尔^③，带着有关的全权证书和消息，来到我们这里。上述委员会已募到一笔款子，

① 最后一词辨认不清。

② 参看文件215。

③ 卡·沙佩尔于1848年3月底受中央委员会委托又一次前往伦敦，参看文件225。

并派遣部分盟员带着这笔捐款分赴德国某些地区，即需要他们或是他们熟悉的地方。

早在沙佩尔兄弟到来之前，就已召开了几次全体会议。现在召开这些会议都是为了听取沙佩尔兄弟和后来到这里作报告的鲍威尔^①介绍巴黎所发生的事件的概况。盟员的积极性很高，甚至太高了。从那以后，有一些人的情绪明显地低落下来。但是大多数人则相反，开始更好地去理解整个运动，并且对实现我们的原则怀着更大的期望。

关于英国宪章运动，还需要提出下面一点意见：一些成员，甚至整个区部，特别是我们的英国兄弟，都力图在公开的会议上支持宪章派。由于议会通过了反动决议，公开活动实际上已成为不可能。四月十日^②的结局（许多盟员已预见到了其后果）使我们伦敦支部的兄弟们明白了问题所在。如果进行深入的秘密宣传，那可能会使宪章派重整旗鼓，同民众建立较牢固的联系。只要宪章派不设法通过内部关系支持外部的运动，就不能指望取得任何明显的结果。秘密宣传必须而且马上在短期内加以恢复。

4月10日伦敦区部的人曾聚集在一起，以便在必要时给宪章派以支援。^③

这些都是一般性的问题。现在谈谈区部本身的情况。2月底，伦敦区部拥有10个支部。其中9个支部由德国人、丹麦人、瑞典人、匈牙利人等等组成。剩下的那个支部的成员全是英国

① 李尔普·鲍威尔是8月在巴黎成立的新的中央委员会成员，他于4月回到伦敦，与普芬德和埃卡萨斯一起领导伦敦区部。

② 关于1848年4月10日宪章派的大示威的失败，参看文件234。

③ 在原件上，这句话是写在前面一句话的边上的。

人。那9个支部中的一个，设在伦敦东区，并负责领导东区的教育协会。^①该支部成员多次提出要求撤销东区的支部和教育协会，但这个建议一直遭到否决。

但是，当人们看到，东区的教育协会尽管作出了努力但还是不能发展，最后它还是被撤销了。支部成员则分别插入伦敦西区的各个支部。而教育协会的成员因为在伦敦东区无法扎根，就并入了西区的教育协会。

到上面提到的时间为止，伦敦区部共有盟员84人。尽管许多盟员已经离开这里，但目前盟员的数量 [……] ^②

从记录中摘录下述有关纪律处分的决议：

1. 库克第一，库克第二，哈尔特第一，哈尔特第二和布劳被清除出同盟（他们都是不可靠分子）。

2. 亚尔萨斯的托·迈尔，因他的可耻生活方式玷污了同盟的荣誉，被开除盟籍。有关开除他盟籍的动议，区部要在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上提出。

作为总区部（这是以前决定的），我们报告如下：

1. 我们的特使从美国纽约来信说，虽然至今他们还没有做出很大的成绩，但他们并没有游手好闲。纽约的教育协会成员大大落后于运动。法国革命也使那儿的气氛活跃起来了。

威·魏特林为了使别人接受他的观点，显然花了不少心血。但是，更年轻、更优秀的人远远胜过了他 [……] ^③

手稿

柏林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

① 伦敦工人教育协会的这个分会是1846年6月初成立的。

② 在原件上被判罚了。

③ 原件到此结束。

268

《北极星报》刊登的关于《新莱茵报》出版的报道^①

1848年6月24日

《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是一家新日报的名称，不久前在科伦开始出版。这家宣布自己为“民主派机关报”的报纸，它的编排技巧是无与伦比的，并以胆识过人著称；我们谨向它致敬，它是我们在反对形形色色暴政和非正义行为的伟大运动中的一个可敬的、有才干的和英勇的战友。它的主编是马克思博士，这是一位才华出众的维护欧洲工人权利的斗士；编辑部同仁则有：布雷斯劳的威·沃尔弗，一位久经考验的民主主义者；科布伦茨的德朗克博士，他曾经是政治犯；科伦的斐·沃尔弗（他在巴黎呆过10年）；亨·毕尔格尔斯（科伦人，是一位可爱的人民演说家，法兰克福第一届国民议会^②议员）；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他的杰出论文经常为《北极星报》的各栏增添光彩），还有格奥尔格·维尔特（他在著名的布鲁塞尔会议上揭露了自由贸易派的谎言^③，因而他

① 参看1848年6月27日《新莱茵报》第27号对此作出的答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36页），在答复中强调指出：“在英国报纸中，唯有革命的《北极星报》的赞许才是我们所珍视的”。

② 指预备议会。

③ 参看注103。

在我们的读者中享有盛誉)。我们祝愿我们的同仁得到长期的、有益的和胜利的发展。

1848年6月24日《北极星报》(伦敦)

第558号

269

柏林工人代表大会的邀请书¹⁴⁶

1848年6月26日

邀请德国工人阶级派代表参加8月20—26日

在柏林召开的工人议会

工人们，兄弟们：

下面签名的参加由柏林手工业者联合会召集的手工业者和工人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不满意这次大会关于当前社会问题的决议，虽然它的实际效益已得到广泛的承认。代表们一致同意邀请**整个祖国**各城市、工厂区和农业区的工人阶级派代表参加以讨论工人阶级的物质利益为唯一宗旨的一次**联合工人议会**。在以往历次或多或少带有地方性的工人、手工业者和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上，在讨论重大的社会问题或劳动问题时，或者草率收场，或者毫无结果。因此，我们认为当务之急是：建立德国工人阶级的一种尽可能完整的代表机构，独立处理首先同工人阶级有关的问题，在基本问题上，即在保证工人阶级摆脱资本、人身依附关系和物质匮乏的问题上联合一致。工人议会确定的各点应成为**德国**的一个社会的**人民宪章**，人民宪章应该使迄今受少数人剥削和压

迫的千百万人建立兄弟般的关系，应该全力以赴地使之成为国家的法律。

我们认为，实施下列这些措施对工人阶级来说是迫不及待和必不可少的，所以我们把它们看作是我们的提案，而不抢在议会作出决议以前采取行动。

我们自己作为工人，为德国工人阶级的共同利益提出以下要求：

1. 国家有责任为每个愿意劳动的人提供与人的需要相适应的生存条件（劳动保障）；

2. 国家有责任支持并促进独立的手工业或工业的工人团体；

3. 国家应关心一切无依无靠者以及劳动致残者；

4. 调整和限制过长的劳动时间；

5. 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调整税收制度，亦即征收高额累进所得税，限制继承权，废除消费税以及一切迄今压在农业工人身上的封建负担、苛捐杂税、劳役、什一税等等；

6. 发行公债。国家实行免费教育，如有必要，应对青年实行免费的因材施教；

7. 实行免费的法律保护；

8. 任命由工人阶级自由选举产生的德国各邦劳动部。

工人们，兄弟们！

我们过去由于四分五裂，孤军作战，因而势单力薄，受人鄙视，现在让我们联合起来。我们有千百万人，形成了全国的绝大多数。只有在同一个目标下联合起来，我们才会变得强大，才能形成一股我们这些创造一切财富的人理应拥有的力量。我们的选票举足轻重，我们应不失时机地在**社会民主运动**中发挥作用！

科尼斯堡工人联合会代表

弗里德里希·克吕格尔

柏林机械制造工人联合会代表

恩斯特·克劳泽

汉堡工人联合会代表

卡·毕林

柏林工人中央委员会代表

波尔恩

汉堡工人教育协会代表

F. E. 施泰因豪厄尔

机械制造工人联合会代表

A. 卢赫特和克劳泽

备注：

1. 请接到上述邀请书的各联合会转告本地区的联合会，同时请求各家通俗报纸的编辑部在报上刊登我们的邀请书；

2. 请各联合会给其参加工人议会的代表开具证明信；

3. 柏林工人中央委员会（地址：罗斯玛丽亚大街 5 号 **波尔恩**）将为召开议会临时担任事务性领导工作。开会地点届时将通过官方报纸另行通知。

致德国各工人、手工业者和教育团体，致在瑞士、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的德国人团体。

1848年8月27日《人民报》（柏林）第11号

273

民主派兄弟协会关于六月起义的呼吁书摘录¹⁴⁷

1848年7月4日

[……] 红色共和国的旗帜就是整个欧洲无产者的旗帜。群众受政治空谈迷惑，被名义上的（有名无实的）政治权利蒙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法国、英国和德国的千百万工人都懂得，最好的宪法既不能包括所有人权，也不能包括其中最重要的人权。在圣安都昂郊区被扯下的红旗是征服不了的。这面红旗是信仰的象征，而信仰并非局限在巴黎，正在人类工业的每个蜂房里滋生蔓延；一次失败，甚至五十次失败也阻挡不住这种信仰的凯旋。[……]

1848年7月15日《新莱茵报》（科伦）第45号

摘要

274

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给科伦工人联合会的信^①

1848年7月4日

伦敦工人教育协会致科伦工人联合会

兄弟们：

^① 这封信是在1848年7月14日科伦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上宣读的。它是卡尔·沙佩尔从伦敦带来的对6月12日的信（文件266）的复信。

你们通过我们的兄弟卡·沙佩尔带来的信，几天前我们已经收阅了，阅后使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们很羡慕你们能够享受到丰富多彩的政治生活的乐趣，而我们则因远离运动的发源地而感到悲伤。

你们希望经常保持最密切的联系，这也是我们的愿望。我们的敌人早已在这方面走在我们前头了，现在已是我们开始利用这个武器同敌人进行斗争的时候了，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不仅能持久地牵制敌人，甚至能彻底地击败敌人。

我们完全同意你们的观点，在整个德国建立工人联合会，并使它们相互间保持极其密切的联系，这样一来，我们彼此之间就能得到发展，实现我们的目标，即我们迫切需要的无产阶级的联合。如能做到这一点，毫无疑问，胜利就属于我们。我们必须勇敢地同敌人对抗，因为我们不会失去什么东西，而必将得到整个世界。鼓起勇气，坚定不移地前进，未来是属于我们的。

致敬并握手

伦敦工人协会

1848年7月4日于伦敦

1848年7月16日《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刊》

第15号

275

朱利安·哈尼为《新莱茵报》撰写的文章^①摘录

1848年7月5日

〔……〕英国的政治运动同一切政治运动一样，它的发展也伴随着大部分社会状况的彻底变革。旧同业公会的终止，消灭了整个手工业者阶层连同师傅和帮工迄今为止与社会对立的那种关系；宗法制的协作正在转变为雇主和工人之间的敌对对立，转变为工人相互之间的竞争。在此其间，80年代的伟大发明导致了一场决定性的变革。

现代工业的开端就是一场打击，它抛弃了千百种关系。在此之前用手工耕种大片土地、居住得很分散的大批人，如今却被赶出了自己的家园，被迫成群结队地蜂拥进入飞速崛起的新城市，沦为机器的奴隶，因为这些机器在竞争的斗争中战胜了他们。英国自从伊丽莎白时代起就试图以每年的济贫款来应付流氓无产阶级，同流氓无产阶级结伴的是产业无产阶级，后者的价值同产品的价值一样，是由求与供决定的，而且这一阶级是受工业发展的一切后果摆布的；它不久将是最终奋起反抗，通过政治变革改善自己社会状况的那些人数众多的革命群众。

在激进派贵族阶级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交替影响下，我们看

^① 该文刊登在1848年7月4日和5日《新莱茵报》第34和35号上，文中概述了英国工人运动特别是宪章运动的全部历史。

到，这些起初并没有觉悟的群众经过多次受骗上当，经过多次的挫折失败，终于在宪章运动中逐步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地位，摆脱他们的自由派欺骗者的任何诱导，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具有不可抗拒的威力。资产阶级对旧的土地贵族每取得一个胜利，工人群众也就取得一个胜利，因为他们比正取得胜利的中等阶级更优越更坚强。未来的斗争随时随地都将变得更简单更容易理解。最后资本的代表和劳动的儿子相互之间将势不两立。[……]

1848年7月5日《新莱茵报》（科伦）第35号

节录

276

亨利希·弥勒（科伦）给莫泽斯·赫斯（巴黎）的信¹⁴⁸

1848年7月5日

1848年7月5日于科伦

亲爱的朋友：

我正好碰见特里娜^①，她将转交给你一封信，因此，我想乘机也给你略写几行，让她捎给你，向你报告最近在科伦发生的事件，并希望得到你处的消息。人民一直处于极度紧张状态，资产阶级趾高气扬，警察为所欲为，又逮捕了哥特沙克和安内克。其中的原委是微不足道的；你在《新莱茵报》上也会看到这一点。集会仍在继续；德国的一切民主集会都互有联系。巴黎事件使我们遭到沉重打击。无论如何，请你把巴黎的详细情况告诉我，因为你知道，一个人如果对一个件事只有大概的了解，就比身临其境

^① 卡特琳娜·佩什，是赫斯的弟妹。

的人更有兴趣了解它，因为我就是只了解局部情况的人。我从布鲁塞尔给巴黎的一个好友写了好几封信，但没有得到回音。如果你路过他那里，劳驾，请你去看看他，代我向他问好，叫他给我来信。你可以把我的地址告诉他。他住在圣马丁郊区188号，名叫格奥尔格·贝格曼先生。你不妨打听一下，在他旁边，即第186号住的是一位葡萄酒商人，到那里去问格奥尔格就行了，然后你在1—3小时之内就能见到他，他是马车夫。

劳驾，你如果方便的话，就给我搞一张巴黎市区图，我把钱交给此信的送交者一起带给你；有了市区图，找人就方便了；除此之外，我没有什么特别新闻相告。

特里娜会把其他事情都告诉你的，请代我向你夫人多多致意，立盼回复。

你们的朋友

亨利希·弥勒

于喜剧街18号

埃德蒙·济伯纳编《莫泽斯·赫斯通信集》1959年海牙版第198—199页

277

科伦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

1848年7月6日

1848年7月6日委员会会议

公民莫尔向会议宣布，严森主席走了，因此，会议必须选举

573

一名新主席，接着公民莫尔当选。¹⁴⁹他在会议上作了如下发言：

兄弟们，我将尽力不辜负你们对我的信任，你们选我担任这个光荣职务，我需要你们的支持；维护“安宁和秩序”，并不完全取决于主席一个人，而是取决于会员本身。每一个发言人，不管他是否代表我们的意见，我们都要认真听取，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无拘无束地坦率发表自己的意见，不必担心受到干扰。随后我们就可以自豪地同出卖灵魂的资产阶级作斗争，它甚至企图一如既往地污蔑和谩骂工人是一群粗野无知的二流子和煽动者。

兄弟们，自从7月3日即上星期一我们集会以来，发生了不少事情；但是，首先我要向工人联合会的会员们表示我的致意，因为他们采取刚强坚定的态度以及镇定自若、深思熟虑的举止，无疑使资产阶级的一切期望都落了空，使警察和与之相互勾结的兵痞异常愤怒，而他们的准备措施是人所共知的，恕不在这里一一复述了。

现在，我不得不再一次重复上星期一我对你们说过的话，即使在今天，警察又已作好准备，士兵已在兵营里待命，据说还加了双岗等等。我们只要镇定自若，坚强不屈，就能接二连三地挫败警察，而他们可能要把我们的主席一个接一个地抓走。因此，我们要向他们表明，我们不受任何人的约束，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人权，我们大家都是独立自主的，因而我们能够保证值得嘉许的警察机构有事可干，它还必须抓走七八千名主席，方能瓦解工人联合会；因为我坚信，每个会员都乐于担任主席的职务，并尽心竭力去履行这一职务。到那时，反动派最终会狗急跳墙，迫不及待地采取措施，既禁止集会又取消出版自由；到那时，小市民和

一切锱铢必较者就要眼看着自己的权利和自由受到威胁，于是就同工人采取联合行动；未来是属于我们的，而且未来迟早必属于我们。在巴黎，工人虽然遭到镇压，但他们并没有被战胜；谁知道明天会从柏林给我们传来什么消息呢！

联合会会员名单和本月3日会议的记录已分别在公民哥特沙克和公民严森家里被没收。继续保留为重新获得这两个文件而采取的措施。

1848年7月13日《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刊》
第14号

278

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莫泽斯·赫斯（巴黎）的信

1848年7月10日^①

星期一

尊敬的赫斯：

我真倒霉。我上星期去看你，既没有见到你，也没有见到你夫人。现在，我简直像着了魔似的，妨碍我去看望你。今天晚上5点钟我照例要去国民自卫军值班，可我又答应去参加章程的讨论。¹⁵⁰你只管去，我已经对章程起草委员会主席施皮斯先生说

^① 邮戳的日期。

过你要去参加讨论。参加讨论的，有好几个共产主义者：莱宁格尔、谢尔策尔、沙贝利茨、佩姆珀尔；其他人也将成为共产主义者。但你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卡贝，沃尔弗^①对此人一贯非常不满。沃尔弗现在科伦。你今天只管放心地去，7点左右到好人街咖啡店老板那里去找施皮斯或上述任何一个人，并说明自己的身分。

再见

艾韦贝克

匆匆草于剧院街33号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F.173，op.1，Nr.2618

279

科伦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

1848年7月13日

莫尔宣布会议开始，他说，在上次委员会会议上，为了把联合会议事日程重新纳入正常轨道，全体委员会委员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

他告诉大家说，这次会议作出决定，库存现金要在每次委员

^① 斐迪南·沃尔弗。

会会议上公布，会议记录在付排前要在委员会会议上宣读。

接着，他还说，要任命一个人进中央委员会，以代替严森。¹⁵¹
沙佩尔获得多数通过。

马尔滕斯被任命为第二书记。

沙佩尔当选为希尔格尔分会的临时主席。

通过了沙佩尔提出的在委员会会议上讨论问题的建议。^①

提出下列问题准备在下次会议上讨论：机器对人有利还是有弊？

莫尔接着还说，在以往的起义中，人们在捣毁机器时非但没有根除他们身受其害的弊端，反而使这种弊端变本加厉了，因为他们并没有研究这些弊端所由产生的基础，其实这些弊端并不起源于机器，而是起源于社会制度的恶劣组织。

接着，书记还宣读了一封给伦敦工人协会的复信，会议就此结束。

1848年7月20日《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刊》

第16号

^① 这个决议作出以后，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便开始讨论旨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财富的各种政治思想题目。有关机器的作用问题的讨论，见文件280。不久以后，《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就成了讨论的基础，参看文件289。

关于卡尔·沙佩尔在科伦工人联合会作报告的报道

1848年7月17日

【……】接着，沙佩尔还谈到了机器的作用问题，内容大致如下^①：上个世纪在机器发明以前，行会制度占统治地位，在这种制度下，绝大多数人就像今天一样被奴役，绝大多数人都成了行会老板的强制或专横的牺牲品，同样，现在的工人则成了资产者老爷的牺牲品；但是，由于机器的发明，由于机器的发明而引起的分工，由于许多人挤在一个地方，使大家意识到，他们会从自然中得到权利，在人类社会中占有比现在更好的地位；意识到他们不仅不愿意用自己的劳动——他们（工人）的劳动报酬几乎还不够买干面包、土豆和破烂衣服，以致食不裹腹，衣不遮体，——为他们所谓的主人填满私囊，让他们任意挥霍浪费，而且还向生活提出“要求”，他们要求自己赖以生存的劳动得到保障。这个地球上的物质财富的分配迄今为止都是一种巧合现象，但是人的生命和人的整个本质太高尚，以致人们不能使之依赖于巧合现象，而我们的牧师们大约从一千九百年以来就向我们鼓吹的人人平等不是指虚无缥缈的彼岸，而必须在此岸实现。现在，机器给个别人虽然还会带来损失，但多数人现在已经从中得到了很大好处。

^① 参看沙佩尔1848年9月8日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文件293。

1.由于生产成倍增长。

2.由于铁路和轮船加速了产品和人员的运输。

但是，如果全部机器都成为国家的即所有人的财产，那么，就连个别人的损失也将得到弥补，而法国临时政府的失策就在于，它没有作价从所有者手中把机器接收过来，保持机器运转，它宁愿让工人在国家工场里从事不必要的或者不实用的劳动。

[……]

1848年7月23日《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刊》
第17号

节录

282

科伦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

1848年7月31日

[……] 公民莫尔说，由于时间关系，不能再继续为报纸承担责任了，并对该报第19号上刊登的一篇文章（政治）提出抗议。该文宣称，德国必须成为联邦共和国；它还宣称，当代最卓越的人物一致公认，德国的未来只有成为自由而统一的共和国，才能给人民提供保障。¹⁵²

公民泽尔霍夫指出，这家报纸通常可以销售1 400—1 500份，甚至1 800份，这是一股重要的力量，我们应该利用这股力量。但是，办一家报纸就得具备三个条件：（1）所有者，工人联合会本身可以担任；（2）编辑部，在此之前只是临时性的；（3）承担责任的保证人，刚才莫尔已经说过，不能再继续当保

证人了，因此，我们或者为此设立一个委员会，或者专门召开一次委员会会议，处理最重要的报纸事务。

公民莫尔接着提议在星期二召开委员会特别会议。〔……〕

公民贝克豪森宣读法兰克福工人联合会¹⁵³对法兰克福手工业者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旨在恢复旧行会制度的各项决议¹⁵³提出的抗议，并提议赞同这个抗议。

勒泽尔附议，并且说，手工业者代表大会通过的这些决议确实是由师傅们拼凑成的一大杰作，它们不仅想用强制手段恢复旧行会制度，而且还要更多更多的东西，师傅想取得一切，而帮工和学徒充其量只能成为他们的奴隶。接着，勒泽尔还宣读了这些决议中的几个条款，并提议，联合会应声明同意刚才宣读的抗议书的内容，并在我们的报纸上刊登。这个提议获得一致通过。〔……〕

1848年8月6日《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刊》

节录

第21号

285

科伦莱茵省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会议记录摘录

1848年8月13—14日

在执行法兰克福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6月14—17日）决议的过程中，鉴于莱茵区域委员会8月4日的呼吁书^①，莱茵省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于8月13和14日举行。参加这次大会的有：

^① 文件283。

- 1.科伦民主协会
- 2.科伦工人联合会
- 3.科伦工人业主联合会
- 4.佐林根政治俱乐部
- 5.杜塞尔多夫人民俱乐部
- 6.杜塞尔多夫民主君主政体联合会
- 7.克雷菲尔德工人联合会
- 8.凯特维希人民联合会
- 9.特利尔民主协会
- 10.多特蒙德人民联合会
- 11.哈姆工人联合会
- 12.科黑姆民主协会
- 13.莱茵河畔缪尔海姆工人联合会
- 14.鲁尔河畔缪尔海姆民主协会
- 15.波恩民主协会
- 16.巴门政治俱乐部
- 17.柏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联合会

以上各团体共派出40名代表。此外，参加讨论的还有其他一些没有受特别委托的民主主义者。〔……〕在是否准许威斯特伐利亚的代表出席大会的问题上，大会决议如下：因为在法兰克福莱茵省和威斯特伐利亚联合成一个区域委员会，柏林的中央委员会作为基本执行机构，不能违背当地各联合会的意志而把威斯特伐利亚分开；这两个省相互间发生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对威斯特伐利亚的民主发展产生影响，如果普鲁士脱离它的一些省，只会促进特殊的普鲁士主义，使威斯特伐利亚各团体拥有完全的表

决权。〔……〕

由区域委员会作为特别草案提出的问题：

1. 寻找途径和办法，使各个团体相互之间并同理事会建立联系，怎样才能促进各团体的形成；
2. 各团体如何对外开展活动；
3. 怎样筹集资金，应筹集多少；

接着，代表大会一致认为频繁的通信联系是彼此交往的直接手段，并一致建议通过民主报纸发表文章，责成每个地方联合会务必按月向区域委员会提交报告，区域委员会则务必对这些报告加以汇总和摘录，以通报各团体。①〔……〕

科伦代表沙佩尔说：他的联合会有7 000名会员，头头们现在身陷囹圄。联合会并没有参加间接选举。有人对联合会发出了可怕的吼叫。逮捕②并没有损害它的一根毫毛。一个主席总是可以找到的，他们必须把7 000人关押起来方能消灭这样一个联合会。联合会对法兰克福手工业者代表大会提出了抗议。③此外，它还通过各个分会和在销路很广的工人报纸④进行活动。在这个地区民主力量很强大。〔……〕

科伦代表沃尔弗说：我们对当前的法国已不抱任何希望，法国必须进行一场新的革命才能取胜。今天的宗教节日同德国的统一毫不相干，这是科伦的钱袋问题。科伦人是完全正确的。〔……〕

① 关于代表大会的决议，另见文件293。

② 参看文件272和277。

③ 参看文件282。

④ 《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刊》。

科伦代表恩格斯说：莱茵省的特点就是憎恨官僚的和典型的普鲁士主义；但愿这种思想能继续下去。〔……〕

有人以这里的工人联合会的名义提出下列提案：组织一个救济银行，（1）救济因民主倾向而遭受迫害者及其家属；（2）救济需要救助的正在旅行的民主团体成员。这个提案的第一点获得通过，第二点因经费有限、委员会手头拮据而遭到拒绝，让各个团体因地制宜地自行处理这方面的问题。

科伦民主协会、工人联合会和体操协会会员，公民尤利乌斯·赖布黑尔姆提交了一份书面建议：

“希望代表大会承认，最广泛地参与体操事业是促进民主的一个重要手段，因而决定，所有派代表出席代表大会或今后准备加入联合会总会的联合会应最有效地参与体操事业，并应在定期的报告中专门提及这个问题。”

多数人赞同赖希黑尔姆的建议〔……〕

1848年9月13和14日《新莱茵报》（科伦）
第101和102号

摘要

286

科伦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

1848年8月17日

记录宣读完毕以后，公民莫尔向全体与会者报告了警察当局对公民马克思和公民沙佩尔采取的措施，沙佩尔被驱逐出城。¹⁵⁴

根据公民诺特荣克的提议，大会任命了一个代表团，责成它

就这类警察措施向警察局长盖格尔提出抗议。当选为代表团成员
的有：公民泽尔霍夫、莫尔、沃尔弗、诺特荣克、卡克尔和勃鲁
姆。 [……]

1848年8月24日《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刊》
第25号

节录

287

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给柏林工人代表大会的信¹⁵⁵

1848年8月17日

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致柏林工人议会

德国国内外的各工人团体的代表呼吁举行大会，全面讨论工
人阶级的社会状况，选择最好的状况，然后安排必须采取的各项措
施，这一呼声也在我们的耳边回响。我们也乐于从我们中间派出一
名能维护我们的观点的代表去参加工人议会。不过，我们的协会目
前还不很强大，因而缺乏必要的经费。这样，我们就全权委托我
们先前的一名成员，斯蒂凡·波尔恩，代表我们参加工人议会的
各次会议，他非常了解我们的观点，我们完全信赖他。

工人阶级状况的改善问题，在法国和德国最近爆发的革命以
后，人们曾经专门加以考虑，可惜又完全被忽视了。资产阶级老
谋深算，虚伪地、偷偷摸摸地把我们工人用鲜血换来的自由据为
已有，它现在大权独揽，自命不凡，动辄压制并奴役无产阶级。
不过，我们工人也懂得从我们用高昂代价换来的自由中得到好

处，即出版自由和结社权，有了这两条，我们就能公开地讨论我们的利益，并在报纸上维护我们的利益；有了这两条，就使工人有可能在其状况和地位问题上了解到大多数工人至今尚未意识到的东西，即他们受苦受穷的根源，以及摆脱目前被奴役状态和资本统治、获得独立性的手段。

但是，我们仅仅了解我们的状况，仅仅清楚地懂得我们作为人应该像富有阶级即贵族和资产阶级一样得到这些享受和权利还不够，我们还完全有必要表明我们的行动，并相互讨论为达到我们的目的、达到共同幸福和改善无产阶级状况所必需的手段，然后将它们付诸实施。

柏林工人议会也就是为此目的在柏林召开的，可以预期，这次议会将指导整个德国的工人组织。

我们只要联合起来，就能做到一切；我们只要联合起来，就能战胜我们的敌人；而我们的胜利将会消除许多政治上的分歧。在结社权早已存在、社会问题已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法英两国，为我们的利益而开展的宣传鼓动多半由于它的领导人的过错而遭到了失败；缺乏完全一致的意见。

为了消除工人阶级的贫困状况，我们不揣冒昧向柏林工人议会提出下列首先导向我们目标的要求：

1. 国家应为每个工人的生存提供保障，最好建立国家工厂，使每个失业者能在那里得到生存保证。【……】^①

2. 建立国家工厂。

^① 由于篇幅有限，这里没有全文刊印一些要求的详细解释，特别是过于冗长的解释。

国家工厂主要用于保证每个工人的生存。工人不论干什么工作，都可能**有熟练和不熟练、勤奋和懒惰之分**，因为对于这个最后的阶级来说总会有刺激本身勤奋的手段的。为了获得这个议论那么多、许诺那么频繁、然而始终没有得到的**自由**，就有必要使**每个人都有同等的享受和权利，因而取得同等的报酬**。

3.工人结社，也就是说，我们不仅有权在任何地方集会，为我们的利益发表演说，商讨社会状况，而且还有权由自己承担风险建立一个商店（不管是什么商店），在这里，所有参与者必须为他们自己进行工作，并获得同等的报酬。为了使工人们中间的这种商业团体不再像以前那样，由于缺乏必要的预付资金而又受到资产阶级的压制，国家就得向它们提出保证并提供必要的低息或无息基金。

4.普选权，即直接选举。 [……]

5.调整十小时工作日。 [……]

为了使无产阶级充分获得由人权赋予它的享受，并且使它认识到作为社会成员所应有的地位，缩短劳动时间是非常必要的。即使今后随着工人人数的增加，每天的劳动时间可能是六七小时，但我们认为这在目前是不可取的，我们提议调整十小时工作日。

6.建立不受教会干涉的国民教育体制。 [……]

7.废除一切行会、垄断和特权。 [……]

8.取消工人阶级税、消费税以及一切强加给小农的徭役、什一税等等；取消一切间接的教会杂税以及婚礼费、洗礼费和丧葬费等等；征收累进所得税和限制继承权。 [……]

9.免费提供司法帮助。

10. 建立劳工部。 [……]

在我们面前只有两条路：或者不得不为生存而工作，或者不得不饿死，二者必居其一。但是，如果我们得不到工作，就应当甘愿像绵羊一样默默饿死吗？这个问题不需要专门回答，每个人都能理解。 [……]

但愿我们不久就能听到关于你们的活动和工作的喜讯，你们作为改善人类状况的倡议者，将在历史上树起一个比最伟大英雄纪念碑还更加引人注目的永久性纪念碑。

顺致敬意并紧紧握手！

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委员会

主 席 豪埃尔瓦斯

第一书记 施洛特曼

第二书记 布洛斯

司 库 施泰因根斯

图书管理

员兼秘书 勒德尔

1848年8月17日于布鲁塞尔

手稿

德累斯顿国家档案馆，MdI,Nr.11026a

节录

第一次发表

288

汉堡圣乔治工人联合会授予卡尔·毕林参加柏林工人代表大会的全权证书¹⁵⁶

1848年8月17日

全 权 证 书

汉堡圣乔治工人联合会委任约·卡·毕林为参加柏林工人代表大会的代表。

主席 卡·毕林

书记 莫·海尔曼

1848年8月17日于汉堡

手稿

第一次发表

德累斯顿国家档案馆, MdI, Nr. 11026a

289

科伦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

1848年8月28日

[……] 公民勃鲁姆通知说, 在沃林根也已成立一个联合会; 接着, 公民莫尔提议, 把过期的没有卖完的报纸免费转让给这个联合会和类似团体; 这一提议获得通过。

公民勃鲁姆接着又说，在下加塞尔^①也已成立了一个联合会；接着开始讨论社会问题。^②

公民勒维斯认为，如果优先考虑教育问题，那么，各等级之间的差别就会消失，从目前的条件看，达到这一点是不会有很大困难的，等等。

公民沙佩尔反驳说，前面一个发言人的观点是傅立叶主义的、慈善主义的容忍观点，资产阶级非常赞同这种观点，它同无产阶级势不两立，因此，我们也就针锋相对，也用同样的武器同资产阶级作斗争，一劳永逸地消除“把两颊送过去挨打”这种软弱的基督教的容忍态度。

公民莫尔补充说：提出这个问题，主要是指法国的情况。柏林的大臣们总是暗示法国的国家工厂，告诫人民容忍和仁爱，却没有采取任何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

公民弥勒认为，如果国家把铁路、运河等等收归国有，那么，许多东西都能有助于改善和组织。

公民威斯特曼认为，如果有朝一日人人都有工作，那么就不会再有竞争，但现在是人压迫人。

公民沙佩尔说：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这种情况只能延续到某一个阶段。如果所有制形式对绝大多数人不利，那么，这种所有制就必须采取另一种形式。封建所有制必须变为资产阶级所有制，同时设立把抵押地收归国有的机构，特别是向高利贷者

① 位于科伦以南的一个村镇。

② 从此，工人联合会开始讨论《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文件224），从1843年11月份起，讨论就带有系统性和计划性（另见文件303和309）。

征税，城市无产阶级必须建立国家工厂，但不是巴黎那样的国家工厂，而是每种手工业都必须建立自己的工场，比如巴黎的缝纫工场就是这样的工场。此外，国家必须没收一切停产的工场和交通工具，然后才能有所收获。[……]

1848年9月8日《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刊》

节录

第28号

293

科伦工人联合会全体会议记录

1848年9月3日

2时半，莫尔主席宣布会议开始。他说，召开这次全体会议主要是汇报8月13日在科伦这里举行的代表大会^①的情况。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一共有41位代表，他们分别代表16个团体。公民施奈德尔，即这里三个团体（民主协会、工人联合会以及工人业主联合会）委员会的主席当选为主席，特利尔公民席利和克雷菲尔德公民伊曼特当选为书记。

第一，威斯特伐利亚和莱茵省应该根据法兰克福代表大会的决议组成一个区域委员会，还是威斯特伐利亚应该根据柏林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单独组成一个区域委员会？这个问题留待即将举行的威斯特伐利亚临时代表大会去决定；但是，大家普遍希望这两

^① 参看文件285。

个省能组成一个区域委员会，以便消除这两个省之间存在的旧成见。^①

第二，会上就达到组织的手段和途径作出如下决议：每个团体必须每月同区域委员会通信，区域委员会必须每月同中央委员会通信，反之亦然；此外，竭尽全力支持公认的民主派机关报，如《新莱茵报》，揭露马虎了草的报纸，如《科伦日报》和《爱北斐特日报》，揭露反动派的一切卑鄙下流的造谣报纸；此外，各团体应负起责任，在本地区向农村发展，影响农民和工厂工人，在乡村创建联合会，并同它们保持定期联系。¹⁵⁷

第三，会上作出决议，向每人征收至少2分尼的人头税，三个团体的代表对此表示反对，其中有科伦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因为他们并没有从他们的委托人那里得到在这方面的代表权。趁此机会，我不得不再次谈谈已在工人联合会中重复过多次的一个提议，即我们应当取消自愿会费，代之以1银格罗申的强制性会费；像往常一样，我们从未说出一个确切的数字，总说工人联合会共有六七千人，而这是任何时候都能算清的；如果计算不出确切的会费数目，工人联合会就决不能干出什么大事来。因此，我再重复一次我的提议，工人联合会的每个会员每月应定期缴纳1银格罗申会费，其中2分尼上缴给柏林中央委员会。这个提议获得一致通过。

第四，代表大会决定，下次代表大会定于9月24日在科伦这里举行。^②

① 1848年9月10—11日，在比雷菲尔德举行的第一届威斯特伐利亚各民主团体代表大会否决了加入莱茵区域委员会的提案。

② 第二届莱茵地区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因九月危机和科伦省戒严，直到11月23日才举行。关于这次大会的决议，参看文件313。

公民们，反动派和警察当局及其帮凶对我们采取的种种措施，你们是知道的：公民哥特沙克和安内克银铛入狱已有两个多月；公民埃塞尔在明斯特被捕，案子一拖再拖，他坐牢也已一月有余，而如果按照上级警察当局的愿望，他们还得长期呆在监狱里，因为按照警察当局的说法现在还得审讯外来的证人。公民武尔夫也已坐了一个多月的牢^①，公民弗莱里格拉特上周被监禁。（在此，公民莫尔就派往杜塞尔多夫的代表团一事作了汇报，汇报的内容已刊登在本报上一号上^②）由于我们今天通过的关于缴纳固定会费的决议，代表大会决议中有一项决议已经开始生效，而现在对我们来说，关键在于使其他各项决议尽快付诸实施；如果遍布整个德国的民主派真正组织起来，那么，警察当局就可能要一个接一个地抓人，解散各个团体，限制报刊；而压制组织，它是不会得逞的；如果所有公开的团体都被解散，那么，组织将转入地下，继续存在，而这样一来，可能会使值得嘉许的警察当局感到头痛。进步是阻挡不了的。〔……〕

公民沙佩尔说：我作为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的一员，冒昧地为公民莫尔的讲话再作一些补充。代表们在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清楚地表明，民主派虽然在许多地方占居民的多数，但是，反动派仍然拥有强大的力量，一是因为他们的经费要比民主派雄厚，二是因为他们有官僚制度的强有力支持。因此，我们的任务是全

① 律师尤利乌斯·武尔夫是杜塞尔多夫民主人民俱乐部的主席，该俱乐部同科伦工人联合会的关系甚密，他于1848年7月被捕。

② 1848年9月8日《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刊》第28号就弗莱里格拉特因他的诗作《死者致生者》而于8月29日被捕以及紧接着在杜塞尔多夫爆发的抗议行动作了报道。为了向检察官提交抗议书，当时选出了一个由25人组成的代表团，其中有3名代表是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员。

力以赴，力争正义事业取得胜利。

我作为联合会的代表在大会上声明，工人联合会尽管有许多会员遭到迫害，但仍然很强大，而且像往常那样继续发挥作用，丝毫也没有因此丧失勇气。我相信，这些话已表达了所有与会者的想法和决心。（好极了！）

至于宣传所必需的经费，他们已经决定每个联合会会员每月缴纳1银格罗申会费。虽然我知道，无产者中有些人无力支付这个小小的数目，但是，我们多数会员还是能够而且将会做到这一点的。每月只要收入几千银格罗申，那么，我们不仅能为争取自由而坐牢的人及其家属以及逃亡的共和主义者提供资助，履行我们对中央委员会的义务，而且还能在有工人联合会的地方建立阅览室，摆上最好的报刊以及向无产者阐明其状况的著作。
[……]

让反动派再一次狂吼吧，我们知道，这是一条被踩掉脑袋的长虫的最后一次抽搐。我们并不沮丧，因为我们是大有希望的，我们有着光辉锦绣的前程。有些人会对你们说，世界上总有幸运者和不幸者、巨富和乞丐之分，就人们所了解的人类历史而言，至少是如此，而且这种情况将继续存在，你们无法改变它。请你们回答他们：是的，只要了解历史就会知道，当然总有一个或几个特权阶级对人民进行剥削，但是，我们要消灭的正是这种阶级统治，正是一小撮特权者对人民的这种敲骨吸髓的剥削，因为这是导致一切斗争、一切贫困的根源。[……]

有人还对我们说，资产阶级的剥削方式比骑士阶层的剥削方式更巧妙，更文明，我们则回答说：我们根本不愿意受任何剥削。如果人权取得胜利，阶级差别就将消失，继而我们的贫困也

将消失。到那时才会有真正的人的自由，而人民主权将不再是一句空话。我们只有自己帮助自己，上苍才会帮助我们。（好极了！）〔……〕

公民勃鲁姆再一次提议，每月举行一次全体会议。这个提议也获得一致通过。

来自杜塞尔多夫的公民福凯代表杜塞尔多夫人民俱乐部，为科伦工人联合会对诗人弗莱里格拉特的同情表示感谢，并告诫大家要紧密团结，风雨同舟。〔……〕

公民沙佩尔说，〔……〕刚才有人谈到，在科伦还有行会制度和同业工会制度的痕迹，请允许我就此再说几句。由蒸汽力推动的机器消灭了上个世纪的生产方式，开始了大工业。在尚未使用机器的商业部门，人们也同样开始了越来越多的分工，从而工序也日益简化，以致不久机器就能在到处或多或少地代替手工劳动。由于机器的使用，生产大大简化，价格大大降低，而产量却大幅度增长；当前的生产方式之所以产生有害影响，仅仅是由于它完全受资本的控制。现在是蒸汽时代，小资产者惊异地发现，他们的财产也成为蒸汽了，他们变成无产者已为期不远。可惜，他们鼠目寸光，不向前看，不同无产阶级联合，不建立劳动组织，而是向后看，死死盯住他们的行会制度这种已过时的东西。他们力图恢复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恢复他们的行会制度，想借以拯救自己。小资产者确实应该得到同情，他们得不到真正的尊重，大工业不久就将把他们抛入无产阶级的行列，那时他们将会得到尊重。〔……〕

1848年9月7日《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刊》

节录

第29号

294

巴黎德意志协会的呼吁书^①

1848年9月10日

巴黎德意志协会致德国民主派

兄弟们：

我们全神贯注、兴致勃勃地注视着你们为建立组织、通过任命一个中央委员会、为有效地开展组织工作所作的努力。我们立即作出决定，以你们为榜样，联合我们的力量，同你们建立联系。令人痛心的六月事件，对你们产生不无可悲的反作用，我们的决定也因六月事件而未能及时付诸实施。但六月事件并没有完全失败，几周以前，我们在巴黎又组成了**德意志协会**。^②

由于我们所处的地位，我们特别有助于在德法两国民主派之间建立联系，而这种联系至今完全被忽视了。如果反动派分裂莱茵河左右两岸德法两国人民的图谋暂时得逞，那么，这个短暂时间可能就会葬送正在形成的民族自由，因为在斗争时刻，欧洲民主的胜利取决于德法两国人民的联盟。

因此，我们将坚持不懈地努力，使这两个民族采取共同行

① 民主派各团体中央委员会在1848年10月12日的一封信中对这个呼吁书作了答复，该信载于埃·济伯纳编《莫泽斯·赫斯通信集》1959年海牙版第202—203页。

② 参看注150。

动，去应付这一日益迫近的后果严重的决定性时刻。我们指望你们大力支持我们的努力，同样，请你们拭目以待，我们有决心有热情随时用我们的全部力量为德国民主派效劳。

以德意志协会的名义：

谢尔策尔 工人。 赫斯 政论家。
雷哈尔德 工人。 艾韦贝克 医生。
莫伊勒 教授。 莱宁格尔 工人。
沙贝利茨 新闻记者。

1848年9月10日于巴黎

1848年9月20日《柏林阅览室》第217号^①

295

科伦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

1848年9月11日

[……] 公民勒泽尔请求联合会委员会邀请弗雷兴工人联合会参加定于15日在沃林根举行的民众大会。书记受托办理这件事。

公民德朗克发言：现在我们已达到了一个也许比有些人所想象的更重要、更富有成果的时刻。办事内阁已连同它那些造福于

^① 1848年9月24日《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刊》第34号也刊登了这个呼吁书，但删去了日期和签名，而且在文风上也作了较大改动。

世界的财政计划一起垮台了。但但是，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已经在达到我们预期的目的或者已取得什么成就；我们从来没有指望得到一个左派内阁。不，更确切地说，我们现在宁愿希望出现一个不属于议会，将由先前的那些人（如芬克等）组成的内阁。在这样一个内阁后面，专制主义将有恃无恐，横行无忌，飞扬跋扈，很可能借助波美拉尼亚的刺刀来解散议会，然后，王国和人民之间的斗争就将不可避免。也许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在柏林有人已经进入街垒，开始战斗了。

接着开始讨论社会问题，莫尔主席指出，建立劳动组织是否可能，这是我们悬而未决的问题。有人指责我们，主要是由于法国的国家工厂没有取得成功，并想以此证明，建立劳动组织是不可能的。

公民恩格斯就这个问题作了长篇报告。他的报告博得了热烈的掌声。[……]

1848年9月21日《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刊》

节录

第33号

297

科伦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

1848年9月14日

主席、公民莫尔没有出席会议，由公民沙佩尔代替他的职

① 参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办事内阁的垮台》，载于1848年9月10日《新莱茵报》第99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60—462页）。

位：他在宣读并通过上周的会议记录以后提出，必须邀请杜塞尔多夫人^①出席沃林根的民众大会。公民勃鲁姆本来要到杜塞尔多夫去，他愿意口头转达这一邀请，并在那里开展活动，从那里出发，在这个地区建立工人联合会。

接着，公民沙佩尔告诉与会者说，沃林根市长已向这里的警察当局提交一份标有“密件”字样的控告；市长在这个密件中写道：“卡尔·马克思还有其他一些人到过那里，这些人把整个地区搞得惶惶不可终日，侮辱尊敬的国王陛下，鼓吹可怕的共产主义；甚至散发写有17条共产主义要求的传单。”由此可见，3月18日和19日这两天是悄悄地从普鲁士警察身旁溜过的，因为这些警察似乎一直还不知道。他们曾一度为自由集会权提供了保障。[……]

公民沙佩尔告知与会者，现在许多反动报纸对工人联合会极尽蔑视和诽谤之能事。它们竟说什么：工人联合会已濒临彻底垮台的边缘，几乎都不存在了；而工人对此则漠不关心，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受骗上当了。因此，工人联合会感到格外高兴的是，我们通过成立安全委员会（它完全属于我们党）向全世界，特别向伪君子们无可辩驳地、证据确凿地证明，我们不仅还存在，而且全都知道了，什么时候开始行动，应该干些什么。

此外，沙佩尔还说：有人已产生这样的顾虑，工人联合会承认安全委员会可能使从法兰克福代表大会^②以来联合起来的各团体之间出现分裂。因此，他向联合会提出了下面这个问题：联合会

① 指杜塞尔多夫人民民主俱乐部。

② 第一届法兰克福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

同意不同意、承认不承认现有这种形式的安全委员会？

公民沃尔弗表示反对，认为这是多此一举，理由是，这一安全委员会是由5 000多居民选举产生的，理应把它看作是人民意志的真正表现。在他表态以后，大家不顾上述那个问题，还是一致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因而安全委员会得到了工人联合会的承认。

公民沙佩尔说：自从泽尔霍夫离开工人报领导岗位以来，就由他和公民莫尔共同承担该报的领导责任；他要求由另外一人来代替他负责编辑、校对、修改和发行，建议向他支付小额报酬，因为他每周要为此忙碌四五天。亚当建议，工人已经有工资，所以他应无偿从事这项工作。这一建议遭到否决后，大家一致同意把这一任务交给公民莫尔，并同意给他每周3塔勒报酬。^① [……]

1848年9月21日《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刊》
第33号

节录

301

约瑟夫·莫尔（伦敦）给科伦工人联合会的信

1848年10月10日

1848年10月10日于伦敦

这里可以说是路易-菲力浦、基佐、威灵顿、梅特涅和本生策划阴谋的大本营，这个可鄙的集团已经完成了一项任务，也就

① 关于对该报的领导，另见注152。由于九月事件，莫尔不得不马上离开科伦，所以他直接掌管编辑部工作只有几天时间。

是使人民演说家(给专制制度)尽可能少一些害处，取消出版和集会自由，再次收缴市民们手中的武器。其实，对科伦来说，这是一项多余的措施，因为普鲁士专制制度及其可鄙的同伙从未有过比科伦市民自卫军更好的帮凶，哪里需要禁唱刺耳的音乐，这位唐·吉珂德就挥着得心应手的刺刀，驱散兴致盎然、纯洁无辜的人民，人们经常可以在公开的酒馆里听到这帮流氓在无耻地吹嘘他们的英勇业绩，10个甚至12个武装的资产者袭击一个工人，把他打得遍体鳞伤，血迹斑斑；他们双手沾满工人的鲜血，然后把他带回哨所，以此炫耀他们的战利品。但是，由于有人侵犯人民的权利而使人民面露愠色的时候，掌旗人和大唐·吉珂德就声明无力建立安定和秩序，而所有的小商人则把睡帽向下拉，遮住自己的耳朵，并马上躲到床底下或钻进其他什么地方，再也不出来见见阳光，直到别人叫喊：小市民，交出你们的武器吧；但是，他们所办的事都办完了，他们能办的事，就是又交出他们最危险的玩具。要是不把科伦市民自卫军的不朽业绩载入史册，那可真是以怨报德。当然，个别例外并没有计算在内。他们的第二个任务（这个任务还没有完成，在完成这一任务时，这班先生们肯定要吹毛求疵）是，使德国普鲁士化，因此，他们任命了一个遇事只会说声“是”的老好人米歇尔^①为帝国摄政王。如果这个德国的米歇尔变成了普鲁士的米歇尔，那么，他就会大力地、一致地、坚决地依靠僧侣和耶稣教徒的支持，教训共和制的瑞士和革命的法国；这班先生们就是这样盘算的，但是没有老板。

如果联合会一个接一个地被镇压，人民演说家一个接一个地

① 奥地利大公约翰。

被监禁，而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又被完全取消，整个德国被宣布处于戒严状态，那么，埋在无产阶级，特别是农民这一块沃土里的种子就会开花结果；如果这帮歹徒及其僧侣、耶稣教徒、小市民、官僚和整个特权阶层只管挖掉和铲除这颗种子，他们就不会再有什么果实可以侵吞了；从蒸汽力发明以来，通过蒸汽，现在正取得进步，想要控制和阻挡它，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人民享受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时间并不长，但这短短的一段时间却足以使无产者和农民懂得，将来不让自己再受上帝、国王和祖国的愚弄和剥削，不再忍气吞声地挨饿，而要永不停息地向前进击，直到被迫同意给他们以权利或他们自己通过暴力取得这些权利为止；这短短的一段时间向他们充分证明，人民在没有表明自己是独立自主的以前，是不会有幸福的；人民将既不相信所谓的人民代表，也不相信所谓的牛皮大王和满嘴空话的民主派，这些人不论在什么时候，总是信口雌黄，说得娓娓动听，但是，一旦到了行动的时刻，需要他们用行动来证明自己早已说过的话时，他们就隐藏得无影无踪（谁觉得这顶帽子不合适，就不必戴它），只要人民不能独立自主地信赖别人，那么他们过去被人遗弃，将来还会被人遗弃。

兄弟们，因此，我们必须竭尽全力，组织起来，这样我们就能在短时间内同挥动魔棍的普富尔之流以及德国的所有霰弹英雄抗争；如果整个德国宣布戒严，你们就分成每19个人一组，把你们分到各个饭店里去，每周举行你们的例行会议^①，特别是每个

^① 1848年9月26日科伦宣布戒严时，所有“政治的和社会的团体”均被取缔，白天在大街上和公共场所举行的20人以上的所有集会，以及晚上、夜里在这些地方举行的10人的集会，均被禁止（1848年9月27日《科伦日报》第265号）。

星期天，你们可以下乡去，到附近的村庄去，在那里创建联合会，并使所有这些联合会建立联系，定期通讯，然后，在所有这些联合会中，每周或每月向每个人征收一定的钱额，以便支援那些在为我们的神圣事业坐牢或流亡在外的男人们的家属。

即使不能在科伦，即使不能在城市，你们也要尽可能经常在（科伦、维斯林根、缪尔海姆、下加塞尔等）的郊区村庄举行全体会议，力争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使你们受到教育，以便独立自主，认清敌友，区别牛皮大王和你们真正的朋友。请你们相信，再过一年，也许半年，你们就能收获这一组织的果实。

在英国这里，资产阶级取得了完全的统治，毫无顾忌地把人民演说家判处终身监禁，终身流放，他们竟恬不知耻地宣称，把充当反对人民的主要证人的那些家伙，把公开声明不信上帝的那些家伙，都收买来充当密探（这些人通常是不能作为证人出庭的）；但是，这里的资产阶级对此视而不见；不错，是诽谤人民之友的时候了；这帮恶棍多半都被多次判刑，他们公开声称，他们借口要办一件急事，把他们的武器交给诚实的宪章派暂时保存，然后把警察带到由诚实的宪章派开办的咖啡馆，在喝咖啡时，趁人不备，把火药和子弹放进杯子里。英国资产阶级政府就根据这样的指控判处被告终身流放。请看，兄弟们，这就是我们期望从无耻的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君主立宪制中得到的东西。

我希望而且也很可能不久就会回到你们中间，就此搁笔。

你们的忠实朋友

约瑟夫·莫尔

1848年10月19日《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刊》

第39⁴³

304

科伦工人联合会给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的信

1848年10月19日^①

致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获悉，我们的同胞和兄弟、这里的工人联合会主席约瑟夫·莫尔安康而愉快地生活在你们中间。你们对我们的兄弟、也是你们的兄弟、现正落入司法机关手心的卡尔·沙佩尔表示同情，我们对此同样感到非常高兴。

使我们欣慰的是，你们立即决定给予沙佩尔及其家属以全力资助。¹⁵⁸

你们把这看成是你们应尽的义务，不忘记遭到不幸的人民儿子；你们像我们一样，都是从同一种观点出发的，这些人必然得到党（他们属于党）的支持。

本工人联合会是用真正的民主思想武装起来的，在此，它为你们所给予的热情支持表示由衷的感谢。

敬礼并握手！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万岁。

科伦工人联合会

^① 在这封信上没有注明日期。它是作为10月19日委员会会议记录的附件发表的，报纸的导语指出：“下面这封科伦工人联合会的信是今天寄给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的。”（1848年10月26日《自由、博爱、劳动》第1号）。

代主席^① 公民格·勒泽尔

1848年10月26日《自由、博爱、劳动》

（科伦）第1号

307

社会问题委员会在柏林第二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上的报告¹⁵⁹

1848年10月30日

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坚信，解决社会问题，也就是说，要建立一种最普遍的物质福利和精神福利的制度，只有通过逐步的发展，只有通过整个文明人类的同心协力才有可能。现在这种少数人从精神上、肉体上奴役多数人的社会不平等状况，既不能依靠一次或几次强有力的飞跃，也不能依靠人们想在各种制度的呆板框框里描绘人类的整个发展来加以克服。单个人的或者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学派的聪明才智和不懈努力，都不能成功地开创可以称之为一切人道的最终目标的那种社会状况，也就是说，开创这样一种状况，在这种状况下，每个人都能具备满足自己的精神需要和物质需要以及发挥自己的全部才能的一切手段。达到这个目标，乃是几代人的使命，而且将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协作的结果，是一个几代人的组织的结果。社会问题不能通过命令来解决，只能是

^① 从10月16日起，卡尔·马克思就已担任主席，而这事在工人联合会于10月26日全体会议才获得批准，但马克思没有出席10月19日的委员会会议。

一种独立的、通过人类之树上的一切力量的共同协作而富于生气和精力充沛的发展的结果。

同时，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同样也坚信，提出一些普遍原则，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指导性原则，今天已经是时候了，今天已经有可能了，因而也就成为必要了。通过对这些原则的极其广泛的宣传和非常透彻的讨论，才有可能在多数人中间产生这样的思想和想法，因此，才能出现为建立渴望已久的平等和博爱的制度所必需的相应步骤。同样，代表大会还满怀信心地认为，一些实际步骤，即那些指导性原则的自然结果，今天就可以而且必须被看作是首要的绝对必不可少的步骤，民主共和国成立以后，如果出现解决社会问题的苗头，就必须立即采取这些步骤。代表大会并不隐瞒，那些指导性原则并不是以迄今为止的历史权利和私人权利为基础的；而那些措施在深受其害的人们眼里似乎是专横的极不公平的措施。但是，代表大会觉得自己更坚强了，它深信，同从各种各样的征服和压迫中产生的社会的和所谓合法的现状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恰恰就是解决社会问题、建立真正的人类状况的首要的、必不可少的步骤。代表大会要发挥自己最大的智慧和才能为各民族绝大多数人谋福利，并且认为，现在还不能讨论占有地球上全部地产达几百年之久的一小撮人的利益，应当讨论的问题是，如何使绝大多数迄今一直是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人的权利和人的尊严不受侵犯。人民的幸福就是最高的法律。

在这些观点的指导下，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提出以下原则，这些原则在将来改造社会制度的过程中必须发挥决定性和指导性作用。

1.土地是人类的共同财产；它现在的开垦和耕种状况不是个

别人努力的结果，而是全人类旷日持久的共同努力的成果。因此，任何人都不能享有土地所有权。耕种土地的人有权占有同他本人及其家属的生活必需品一样多的土地产品，多余部分归全体人民所有。因为任何一种人的劳动都不是个人的劳动，更确切地说，每一种劳动都是社会劳动。也就是说，每个个人的劳动能提供较多的产品，因为它是得到全体人民的劳动的支持。

2.总的说来，所有制并不是私法的关系，而是一种社会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一种国家法的关系。一切所有制关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都服从于一种由社会内部的每次阶级斗争所制约的社会变更。现代资产阶级私有制是以阶级对立、少数人剥削多数人为基础的产品生产和产品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善的表现。所以，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旦有利于前者——这个时刻一到，我们才能进入一种新型的社会状况，——现在的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就会自行消亡。然后我们便将从私有制进入公有制。但是，在这个时刻到来之前，通过一些准备措施削弱和限制以剥削群众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所有制仍然是革命政党的任务和义务。

3.人人完全平等，人人有权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充分发挥自己的物质才能和精神才能。只有这样一种状况，即既没有物质特权也没有精神特权的状况，才是一种真正的人类状况。

4.人人承担同样的义务，通过自己力所能及的劳动促进社会资本的增长。谁不愿意劳动，谁就无权满足自己的需要；只有生产者才可能是消费者；个别人游手好闲，就是对所有人的不公平。

这些原则同下列实际措施和法律是相适应的，民主共和国诞

生以后，如果要实行帮助大多数受苦受难的人的事业，就必须立即颁布上述措施和法律。

(1) 变贵族地产和其他封建地产（如长子继承权）、一切矿山、矿非等等为国家财产；至于私人的矿山等等，应向私人支付其资本价值的4%，作为20年的租金；这些地产一般都应用现代科学的辅助工具进行耕种，使全体人民得益；

(2) 在租赁业发达的地区，应把地租或租金作为赋税上缴国家。原来的土地所有者既非农民又非租佃者，根本不从事生产，所以他们的消费纯属滥用；

(3) 建立国家银行，代替所有私人银行，国家银行的纸币是法定流通的纸币。这条措施可以为全民利益来调整信用业，从而埋葬大金融家的统治。由于国家银行逐步用纸币代替金币和银币，所以纸币就使得资产阶级必不可少的交往工具，即一般的交换手段更加便宜，并且它还允许让金币和银币对外发生作用。最后，为了使保守资产者的利益与革命结合起来，采取这条措施是必要的；

(4) 所有交通工具，如铁路、运河、轮船、公路、邮电等等均由国家掌握，使之变为国有财产；

(5) 限制继承权；

(6) 实行高额累进税和废除消费税；

(7) 全体政府官员的薪水应一律平等。除了带家眷的那些官员，也就是说，需要比较多的官员，应有比其他人有更高的收入，但这一切在共和国成立后的最近25年还应进行修改；

(8) 政教完全分离。各教派的神职人员仅在他们自愿所在的教区领取薪金；

(9) 免费提供司法帮助；

(10) 实施普及的免费的国民教育；

(11) 对所有的人都一律实行劳动义务制。取消现有的常备军；由于实行全民武装，设常备军已没有必要。但是，只要中欧的政治局势使德国仍然需要常备军，那么，就必须注意这样一点：军队同时是劳动大军，因此军队不再像以前那样光消费，而且还能生产出比它的费用还要多的东西。这一点也是组织劳动的一种手段；

(12) 建立国家工厂。国家保障所有工人的生存，并负担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的生活。这样做符合整个德国的利益；尤其为了德国无产阶级、小资产者和农民阶级的利益，必须全力以赴地为实现上述措施而工作。因为只有实现这些措施，在德国迄今受少数人剥削、（而且还有人还想继续压迫）的千百万人，才能取得他们作为财富的创造者应得的那种权利和权力。

委员会提议，代表大会把这个声明当作自己的声明，分送民主总会的各个协会进行讨论和评定。

社会问题委员会

1848年10月30日于柏林

《柏林第二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的讨论》（约·许纳曼和亨利希·贝纳恩编《人民报》附刊）〔未注明出版日期，柏林版〕第28—29页

308

海尔曼·艾韦贝克（柏林）给莫泽斯·赫斯（巴黎）的信¹⁶⁰

1848年11月1日

1848年11月1日于柏林

亲爱的：

直到今天我才片刻的空闲坐下来写信告诉你，柏林正在一个火山口上保持平衡，处境危险。昨天晚上就已发生骚乱，人民要绞死几个右派的代表人物，这时机器制造工人出面调停，市民自卫军的一名上尉为了感谢机器制造工人，砍去了他们中一名工人的一个手指，砸破了另一个人的脑袋，这个人当天夜里就一命呜呼了。而市民自卫军仍然不被看作是敌视工人的。

我对我所需要的一切人都说了；德斯特尔对同盟中央委员会的迁址甚为不满，并恳求我暂时让它留在原地，即伦敦（或者科伦），等到即将召开的共产主义者代表大会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再说。共产主义者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据说在柏林召开，这一点他觉得非常合适。此外，我在同海尔曼·克利盖谈话时发现，他为了不使用一个比较生硬的字眼，而显得出奇的外交式的冷静，我也就对他听之任之。详情恕我面告。此外，我在归途中才可能同马克思会谈，去时我简直一点时间也没有。我在科伦没有停留，因此连你给安内克夫人的信也没有转交。科伦的夜简直是

漆黑的，只有魔鬼才能辨别方向；何况我已精疲力竭，饥肠辘辘。由于你没有给我预订旅馆，所以我在一家饭店里大嚼了一顿贵得出奇的晚餐后就匆匆赶路了。现在德斯特尔为我订了一个廉价的房间，我将在科伦呆一天一夜。德斯特尔还迫不及待地请求我想方设法在马克思面前说一些友好的话，严肃地提醒他注意：他对恩格斯的同情带有危险性。因此，应该立即把这个意思从巴黎写信告诉伦敦方面。共产主义者代表大会**必须在四周内举行**，而且在这里举行。也应该给那些山区（拉绍德封等地）写信，以便防止恩格斯的**各种花招**；在我离开巴黎的那天晚上，我还给你发了一封信，谈的也是这个问题，想必你已经收到了。因此，在我回来之前，你**不要**拿着这两封信在那里干等。

我在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上取得的成果已摘要刊登在10月31日《柏林阅览室》附刊上，这是我亲自交给该报的^①；对此阿·卢格老爷子强压着我的怒火，**什么也没有**说。在这里，只有《阅览室》[可供]^②我们利用；它曾向我预约过巴黎的通讯。^③

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现有德斯特尔、爱德华·赖辛巴赫伯爵和赫克萨默博士三人组成，再多我们不想要；但是，通过我们坚定的党的通力合作，安内克、哥特沙克、拜尔霍费尔、施纳克、埃

① 艾韦贝克在柏林第二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上首先宣读了法国、意大利和波兰三个民主派委员会的贺信，他在他提到的通讯中也谈了这件事（1848年10月31日《柏林阅览室》第252号）。

② 原件缺损。

③ 《柏林阅览室》因柏林实行戒严，被迫停刊，因此，建立通讯联系的计划没有实现。

尔贝当选为后补委员。恩格斯和马克思没有当选，这是不言而喻的。只有鲁普斯^①得了很多选票。

致安

又及：

把奥尔德和格雷哥里赶出去。^②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F.20,op.1,Nr.154

309

科伦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

1848年11月2日

[……] 公民诺特荣克作关于当前的政治问题的报告。

然后开始讨论社会问题。公民罗斯、赖夫、诺特荣克、卡斯勒尔、贝多尔夫、勒泽尔和森格尔讨论了关于“德国宣布为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这一条款。[……]

1848年11月9日《自由、博爱、劳动》

节录

(科伦)第5号

① 威廉·沃尔弗。

② 这两个人的名字字迹不清。

310

科伦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

1848年11月6日

[……] 公民博伊斯特简要地报告了柏林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的活动情况^①，并对这次代表大会没有全部完成自己的任务表示遗憾。他说这要归咎于许多出席大会的立宪派。

主席马克思博士扼要地报告了维也纳事件的经过，并且特别强调指出，只是由于维也纳资产阶级屡次叛变，文迪施格雷茨才得以夺取该城 [……]

1848年11月12日《自由、博爱、劳动》
(科伦)第6号

节录

311

卡尔·毕林受德国工人汉堡地区委员会的委托给莱比锡中央委员会的信¹⁶¹

1848年11月12日

1848年11月12日于汉堡

^① 参看文件307。

致中央委员会

以前，我们在缴纳会费和呈送报告方面都没有尽到我们的责任，这完全是由不利的地方关系和由此开始滋长的思想混乱造成的。但是，现在我们可以令人欣慰地告诉你们，在鞋匠、雪茄烟工人、裁缝、钳工、木工、海员、石匠、抹灰工、圣乔治工人联合会、车辆厂工人同我们联合成完整的团体以后，就能指望，不久将使汉堡的所有工人站在一起，形成一个巨大的兄弟会，使各地的工人兄弟握手言欢，并使之结成一个坚强的严密阵线，它将一劳永逸地消灭工人阶级甚至全人类的贫困和苦难。

遗憾的是，一个令人瞩目的团体，即印刷工人公会，不久前还作了那么可贵的努力，但至今并不赞同我们的目标，尽管我们提过多次要求。不过，我们希望印刷工人们也会明白，大家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得到幸福。

你们要求我们坚持不懈，奋勇前进，对此我们谨表谢意，但是，我们也向你们保证，各地的工人可以相信我们，我们汉堡工人深知我们组织及其使命的尊严和重要性，我们大家将永远高举我们这面旗帜，直到剩下最后一个人。同时，我们请求你们以整个兄弟会的名义向遭到打击但没有被战胜的维也纳的兄弟们，为他们的英勇而高尚的牺牲精神，公开转达我们的敬意，并请求你们向他们保证，他们的敌人也就是**我们的敌人**。[……]

手稿

德累斯顿国家档案馆，Mdl,Nr.11026a

节录

314

海尔曼·艾韦贝克（科伦）给莫泽斯·赫斯（巴黎）的信

1848年11月14日

1848年11月14日于科伦

亲爱的：

我现在忙得不亦乐乎，在拼着命干，坐在马克思身边，在报纸编辑部办公桌旁看校样，每晚都看到1点半，今天我看还有点时间，便提笔给你写这封信，因为我（刚刚到达，并希望明天能起程前往巴黎）听说，哲学家沃尔弗^①在巴黎。至于我们协会^②该怎样对付这个人，我就用不着跟你多谈了。在这个时刻，我也许有必要在巴黎，以便这位哲学家尽情地倾泻他的满腹老骚和风言风语；因此，我要赶往巴黎。直到现在，我之所以未能早些到巴黎，因为柏林把我困住了，并且我还必须在科伦呆一天，尤其明天，马克思被传讯^③，有被拘留的危险。

柏林城由于实行戒严，已完全弗兰格尔化了^④，这关系到共和国还是哥萨克主义。

① 可能是斐迪南·沃尔弗。

② 巴黎德意志协会，参看注150。

③ 马克思是11月14日被预审法官传讯的。由于艾韦贝克是在夜里写这封信的，所以错写了“明天”；关于这封信的日期，他开始也是写的“11月13日”，后来才改为“11月14日”。

④ 影射冯·弗兰格尔将军，是他宣布柏林戒严的。

消除沃尔弗的一切影响，别让沃尔策尔和其他人听他的那一套。他似乎同马克思有书信往来。马克思十分爱慕恩格斯，把他誉之为“在精神方面、道德方面和性格方面”都是很出色的人物。马克思说，这个恩格斯为了美好事业现住在瑞士¹⁶²；——

祝好！

又及：把附件马上寄来。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F.20,op.1,Nr.155

316

科伦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

1848年11月16日

宣读并通过上次会议记录。

为了民主，为了我们的美好事业，许多会员特别要求下乡活动，在那里进行宣传，为此目的，星期日大家分头奔往各地，而且从下星期日就开始。这个提议获得一致通过。

勒泽尔主席将莱茵省同西里西亚作了一番比较，他感到遗憾的是，在莱茵省，民主赖以存在的基础还是那么薄弱，而在西里西亚，全体居民都非常喜欢民主的原则。

公民卡斯滕斯^①说，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西里西

^① 弗里德里希·列斯纳为逃避兵役而用的化名，因此，他于1848年夏天从英国回国后一直沿用这个名字。原件上为：卡斯滕纳。

亚、饥饿和贫困已经由来已久，而且变本加厉，迫使人们认真思考。

我们的卑下资产阶级虽然已经实现自己的夙愿，即确立了用大喊大叫要求到的“宪法”，但它有朝一日遭到大工业的压制和“自由竞争”的排挤，那么，它也就会认识到自己的真正立足点，就会毫不迟疑地走到我们党一边来。

公民罗斯扼要地概述了当前的政治问题。然后便进行社会问题的讨论；而公民迈耶尔、罗斯和森格尔还进一步讨论了共产党的要求的第1条。^①

随后，会议结束。

1848年11月19日《自由、博爱、劳动》

（科伦）第8号

318

科伦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

1848年11月23日

[……] 公民丹茨认为，现在已经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不能再迟疑了，工人现在必须争得自己的权利。他指责科伦人太掉以轻心了。

公民勒泽尔对此回答说，工人党还在孤军作战，并且为了我们的特殊利益，现在还不是行动的时候。他说，现在，各党派应

^①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文件224。

该联合起来，反对专制制度。在科伦这里已从全体人民中选出了一个二十五人委员会，其中有各党派的代表，这样做也是为了争取信任。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采取必要的措施，就是否采取行动，何时采取行动，以及采取什么行动等问题作出决议。这个委员会在这里虽然几乎根本没有得到有产阶级的支持，但是，他认为大家对它至今所做的工作是满意的。

公民罗斯也发表了类似的意见，他认为，未加考虑的草率行动只能给事业带来危害。他提到杜塞尔多夫，那里的情况原先看起来对我们的事业是很有利的，可是现在却不能采取有力措施，而必须对全省人民做更多的教育和启迪工作，为此，在农村开展活动尤为必要。

公民勒泽尔还说，在这里举行的莱茵省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也认为这后一点是当代的主要任务，大家取得了一致意见，以各个联合会所在地为出发点，派特使到农村去，设法也在那里传播我们的思想。

接着，主席、公民沙佩尔发言，主要内容如下：

目前，这里并不是多说话的场所，因此，我们现在必须在农村开始行动，使我们已经接受的思想也在农村得到传播。

但是，我们应当牢记，目前，德国有三个相互对立的派别，即贵族和封建统治的天赋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只有在共同反对第一个派别，即贵族和专制制度的时候才实行联合。推翻了贵族和专制制度以后，它们便分道扬镳，因为它们的特殊利益是冰炭不相容的。

专制制度带着一种空洞的光环，带着以前的、如今已一去不复返的时代的微光，在权势欲和复仇欲的驱使下竟，敢一意孤

行，丧心病狂地解散柏林议会，逮捕议员或者甚至根据紧急状态法对待他们，那么，全国就会举行起义，各党派就会联合起来，而将永远把它消灭掉。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想同专制统治作斗争；前者试图按照自己的利益实行统治，而后者则试图开辟这样一条统治途径，在这里不再有任何党派利益，而所有人只要活着就一律平等。

但是，资产阶级是有理由同封建政府、贵族作斗争的，并使贵族屈从于资产阶级，同样，我们也要同资产阶级作斗争，并使它屈从于整个人类，因为它代替世袭贵族和金融贵族，只能说是换了一个反动的统治，但并没有消灭这种统治。

而当代的伟大任务是，不仅要推翻封建的、专制的统治，而且还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金钱的统治；这个任务并不是很快就能轻而易举解决的。

不过，我们不用怀疑，这个任务终将得到解决。德国人，一个拥有4 000万人口的民族不会永远容忍200万有产者的剥削和榨取。

我们可以相信，在这个地球上的所有人都取得权利和正义以前，就既不会安定，也不会安宁。（鼓掌）〔……〕

1848年11月30日《自由、博爱、劳动》

节录

（科伦）第11号

319

雅科布·沙贝利茨（巴塞尔）给莫泽斯·赫斯（巴黎）
的信

1848年11月25日

1848年11月25日于巴塞尔

亲爱的赫斯：

〔……〕艾韦贝克现在在巴黎吗？我很想也给他写封信。感谢你给我提供了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消息；恩格斯的情况，我一点也不知道。如果他在瑞士，想必很安宁，否则我就会知道他的居留地。我一旦得到他的消息，就马上告诉你们。〔……〕

为了消除我的忧郁情绪，为了尽力为我们的事业工作，我就要以盟员的身分加入爱国者联盟和格留特利联盟^①，这一点我必须告诉你，以便通知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两个联盟都是由优秀分子组成的。甚至在工人盟员较少的爱国者联盟中也尽是能干的激进分子，他们谈到无产阶级时都肃然起敬，所以该联盟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比如主席和副主席，后者到维也纳以后就向大学生和工人，向热血沸腾的人民发表了慷慨激昂、富有进取精神的祝词。格留特利联盟的情况还要好，它有70多名成员，其中大部

① 格留特利联盟是瑞士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组织，是作为手工业者和工人的教育协会于1838年建立的。“格留特利”一词是强调该组织的瑞士民族性。
——译者注

分，更确切地说，十分之九是工人。这个联盟组织得很好，在瑞士和国外有20多个支部；只是在它的章程中存在着利己主义原则，只吸收瑞士人参加。现在我正在不停地填鸭式地向他们灌输博爱精神，但我不敢肯定能不能消除那种规定。在此期间，他们已经不完全反对非瑞士人了，比如在司徒卢威的志愿部队向巴登进军时，他们为此制造了几千发子弹。因此，我满怀希望。

下面就来谈谈“德意志协会”吧！因为我知道有这么一个组织，所以我打算去看看，那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时德国的梅特涅（他也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正好来找我，向我打听德意志协会的地址。我当然愿意陪他一同前往，我们是星期一即11月13日去的。我们发现那里约有15—18人，他们小心翼翼地接待了我们；我立即发现，他们中间几乎没有一个是工人，我也不抱太大的希望；说真的，他们的讨论简直索然无味，而且一点不庄重，没有一个人站起来说话，也不脱帽。这虽然是形式问题，但他们伤了我的心，因为我在伦敦和巴黎我们协会的会议上看到的都是端庄文雅的举止。梅特涅对这种讨论也感到不满，因为他以民主派中央委员会成员^①的身分果断地向他们提出了质问，同情协会事业的人为何这样少，等等。我也发了言，我说，我虽然是瑞士人，但我在伦敦是成员^②，在巴黎甚至还是德意志协会的主席，因此我不揣冒昧地问一句，在一个像巴塞尔这样的城市，为何只有15—18人组成一个德意志协会，那么多工人都上哪里去

① 梅特涅是第一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任命的临时领导机构的成员之一；另见看注145。

② 指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成员，沙贝利茨是在1847参加该协会的；另见注95。

了。总之，我严厉地斥责了他们，特别是由于当时正在讨论的一个问题也给我提供了斥责的材料。他们请求原谅，说什么会员人数少是最近巴登起义遭到失败所致，因而许多人被驱逐出境，许多人被吓破了胆，等等。最后，协会主席表示愿意以协会的名义邀请我作为来宾继续出席他们的会议，因为他们只接收德国人为其会员。尽管我本人不太愿意，但这是我应尽的责任，每周出席他们的会议，以便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如果你想详细了解在瑞士的各个德国团体的组织情况，可以直接写封信给“巴塞尔金羊旅馆的德意志协会主席（卡·盖特）”。因为据我所知，他们同瑞士的其他联合会建立了联系，并通过了据说是你们寄去的章程，其中谈到了“总区部和区部”等等。

请你经常来信谈谈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情况，过不久，我想把一些精干的人，不管是德国人还是瑞士人，组成一个（混合的）支部。〔……〕

埃德蒙·济伯纳编《莫泽斯·赫斯通信集》1959年海牙版第210—213页

节录

322

卡尔·布龙^①（汉堡）给约翰·菲力浦·贝克尔（俾尔）的信

1848年12月2日

① 这封信的落款是“利布林”。当时，布龙为了躲避警方和法庭的追究，借用了—一个科尔马人的名字：约瑟夫·利布林；另见文件381。

2月2日于汉堡

亲爱的普拉格曼：

10天前我从柏林回到这里^①，我是去那里参加民主派代表大会的。可惜我是在回来的时候才收到你的来信，因此，我在柏林没有顾上把这里的情况告诉你。赫克萨默虽然非常了解我，我们俩几乎天天见面，但是，就连他也没有向我表示他对“自助者”¹⁶³的看法；我同各地来的许多人关系都很好，因此，我要是早点收到你的来信，就可以向你谈很多情况。这次代表大会的讨论情况和取得的成果，你们可能已经知道了，因此，我的汇报也许来得太晚了；由于德斯特尔和赖辛巴赫被选人中央委员会，我们已获益匪浅。现在经常发布民主通告信，向各团体报告我们的事业的进展情况。〔……〕

“自助者”在这里和其他地方发展很顺利，甚至已发展到军人中间去了。不过我了解得还不充分。在这里我还遇到了另外一个团体，而且也具有同一种倾向，这个团体是由伦敦方面领导的，伦敦派来的一名特使^②先我几天到达柏林，他现在到东北地区去了，我将设法让他到你们那里去一次，以便亲密无间地联合起来；我是该团体的成员，现在正在为它工作，也就是说，为它物色成员。不过为联合一事¹⁶⁴还要给伦敦写信。我如果有钱就到你们那里去，然后再去伦敦。〔……〕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F.185，Nr.48/2

节录

第一次发表

① 布龙没有直接从柏林回去，而是先从柏林前往梅克伦堡。

② 很可能是指约瑟夫·莫尔。

323

A. 里德尔（列日）给卡尔·马克思（科伦）的信

1848年12月5日

1848年12月5日于列日

亲爱的马克思：

我以列日德国工人社会主义者俱乐部的名义随信给你寄去……^①以供民主派中央委员会使用。

祖国已经得到拯救！！最近一周来，列日这里成立了一个“讨论祖国利益”的联合会，由亚琛的伊比尔特或者伊贝尔茨^②教授（？）任主席；这件大事已在四家报纸上公布！我还没有加入这个联合会，但一些工人对我说过，这个联合会丝毫不为工人着想；有人说它似乎是阅读《科伦日报》社论的场所；我还要告诉你，你身体这样安康，并给我寄来报纸¹⁶⁵，对此我非常高兴。我在一个师傅那里工作刚刚一个星期；到目前为止，我手头一直十分拮据。如果再工作一段时间，我将尽力设法攒一笔钱，偿还我的债务。

① 这里删去的是一笔款子的数目，即9法郎50生丁。这是在该信脚注中给以补充的；从该脚注中可以看出，里德尔因付不起邮费而只想先寄出全部款子的一部分。这条脚注后来又被删掉，最后寄出了2塔勒13银格罗申，该信同时又是汇票，参看本卷第624页注①。

② 这里有一条边注：还有弗里德里希博士？

向你全家以及其他熟人致意。

A.里德尔

为了节省邮资，我暂时将这封信寄往**欧本**；随信寄去9法郎50生丁，邮资已付。^①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第一次发表

档案馆，F.1. op.5, Nr.181

326

弗兰茨·施彭格勒（慕尼黑）给格奥尔格·基克（莱比锡）的信¹⁸⁴⁸

1848年12月17日

1848年12月17日于慕尼黑

亲爱的基克先生：

[……]在我已经看到在联合会内部尽快地向会员们阐明真正的社会原则并把他们造就成这个原则的拥护者都是不可能的以后，一些社会主义者（其人数当然是很少的）就组织了一个俱乐部，表示支持联合会，在联合会讨论社会问题时，他们就在那里参加讨论，以便尽快传播这种原则。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举行

^① 信封上注明：“随信寄去2塔勒13银格罗申”。这笔汇款记在柏林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的收入栏内，《新莱茵报》（1848年12月16日第170号增刊）宣布：“列日德国工人联合会寄来2塔勒13银格罗申”。

三次会议，我在联合会中就遭到了指责，说什么我想搞垮联合会，甚至还有人说什么，这样的会员离开联合会倒是好事。这两个例子也许可以说明这里工人的情况。这里工人组织发展缓慢。裁缝、木工、五金工人、旋工、制皂工人、鞋匠都已加入组织。他们每星期一举行会议，下周各地的代表将要集会。在组织方面，任何一个城市都不像这里有这么多的障碍，而在协作方面的障碍则更多了。[……]

手稿

德累斯顿国家档案馆，MöI,11026a

节录

第一次发表

327

奥古斯特·格贝尔特（伯桑松）¹⁶⁷ 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伯尔尼）的信

1848年12月21日

1848年12月21日于伯桑松

亲爱的兄弟：

我离开巴黎以来，前几天才第一次听到关于你的点滴消息，也就是说，是通过施洛特尔贝克了解到的，他和你是同时到达伯尔尼的^①；他的信虽然不是直接写给我的，而是写给军团的，他

^① 弗·施洛特尔贝克和格贝尔特都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前者以拉绍德封工人联合会代表的身分在伯尔尼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上会见了恩格斯。格贝尔特把自己的信寄给了施洛特尔贝克，后者又把它转给了恩格斯，参看文件329。

在信中说你是洛桑的代表；他没有详细谈及代表大会的讨论情况，只简单地说了说大会的议程。

自从我们分别以来，当时曾有许多人表示怀疑的某些情况，如今已发生了变化；就是我当时也不相信，事态在今年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不过，综观所发生的一切，就是缺乏行动，或者说，在此以前总还是缺乏这种行动（有力的行动）。你也许还记得，今年年初伦敦中央委员会的一份通告信^①中说过的话，任何时候，同盟都应该抓住它所遇到的每一个时机，用行动来证明早就说过的话；而今年春天就有过一次机会，我当时在纳沙泰尔州，这你是知道的，在那里我们大家都满腔热忱地同情纳沙泰尔革命。^②这次革命结束以后，巴登起义开始了。我们全部有战斗力的人也都对此感到欢欣鼓舞，首先是发自内心的激动，其次是由于巴黎的一封来信，信中要求我们把自己武装起来；但几天以后，我们收到了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信中不同意我们参加实际行动。不过，第一封信来得太迟了，而第二封信又违背了我们的信念，如果我出面阻止，人家就会把我看成是叛徒；后面一点我当时就答复了巴黎，而对方回信要我们采取行动，这一点，我们也认为是对的，而且也是这么做的；你们那时要是领导了在巴黎的德国人，同我们一起在巴登开始斗争，那不是就更好吗？这样做，我们也许会取得更大的成果，领导在法国的德国人的那些人就不至于全是剥削者和胆小鬼，这些人只想在德国坐上共和国的安乐椅，唯独不愿为此献出自己的生命，因而一切都在倒

① 通告信没有保存下来。

② 1848年8月1日在纳沙泰尔爆发起义，宣布完全摆脱普鲁士的控制，并颁布了一个共和国的宪法。普鲁士到1857年才最终放弃它对纳沙泰尔的要求。

退。168

你对这件事的进程已了如指掌，所以我不想没完没了地向你唠叨，但是，我希望你仍然保持以前那种热情，因为现在首先必须聚集一切力量，使人们能够通过行动取得应有的权利；请愿、协商都是无济于事的，对此我们已有深刻的体会。因此，我们应当设法在各联合会内部使一切有战斗力的人尽到自己的责任，投身于未来的斗争，而且要建立这样的组织，从每10人或20人中选出一人来管理一些小事，再由他们中间的10人中选出一人。这样可以保持经常联系，重要的是，人们在关键时刻可知道自己拥有的实力。这一点以往总是做得很不够，总是一味相信：人们在必要时能尽到自己的本分。只有我们知道：应当怎样同这样一支非正规部队去周旋；每个人都想发号施令，就是没有一个人服从整体。因此，在瑞士只能这样来处理这个问题，知道确实拥有多少力量，因为各联合会对政治局势争论不休，同时像过去那样忽略了实际问题，这没有使我们达到任何目的。因此，我们直接向人们指出，他们是什么人，应该提出什么样的要求；并向他们阐明，确保人的权利，不是靠什么变革，不是靠微小的改善，而是靠同等地参与各种活动，靠大自然和人的勤奋为所有人创造的同等权利；任何人都不能靠损害别人而使自己舒舒服服地过日子，每个人都必须为全体人的幸福作出贡献。这一点必须通过城乡各支部的联合来实现，同时统计出使每个支部像人一样生活所必需的东西。如果做到了这一点，委员会也就可以考虑到生产一切必要的东西了；这样一来，就不再有贫困，任何人都不必再为了生活而乞求于别人了。

我给艾韦贝克写过几封信，也收到了他的回信。军团向他提

出了建议，让他设法使法国的各民主协会同“自助者”^①联合起来；对此他回答说，如果在巴黎活动比较方便，他将尽力而为。我们同里昂（那里有一个相当强大的联合会）也有通讯联系；我们想尽力通过巴黎人和里昂人的帮助在法国所有比较大的城市里建立组织。因此，请你们在瑞士尽到自己的责任。我们这里的内部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大家每人每天都靠50生丁救济费生活。因此，我们必须支付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费用。在这里，150人还同我们生活在一起。此外，我们的情况，施洛特尔贝克难会告诉你的。

劳驾，请你在回信中谈谈柏林、科伦、伦敦以及整个同盟的情况，我对此了解甚少。我们军团中还有许多人想知道这方面的情况；波尔恩近况如何，我也很想知道。

希望尽快复信，向你问好

你的兄弟

奥古斯特·格贝尔特

代我们的司令官奥古斯特·维利希多多致意。

我的通讯处是：伯桑松的德国流亡者 奥·格贝尔特

手稿

第一次发表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F. 1，op. 1，Nr. 277

① 参看法163。

329

弗·施洛特尔贝克（拉绍德封）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伯尔尼）的信

1848年12月29日

1848年12月29日于拉绍德封

亲爱的恩格斯：

随信我把我们的格贝尔特的一封信^①寄给你，你知道，他现在在伯桑松。明天我想给他寄一份记录^②去，让他也了解一下这里发生的情况。

我们很想订阅《新莱茵报》，所以我请你尽快来信告诉我，报费以及寄到这里来的邮费一共需要多少钱。

此外，我还请你来信告诉我们，为什么两封信^③一封也没有在报纸上刊登。如果往后不再发表这两封信，请把它们寄给这里的联合会，顺便把苏黎世分发给各个联合会的书信登记格式一并寄来。劳驾，此事请你办理一下。

联合会的境况还算不错，只是还有一些家伙总是向往自由主义，但又羞于同其他工人交往，因此，他们为了挽救自己的那一

① 文件327。

② 指伯尔尼代表大会的记录。

③ 很可能是指伯尔尼代表大会通过的两封信，即给柏林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的信（没有保存下来）和给法兰克福三月同盟的信（文件325）。

套可怜的自由主义而企图怀疑我们。但遗憾的是，他们不得不感到羞愧，因为他们很快就会明白，他们不是民主派，总是停留在原地不动。

致敬并握手。

弗·施洛特尔贝克

你来信时，把信寄给洛克尔市太阳街的商人格茨或乌尔利希。

向所有的朋友们致意，祝新年愉快。

手稿

第一次发表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F. 1，op. 5，Nr. 183

332

约瑟夫·魏德迈（达姆施塔特）给卡尔·马克思（科伦）的信

1849年1月22日

1849年1月22日^①于达姆施塔特

亲爱的马克思：

下星期日，工人代表大会将在海德堡举行^②，人们非常急切地邀请我们参加。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德国南部工人们的表现，

① 信上注明的日期辨认不清，也可能是“1月23日”，但从信中提到1月21日举行的大会这一点看，该信是在“1月22日”写的。

② 参看文件335。

他们是否将完全放弃旧的行会杂念，是否将同意革命的发展。一场艰巨的斗争肯定是不可避免的。我没有看过最近召开的民主派代表大会^①通过的纲领，仅仅从艾韦贝克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对纲领所作的评论中略知一二，该纲领同在伦敦通过的共产主义纲领非常相似。^②因此，我在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将会受益，原因是我可以根据这个纲领申请加入民主派中央委员会。劳你驾，给我搞一份纲领来。

昨天的会议^③是我在这里所见到的最好一次会议。三月同盟^④的倾向很快就被我们克服了，我们利用了由三月同盟召集的这次会议。许多人都直言不讳地表示有必要进行第二次革命，因此下次再演出一系列新的审讯闹剧，我将不会感到惊奇。

我的夫人和我衷心地问候你和你的全家。

你的

约·魏德迈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F. 1，op. 5，Nr. 191

① 参看文件307。

② 参看注159。

③ 魏德迈在他发表于1849年1月26日《新莱茵报》第205号上的一篇通讯中报道了关于这次大会的情况。

④ 三月同盟即中央三月同盟；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中央三月同盟及其在德国各城市的分支，是在1848年11月底由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左派议员们组织的。同盟宣称它的宗旨是保卫德国1848年三月革命的成果。同盟是由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弗吕贝尔等人领导的，他们用空话代替革命行动，同反革命斗争时无能为力。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尖锐地抨击弗吕贝尔等人的不彻底和不坚决的政策，指出这种政策对革命的敌人有利。——译者注

333

尤利乌斯·李西格诺洛（曼海姆）给伯尔尼德国工人联合会的信

1849年1月23日

1849年1月23日于曼海姆

亲爱的兄弟们：

我终于有空给你们写信了，而我认为促使我写这封信的主要原因是你们说过，一个人一旦离开了，就再也听不到关于他的一点消息了。

你们急于想知道我们这里的情况怎么样？我只想用两个字来回答你们的问题：很糟！在德国，只有很少的人同情我们的思想，而这很少的人也被强加于他们的惩罚搞得抬不起头来，所以始终兴趣索然。至今他们能保持团结是因为穿上了军服，现在巴登人也穿上了军服。谢天谢地！我已脱离了军队，因为这些家伙全是无能之辈。而今，巴登地区各民主协会的中央机构设在曼海姆，该地区的一些公民正在花大力气；晚报^①的编辑格罗厄也是盟员，他多多让人向恩斯林先生致意。我来到这里的联合会时，他们正在讨论三月同盟的问题，讨论结果几乎同我们在伯尔尼^②的情况一模一样，人们几乎都不信任他们。

① 《曼海姆晚报》。

② 参看文件325。

你们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你们新的领导班子工作很努力吧，恩格斯还是担任秘书吧，你们那位善良的德国人凯泽尔还任主席吧，他是我在威美尔曼的啤酒馆里亲自介绍他入会的，这样做是出于真正的友谊，为的是让他切勿忘记我的好意；这是一种真正的士瓦本式胡闹，我至今还感到遗憾。我是没有带护照来到这里的，而且囊空如洗，多悬哪！〔……〕首先代我向恩格斯致意，我再次感谢他对我的共产主义的友好款待，其次代我向埃克斯尔博士、街垒战指挥官恩斯林骑士先生以及巴登大公国志愿部队的将军——奥芬堡的奈林格尔先生，我在前往弗赖堡途中，在奥芬堡的天使旅馆有幸结识了奈林格尔将军，我对他的杰出的炸弹天才深表钦佩，在那里，人们一谈到这位将军的炸弹就胆战心惊。或许你们需要钱吧？请别向我开口，如果给我写信，我一定会感到高兴，但你们务必贴足邮票，因为我分文不名。

叫恩格斯也给我写信，我再次向他表示敬意和由衷的谢忱。

你们的兄弟

尤利乌斯·李西格诺洛

我的通信地址是：LC4，2号A.李西格诺洛秘书先生收。

手稿

伯尔尼瑞士联邦档案馆，《司法、流亡者
(1848—1895年)》第68卷d

节录

第一次发表

334

《新莱茵报》关于布鲁塞尔民主派兄弟协会举行宴会的报道

1849年1月28日

1月28日，**布鲁塞尔**。不久前在这里成立的“民主派兄弟协会”（它的主席是费德尔律师），今天在纳穆尔门外的皇宫咖啡馆的一个大厅里举行堪称盛大的宴会。有1000多人参加，事先根本没有发出通知和其他宣传，但大厅还是容纳不下所有的与会者，这一点证明，民主在这里享有多么高的威望。在宴会上发表的许多热情洋溢的讲话和祝酒词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费德尔主席的祝酒词：“社会民主共和国万岁！”这句话引起了巨大反响，不仅在大厅里，而且在临近的大街上都响起了雷鸣般的欢呼声。

[……]比利时民主主义者日果以德国人的名义讲了话，他说，我们大家都为同一个目标奋斗，而且要争取做到：将来不再分疆界，不再分民族颜色，总而言之，所有民主派，无论是德国的、法国的还是比利时的，都只承认红颜色。他的讲话博得了非常热烈的掌声。接着宣读了身陷囹圄而不能出席宴会的深受众人爱戴的特德斯科的来信，他在信中说，他虽然长期被关在狱中，但他的信仰并没有变，他还是热忱地表示，就是在狱中，他仍然要尽一切可能为美好事业工作。[……]

1849年2月2日《新莱茵报》（科伦）第211号

节录

335

《新莱茵报》关于海德堡工人联合会地区代表大会的报道¹⁶⁹

1849年1月28日和29日

海德堡，1月30日。工人代表大会在海德堡召开。应海德堡工人联合会的邀请，德国南部许多工人联合会的代表以及莱比锡和法兰克福两个中央委员会的一些委员都出席了代表大会。在法兰克福中央委员会委员中也有我们德国南部小资产阶级的那位教条主义代表文克布莱希教授。他在第一天晚上的预备会议（这位大人物太忙，不能分身出席正式会议）上就使我们感到很无聊，他竟按照专为小资产阶级设想的那一套对工业发展作了历史阐述，并且竟概述了同样由他特意制订（其实并不是他发明的，因为类似的东西早就有了）的小资产阶级复辟体系。他主张重新消灭大资本，非常准确地给每项手工业规定可以使用多大的资本总额；当然手工业只允许由考试合格的师傅来经营；文克布莱希先生还为哪些部门可以使用机器，哪些部门不可以使用机器作了安排。为了剥夺大资本家的资本，他主张建立银行，通过银行的调节，使资本用于商业企业。当然大资本家也可以经营一项手工业，从剩余的财产中提取由文克布莱希先生和银行所规定的利息。路特希尔德先生要警惕，他会发现这位加塞尔的教授是比共

产主义者还要危险的敌人。

波尔恩在这次预备会议上与文克布莱希先生针锋相对，他支持革命的工人，认为革命的工人并不想毁灭大工业，而是想利用大工业。从这两位发言人所得到的不同反应可以看出，德国南部的大多数工人也比文克布莱希先生更了解本阶级的利益，尽管后者目前还有一些追随者。德国北部和德国南部的工人联合会联合成一个共同的组织（这一组织是通过两个中央委员会的联合而暂时在莱比锡建立起来的），无疑将有利于堵死文克布莱希理论通往劳动无产阶级的去路。

第二天开始的原则性辩论，主要是围绕着小资产阶级的或反革命的态度同工人的革命态度之间的对立进行的。但是，关于这一点，特别是关于工人对资产阶级发展的一些问题所持的态度，大会并没有作出任何决议，而是留待即将举行的全体工人代表大会去解决，因此它们并没有直接的意义。大会作出的决议仅仅同两个中央委员会的联合有关，同德国南部工人联合会的组织有关，本报将向你们详细报道这些决议。

1849年2月4日《新莱茵报》（科伦）第213号

336

科伦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

1849年1月29日

[……] 公民赖夫代表为帮助联合会会刊编辑而成立的编

辑委员会发表如下声明，编辑委员会对该报刊登的《致拉沃先生》一文不负任何责任，因为事先并没有人把该文送给它审阅；因此他拒绝委员会承担全部责任，并建议把本声明全文发表。¹⁷⁰他的建议获得通过。

公民沙佩尔就这篇带刺激性的文章发表意见：

如果在工人或者在选举人中非常坚定的一派，由于这篇文章或类似的文章和攻击而决定同其他民主派一起选举，那么，“许岑多夫”反对派的候选人当选就不再是什么出乎意料的事情了。而我们正是要把可能发现的最坏的人，即以前大谈自由主义空话、尔后又变成极端悲观论者的一个人，也就是一个受人蔑视的变节者送往柏林。

但是，目前由于像《致拉沃先生》这类文章，我们要做好一切准备来达到这个目的。

公民勒泽尔说：不可理解，我们联合会机关报的编辑怎么能在发生了有关《致施奈德尔和拉沃先生》之类文章的事情以后又同意发表这篇文章，更有甚者，竟然不把它送交编辑委员会审阅，而编辑委员会就是因上次那篇文章才成立的，它的职责就是防止这类不合时宜的事情再次发生。

我们在选举人的选举时同民主派联合一起，因为我们确信我们党本身没有足够的选举人可以通过选举，在此期间，民主派的微弱多数，特别是他们在科伦这里取得的微不足道的胜利，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我们的观点是何等正确。但是，我们通过联合，根据多数，使民主派通过了选举。

但是，如果认为，有了从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的必要联合中产生的这种民主派选举人的多数，就可以争取到民主派的议

员，那么，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到现在为止，为了不惜代价地使纯粹的民主派获胜，我们同他们的联合是必要的，可见，在议员的选举开始以前，这种联合也是必要的。

如果说我们以前曾经有过如果不联合就可能屈服于抱怨派的危险，那么，在我们共同取得微小胜利的今天，我们同样面临着这种危险；因为选举刚刚过去一半。

既然我们为这次选举提出了联合的原则，我们为什么不应该把这一原则坚持到选举完全结束，何况迄今为止的选举结果已证明这个原则是完全合理的！

我们作为一刻也不放弃自己旗帜的红色共和派，尽管不准备哪怕稍微考虑一下同民主派的原则联合；尽管民主派在前进的道路上远远落后于我们，就像极其可恶的抱怨派落后于民主派一样；尽管他们的所有领导人得不到我们的丝毫同情，但我们仍然认为，在现在这个时刻，即在选举快要结束的时刻，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攻击他们的可能当选为议员的那些候选人，简直是一种不可饶恕的虎头蛇尾行为。

而这种行为恰恰就是由**我们的**报纸刊登的那种文章造成的，如以前那篇文章是针对施奈德尔第二和拉沃的，而现在我们谈论的这篇则是在**我们的**报纸上针对拉沃一人的。联合会对第一篇文章曾经提出过抗议，但那位编辑没有接受教训，今天又一次迫使我们提出抗议。

这样下去，我们的会议只好全都用来抗议我们自己机关报上的文章和纠正我们那位编辑的错误和不彻底性了。

公民诺特荣克要求普林茨编辑作出肯定的表示，他是否承认

为他而成立的编辑委员会，是否愿意将每篇文章在付印前都送交编辑委员会审阅。

公民普林茨虽然愿意承认编辑委员会，但认为每篇文章都要送审是不可能的。

认为不可能的这种说法遭到了公民马克思的反对。

公民普林茨明确表示反对编辑委员会。

对此，许多人表示不满，联合会根据这些人的提议作出如下决定：

《自由、劳动》报不再是联合会的机关报。

原来的《自由、博爱、劳动》报将增设刊头和红旗继续出版。

公民克·约·埃塞尔任该报编辑。

对其他方面应该采取的一些措施，埃塞尔必须同继续存在的编辑委员会取得一致意见。

报纸的刊头将设计成这样：一个人身穿短上衣，手握宝剑和红旗。¹⁷¹ [……]

1840年2月8日《自由、博爱、劳动》
(科伦)第1号

节录

科伦工人联合会全体会议记录

1849年2月4日

工人联合会全体会议，1849年2月

主席勒泽尔^①宣布会议开始，并作了简短的开场白，接着，他请公民沙佩尔就召开全体会议的宗旨发表意见，汇报联合会自上次全体会议以来所取得的成果。

公民沙佩尔详细报告了以往历次委员会会议和各个分会的活动，并列举了那里讨论的主要问题。

然后他阐明了联合会的改组计划¹⁷²，计划如下：

增加目前分会的数目，在本城最合适的地方增至八九个分会¹⁷³；提出成为联合会会员的条件，使之在其中一个分会登记注册；每月缴纳1银格罗申会费，其中9分尼留作分会购买图书，3分尼上缴工人联合会总储金处；每两周在埃塞尔大厅举行一次全体会议，各分会的全体会员都可参加，而不必缴纳特别费用，但非会员除外。据悉，马克思和恩格斯先生已允诺，两周一次同联合会主席轮流就社会问题发表演说，联合会会员仍可免费听讲。

公民沙佩尔提议，就联合会是否同意这个计划进行投票表决，并任命一个委员会起草联合会章程，在章程中明确阐明这一点。这个提议获得通过。会议批准了上面提出的改组计划，还责

^① 关于勒泽尔当选为工人联合会主席一事，没有文字记载。他在1849年1月25日的委员会会议上第一次以主席身份出场。2月23日，沙佩尔当选为主席。

成上次委员会会议为此任命的委员会按计划起草联合会章程，并提交下次全体会议批准。^①

公民贝多尔夫报告了联合会的收支情况和储金情况。

会议批准了委员会作出的决议，即恢复出版原来的《自由、博爱、劳动》报，并任命克·约·埃塞尔为该报编辑。

会议决定，狂欢节后的星期日举行全体会议，然后确定联合会的章程。

接着，会议结束。

1849年2月15日《自由、博爱、劳动》
(科伦)第3号

340

卡尔·德斯特尔(莱比锡)给卡尔·马克思(科伦)的信

1849年2月12日

亲爱的马克思：

如果波尔恩新近不带来关于你们的点滴消息^②，如果我不读《新莱茵报》，那我真以为你们已经不存在了，因为我从来没有从你们那里得到一鳞半爪消息。[……]

现在，我正遇到一个特殊问题，需要向你请教。早在去年10月和11月，就卢格这位大人物的《改革报》问题，在国民议会内外的党员中间引起了对他的极大不满，他们不满的理由，每一个稍微认真阅读《改革报》的读者都能明白。[……]

^① 参看文件341。

^② 波尔恩在科伦拜访过马克思；参看法169。

现在，在柏林创办一个坚定的民主派机关报已势在必行。
[……] 在各方面的要求下，我们已为在柏林创办一个民主派机关报采取了一些步骤，而这种可能性，我说的是极大的可能性，目前已经存在。现在我向你提出请求，请你在这个问题上给我出主意，尤其是你能否给我们这个报纸指定一位主编，特别是指定一位能负责该报国民经济学部分的编辑。请你尽快回信，因为戒严一解除，我们就要开始进行这项工作。[……]

向大家问好。

永远是你的忠实朋友

德斯特尔

1849年2月12日于莱比锡

我在伯尔尼通过工人联合会向恩格斯转达的致敬信，他可能没有收到。

通讯处：莱比锡C.L.布特尔。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F.1, op.5, Nr.200

节录

第一次发表

341

科伦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

1849年2月15日

宣读并通过了上次会议的记录。接着，公民卡斯滕斯^①提

^① 弗里德里希·列斯纳。

议，向警察当局索回当时被没收的红旗和弗莱里格拉特的250首诗这些工人联合会的财产；这个提案获得通过。〔……〕接着，公民沙佩尔谈当前的政治问题，他说：

尽管选举已经完全结束，但还没有确切了解各党派大概的实力。第二议院虽然不完全符合我们的意愿，但是，它面对抱怨派的行贿和威胁还是取得了良好的结果。至于第一议院，它的代表都是极端反动派和极端抱怨派这一大帮流氓，因此它对我们来说不过是例行公事，事态一旦明朗，我们就有好时机来收拾这帮精明能干的抱怨派。

在萨克森，那里选出的议院是非常民主的。本来就已支离破碎的德国，由于人为地把什列斯维希同霍尔施坦分离开来，将更加支离破碎。也就是说，这是目光短浅的无权的德国中央政权干的，它在奥地利问题上已再一次丢脸和受辱，因为法兰克福的联邦之父在奥地利的淫威下表示同意奥地利从德国分离出去，而奥地利内阁对此表示抗议。〔……〕

此后，恩格斯提议，任命一个委员会，同民主协会的委员会建立联系，以便为在这里举行一次宴会纪念法国二月革命作出必要的规定。^①最后联合会通过了这一提案，委员会由公民沙佩尔、勒泽尔和赖夫组成。

接着，会议结束。

1849年2月24日《自由、博爱、劳动》
(科伦)第6号

节录

^① 参看文件344。

关于汉堡工人教育协会成立四周年纪念活动的报道^①

1849年2月21日

××× 1849年2月21日于汉堡

这一次工人教育协会成立纪念日活动，像以前一样，也给人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的确可以这样说，这是它唯一的一次不通过革命获得深远意义的政治性纪念活动。早在几年前，汉堡的革命力量就聚集在它的周围^②，旨在唤醒麻木不仁的汉堡人。

[……] 汉堡的交易所经纪人清楚地看到，尽管有各种群众集会，尽管有各种俱乐部和其他庆祝活动，但他们仍能一如既往地放高利贷，一如既往地受人尊重，一如既往地把穷人同“可尊敬的商人”联系在一起。因此，如果有人跟他们谈起民主，他们总是轻蔑地耸耸肩膀，并且操着浓重的汉堡口音惊叫一声：“不怕”。这里的民主派恰好不懂得使他们害怕；民主派咒骂资本，却又长期在创造资本，他们想要资本，只要伸出手来，资本就在那里。如果这些观点出现在工人联合会的成立纪念会上，那么，也许第二天中午交易所的股票行情就要下跌；但是，发言者们没有阐述这种激进主义，而是讲了许多许多别的事情和频频干杯，特别在就餐

① 这篇报道已查明是为《新莱茵报》写的通讯，但该报没有刊登；未能查清作者是谁，他的通讯（标记为×××）曾在《新莱茵报》上多次出现。关于共产主义者在1848年在汉堡的活动，另见注156和161。

② 关于汉堡工人教育协会的成立，参看文件59。

时，成群的空谈家拥上讲台，以便夺回他们早已在工人中失掉的优势。施泰因贝格和鲁斯关于工人的发言最为出色；此外，魏特林讲了感情和牺牲（原文如此）的必要性，并让“渊博的、漂亮的、年轻的”巴尔贝斯和哈根讲了去年的社会革命以及工人联合会的情况。施纳克的发言特别有意思，他谴责了牛皮大王、空谈家和施拉姆^①（议员的弟弟），并且为流亡者和精神病患者举杯祝了酒！ [……]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 23, Nr. 21/8

节录

第一次发表

343

J. P. 施米茨（宾根）给卡尔·马克思（科伦）的信

1849年2月22日

科伦的卡尔·马克思先生^②：

由于涉及一个崇高的目标，所以我冒昧地给您略写几行。我深信，这寥寥几行是不会白写的，因为我意识到，〔您〕现在对我的这件事情能够起很大作用，而且我还知道，您现在身居多高的位置。我尽管是科伦人，但对我这个人和我名字您也许一无所知。自从本月11日以来，我在宾根这里创建了一个工人教育协

^① 康拉德·施拉姆。

^② 信封上的称谓是：莱茵河与科伦，《新莱茵报》编辑，卡尔·马克思先生。

会^①，旨在对这里的工人进行民主的宣传教育，而这里却非常缺乏这种宣传教育（我是这样看的）。本协会现有30名会员，大部分是工人，我也是其中之一。在这期间，我暂时还是这些未开化人的头头，可惜，在这些人的脑子里牧师们传授的教义问答还太根深蒂固，如果不通过宣传教育来制止牧师们的胡作非为，那么，这种教义问答通过现在主要由君主制度使用的那种工具而将在他们脑子里继续存在。我请求您趁我开始时就在（您认为恰当的）方面给我以支持，并给我寄一些著作来，让我根据它们尽可能写一个真正民主主义的报告，给这些人一些启迪，吸收您的富有特色的思想。因为我是工人，不可能把很多时间都花在学习上。像我这种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自己写一篇报告，要是没有您这样的人帮忙，是决不能给工人留下什么印象的。

希望尽快得到您的有利于我的目的的答复。

永远忠实于您的

J.P.施米茨

1849年2月22日于宾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F.20,Nr.20

^① 宾根工人教育协会1849年4月底也加入了以科伦为中心的莱茵省和威斯特伐利亚各工人各联合会的组织联合。

345

科伦工人联合会全体会议记录

1849年2月25日

工人联合会全体会议，1849年2月25日

主席勒泽尔主持会议，他说，新章程起草委员会^①已结束自己的工作，即将把章程提交全体会议审议。

公民沙佩尔在会议上宣读委员会起草的章程草案，宣读完毕后，会议决定讨论草案的各个条款。¹⁷⁴

前三条获得通过。

关于第4条，公民安内克提议，为了更明确起见，应把“同样，每周，即每个星期一，举行一次由各分会参加的全体会议”这句话改为“一次工人联合会全体会议”。

这个提议获得通过。

从第5至16条未经详细讨论就通过了。

根据公民安内克提议，会议决定把第16条和第17条中的“名誉法庭”（它使人不禁想起鲁普士王室的法庭^②）一词改为“仲裁法庭”。

此外，根据公民沙佩尔就第12条的提议通过了关于“在军队服役的会员免交一切费用”的说明，并根据公民埃塞尔的提议通

^① 参看文件337。

^② 安内克指的是普鲁士军队中的名誉法庭诉讼程序。

过了“在1849年2月25日工人联合会全体会议上讨论和通过”这一总结说明。

此外，会议还决定，对章程作出令人满意的修改后即行出版，发给每一个会员。在联合会的报纸《自由、博爱、劳动》上冠以“工人联合会机关报”的字样。

根据新章程第8条着手选举由5名会员组成的委员会，结果公民安内克、贝多尔夫、勒泽尔、沙佩尔和萨尔格特当选。¹⁷⁵

公民勒泽尔宣布，本周例行的委员会会议仍要举行，但根据章程规定，下星期一，第一次全体会议将在埃塞尔大厅举行，并提醒全体会员记住在这以前要在某一个分会登记注册。

接着，公民埃塞尔还提议为一名回国的流亡者募捐，以便让他尽快再次离开德国国土；原来他在国外时就问过当地警察当局，他回国是否会有什么不良后果，得到的答复是：不会有，他可以回国，尽管如此，他现在仍然受到通缉。这个提案获得通过，公民卡斯滕斯^①和迈耶尔受托办理此事，会议就此结束。

1849年3月4日《自由、博爱、劳动》

（科伦）第8号

^① 弗里德里希·列斯纳。

346

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卡尔·马克思（科伦）的信

1849年2月26日

1849年2月26日于巴黎

万神庙附近乌尔姆街12号

亲爱的：

我同帕亚先生（几个月来，我一直在教他学德语，现已证实他是莱茵河两岸民主派之间的一名优秀联络员）已把你的《共产主义宣言》译成了法文。译文基本上是成功的；这个宣言使他很受鼓舞，他准备尽快把它出版一个大开本的小册子，外加一篇关于你的前言和一篇关于你的简讯。^①扉页上只署他的名字，不署我的名字。〔……〕我知道，凡是我和他写的东西，从1848年8月以来，只要是关于我们德国的，都深受政府部门民主派和社会学家的欢迎。我知道，我的大脉搏一部分就是因此而跳动的。所以，劳驾你写信告诉我：你的出生年月日，学历，你的第一批出版物，旧《莱茵报》的出版时间。这一切都是富有特色的。关于你的其他情况，我已经知道了。

现在，他希望尽快得知：你是否允许他减弱第23页下面“让

① 艾韦贝克早在1848年12月12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就说：“你的《共产主义宣言》不久将出版法文版。”（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1,op.5,Nr.182）。后来帕亚的法译本没有出版。

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①。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这句话的语气，不是因为他讨厌这句话，而也许是因为他害怕这句话，这句话正由于在结尾处，所以很容易引起准备在《社会辩论报》等等报纸上评论《宣言》这一处的那些反动分子吹毛求疵，对4月选举可能产生不利影响。你当然知道，在法国，怎样领会一个词，一个音节，甚至会变成提示语，变成党的语言。“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这个真理在前面的22页上已作了阐述，现在可以不作改动，就用来安慰他那高卢罗曼式的顾虑吧。不是吗？

当他热情地向许多人民代表和其他法国人讲述你在《宣言》中所作的“尖锐的分析、出色的描写、优美的词句”等等时，我不仅多次在场，而且还知道他以前也说过这种话。另一方面，如果仅仅为了那句话就延期到4月选举以后才出版，就未免太遗憾了；这简直是无谓地浪费时间。但是，如果你不允许他改动那句话，他就可能根据法国形形色色民主派的劝说拖延出版。他希望你本人能作修改。

马克思，你看，我并非中庸之辈，我同他之间的分歧就是由于这本书拖这么久没有出版造成的。[……]

祝好。向你亲爱的夫人问候，向孩子们以及维尔特、弗莱里格拉特、丹尼尔斯、克莱因和两位沃尔弗^②致意。

你的 艾韦贝克

节录

第一次发表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F.1, op.5, Nr.209

① 着重号是艾韦贝克写的。

② 威廉·沃尔弗和斐迪南·沃尔弗。

347

恩斯特·德朗克（巴黎）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科伦）的信

约1849年3月初¹⁷⁶

亲爱的恩格斯：

收到25塔勒（光靠这些钱我确实无法动身）以后，我就给马克思写了一封信，给你写了两封信，至今没有收到回信。〔……〕如果你不给我答复，我就只当你们不需要我了，因此，我准备在这里安排一下，力所能及地寄一些通讯。但是，要我回来，就给我写信，以便我不再另找新的住所，背上新的债务。

在这里，哥特沙克对报纸简直深恶痛绝，他一是嘲笑艾韦贝克这个傻瓜的通讯，二是嘲笑竟推荐施奈德尔、哈根和基尔这些意志薄弱者为“民主派”候选人。^①这帮家伙同海尔维格有联系，看来他们在这里策划有组织的反报纸阴谋。〔……〕

《法兰克福总邮报》刊登的那篇关于“革命漩涡”的通讯（《新莱茵报》也摘要转载过），我认为是艾韦贝克本人写的，他也写了反对他本人的话^②，那仅仅是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总之，只有他或者他的朋友莫泽斯才能说明，他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通讯就是他自己那些文章的法译文，且这些文章是他发表

^① 参看文件331、341和345。

^② 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艾韦贝克为《法兰克福总邮报》写过一篇通讯，相反，莫泽斯·赫斯倒是定期地从巴黎为该报写通讯。

在法国的地方报纸上的。[……]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F.1,op.5,Nr.324

节录

第一次发表

348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科伦）给雅科布·沙贝利茨（巴
塞尔）的信

1849年3月8日

1849年3月8日于科伦

亲爱的沙贝利茨：

你于去年11月的友好来信，我至今才回复，千万别生我的
气。我收到信时，正忙得不可开交，一时疏忽就把它搁下来了。

[……]

下面就谈谈你来信中的主要点吧！《新莱茵报》不能同《瑞
士国民报》交换，因为受到邮政条例的限制，比如你最先用捆扎
的包裹寄给我们的几期报纸，邮资约1法郎，但如果把报纸平
邮，那么，邮资对双方来说都要比交换便宜得多，交换无非是把
过高的邮资拱手交给恬不知耻的邮政机关。因此，我准备从新
年起在我办公室订阅《瑞士国民报》，如果不发生什么意外，请
你也订阅《新莱茵报》。按照恩格斯（他不久前在巴塞尔见过你）^①

^① 恩格斯于1848年10月底至1849年1月中曾在瑞士逗留；这是证明恩格斯到过
巴塞尔的唯一证据。

的意见，我估计要出现后一种情况。

出自你手笔的通讯，我们总是很喜欢、很欢迎。因此，如有好机会，请勤写通讯！

我自从去年10月获释以来，一直住在科伦这里，几乎只呆在编辑部和自己家里。反动派的胜利使我感到沮丧和愤懑。一年前的这个时候，我们曾在白鹿酒店、在你们那用三种颜色披上节日盛装的办公室^①里欢呼雀跃，现在则是另一番景象了！不，这种景象不会一成不变，我是这样聊以自慰的！匈牙利和意大利——就连它们也忍受不了，那里的人们宁愿马上去战斗，去牺牲！第一次革命和它的反革命有规律地记下了它们的每一个回合；现在，在意大利，第二次革命正发出闪光，它将像一年前一样，蔓延到法国和德国，这是不会也不可能令人失望的。接着将出现国际性混乱——世界大战！那时情况无疑会好起来，会明朗化，但是，目前在普鲁士王国的专制制度下生活还很悲惨，索然无味。

[……]

沙佩尔自从获释以来继续在搞报纸的校对工作，消除了不少印刷错误（这一点可以证明，他并不像夏绿蒂·科尔黛-毕尔特^②小姐认为的那样嗜血成性），而且善于思索，工作卓有成效。节日之夜，他身穿短外套，头戴雅各宾帽，在大街上穿行。大家友好地向你致意。我夫人也向你致意，她现在同孩子们愉快地生活在一起。

① 指《德意志伦敦报》编辑部，1847年和1848年初，沙贝利茨为该报编辑。

② 这里同杀害马拉的女凶手并提的阿美利·毕尔特是一个侨居伦敦的德国女作家，弗莱因格拉特和沙贝利茨可能是在不伦瑞克公爵宫廷的至亲好友中间认识她的。

再见，亲爱的朋友和兄弟！再次请你别生我的气，请你尽快来信，以证明你不生我的气！

谨致友好祝愿

永远是你的老

斐·弗莱里格拉特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23,Nr.15

节录

第一次发表

350

维尔腾堡工人联合会中央委员会（乌尔姆）给斯图加特工人联合会的信¹⁷⁷

1849年3月11日

1849年3月11日

[……] 大约两周前，伦敦德意志协会的一名会员^①曾光临我们这里，访问了我们的联合会，并在我们的会议上透彻地讲述了工人的悲惨境况。[……]

所以，如果你们允许我们把这位代表（他从乌尔姆出发，前往斯图加特）指点并介绍给你们，那么，你们朝思暮想同伦敦协会的联系就算接上了，因为我们相信，从英国那些有经验的人那里可以得到不少有利于手工业者和工人事业的教益。[……] 但

^① 指约瑟夫·莫尔，他从慕尼黑来到这里；参看文件351。

是，如果你们还要会见另一名代表，我们愿意向你们提供伦敦工人协会以及巴黎工人协会的详细地址。 [……]

1849年3月15日《太阳报》(斯图加特)；
按副本刊印，见美国河畔法兰克福联邦档案馆藏的克瓦克尔遗著

节录

351

弗兰茨·施彭格勒（慕尼黑）给莱比锡德国工人中央委员会的信

1849年3月12日

1849年3月12日于慕尼黑

尊敬的朋友们：

这里的联合会已经收到了你们的珍贵来信。联合会早已决定要在慕尼黑召开一次巴伐利亚区工人代表大会。^① [……]

我已经通过泰勒先生¹⁷⁸收到了“兄弟会”的代表资格证、组织证书和柏林决议。泰勒先生在这里逗留了一周，并参加了我们联合会举行的法国革命庆祝会。¹⁷⁹ [……] 我们的工人组织各方面都倒退了。其主要原因是：这里精明能干的工人太少，而这几个工人，至多五个工人^②，简直忙得团团转，这是可想而知

① 巴伐利亚区代表大会并没有在慕尼黑举行，而是1849年4月3—4日在纽伦堡举行的（参看注169）。

② 参看文件326。

的。我实在不敢答应，我还能做更多的工作。所以，就像这里越来越不同情各个联合会一样，对我们组织的同情也正日益减少。朋友们，我要说的话很多，可是时间不允许，我得马上赶往联合会。我的信写得很糟糕，万望见谅。

致以兄弟般的敬礼并握手

永远忠实于你们的朋友

弗兰茨·施彭格勒

手稿

德累斯顿国家档案馆，MdI,11026a

节录

第一次发表

353

威廉·沃尔弗《西里西亚的十亿》一书摘录¹⁸⁰

1849年3月22日至4月25日

[……] 在去年12月颁布钦定临时赎免法以后，我们紧接着就证明，这项法律为了地主老爷的利益只考虑（在仲裁法庭组成时）把所谓的小人物交给大人物任意宰割或交给他们的敌人任意摆布。尽管如此，贵族骑士等级还对这个法律仍然心怀不满，要求有一项更便于使骑士等级中饱私囊的法律。[……]

现在，这些人觉得梦寐以求的阿兰胡埃斯的美妙日子已经回来了。这帮高贵的老爷们已经非常清楚地估计到，他们如今在刺刀、戒严、整装待发的军队的保护下，在盼望派来俄国内弟的增援部队的保护下，能从西里西亚的农民群众身上榨取比以前更多的东西。

但是，这种估计即使再细致周到，也是在没有主人的情况下作出的。

这个主人就是西里西亚的农民，不是拥有三四个胡符^①或更多土地的大都同骑士老爷本身完全一样思想并行动的资产者农民，而是那一批小农、园丁、雇工和“佣人”，这些人在这以前都是大地主的真正役畜，按照大地主的设想，他们始终是另外一种人。

1848年，那一批人对无偿废除封建债务已感到心满意足，这些迄今遭到无耻敲骨吸髓榨取的人们的善良心理表明，他们大多数人都愿意忘记过去，只要求保证他们未来享有权利和自由。

经过1848年最后几个月和1849年到现在为止的艰苦见习期以后，西里西亚的农民，即“小人物”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封建地主老爷必须依法交出他们抢去的财物，至少必须交出他们借助于原来的豁免法占有的那部分财物，而不是让他们根据挖空心思搞出来的豁免法成为新的富翁。

“我的勇敢的军队”毕竟还需要花一段时间用“小人物”的血汗去填满地主们的钱袋；而农民只是在等待他们能实行清算的时刻，他们在没有主人的情况下确实不会实行清算。

人们都在越来越热心地对各个村子的问题一一进行研究，强盗骑士老爷仅仅在最近30年内在“天赋神权”的庇护下，究竟从农民那里窃取了什么东西。这里的情况并不像法国那么简单。在法国，一小撮贵族和上等资产者于1825年要求并得到了10亿（近

^① 胡符——德国农户占有土地的计量单位，1胡符在当时的西里西亚约合15公顷。

3亿普鲁士塔勒），作为对他们在革命中遭受损失的所谓赔偿。这是一个可观的数字，法国农民因此知道，他们应该收回多少资本和利息。

在普鲁士，贵族骑士老爷们年复一年地进行敲榨勒索，这么一大笔钱他们竟分文未付。在此之前，虽然有个别农民可能知道，他为他个人和他的村子付给了贵族地主多少钱，但是现在有人已经清算并算出了为全省付出的大概数目：在最近30年内，通过赎免，农民竟被西里西亚的强盗骑士抢走了8000多万普鲁士塔勒，其中一部分是以土地的形式，一部分是以现金和地租的形式出现的。此外，还要加上每年的捐税和至今尚未赎免的人要偿付的徭役费。这笔钱最近30年总计至少为1.6亿塔勒，同上面那笔钱加在一起共计约有2.4亿塔勒。

农民们对这笔现在才得知的帐目已经恍然大悟，而封建贵族同伙尽管有他们最高保护人的天赋全权，但对农民们的觉醒还是感到胆战心惊的。他们从农民们的口袋里掏走了2.4亿，而“我们的2.4亿，必须在最近收回”。这就是目前在西里西亚农民中间传播的思想，就是好几千个村子严正提出的要求。

如果一定要谈到对封建负担的赔偿问题，那么，骑士等级必须把他们从农民那里夺去的东西赔偿给农民。这样一种正在日益传播的意识就是一项“成就”，而且是不久就会结出丰硕成果的成就。这项成就是任何强制性命令也推翻不了的。下一次革命将帮助它发挥实际作用，到那时西里西亚的农民可能会懂得制定一项赔偿法，按照这项法律，不仅被夺走的资本，而且“全国流行的”利益^①都将全部回到人民的口袋里。[……]

^① 利息。

如果我们把骑士老爷在最近30年中少付或根本未付的土地税这一项算作4 000万塔勒（这确实还是非常保守的算法），那么，这笔钱再加上他们直接从西里西亚农民的口袋里抢走的2.4亿，总共就是2.8亿。

这就是西里西亚的10亿！我们不会就此善罢甘休，我们要求偿还其他所有被强盗骑士直接或间接地抢走的东西。

骑士老爷现在又兴致勃勃地跨上了他们自己制造的“赔偿”玩具马，所以，农民也进入了终于能跨上自己那赔偿的纯种马的时代了。骑士老爷还想把他们在这一以前以“地租、纺纱税、养鸡税、看守人头税、蛋税、扫帚税、扫烟囱人头税以及保护税”的名义，以“劳役和宫廷服役”的名义，以“谷物交付和其他实物交付”的名义所剥削的中世纪财产即封建财产，迅速地转化成资产阶级的即最现代的地租或典契财产。他们把“赔偿”称为转化过程。

那好吧，你们就不厌其烦地侈谈“赔偿”吧，不过到将来你们还想坚持从上个世纪以来一直闻名于西里西亚的大骗子埃克斯纳的那种原则可不是明智的，原来这个埃克斯纳带着他的一帮强盗抢劫富有的磨坊主时，扬言只要得到一笔等量的钱就不加以伤害。到时，西里西亚的农民最终采取独立行动，向你们清算，众口一词地赞同“赔偿”的号召，你们可别感到惊奇；这个众口一词的赞同声不久将令人毛骨悚然地在你们耳边回响，响彻整个西里西亚的每一个角落。〔……〕

迄今为止，农村居民的利益是分开的。一部分人已经赎回了，他们很少关心那些不得不还在服劳役的人；一个村子的人很少过问另一个村子的人的命运；大农和富裕农不同情那些在保护

税的重负下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邻居，等等。而骑士等级和官僚等级对这种分离状态是求之不得、倍加赞扬的。

强盗骑士等级的贪得无厌重新萌发了，这一等级在1849年四处叫喊要“赔偿”“优惠权”，仿佛未曾有过1848年，仿佛农民还沉睡未醒，其实农民在挣脱身上的锁链时就有点清醒了，因为骑士等级的这种赔偿叫喊，结束了农民之间按照对封建关系的各种不同利益和等级而形成的分离状态。

现在农民有着共同的利益：要求收回被骑士掠夺的东西；赔偿由地主从农民的口袋中榨取的一切，赔偿骑士老爷完全没有偿还或者只偿还少许的那些等级税、土地税以及其他各种苛捐杂税。

将来，西里西亚的农民在全地区只高悬这样一面旗帜，上面写着：

“骑士在最近30年内抢走的一切必须全部赔偿。”

“从大小骑士等级的天赋钱袋中收回3亿塔勒！”

1849年3月22日、25日和4月13日《新莱茵报》（科伦）第252号、255号（第2版）和271号

摘要

354

共产主义者同盟一支部主席（柏林）给奥古斯特·黑策尔（柏林）的信¹⁸¹

约1849年3月底

亲爱的朋友黑策尔：

今天晚上要接纳几个盟员，劳驾，请给我寄一份章程^①来，可能的话，请寄一份石印的章程来，我将于星期四奉还。

舒尔茨支部

你的朋友 胡果

康内吉塞尔的章程今天晚上他自己要用。

维尔穆特和施梯伦《19世纪共产主义者的
阴谋》1853年柏林版第1册第46页

355

共产主义者同盟柏林总区部给伦敦中央委员会的信

1849年3月底¹⁸²

^① 文件321。

柏林总区部致中央委员会

我们荣幸地向中央委员会汇报，同盟从修改章程以来在这里所取得的成就。众所周知，柏林在这以前一直不是我们进行宣传的一个理想场所，即使革命以后也是如此，只是在戒严状态解除后才有了些起色，以致同盟的规模每天都在扩大，影响每天都在增长。我们已有100名盟员，共分10个支部，从现在开始，每月将约有12塔勒的收入。但是，鉴于我们这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和政治意义，我们希望中央委员会授权我们，我们的全部收入均由我们自己支配。新的革命看来即将来临，我们还需要许多钱购买武器弹药。此外，我们还缺乏宣传用书，我们请求中央委员会给我介绍一些宣传用书。

维尔穆特和施梯伯《19世纪共产主义者的
阴谋》1853年柏林版第1册第46页

357

科伦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决议¹⁸³

1849年4月11日

[……]

2.各个分会应根据《新莱茵报》最近几号就社会问题所发表的社论去讨论社会问题。^①

^① 4月17日的委员会会议也规定，“社会问题（资本与雇佣劳动）”是各个分会的议题（1849年4月22日《自由、博爱、劳动》第22号）。

3. 登报请求莱茵省的所有工人联合会把它们通讯处寄给我们；此外，要求德国的各工人联合会也讨论工资问题，并要求把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告诉我们。为此应把《新莱茵报》的有关各号寄给这些联合会。〔……〕

会议批准把我们的24份联合会章程转让给多伊茨和杜塞尔多夫，并同意下列救济款项：给1名患病的联合会会员15银格罗申；给4名被驱逐出克拉科夫的波兰人1塔勒15银格罗申；给1名列日工人联合会会员15银格罗申。〔……〕

1849年4月12日《自由、博爱、劳动》
(科伦)第19号

节录

363

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给斯图加特工人联合会的信
约1849年4月底至5月初^①

兄弟们：

我们及时地收到了你们今年3月9日的友好来信，我们高兴地接受了你们伸出的友谊之手，并力求保持我们相互之间的友谊。我们对你们给予我们会员^②的友好接待表示赞许，并希望找到这样的机会来实际证明我们的这种赞许。

① 从本信中可以看出，这里指的是对1849年3月9日斯图加特工人联合会的信所作的迟到的答复；参看注177。因为在5月13日发表的伦敦信件中，还没有提到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斗争，所以，它可能是在1849年4月底，最迟在5月初写的。

② 约瑟夫·莫尔；参看文件350和351。

工人们当然需要一个组织，以便认清他们的普遍状况，并找出适合改善这种状况并使工人的生活有保证的各项措施。我们生活在外国，在这里，阶级对立已经极其广泛地形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势不两立。正是在这里，每天都在向工人们表明，他们只不过是资本的奴隶，他们的劳动只不过是增殖资产者的资本，他们如果不设法通过联合来摆脱这种桎梏，就势必永远当工人。

在德国，资本家目前正在企图实现自己的利益，并达到英国资产者早已拥有的那种统治无产阶级的力量。现在，英国产品已经使半个德国濒临毁灭，而且还要完全毁灭德国资产阶级。

在小范围内实行关税保护和协作，只能对我们有害。由于实行关税保护，将产生人数更多的无产阶级，在短期内会出现生产过剩现象，而且比我们估计的来得还要快，因为德国同外国并没有贸易来往。由于小范围的协作，工人们脱离了伟大的运动，陷入了行会制度的残余而不能自拔。

只要工业无产阶级同农业无产阶级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任何小规模尝试其结局就将是不幸的。社会改造可以在一个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进行管理的国家内大规模地实行。工人联合起来，就能行使他们的权力，参加一切公开的选举，并在最适当的时机使自己上升为执政党。

我们希望这封信能给你们联合会带去欢乐，因而请你们不要计较我们因偶然情况表示的暂时沉默。

如果你们向我们提出什么学术问题或社会问题，我们将竭尽全力尽快地回答你们提出的问题。

致以兄弟般的问候

受工人协会委托

通讯书记 亨·鲍威尔

1849年5月13日《太阳报》(斯图加特);
根据副本刊印,见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联邦
档案馆藏约克瓦尔克遗著

364

科伦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

1849年5月1日

各分会代表作有关各分会的情况和作用的报告。

原多伊茨民主协会作为第十分会也加入了科伦工人联合会,
它目前拥有230名会员。[……]

主席宣布,已经从宾根、莱比锡和曼海姆收到了表示同意的
信。前二者谈到了工人(社会)党脱离民主派一事;后者为寄给
它的在《新莱茵报》发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一文表示感谢,
并说要就这篇文章进行讨论。[……]

1849年5月13日《自由、博爱、劳动》

节录

(科伦)第28号

365

乔治·朱利安·哈尼（伦敦）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科伦）的信

1849年5月1—2日

1849年5月1日于伦敦

布朗普顿区女王街9号

亲爱的恩格斯：

[……] 我和奥康瑙尔之间的问题没有进展，仍然同上一次去信时一样。¹⁸⁴我记得自那时起没有再见过他。你大概已经注意到《北极星报》上他那种虽然不是直截了当表达的但却十分明显的敌意了吧。不过，我没有去理会他，因为我很清楚，他的权力正在迅速地化为乌有；相反地，我的朋友则在日益增多。[……]

我同朋友磋商后，决定办一个售价3便士的月刊，自6月1日起出版。刊物的名称是：

《不列颠和外国政治、历史和文学民主评论及其他》

我希望能把这个刊物办成功，同时也保留我在《北极星报》报社的工作，至少是保留一段时间。如果这个办月刊的设想成功了^①，这就将为一些更大的事业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你曾好心地答应过要给我帮助，现在我就写信要你履行自己的诺言了。我已经给沙佩尔写了信，请他写一篇通讯供刊物发

^① 《民主评论》杂志于1849年6月开始出版。

表。请你务必也写一篇文章或通讯。题材由你自选，可以是关于德国政治的，也可以是关于英国政治的。如果是后者，请不要涉及奥康瑙尔；如果是其他方面的，你写得多激烈都可以。也许写些关于德国情况或大陆的一般情况的东西更好一些。

我觉得最有必要的是每期月刊上都能有你写的东西。

除了政治性的文章，我还欢迎一些——不管多么简短——介绍德国文学的东西；如有可能的话，翻译一些德国的爱国诗歌。弗莱里格拉特或维尔特能够帮助写些文学和诗歌一类的东西吗？回忆罗伯特·勃鲁姆的文章大概是能吸引人的。介绍民主运动中的其他烈士和受害者的文章同样是能吸引人的。一个题材可以连载几个月，但作为一般原则，文章不宜太长。我大概还得重复一遍上封信中说的那句话，即我无法允诺给予报酬。如果刊物办得成功，我是不愿让你或其他人白白为我写东西的。当然邮资全部由我支付。

我非常希望每个月都能得到法国和美国的通讯。你知道巴黎有什么人能用英文写东西并愿意提供帮助吗？艾韦贝克怎么样？你的文章或通讯寄得越快越好，最晚不要迟于5月21日。

致以兄弟的敬礼！

乔·朱利安·哈尼

又及：5月2日勃兰登堡的第二次政变^①可能会加快这一天的到来，那时你们不是红色德意志共和国的公民，就是俄国人的奴隶。我很关心你的安全和胜利。

这些新的事件或许会对你写东西有妨碍，但是我知道，只要

^① 普鲁士第二议院于1849年4月27日解散。

有可能，你是会写的。

路易·勃朗和科西迪耶尔昨晚同我一起进餐。他们都答应要对《民主评论》给予帮助。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F.1,op.5,Nr.222

节录

371

科伦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

1899年5月21日

邀请参加这次委员会会议的有委员会委员以及各分会的所有负责人，他们大部分都出席了会议。

公民沙佩尔宣布会议开始，接着他说，他因众所周知的情况将离开科伦，将脱离工人联合会。①

他就他作为联合会主席的工作向与会者作了说明，会议对他的说明表示完全满意，并对他担任主席表示赞许，对他迄今所进行的卓有成效的积极活动表示感谢。

然后，会议就联合会今后的结构问题作出下列决议②：

(1) 在工人联合会原有的九个分会中保留五个。

它们是：库尼贝尔特地区海舍尔附近的第三分会，十字街西蒙斯附近的第一分会，罗滕堡的第四分会，旧钟楼地区普法尔附

① 沙佩尔前往维斯巴登；参看文件377。

② 另见文件378。

近的第六、七分会以及早先在威克塞霍弗地区的列格曼附近、后来在金德勒附近的第二分会。

四个停止活动的分会同保留的分会合并，它们是：

普兰克巷的第九分会同海舍尔附近的第三分会合并；凯西利亚大街的第七分会同旧钟楼地区普法尔附近的第六分会合并；希腊门附近的第八分会和比贝尔大街的第五分会同威克塞门地区金德勒附近的第二分会合并。

(2) 每个保留的分会选举五名负责人，即主席、书记员、司库、图书管理员和秘书各一人。

(3) 各分会的这25名负责人组成工人联合会委员会。

(4) 委员会每周举行一次讨论联合会事务管理的会议，并从中选出一名主席（他同时又是全体会议主席）、一名书记和一名司库。

(5) 保留的各分会不需要的所有联合会物品暂时由司库贝多尔夫保管，以后由新任命的主席保管。

(6) 这次会议将于本月30日在旧钟楼附近的普法尔继续举行，听取各分会通过这些决议的情况报告，然后确定组成新的委员会等等事项。

(7) 联合会全体会议不再像以前那样每周举行一次，而是由委员会根据情况不定期召开。

各分会的议程照旧。

1849年6月10日《自由、博爱、劳动》

（科伦）第30号

372

弗里德里希·列斯纳回忆科伦工人联合会在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期间的活动

1849年5月中以后

[……] 几个月以后，马克思就被驱逐出普鲁士，恩格斯前往已经爆发革命的巴登。我的几个熟人也前往巴登。沙佩尔前往拿骚组织那里的农民。其余留在科伦的同志们对乡村展开了宣传工作，因为当时我们已经懂得在农民中进行宣传的意义。（1893年我出席社会民主党科伦代表大会^①时，有几个农民邀我到科伦附近的沃林根去。他们还记得我在1848年和1849年的情景）我们利用空闲时间制造子弹，造好后运往巴登。当然，子弹是秘密地制造的。“红色贝克尔”（后为科伦市长和众议院议员）弄来弹头和火药，我们每一个人都各尽所能，支援革命。[……]

弗里德里希·列斯纳《一八四八年前后》，载于1898年《德意志言论》（维也纳）第4期第147页

节录

^① 关于列斯纳出席1893年科伦代表大会的情况，参看本书第2卷。

376

奥斯渥特·狄茨（弗兰肯塔尔—普法尔茨）给弗里德里希·卡尔·海特尔（维斯巴登）的信¹⁸⁵

1849年6月8日

亲爱的海特尔：

几天以前我就已收到了你的来信，不过未能及时回信，因为邮递太不安全，而且今天我才有机会给你写信。我在等待拿骚的消息，据说那里比较安全。但是，我对此并不抱任何幻想，所以我宁愿等待你的来信加以证实。我寻思，短期内我们将采取强有力的决定性行动，到那时，希望拿骚也能贡献一份力量。如果需要早一点谈谈其他什么事情，那么就请你立即把这件事告诉我，以便我们同巴登—普法尔茨取得联系，与他们携手并肩地共同前进，而且我也可以立即为能干的军官们做主事。我在这里听说，好些村镇（迪伦堡、拿骚）都由自己负责购买了大炮，如果这是真的，那就出色地证明了我们人民的精神。我们的自卫军在维斯巴登的情况怎么样？因此，请你同古德马尔谈谈，并代我向所有的人表示衷心的问候；另外，别忘了内罗塔尔的范哈恩，告诉他，我随时都准备去。如果发生什么事情，最好派一个可靠的人（无产者）通知我；来人可以到布伦克尔主教那里找我，我住在他家。我们的大本营现在驻扎在弗兰肯塔尔；边境地区牢牢地

① 位于维斯巴登西北郊。

掌握在我们手里；齐茨率1 500人在阿尔森茨塔爾安营扎寨，他的前哨部队驻扎在克罗茨纳赫附近。

再见，由衷地向我们所有的熟人致意，并向你本人问候。

你的忠诚的

奥斯渥特·狄茨

波茨坦国家档案馆，

第一次发表

Rep.30C, Tit.94, Lit.W, Nr.301,

Bd.1, lfd.Nr.14037

377

卡尔·沙佩尔在伊德施坦全邦代表大会上的讲话¹⁸⁶

1849年6月10日

[……] 沙佩尔说：同胞们！请允许我陈述我的提案的理由。¹⁸⁷ 我们现在正面临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清晰而明确地表明我们需要什么。我不怕残忍的暴力对准我们的刺刀，人民的精神将轻而易举地摧毁它；但害怕普鲁士的花招。为了使人们在解释我们的决议不走样，我再说一遍，我们必须把它表述得清晰而明确。祖国的叛徒已经宣布到哥达召开会议，以便在那里成立新的国民议会。这是由亨利希·冯·加格恩和我们的拿骚议员麦克斯·冯·加格恩签署的。因此，我们必须补充说：“在斯图加特召开”，我们必须赞赏所有坚持到最后的人们，赞赏所有不怕掉脑袋的人们，赞赏所有声明“要同德国的自由共存亡”的人们；所以，我们除了斯图加特的国民议会以外，不承认其他任

何地方的国民议会。（妙极了！）其次，我们必须声明，不管这次在斯图加特召开的国民议会的人数多寡，我们都承认它是国民议会，因为德国的诸侯们和祖国的叛徒们甚至说过这样的话，斯图加特人已不再是多数，所以是一个准议会。我们必须清晰而明确地声明，关键不在于数量，而在于活在这些人心中的精神；关键只在于，这些人下决心同德国的自由共存亡。因此，我们声明，在这个意义上，那里即使只有50人，即使只有5人，但他们确实是为德国的自由、为德国人民的幸福而生存、战斗和牺牲的；我们承认他们是最高的德国权力。（热烈喝彩！）同胞们！我衷心希望我关于第一条款的提案获得通过。〔……〕

主席说：沙佩尔先生提议，代表团应由56名成员组成，每个单位出2名。

其次，会议任命一个由7名成员组成的全邦委员会，从今天起就举行会议，为实施各项决议采取必要措施。（获得支持。）

沙佩尔说：同胞们！为了实施我们的决议，我们固然需要做一些工作，但我们不能说，像我们今天在这里一样，我们要前往维斯巴登，要推翻政府，这种事我们不能干，所以，今天我们什么也不能干，干什么事都不能随心所欲，我们不能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因此，必须任命一个委员会，但不是由15名成员组成，因为那样不能代表拿骚的所有单位，所以每个单位出2名代表要好一些，可能的话，明天就去找赫尔佐格和内阁。议院要到下星期五才开会，现在重要的问题是，它是否又恢复每周开会。此外，我们必须考虑到，如果代表团此行一无所获，那该怎么办？格劳博士提议，拿骚的左派应当领导人民。但是，话根本不能这么说。谁算是左派，我们不知道，这里并没有指特定的人。

我们不能决定，也不许可决定，比如要在3月4日开往维斯巴登，因为，如果我们作出这种决定，那么，今天晚上维斯巴登就会全都知道，而明天普鲁士人就会进驻那里，因此我们任命一个由7名成员组成的全邦委员会是有必要的，旨在为实施这些决议采取措施，而且它可以在全邦范围内采取必要措施，而敌人却无从知道我们的意图；敌人打的是暗牌，如果我们打明牌，会输牌。因此，我们必须挑选那些我们深信能完成我们的事业、能对我们负责的人。在这里，讨论实施决议的方法，是不切实际的。我是老革命了，曾经历过多次革命，并且知道，如果公开说明实施这些决议的方法，那将一事无成。

主席把朗格的提案的第一部分，即“委托办公室起草三份呈文（一份呈拿骚议院，一份呈内阁，一份呈赫尔佐格）”一事提交会议表决，并被通过。

沙佩尔提议对朗格的提案的第二句话加以修改，认为应选举一个由56人组成的代表团，这个提案获得通过。〔……〕

卡·沙佩尔的提案说：“会议任命一个由7名成员组成的全邦委员会，从今天起就举行会议，为实施我们的决议采取必要措施。”

我首先提出附议迈耶尔博士的提案的问题。迈耶尔先生收回了自己的提案并赞同卡·沙佩尔的提案，我对卡·沙佩尔的提案也表示支持。（获得支持。）

沙佩尔说，同胞们！我刚才已向你们阐明了理由，为什么这个全邦委员会是必要的，为什么它不应当公开辩论为实施我们的决议采取必要的措施。固然现在正是我们变言论为行动的时候，但是我们采取什么方式，不必让反对我们的那些人知道。〔……〕

主席将卡·沙佩尔的提案提交会议表决。该提案获得通过。

沙佩尔说：同胞们！主席先生征求我的意见，应当用什么方式选举这个全邦委员会，我认为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进行：或者先提出提案，对它进行表决，或者委托办公室提出14名候选人，其中得选票最多的7名当选。这一选举非常重要。〔……〕

沙佩尔说：我完全赞同朗格博士刚才提出的意见。^①左派成员深得爱自由的拿骚人民的信任。他们在维斯巴登，正因为他们在那里，所以，最适合进行我们的事业。我希望并相信，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我们大家都能要求这7人执行我们的决议。〔……〕^②

沙佩尔说：同胞们！你们现在选出了全邦委员会，我请你们牢记这个名字，如果这些同胞不执行我们的决议，他们将受到人民的审判。（好极了，太棒了！）〔……〕

《维斯巴登陪审法庭就魏因巴赫和萨校对
员和语言教师卡尔·沙佩尔持有叛国罪、
污辱国王陛下、污辱普鲁士国王和亲王皇
的辩论（1850年2月8—15日）》1850年
维斯巴登版 第70—71、97—100、102、
103页

摘要

① 有人提议，会议应提出21名成员，从中选出7名委员会委员，针对这个提案朗格代表提议：7个委员会委员从全议院的左派中选举产生。

② 接着左派用讨论出理中代表大会的左派议员中选举产生了7人委员会。

378

科伦工人联合会全体会议记录

1849年6月18日

主席，公民勒泽尔9时前宣布会议开始，首先陈述了联合会及其各分会的现状。他提醒说，由于反革命暂时取得胜利，参加政治联合会的人比较少，所以有必要将原来的九个分会压缩为五个，并对委员会作一些调整；他向会议报告说，根据前主席卡·沙佩尔的提议，委员会由保留下来的各分会的全体负责人组成，公民勒泽尔、赖夫和贝多尔夫分别当选为主席、书记员和司库，但这都是临时的，条件是须经全体会议批准。^①

会议对此表示同意，并批准了委员会进行的选举。

司库就最近四个月来现金的核算和结算情况作了详细报告。

接着，主席谈到了报纸问题。他说，报纸由于缺乏股份已经被迫停刊。可是有一个公民（他认为报纸是联合会的机关报，具有重要意义，所以不能停刊）愿意负担四号报纸的费用，于是，委员会作出了决议，试着继续出版该报，并把编辑工作移交给了由公民赖夫、奥托、萨尔格特和格律恩组成的委员会。^②

① 参看文件371。

② 5月13日《自由、博爱、劳动》报出版了第28号以后就被迫暂时停刊，自从四号的费用有了保证以后又以周报形式出版至6月24日，在此期间，由赖夫担任编辑。最后几号是用红色油墨印刷的。

接着，会议就钦定选举法进行了讨论^①，并一致通过决议，如果这个分为三次过滤的法律生效，就不参加任何选举。

会议概述了当前的政治问题以后便宣布结束。

门票收入为6塔勒18银格罗申。

为沙佩尔募捐2塔勒4银格罗申3分尼。

1849年6月24日《自由、博爱、劳动》

（科伦）第32号

379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科伦）给卡尔·马克思（巴黎）的信¹⁸⁸

1849年6月22日

1849年6月22日于科伦

亲爱的马克思：

我从阿姆斯特丹回来后就已立即通知你夫人，在目前情况下，波斯特未经在吕登沙伊德的格尔施泰因的特别同意，是不愿把那1000塔勒交出来的。关于我这次旅行的不愉快后果，想必她已立即告诉你了。从那时起，我就再没有得到有关波斯特的其他消息，这一点或许可以说明：格尔施泰因并没有同意。

至于楚劳夫的问题^②，楚劳夫（就是为了不让银行出卖他的

① 1849年5月30日，在普鲁士开始施行三级选举制。

② 1849年1月，亨利希·楚劳夫给《新莱茵报》资助了13股贝尔格—马尔克铁路股票，此事由马克思作保。

股票) 已用另外三张股票(每张通常为100塔勒) 自行弥补了因股票行市下跌而由银行要求的100塔勒差额, 所以, 现在必须用340塔勒去赎回每张为100塔勒的整整13张股票。我准备听从瑞特的劝告, 让人扣留这340塔勒以及波斯特还在期待的这笔钱的可能费用; 采取这个步骤, 你会发现, 是完全对你有利的。

[……]

手稿

节录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 F. 1, op. 5, Nr. 228

380

关于科伦工人联合会纪念六月起义一周年宴会的报道¹⁸⁹

1849年6月25日

科伦, 6月25日。这里的工人联合会为纪念巴黎六月起义一周年在埃塞尔大厅举行宴会, 参加者相当踊跃。几位党的重要领导人也出席了宴会, 而当那些在任何情况下都坚韧不拔的真诚可靠的战士入场时, 更加受到了忠厚正直的工人们——民族的核心热烈欢迎。铿锵有力的演说、祝酒词和歌曲为宴会增添了乐趣。当一些人为高级人士喝倒彩, 而主席又未能及时制止这种讨厌的举动时, 一个警官强令纪念活动结束, 说是因为时间拖得太长。可是活动并没有结束, 而在再次要求人们离开大厅时, 又一次奏起了《马赛曲》。这时军队开来了, 并且用刺刀将人们赶出了大厅。

自由结社权和法定权力万岁！

1849年6月26日《苏科伦日报》第146号

381

弗·格吕贝尔（汉堡）给卡尔·马克思（巴黎）的信

1849年7月2日

1849年7月2日于汉堡

亲爱的朋友：

今天收到了你从巴黎的来信（没有注明详细日期），尽管内容令人不快，但我还是很高兴，因为这毕竟表明你还活着！哈哈！我们曾经同战斗，共患难，风雨同舟。这里也碰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因此我立即坐下来给你写这封信，以便你一听到这种不愉快的、布龙给你的信没有回答的消息时，不致吃惊。弗里施^①，就是那个梅克伦堡人，他当时比你还早一天就旅行去了，此后再没有回来，估计他还在康斯坦茨！他的地址，也许是比较详细的地址，我能在最近两三天内了解到，到时候我再次写信告诉你；因此，今天我提笔写信，就是为了至少暂时消除一些不愉快的消息。至于布龙，最近（在使用罗德的地址时）他没有收到过一封信。除此之外，布龙是会得到宽恕的，也就是说，要排除

① 原件上为：弗里奇。1849年5月6日，克罗克辛的具有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贵族地主冯·弗里施在汉堡交给马克思50塔勒，以供继续出版《新莱茵报》之需。

极大障碍。我很奇怪，你竟然对此事一无所知？？这是所有官方报纸都登过的呀！布龙现正蹲在普鲁士的监狱里!!!……巴登革命爆发以后，他想要同施拉姆和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胖子上尉（我知道你也认识此公）一起去旅行；于是他们三人同行，他们要路经爱森纳赫（不知是这里的人告密的，还是像后来返回的缪勒尔上尉所说的，是一个同路的大个子军人告密的？）。够了，他们在莱尔特（汉诺威）就被拘留，文件被查抄，而且布龙发疯似地非要随身带走的印刷品和其他著作也统统被抄走；而警察至今似乎还认为这次逮捕是完全合理的，因为他们以为布龙就是德斯特尔，他们早已不需要任何伪装；从此我再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得知有关布龙的任何消息了，只获悉他很快就被从汉诺威押走，交给了普鲁士。我们考虑再三，尽了最大的努力，但都是枉然，我们无能为力；他动身时带走的是这里签发的一个法国护照（身份是科尔马的利布林），施拉姆护照上的名字是泰奥多尔·哈根。此外，这次旅行安排得极其糟糕，他们的做法轻率得有些不可思议，愚蠢得有些不能想象！比如，布龙竟把1846年对施拉姆的相貌特征描述随身带着，这是他不久前像珍品一样收藏的。施拉姆也无影无踪了，据估计，他被交给了多伊茨他以前所在的卫戍部队。这两个人的命运凶多吉少，已经是“九死一生”。①

埃克尔曼已被驱逐，现在住在旺茨贝克，他的居留证已经到期，有人就抓住这一点，不予更换新的居留证，从而把他驱逐出境。此外，这些民主派，哈根、勒韦、埃克尔曼等人还作了垂死

① 根据但丁·阿利格埃里《神曲》中“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一句的随意改写。

挣扎；不过他们没有阿谀奉承的本领；然而他们出了洋相，现在挺“合适”，正在等待事件的发生，而这种事件是会发生的；制宪议会还希望实现它的制宪成果，汉堡人还希望而且相信光在他们的羊圈里就能处理他们的事情！他们很快就会发现完全不同的情况，这种情况对于这帮愚蠢的自由化的资产者无赖来说是再合适不过的。〔……〕

他们大谈特谈缔结和约，即同丹麦缔结和约，而汉堡人在想象中觉察到他们的三桅船正扬帆起程；如果普鲁士人在巴登应付得了，这件事是完全可能发生的；反革命的最后这一幕可能将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上演。

再见！今天就谈这些。过几天我再给你写信；可惜心有余而力不足。

罗德衷心地向你问好。

致以亲切的问候

弗·格吕贝尔

通信地址：斐迪南大街25号欧根·施特龙收。

又及：这个地址非常合适，完全可靠。

同上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F. 1，op. 5，Nr. 229

节录

第一次发表

382

恩斯特·德朗克（巴黎）给约瑟夫·魏德迈（美因河畔
法兰克福）的信

1849年7月25日左右

[……] 马克思还在这里——由于红色沃尔弗^①，他最近很
倒霉。我们准备临时——在我们的报纸时来运转以前——搞一个
印刷厂：“《新莱茵报》编辑部出版社”，在这里或在日内瓦印
刷东西，可能的话，一开始就立即出版马克思的小册子《雇佣劳
动与资本》和出版一个社论集《〈新莱茵报〉选辑》。¹⁹⁰ 为了筹
集经费，马克思和我给德国的许多人都写了信；成败将取决于能
否筹集到经费；如此等等。

向你夫人、吕宁及其夫人问好。最近几天内我将再告详情。

你的

恩·德朗克

阿萨德路9号（用我的真名）

另外，请写信告诉我，你是否知道恩格斯的近况；马克思尽
管给恩格斯写了三四封信，但仍然杳无音讯。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案馆档，F.181，Nr.4/2

节录

第一次发表

^① 斐迪南·沃尔弗。

彼得·格尔哈德·勒泽尔1853—1854年关于1848—1849年革命时期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供词摘录¹⁹¹

今天^①，20号罪犯回答问题如下：

1848年革命后不久，我成了在科伦成立的工人业主联合会以及民主协会的会员。在工人业主联合会里，我当选为理事会成员。1848年6月以前我一直一直是这些联合会和协会的会员。1848年6月，我退出了业主联合会，因为工人在那里享有的权利大大少于业主享有的权利。稍后我退出了民主协会，因为我提出的关于救济第一次巴登起义的参加者，当时在伯桑松流亡的维利希、严森和其他科伦人的建议遭到拒绝。这时和稍后我还不是科伦工人联合会的会员，因为我不喜欢它的组织。已故的哥特沙克医生被捕后，约瑟夫·莫尔代替他履行联合会主席的职责。在莫尔的领导 下，工人联合会采取了一种比较坚定的立场，所以我这时加入了联合会，并立即参加了联合会的讨论。9月，由于众所周知的街垒事件，沙佩尔和贝克尔被捕，在这以后不久莫尔流亡伦敦。这时我当选为工人联合会的主席。^②

在工人联合会的会员当中我认为最有教养和最能干的工人是

① 1853年12月30日审讯。

② 九月事件以后，卡尔·马克思当选为科伦工人联合会主席，参看“文件303”勒泽尔当选为负责日常工作的副主席。

理发师老贝多尔夫（住在奶油市场）；我同他结识，在他的帮助下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原则有了更多的认识。我同他结交并成了朋友之后，我终于从他那里知道，还在1848年革命以前就有共产主义者同盟；哥特沙克医生，土地测量员严森和他在科伦建立了支部；哥特沙克医生在革命前平均每周同工人会见两次，但工人人数不超过15人，在这些集会上哥特沙克作有关共产主义的报告和有关历史题材的报告。贝多尔夫还告诉我，同盟主要驻地是伦敦，那里有四个支部，共60人，同盟中央委员会设在那里。在布鲁塞尔有两个支部，在巴黎有两个，在瑞士有几个。1847年在伦敦召开了代表大会，会上讨论并通过了章程，后来给哥特沙克医生寄来了几份石印的。但贝多尔夫不知道哥特沙克把它们存放在什么地方。贝多尔夫读过这个章程，但他手头没有。我本人从未见过章程，但这无疑是在科伦审判时提到过的1847年12月8日的章程。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马克思受委托起草后来发表的《党的宣言》，这一宣言据说是用同盟的资金印刷散发的。正像贝多尔夫告诉我的那样，革命后不久，伦敦各支部通过决定，让尽可能多的盟员回德国宣传同盟的原则。还决定临时把中央委员会迁往布鲁塞尔，并从同盟的储金中拿出些钱给没有钱的盟员，供他们回德国。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一些贝多尔夫不知道姓名的人暂时留在布鲁塞尔同布鲁塞尔支部共同领导同盟。这些到达布鲁塞尔的盟员和布鲁塞尔支部成员开了联席会议，一致决定委托马克思全权实施对同盟事务的领导。他记得，马克思当时还去了巴黎，尔后同其他一些著名的革命者到了科伦，旨在接受将要在科伦出版的《新莱茵报》主编职务。在这之后不久，在著名的罗马旅馆专门为此租赁的房间里召开了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人

是：

1. 卡尔·马克思。
2.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3. 哥特沙克医生。
4. 土地测量员严森。
5. 理发师贝多尔夫。
6. 卡尔·沙佩尔。
7. 约瑟夫·莫尔。

8. 鞋匠弥勒（他在科伦期间在格拉斯街蒂尔鞋店里工作，如果没有记错，他是萨克森人，1849年参加了梅洛斯拉夫斯基的巴登进军，如果他这时没有回到德国，那就可能在瑞士）。

9. 裁缝帮工豪德（眼下在伦敦）。

会上发生十分激烈的争论。因为科伦工人联合会组织方面的问题，哥特沙克遭到严厉的指责，此外，马克思建议解散同盟。在第一个问题上，马克思和沙佩尔意见一致，在第二个问题上，哥特沙克和马克思意见一致，都赞成解散同盟。由于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不一致——沙佩尔和莫尔要求无论如何保留同盟，——马克思就运用交给他的自行酌定行动的权力，解散了同盟。^①马克思认为同盟继续存在是不必要的，因为同盟不是密谋组织，而是宣传组织，在现在的条件下可以进行公开的宣传，不需要有秘密组织，因为已有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

^①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交给马克思的自行酌定行动的权力只能使用到1848年3月初中央委员会从布鲁塞尔迁至巴黎为止，参看文件206。有关细节，参看康捷尔《一个拙劣案件的招供辩护》，载于1962年《苏共历史问题》第3期，德译文载于1963年《德国工人运动史论丛》第2期。

1849年春，沙佩尔——我在工人联合会里结识了他——约我第二天晚上同他和其他几个人会面，如果我没有记错，地点是在赫伯茨的小饭馆里，因为他想秘密告诉我们一些事情。^①我到赫伯茨饭馆时，下面一些人已经在那里，或者稍后来那里：

1. 卡尔·沙佩尔。

2. 鞋匠弥勒。

3. 裁缝豪德。

4. 裁缝迈耶尔（现在伦敦，娶了英国女子为妻，他是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员，他的其他情况我就说不清了）。

5. 商人赖夫。

6. 理发师贝多尔夫。

7. 裁缝诺特荣克。

8. 克里斯蒂安·约瑟夫·埃塞尔（后来是《西德意志报》的出版者，现在大概流亡英国）。

沙佩尔通知我们说，以前有同盟，被马克思解散了，但他从未同意解散同盟。他又说，1848年的钦定宪法颁布后，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已大受限制，今后无疑还要受到更大的限制，是该重新建立同盟的时候了。他说，莫尔，我们知道，他当时流亡伦敦，同以前留在伦敦的盟员一起，建立了支部。这个支部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由莫尔、亨利希·鲍威尔和埃卡留斯组成。莫尔受这个中央委员会的委托，甚至未经马克思的同意，在科伦建立了支部。沙佩尔给我们讲了同盟的组织的目的，然后问我们想

^① 勒泽尔所说的莫尔已在1848年11月到德国作特使旅行，所以，这里提到的会面大约是在1848年底，至少是11月中以后，而那时沙佩尔还在监狱里。

不想加入同盟并同他一起建立支部。我们回答说同意，但要求他先把新章程给我们看看，我们，尤其是赖夫还声明，我们将不参加密谋性同盟。沙佩尔答应立即写信去伦敦要他们把章程寄来，等章程一寄到，他就拿给我们看。这天晚上的谈话就到此结束。不久，约瑟夫·莫尔以特使的身分，受重新建立的中央委员会的委托，来说服马克思和恩格斯赞成重新建立的同盟。莫尔持有英国护照，用的是英国人姓名，但我记不得这个姓名了；他住在他的密友沙佩尔那里。我得到沙佩尔邀请，叫我第二天晚上到《新莱茵报》编辑部去。在那里，在二楼出口右边的一个房间里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是：

1. 卡尔·沙佩尔。
2.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①
3. 威廉·沃尔弗（鲁普斯）。
4. 卡尔·马克思。
5. 诺特荣克。
6. 弥勒（鞋匠）。
7. 赖夫。
8. 贝多尔夫。
9. 豪德。
10. 埃塞尔。
11. 莫尔。
12. 我。

① 如果恩格斯参加讨论的话，那么，最早是在1849年1月下旬才有可能，因为他这时才从瑞士回到伦敦。

讨论的问题是：是否应建立同盟。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和沃尔弗为一方，沙佩尔和莫尔为一方进行辩论。马克思重新声明说，既然还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同盟是不必要的。沙佩尔和莫尔则声明，同盟的存在是极其必要的。马克思及其支持者还反对伦敦支部制定和通过的章程，章程是莫尔拿出来的。这个章程也就是在柏林的鞋匠黑策尔那里没收的那个章程，名称叫做《革命党章程》。^①马克思反对这个章程，原因是它宣布斗争的目的是“建立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所以章程不是共产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的；另一个原因是它一切都归结为密谋活动。在表决时，赞成新的同盟组织的，只有沙佩尔、莫尔、弥勒、豪德、迈耶尔，如果我没有记错，还有埃塞尔。莫尔不久即离开科伦到全德旅行。他在此行期间，正如马克思后来从伦敦来信告诉我的，接纳了下面的人加入同盟：

1. 比雷菲尔德的商人雷姆佩尔。
2. 汉堡的木材商马尔滕斯。
3. 施韦林的水疗医师迈耶尔。
4. 柏林的鞋匠黑策尔。
5. 莱比锡的裁缝马尔提乌斯（马尔提乌斯兄弟中的小马尔提乌斯）。

莫尔写信给伦敦说，人们对他很冷淡，因为当时正在酝酿巴登运动。

在莫尔旅行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被警察当局驱逐出科伦。沙佩尔去了维斯巴登，打算在那里进行鼓动活动。豪德和弥勒去普

^① 文件321。

法尔茨，在维利希的指挥下参加巴登进军，后来流亡瑞士，豪德后来从那里去了伦敦。这样，计划中的组织也就完了，因为领导人都已离开，或者已被驱逐出科伦。 [……] ①

波茨坦国家档案馆，Rep.30C,Tit.94,
Lit.R.,Nr.208b

① 勃泽尔关于革命以后历次事件的供词，见本书第2卷。

附 录

a

流亡者同盟章程

（“山岭”章程或“营地”章程）¹⁹²

约1834—1835年

“营地”章程

第一章 德国流亡者同盟的性质、 宗旨和组织机构

- 第1条 德国流亡者同盟是由德国人组成的组织。所谓德国人，就是指所有说德语、保持德意志民族风俗习惯的人。
- 第2条 德国流亡者同盟的宗旨是使德国摆脱耻辱性奴役的桎梏，建立一种能使人类防止再受奴役和贫困的制度。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首先在说德语、保持德意志民族风俗习惯的地区，然后在世界其他地区建立并维护社会的和政治的平等、自由、公德和民族团结。
- 第3条 德国〔流亡者〕同盟力图通过下列途径来达到这个目标，即承认人权和公民权宣言¹⁹³中提出的各项原则和流

亡者信条^①中的有关条款，并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争取在资产阶级社会的雇佣关系下实现这些原则和条款。

第4条 德国流亡者同盟下设若干帐篷和营地；茅舍由营地领导，营地则由总营地领导，而总营地又由中心领导。

第二章 帐篷

第5条 帐篷是同盟的基层组织。

第6条 帐篷的使命是扩大同盟盟员的数量，并为营地建立培养和考核的学校。

第7条 茅舍的活动有明确的规定，并以同盟一般章程^②为指导。

第三章 营地的性质和宗旨

第8条 营地是每个由中心在这个名称下认可的流亡者多数组成。

第9条 所有营地构成德国流亡者同盟的第二层和最高层。

第10条 营地是同盟的最高目标的捍卫者，同盟的全部决议的执行人，同盟的内部机构和对外活动的顾问，同盟的物质力量的指挥者。

第11条 此外，营地还负有下列使命：

- a. 承认和积极宣传第2、3条中阐明的本组织的原则；
- b. 在其最后结论中阐述并设法实现那些原则；
- c. 无条件服从同盟领导机关的各项法规；
- d. 服从同盟的一切规章和其他各种规定，并将执行情况

① 参看附录a。

② 附录b。

上报上级组织；

e.采取一切有效措施，为所辖各帐篷制定与同盟的宗旨相应的方针；特别是设法承认同盟的原则和执行同盟的决议。

第12条 一个营地可领导若干个帐篷，营地成立之前不得设置帐篷。

第13条 营地的存在对各帐篷保密。破坏本规定者，要被开除出盟或酌情处以死刑。

第14条 帐篷对茅舍的领导是由营地为此任命的三名全权代表来体现的，必要时，全权代表可向帐篷公开自己的身分，说明自己是中心的委托人，及时执行营地的决议，定期向营地报告工作，并对营地的工作负责。

第15条 帐篷根据营地的决议进行划分。

第16条 每个营地不得少于三名成员或超过十名成员。

第17条 营地一旦具备分设的条件和形式，就可以分设，但必须立即上报同盟常设机构（如条件许可的话）。

第18条 每个营地可以自行确定自己的名称，各个帐篷的名称也由营地确定。

第19条 营地^①必须每季度向同盟常设机构汇报其全部活动情况及其了解到的一切有价值的事例。书写这种报告时要注意保密条例，如果不能口头汇报，就必须使用已经规定或即将规定的密码书写。报告在每年的1、4、7、10月份呈送。本组织的来往信件阅后务必立即销毁，从其中

^① 在此以前，原件上都使用“山岭”这一旧名称。

摘出的要点务必用密码保存。

第20条 每个营地设一储金处，存放除一些门票收入和每月的会费以外的、营地以其他方式得到的一切款项。会费的数量由营地根据其成员的经济情况而定，会费缴纳情况可以全部公布。作为全权代表在帐篷缴纳会费的成员不再向营地缴纳会费。

第21条 各营地的储金处由各营地自行支配，但在紧急情况下，同盟常设机构有权根据储金处的储金量提取适当款项。因此，定期清理帐目是每个营地应尽的义务。

第22条 除一般章程规定的领导成员外，每个营地还有一名司库。此外，营地的领导成员要执行一般章程中的有关规定。

第23条 各营地之间现在和将来(如果可行)都要相互保守秘密，严格杜绝直接交往。整个同盟的联系只有同盟常设机构掌握。

第23a条 各营地的识别标志要有别于各帐篷的识别标志。

第四章 接收新盟员

第24条 凡是没有在某个帐篷作为同盟兄弟举行仪式的人，均不得接纳入营地。

第25条 只有在本组织的利益需要直接将某人接纳入营地时，上述规定才有例外，而营地授权决定这种例外。

第26条 被接收入营地者的首要条件是：具有真正共和主义的朴实作风、性格勇敢坚定、严格遵守同盟的各项原则、恪守秘密、深明秘密组织的实质。不具备上述条件，任何

营地都不得允许新盟员参加营地的活动。此外，为各帐篷接收新盟员所规定的各项要求也是完全必要的，这是事物的本质，无须详加说明。

第27条 为确保申请入盟者都具备上述条件，必须极其慎重地审查他们的履历和现实的具体表现，待查明他们在这两个方面确实令人满意以后，才能就他们的入盟问题进行表决。申请者通过表决以后，就任命一个委员会，十分谨慎地向他们详细交代本组织的政治原则和应尽的义务；然后，如果他们的回答令人满意，便可以向他们暗示：在同盟中可能要建立更高的一层，目的是在这一层内把一切现行的原则和机构结合起来。接着再问他们，是否愿意接受将要建立的这一层的约束；待他们没有丝毫顾虑，保证严守秘密以后，再向他们讲明，这一层已经存在，问他们是否愿意加入，如果申请者愿意，可以当委员会的面立即举行入盟仪式，也可在营地的下次会议上举行入盟仪式，这由营地作出决定。

第28条 下面是入盟时应履行的誓言：“我宣誓：决不泄露这一层的存在，服从它的各项法规以及它的法定上级的指令，愿意为它的目标而牺牲自己的生命。我以我的荣誉和生命担保，永不食言。”

第五章 总营地

第29条 总营地是同盟的一级机构，它们领导一定范围内的营地和帐篷。

第30条 总营地^①由中心^②来指定，它们的成员和驻地只有同盟

最高机构知道。

- 第31条 谁泄露总营地的秘密，谁就将被开除出盟和遭到谴责，情节严重者处以极刑。
- 第32条 总营地有权要求所辖地区的所有营地成员和同盟盟员绝对服从自己。
- 第33条 总营地的义务是，在辖区执行同盟的法规以及中心的一切规定，按季度向中心汇报本区的工作情况，特别是汇报它所掌握的有价值的材料。中心的情况或决议常常要求总营地注意在其领导下的同盟组织的安全，促进它们的发展，主动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行动，只要它认为适宜，良心上负责任就行。
- 第33a条 中心在每个总营地成员中指定一名通讯员，以便保持总营地与其全权代表的联系；通讯员有权挑选一名经证明能处理一切通讯业务的人为自己的助手。
- 第34条 中心有权酌情解散总营地或清除个别成员。
- 第35条 总营地以自己的荣誉和生命担保其工作对同盟负责。
- 第36条 各总营地现在和将来相互间都严格保密。
- 第37条 如果这条秘密因偶然事件而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总营地内泄露，那么，各有关的总营地在履行职责时禁止直接联系，只有在得到明确批准后才允许直接联系。
- 第38条 总营地任命的全权代表机构负责总营地同其领导下的同盟组织的联系。

① 在此之前，原件上均用“高等法院”这一旧名称。

② 在此之前，原件上均用“全国委员会”这一旧名称。

第六章 中心

- 第39条 中心是德国流亡者同盟的最高立法机关和执行机关。
- 第40条 中心作为这样的机构，有权要求全体营地成员和各级同盟组织无条件地服从自己。
- 第41条 中心自己选择它的成员，鉴于本组织的秘密性质，此规定是必要的。
- 第42条 中心的成员和他们的居留地址对一切非中心成员的流亡者绝对保密。
- 第43条 中心的义务是：执行同盟的法规，关心同盟的安全和发展，修改法规（上述考虑经常要求这样做），公布识别标志，通过适当途径准备迎接拯救祖国的伟大时刻，继续领导同盟力量，直至实现同盟最远大的目标。
- 第44条 法规是一种表达基本思想和达到最终目标的手段。基本思想和最终目标是不能修改的，而法规是可以修变的。但是，凡是根据法规制定的合同，一旦法规失效，**合同也随之失效**。如果每一个同盟盟员还有良心，不想放弃同盟，那么，在流亡者同盟内，任何基本法规都不能改变。
- 第44a条 所谓基本法规，就是指一切关于重要原则和同盟内部组织基础的规定。
- 第45条 中心的成员以自己的荣誉和生命担保，忠实履行自己的义务；向祖国宣誓，依法惩处每一个犯罪兄弟。
- 第46条 中心与流亡者同盟营地的组织和分营地的联系由中心为此任命的全权代表负责。

第七章 全权代表

- 第47条 全权代表就是一切持有全权证书的流亡者。
- 第48条 有权任命全权代表的有：
1. 中心，
 2. 总营地，
 3. 营地，
 4. 由它们的授权机关明确委托的全权代表。
- 第49条 中心的全权代表不是总代表就是特命全权代表。总代表的权力涉及同盟的各个领域，不管何人何地都要保证总代表执行自己的权力。特命全权代表则受一定界限的约束，超越这个界限就是与他们的威望不相称。
- 第50条 所有全权代表均代表各自的授权机关，他们对本辖区的各级同盟组织享有应有的权利和义务。
- 第51条 全权代表始终义无反顾地以自己的生命和荣誉对自己的工作负责，严守他们所知道的关于同盟的全部秘密。
- 第52条 全权代表只有在公务要求他们不得不公开自己的身分时才能公开自己的身分。
- 第52a条 中心的全权代表在公开自己的身分时应出示中心为此目的给同盟组织和营地的通讯员规定的标志。
- 第52b条 凡是存在营地的地方，都有同盟常设机构的一名全权代表；同盟常设机构的全部通信均由他交给营地，而营地给上级机关的报告则交给他本人。
- 第53条 全权代表应承担的严格义务是，在他们利用他们的威望时要保持举止简朴谦逊，竭力使同盟盟员相信他们的指

令，只在极个别的情况下允许用命令的口气讲话；同时，他们也有权采取强硬措施，对他们来说，为了完成传递任务，这样做是必要的。姑息迁就如同专横跋扈一样都应受到惩罚。

第八章 一般规定

第54条 只有营地成员才有资格被指定为同盟常设机构的成员或全权代表。

第54a条 每个营地的成员，如果拒绝服从法规，就应受到开除出盟的惩罚。

第55条 为帐篷制定的一般规定中的与本章程不相抵触的各条规定，各营地都可参照执行。

中心

根据一个铅印小册子刊印
梅泽堡德国中央档案馆，
Rep, 77. Tit, 509. Nr, 47. Bd, 1

b

流亡者同盟章程

（“一般”章程）194

约1834—1835年

德国流亡者同盟一般章程

第一章 德国流亡者同盟的性质、宗旨和组织机构

- 第1条 德国流亡者同盟是由德国人组成的同盟；德国人，就是指那些说德语、保持德意志民族风俗习惯的人。
- 第2条 德国流亡者同盟是一个绝对秘密的组织。
- 第3条 同盟的宗旨是解放和复兴德意志民族。^①
- 第4条 德国流亡者同盟划分为若干帐篷。
- 第5条 中心对各帐篷实行领导。

第二章 盟员

- 第6条 凡按章程规定而被吸收入盟者，均为盟员；依法被判刑而尚未开除盟籍者，仍为盟员。
- 第7条 入盟的必备条件是：
- (1) 具有十分刚毅的性格，清白，善于保守秘密，为同盟的事业作必要牺牲的精神准备，为实现同盟宗旨而不倦地、同时又是谨慎细致地进行工作；
 - (2) 一致通过接受为一个帐篷的成员；
 - (3) 说明生活资料的来源；
 - (4) 进行忠诚宣誓。
- 第8条 凡有下列情节者，应开除其盟籍：
- (1) 有意或因疏忽大意而泄露同盟的秘密者；
 - (2) 经常有不道德行为者；
 - (3) 在履行盟员义务过程中，经常玩忽职守者；
 - (4) 顽固地拒不接受或反对同盟的宗旨者；

^① 这是A稿，在B稿上还有这样一句话，“实现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的各项原则。”

- 第9条 开除，可能使被开除者招致凌辱，且不排除相继而来的惩处。
- 第10条 只有中心才有权开除盟籍。即使在十分必要时，各帐篷也只有临时剥夺可疑的盟员或在某方面被揭发有问题的盟员参加会议的权力。
- 第11条 盟员之间完全平等、亲如兄弟。在危险和困难时刻，互相帮助。在任何危急情况下，相互支援，关怀无亲无故的盟员亲属，这些就如同每个成员对祖国、对人类应尽的义务。
- 第12条 所有成员都使用在入盟时自选的战斗化名。

第三章 帐篷

- 第13条 帐篷是由同盟常设机关认可的盟员小组。
- 第14条 每个帐篷有少至三人，多至十人组成。
- 第15条 如果帐篷的成员超过规定的人数，超过的人数则另行组成帐篷。
- 第16条 另立帐篷的时间和方法由中心的全权代表决定。
- 第17条 每个帐篷设一个储金处，管理盟员自愿缴纳的会费。帐篷有权独立支配这些会费，同盟领导机关如有某种需要，可以请求动用。^①在另组帐篷时，储金处的款项归保留原帐篷名称和特点的帐篷所有。申请入盟的人应按其入盟介绍人的规定办事。
- 第18条 每个帐篷的建立和领导均由中心的全权代表负责。这些

^① 这里可能被篡改了：根据与流亡者同盟章程（文件5）第17条所作的比较，下面的说法比较准确：同盟领导机关如有某种需要可以请求捐款。

全权代表应是这个帐篷的成员，并尽可能参加这个帐篷的会议。

第19条 吸收那些符合道德标准的、以自己勇敢而又谨慎的行为去很好地影响群众的智慧和思想感情的人入盟，并以此来巩固组织；用讨论社会问题的方法教育盟员和提高其道德品质，乃是每个帐篷的极其重要的职责。帐篷的成员应该支持人民群众对暴政统治的痛恨情绪，并且还应该激化这种情绪；应该鼓励传播这样的学说，它们是为了共同利益，为了有助于从根本上改变德国命运而准备基础的学说；应该密切注视那些享有激进派名声的人的行径；应该使社会舆论更多地建立在公正的原则基础上，而不建立在个人和权威的意見的基础上；应该揭露那些披着爱人民的外衣，打着道德和明智的招牌，而实际上推行的却是奴役和贫困的两面派；最后，还应该时刻准备去保护无辜者和惩治犯罪者。

第20条 每个帐篷设一名主席、一名书记和一名助理。^①

第21条 主席根据自己的意愿或帐篷某个成员的倡议就可召开会议，并负责会议的正常进行。主席在任何情况下都代表

① B稿上为：一名主席和一名助理。关于省去书记一职，调查机关在一篇报告中说：“书记的职责是起草组织的事务所必需的文稿和作会议记录，而在德国没有这样的记录要作，更没有许多东西要写，因此书记一职完全是不必要的，只要为帐篷主席配备一名助理，让他帮助主席的工作就可以了。”

（参看列·弗·伊尔泽《除同盟代表大会建立的委员会外，美因兹中央调查委员会和法兰克福同盟中央委员会1819—1827年和1833—1842年进行的政治调查的经过》1860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463页）

帐篷，除非有任命的特别代表。

第22条 [书记负责起草本组织的事务所必需的文告并作会议记录。] ①

第23条 助理负责财务工作，收集会费，登记造册，必要时代行主席的职权。

第24条 所有负责人均选举产生，他们在履行职务期间服从同盟的各项法规，无法可依时，则服从帐篷的决议，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第25条 负责人的选举每半年进行一次。

第26条 各帐篷之间现在和将来尽可能相互保密，严禁各帐篷之间直接交往。

第27条 充满与同盟宗旨相违背的思想情绪的那些帐篷，应责令其解散或停止活动，但只有中心有权给以这种处罚。

第28条 各个帐篷都使用中心为其规定的专称。

第四章 中心

第29条 中心是由盟员组成的机关。

第30条 中心是德国流亡者同盟的最高立法机关和执行机关。

第31条 中心所在地和成员姓名对同盟其他成员一概保密。

第32条 中心的成员由中心任命。

第33条 中心通过其为此任命的全权代表与同盟各个组织保持联系。

第34条 中心对自己的工作负责，目前是对自己的良心负责，将

① A稿中新增了这一条，而B稿中缺少这一条，因此B稿比A稿少一条。

来是对全民法庭负责。

第五章 全权代表

- 第35条 全权代表是指被授予同盟全权证书的盟员。
- 第36条 同盟的这种全权证书由中心授予或者由中心授权的机关授予。
- 第37条 只有在为完成预定目的而有必要的情况下，全权代表才公开自己的姓名。

第六章 一般规定

- 第38条 发展新盟员，或由帐篷一级代表会议，或由专门的委员会负责。
- 第39条 当帐篷作出决定要吸收某人入盟后，就必须首先向发展对象介绍有关同盟的组织和宗旨，而发展对象则应宣誓保守组织秘密。若发展对象同意这样做，则于预定日期带其到召开发展会议的地方，向他介绍盟章盟规。如果他同意入盟，则立即举行宣誓仪式，而如果他要给以考虑的时间，则可以放行，但必须向其提出警告：假如他违反严守秘密的庄严宣誓，就一定要受到同盟的报复。
- 第40条 入盟的庄严宣誓是：
“我忠诚宣誓：严守同盟的秘密，忠于同盟，准备为实现其崇高目标而牺牲。假如我违反了誓言，愿受凌辱和死亡的惩处。”
- 第41条 组织的叛徒将予以处死。

根据一个铅印小册子刊印，
梅泽堡德国中央档案馆，
Rep. 77, Tit. 509, Bd. 1, Nr. 47

C

传单《流亡者同盟信条》摘录¹⁹⁵

1834年春

[……] ② 于是就只有民主共和国了。在民主共和国里，有着充分的自由，可以建成自由的天堂。人民主权、人民统治是民主共和国的实质，这里不再是由某一个人或一个特权阶级，而是由全体公民规定自由的界限和制定法律。[……]

一个这样的国家，就国家形式来说，可以说已具备自由占统治地位的各种先决条件。但还缺少一点，那就是这个国家联合体还缺少内容和性质，或者说得更明确些，那就是还缺少使人民能够利用和实际利用自己的自由和权力来真正为自己谋利益的国家制度。没有这样的制度，任何国家形式只是形式而已，只是一幅没有生命的美丽图画而已。这种制度必须到公民的社会地位、他们的理智和道德以及他们的财产关系中去寻找。如果人们确实希

① 此外，在A稿上还有一个规定：宣誓入盟者必须闭上双眼，这一点在巴黎通常很流行，而在德国则不太流行。（参看列·弗·伊尔泽《政治调查的经过……》第466页）

② 在这一段的前半段中，谴责了君主立宪制和“贵族制”共和国。

望获得自由，国家在自己的活动中就必须致力于建立这种制度。

在财产占有方面日益平等和公民人人平等的公共教育，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没有这个手段，最完美无缺的人民宪法也就不能保障安宁，不能维护真理。〔……〕

公民要能行使自己的公民权，他首先必须获得独立。但是只有这样的公民才是独立公民，他的生存和生活来源不因为他在外界的地位而受到他人的操纵和支配。但是，在那往往是一个富人支配着几千个工人，他们不靠这个富人就只能受穷挨饿的地方；在那往往是一个特权阶级统治着无数无权的同类，玩弄同类的生命，对他们进行敲榨勒索、百般折磨，只给他们微薄的工资，或给一点侮辱性的施舍的地方；在这些地方，侈谈独立，侈谈平等，简直是笑话，是极大的讽刺。如果自由的人民宪法允许这种依附关系的存在，那它无非就是少数人手中的权欲、虚荣的玩物和工具，其必然结果一定是少数人的统治乃至暴政。〔……〕

上面得出的所有结论，还可以从这样的一条同样是无可辩驳的崇高原则得出，这一原则就是：生存的权利高于财产的权利；自由平等者的国家的生存权利高于个别人的压迫和特权的所谓权利，而压迫和特权事实本身又只不过是无权的产物，几百年来却被说成是权利和传统。〔……〕

在此，我们还要谈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虽然普遍存在，但对我们的祖国来说，却特别重大。我们的祖国由于它的各个民族持续数百年的相互分离已被弄得四分五裂，所以阐明这个问题越发必要。

民族统一是每个国家的原则，是国家存在的保证。分崩离析、支离破碎就是孱弱，一个联邦（联邦制的国家）可使德国的这种孱弱、这种耻辱永久化。〔……〕

只有建立一个统一的强盛的德国，才能保证德国的地位，才能在德国建立和保证自由和平等、权利和道德的统治。

德国要想保证诚实的德国人的康宁、幸福，它一定要把自由、平等、道德和民族统一作为制定德国未来宪法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德国才有希望成为独立民族的兄弟联盟当之无愧的成员。

《流亡者同盟信条》〔1834年巴黎版〕第
4、6—7、9—12页（再版于威纳尔·柯瓦耳
斯基编《正义者同盟的前史和产生》1962
年柏林版第182—190页）

摘要

d

传单《流亡者同盟告德国人民之友书》摘录¹⁹⁶

1834年春

〔……〕“祖国之友的联合是达到自由的第一步，也是最后一步。”只要要求自由的呼声引起广泛的注意，这种联合在整个德国就会迅速获得成功，如果这样，那么，我们的敌人就将集中他们的全部力量，而我们就要准备迎击敌人，在需要我们斗争的地方，我们就要精神抖擞地开始斗争。〔……〕

我们德国人之所以要一个秘密组织，就是因为不允许我们公开集会；因为我们不能公开讨论德国的事务，不让我们公开出版书报刊物；因为我们像一盘散沙，而我们的敌人在我们分崩离析的情况下就可以阻止我们的共同行动。〔……〕

为了这个组织的利益，秘密是绝对必要的。但是，什么事在这样大的秘密中是不可能不泄露的，以致由于疏忽或故意，有时

就难免揭破秘密，因此，务必把这个组织建成甚至连疏忽或故意也不能使它遭到损害，从而使它遭到破坏。这样做的结果，便可使那些只有少数成员之间有较大密切接触的各个部分联合成上述这样一个组织。在每个村子都有三四个或者更多的自由之友，他们一起聚会，他们宣誓决心共同为德国的自由而工作，严守自己的组织的秘密。这样一些同盟者在邻近各村的爱国者中间竭尽全力，使之在那里建立类似的团体，而且已设法建立了这种团体；如果这样的团体早已存在，那么，同盟者便从每个村子中选出一个人，同从其他村子中选出的人再建立起比较密切的联系，进行管理工作，收集自愿缴纳的会费，向他们发送信件和印刷品，向他们报告消息并按照组织成员的精神回答问题。但是，在城市里，就像在农村里一样，人民之友也聚会；在城市里，搞联合比较容易，因为爱国者在这里聚会不像在农村里那样引人注目。一般地说，在城市里进行公开活动的中心点更多，因此，附近城市的组织始终要成为一种纽带，农村的爱国者借以同另一个农村的爱国者建立起联系。所以，四五个或者六个村主席必须从自己中间再选出一个人，同城市的团体的主席进行交往，因而邻近的所有村子就这样同该城市建立起联系。德国的每个省必须在省城再建立一个这样的团体，而这个团体的主席同本省各个城市的团体主席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尔后，整个团体必须由一个委员会负责领导，而这个委员会只同各省城的主席有通讯联系，而且只有一两个成员才知道它。这个以整个组织的平安为基础的委员会，必须尽可能地在自由的敌人面前确保自身的平安，因而务必对它严守秘密，因此，把它的会址设在远离德国的异国，也许是好主意，也许是非常必要的。

这种组织的目标是以德国的需要为出发点。它的主要目标就是采取共同行动，使德国从悲惨的奴隶制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而传播对宣传教育有益的印刷品，为此目的收集自愿缴纳的会费，为人民之友的安全通信提供方便，并以言论和行动准备迎接解放的伟大日子，则是它的最近目标，这个目标目前只有通过这样一种团体才能实现。

在这里如此“明白地”分析一个“秘密”组织的基本特点和计划，有人也许会感到惊奇。然而这一点根本不会引起人们反感。这个计划对于德国各邦政府和德国警方来说，根本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因此，这里并没有向它们泄露什么，因为正是在这里仅仅谈了一个计划，别的什么也没有谈；但这个计划也许会落到一些祖国之友的手里，向他们指明正确的道路，使之沿着这条道路为自由而奋斗，因此，他们手中便有了为其热爱自由开辟活动范围的武器。[……]

《流亡者同盟告德国人民之友书》[1834
年巴黎版]第20—23页

摘要

e

泰奥多尔·舒斯泰尔《一个共和党人的思想》一文摘录
1835年

[……] “为工作而活着，为斗争而牺牲”^①，以劳动求福

① 1831年里昂织工起义期间的战斗口号。

利，或者是在斗争中死去，压缩少数人的过多财富，以消灭人民的贫困。这就是流亡者同盟的格言，是无产者的战斗口号。强化惩治法将是徒劳的，放空炮将是徒劳的，用画饼充饥的办法去解决一系列不平等也将是徒劳的。生铁解救不了饥饿，不幸的后继者依然源源不断。在最终实现上述口号以前，什么和睦与和平、安全与秩序将永远排除在人类社会之外。要是富人们看看别的方面，不昏头昏脑地死盯着金钱，要是叫我们去治他们的眼睛，让他们在自己的金钱的光芒刺激下能够睁开眼睛来，那我们将给他们一个忠告：请你们不要再同君主结盟，要站在被压迫者这边来，这边就是未来，因为这边有权利，这边是实力，因为这边人多。你们担心你们的财产吗？一个理由就足以使你们相信上面的比喻，王权已经危在旦夕，而且你们如果作为它的朋友，你们就会毫无疑问地同它一起灭亡。但是，你们听听正义的呼声，把你们从人民那里拿走而又久久不愿还给人民的東西，主动地还给人民，那么，人民今天还会像接受礼物一样感激地接受，否则到明天，人民就会把这些东西看作是被你们夺去的权利，强迫你们交出来。人民是宽宏大量的，他们将忘掉你们给他们造成的不公，因为人民的心灵天生高尚，乐于宽恕，他们觉得幸福，就会忠实地站在你们一边。反之，他们觉得不幸，就会联合起来反对你们。因此，请把土地还给农民，废除行会权，提高工资，仿效高尚的法国国民议会，这样你们的名誉将由于你们的牺牲结出的珍贵果实而永垂史册，或者说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辉。请紧握人民伸出的友谊之手吧！以应有的憎恨惩治人民公敌的诽谤吧！人民既不想掠夺，也不想流血，他们只想安安心心地干活，拿一份适当的报酬。但是，要是你们拿战争的叫嚣来回答人民和解修好的呼

声，一如既往地用暴力手段对待人民安分的请求。对不起，倒霉的不是人民，人民的事业是不朽的，而倒霉的将是你们自己。你们就会自取灭亡，而且一定避免不了灭亡。你们难道一点不想知道**社会改革**吗？那你们就向**社会革命**屈服吧！

1835年《流亡者》第2年卷第123—124页

（威纳尔·柯瓦耳斯基编《从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1967年柏林版第77—78页）

注 释

- 1 《流亡者》杂志是由雅科布·费奈迪与流亡者同盟的其他领导人一起编辑出版的，从1834年7月至1836年1月在巴黎总共出版了12期。费奈迪等人在《流亡者》杂志上代表一条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只注意政治变革的路线，而舒斯泰尔则与此不同，他从1834年底开始在自己的文章中首先研究社会问题，尖锐地批判了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系列现象。1835年4月，费奈迪被驱逐出巴黎以后，实际上由舒斯泰尔和装订工人爱德华·劳赫两人接管了《流亡者》杂志的领导工作。舒斯泰尔极其坚决地维护自己在《一个共和党人的思想》中所阐发的观点。（参看附录中的文件e）舒斯泰尔对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首先唤起了无产阶级手工业帮工的自信心，其次促进了无产阶级一翼在流亡者同盟内部的形成。然而，舒斯泰尔并不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是代表受到资本主义威胁的小资产阶级阶层的阶级利益。所以，舒斯泰尔的社会纲领一再重复旨在缩小财产差别和建立手工业者协作社的改革建议，但他的出发点是保留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舒斯泰尔的这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设想以及他同费奈迪一起奉行的宗派主义组织计划，妨碍了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形成。关于《流亡者》杂志，参看威纳尔·柯瓦耳斯基编的《从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1967年柏林版第XIX—XXXIII页。——1。
- 2 指德意志人民同盟的领袖，该同盟由德国流亡者和手工业者在巴黎建立。1832年2月，它是所谓的出版和祖国同盟（即“德意志支持出版自由祖国同盟”）的分会形式产生的，1833年夏天更名为德意志人民同盟。正义者同盟的许多盟员是在人民同盟中开始其政治生涯的。1834年4月，针对进步组织政治活动的新结社法开始生效，人民同盟也就无法继续存在，代之而起的是流亡者同盟这一秘密组织，人民同盟的最坚定的成员继续在流亡者同盟中活动。——3。

- 3 艾韦贝克（他在1840年才成为正义者同盟盟员，而且受卡贝的影响很深）的这种说法是不妥当的。最初，主要是巴贝夫和傅立叶的观点，其次是魏特林和沙佩尔的设想在同盟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卡贝的观点从1840年开始才对同盟起了较大的作用；艾韦贝克本人也曾非常积极地在正义者同盟中推行卡贝的思想，他出版过卡贝的著作《伊加利亚旅行记》的德译本，署名是温德尔-希普勒。——4。
- 4 除了艾韦贝克和魏特林的较晚的报道（文件2和3）以外，没有保存下任何足以直接证明正义者同盟形成的资料。因此，就只好追溯到德国各邦政府采取迫害措施的大量成果——审讯记录和类似材料。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中央调查当局所作的总结报告，有一部分已由列·弗·伊尔塞在其《政治调查的经过……》（1860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中发表了。

这类材料多半来源于1840—1841年。1840年秋天，一些流亡者同盟盟员最先在汉诺威被捕后，这个组织的大批成员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美因兹及其周围地区相继被捕。不久，逮捕浪潮席卷德国大部分地区，同时也波及了正义者同盟的许多盟员。

关于流亡者同盟分裂的供词明显地表明，同盟章程（附录中的文件a和b）中有关绝对服从上级领导的规定是同盟分裂的主要原因。相反，个别模棱两可的材料则提到了这样的事实：尖锐的政治思想上的对立是造成分裂的原因，如魏特林和艾韦贝克的论述以及其他许多间接的提示都证明了这一点。——4。

- 5 关于拒绝绝对服从上级的问题，霍夫曼在前几次审讯中已作了供述。比如1840年12月7日的审讯记录是这样写的：

“问：他是否也宣过誓，要服从达到同盟目标的各项规定；在押犯答：不，正相反，在我入盟〔1836年〕大约一年半以后，同盟内部就产生了重大分歧，因为上级要求下面的人应当履行绝对服从的义务，哪怕是要他杀死分裂同盟者，他也应当绝对服从。”1841年3月8日的记录中还有一条有关会费的说明。霍夫曼说，在巴黎，他先后在流亡者同盟和正义者同盟中每月缴过10苏的会费（汉堡国家档案馆，C1840，Nr.567，Bd.4）。——9。

- 6 正义者同盟章程是1837—1838年间在巴黎与流亡者同盟最终分裂以后

产生的。章程的起草和首次出版的确切日期还不清楚，可能是在1837年底或1838年初出版的。正义者同盟章程在许多方面虽然以流亡者同盟章程为蓝本，但同后者相比的确存在原则性区别，特别明显地强调组织内部的民主。这一点表现在，正义者同盟只有一个章程，而流亡者同盟则曾经有双重章程（参看附录中的文件a和b）。在章程的第11条和第25条中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与流亡者同盟章程的区别，因为在这两条中对最高机构的选举和盟员履行服从义务的界限都作了规定。这些组织规定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因为它们表明，大部分无产阶级盟员业已摆脱该组织迄今存在的小资产阶级的领导。虽然在起草章程的时候，工人共产主义观点在正义者同盟领导人中间已占据统治地位，但是，针对组织方面的这些重大变化，正义者同盟章程在制定自己的目标时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以流亡者同盟章程为依据的。1848年初，人民议事会开始着手新章程（文件30）的起草工作。

这个章程起码有两个不同的版本。第一个版本的一份连同一些文件已于1839年在卡尔·沙佩尔处被没收了（参看沃尔弗冈·席德尔《德国工人运动的开端》1963年斯图加特版第45页）；第二个版本的一份已于1841年1月24日在阿罗尔森的木匠帮工卡尔赫费尔处被没收了，一个石印副本被作为附录收入了莱茵河畔法兰克福中央调查当局1841年1月31日的报告（参看列·弗·伊尔塞再版的《政治调查的经过……》第580—587页）。第一个版本一份也没有保存下来，但在舍费尔1841年6月12日的供词（梅泽堡德国中央档案馆·Rep.77, Tit.50^r, Nr.47, Bd.3）中，陈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区别。他提到他1838年夏天在巴黎期间曾见过第一个版本，他说：“我曾见过这个正义者同盟的章程，印制得很糟糕，好像是用手工印刷在一张长条纸上的，没有封面，题目是印在正文上面的。”当人们把那个从卡尔赫费尔家没收的版本给他看的时候，他说他在巴黎的正义者同盟盟员那里看到的是另一个版本。他说：“那是印在一张长长的纸上的，要比我在这里看到的这个本子的纸长得多；而且印有明确的标题：《正义者同盟章程》，而这里的这一版叫做《正义》，这一名称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我在巴黎见到的那个章程的页数也没有这么多。我记不清了，我见过的章程上是否标明这是在冯·施泰因大臣的文件中找到的这类

字样，上面似乎印有‘德意志共和国印刷所印刷’等字样，我也记不清了。”

至于同盟的不同称呼，需要追溯到同盟成立后不久就暴露出来的意见分歧。比如威纳尔在谈到一部分同盟盟员的供词时就这样认为，他们不能自称为“正义者”，相反，倒可以用“正义”这个词来表明同盟的目的（参看普鲁士邦议会公使1841年7月8日的报告——梅泽堡德国中央档案馆，Rep.77, Tit. 105, Nr. 13）。而且，在后来的几年里主要使用的是“正义同盟”这一名称，尽管如此，“正义者同盟”这个名称还是载入了同盟史册。——9。

- 7 卡尔·沙佩尔关于财产公有，即关于共产主义的文章是一篇纲领性的文章，该文的写作日期与正义者同盟的第一个纲领性著作，即威廉·魏特林《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的写作日期几乎相同，因而对当时在巴黎的正义者同盟组织中所进行的纲领讨论起了积极作用。这是一篇未经印刷的没有写完的文章的草稿，当沙佩尔因参加1839年五月起义在巴黎被捕时，这个草稿和其他文件一起都被法国警察当局没收了。本书是根据沃·席德尔发表的巴黎国家档案馆保存的手稿刊印的。——16。

- 8 随着这第一部纲领性著作的出版，正义者同盟就使自己有了工人空想共产主义的政治思想基础，从而克服了章程在纲领方面还存在着模棱两可状况。这一著作按其内容和结构，以及从指导思想和表达方式来看，都是魏特林的作品，同时它也是正义者同盟巴黎组织中集体交流意见的成果。可能是魏特林利用了其他同盟盟员的草稿或试作。魏特林在撰写时参照了巴贝夫、傅立叶和拉梅耐的著作。

《人类……》一书的略加改动的第2版是1845年在伯尔尼出版的。——29。

- 9 这里刊印的关于巴黎正义者同盟创立后最初几年的内部组织生活的各种资料，都取材于以文件4为基础的同样材料。关于讨论教义问答的详细说明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从那时起，制定问答式纲领一次又一次成了正义者同盟甚至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其成立初期的讨论对象。1838—1839年对教义问答的讨论证明，同盟盟员已经认识到章程中缺乏纲领性的阐述。

这些资料还提供了关于正义者同盟代表和流亡者同盟代表1838年夏天在巴黎再次进行谈判的情况。这次谈判的主要内容是关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及其周围地区的同盟组织的发展问题。这个人数相当多的组织是威廉·恩克1836年从巴黎回到法兰克福后成立的。恩克在巴黎时曾在流亡者同盟中起过重要作用；他离开巴黎时接受了在自己家乡建立组织的委托；在他的领导下，在其家乡果然建立了组织。在建立组织的过程中，卡尔·布龙起了重要作用，他是该组织的最早的成员之一。他以特使身分作过多次旅行，在法兰克福地区，首先在组织宣传品的印刷方面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1838年，当正义者同盟成立的消息不时从巴黎传到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时，恩克给流亡者同盟领导人和正义者同盟领导人写了信，并委托鞋匠卡尔·路德维希·舍费尔前往巴黎当面进行解释。这里刊印的文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谈判的进程，在个别地方还揭示了谈判的内容。舍费尔当时有些讳莫如深，但最后赞同流亡者同盟，并对法兰克福组织产生了相应的影响。

但是，在法兰克福组织内部，曾经在巴黎导致了流亡者同盟分裂和正义者同盟成立的那些矛盾也起了作用，1840年进行的关于德国人同盟的争论就表明了这一点；这场争论由于1840—1841年的大逮捕而中断，整个组织因此遭到破坏。从1839年底到1840年初，巴黎的流亡者同盟领导人试图同一些正义者同盟盟员一起建立一个新的组织——德国人同盟（参看注10）。但是，争取流亡者同盟的法兰克福组织支持这个计划的尝试遇到了很大阻力。在讨论章程（载于列·弗·伊尔塞《政治调查的经过……》第588—594页）过程中，双方虽然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但是，盟员们对章程还载明要求盟员绝对服从上级这一规定表示不满。据一个被捕者的供词说，当时已成为法兰克福组织领导人的舍费尔在其受组织委托写给巴黎的信中说：“我们基本同意这个章程的内容，因为它同我们的原先的章程颇为一致。只有两点我们不理解，一是穿仆役制服的人〔即被全体盟员开除的人员〕，二是要我们绝对服从人民议事会的决议。我们在理解这两点以前，我们准备接受德国人同盟的章程。”（《关于流亡者同盟、正义者同盟和德国人同盟……等革命组织的调查结果汇编》1841年美因河畔法兰

克福（油印）版第58页）这场争论表明，流亡者同盟的巴黎总部本身已日益失掉在德国受它影响的基础。德国人同盟表面上存在还不到一年就销声匿迹了，接着流亡者同盟也消失不见了。——32。

- 10 关于为争取正义者同盟盟员加入德国人同盟所作的努力，在关于威纳尔的供词的报道中还这样写道：“过了一段时间，在一次区部会议上就是否加入德国人同盟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最后大家一致同意任命一个委员会，与德国人同盟就加入该同盟一事进行谈判。威纳尔由于对这个结果以及因此浪费掉的时间感到不满，辞去了支部领导人的职务；大家推选巴克担任支部领导人，但遭到他的拒绝，后来由路易·沙勒接替了这个职务。威纳尔在离开巴黎（1840年6月初）前约两三周，结识了美因兹的鞋匠帮工律贝尔（应为李伯尔）；律贝尔劝他加入德国人同盟；在他临行前两天，就真的未举行特别仪式，而由戈德施米特吸收入盟了。”——35。

- 11 “四季社”是奥古斯特·布朗基、阿尔芒·巴尔贝斯和马丁·贝尔纳领导下的一个革命的密谋组织，1839年5月12日该社曾在巴黎作了一次起义的尝试。这一组织深受巴贝夫思想和谈式的影响，基本上早就具有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性质。在“四季社”里占统治地位的观点的典型特征是，把通过革命夺取政权看成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由之路，同时把注意力集中在武装起义上。但是，他们并不认为通过革命夺取政权就是日益广泛地开展起来的阶级斗争的最高目标，而认为是少数富于牺牲的革命者的突击行动。在夺取政权的道路问题上，这种盲动主义观点是阶级运动不发达的表现；不久以后，它就作为“布朗基主义”而遭到了日益发展的革命工人运动的拒绝。参加五月武装起义的只有一小部分（几百人）斗争坚决的革命者。群众事先没有准备，所以没有参加这次虽作了顽强抵抗，但很快就遭到失败的行动。这次起义的失败使盲动主义观点信誉扫地，结果，在以后几年里，使所谓的和平空想共产主义在工人运动中产生了影响。

除了巴黎国家档案馆收藏的调查材料（不归我们使用）外，现在没有直接的证明材料可资证明正义者同盟曾参与了五月起义，这一点部分应归因于这样的事实：这次起义的准备工作是绝对保密的。因此，这里刊印的魏特林和沙佩尔的报告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们还可

以用若干其他材料来加以补充。比如，1845年法国警察当局的一份备忘录是这样说的：

“当这位德国的宣传鼓动的奸细〔魏特林〕在各地游说时，法国和德国的共产主义者认为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在法国进行一次革命；他们相互约定，相互联合，攻击政府。

“1839年5月12日和13日这两天，巴黎街头爆发了流血起义，法国和德国的共产主义者都参加了起义；巴尔贝斯指挥的起义者强占了许多哨所，但是，社会权力立即又恢复了法律的权威。

“在被枪杀、被殴打或在反对政府的斗争中被逮捕的人当中，有许多是德国的工人。一些人被判了刑或被驱逐出境；在被驱逐的人中有：

沙佩尔（卡尔），蛊惑者协会的领导人之一；

科克尔芒（安东），莱茵省人；

伊萨克·阿伯拉罕，（普鲁士）卡森福德人；

迈尔（丹尼尔），茨魏布吕肯人（莱茵巴伐利亚）；

鲁斯特，化名兴德勒。”（1957年10月《历史问题。法国社会史研究所季度公报》第19期，原件副本藏于梅泽堡德国中央档案馆，AA 1, Rep. 4, Nr. 2061）——39。

- 12 魏特林并没有参加五月起义。1839年4月底，他受正义者同盟委托到法国东部边境去了，他也许还去了德国的莱茵地区。魏特林此行的目的可能是：如果巴黎起义获得成功，那么，就在莱茵地区采取类似的行动，但缺乏这方面的证明材料。法国警察当局未能掌握魏特林此次活动的情况。——39。

- 13 奥斯滕在1839年7月10日于狱中写的一封信（该信被没收，并归入了调查当局的档案）中说：“5月12日，我四次差点被子弹打中。我的两个战友倒在我脚下牺牲了，第三个倒下时还呼喊：噢，兄弟，为我报仇！这给我这个狂怒者增添了力量。是的，当我看见巴尔贝斯倒下时，我愤怒地向敌人冲了过去。我原以为能守住街垒，可惜时间来不及了，国民自卫军冲过来了，战友们全都后退了。”（1839年12月25日《德意志人民俱乐部》第73号）

这里引用的这封信是从梅里约的法文报告中转译过来的（巴黎高等法院，1839年5月12日和13日的审判案，梅里约的报告）。在原文

中，这句话是这样说的：“是的，当我看见巴尔贝斯倒下时，我就像一个狂怒者一样，端着枪向敌人冲了过去，我原以为能守住我们的街垒的。”（沃尔弗冈·席德尔《德国工人运动的开端》第160页）。——39。

- 14 沙佩尔在1845年的伦敦讨论期间，在抵制盲动主义倾向时提到他曾参加五月起义，同时他强调了警探的危险活动（参看文件64）。1850年，他在维斯巴登法庭上作了更为详细的描述，但是，他作为被告，为了避免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罪名，他的说法显然同事实是矛盾的；他实际上参加了五月起义，但他说是消极的旁观者。他比1845年时还更强调捣乱分子的作用。他说，由于法国国王1839年在组阁问题上碰到了困难，就像沙佩尔所说的那样，不得不“为此寻找某种借口搞一次政变”；他还说，“为此目的，通过间谍煽动一个社团，即所谓的家庭社团〔应为四季社〕”。由于这种判断，沙佩尔明显地夸大了政府打进秘密组织的奸细和捣乱分子所起的作用。显而易见，沙佩尔是根据自己总结的个人经验这样做的。关于奸细在秘密组织中所起的作用，参看马克思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发表的对谢努和德拉奥德的著作所作的书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13—330页）。——39。

- 15 40年代初，正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是在极其隐蔽的状态中进行的，以致警察当局只能在极个别情况下才能发现一些地方组织的蛛丝马迹。1840—1841年掀起的对流亡者同盟的大逮捕浪潮（参看注4）虽然也波及了一些正义者同盟盟员，在阿罗尔森，警方搞到了一本正义者同盟章程，在莱比锡搜到了一本魏特林的著作，即《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但是，调查当局始终没有弄清同盟在德国的组织联系，虽然调查案卷中也写着，正义者同盟当时已在许多地方深深扎下了根。

汉堡的情况也是这样，从1840年9月起，许多盟员相继被捕，但是，关于组织的活动情况在调查案卷中只有一些残缺不全的记载。被捕者首先彻底否认自己的组织活动；有些人原来已作了详细供述，但在后来的审讯中又翻供了，甚至完全推翻了。1841年3月，一直矢口否认的主要参加者之一格吕贝尔突然愿意作比较详细的供述，但是，他说

这是指流亡者同盟的一个组织的建立而言的，这样一来，就为日后使用这些案卷增加了困难。在以后的审讯中，其他被捕者也改变了原来的供词。格吕贝尔的说法同一系列事实是矛盾的，他这样做显然是为了向警察当局隐瞒事实真相。诚然，格吕贝尔与流亡者同盟确实有密切联系，尽管他参与了正义者同盟一个支部的建立工作，但他仍然与流亡者同盟继续保持这种联系。这两个组织在德国尚未截然分开，而手工业帮工相互间的私人联系又往往消除了组织界限。

正义者同盟汉堡支部是由阿伦斯、格吕贝尔、霍夫曼、科尼希和施塔尔约在1839年底至1840年初建立起来的。木匠霍夫曼是该支部的领导人。1834年，他漫游到瑞士。在那里，成了“青年德意志”的成员，同年10月前往巴黎；1836年在巴黎加入了流亡者同盟。他积极参与了正义者同盟的创建工作，1837年春天，加入了该同盟，从1838年5月直到1839年5月为人民议事会成员（参看文件9）。1839年10月，霍夫曼经伦敦回到汉堡。裁缝格吕贝尔在汉堡是仅次于霍夫曼的积极分子，1833年在巴黎加入德意志人民同盟，但过了不久又回到了德国，同卡尔·布龙过从甚密，在流亡者同盟中进行活动。正义者同盟汉堡支部是在格吕贝尔的住所成立的，支部的大多数聚会也是在那里举行的。木匠阿伦斯和施塔尔以及钳工科尼希在30年代中定居瑞士，同“青年德意志”的接触相当频繁；1837年初，阿伦斯途经里昂和巴黎（在巴黎他认识了霍夫曼）回到了汉堡；1838年，科尼希直接从瑞士回到了汉堡，施塔尔则经伦敦和不来梅回到了汉堡。在1840年这一年中，加入汉堡支部的还有裁缝加布以及木匠罗斯托克和莱默。

不来梅的一个同盟盟员小组同汉堡组织也有联系，汉堡支部刚成立不久，施塔尔就第二次到了不来梅。

汉堡支部与巴黎正义者同盟领导人的联系工作由霍夫曼负责，他主要同木匠卡尔·布勒德尔通信联系。布勒德尔1840年6月写的一封信成了警察当局调查的专门对象，因为信中向霍夫曼提到了汉堡支部的许多成员。此外，正义者同盟盟员布兰德斯和加布，还经常从巴黎来到汉堡，在那里逗留的时间长短不一，他们曾向霍夫曼转致韦森巴赫的问候。

只有马尔滕斯（他是在巴黎认识霍夫曼的）是1840年底的逮捕浪

湖中幸免于难的人。他在国外居留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回到汉堡，时正好第一次逮捕刚刚结束。于是他又立即离开汉堡，经伦敦回到巴黎。到1813年他才最终回到汉堡（参看注53）。他在1841年9月24日给约翰·菲利浦·贝克尔的信中写道：“……我也差点儿成了牺牲品，因为有人早在我回到故乡前两周，就已到几个朋友（他们也在监狱里受折磨）的住宅里去搜捕过我了。我听到了这种情况，没有多加考虑，便当机立断，在我回到故乡的当天就坐船前往伦敦，我在伦敦呆了几个星期，但根本找不到工作，所以我又回到了这里……”（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约翰·菲利浦·贝克尔遗著）。——40。

- 16 1840年，巴黎爆发了当时最大的一次罢工，约有50 000名工人参加了罢工。罢工虽然失败了，但使共产主义运动增加了活力。5月间，裁缝首先开始罢工。当时还创办了一个公共食堂，负责500—1000工人的饮食，初参加者只需缴纳低廉的伙食费。在巴黎工作的德国裁缝帮工也参加了罢工；正义者同盟盟员在罢工中起了重要作用，因此，盟员们在这里第一次同工人的日益广泛的阶级运动建立了联系。魏特林积极参加了公共食堂的筹办工作，关于这一点，他在1845年曾这样写道：“在巴黎，我们在罢工的时候，同师傅们一起为500名罢工工人开办了一个食堂。我们每天都吃两顿面包、肉和土豆，交11苏伙食费。〔……〕我们还请了一名厨师，每月付给他25法郎工钱，当然还要支付食堂用房的租金。”（威廉·魏特林《正义。500天的研究》，恩斯特·巴尼科尔编，1929年基尔版第165页）关于魏特林的这些活动，艾韦贝克也曾作过报道：“他〔魏特林〕也像每一个德国人一样，在作了多次旅行后来到了巴黎。在巴黎，他向几千名德国和法国的裁缝帮工提供了真正的服务，因为他在裁缝帮工们没有活干的时候，为他们组织了一个公共的、因而是廉价的食堂。”（海尔曼·艾韦贝克《德国和德国人》1851年巴黎版第592页）

德国的裁缝帮工作了很大努力，争取其他城市的同行采取一致行动。他们同法国同行一道向在德国的裁缝帮工发出的呼吁书，如致不伦瑞克、德累斯顿、马格德堡的裁缝帮工的呼吁书，传播很广。——51。

- 17 寄往不伦瑞克和德累斯顿的两份呼吁书的行文基本上是相同的，但

是，由于巴黎的裁缝在誊清副本时改动了措词，所以两份呼吁书就有了一些差别。这两份呼吁书不仅非常不合正字法，而且有的句子结构也模糊不清。凡是上下文意思连贯的地方，都用方括号作了补充。本书使用的蓝本是寄往不伦瑞克裁缝帮工的呼吁书(A)，同时参考了寄往德累斯顿的裁缝帮工的呼吁书(B)（该呼吁书只保存下来一个副本），凡在内容上有重大改动的地方，均在脚注中作了说明。——51。

- 18 德国裁缝帮工在向德国发出呼吁书的时候，或者附上他们的法国同行的相应呼吁书，或者在背面抄上这种呼吁书。这份呼吁书也有在行文上有出入的两个文本。本书使用的蓝本是发往不伦瑞克帮工的呼吁书(A)，同时还参考了发往德累斯顿裁缝帮工的呼吁书(B)。B稿上的一些出入均在脚注中作了说明。——53。
- 19 发往马格德堡裁缝帮工的这份呼吁书在行文上同发往不伦瑞克和德累斯顿的呼吁书是不一致的，它可能是由魏特林起草的，并注明了回信的地址。当然，现在已没有确凿可靠的原件了。呼吁书是发给马格德堡裁缝的老帮工海尔曼·扎尔曼的，但是，当警察当局1840年9月进行搜索时，无法再找到这份当时已转发出去的呼吁书了。扎尔曼在一次审讯中说，信上标明收件人的地址：“马格德堡裁缝行会的老帮工收”，信的一面是用法文写的，另一面是用德文写的。他本人看了用德文写的一面，有人对他说，用法文写的信与用德文写的信同样重要。扎尔曼是凭记忆复述这份呼吁书的字句的，想必他记得非常清楚。——54。
- 20 正义者同盟利用魏特林出版的这个杂志得以第一次面向广大手工业者帮工。该杂志的发行量为1 000册，1841年9月至12月每月出版一期。前三期在日内瓦出版，第4期在伯尔尼出版。从1842年1月起更名为《年轻一代》，一直由魏特林出版到1843年5月，即直到他被捕为止。在这两个杂志上，魏特林在一系列文章（有一部分是撰写他的《保证》一书的直接试作）中阐述了他的空想共产主义的基本思想。

《呼吁》的发行工作是由正义者同盟组织的（参看文件17）。早在第1期中就印有这样的广告：“欲订者请与下列诸位先生联系：巴

黎日照街19号鞋匠鲍威尔先生、伦敦海德街布卢姆兹伯里4号卡尔·莫尔先生、日内瓦佩利塞里街131号赞多茨先生、拉绍德封尤伊夫街面包师楚特尔先生。”

从每期的总印数中，照例有700本寄往巴黎。瑞士当局千方百计进行刁难，企图阻挠魏特林这个杂志的出版，而法国政府则采取严厉措施禁止该杂志在法国发行。1841年12月18日，亨利希·鲍威尔在巴黎被捕。在他家里，除了书信和许多宣传小册子以外，还被抄走了150本《吁助》。普鲁士驻巴黎公使在1842年6月27日给外交大臣的一个报告中说：“鲍威尔在法庭对他的审讯中被宣布无罪释放；这里的警察局长倒认为有必要从今年3月12日起没收他更长期居留法国的许可证，因此，鲍威尔获得了一个前往英国的护照。”（梅泽堡德国中央档案馆，A A I, Rep. 4, Nr. 2056）——55。

- 21 1840年2月7日在卡尔·沙佩尔和约瑟夫·莫尔领导下在伦敦创建的伦敦工人教育协会，最初取名为“德意志民主协会”，不久以后改名为“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该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在它存在期间曾屡更其名，而首推“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这一名称最为人所知。第一次命名可能是仿照“法国民主协会”这一名称确定的，后者是由流亡英国的法国共和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建立的。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领导人同该协会的关系非常密切（参看文件40）。

这封伦敦来信（它的原件没有保存下来）由魏特林摘要发表的，并加上了《一封伦敦来信摘录》这一标题。——60。

- 22 魏特林为接收正义者同盟盟员而制定的方针是他的札记的一部分，这些札记是在他的住处被没收的，由布伦奇里汇总后在他的报告中予以发表，汇总时在各个札记上都标上了A、B、C字样。但到苏黎世国家档案馆查找，只找到本书刊印的这个B部分。现在已无法弄清撰写这个札记的确切日期，但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1842年以前撰写的，因为札记中有一个敦促订阅《年轻一代》的通知。

同这个文件有密切关系的是下列由布伦奇里发表的魏特林的札记，即C部分：

“会议议程

一、接收盟员仪式

(1) 问：被接收入盟者为何而来；

(2) 问：被接收入盟者有什么目标，认为用什么手段达到这个目标为好；

(3) 补充他们的回答，向他们解释更明确的目标和手段。特别要使他们了解**严守秘密**和**敢于牺牲**的必要性，并要使他们懂得，如果每个人都经受住四周或八周的考验，那么，不用花很大力气，就能在一年内取得简单多数票；

(4) 然后问，他们是否同意以上各点；

(5) 接着他们宣誓；

(6) 入盟仪式完毕。

二、宣传测验

按顺序问每个人：

(1) 他上星期是否**作过宣传**，作了**什么宣传**；

(2) 让他讲述宣传活动中的几个重要场面；

(3) 如果他没有作过宣传，就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并指示他怎样作宣传；

(4) 然后问，是否谁也不知道开会地点，是否有人要提供这种用于接收盟员用的开会地点。

三、关于对外宣传的消息

(1) 同盟内的消息；(2) 报纸上的消息；(3) 私人的消息。

四、问题

是否有人提问题、作报道或报告，如：

(1) 关于新闻、宣传、同盟或者原则问题；

(2) 关于这个或那个人还不明白的各种问题；

(3) 关于这一类问题的各种报告；

五、同盟规章的调整

(1) 每月的会费；(2) 购买书籍费；(3) 外出者的登记；(4) 超员支部的划分；(5) 主席的选举；(6) 确定新支部的合适地址以及确定集会的日期。

六、朗读或讨论

通常只限于阅读或讨论那些不是每个人都拥有或并不是每个人都理解的著作。

又及：如果要使成员们对自己的会议感兴趣，那么，每个人应随时准备一个问题，在讨论不能引人入胜时提出来。”（〔约翰·卡斯帕尔·布伦奇里〕《瑞士的共产主义者。依据从魏特林处发现的文件》1843年苏黎世版第40—41页）

关于组织原则，奥古斯特·贝克尔是这样论述的：“秘密组织，它的议事日程，或者就像人们愿意说的，布伦奇里从魏特林的文件里发现并在他的关于共产主义者的报告中发表的议事日程，起初只在日内瓦才有，那里似乎有这种必要。后来才传播到瑞士的离州和其他地区。当时，几乎在所有联合会中都发生了在日内瓦联合会中发生的类似情况。”（恩斯特·巴尼科尔《宗教和无神论早期社会主义史。根据奥古斯特·贝克尔1847年的叙述》1932年基尔版第51页）。——64。

23 魏特林的这一部分札记是由布伦奇里作为A部分刊登的（参看注22）。在刊印文件17时，把手稿同布伦奇里的文本所作的比较表明，正文中的着重号是布伦奇里加的，所以，文件17上的着重号也可能是他加的。——66。

24 从莫伊勒1841年8月21日给卡贝的信中就可以看出，他受卡贝的影响相当深。比如，他在信中说：“我因工作关系，未能去看望您就离开了巴黎，为此我深感遗憾；我一想到您曾接待过每一个有幸可以接近您，从您高尚的思想境界中吸取养料的人，我就更加感到遗憾。”（1960年《年鉴》（米兰）第3年卷第614页）

莫伊勒同时还谈到，他曾翻译了卡贝的《伊加利亚旅行记》第2卷。这个译本是否出版，不得而知。但有一个海尔曼·艾韦贝克用化名翻译的译本《埃蒂耶纳·卡贝，伊加利亚旅行记》，由温德尔希普勒博士〔海尔曼·艾韦贝克〕译自法文，1847年巴黎版。——73。

25 西蒙·施米特首先为出版威廉·魏特林的著作《和谐与自由的保证》而积极筹款。这一点，从他1842年7月15日的信（苏黎世国家档案馆；魏特林文件，P.239.1；恩斯特·巴尼科尔《宗教和无神论早期社会主义史……》第112—113页）中就可以看出；这封信同时还表

明，当时施米特和魏特林之间已发生严重分歧，这些分歧最初还是被克服了，但到1843年春季终于导致了他们之间的破裂（参看文件27、34和36）。——73。

- 26 “青年德意志”是30年代初由在瑞士的德国流亡者，特别是手工业帮工组成的革命秘密组织（参看A.M.波布柯夫《青年德意志》，载于1954年《历史问题》（莫斯科）第12期第93--103页；威纳尔·柯瓦耳斯基《正义者同盟的前史和产生……》）。遭到1836年的大规模迫害以后，反对运动在40年代重又复苏，并且又得到了手工业帮工的大力支持。但是，重新形成的宣传组织（还是叫“青年德意志”）的领导权却旁落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的手里。他们把宣传建立在青年黑格尔派的无神论思想的基础上，使运动日益具有宗派主义的性质。“青年德意志”的代表人物首先越来越激烈地反对工人们为争取独立所作的努力，以致正义者同盟在瑞士的活动，特别是共产主义宣传就必然同“青年德意志”展开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激烈争论。——76。

- 27 经过激烈的争论，“青年德意志”（参看注26）的追随者被开除出西蒙·施米特领导的洛桑手工业者联合会（参看恩斯特·巴尼科尔《宗教和无神论早期社会主义史……》第61—63页；奥托·布鲁格尔《瑞士德国手工业者联合会史（1836—1843年）。魏特林的影响（1841—1843年）》1932年伯尔尼—莱比锡版第99—101页）。——79。

- 28 《和谐与自由的保证》是威廉·魏特林的最重要著作之一，在这里，他全面地阐述了他的空想共产主义观点，尖锐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对劳动群众的剥削，揭露了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弊病，为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绘制了一幅详尽的蓝图，并论述了他的关于建立这种制度的途径和方法的思想。魏特林在空想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中是佼佼者，首先因为他在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手段中，把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提到了首位。魏特林在他的著作中表明他是一位独立的杰出的理论家。卡尔·马克思高度地评价了这部著作，把它称之为“德国工人的史无前例的光辉灿烂的处女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81页）。

《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对正义者同盟产生了重大影响，向许多手

工业帮工指明了通往共产主义运动的道路。

但同时，在《保证》中，空想主义所固有的弱点也是突出的。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的，这种弱点之所以产生，是因为这种学说是一个尚未发展的无产阶级的理论表现（参看文件106）。这些弱点就表现在魏特林过于细致地描绘了共产主义社会，在描绘中表现出强烈的平均共产主义倾向。此外，尽管他引导人们采取革命行动，但是，达到这种梦寐以求的社会制度的途径却极不明确。首先，魏特林把革命看成绝望的人民群众的一种初步的、突然的、只不过是破坏性的发作，这一点不久就使他陷入了所谓的盗窃理论（参看文件35、36和38），而且他对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客观历史必然性认识不清。最后，在魏特林那里，在评价个人的作用时带有宗教色彩，过高地评价了这种作用，特别是在他后来的一部著作《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中，他完全从宗教概念出发，因为他希望借此争取手工业者帮工中的落后阶层也赞同他的学说。魏特林观点的缺陷在后来的几年里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保证》于1842年12月在瑞士出版，由正义者同盟资助印刷并组织发行（参看文件34）。关于这一点，魏特林本人后来写道：“1842年，由于巴黎、日内瓦、拉绍德封、洛桑以及其他地方的共产主义者的共同努力，使《保证》一书能够印行2 000册。约有300个工人各尽了自己的力量，以取得这本书为报酬分担了全部印刷费用。

“在这个时期里，在一些有特殊表现的人之中——这些人都是一些有高度热情的人，他们以自己的高贵品质和无私忘我的光辉榜样，鼓励了更多有热情的人同他们一样勇于作出牺牲，在这些人中，我在这里要特别提出哥本哈根的彼得逊和西蒙·施米特。还有罗伊特林根的一个鞣皮工，这个工人由于他的出身好，他比前面两个人表现得更出色。”（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第3版序言》，贝·考夫霍尔德编，1955年柏林版第297页；《和谐与自由的保证》1960年商务印书馆版第306页；并参看注25）

1845年，《保证》出版了未作改动的第2版；1849年，魏特林作了重大修订后出了第3版。——82。

29 贝克尔首先提到了题为《普鲁士反动派(片断)》（署名为一个法国

人)这篇文章(由米·亚·巴枯宁以茹尔·埃利萨德这一笔名发表在1842年10月17—21日《德意志年鉴》第247—251页上,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贝克尔在信中全文引用了编辑部为上述文章加的按语以及该文本身的结束语。这些摘录中的一部分刊印于[约翰·卡斯帕尔·布伦奇里]《瑞士的共产主义者……》第16—17页。——87。

- 30 人民议事会的一名成员于1843年2月21日给魏特林的信(文件36)表明,在巴黎“早已”起草了新章程。这个成员把章程中“义务”部分寄给了魏特林,在魏特林被捕时落入了警察之手。门特尔的供词(文件12)也谈到了这个“义务”部分。信中谈到的要寄发的章程第二部分,即“组织”部分没有保存下来。只要把这个新章程同1838年的章程(文件5)作一番比较,就可以看出,新章程虽然是以旧章程为基础的,但毕竟作了一些重大修改。这封信还表明,在处理章程的组织部分时可能是特别机密的。——87。

- 31 普鲁士政府误认为阿道夫·鲁滕贝格(他名义上是《莱茵报》的责任编辑,实际上他根本不能胜任这项工作)就是主张报纸采取坚决反对立场的一个主要责任者,因此,它于1842年11月解除了他的职务,结果使许多毫无根据的谣言不胫而走,到处流传,据此,《莱茵报》想要采取一条温和的路线(参看马克思1842年7月9日和11月30日给阿尔诺德·卢格的信,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28—430页和434—436页)。

载勒尔在1月18日给魏特林的信中也谈到了他为《莱茵报》撰写通讯一事,他说:“您不要为您的著作的销售问题失去信心,我为此在《莱茵报》上发表的小品文似乎受到了新编辑部的指责,否则早就发表了。[……]明天我想再给《莱茵报》写一篇文章。我厌恶它,因为它窜改我的文章,弄得面目全非,一会儿加上∞,一会儿加上两个××,一会儿加上×,一会儿又加上三个***这一类符号,而贝克尔的符号点总只有一下换成丰丰。您看,我的文章能否在瑞士报刊上发表?”(塞巴斯蒂安·载勒尔1843年1月18日(于莫拉特)给威廉·魏特林的信,苏黎世国家档案馆,魏特林文件,P.239.1)。
——89。

- 32 贝克尔在这里恰如其分地勾画了以“预言家”的姿态出现的阿尔布雷

希特的特征。温特图尔人阿尔布雷希特的一封可能是在这一时期写的信，不仅表明了他为魏特林所作的努力，而且还表明了他那完全异想天开的观点。他在信中说：

“小兄弟，事情进行得很顺利，我在温特图尔及其附近地区拥有230个订户，总共900份，所以我在第一版问世以前要对它严守秘密。在温特图尔，大家对我们的体系还是很陌生的；你一定要相信，阿尔布雷希特能够鼓舞整个地区的人，能够唤醒沉睡中的人们。种子已经播下，天上的雨露将湿润它茁壮生长。如果我穿过城市或某个村庄，大家就会活跃起来。这里的人说，这是带来和平喜讯的人，那里的人就纷纷赶来聆听他那安慰人心的话。然后我便为你充当幸福的使者，为你铺平阳关大道。我用寥寥数语就说服了多数人，以致使他们有了谈天说地和从事思考的材料，虽然他们还不能完全理解。愚蠢的人、自负的人，在使他们惊奇得目瞪口呆以前，始终是愚蠢的。”（〔约翰·卡斯帕尔·布伦奇里〕《瑞士的共产主义者……》第46页）。——91。

- 33 接着详细地复述了书评的内容。关于巴黎的同盟盟员对待施泰因的态度，还可参看文件42。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法学博士罗伦兹·施泰因1841—1843年在巴黎深造。他利用这个机会从事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研究，同时还结识了社会主义组织的几个法国领导人以及德国领导人，其中有艾韦贝克。同时，施泰因还从巴黎向普鲁士当局提供了间谍情报。1842年秋天，他发表了反对共产主义的题为《现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书，该书在德国引起了极大轰动，许多家报纸和杂志都对它展开了讨论，1843年1月11和12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第11和12号也对它进行了讨论。关于施泰因，还可参看文件74。——93。

- 34 普鲁士政府于1843年1月21日决定，于3月31日查封《莱茵报》，并立即向下属机关发了相应的指示。《莱茵报》的被查封，在瑞士的共产主义者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一点，从塞巴斯蒂安·载勒尔2月8日给西蒙·施米特的信中就可以看出，信中说：“遗憾的是，《莱茵报》在4月1日之前可能就要停刊了。普鲁士式的喜剧似乎充满了火药味，而这一家优秀的报纸就将同它一起被送进坟墓。贝克尔

也不见了，因为他为它写了许多文章，况且往往不是缩手缩脚写成的，而是使他的文章保持共产主义的色彩。共产主义竟使《莱茵报》破了产。不过这也是一个好兆头，在德国，人们已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苏黎世国家档案馆，魏特林文件，P.239.1；〔约翰·卡斯帕尔·布伦奇里〕《瑞士的共产主义者……》第53—54页；另见文件31）。——94。

- 35 艾韦贝克早在1843年2月初给魏特林的一封信中就说：“赫斯博士（出生于莱茵普鲁士，青年黑格尔派共产主义哲学家）在这里访问，他对你的书作出褒贬参半、瑕瑜互见的评论。他认为这本书写得很出色。”（苏黎世国家档案馆，魏特林文件，P.239.1；〔约翰·卡斯帕尔·布伦奇里〕《瑞士的共产主义者……》第50页）。魏特林对预告的书评（但没有发表）持不信任态度，这一点可以从艾韦贝克1843年5月25日写给魏特林的信中所作的评语看出，他说：“你说赫斯博士想给你带来痛苦，你赶快打消这种念头吧，他指责你的著作，有理无理，自有公论；不过，他在这里念给一些人听的东西，可一点也没有冒犯的意思，是你错了。”（同上；〔约翰·卡斯帕尔·布伦奇里〕《瑞士的共产主义者……》第115页）。关于赫斯，参看文件42。——94。
- 36 早在1842年12月底，奥古斯特·贝克尔就写信给魏特林说：“你将从伦敦收到75法郎。”（苏黎世国家档案馆，魏特林文件，P.239.1）但是，从他们后来的通信中可以看出，由于疏忽大意，这笔钱可能到得比较晚。首先参看奥古斯特·贝克尔1843年5月28日给魏特林的信（同上）。——94。
- 37 这不是巴黎的人民议事会寄出的第一笔钱。艾韦贝克在1842年12月15日给魏特林的信中写道：“你目前的处境很困难，我们立即给你寄去250法郎，希望你用这笔钱暂时先堵住米叙德那个小气鬼（即《年轻一代》和《保证》的印刷者）的嘴巴。”（苏黎世国家档案馆，魏特林文件，P.239.1）。——95。
- 38 这封信在正义者同盟中开始了同魏特林的假革命观点的争论，而魏特林试图通过书信（这些书信没有保存下来）争取同盟盟员拥护自己的假革命观点。他眼看着不能很快取得决定性的成果，因而感到灰心失

望，他本来就把群众的无意识的自发的行动看成是革命的实质（参看注28）。在这种情况下，就寻找借口，制定彻头彻尾的冒险计划。魏特林给流氓无产阶级许愿，只要他们参加革命，就能随心所欲地盗窃。他想借此争取流氓无产阶级作为自己的同盟者。这种观点，正如一些书信（文件36和38）所证明的，遭到了坚决的反对，而且后来也一再成为激烈争论的对象（参看文件64）。

艾韦贝克在1843年5月25日给魏特林的信中又一次提到了他的盗窃理论：“你的那一套作为补救办法的盗窃理论是错误的。蒲鲁东是完全正确的，他认为财产是一种偷来的东西（虽然永远有一种财产，即使是有限的财产，它甚至在最美好的财产公有制下也是存在的，比如，你吃的面包，你挣来的钟表，你穿的衣服，这些东西即使在公社里也是私有财产；要是有人从你那里拿走，还说什么在朋友中间一切都必然是公有的，你恐怕就会心怀不满。”（苏黎世国家档案馆，魏特林文件，P.239.1；〔约翰·卡斯帕尔·布伦奇里〕《瑞士的共产主义者……》第114—115页）。——95。

- 39 这封信是丹麦的一个手工业者帮工写的，他德语掌握得很好，但该信在正字法方面，而且间或在句子结构上都有较明显的错误。

该信注明的日期，是同艾韦贝克1843年4月6日给魏特林的信中的几处地方作了核对以后确定的；艾韦贝克在信中说：“你在瑞士得罪了所有的人，以致你的处境很不妙，同时我们还通过克林格勒（他上美国去了）从洛克尔方面了解到，你随时都可能被捕，所以，我们劝你先弄一个假护照到英国去，或许你倒愿意去纽约（我们劝你不要到那里去）。你务必设法搞到旅费，你如果路经巴黎，可以在那里申请补助。”（苏黎世国家档案馆，魏特林文件，P.239.1）。——104。

- 40 这是贝克尔对魏特林一封信的回信，魏特林的信的原件虽然没有保存下来，但保存下一个内容梗概，那就是贝克尔1843年7月13日写给魏特林的信，可是这封信没有到达后者的手里，而是被调查当局没收了。关于魏特林为什么写这封信，贝克尔后来在一篇报告中写道：“审讯一开始，当人们问及魏特林，贝克尔信中所说的40 000人的革命大军一事时，他说这是贝克尔的误解；接着他在预审法官的口授下给贝克尔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要求贝克尔把这些混淆事实的信件寄给苏黎世

调查机关。很可惜的是，贝克尔没有保存下这些信件。因此，他只好凭记忆给有关当局写了一个关于这些信件内容的书面报告。”（恩斯特·巴尼科尔《宗教和无神论早期社会主义史……》第67—68页。）

贝克尔在1843年7月13日的信中说：“亲爱的魏特林，你在狱中写给我的信，已由这里的有关当局交给我了。很抱歉，我不能满足你的愿望。《东方观察家》一报出要把从你那里弄到的秘密公开出去，我稍加考虑以后就认为把你给我的那些宝贵信件付之一炬才是上策。我有理由估计，他们截获了我给你的秘密信件，并将采取行动，搞到你给我的回信。[……]”

“在这一方面，我现在为你所能做的一切，就是竭尽全力，凭记忆把你最后一封来信的内容告诉你。在这里，我要尽量使用你的原话和表达方式。不言而喻，你只需要承认你不能肯定的东西。你第一次提到40 000人的那封信的内容大致如下：

“亲爱的贝克尔……组织宣传是目前的当务之急；要是我们不组织宣传，那我们的事业将永远是一句多余的废话。我们必须组织宣传，也就是说，不是公开地，而是秘密地组织宣传。每个纨绔子弟需要知道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所有党派都有自己的进军计划，我们为什么不能有我们的进军计划。我们找到了一些追随者；现在的问题是抓住他们，调整他们的活动范围。为此，我们必须建立一种秘密组织。说服这些人加入这样一种组织是最容易不过的事。听着！每一个人都听着，‘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连猪狗都不如的社会里。劳动的人成天紧锁双眉，贫困不堪，而不劳动的人却纸醉金迷，挥霍无度，无忧无虑。这种局面也许是可以改变的，只要我们建立一种组织，旨在向公众阐明这帮猪狗是不讲什么公平的。你愿意参加这种团体吗？’被问的人几乎总是说愿意。然后回答他说：‘那么，把你的手给我，闭上你的嘴。’你看，亲爱的贝克尔，我也成了一个反对做事神秘化的人，成了一个反对礼仪的人了。但是，这话究竟从何说起呢？没有章程，没有誓言。我们需要建立的组织不应当是公开的组织，但因此也不需要是真正秘密的组织，等等。如果我们十分勤奋地为这个组织进行工作，我们的人数很快就会剧增。我们目前在瑞士已有几百人（具体数字我已忘记了），如果他们之中每个人每个月都能为组织发

展一个人使之成为共产主义者，这个人再去发展别的人，那么，我们到1844年春天就会有40 000人之众。如果这40 000人举行一次起义，那么我们的前景可就光明了；到那时，那些政治家先生们就只好把拙劣的玩笑留给自己了；到那时，人们就得真诚地来关心我们了，等等。”（苏黎世国家档案馆，魏特林文件，P.239.1；恩斯特·巴尼科尔《宗教和无神论早期社会主义史……》第67—68页），——106。

41 在所有其他资料中都只提到40 000人，但是，根据注40中复述的魏特林所论述的计算方法，假如开始为100人，每月翻一番，那么在一年內（1843年4月至1844年春）确实有40万人左右。——106。

42 艾书贝克在给魏特林的一封信中也说过类似的话（见文件34），并在1843年5月25日的信中又一次向魏特林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你总是误解我们，我们对此表示遗憾。谁对你说过，你不应当出版什么东西了？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奉劝你，在你目前处于动荡不安的情况下，最好别再写大部头的书，因为写大部头的书，需要系统地、长时间地安下心来进行考证和收集工作。你可以把这种工作让给别人去做，而你就专心致志地办好杂志，从事口头宣传（同时写写小册子）好了。

“或许你想要坚持己见，那也好。不过，你到时候再损害美好事业，你可不要感到惊奇。或许你以为，你通过系统的书（《保证》就是其中之一）提出用盗窃医治今天的盗窃那一套理论，就可以大大促进美好事业！”（苏黎世国家档案馆，魏特林文件，P.239.1；[约翰·卡斯巴尔·布伦奇里]《瑞士的共产主义者……》第114页）——108。

43 法国民主协会是由伦敦的法国流亡者在30年代末建立的，参加该协会的有革命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从40年代初开始受卡贝的影响。正义者同盟的领导成员参加了他们的讨论（参看文件95）。该协会的会议记录，除了1844年寄给卡贝的几次会议记录摘要的副本以外，都没有保存下来，这些副本是在卡贝的文件中找到的。卡贝在给民主协会的信中曾经谈到过他准备在巴黎建立一个5—10人的小型共产主义共同体的计划。这个计划曾被提交1844年5月6日会议讨论，沙佩尔（明确指明是1843年的讨论）和鲍威尔在讨论时都发了言。

“公民沙佩尔说，公民卡贝打算在巴黎建立一个小型共同体，并请求在这次会议上讨论这一措施的目的性，以便听取协会在这方面的意见。

“公民沙佩尔借此机会提醒大家，他们在去年就对在北美伊利湖畔建立的一个共同体提出过指责，遗憾的是，他们的预言并没有错，因为这个小移民区并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他认为，公民卡贝的尝试对我们的事业弊多利少。

“他建议理事会审阅这些记录，把有关这个问题的发言摘录出来，寄给卡贝公民。

“公民沙佩尔说，在瑞士，有人已建立了一些小型的共同体，但过了一段时间就发现这类共同体不可能获得成功，因为每天在共产主义者中间反复进行枯燥乏味的讨论破坏了和谐，此外，也已引起了政府方面的密切注意。他们千方百计地加以干扰，设法在共同体内部制造分裂。

“比如，从1835—1839年，在英国就发生过这种情况，当时，人们通过宣传已争取到60 000个拥护者，正想在小范围内把理论付诸实践，大部分拥护者就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了。〔……〕

“公民鲍威尔说，如果人人都忠诚于事业，还是可能成功的；可惜在刚才所谈的小型共同体内部没有忠诚的人，或者只有少数人是忠诚的；加之他们的共同体不是这个词的全部意义上的共同体；他们只是为了更节约地过日子才联合在一起，而且劳动并不是共同的劳动。”

（阿尔图尔·雷宁《关于共产主义移民区的伦敦讨论》，载于1952年《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公报》（阿姆斯特丹）第7年卷第2期第100—101页）

关于下次会议，即1844年5月13日会议，记录中是这样写的：

“宜谈伦敦民主协会准备寄给卡贝公民的书信草稿。公民沙佩尔报告了关于新和谐中的共同体。他说，加入这个共同体的资本家想提出过分的要求，并想决定普通工人的命运。

“要建立一个指望能获得成功的共同体，就必须使它同外界隔绝，拉普在美洲就是这么做的，他的共同体取得了巨大成就。”（阿尔图尔·雷宁《关于……伦敦讨论》，同上，第103页）

卡贝的类似空想计划在1847年还一度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领导人讨论的对象，在讨论中他们坚决拒绝了 this 计划（参看文件156）。此外，在40年代初，伦敦的共产主义者受了卡贝很深的影响，这一点从沙佩尔、鲍威尔和莫尔签署的1843年8月23日给卡贝的信中也可以看出。信中是这样说的：

“我们虽然是德国人，但我们仍然认为，感谢您的牺牲精神并且声明，我们是伊加利亚学说的地地道道的拥护者，是我们的义务。

〔……〕我们也不怕遭到反对。我们可以声明，德国共产主义者像他们的法国兄弟一样，只想进行和平的宣传，而从来没有想要使用物质暴力促使自己的原则取得胜利；因为他们很清楚，真理和正义绝不能依靠刺刀来实现，而只能依靠理性来支配。〔……〕人类的两大灾祸就是愚昧和迷信；这是我们必须反对的敌人，然而同它们进行斗争的武器只能是理性与和平的讨论。

“其次，历史告诉我们，一切使用物质暴力的革命一般说来只对一些爱好虚荣的人有利，而19世纪的大革命必须在头脑里进行，我们在清除了原因以后，就不再需要反对影响，因为影响本身已自行消亡。”（阿尔图尔·雷宁《关于……伦敦讨论》，同上，第94—95页）——111。

- 44 所谓布伦奇里的报告是1843年6月8日魏特林在苏黎世被捕以后，由苏黎世州政府顾问约·卡·布伦奇里受苏黎世当局委托撰写的。魏特林被捕以后，当局试图阻挠他的新作《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的出版。1843年9月16日，魏特林被判处六个月监禁，11月底又被改判为十个月监禁，并被驱逐出瑞士。1844年5月21日，他被监禁了差不多一年以后，被引渡给德国当局（参看注46）。根据从魏特林处没收的大量书信和手稿，布伦奇里编写了题为《瑞士的共产主义者。依据从魏特林处发现的文件》1843年苏黎世版。布伦奇里的报告引起了极大轰动，并得到了与作者的意图相反的效果：许多手工业帮工从此开始对共产主义思想感兴趣了。巴黎和伦敦的正义者同盟盟员对此也作出了反应，向布伦奇里发了一封讽刺性的感谢信（见文件11）。巴黎的感谢信经莫泽斯·赫斯在文风上作了一些根本性的修改后，以通讯的形式刊登在1843年9月5日《科伦日报》第248号上；赫斯在接语

中说：“最后，我还要向你们推荐一个文件，这是不久前寄位在这里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可能是应《人民报》的要求交给布伦奇里先生的，因为上一号的《人民报》曾表示，希望给苏黎世委员会的报告的作者写一封感谢信。”关于这次刊登，赫斯还补充说：“这封感谢信已翻印了许多副本，分发给这里的德国工人。”（莫泽斯·赫斯《哲学和社会主义文集（1837—1850年）》，奥古斯特·得尔祖和沃尔夫冈·明克编，1961年柏林版第249页）

这封感谢信作为1843年9月11日发自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通讯《共产主义者的天使——布伦奇里博士》，发表在《曼海姆晚报》上。通讯中还说：“苏黎世湖畔的一封信使我们不再继续怀疑对布伦奇里先生及其党羽的十分激动的心情，这种激动心情似乎是他的反对共产主义者的报告引起的直接后果；而这封来自苏黎世的知己之手的信件本身给我们复制了一份巴黎的德国共产主义者给布伦奇里先生的‘感谢信’。因此，我们同时更正这个发表在9月5日《科伦日报》上的文件。”——116。

- 45 这封信是作为9月24日来自洛桑的通讯刊登在《曼海姆晚报》上的，通讯中还提到了巴黎人民议事会的信（文件13）的发表一事。这篇通讯还包括一封附信的摘录，伦敦人把它同他们给布伦奇里的信一起寄给了洛桑的同盟盟员，信中说：“布伦奇里博士，这个儿皇帝的作品，确实为我们立下了汗马功劳。从魏特林的书中所作的这些摘录在德国本来是绝对逃脱不了书报检查的，这一著作本身，一旦被发觉其内容，就会被禁止和没收。但这些摘录（人们现在可以坐在德国的壁炉旁自由自在地欣赏）将使工人阶级产生极大的兴趣，他们将开始对这一章进行思考，有时还将对这一章表示赞同。这帮愚蠢的教条主义者满以为用“令人讨厌的老一套”、“兵营国家”之类的空话就能使人们惧怕我们的事业。这些空话可能会激起一些高贵而无聊的游手好闲者的狂热，但对于劳动人民（办公室职员也包括在内！）来说，这些空话就不可能起那么大的作用，等等。”——117。

- 46 威廉·魏特林在苏黎世监狱里蹲了大约一年时间（参看法14）以后，于1844年5月底被瑞士当局引渡给德国，在德国把他当做囚犯送到了他的故乡马格德堡。在那里，他暂时被释放，于是他立即同他的拥护

者取得了联系；这一点从本书刊印的马尔滕斯的信以及席尔格姆1844年7月4日给魏特林的信（梅泽堡德国中央档案馆，Rep.77, Tit. 6, Lit.w.Nr.96；恩斯特·巴尼科尔《囚犯魏特林及其“正义同盟”》1929年基尔版）中看出。

1845年2月，马尔滕斯和其他几个同盟盟员在汉堡被短期拘留。调查内容首先是同魏特林的关系（参看文件46）以及马尔滕斯给巴黎的韦森巴赫的一封信（文件61）。马尔滕斯在一次审讯中说：“我先前在巴黎见过魏特林，但后来我同他就没有进一步联系了。他被驱逐出瑞士并到了马格德堡以后，去年夏天他从那里给我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内容大致是说，他需要钱。这封信是直接寄给我的，还是寄给裁缝师傅维贝尔（他也认识魏特林）的，或者还是寄给我们两人的，我记不清了。据我所知，维贝尔和我是魏特林在这里唯一认识的两个人。因此，他写信给我们两个人，是顺理成章的。接着，我们就给他寄去了10塔勒（普鲁士）库兰特银行汇票，同时我还写了一封信，内容我记不清了。[……]”

“魏特林在他的信中还叫我把该信转寄给伦敦的沙佩尔（地址是他随信附来的），以便让他再转寄给魏特林在巴黎的朋友们。我把信转寄了，并给信外加了一个信封，还写上了‘转往巴黎’的字样。信封上我写了魏特林给我寄来的沙佩尔的地址。[……]”

“魏特林的信不在我的手头，到了伦敦或巴黎后就没有再寄回来。魏特林按照维贝尔的地址到达这里以前不久，当时伦敦方面来了一封回信，是由沙佩尔署名的，他对魏特林的处境表示遗憾，但没有给他寄钱。”（恩斯特·巴尼科尔《囚犯魏特林……》第242—244页）——118。

- 47 普鲁士当局眼看无法对魏特林开庭审判，于是决定把他驱逐出境。为此，魏特林被带到汉堡。他利用他1844年8月18—23日在汉堡逗留的机会，会见了正义者同盟汉堡支部的最积极的成员（参看文件11），关于这一点，雅科布·奥多尔夫也在回忆录中作了如下叙述：

“魏特林被迫在所谓‘自由瑞士’吃了一阵子官司，后来又被押送到他的故乡马格德堡。在那里，摆在他面前两条道路：或者坐一辈子牢，或者移居到美国。他当然宁愿去美国。他在两个宪兵押送下，乘船

来到这甲。我们工人得知这件事后，**约翰·弗·马尔滕斯**带头开始募捐，大家凑了一笔数目相当大的钱，而他则靠这些钱投奔新大陆去了，他给我们留下了他的两个使徒，即上面提到过的他的两本书〔《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和《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雅科布·奥多尔夫〕《一个老汉堡人的经历》，载于1886年11月7日《公民报》（汉堡）第262号附刊）

裁缝**维贝尔**，当时是汉堡工人教育协会主席，1845年2月同**马尔滕斯**一起被捕。除了同**魏特林**有联系之外，还给他加了一条罪名：1844年，他把**马尔滕斯**给巴黎的**韦森巴赫**的一封信交给了师傅，当时他就在这个师傅那里工作。——120。

- 48 这封信是以《伦敦的德国工人为西里西亚织工募捐》为题发表在《电讯》（汉堡）上的，发表时编辑部加了如下声明：“下面这封信是寄给《电讯》编辑部的，编辑部为分配下面提到的捐款将采取必要的措施。《电讯》编辑部”

这封伦敦来信在《电讯》上刊登以后，其他报纸也相继予以转载，如1844年10月30日的巴黎《前进报》第87号就是一例。

关于分配伦敦共产主义者募集的捐款，1844年12月28日《发言人报》（威塞耳）第104号以1844年12月14日西里西亚通讯的形式作了报道；这篇通讯是由**斐迪南·派纳特**撰写的，他从1846年开始为布魯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通讯员（参看文件113），该通讯指出：

“今天，在朗根比劳的律师**诺伊厄曼**和**施纳伯尔**先生以及彼得斯瓦尔道的律师**施莱耶尔**先生的参加下，由他们从这两个村镇中选出的最困难家庭（它们因赡养者死亡或身陷囹圄而处境极度贫困）在赖辛巴赫的王冠旅社集会，按照需要情况领取由伦敦的德国工人为表示同情和保护而寄来的救济款。这笔总共6英镑（40塔勒15银格罗申普鲁士库兰特）捐款是由汉堡的书商**康培**先生寄到布雷斯劳的，而我，赖辛巴赫附近的**奥尔伯斯多夫**的候选神学博士**斐迪南·派纳特**，则受委托分配这笔捐款，我在此履行交给我的这个光荣使命。”接下去是牺牲织工和被捕织工的孤儿寡母名单以及分配给他们各人的救济款数目。

（参看**瓦尔特·施米特**《关于1844年6月西里西亚织工起义的若干文

件》，载于《德国早期工人运动史概況》1964年柏林版第30—64页）——121。

- 49 指恩格斯为欧文派社会主义者出版的伦敦周刊《新道德世界。合理社会的报纸》撰写的稿件，最先发表的是1843年11月的《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75—593页），其他稿件陆续发表到1845年5月为止。弗莱明提到的恩格斯的的文章转载在1843年11月11日和25日《北极星报》（伦敦）第313和315号上。——126。
- 50 由于缺乏手稿，梅林是以第一次发表的文本为依据的，但他显然删去了信的结尾的日期和地址，并取消了分段，因此，巴尼科尔没有急于发表，以期恢复本文的原貌，但他没有弄到手稿，而只找到一个副本。——128。
- 51 伦敦的正义者同盟领导人同其他国家的政治流亡者一起所作的首次尝试，即创立一个国际民主协会总会，但没有获得持久的成功。这个组织，即民主派兄弟协会（见文件70）的前身，没有得到宪章派的支持，它在人数上微乎其微，并且存在的时间甚短。参看康捷尔《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组织者》，1957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第105—107页。——129。
- 52 威廉·魏特林1843年5月被捕和紧接着被驱逐以后，瑞士大多数受共产主义影响的工人联合会又很快滑到小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义立场上去，并且有时也处在那个受真正的社会主义影响的政治骗子格奥尔格·库尔曼的影响之下；就连奥古斯特·贝克尔也成了库尔曼的拥护者。这个文件表明，甚至洛桑和伯尔尼两地的联合会，虽然有正义者同盟支部在那里活动，但仍然未能摆脱其影响。这个文件还表明，在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这对尖锐的矛盾中，洛桑工人联合会存在宗派主义倾向，这种倾向有的渊源于魏特林，并得到库尔曼的间接支持。但是，在这段时间里，工人们对于库尔曼的报告也不乏反对意见。参看恩斯特·巴尼科尔《宗教的和无神论早期社会主义史。根据奥古斯特·贝克尔1847年的叙述》，1932年基尔版第76—80页。这本书中还有说明库尔曼为奥地利政府从事间谍活动的材料。

关于对库尔曼的评价以及对其1845年在日内瓦出版的《新世界或

人间的精神王国。通告》一书的评价，参看《德意志意识形态》第5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29—640页），另见恩格斯的《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28—530页）。——133。

- 53 汉堡工人教育协会（最初为“工人教育社”，1846年2月起为“工人教育协会”）的建立，是以汉堡正义者同盟的非常积极的组织（参看文件11和61）为基础的，它的会员们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慈善派代表进行合作。同盟盟员在实现自己的计划时，只要伦敦和瑞士的工人教育协会符合德国的条件，就以它们为榜样。工人建立组织所作的努力，引起汉堡当局的极大猜疑。因此，工人们认为必须同爱国主义协会（“汉堡艺术和实用手工艺促进协会”）进行紧密合作。

在1844年12月30日至1845年1月26日的开头四次会议（关于这四次会议的记录副本被普鲁士当局收入了档案）上，首先讨论了章程。最早通过的章程于1845年8月10日作了修改，并以《汉堡工人教育协会条例草案》为题公开发表（1845年汉堡版）。开头两条是：

第1条：汉堡工人教育协会的宗旨是，促进普遍教育和道德教育，提高会员们的审美感和高尚情操；

第2条：为此目的，会员们每晚聚会，有时唱歌、阅读图书和协会保存的杂志，有时听学术报告并参加有关市民生活必要知识的讲座。

1846年2月3日，协会决定再次修改章程，这次主要是修改第3条。1845年8月通过的章程是这样说的：“人人均可入会，不分等级、性别和职业”，而新的第3条则是：“尽管协会首先是为手工业者帮工和工人建立的，但人人都可入会，不分性别、等级和职业；只要作风正派，名声良好。”（《汉堡工人教育协会条例》1846年汉堡版）关于汉堡工人教育协会的历史（1845年底约有会员230人，1846年底约有400人，1848年革命开始时约有600人），参看亨利希·劳芬贝格《汉堡、阿尔托纳及周围地区的工人运动史》1911年汉堡版第1卷第90—104页。

关于1846年秋和1847年春汉堡工人教育协会的政治思想生活，弗里德里希·列斯纳在其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在我找到工作的那个作

坊里，我认识了几个同行，他们在瑞士、巴黎和伦敦做过工，接触过共产主义，对它简直如醉如痴。〔……〕我的同行急着向我介绍共产主义的福音。

“当时，汉堡有一个工人教育协会，这是一个先进工人聚集的场所。他们每天晚上在那里一起读报，讨论或唱歌和学习外语。报纸多半是反对派的；讨论的中心主要是共产主义问题；歌咏团唱的是激进自由派的歌曲。歌咏团的格言是：‘我不是为我唱歌，而是为我唱的歌感到多么自豪，多么自由！’”

“汉堡工人教育协会，按这个词的最好意思讲，是一个传播革命思想的文化场所。当然，40年代的革命思想是：为德国的统一和自由，为共和国和各国人民的友谊，为自由思想、原始基督教、共产主义而努力奋斗。所有这些思想在那里犹如一团乱麻，合成了一种极其模糊、极其混乱的理想。这种情况曾一度造成混乱，而这一混乱只为少数人所理解。

“在‘工人教育协会’中，大家都认为威廉·魏特林是了不起的。我们对他无限崇拜，他成了他的追随者的偶像。

“1846年11月，我的同行们介绍我参加了工人协会，不久我被吸收为正式会员。开始经常参加那些对我有着巨大吸引力的夜间讨论会。在讨论会上，一个名叫马尔滕斯的工人特别引人注目，他也是在外国成为共产主义者的。他是一个非常杰出的鼓动家，他宣讲共产主义思想时，善于抓住听众的心理，在这方面，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他。他说话流畅，真心实意地以新的希望和感情鼓动和激励我们被压迫、被剥削的工人振作精神。”（弗里德里希·列斯纳：《一八四八年前后》，载于《德意志言论》（维也纳）1838年第3期第99—100页）。——131。

- 54 这封信中的称呼和行文表明，实际上这是正义者同盟汉堡支部给巴黎人民议事会的一份报告。该信是由奥古斯特·维贝尔交给他的一位正要前往巴黎的师傅，即裁缝师傅比绍夫传递的。因为比绍夫不是同盟盟员，所以该信没有直接谈及汉堡同盟的工作问题；出于同样的原因，关于工人教育协会的性质问题也写得十分谨慎。但是，从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汉堡工人教育协会就是汉堡同盟支部的基础。

这些防范措施，后经证明是不无道理的，因为比绍夫并没有转交这封信，而是把它交给了当局。关于由此而引起的逮捕情况，参看注46。——135。

- 55 这里发表的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1845—1846年的会议记录摘要，是根据麦克斯·纳特劳的文本复制的。原始记录本肯定已经散失；纳特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可能查阅并利用了这本子，他记得记录分以下几个阶段：

1845年2月11日至1847年1月5日；1847年10月19日至1848年6月6日；1848年8月20日至12月24日；1851年9月19日至1852年4月21日以及1852年5月10日至6月9日（部分）。参看麦克斯·纳特劳《马克思文选》，载于《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莱比锡）1979年第8年卷第392页。纳特劳发表的《1845—1846年的伦敦讨论》存在几大缺陷。他在摘录时首先把注意力集中于魏特林的态度，所以他摘录的通常只是魏特林没有参加讨论会时的一些问题，但不是讨论情况。而伦敦的同盟领导成员的发言，要么从他们对魏特林观点的批驳中去寻找，要么干脆没有记载，如埃卡留斯和普芬德的态度，他们的观点最接近伦敦的共产主义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另外，纳特劳的文本也没有科学地阐明资料的特点，在复制本来就没有逐字记下的发言时，并没有加上选编者的意见。这个文本尽管存在这种缺陷，但仍然具有巨大的学术价值。它证明，伦敦的共产主义者为了摆脱当时对他们仍有强烈影响的卡贝的和平共产主义，而且（在坚决拒绝布朗基主义的形形色色观点时）为了促进对共产主义革命性的认识，作出了努力。伦敦的正义者同盟领导人由于认识历史发展过程，要比试图一跃达到共产主义的魏特林高明得多。首先，他们同魏特林和克利盖（这两个人想要通过呼吁感情以发动尚未觉醒的人民群众）相反，他们却完全明白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理性和科学的决定性作用。伦敦讨论表明：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遭到了日益激烈的反对。当1844年8月底魏特林到达伦敦时，虽然受到了进步的英国工人和德国工人的热情欢迎（参看文件48）。但是，他与伦敦正义者同盟领导成员之间在原则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却日益明显。1844年的协会记录虽然没有保存下来，但我们仍能看出他们之间很快就产

生了分歧；据说通过全体讨论最后解决了分歧。关于这次讨论，魏特林似乎把它作为论述一系列问题的基础；这些问题比第二年讨论的18个问题还要多，因为1846年1月14日的决议说：“还有下列问题不再继续讨论”，1846年初关于魏特林的问答式问题的讨论终于全部停止。

《伦敦讨论》的行文是按讷特劳的文本印行的；讷特劳从记录本中摘引的直接引文像原件一样加了引号，其他小段文字是讷特劳加的重印评语。行文中方括号内的插话并非本书编者所加，而是讷特劳所加，这是与惯例的不同之处。

为了明确正文的分段，每一个发言者的发言都另起一段。此外，讷特劳加脚注，只要对这次讨论或对原件特点有所启发，均予以保留。——136。

- 56 讷特劳为此加了下列的注解：“当时（3月4日）沙佩尔提议分别给欧仁·苏和约翰奈斯·隆格写信，信是由魏特林起草和宣读的（3月11日）。”这两封信在1845年4月《德意志电讯》（汉堡）第56期上发表，标题为《伦敦德国工人的两封信》。在这两封信上签名的有：亨·鲍威尔、卡·沙佩尔、约·莫尔和阿·列曼。“致使徒隆格”一信是针对德国天主教运动领袖的。德国天主教运动是天主教会中一支具有强烈民主主义色彩的反对派。信中对隆格的活动表示同情，同时也针对魏特林的观点提出了一系列批判性意见。比如信中这样写道：“国王支持你的活动，路德也曾得到君主的支持，他也像你一样进行了宗教改革，但是穷人们从中得到了什么呢？向穷人传播福音的人从未得到大人物的支持，而是遭到他们的反对、迫害和杀戮。只有信仰、宗教从而还有以消灭贫困为宗旨、首先为贫困而行动的宗教改革，才能在历史上有永恒的价值。”给隆格的这封信的摘要刊登在1845年《莱茵社会改革年鉴》（达姆施塔特）第1卷第327—329页。——137。

- 57 “弗里茨”很可能是指弗里德里希·门特尔，从门特尔的诗（参看注64）中可以看出，他还被称为“美男子弗里茨”，据他自己说，从1845年春天到夏天他在伦敦（参看文件75）。我们可以认为，他因即将要在柏林为秘密的正义者同盟展开工作而没有在记录中使用全名。

因此，门特尔在伦敦的时间可能是1845年4月23日前不久直至8月5日以后。——111。

- 58 卡尔·沙佩尔在这个讨论发言中已经预示不再讨论魏特林的一些问题，他的这个发言同他5月底6月初在讨论第五个问题，即哲学同共产主义的关系问题时所作的说明是有联系的。在此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5年8月在伦敦同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进行了一次谈话（参看注61），并向他们阐述了关于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一些基本思想。艾韦贝克的一封信（文件69）表明，巴黎人民议事会（可能是在马克思的激励下）也建议伦敦共产主义者研究哲学问题。从后来的讨论进程可以看出，1846年初他们决定讨论费尔巴哈的哲学。讷特劳对沙佩尔的阐述作了以下注释：“指即将中止讨论的第一个暗示。[1845年]11月4日至1846年1月7日魏特林不再露面，后来露了最后一次面。[1845年]11月4日他通知说，瑞士人成立了一个印刷费储蓄所，并向协会是否想参加这个储蓄所，即自愿缴纳费用。这样，协会可以决定自己印刷东西或委托刊登在现有的瑞士报纸上。协会作出的决定是：‘先从瑞士寄5—10份报纸来，看看它们同协会的思想是否一致。’这一点表明，魏特林的影响无论如何已不占统治地位了。”（麦克斯·讷特劳《伦敦德国共产主义协会的讨论（1845年）》，载于《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1922年第10年卷第385页）。——165。
- 59 紧接着，讷特劳还对后来的讨论作了如下说明：“实际上，关于弗里德里希·费尔巴哈的未来宗教（1843年苏黎世和温特图尔版）的持久而深入的讨论，是从1846年2月8日开始的，到12月29日讨论完第14章。同时，1846年还讨论了下列问题，我把题目大都作了压缩：在柏林废除妓院引起的后果（2月17日，3月24日）；‘对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来说，最好的教育方法是什么？’（沙佩尔，4月14日，5月12日）；‘为人类带来更多利益的是什么，是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还是1789年的法国革命？’（鲍威尔，7月28日至9月15日）；现今如此激烈的竞争对社会进步的利弊（德珀尔，9月22日）；‘日内瓦无产者的最终胜利对整个社会改革能产生什么影响？’（9月20日）；‘克莱奥帕特拉对罗马的命运产生了什么影响？’（11月8日）；厄内斯特·

琼斯‘关于英国工人现状的报告’（11月17日）；‘我们人人皆兄弟。怎样在我们中间结成兄弟同盟？’（11月24日、12月8、22日）。

“接着是在‘星期日班’上的报告等等，下面是它们的从1846年7月26日起的记录：关于德国天主教军团（沙佩尔，7月26日、8月2日）；‘法国政府占领阿尔及尔产生了什么影响？’（8月9日；消灭了捣乱分子，训练了一支反对法国人民的军队……）；‘工人在现今的社会里能否保障自己的生存？’（8月16和23日）；宗教改革（普芬德，8月30日）；‘人人皆兄弟，根据是什么？’（罗森塔尔，9月6、27日，10月4日）；‘伦敦的德国人致他们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同胞的公开信，由读书会发起，伦敦教育协会给德国无产阶级的信’（由原德国中学教员西韦尔斯承印，9月13日）；沙佩尔‘关于神、现代宗教和未来宗教的报告’（9月20日）；‘民族教育和纯粹人的教育之间的差别何在？我们应选择什么教育？’（沙佩尔，旨在反对在丹麦问题上反映出来的民族情绪，10月4、11、25日）；三十年战争（普芬德，10月18日）；沙佩尔论世界通史（11月1日）；‘基督想创造今天的宗教还是改善人类的幸福？’（罗森塔尔，11月15日）；‘机器对工人阶级的利弊？’（沙佩尔，11月22日，12月6日）；‘导致人类幸福的最佳教育方式是什么？’（科赫，1846年12月20、27日）。”（麦克斯·纳特劳《伦敦德国共产主义协会的讨论（1845年）》，载于《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1922年第10年卷第386—387页）关于“星期日班”，参看文件95中为星期日举行的讨论会所规定的总题目。——166。

- 60 这封信所注明的日期是根据信中论及的下列几点推论的：（1）海尔曼·克利盖是1845年5月去伦敦的；（2）恩格斯的书是1845年5月底在莱比锡出版的；第一批书差不多是在6月初以前到巴黎的。《社会明镜》是从1845年4月开始在爱北斐特出版的。艾韦贝克所说的可能是在巴黎开始发行，因此该书也许在5月份就发行了。——169。
- 61 参加这次大会的，除了恩格斯以外，很可能还有马克思和朱利安·哈尼以及伦敦的正义者同盟的主要代表。由于这些旨在创建民主派兄弟协会的准备措施，恩格斯使伦敦的正义者同盟领导同宪章派建立了紧密联系。参看伊·阿·巴赫《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1845年8月在伦敦

的新材料》，载于《社会政治思想史概论》，1955年莫斯科版第479—482页。——172。

- 62 关于参与正义者同盟为威廉·魏特林进行募捐的情况，海尔曼·艾韦贝克在1845年9月21日给马克思、恩格斯和莫泽斯·赫斯的信中也说：格奥尔格·海尔维格和夫人“为魏特林捐了50法郎。里昂的手工业者也捐了这么多。”见沃尔弗冈·明克《研究赫斯的新材料》，1964年柏林版第98—99页。——174。
- 63 格奥尔格·维贝尔医生是基尔人，也以绰号“马车夫”著称；1844年，他在巴黎属于马克思、毕尔格尔斯、丹尼尔斯、艾韦贝克、海涅等人这一派。他在《前进报》上发表过一系列文章和诗歌，而他在撰写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论文，如《黑人奴隶和自由奴隶》（1844年7月20日第58号）和《货币》（1844年8月28日第69号）时，参考了马克思的手稿和摘录。参看弗·P·席勒《巴黎〈前进报〉的撰稿人之一格奥尔格·维贝尔》，载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27年美国河畔法兰克福版第2卷第465—472页。大约在1845年初，由于《前进报》被查封，维贝尔回到基尔继续从事社会主义活动，并与正义者同盟盟员——巴黎的海尔曼·艾韦贝克、柏林的弗里德里希·门特尔和马格德堡的亚历山大·贝克取得了联系。——178。
- 64 早在1844—1845年，从国外回国的正义者同盟盟员就已在柏林的手工业者联合会（创立于1844年4月）中开展活动，但是，同盟的有组织活动是在裁缝帮工弗里德里希·门特尔1845年底回到柏林后才开始的。当时年仅23岁的门特尔在巴黎成了同盟盟员，后为人民议事会成员。1845年春天和夏天，他在伦敦逗留（参看文件64和65），此后，于1845年8—9月经汉堡、基尔和马格德堡回到柏林，途中为同盟进行了活动，与其他盟员一起建立了一个正义者同盟的组织。然而，1846年12月9日，门特尔和一批志同道合者，其中包括同盟盟员一起被捕。他遭到严密隔离监禁约三个星期以后，于1846年12月底叛变自首，供出了大量他所知道的有关同盟活动的情况，同时还供出了120多个同盟盟员的名字。这个供词使爱德华·梅因被判两年要塞监禁。1846年12月底，马格德堡的亚历山大·贝克被捕，这也是由门特尔的供词所致。但是，在审理门特尔、毕林、黑策尔和弥勒的案件时，门特

尔声称，1846年12月，他由于在狱中遭到虐待，神经失常，“差点儿发疯。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招供的，对此我不能负责”。门特尔推翻了他的全部供词。正因为这些供词涉及面很广，致使审讯当局对供词的可靠性表示怀疑。因此，这次招供的结果是，门特尔和毕林在1847年6月14日的判决中只被判处轻度的连串前羁押等在内的监禁，而弥勒和黑策尔则被无罪释放。

有一首匿名的打油诗生动地描绘了这次从抓入到审判的全过程，这首诗出自一个非常了解当时情况的同时代人之手；1847年11月11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30号刊登了这首诗，并加了按语。该诗还被广为传抄。有一个抄本同《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刊登的文本有些出入，它的片断现藏波茨坦国家档案馆，Rep. 30 C, Tit. 94, Lit. K, Nr. 430, 1fd. Nr. 10944。弗里德里希·列斯纳1847年春在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上朗诵了门特尔的诗作的一部分，后来还收入了他的回忆录。参看弗里德里希·列斯纳《一八四八年前后》，载于1898年《德意志言论》（维也纳）第3期第104—106页，另见门特尔的诗歌集《四八年战士——当代读物》，布鲁诺·凯泽尔编，1952年魏玛版。

同盟在柏林的活动，由于盟员被逮捕和被审判而遭到了沉重打击，但并没有因此一蹶不振（参看文件160和240）；另见格尔哈德·齐塞《柏林工人运动的开端》，载于1965年《德国工人运动史论丛》（柏林）第7年卷，《地方工人运动史特辑》第140—156页；库尔特·威尼克《1848—1849年革命前、中、后柏林工人运动中的共产主义者和政治积极分子》，载于1968年《德国工人运动史论丛》第10年卷第2期第298—344页。门特尔的供词除一些单独的说明外，在各个方面经证实都是完全可靠的。保存下来的1847年2月12、13、15和17日的供词的记录副本（其中提到的1846年12月31日以及〔1847年〕1月25日和27日的供词都没有保存下来）是由三部分审讯材料组成的。本书也已全文分开刊印。它们是：1840—1845年门特尔在巴黎的活动（文件12）、1845年夏天他在伦敦的逗留（文件65）和本书刊印的柏林事件。

此外，还有一个简短的关于1847年1月30日的审讯记录，这一记录是在审讯德朗克和赫斯时作的。在记录中这样写道：“在巴黎，艾

韦贝克告诉我，赫斯是个很能干的人，也就是说，艾韦贝克和莫伊勒是企图按照这种意愿从事活动的。我本人并不认识赫斯，也从未给他写过信，他也没有给我写过信。他同艾韦贝克有通信联系，而且艾韦贝克有一次在人民议事会会议上还告诉我，关于西里西亚织工起义的情况就是赫斯告诉他的，同时还告诉他，关于织工状况的传单在德国不胫而走，流传甚广。其他人还对我说，赫斯同魏特林的接触相当频繁，并向他提供过资助。〔……〕

“德朗克这个名字我很熟悉，我记得这个名字是此地的著作家告诉我的。他一定发表过什么著作。我本人同他从来没有有什么交往。关于梅因博士，我早已说过，著作家克利盖在伦敦为我记下了这里的一些著作家的地址，叫我去找他们并转致问候。这些人当中就有梅因博士、埃德加尔和奈鲁诺·鲍威尔。我在这里回答提问时早已说明，后面两个人我根本不认识，梅因博士是我去年夏末在海尔特饭店初次见面的，并向他转达了克利盖的问候。从那时起，我几乎每个星期五都在海尔特见到他们，在炮兵街30号的星期日集会上也见过梅因博士，他在那里做过一个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报告。此外，他还参加过在上述两处举行的讨论。在海尔特他还常常朗诵皮特曼的纪念册和《虔诚灵魂的喜悦和安逸》的节录。”（梅泽堡德国中央档案馆，Rep.77, Tit.874, D3）。——179。

- 65 《人民总汇报。当代重大问题每月通俗评论》，从1845年1月起在科伦出版，1846年春被迫停刊（参看文件73）。这个月刊由亨利希·毕尔格尔斯、罗兰特·丹尼尔斯和卡尔·德斯特尔出版，主要研讨社会问题，同时也小心谨慎地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参看卡尔·欧伯曼《卡尔·德斯特尔——医生、革命家》，载于《德国早期工人运动史概况》1964年柏林版第114—118页。——203。
- 66 波兰革命民主派首先提出倡议，准备于1846年2月在波兰发动旨在解放全国的起义，但波兰的屠杀和逮捕行动阻止了一场普遍的起义，结果只爆发了一些零星的革命起义。只有在1815年以来由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共管的特区克拉科夫，起义者在2月22日取得了一次胜利，并组成了临时国民政府，发表了一个旨在废除封建负担的宣言。这个由德姆博夫斯基在克拉科夫起义的日子里阐明的纲领提出了一些革命民主主

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要求，例如把土地分给无土地者，建立民族的或“社会的”工厂。3月初，克拉科夫起义遭到镇压。1846年11月，根据奥地利、普鲁士与俄国签订的条约，克拉科夫并入奥地利的版图。——215。

- 67 《民主派兄弟协会给大不列颠人民的信》以及关于这次大会的报道，发表在《北极星报》上。在信上签名的有：乔·朱利安·哈尼、卡尔·沙佩尔、奥古斯特·让·米歇洛、彼得·霍尔姆、昂利·于贝尔和A.涅梅特这几位书记。信中这样写道：“我们呼吁英国的各阶级人民，对波兰的事业给以同情和支持，但我们特别呼吁无产者，因为民主波兰的事业就是他们的事业，而且因为惨痛的经验已使我们深信，波兰的真正的自由事业在该国的特权阶级中的朋友是绝无仅有的。”——217。
- 68 哈尼指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6年初在布鲁塞尔制定的旨在建立国际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计划。哈尼提及的恩格斯于3月5日写的信（该信没有保存下来），是开始实行该计划的一个最早的、比较确实的提示。但是，从丹尼尔斯1846年3月7日给马克思的信（文件78）中可以看出，马克思肯定在1、2月间就已给科伦写信，谈到了类似计划；还有艾韦贝克1846年7月27日写给马克思的信（文件114）也提到了这个日期。

在1846年这一年中，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在把科学共产主义与正义者同盟相结合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该委员会的创立，为1847年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建立做好了准备。不仅在布鲁塞尔，而且在伦敦、巴黎和科伦都最先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首先，马克思、恩格斯、菲利浦·日果和威廉·沃尔弗领导的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通过建立政治联系、协调宣传工作以及发送石印通告（参看文件88），做了大量的组织和思想工作。能证明各个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活动的文件主要有：81—83、85、87、88、90—92、94—98、103、104、108、110、113、114、116、117、121、122、125、128、132、135、138。

关于各个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历史，参看《德国工人运动史（八卷本）》第1卷1966年柏林版第53—58页；康捷尔《马克思和恩

格斯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组织者》1957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第80—170页。——219。

- 69 所谓“手工业者共产主义”首先是指魏特林的平均共产主义：“哲学共产主义”既是空想共产主义的一种形式。19世纪10年代初产生于德国的进步知识分子中间。这种思潮在许多方面可以说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前身。内部自相矛盾，存在时间不长；“真正的”社会主义从1844年以后开始形成，当时也称为“哲学共产主义”或“哲学社会主义”。关于哲学共产主义。关于“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形成。参看康捷尔《马克思和恩格斯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斗争史略》，载于《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史概论》1959年莫斯科版第114—178页。——227。
- 70 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是国民经济学历史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他在其《当代和未来的国民经济学》一书（1848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中同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进行了非常全面的论战。希尔德布兰德具有左派自由主义思想，对黑森当局持反对立场，他在撰写这篇报道时，担任马尔堡大学政治学教授和副校长。参看卡尔·格律恩贝格《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论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兼论希尔德布兰德传》，载于《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1925年莱比锡版第11年卷第445—459页。本书也是第一次刊印希尔德布兰德的报道，辨认错误在所难免。——229。
- 71 约瑟夫·魏德迈早在担任普鲁士炮兵军官期间，即大约从1843年开始就在科伦同社会主义者建立了联系，1845年他服役期满，从此就当新闻记者（《特利尔日报》、《威斯特伐利亚汽船》）。关于魏德迈的一生，参看帕斯别洛娃《约瑟夫·魏德迈》，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和第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74—312页，以及卡尔·欧伯曼《约瑟夫·魏德迈传》1980年人民出版社版。

1846年2月前后，魏德迈从当时的定居地威斯特伐利亚前往布鲁塞尔。在那里加入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从此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忠实战友。魏德迈于5月底返回威斯特伐利亚后，就积极活动，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物色出版社；同时，他还为出版马克思和

恩格斯编辑的一个杂志和出版一些小册子作出了努力。为此，他首先同威斯特伐利亚的一批社会主义者，特别是尤利乌斯·迈耶尔和鲁道夫·雷姆佩尔进行协商，还同科伦的罗兰特·丹尼尔斯保持密切联系。魏德迈、丹尼尔斯和赫斯等人在这个时期的通信，有很大一部分都是谈论这个出版社计划的，但这个计划不久便遇到很大困难。最后终于彻底破产了（参看注76和79）。本书只刊印从上述书信中所作的一些摘录，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同这个出版社计划有关的思想分歧。可惜马克思关于这个问题的通信只保存下很少一部分，因此，他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从回信中推测。——235。

- 72 克特根很晚才把他起草的这个通告的副本寄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克特根在1846年6月10日的一封简短附信中写道：“亲爱的恩格斯，请你把这个写得很蹩脚的通告转达给我们在那里的朋友们，并马上给我回信。”

预定在斐维的会晤并没有实现。关于对克特根这个通告的批判性评价。参看布鲁塞尔的复信和楚劳夫的信（文件96和98）。——249。

- 73 赫斯这个时期的其他书信也表明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态度，这种态度渊源于赫斯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观点，并且同他对魏特林的袒护紧密相连。就是在后来一段时间里，赫斯也没有放弃这种观点，虽然他不久就试图重新接近马克思（参看文件115）。他的特点是始终采取摇摆不定的态度。他在1846年6月5日从斐维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刚才我收到魏特林的来信，他现在在阿尔隆（卢森堡），住在一个裁缝家里或一家服装店里。[……]维尔特来这里已有好几天了，他也在等你的来信。从他那里我比较详细地了解了关于魏特林的事。我早已知道，魏特林在钱的问题上是个吝啬鬼。这是最后一次，我以后不再在这方面照顾他了。总之，在任何方面，我对魏特林的态度截然不同于对你的态度；他这个人越来越使我感到厌恶，只有在党务方面我才同他有联系。我希望一到科伦就向你证明我对你本人是多么感兴趣。在党的事业上，我同你没有更多的交往，这并非我的过错。这样做对党的事业也没有什么妨碍，没有我同你的合作，党的事业照样‘勇往直前’。”（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1, op. 3, Nr. 105, 载于《莫泽斯·赫斯通信集》，埃德蒙·

济伯纳编，1959年海牙版第157—158页；另见格奥尔格·维尔特1846年6月左右给马克思的信，载于《格奥尔格·维尔特全集》（5卷本），布鲁诺·凯泽尔编，1957年柏林版第5卷第224—225页；在全集中，该信的日期被误认为7月）。——251。

- 74 指杜塞尔多夫的阿道夫·云格。他在科伦学会了木工手艺，可能早在40年代初就到了巴黎，在那里的正义者同盟中起了重要作用。1846年6月底，他在科伦作了短期逗留后又重返巴黎（参看文件101），途中路经布鲁塞尔，向马克思转交了丹尼尔斯的一封信（文件97）。在巴黎，云格特别活跃，其目的在于抵制格律恩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恩格斯到巴黎时，他便成了恩格斯最可靠的战友（文件128、129和132）。在云格从科伦返回巴黎后，法国警察当局就密切注视他的活动，并于1847年3月底把他驱逐出境。关于这一点，巴黎警察厅长1847年3月23日在给普鲁士驻巴黎公使的一个报告中写道：“云格的行为不能不引起我特别注意。他倾注全力从事宣传活动，几乎完全忽视了自己的本职工作；不久前在一个共产主义团体（我已下令解散）中最终找到了他以后，我就下令抄了他的家，结果没收了一堆或多或少带有煽动性的反对现存制度的小册子、报纸和著作。[……]云格亲自起草的一个信条证明，就他的学说而言，他属于这个党的唯物主义派；最后还发现一封1846年12月17日从科伦寄给他的信，这封信只署了名字或者说只写了大写花体字起首字母Max（麦克斯），信中要求他继续坚定不移地坚持他的原则，建议他在这里充当莱茵河彼岸某一个共产主义中心的特使之一，而他也要向这个中心报告自己所采取的步骤。”（梅泽堡德国中央档案馆，Rep.77, Tit.500, Nr. 10, Bd. 5）

云格被驱逐出境后，前往布鲁塞尔，1847年8月他被选入共产主义者同盟区部领导机构（参看文件153），并且成了德意志工人协会的创建人之一。1848年初，他移居美国（参看文件190）。——254。

- 75 魏特林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中，把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劳动区分为两种主要形式：每个人都有义务为社会完成必要的劳动，并为此获得必要的生活资料；每个人都可任意或者按照自己的爱好在所谓的交易小时中从事一些附加劳动，以满足个人的生活必需品以外的需

要。因此，根据魏特林的观点，在保障个人自由的同时还应提供社会的和谐。——257。

- 76 约瑟夫·魏德迈的这封信是对马克思的一封没有保存下来的信的复信，在此信中也详细地谈到了已遭遇到巨大困难的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计划。此外，从该信的第一部分可以明显看出，马克思强烈反对魏德迈竟背着他向威斯特伐利亚的社会主义者募捐，因为这些社会主义者大部分都是拥护“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魏德迈不知道，马克思拒绝这种募捐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另见注86）。——265。
- 77 《威斯特伐利亚汽船》（帕德博恩）也没有刊登这个通告前面的“决议”以及5月11日会议的参加者名单，然而提出了“论证”，即歪曲的论证（参看注85）。关于反克利的通告，魏德迈早在1846年6月11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就这样写道：“今天我收到了你对《人民代言者报》的判决。魏特林在这里也不合群，这是个大问题。为了反对《社会明镜》上的批判，我很想在《汽船》上摘登一段。我可以提到所有的人名吗？”（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 1, op. 1, Nr. 190）。——265。
- 78 1846年初，英美两国之间因太平洋沿岸的俄勒冈地区（它在此之前系两国共管区）的归属问题而出现了剑拔弩张的局面，战争一触即发。但到了6月，两国之间达成了划分这一地区的协议。民主派兄弟协会在这封信一开头就提醒说，它已于3月4日发表了一个宣言，表示反对咄咄逼人的战争危险，希望两国人民采取和平解决办法，同时谴责美国1846年对墨西哥的征服战争。关于通过这个决议的情况，有一篇集会报道这样写道：“该协会每周的例行集会于7月6日星期一晚上在德罗利巷的白鹿酒店举行。约瑟夫·莫尔担任主席。〔……〕根据朱利安·哈尼的提议，就解决俄勒冈问题通过一封《致英美工人阶级的信》。该信是由书记们于7月4日，即美国宣布独立纪念日起草的。卡尔·沙佩尔附议，并在大会上作了简短的讲话。大卫·罗斯附议。该信获得一致通过。朱利安·哈尼提议，将这封信的副本寄给《青年美国》的出版者，并给纽约的全国改革协会写封感谢信，感谢他们在俄勒冈问题上和墨西哥战争问题上所持的态度。这个提议获得通过。厄内斯特·琼斯当选为下次会议的主席，讨论就此结束。”

(1846年7月11日《北极星报》第452号)这封信还被刊载于《1848年民主手册》1847年莱比锡版第264—272页。——275。

- 79 威斯特伐利亚的社会主义者，特别是尤利乌斯·迈耶尔和鲁道夫·雷姆佩尔，撤销了他们支持《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出版承诺，当时他们首先遇到了经济上的困难，而更深刻的原因则是，科学共产主义同正在威斯特伐利亚广泛传播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因此，马克思在1846年12月28日给安年柯夫的信中写道：“我本想有可能随信把我那本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书寄给您，但是直到现在，我既未能出版这本书，也未能出版我曾在布鲁塞尔向您说过的对德国的哲学家和社会主义者的那篇批判。您很难想象，在德国出版这种书要碰到怎样的困难，这困难一方面来自警察，一方面来自代表我所抨击的一切流派的利益的出版商。至于我们自己的党，那么它不仅很贫困，而且德国共产党内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党员由于我反对他们的空想和浮夸而生我的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88页）

甚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威斯特伐利亚社会主义者就出版问题的谈判破裂以后，他们仍然继续为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作出努力，当时他们首先得到了丹尼尔斯的支持，然而这种尝试还是没有取得成功。——277。

- 80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个计划同建立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联系在一起，计划的中心内容是计划召开一次代表大会。伦敦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表明，伦敦的正义者同盟领导人非常乐意采纳这个计划，他们在后来一段时间里，为实现这一计划做了大量工作，而这个计划不久就越来越具体化了，并且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同活动和由于正义者同盟的领导，该计划随着1847年共产主义者同盟两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而终于得以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重视通过一个政治思想上的澄清过程来筹备代表大会，以便使各个共产主义小组在科学共产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因此，就像他们给爱北斐特社会主义者的信（文件96）所表明的那样，他们反对过早地召开代表大会。事实很快就证明，在这个问题上，在伦敦的共产主义者（起初，他们更不理解对克利盖的批判）中间还存在着极其糊涂的观念。他们没有看到，政

治思想上的争论对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具有重大意义，他们竟认为只要代表大会一召开，就足以消除思想上的意见分歧和对立。布鲁塞尔和伦敦之间的这种迥然不同的观点，在1846年底前后表现得尤为突出（参看注92）。——284。

- 81 这些书信本身没有保存下来，但是，威廉·沃尔弗从他接受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托而同西里西亚，即同布雷斯劳、施特里高、厄斯、兰茨胡特、弗兰肯施坦、勒文贝格、赖辛巴赫（欧伦山麓）等地的许多社会主义者的通讯中作了大量摘录。他在摘录中没有提到名字的通信人大多是不知名的人；弗兰肯施坦的通讯员名叫沃伊德霍夫斯基。关于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同西里西亚的联系，参看瓦尔特·施米特《威廉·沃尔弗——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1846年》，载于1964年《德国工人运动史论丛》第6年卷第3期第438—461页。本书刊印的这些摘录也像其他摘录一样表明，西里西亚的通信人很愿意定期给布鲁塞尔的委员会寄去通讯，但他们拒绝建立地方通讯委员会。——290。

- 82 这封信的信封上写的收信人地址是“布鲁塞尔博登布吕克街8号菲力浦·日果先生收”，基尔的邮戳日期是1846年8月5日，汉堡的邮戳日期是8月6日，布鲁塞尔的邮戳日期是8月9日。

后来马克思在信上加了边注：

“威斯特伐利亚。

恩格斯。

德斯特尔。

西里西亚。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

尤利乌斯。

科伦的通信地址。”——295。

- 83 1846年6月底，科伦开始市镇选举的准备工作，这是按照在普鲁士首次实施的三级选举制进行的选举。早在第一次公开大会上，科伦共产主义者就懂得对小资产阶级选民（工人实际上不享受选举权）施加巨大影响。还在8月3日和4日进行初选时就出现了骚乱，军警对居民进行了肆无忌惮的镇压。义愤填膺的人民群众被迫把士兵赶回兵营，

并组织了非武装的市民自卫军。关于这次骚乱，在一次集会上当选为调查委员会委员的卡尔·德斯特尔，发表了一本匿名小册子《关于科伦8月3日、4日和以后几天事件的报告》1845年曼海姆版。在1846年10月进行的市镇参议会选举中，民主力量击败了自由资产阶级的候选人卢道夫·康普豪森。他是在第三级选民，即以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为主的选民中被民主派候选人德斯特尔击败的。参看海尔维格·费尔德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革命前夕》1960年柏林版第104—109页；卡尔·欧伯曼《卡尔·德斯特尔——医生、革命家》，载于《德国早期工人运动史概况》1964年柏林版第118—127页。

毕尔格尔斯也向马克思报告了这次选举运动（参看文件119），并于9月份给他寄去了一份详细的总结报告。报告中谈到了共产主义者（他们也代表不享受选举权的工人的权利）的态度：“因此，现在的关键是，赋予无论如何都不明事理的人民党以明确的性质。试问，应该通过强调社会的经济状况，通过清晰地刻画两个以此为基础的党派特征，即刻画资产阶级派和共产主义派的特征来强迫集会，以表示赞成这个或那个党派，共产主义者即使遭受失败、从而丧失市参议会候选人的危险也应该听凭公开的表决，或者他们只应该致力于把集会的纲领搞成一个连明智的资产者也不能接受的纲领？在这里的一次共产主义者的集会上，许多人的态度都非常消极，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同这整个事件毫不相干。这种观点占了主导地位，而德斯特尔设想的下一次市民大会上的纲领草案同《科伦日报》在上个星期日所报道的差不多，现在的市民大会只是一种形式而已，因为它明确声明，选民和非选民的差别对它是无所谓的。”（亨利希·毕尔格尔斯1846年9月给马克思的信，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 1, op. 5, Nr. 124）。——298。

- 84 这封信是对马克思的一封没有保存下来的信的答复。马克思在他的信中不仅严厉地批判了迈耶尔、雷姆佩尔和吕宁，而且也明显地批评了回到威斯特伐利亚后进行《德意志意识形态》出版问题谈判的魏德迈本人（参看注76和79）。从整篇通信中可以看出，魏德迈暂时还没有完全摆脱“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影响，没有认清争论的原则意义，并试图首先保护迈耶尔和雷姆佩尔。不过主要是由于误解所致，而对这种

- 误解特应负主要责任，因为关于出版问题的谈判最早是由他去进行的（参看文件82）。但同魏德迈的意见分歧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他不久就认识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代表的观点是正确的。——301。
- 85 讨论反克利盖的通告（文件88）的刊登问题早已成了魏德迈写信的题材（参看文件99）。但是，《威斯特伐利亚汽船》（1846年第2年卷第7期第295—308页）以《〈人民代言者报〉，由克利盖在纽约编辑出版》为题发表时，正如魏德迈所说的，并没有“逐字逐句”发表，而且由吕宁加了一个模糊不清的按语，还对原文作了很大改动；他甚至偷梁换柱，塞进了自己的观点并加上了跋。魏德迈在信中只引用了跋的第二部分；而在第一部分中，吕宁以调和的口吻声称，“说到我们的批评家，他的批判虽然严厉、尖锐，但是恰如其分。有些人也许会认为，在党内搞得如此认真是不明智的。我上面已经说过，各人的口味是各不相同的。我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但愿克利盖放弃他那套空洞无物、华而不实的空话，不妨回过头去寻找自己行动的坚实核心，寻找自己所追求的实际内容；但愿他从自己竭力推崇的感伤主义和虚无缥缈的爱之梦幻中苏醒过来，重新回到现实的人中间，为人的现实发展和现实运动站岗放哨，到那时，我们愿意同他握手言欢，而他也许还能做出一些优异的成绩来。但是，现在正是转变的时候。”——305。
- 86 关于这段话，魏德迈在信的结尾加了下面的注解：“我把我信中的这段话告诉了吕宁，他担心这段话在谋求博得欢心，而我却并不打算这样做。他请求你们，如果你们计划对《汽船》提出批评（从你们的来信的结尾所说的‘大人’似乎可以看出这一点），那么你们不要考虑个人的情面。”“信”中引用的话摘自莫扎特《费加罗的婚礼》：“假如您愿意起舞，大人，请您示意，我为您伴奏！”——305。
- 87 这封信不是原件，而是根据警察当局1850年在莱比锡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格奥尔格·亨利希·马尔提乌斯家找到的文件的汇编复制出来的，有些地方则是逐字复制的。参看格尔哈德·齐塞《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前史的新文献》，载于1963年《德国工人运动史论丛》第5年卷第5—6期第957—964页。警察当局的汇编虽然没有说明发信人和收信人，但是我们把它同卡尔·沙佩尔起草的伦敦共产主义者的其

他信件作一番比较，就可以得出结论，这封信也可能是沙佩尔起草的（另见文件125）。我们可以从该信的内容推测出，收信人可能在德国，而且不会是老盟员。如果这封信是寄往莱比锡的，收信人就可能是埃·奥·韦勒尔，因为他不久就在他的《民主手册》上发表了1846年11月和1847年2月的告同盟书（文件134和139）。在警察局档案的内容陈述一栏里，关于该信的第一部分是这样总结的：

“一封伦敦来信，注明的日期是1846年8月28日，收信人不详，似乎也没有落款，信尾写着：

“地址：索荷区国王街21号，芬德[普芬德?]先生

“信的开头提到了该收信人的若干书信，其中一封是由考夫曼·M.传递的，他要立即带回复信和认股的钱，接着写道：

“‘首先我用你来称呼你，因为我讨厌用您字，而且因为亲爱的兄弟——

“收信人由于德国无产者没有支持波兰人而毫无道理地指责无产者胆怯——只有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才有能力争取社会自由并使人们摆脱金钱统治。收信人请求得到新近出版的社会主义著作，特别是一些有关威·魏特林、载勒尔、科姆布斯特、哈罗·哈林和克利盖的评论。伦敦教育协会想为《普罗米修斯》杂志认股，并先寄去一半捐款——30先令。遭到教师们激烈反对的、现在伦敦分为两个协会的教育协会坚持纯粹人的观点，‘我们不再是基督徒，而是人’。”——307。

- 88 “青年德意志”（注26）的代表人物从1843年以来重新对侨居瑞士的德国手工业者帮工产生较大的影响，同时他们又竭力反对在瑞士传播的魏特林共产主义。但是，1845年瑞士当局采取的迫害措施已大大地限制了流亡者即“青年德意志”和共产主义者的活动。沙佩尔在信中对残存的一些“青年德意志”小组同正义者同盟盟员取得联系的过程所作的判断未免有些过分乐观。1846年，“青年德意志”实际上已不再作为政治流派继续存在。——307。

- 89 《普罗米修斯》杂志（黑里骚），是海尔曼·皮特曼因出版《德国公民手册》和《莱茵年鉴》而遭到迫害，被迫流亡瑞士后出版的。皮特曼在《普罗米修斯》（仅在1846年底出版过一个两期合刊）上维护他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观点。伦敦的正义者同盟盟员也曾资助过该杂志

（参看注87）。这篇通讯很可能是卡尔·沙佩尔写的，因为它的内容和文风都同文件124和125很接近。——310。

- 90 伦敦“德意志读书会”把这封“公开信”寄给了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征求后者签名，结果导致教育协会发出了自己的公开信，就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表明了它的态度。从纳特劳关于伦敦讨论的记述（参看注55）中可以看出，1846年9月13日的信的草稿曾在工人教育协会中进行了公开讨论并获得一致通过。这一草稿是由哥达的中学教员西韦尔斯教授起草的，1846年，他为了研究学校制度而在法国和英国逗留过（参看注59）。1846年夏天，西韦尔斯带着介绍信从巴黎来到伦敦，找到了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参看文件109），并参加了工人教育协会和民主派兄弟协会的讨论（参看文件131）。

这封信印成了小册子，共计8页，1846年9月18日又在《德意志伦敦报》上发表，9月26日还用英文发表在《北极晨报》第463号上。1846年9月17日左右，该信寄到了巴黎，在那里，正义者同盟把它广为散发。恩格斯也拿到了此信，并对它的不足之处作了尖锐的批判（参看文件120）。

信中否定了剥削者国家的“祖国”这一概念，同时强调各国工人的共同利益。但是，这种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相对立的尝试，并没有摆脱资产阶级世界主义的特征。这些毛病似乎首先应归咎于作者西韦尔斯，其根源则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就是根本否定当时资产阶级运动的相对进步性，从而也根本否定当时资产阶级领导下的民族运动的相对进步性。——312。

- 91 1846年夏天和秋天，正义者同盟的领导机构即巴黎的人民议事会陷入了非常危急的境地，海尔曼·艾韦贝克退出组织活动一事（参看他于1848年8月14日给马克思的信，文件118）也可证明这一点。最后决定把领导机构所在地迁往伦敦，由那里的同盟领导成员，首先是卡尔·沙佩尔、约瑟夫·莫尔和亨利希·鲍威尔组成了新的人民议事会；新的议事会在1846年11月的告同盟书（文件134）中向同盟报告了新的形势和它的计划。关于人民议事会迁往伦敦一事另见文件148。——323。
- 92 关于计划召开一次代表大会的这段论述表明，伦敦的人民议事会改变

了自己的意图。1846年9月人民议事会还打算在1847年初召开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倡议的全体共产主义者代表大会（参看文件125和126），甚至还表现出某种急躁情绪（参看注80），而它现在又把这次代表大会推迟到1848年召开。不过它预先想要举行一次正义者同盟代表大会。人民议事会显然没有把改变代表大会的召开计划一事通知马克思和恩格斯，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恰恰非常重视关于召开这次大会的细致的思想准备工作。至于具体的计划和有直接联系的争论缺乏详尽的记载，仅有恩格斯的一封信（文件136），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布鲁塞尔和伦敦之间有时出现了明显的不和。但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很快就认识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的正确性，并决定请求他们两人加入同盟（参看文件138）。——324。

- 93 天主教会和新教教会这两个反“派”接近自由运动，特别是民主运动，不久便遭到政府日益严酷的迫害。1846年，新教的“光明之友”运动导致了教会的分裂，分裂出来的部分组成了“自由公理会”。强调宗教问题是形成政党的障碍。——325。
- 94 约瑟夫·莫尔带着这份由卡尔·沙佩尔起草的委托书，实际上是正义者同盟人民议事会的一封信，前往布鲁塞尔会见马克思并前往巴黎会见恩格斯，就邀请他们加入正义者同盟一事进行谈判。恩格斯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中记述了这次谈判的经过，而马克思则在《福格特先生》中写道：“我们还出版了一系列抨击性小册子，有的是铅印的，有的是石印的；我们在这些小册子里，对构成当时同盟的秘密学说的那种英、法两国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同德国哲学这二者的杂拌儿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为了代替这种杂拌儿，我们提出把对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结构的科学研究作为唯一牢靠的理论基础，最后并用通俗的形式说明，问题并不在于实现某种空想的体系，而在于要自觉地参加我们眼前发生的革命地改造社会的历史过程。在我们的活动的影 响下，伦敦中央委员会同我们建立了通讯联系，并在1846年年底派了一个中央委员、钟表匠**约瑟夫·莫尔**（他后来以一个革命士兵在巴登战场上阵亡了）到布鲁塞尔来，邀请我们加入同盟。我们对这种建议有种种顾虑，但都被莫尔打消了，因为他通知说，中央委员会准备在伦敦召开同盟代表大会，大会上，我们所坚持的各种批判的观点，将

作为同盟的理论在正式的宣言中表现出来：他又说，可是为了同保守派分子和反对派分子作斗争，我们必须亲自参加大会，这就涉及我们要加入同盟这样一个问题了。这样，我们就加入了同盟。”（卡尔·马克思《福格特先生》，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464—465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莫尔交谈中也反对形形色色的“迷信权威”的东西，对此马克思后来写道：“我们两人都把声望看得一钱不值。举一个例子就可证明：由于厌恶一切个人迷信，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让公布那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我甚至从来也不予答复，偶尔答复，也只是加以斥责。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秘密团体时的必要条件是：摒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后来，拉萨尔的所作所为却恰恰相反。）”（马克思1877年11月10日给威廉·布洛斯的信，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86—289页）。——337。

- 95 雅科布·沙贝利茨在日记（藏于巴塞尔大学图书馆，沙贝利茨遗著¹）中也谈到了出版一个杂志的尝试。沙贝利茨是一个进步的瑞士出版商的儿子，于1846年5月来到伦敦。不久以后就担负了《德意志伦敦报》的编辑工作，这家报纸是德国流亡者的机关报，由失去王位后移居伦敦的不伦瑞克公爵资助。沙贝利茨最初只是由于社交活动才于1846年9月加入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但不久他就成了教育协会和民主派兄弟协会的积极会员。最后，于1848年初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参看文件225）。沙贝利茨在其日记中写道，1847年2月7日，他在工人教育协会中参加了一次“关于准备出版协会刊物的讨论。在讨论中，他同意采用《无产者》为刊名，而反对用《工人报》为刊名”。接着他还写道：“我们也取得了胜利”。关于2月14日会议上的一次讨论，沙贝利茨继续写道：“上星期天，在采用刊名的问题上我们取得了胜利，而这次在出版协会刊物的问题上我们失败了。沙佩尔、普芬德、舍尔瓦尔德〔应为舍尔瓦尔〕、班贝尔格尔和我分析了我们主张出版月刊的理由。只有施奈德尔和舒斯泰尔（他们对这种事简直一窍不通，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不同意我们的观点，而主张出版半月刊。沙佩尔、班贝尔格尔和我都将不再插手此事，让

这些人去干去。这就叫做‘万事开头难’，因此凡事都应从小事做起，不要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以后才出版了《共产主义杂志》的试刊号。——346。

- 96 魏德迈接着比较详尽地论述了马克思的打算，即准备在《威斯特伐利亚汽船》（帕德博恩）上发表其批判卡尔·格律恩所著《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一书的文章（即《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这段论述和魏德迈1847年7月22日给马克思的信（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1，op.5，Nr.141）一样，都说明了当时出现的种种困难。有些困难是由于误解造成的，而产生误解的原因首先是丹尼尔斯的疏忽大意，他到7月中旬才把手稿寄给魏德迈，而马克思早在4月就已经预告要在《威特伐利亚汽船》发表手稿（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2—45页）；另一方面的原因则由于吕宁反对对“真正的”社会主义作原则性批判（参看注97）。——349。

- 97 奥托·吕宁（魏德迈把马克思的信转给了在瑞士的吕宁）在1847年7月16日给马克思的信中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从该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反对吕宁竟对批判格律恩持保留态度并提醒大家注意吕宁在刊登《反克利盖的通告》（参看注85）时竟作了篡改。这封给马克思的信充分证明了吕宁的动摇不定态度，信中这样写道：

“您的来信使我很高兴，我早就希望同您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

[……]

“关于您预告在《威斯特伐利亚汽船》上发表您的著作，事先您没有同我商量，我并不想因此责怪您。您无论如何可以指望《汽船》，因为我相信，不仅魏德迈的著作，而且我本人的著作，都同您的观点相差不远。我在有关的章节中指出了一些难以通过书报检查的地方，在其他章节中我作了如下改动。恕我直言。

“您对我们的现状的看法，我是知道的，而且非常赞成，而您的论战方式我不能苟同。您向以某种方式不同意您的观点的所有人开火——也就是说，您常常把这些人说得一无是处，仿佛他们从此以后就成了时代的废物，必须尽快地把他们从运动者的行列中清除出去。尽管我本人决不充当四平八稳的和事佬，而且也不相信我会对任何一个

我所认识的人留下这种印象，但我不认为这是正确的，无论如何不认为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一个人对自己可以随便批判和指责，但当一个人在同一个方向的半道上停步不前（虽然有一度是同路人）为什么就要打棍子呢？为什么要让愚昧无知的或者幸灾乐祸的公众看笑话呢？而公众是把它看成自己阵营内部的一场激烈斗争的。这对于本来就不太巩固的党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我非常赞同您对克利盖的极端无知所作的批判性阐述，但是，如果我可以把您的原话作一番重大修改，那么，为了读者起见，我宁愿把责备之词弄得温和些。顺便说一句，我没有把这些责备当作自我批评，而只是清楚地介绍了布鲁塞尔的通告，我只是考虑到书报检查这一关才没有直接把这个通告看作是布鲁塞尔共产主义者的一道命令。我不知道您不愿意刊登这一通告，此外，它在我们这里已经不胫而走，广为传播，甚至已寄给克利盖本人去刊登。

“言归正传，凡是对格律恩先生的种种非难，我全都了解，他的夸夸其谈，他的抄袭才能，如此等等。您不要以为我对他抱有什么幻想；我从一开始就非常了解他。尽管如此，但我不能不认为，他过去的所作所为是无害的，是顺从党的，尽管他犯过那么多的错误和干过那么多的欺人勾当，但公众的愚昧无知确实是严重的，以致他们还能从他那里学到一些东西。此外，不能否认，他是一个多产作家，因此他曾激励了一些人，至少使一些人感到好奇。又由于他正好在社会主义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时期偶然在威斯特伐利亚出现的，由于他那满怀信心的举动，他在我们这里居然成了一个公众人物，因此，为了党的利益，我认为，在他的个人品德没有表现出来以前，就把他弄得太丢人显眼是有害的。因此，我希望您不要把您的非难搞得过于尖酸刻薄，过于令人厌恶，希望不要把他整得太惨。我没有读过您的手稿，所以，我已请求魏德迈征得您同意，把一些地方改得缓和一点。我希望您能认可我的理由，并对此表示赞同。”（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1，op.5，Nr.140）。

马克思的文章发表在《威斯特伐利亚汽船》8月和9月合刊第439—463、505—525页）上；这次编辑部未作修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73—628页。——349。

- 98 说“10月”是不对的。很可能是“7月”。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恩格斯就从伦敦回到巴黎。但他在巴黎只呆到7月底，后来就到布鲁塞尔去住了几个月。波尔恩所说的分手想必就是在这段时间。从伯尔尼工人联合会理事会的记录本中可以看出，波尔恩1847年9月就统已同这个联合会有来往（参看罗尔夫·德卢贝克《关于弗·恩格斯1848年底至1849年初在瑞士的政治活动》，载于1960年《德国工人运动史论丛》第2年卷第1期第749页）。如果我们根据波尔恩关于他的逗留所作的说明，从这时推算他的旅程的各个阶段，就能算出他离开巴黎的时间大约在7月底。关于波尔恩在其特使旅行中所起作用的重要说明，见中央委员会1847年9月14日的告同盟书（文件160）。——350。
- 99 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的建立是以布鲁塞尔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组织为基础的。马克思在后来的一则笔记中曾谈到他和恩格斯在建立该工人协会时所起的作用。他说：“在他（恩格斯）旅居布鲁塞尔时，他和马克思建立了德国工人共产主义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同佛来米和瓦隆的俱乐部保持了联系。他们两人和伯恩施太德一起创办了《德意志—布鲁塞尔报》。”（马克思《弗·恩格斯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文版导言》，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0页）。
- 协会主席是卡尔·瓦劳，莫泽斯·赫斯曾一度担任副主席。马克思曾在协会作过几个报告，其中包括《雇佣劳动与资本》。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威廉·沃尔弗是“最受爱戴的演讲人之一。他每星期都到那里作时事评论。这些评论每次都是一篇叙述通俗、幽默而又十分有力的杰作，对德国的统治者和臣民的渺小和卑鄙，进行了特别强烈的抨击。这些政治评论成了他十分喜爱的题材，在他参加的每一个社团里，他都要发表这种评论，而每次都讲述得同样完美而通俗。”（恩格斯《威廉·沃尔弗》，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68页）威廉·沃尔弗写的会员名单（文件191）清楚地表明，这个工人协会建立几个月后就拥有约100名会员。——351。
- 100 《共产主义杂志》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在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出版的，1847年春同盟就对创办一个同盟的机关刊物作了初次

尝试，但没有成功（参看注95）。在杂志的扉页上第一次出现了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此外，开头还印有下列告示：“我们敬请国外所有支持我们事业的朋友们，把稿件和订阅本杂志的订单一并邮寄给‘工人教育协会’，地址是：伦敦霍尔博恩车站德罗利巷191号，邮资统付。杂志**定价**：在德国每份为2新银洛罗申或6十字币，在法国和比利时为4苏，在瑞士为1.5巴岑。”在杂志的封底上印有这样的附注：“在伦敦瑞琴特公园梅里勒榜街8号德国书店；西区霍尔博恩车站德罗利巷191号教育协会；东区怀特奈泊湾大城塔街教育协会均有出售。”版权说明：“伦敦城区圣玛丽·阿克新街18号，梅尔多拉—坎恩出版公司出版。内部发行。”

杂志编辑部由卡尔·沙佩尔负责，开头两篇绪论可能出自他的手笔，关于卡贝移民计划的那篇文章也可能是他写的。政治思想极其明确的那篇论文是威廉·沃尔弗写的，他可能也是编辑部成员之一。从沙贝利茨9月4日的日记（参看注95）的一则记载中可以看出，试刊号是1847年9月的头几天出版的。在日记中是这样记载的：“昨天，沙佩尔来看望我们，带来几本《共产主义杂志》，让我们发送。”

（藏于巴塞尔大学图书馆，沙贝利茨遗著1）原计划把威廉·沃尔弗接回伦敦，参加杂志编辑部工作，杂志于1848年初开始定期出版。但是，这个计划未能实现，原因不明。关于试刊号的推销情况，参看文件160。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保存着一份《共产主义杂志》，上面有弗里德里希·列斯纳的两条题词，其中一条是写在封面上的：“共产主义杂志。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于1847年出版”；另一条是：“弗里德里希·列斯纳为当代和未来工人运动史收藏。1890年于伦敦。”（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 20, op. 1, Nr. 111）。

本卷完整地刊印了《共产主义杂志》，除了最后的一篇论文《政治和社会评论》，这篇论文是关于各国发生的事件简讯汇编，可能出自威廉·沃尔弗的手笔。

完整的重印本见威纳尔·科瓦耳斯基《从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1967年柏林版第391—417页；此外参看影印本，载于《社

会科学新报增刊检索丛刊》(苏黎世)第1期(未注明出版日期)。
——356。

- 101 卡尔·海因岑在九点要求中阐述的小资产阶级纲领具有明显的空想、反动的特征。在前四点要求中他要求推翻君主制，建立一个能保障公民的“物质”和“政治”幸福的共和国。在第五点中，海因岑认为，共和国的第一条原则就是，“任何一个人都无权占有公共土地，所以土地必须是人类的公共财产，即必须是国家的财产”。但是，根据第七点，每个公民在不损害他人权利的前提下，有权“按照自己的个性在这个公共财产上……建立和理应当要求个人生存。”海因岑把“个人所得”和“所得者的个人占有”明确地称之为“个人生存的需要”。在第七点中，海因岑试图通过直接的“最高限度”的占有或者累进税来防止因自由竞争的“迫切需要”而产生的“有害的不平等”，并且声明：“任何人也不得要求更多的报酬，只能得到根据约略估算所必需的东西，以维持人的生存，过得像他人一样幸福。”同时，在海因岑看来，国家的任务应当是“限制个人的任意所得”。根据第八点，国家应当为成年公民的自由训练而负责向这些人提供“最低限度”的东西，即“有一定期限的自由住房”以及为“从事所选择的职业的开始阶段”准备“最低限度”的物质和资金。海因岑在第九点中力图非常详尽地证明，国家“在一切有争议的利益方面充当调停角色的第三者”(卡尔·海因岑《共产主义的》，载于1847年《德意志代言者报》(缪尔豪森)第2期第125—132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的文章反映了他们同海因岑的小资产阶级观点的争论是多方面的，见文件162和172；参看文件163和170。——365。

- 102 早在1843年，当伦敦的共产主义者还深受卡贝影响的时候，他们就已反对他的移民计划了(参看文件40)。1847年5月，卡贝在他出版的《人民报》(巴黎)上发表了一项呼吁书，题为《伊加利亚旅行记》，《共产主义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的作者，可能是卡尔·沙佩尔，同这一呼吁书展开了争论。1847年9月8日，卡贝离开法国来到了英国。他利用在那里逗留的机会试图说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支持他的计划。对此，列斯纳在回忆录中写道：“1847年夏，著名的《伊加利

《旅行记》的作者埃蒂耶纳·卡贝向法国共产主义者发出了呼吁，「……」这一号召也传到了伦敦工人教育协会。大约在1847年9月，卡贝亲自到伦敦，要我们相信他的思想。我们把他这个建议讨论了整整一个星期，最后，同盟表示反对一切试验。”列斯纳接着详细地引证了《共产主义杂志》上那篇文章所列举的论据，然后他继续写道，“这就是我们给卡贝的答复。我之所以在此把这些都详细地记述下来，因为它们很有历史价值。这些东西表明，那时已经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的有思想的共产主义者，当时就驳斥了各种空想的尝试；此外还证明，我们是正确的；时间则完全证实了我们的忧虑。”（弗里德里希·列斯纳《一八四八年前后》，载于1898年《德意志言论》（维也纳）第3期第106—108页；《人间的普罗米修斯》198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5—6页）。

1847年9月22日卡贝回到德国以后，又在10月8日和10日的《人民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在该文中详细地引用了《共产主义杂志》上的那篇文章的论据，试图对它们一一加以驳斥。参看阿尔图尔·雷宁《卡贝答沙佩尔》，载于1953年《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公报》（阿姆斯特丹）第8年卷第1期第7—15页。1847年12月，卡贝又一次到伦敦，为他的移民计划辩护。对此，沙贝利茨在日记中写道，“星期二（12月28日）晚上协会举行了一次有趣的会议。巴黎的卡贝到会阐明了他的移民计划并驳斥了反对这个计划的意见。这一点他做得很不光彩。因为鲍威尔和沙佩尔的讲话是无懈可击的。”（巴塞尔大学图书馆，沙贝利茨遗著1）。——364。

103 有一段时间，恩格斯也被认为是这篇论文的作者。但是，只要把这篇文章同威廉·沃尔弗发表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的各篇文章作一比较，就可以看出，《共产主义杂志》上的那篇文章也出自沃尔弗之手（参看瓦尔特·施米特《威廉·沃尔夫为〈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撰稿》，载于1961年《德国工人运动史论丛》第3年卷第2期第334—335页）。现在，这个事实已为1847年9月14日的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文件160）所证实。——367。

104 1847年夏天，马克思在威廉·沃尔弗的帮助下，终于对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阿达尔贝特·冯·伯恩施太德和从1847年年初开始作为布魯

塞尔德国流亡者的报纸出版的《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产生决定性影响。早在1847年春天，沃尔弗就已经为该报撰稿，同年6月，恩格斯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从1847年9月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同伯恩施太德达成的一项特别协议，成了该报的经常撰稿人，并且他们很快便确定了编辑部的政治路线，而已经相继加入工人协会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伯恩施太德表面上仍然是编辑部的领导人。从此，《德意志—布鲁塞尔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报上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实际上就成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关报。

为《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撰稿，曾经遭到各方面的反对，比如魏德迈就顾虑重重，在他看来，伯恩施太德这个人原先在政治上比较糊涂。关于伯恩施太德同德国各邦政府有勾结的谣传不胫而走，但他在出版《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的时候，也遭到了普鲁士政府的迫害，尽管他过去曾经向普鲁士政府写过报告，但现在，普鲁士政府还是千方百计唆使比利时政府把他驱逐出境。而马克思在评价《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时的出发点是，支配一家新闻刊物对共产主义运动所具有的意义；他在1847年8月8日给海尔维格的信中阐明了他的观点。他在信中谈了普鲁士公使馆的阴谋诡计以及针对伯恩施太德的三个案件，并补充说，这些案件对伯恩施太德来说是不会有结果的，然后他说：“不过，在另一方面，《布鲁塞尔报》却面临着突然发生经济破产的危险。这家报纸虽然存在许多缺点，毕竟还有一些功绩，特别是现在，伯恩施太德已经表示愿意在各方面都适应我们，报纸将会办得更好些。那些高贵的条顿人在这个事件中采取了什么态度呢？各位出版商诬陷伯恩施太德，因为他无法在法律上追究他们的责任。形形色色的反对派，不是在写作上或在经济上给予哪怕极其微小的帮助，而是认为，更方便的是宣称伯恩施太德的名字对他们是一个障碍。这些人任何时候都会找到借口而什么也不干的！他们要么就是说本人不行，要么就是说那人的妻子不行，要么就是立意欠妥，要么就是文风不佳，要么就是版面有问题，或者推销起来多少有一些危险性，等等。这些先生想要坐享其成。如果有一家不受检查制度约束而又是政府所百般刁难的反对派的报纸，而报纸的编辑通过他的工作的

结果本身表明他是愿意从事一切进步活动的，难道不应该首先利用这种机会吗！？如果认为这家报纸还不令人满意的话，难道不应该使它令人满意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 第492页）1848年3月，伯恩施太德在巴黎被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参看文件216）。——384。

105 哥特沙克在这里显然是指一个社会主义者小组，这个小组的核心就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其中有安得列阿斯·哥特沙克、弗里德里希·安内克和奥古斯特·维利希。这个科伦小组中的有些人接受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影响；与此相反，以亨利希·毕尔格尔斯、罗兰特·丹尼尔斯和卡尔·德斯特尔为首的同盟支部则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有紧密联系（参看恩佐别尔《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三月革命前的同盟科伦支部》，载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24年莫斯科版第1卷第76—104页；德译文载于《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1925年版第11年卷第299—335页）。——385。

106 1847年9月25日，《北极星报》（伦敦）刊登了一篇关于周年庆祝活动的报道，报道详细地复述了厄内斯特·琼斯的讲话；根据这一报道，他在谈到卡贝的移民计划（参看文件156）时说：“我们必须防止两种危险——移居国外和我们的力量在家乡分成小股力量。我已发现这两种危险的倾向确已存在。兄弟们，我把每个移居国外的宪章主义者看成是人民大军的逃兵。（请听，请注意听！）那些移居国外的人都是最有实力的人，最有进取心的人，而我们在家乡恰恰就最需要这些人。〔……〕我遗憾地看到，一个伟大而有天才的人丧失了自己的毅力，丧失了法国20 000人的毅力。可怜的爱国家者！他们在不久的将来就要失掉三色旗和《马赛曲》。而路易-菲力浦如果看到他的20 000敌人当他的面落荒而逃，定会在土伊勒里宫捧腹大笑。他很清楚，他们是逃往自己的政治坟墓。兄弟们，要做男子汉大丈夫，留在这里，别像胆小鬼一样逃跑。〔……〕你们应在自己的国家建立你们的移民区。在你们自己的国家已有现成的料材，你们可以省力气。你们在自己的国土上必定能组成新的国家，因为你们在更新旧的国家。（热烈鼓掌）”——387

107 派尔·约特雷克的小册子，是根据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以

后在同盟内部进行的纲领讨论写成的，其中主要部分再现了纲领草案（文件147），该草案是在恩格斯直接参与下由第一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构成了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的草案基础。约特雷克的著作是瑞典同盟盟员具有巨大积极性的一个明证，这种积极性在其他一系列文件中也有所表现。约特雷克本人是同盟盟员，1848年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瑞典文本。约特雷克在斯德哥尔摩开有一家小书店，他早在三四十年代就是一位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出色宣传家，翻译过圣西门学派和卡贝的一些著作，最后他们还专门从事卡贝学说的研究。约特雷克是斯德哥尔摩工人教育协会和斯德哥尔摩斯堪的那维亚工人教育协会的领导成员。

斯德哥尔摩工人教育协会（教育社），是1845年10月在裁缝帮工奥洛夫·伦胡尔特和斯温·特雷加德同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共同倡议下成立的，它很快就从一个小团体发展成了一个庞大组织，在1848—1849年间拥有会员1500多人。不久，在瑞士的其他城市也相继成立了类似的团体。在建立这些团体的过程中，同盟盟员起了重要作用。早在1846年7月，在伦敦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一封信（文件109）中哥德堡就被称为根据地。1847年2月的人民议事会告同盟书（文件139）就强调了同盟在瑞典，特别是在斯德哥尔摩所取得的成就，同时指出了继续建立团体的必要性。1847年9月11日的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文件160）特别详尽地探讨了同盟在瑞典所取得的进展。

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瑞典的盟员中，裁缝帮工卡尔·丹尼尔·福尔塞尔的表现也很突出，他于1843年漫游到了巴黎，在那里发展成了共产主义者，1846年旅游到伦敦。1847年1月，一个牧师在斯德哥尔摩工人教育协会作的一个报告（后在《晚报》上发表）中试图证明，共产主义和真正的基督教是一致的，当时可能正好在瑞典南方的福尔塞尔撰写了一篇反驳文章，寄给了约特雷克。后者于2月21日在工人教育协会中宣读了这篇文章，此外还把它出版，题为《共产主义和基督教》。〔1847年2月21日在教育协会的演说，评共产主义者伊格内尔关于共产主义的报告〕。共产主义者卡·丹·福尔塞尔作》。〔应多方要求予以出版〕。

正当工人教育协会的会员迅猛增加的情况下，在1847年这一年，它的领导权却日益落入反动势力之手。这种反动势力禁止进行各种讨论，给特雷加德和伦胡尔特的报告活动设置了越来越大的障碍。斯德哥尔摩的同盟盟员，正如他们1847年7月8日的信（见文件160所引证的）中表明的，被迫把自己的活动重点转移到约特雷克所领导的那维亚协会去。

《论无产阶级》这本小册子是匿名出版的。警察当局的调查报告认为它可能是约特雷克的挚友、裁缝洛伊夫施泰特写的。尽管如此，仍然可以有把握地假定，它的作者是约特雷克。这里只能提供一些大致的说明，用以比较确切地确定该小册子的出版日期。从扉页上看，它是1847年出版的，这一点同下列情况是吻合的：在第10页上，在评论卡贝的移民计划时谈到“明年，即1848年”实现这个计划。它也不可能在1847年9月以前出版，因为在小册子中引用了9月初出版的《共产主义杂志》上的论述；但是，要是把伦敦和斯德哥尔摩之间交通路线较远这一点也考虑在内，那么，10月以前出版的可能性似乎也很小。因此，这本小册子的出版最早也不可能在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前、纲领讨论达到高潮的那两个月。

约特雷克这本小册子共有24页，分成3章，此外，前面有一个简短的序言，后面加了一个说明卡贝的移民计划（参看注102）的附录。这几个部分各有各的特点，因为约特雷克的小册子是由各种不同材料再加上自己的论述编写而成的。从这个小册子中可以看出，约特雷克受了空想主义的观点，特别是卡贝的观点的很深影响，有的地方还竭力运用基督教的思想。但同时他又努力接受非宣传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第3章，即内容最为丰富的一章，题目是《共产主义是一种社会形态》，在这里集各种论述和评语之大成，几乎全是空想共产主义的思想，而开头两章则基本上再现了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纲领草案，因此可以明显看出同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有许多共同之处。引用纲领草案的程度很不一样，但无论如何都用连贯性的行文代替了问答方式。在第1章《无产阶级》中，约特雷克几乎寸步不离伦敦的《信条》的词句。在这一章的第一部分中，即最大的一部分中，除少数例外，有些地方逐字逐句地，有些地方基本上逐字逐句地翻译了第7—

12个问题的答案，也就是说正好翻译了伦敦草案中明显可以看到出自恩格斯手笔的那一部分。第一章的第二部分，即结论部分，与此相反，则是约特雷克自己的阐述。在第二章《过渡时期的共产主义》中，约特雷克复述了第二至六和第十三至二十二个问题的答案。但同时他使用了较多承前启后的过渡语，加进了本人的不少论述，在引用第四、五两个问题时还作了一些小小的改动，接下去也就不常逐字逐句照抄纲领草案了。最明显的是，他在引述第二十二个问题的答案时，把伦敦纲领草案的内容同他自己的观点掺杂在一起。这个问题的答案本来很短，而约特雷克给它加进了自己对宗教看法的详细论述。

约特雷克作为草案引用的也许不是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结束以后就立即发出的那个复制本（参看文件149），而是1847年7月中旬左右专为瑞典的同盟盟员准备的拉丁语副本（参看文件160）。而这个副本可能有某些出入或改正。因此，约特雷克特别准确地引用草案的地方，没有插入自己的评语的地方，可能恰恰就出现一些文字上的出入，当然并非大的出入。本书印行了约特雷克小册子的第一部分，即引言和开头两章，只作了很少删节。印行的部分，没有把正字法现代化。

关于瑞典工人运动的初期和约特雷克的作用以及他的著作《论无产阶级》，参看克尼特·拜克斯特勒姆的《瑞典工人运动》1958年斯德哥尔摩版第1卷第47—75页、1961年莫斯科版第61—87页；康捷尔《〈共产党宣言〉的历史的新材料》，载于1960年《近代和现代史》（莫斯科）第4年卷第2期第111—126页、1961年《德国工人运动史论丛》第3年卷第1期第63—76页；G.亨利克逊-霍尔姆贝格《社会主义在瑞典。（1770—1886年）》1913年斯德哥尔摩版第156—192页；伊瓦尔·温奈斯特勒姆《瑞典乌托邦》1913年斯德哥尔摩版第126—181页。——390。

- 108 马克思、恩格斯、格奥尔格·维尔特和威廉·沃尔弗也出席了1847年9月16—18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讨论自由贸易问题的国际经济会议。维尔特在会上讲了话（格奥尔格·维尔特《在讨论自由贸易问题的布鲁塞尔会议上的演说》，载于《维尔特全集》，布鲁诺·凯泽尔编，1956年柏林版第2卷第128—133页），他在讲话中阐述了共产主义者

的立场。关于格奥尔格·维尔特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作用，参看科切特科娃《格奥尔格·维尔特》，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和第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1963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第313—359页。马克思本来打算也要发表演说，但被大会主席拒绝了（参看恩格斯《讨论自由贸易问题的布鲁塞尔会议》，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85—296页）。会议以后，马克思把他的讲稿加以整理，发表于比利时报纸，即1847年9月29日的《民主工场报》（布鲁塞尔）。但是，这个演说除了恩格斯在报告中引述的部分外，保存下来的只有第一部分的德文译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82—284页），这一部分是由约瑟夫·魏德迈于1848年初以《卡尔·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问题的两篇演说》为题发表的（1848年哈姆版），魏德迈先把演说从法文译成德文，然后加上了前言和注释。至于手稿，马克思可能在1847年9月底或10月初寄给了《威斯特伐利亚汽船》的出版人奥托·吕宁（参看文件167）。在1848年1月9日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公众大会上，马克思宣读了他的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经过扩充后的演说稿（参看文件194）。根据这次大会的决议，马克思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44—459页）出版了小册子《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1848年1月9日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公众大会上发表》。——401。

- 109 《无产阶级革命的后果》一文（本书只刊印了引言部分），是在1847年10月14日至11月11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82、87、89和90号上连载的一组文章；再版于《莫泽斯·赫斯〈哲学和社会主义文集（1837—1850年）〉》第425—444页。赫斯的这篇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尽管有些歪曲）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前进行的关于同盟纲领草案的讨论情况；除了1847年9月14日的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文件160）中的一些说明外，这篇文章是保留下来的能够证明布鲁塞尔区部所属各支部的讨论的唯一证据。赫斯在其论述中一些地方没有遵守自己许下的“扼要概述这些讨论”的诺言，而是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因此，他的这组文章前后矛盾百出：一方面，他引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重要思想，并且以布鲁塞尔工人协会和布鲁塞尔各同盟支部在马克思领导下进行的讨论为依据，但是另一

方面，他采取折衷的办法掺进了他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观点，同时首先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工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所起作用的思想庸俗化并加以歪曲；参看恩格斯在信中对重印这组文章的评论（文件171和177）。——404。

- 110 1847年10月10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81号上刊登了一幅图画，（另见一本旅行手册中按原件复制的一页插图，插图下面有这样的说明：“因请求施舍而挨了十棍子惩罚的业主，今天继续穿过美因兹和兰道。1847年8月11日作于哈瑙。”）这幅图画是《德国的伤口》一文的插图，它描绘的是“一名穷苦的手工业学徒”，该文比较真实地描绘了图画中所勾勒的情景。——409。

- 111 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是《共产党宣言》的一项重要准备工作，是同盟纲领讨论过程中的一个草案。产生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之间。《原理》的基础就是第一次代表大会起草的、1847年6月中旬发表的信条草案（文件147），而恩格斯对信条的起草曾起了决定性作用。当恩格斯于1847年10月15日左右从布鲁塞尔到达巴黎时，巴黎的讨论早已展开，讨论的基础是经莫泽斯·赫斯修改后的草案。10月22日的区部委员会会议决定撤销赫斯的草案，并委托恩格斯在10月29日以前起草一个新的信条（参看文件171）。巴黎的讨论一直继续到11月27日恩格斯离开巴黎为止（参看文件177）。

现在保存下来的恩格斯所拟草案的文本，从时间上来说可能是写得比较早的一个稿本；它可以说是一个残稿，因为其中没有第九、二十二和二十三个问题的答案。但是，只要把它同伦敦代表大会的草案作一比较，残缺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得到弥补。在第九个问题（它同伦敦草案中第十二个问题是吻合的）下面，恩格斯留出了写答案的空白。与此相反，在另外两个问题下面，恩格斯注明“见”伦敦草案，但也可能是“见”一个后来又经过加工的文本。只要同伦敦代表大会的草案作一比较，就可以看出，恩格斯在撰写一些问题时比较尊重伦敦代表大会的草案，在有的段落中，几乎逐字逐句地引用了该草案；这一点在第二、三、四、七、八和十六个问题的答案（在伦敦草案中是第七至十一和十四个问题的答案）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另一些答案中，恩格斯作了彻底加工，而在他的《原理》中基本上都用详尽的答

案对一系列问题作了全新的阐述。在撰写《原理》时，恩格斯纯粹是表面上采用了当时流行的信条（教义问答）形式。但在大多数答案案中，恩格斯作了叙述性的阐明，从而突破了以简短的回答为特征的教义问答的框框。在后来起草纲领草案的时候，恩格斯认为，教义问答的形式是不适用的，最好把纲领改称《共产党宣言》（参看文件177）。

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后来又作了许多增补和删改（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2年柏林国际版旧版第1部分第6卷第501—522页），本书在印行时参考了这些增补和删改，并在脚注中作了说明，因为它们的内容上具有比较重大的意义。——411。

- 112 卡尔·格律恩把蒲鲁东的书（还没有出版）从长条校样翻译成德文：约·皮·蒲鲁东（《国民经济学的哲学或贫困的必要性》，卡尔·格律恩译，1847年达姆施塔特版，两卷本）。他竭力在德国搜罗更多的蒲鲁东追随者，使他们同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相对立。格律恩除了在《特利尔日报》上发表的那些文章外，还在1847年10月8—30日《科伦日报》第281、285、290、293、294、300、301和303号上连载了一篇关于蒲鲁东的书的长文，公然诽谤共产主义者。在这一方面，他同阿尔诺德·卢格站在一条战线上，后者在《关于共产主义的三封信》中详尽地评价了蒲鲁东的书，并明确主张批判共产主义者。

哥特沙克的这封信表明，科伦的共产主义者曾为在报纸上反对格律恩作出了努力。例如，他们成功地在1847年11月1日的《杜塞尔多夫日报》第303号上刊登了下面这篇论战性文章：

“◎科伦，10月30日。《科伦日报》现已载完蒲鲁东的大部头著作《贫困的哲学》的摘要。干了这件费力不讨好的蠢事的那个人，即向德国人特别是《科伦日报》的读者公布这个经济学的神秘主义者的废话的那个人，从他对自己的暗示，对他的‘朋友蒲鲁东’的暗示，以及对他未来的《现代经济学史》的暗示来看，这个人不可能是别人，只能是该书的译者卡尔·格律恩先生。卡尔·格律恩先生完全表明，他以前曾作过不少努力，试图向‘德意志祖国’介绍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甚至要给已故的歌德冠以共产主义圣人的美名，而对他的同乡卡尔·马克思的著作，即他在布鲁塞尔用法文出版的旨在驳斥和否定蒲

鲁东那套胡说八道的著作却只字不提。但是，格律恩先生根本就不知道有这样一本书吗？否；他在发表于同一家《科伦日报》上的共产主义小说中曾提到了这部书；不错，他给他的小说起了一个滑稽可笑的题目《格律恩先生的贫困》；他想必要使自己重振家业，也就是说，在未来，卡·格律恩先生也将在《科伦日报》的编辑部天堂里引人瞩目。”——133。

- 113 建立“以各国人民的团结和友谊为目的的民主协会”的倡议是在184年9月27日举行的公开宴会上提出的（参看文件171），会上选出了一个临时委员会。建立工作本身是在两次全体会议上完成的，这两次会议的记录见路易·若特兰《沙尔·路易·斯皮特霍恩传》1872年布鲁塞尔版第40—46页和L.贝尔特朗《1830年以前的比利时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史》1906年布鲁塞尔—巴黎版第258—263页。

马克思和其他许多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在其中起了重大作用的民主协会，很快便发展成了革命力量的重要中心。它同民主派兄弟协会的联系非常紧密，并准备同它一起召集一次国际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参看文件186）。

在11月7日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主要讨论了章程草案，草案开头几条是：

“第1条 一个名叫‘以各国人民的团结和友谊为目的的民主协会’的组织，是由下列各署名者以及由希望不考虑国别、职业和等级而加入协会，并根据下面规定的程序被准许入会的那些人建立的。

“第2条 本协会的一切活动都将是公开的，并且将限制在比利时宪法许可的范围内。本协会将通过报刊和通过公开举行定期或不定期的集会从事活动；它将提出、讨论并决定达到其目的的各项适当措施；它将通过宣言、公开信和请愿书以及通过联合比利时或其他国家现有的类似协会进行活动。”

关于草案讨论的情况，记录是这样写的：

“特德斯科先生就协会的原则和目标发表了一些总的看法，最后要求删去“协会的活动将限制在比利时宪法许可的范围内”这句话。

“主席先生请他考虑：这种讨论是不可能得到许可的，此外也不

属于议事日程之列。

“布赖埃尔先生试图驳回特德斯科先生的意见。他认为，这个协会并不是行动的协会。因此它可以把自己限制在一个保障绝对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的宪法范围内。但他希望将第1条阐述得更为准确。

“海尔贝格先生认为民主这个词已经够准确了。”

最后，大家一致同意费德尔提出的补充意见，按照他的意见，章程有效期暂定为三个月，然后再作最后的检验。根据记录，在章程草案上签名的有：梅利奈将军、律·若特兰（律师）、安贝尔、斯皮特霍恩（律师）、弗·克吕格尔（著作家）、迈因茨（律师）、冯·伯恩施太德（德文报纸编辑）、海尔贝格（教授）、雅科布·卡茨、威·沃尔弗（著作家）、斯·波尔恩、卡尔·马克思（著作家）、康·扎累夫斯基、让·佩列林、列列韦尔、路德维克·卢布林纳、格·维尔特、特德斯科（律师）、布赖埃尔（医生）、维克多·费德尔（律师）、莫·赫斯、安东·卡茨、保尔·德托马、菲利浦·日果、卡·格福格勒、阿德里安·万·贝维尔福德、斐·沃尔弗、施洛特曼、巴利约、奥内曼斯、阿尔伯·皮卡尔、J.梅斯肯斯。”——434。

114 “阿格奈桑人民协会”是比利时工人在布鲁塞尔建立的一个组织。在1844年作为传单散发的《致社会各阶级的公开信》中提出的贡成大会讨论的本组织的要求如下：普选权、累进税、对儿童实行公费教育（其中包括社会义务和权利、学会一种职业）、组织劳动、废除死刑。该约会的主席是钳工梅斯肯斯，他同时也是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参看注113）。——434。

115 民主派兄弟协会自1845年秋天成立（参看文件70）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它非常重视同宪章派保持紧密联系，试图避免表面上不发生组织对抗的现象，首先它不制定章程，而且也不建立领导委员会。1846年3月，它明确声明，它不是政党，也不是联合会，只通过一些非常一般的有关组织问题的规定（参看文件79）。它在1846年9月21日通过的信（文件130）中也表现了同样的立场。民主派兄弟协会决定通过一个自己的章程，首先说明它独立自主的作用正在日益增长，这一点首先表现在它准备召集一次国际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上。民主派兄弟协会于1848年1月3日会议（见文件193）上的

讨论最能说明它同宪章派的关系。在1847年12月13日会议上通过的章程，一开头就是一项原则声明，而这项声明除了细小差别外，可以说是1846年9月通过的那封信的翻版。原则和前6条（一共11条）是这样写的：

“本协会由英国、法国、德国、斯堪的那维亚、波兰、意大利、瑞士、匈牙利和其他国家的公民组成，它的

宗旨

“协会会员相互进行宣传教育，宣传协会的口号中所体现的崇高原则：

“‘人人皆兄弟’。

“本协会会员决定通过下列

原则声明

“根据上述人类博爱的声明，我们要抵制和谴责一切传统的政治上不平等和‘社会等级’差别，因此，我们把国王、贵族以及根据其占有的财产而垄断政治特权的各个阶级统统称之为人类博爱原则的破坏者和践踏者。由全体人民选举产生并对人民负责的政府是我们的政治信条。

“我们声明，土地及其自然产品是所有人的共同财产；因此，我们谴责一切破坏这条显然公正而自然的法则的行为，把它们看成是掠夺和违法的行为。我们声明，当前的社会制度本质上是不公平的，因为它允许游手好闲者和阴谋家独占土地产品和工业产品，迫使工人阶级为低廉的工资而劳动，甚至使他们注定成为社会奴隶，注定忍受贫困和屈辱。我们的社会信条是，劳动和工资应该对等。

“我们谴责那种‘民族’仇恨，它至今还在分裂人类是愚蠢的可耻的，它之所以愚蠢，是因为任何人也无法决定自己生在哪个国家；它之所以可耻，是因为就像争端和流血的战争业已证明的那样，这种民族虚荣心的后果竟造成了土地荒芜。此外，我们深信，各国人民的压迫者利用了各个时代的民族成见，使各国人民互相厮杀，而他们本应为了共同幸福而相互合作的；不管谁使用，也不管针对谁使用‘外国人’这个词，社会都应众口一词加以谴责。我们的道德信条是，不分‘国别’，把我们的同胞一律看成是一个家庭的成员，即人类的成员，看

成是我们的大集体即世界的公民。最后，我们承认伟大的道德法则是：‘你怎样对待你的兄弟，你的兄弟也就怎样对待你’，我们认为这是公众幸福和私人幸福的伟大保证。

章程

“第1条 各国民主主义者，不管他们住在哪里，都可以成为本协会会员。

“第2条 准备吸收入会的人必须由两名会员在一次例会上予以介绍，而介绍人应对被介绍人的民主原则和道德本质负责。被介绍人被接收入会与否，由到会会员的多数票决定

“第3条 为了筹集邮资、印刷费和其他必要开支，每个会员每年应至少缴纳1先令的会费。会费在每年9月22日缴纳（每个会员可以用任何其他方式支付）。会费可以分期付款。

“第4条 在本协会有代表的每个国家应各出一名总书记，他们的名字应列在会员证上和由本协会发出的所有公开文件上。从总书记中再选出一名或若干名通讯书记。

“第5条 任命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总书记和在本协会有代表的各个国家增加的一名成员组成，其任务是准备并掌管本协会的一般性事务和财务。

“第6条 任命一名司库和负责财务的书记。[……]”——441。

- 116 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也已就瑞士宗得崩德战争的问题向瑞士联邦议会发出了告瑞士人民书(文件178)。民主派兄弟协会的告瑞士人民书(载于威纳尔·奈夫《德国革命中的瑞士》1929年莱比锡版第178—184页)也为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所接受，在上面签名的有：“主席 亨利希·鲍威尔、副主席 古斯塔夫·比伯尔、司库 提·约·皮茨、图书管理员 阿舍尔曼、书记 格奥尔格·埃卡留斯。”此外，工人教育协会本身于12月21日也发了一封信(文件189)。——442。
- 117 这次代表大会的召集最后成了马克思于1847年11月底同民主派兄弟协会领导人进行讨论的课题(参看文件185)。1848年1月1日《北极星报》第532号上的一篇关于民主运动在英国和大陆上的进展情况的报道中有这样一段话：“有人提议，明年9月在比利时革命纪念日在

布鲁塞尔举行上述代表大会，到那时，联合的计划制定者，即自由贸易派也要在同一城市召开他们的代表大会。这个建议目前在法国、德国和瑞士引起了深入的讨论；而在这个国家的伦敦代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已获得一致通过（有两名宪章派执行委员会委员参加了这次会议），此后又相继得到了伦敦一些地方组织的认可。将来我们还要回头来讨论这个重大问题，现在我们把这个问题推荐给英国整个宪章派组织冷静考虑。”

关于12月13日的报道中提到的派往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代表团一事，1847年12月18日《北极星报》第530号上的一则关于工人教育协会12月14日的一次集会的报道说：“一般的日程确定以后，卡尔·沙佩尔、贝尔纳、约翰·阿诺特、赛米尔·布恩翰和约瑟夫·莫尔被推荐组成民主派兄弟协会代表团，要求参与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代表团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他们的建议得到了一致的赞同。”——442。

- 118 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早已同意民主派兄弟协会的信（参看注116）。关于工人教育协会的信的起草和传播情况，雅科布·沙贝利茨在日记中是这样写的：“21日（星期二）沙佩尔和我起草了给瑞士议会关于捐款（100法郎）的附信。关于上述的信，我们一共印了数百份，其中许多是以每份1便士出售的。”（巴塞尔大学图书馆，沙贝利茨遗著1。）——445。
- 119 这份名单是当时担任协会秘书的威廉·沃尔弗写的，在1847年3月1日抄家时，在他的房间里，即在布舍大街14号鞋匠阿德里安·瓦格曼家被没收的。括号里的名字在原件上就删去了，有些名字后面的破折号和其他符号以及个别说明都表明，这可能是沃尔弗写的原始本。这份名单可能是不完整的。至于开具这份名单的日期，可能是在1848年1月初至2月中旬；阿道夫·云格1848年1月1日已经离开比利时（参看文件190），所以名单上没有他的名字。——451。
- 120 指1848年《威斯特伐利亚汽船》1月号，上面发表了斐迪南·沃尔弗的文章《马克思反对蒲鲁东》的第一部分，该文是评论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的。关于《威斯特伐利亚汽船》的邮寄，安得列阿斯·哥特沙克在1848年1月26日从科伦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这里有18本

《威斯特伐利亚汽船》，一有机会就给您寄去。”（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 1, op. 5, Nr. 158）——457。

- 121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委托起草同盟的纲领，但从这个文件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显然是对执行中央委员会的委托负责的。

1月24日的决议原件没有保存下来。中央委员会把该决议附在1月25日的信中寄给了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在布鲁塞尔是菲力浦·日果收阅的。由于马克思当时不在布鲁塞尔，日果就写了一封信连同这封伦敦来信的副本于1848年1月28日一并寄给了马克思；信中说：“星期五早晨。亲爱的马克思，昨天晚上我收到了一封写给我的信，并且邮资已付，看来是塞·裁勒尔（？）写来的。发信地点的邮戳简直模糊不清，难以辨认，我看是从科伦寄出的。还有一件公文，也是昨天收到的，我想逐字逐句转抄给你。你的忠实的菲力浦。”（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 20, op. 1, Nr. 15）——458。

- 122 中央委员会于1847年8月派遣一名特使（可能是裁缝帮工约翰·巴尔塔扎尔·多尔）前往阿姆斯特丹，委托他把那里的同盟盟员组成一个支部（见文件160）以后，它于10月份就报告说，那里已经建立一个支部，有八名成员，并计划建立一个区部，其中可能也包括鹿特丹支部（参看文件169）。1847年2月14日，工人教育协会（“工人阶级道德教育协会”）的建立也是以同盟盟员为基础的。该协会领导人开始是多尔，他回伦敦后，领导人则是旋工和木材商克里斯蒂安·戈德克，他们两人都是盟员。阿姆斯特丹支部的其他成员是，这封信的两位签名者，即许布勒尔和裁缝帮工卡尔·汉克，可能还有裁缝帮工布吕格曼和W. 罗斯以及木工哥特利布·马丁。这些人在工人教育协会中表现很积极，协会的口号（1847年3月8日的章程中明确地写明）是：“人人皆兄弟”。1848年三月革命的头几天，该协会就收到了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寄去的100本《共产党宣言》（参看汉斯·施泰因《阿姆斯特丹工人教育协会（1847年）和西欧现代社会运动的先驱》，载于1937《国际社会史评论》（莱登）第2卷第105—170页）。

《科伦日报》驻阿姆斯特丹通讯员出于对工人教育协会的活动的

美心，于1848年3月12日写道：“就在我们这个世界贸易的中心，豪富和赤贫之间的对立竟明显得惊人，但在工人阶级内部已成立了一个共产主义者协会，这一点我可以绝对肯定地向您担保。这个协会在它出版的一个小册子中极其明确地鼓吹反对私有制。据说该协会已拥有1000多名成员。但愿事先通过合理措施，通过社会改革，通过提高工资等能够抵制这种危险的煽动。”（1848年3月14日《科伦日报》第74号）上述小册子是指戈德克的著作《道德教育协会及其口号；人人皆兄弟。工人的内部状况简述》，教育协会编，1847年〔阿姆斯特丹〕版第1部分。

二月革命和柏林街垒战以后，阿姆斯特丹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在3月14日召集了一次大规模的民众大会，但结果遭到强大的警察镇压。3月31日荷兰政府下令大搜捕，并对16名被告进行审判，其中戈德克、汉克和马丁被判处死刑，但是，他们相继于1848年6月6—20日被宣告无罪。

本书刊印的这封信，因中央委员会此时已从伦敦迁往布鲁塞尔，接着又从布鲁塞尔迁到了巴黎，而几经转寄（参看文件208）。该信执笔是两位签名者之一许布勒尔。这封信存在一些正字法方面的错误，凡是行文明确的地方，本书作了订正，但未作说明。至于某些不准确的甚至意思也不明确的句子结构，本书未作改动。——477。

- 123 《人民的要求》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各支部（其成员有：弗里德希·安内克、贝多尔夫、亨利希·毕尔格尔斯、罗兰特·丹尼尔斯、卡尔·德斯特尔、安得列阿斯·哥特沙克、约翰·严森、奥古斯特·维利希等人）作为革命民主主义的纲领在它们1848年3月3日组织的民众大会上散发的。此后不久，又据此写出了内容更广泛的第二稿（文件213）。法国二月革命胜利的最初消息传到德国以后，在莱茵省，首先在科伦也爆发了广泛的人民运动。2月28日和3月1日，在科伦就先后举行了两次由维利希主持的秘密工人集会。科伦支部委员会3月3日的特别会议本是讨论致柏林政府当局的一份自由主义的呈文的，科伦共产主义者便乘机提出了自己的革命民主主义要求。德斯特尔所作的记录（约瑟夫·汉森《关于政治运动史的莱茵来信和文件（1830—1850年）》1912年波恩版第2卷第1分册第493—498页）表明，他作为支部委员会成员根据《人民的要求》提出了许多建议，但

都被拒绝了。还在支部委员会开会期间，几千人，主要是工人，集合在一起，在哥特沙克、维利希和安内克带领下来到市政厅。同时散发了作为传单的《人民的要求》。在宽敞的市政厅里，哥特沙克向示威群众发表了演说，并要求市长接受《人民的要求》。根据支部委员会的记录，当时还增添了第2条要求，即《与各国人民和平共处》。这次示威行动最后遭到了武力镇压，哥特沙克、维利希和安内克被捕，但于1848年3月21日被宣布无罪释放。维利希获释后没有留在科伦，而是到德国西南部去了，在那里他参加了巴登第一次起义；巴登起义失败后逃往法国，在伯桑松组织了一支流亡者军团（参看注167）。关于科伦事件，可能是到布鲁塞尔去的彼得·诺特莱克告诉恩格斯的（参看文件210）。——479。

- 124 报道中接下去是对费奈迪的一次演说所作的一些讽刺性评论。费奈迪在演说中提出了他自己的一个公开信草稿（报道中也引述了）。巴黎的一个德国流亡者组织团结在费奈迪的周围，他在评价德国对二月革命的态度时代表了民族主义观点。不久就成了预备议会成员的费奈迪，后来又成了五十人委员会成员；他主张在君主立宪制的范围内实行资产阶级改革，并强烈反对在德国建立共和国的一切计划。——482。
- 125 此外，琼斯还反对“德国的可怜的民族主义，反对一大批各自代表其特殊民族利益的小侯国和小王国……，但我告诉你们，在这次大会上，我既不承认普鲁士人，也不承认奥地利人，既不承认巴伐利亚人，也不承认士瓦本人；我把你们大家都看作是希望获得一个伟大德国的自由的一些德国人，都看作是一个德意志共和国的公民”。琼斯在发言结束时说：“我给你们带来了英国宪章派的问候，这是同样希望获得自由的300万人。德国的兄弟们！我呼吁你们来一个比赛，看谁先获得自由，是英国还是德国？”（1848年3月17日《德意志伦敦报》第155号）——482。
- 126 亨利希·伯恩施太因在讲话中还谈到了德国的革命工人参加巴黎二月革命的情况：“当德国穷人在圣安都昂郊区高高筑起无法攀越的街垒时，在罗亚尔宫附近的来势凶猛的枪林弹雨中，德国人视死如归，大声喊出人所共知的口号‘前进’时，当德国人站在法国人一边冲进已被占领的土伊勒利宫，一劳永逸地推翻王位时，冷酷无情的利己主义者

竟说什么，这些德国人为什么这样徒劳无益地为一个外国民族战斗？——鼠目寸光的蠢驴！德国工人在街垒上，德国战士在罗亚尔宫，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他们究竟在为谁而战——他们是在为自由而战，在为他们的自由，在为大家的自由，而不仅仅是在为法国的自由而战；不是的！他们也在为德国的自由，在为欧洲的自由而战。”（1848年3月17日《德意志伦敦报》第155号）——483。

127 指1848年3月3日在科伦散发的传单（文件207）的扩充稿本，对原来的六点要求作了详细论证。这个稿本可能是在3月3日事件以后，在哥特沙克、维利希和安内克被捕（参看注123）以后起草的。作者很可能是德斯特尔、丹尼尔斯和毕尔格尔斯。现在只有一个材料可以证明这个传单的散发日期，从而也能间接证明印刷日期：普鲁士行政专区长官从阿恩斯贝格给内务大臣艾希曼（科伦）的一封信表明，该传单是1848年3月13日在伊塞隆、多特蒙德和哈根通过市邮局寄送给许多公民的。伊塞隆市参议员和阿恩斯贝格行政区长官都估计，这个传单是在科伦印刷的（科布伦茨国家档案馆，Abt.403, Nr.2550）传单共两页。——486。

128 指卡尔·冯·不伦瑞克。他倒台后于1830年9月流亡，同由他暂时给以资助的民主主义流亡者建立了联系。40年代中期，他买下了《德意志伦敦报》，1846年9月至1848年5月，由雅科布·沙贝利茨任该报编辑。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成员同公爵（他在1848年3月初曾答应捐助一大笔款项）的谈判失败了（参看文件220和注139）。——489。

129 关于宪章派所领导的人民运动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参加人民运动的情况：弗里德里希·列斯纳写道：“巴黎的事件对英国工人阶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30年代中起就在英国无产阶级思想感情中起主导作用的宪章运动，由于二月革命的胜利而受到新的推动。这个革命刚一开，伦敦工人就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表示祝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参加了这次游行示威，尽力支援宪章运动。

“宪章派最有声望、最有才干的领袖厄内斯特·琼斯有时来到我们协会；我在那里有机会认识了这位勇敢的、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宣传家。琼斯个子不高，但长得很结实。他那端正、严肃、刚毅的面貌令人一望而知是一位坚决果断、无所畏惧的人民领袖。他精通德文，

是当时少数懂得社会主义并宣传社会主义的宪章派领袖之一。

“8月13日，在伦敦白厅广场召开了群众大会，琼斯在会上讲了话，他号召人民不要害怕可憎的资产阶级辩护士，不要害怕宪警、士兵以及那些供特别警察驱使的胆小如鼠的家伙。‘推翻内阁，解散议会，颁布宪章——我们决不让步！’”（弗里德里希·列斯纳《一八四八年前后》，载于1898年《德意志言论》（维也纳）第3期第110页；《人间的普罗米修斯》198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8—9页）。关于1848年4月10日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参看文件234。——190。

- 130 卡尔·普芬德在1848年3月17日的信（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20, Nr.120）中，向中央委员会详细报告了这次拜访的情况。他在信中写道：“昨天晚上10点钟，我们就到了彼得家，今天早晨我们离开他家时，正好敲响两点。也就是说，我们在那里穷泡了四个小时，没有谈及任何直接性事务。昨天我已经对你们说过，就只有我和沙贝利茨两个人，我迫切希望卡·莫尔也来，以便至少有一个证人。”

关于公爵的政治观点和他的委托人的活动，普芬德报告说：“安德劳直接去巴黎拜访一些政府要员，以便向他们提出一些问题。如：现政府是否庇护攻入德国；它是否派人，或者说它是否允许招募人攻入德国；法国的武器是否同英国一样便宜。我觉得这家伙是在献殷勤，想争取政府支持自己，带领一支军队（约6 000—10 000人，而我们就将属于这支军队）去德国，然后像上帝一样，以一个伟大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德国，以一个可敬小人的身分高踞要位，一下子就把共产主义建立起来。

“也就是说，彼得将一切荒诞不经的事情都理解为共产主义，凡是他不理解的东西他都称之为共产主义。”

普芬德最后报告说，公爵希望，“你们，特别是沙佩尔同安德劳建立联系。要沙佩尔把地址留给彼得那里的通讯员，因为安德劳一到那里就要去找通讯员。彼得将同安德劳继续谈判，如果你们认为可以信任他的话”。从公爵的笔记中可以看出，普芬德在这次谈判中可能要求500英镑（参看梯伯尔·德纳什《一个瑞士年轻人的学徒期和漫游期（1845—1848年）》。雅科布·鲁卡斯·沙贝利茨、卡尔第二·

冯·不伦瑞克公爵和《德意志伦敦报》》，载于1966年《瑞士历史杂志》（巴塞尔）第16年卷第1期第76页）。——491。

- 131 罗兰特·丹尼尔斯的这句话表明，马克思在1848年3月中旬就已经在巴黎说过要出版一家报纸。恩格斯刚到巴黎不久，约在3月21日，这个计划就开始付诸实施。3月26日，恩格斯在给伦敦的埃米尔·布兰克的信中写道：“我给母亲写信要钱，准备再过几天离开这里回德国去，我们打算在德国重新出版《莱茵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99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个打算同科伦的盟员毕尔格尔斯、丹尼尔斯和德斯特尔所作的准备是一致的（参看文件222）。马克思、恩格斯和沙佩尔在4月11日回到科伦时就利用了他们的这些准备工作。

4月初，莫泽斯·赫斯回到科伦以后也曾试图创办一家报纸。他离开布鲁塞尔前不久，从安得列阿斯·哥特沙克的一封信（文件223）中了解到，有人正在科伦筹备创办一家民主报纸。赫斯便同弗里德里希·安内克联名在报上“呼吁重新出版《莱茵报》”（1848年4月7日《科伦日报》第98号附刊；埃德蒙·济伯纳编《莫泽斯·赫斯通信集》1959年海牙版第181—183页）。

这一呼吁其实是一个模糊不清的、小资产阶级的、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实际任务不相适应的纲领。赫斯还写信要求一些共产主义者给以合作。他的计划实际上是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从给赫斯的一些回信（文件235、238和239）中可以看出，这个计划立即引起怀疑和抵制（参看注135），它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回到科伦以后完全成了泡影。关于《新莱茵报》的创办经过，主要参看文件261。——493。

- 132 在三月十八日革命事件以后试图在柏林建立一个独立的合法的工人组织这一过程中，同盟盟员奥古斯特·黑策尔、约翰·克里斯蒂安·吕霍夫和海尔曼·弥勒起了领导作用（关于他们在1845—1846年的活动，参看文件75）。工人俱乐部（“临时中央俱乐部”）于4月4日发出了一篇由恩格尔哈特、弗罗姆、吕霍夫、弥勒和塞夏埃列斯签署的呼吁书（发表在1848年4月5日《柏林阅览室》第81号上），召集柏林各工人组织在4月6日聚集一堂共同协商。4月7日召开的俱乐部会议是由当时从巴黎到达柏林的斯蒂凡·波尔恩主持的，根据报纸

上的一篇报道，当时他作了如下阐述：“现在，工人必须懂得什么是他们的权利，以便他们手里的革命果实不致被骗走。但是，要完全享受革命果实，不能靠**暴动**来实现，更确切地说，必须按照统一而确定的计划去行动。他听到了一些有关工人要毁坏机器的谣传，感到很遗憾；这类谣传就该受到诅咒，他知道得很清楚，这是反动派居心险恶的捏造，是资产阶级所采取的一种措施。但同时他严肃地警告工人要消除一切个人恩怨，必须期待在工人中间出现完全的统一，为此目的，要求从各个手工业部门中选举产生一个代表团的通告信已发往各地。”

（1848年4月8日《柏林阅览室》第84号附刊）

在4月11日的会议上，为柏林全体工人的共同组织选出了一个以波尔恩为首的二十八人委员会（参看1848年4月13日《柏林阅览室》第89号附刊），它作为“工人中央委员会”在柏林从事活动。在4月19日的代表会议上通过了章程，并组成了一个七人执行委员会，其成员是：波尔恩、比斯基、米夏埃利斯、沃宁格尔、里斯、瓦尔德克和吕霍夫。接着便开始了导致“工人兄弟会”创立的发展过程（参看文件269和288）。柏林中央委员会的建立是正在谋求组织联合的工人的一大成就，但是，同业工会的划分助长了本来就严重存在着的经济主义倾向，斯蒂凡·波尔恩就是这种倾向的代表人物（参看注141）。关于柏林工人运动的历史，参看库尔特·韦尔尼克《1848—1849年革命前、中、后柏林工人运动中的共产主义者和政治积极分子》，载于《德国工人运动史论丛》1968年第10年卷第2期第298—344页。——507。

- 133、从这封信的内容来看，首先是从提到伊茨施太因和黑克尔两个人这一点来看，所谈的是巴登的革命事件。巴登的革命事件是紧接着巴黎二月革命的最初消息于1848年2月27日传到曼海姆和奥芬堡开始的，3月1日在卡尔斯卢厄的巴登议会前举行了大规模集会以及在整个巴登爆发了农民骚动，使上述事件达到了第一个高潮。在这些日子里，首先在卡尔斯卢厄有一些人被捕，其中显然也有此信中提到的同盟盟员。由于在信中提到三个星期的监禁，所以该信很可能是在3月下半月写的。信中还提到，1848年春天，在巴登，很可能在曼海姆或卡尔斯卢厄有一个共产主义者同盟支部。可以认为，当时在曼海姆已有一

个对巴登来说是比较强大的工人阶级，它在1848年三月革命中和1849年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中先后组成了“曼海姆农民军”和“曼海姆工人营”。——509。

134 伦敦也以同样的方式组织了同盟盟员返回德国的工作。关于德国共产主义者离开伦敦的情况，一个普鲁士奸细报告说：“大约一个月以来，种种迹象表明，德国新的政治和社会运动正在促使这个协会〔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开始把自己的作用直接扩展到德国，该协会从众多的会员中挑选出最能干、最积极地捍卫自己原则的会员派往德国，以便设法在那里实现这些原则。为了在到达德国时不致引起当局的注意，这些使者通常都是单独行动的。从4月20日以来，已有一大批人离开伦敦，而且还有许多人将陆续离开（梅泽堡德国中央档案馆，Rep.77, Tit.509, Nr.43, Bd.1）。——510。

135 从亨利希·楚劳夫1848年4月4日给莫泽斯·赫斯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他起初曾同意与科伦共产主义者采取共同行动。他在信中写道：“但是，他们要在科伦立即恢复出版《莱茵报》，除了老订户外无疑会增加一些新订户，这件事我还是会像往常一样表示赞同。黑克尔收到了恩格斯从巴黎的来信，说他和马克思今天到达爱北斐特，我也想同他们谈谈。”（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173, Nr.2686）4月4日至10日之间，楚劳夫才了解到，这是两个不同的计划（参看注131）。——512。

136 科伦工人联合会在组织方面初步作了各种尝试以后，终于在1848年4月13日宣告成立。参加组建工作的同盟盟员有：弗里德里希·安内克、贝多尔夫、安得列阿斯·哥特沙克、莫泽斯·赫斯、约翰·严森和彼得·诺特荣克。科伦工人联合会成立时，美因兹工人教育协会的告工人书（文件233）已于4月5日发表。威廉·沃尔弗于4月6—7日把已印成传单的告工人书带到科伦，并以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身分同安内克和哥特沙克进行了磋商（参看文件240）。科伦工人联合会的这个答复是由其中一名书记黑克尔起草的，并在4月14日第一次委员会会议上根据哥特沙克的提议获得通过。这个文件的一些措词表明，哥特沙克曾参与了它的起草工作，同时表明了他的一些模糊不清的概念。

哥特沙克在工人联合会中奉行了一条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路线背

造而喊的口号，他反对空谈的纲领。从科伦中央委员会成立以后导致了激烈的争论（参看文件253）。哥特沙克同赫斯是莫逆之交，并且深受“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影响，他以表面上激进的高谈阔论反对工人参加选举，同时在许多实际政策问题上都把自己的宗派策略同极端机会主义态度紧紧结合在一起。在建立共和国还是君主国的问题上，哥特沙克的态度也动摇不定（参看文件223）。当威廉·李卜克内西1889年10月26日写信给恩格斯，打听哥特沙克在1848年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并询问哥特沙克何时说过“我在这里代表20 000名无产者说，我们不管建立共和国还是君主国，对我们来说是无所谓”这句话时，恩格斯详尽地描绘了哥特沙克其人。他在1889年10月29日给李卜克内西的回信中写道：

“关于先知者哥特沙克，我能告诉你的很少，这个人我早就忘记了。莫泽斯·赫斯在1848年以前接收他加入同盟，并把他说成是一位杰出的、非凡的人物。1848年3月初，他在科伦把自己装扮成一位工人领袖。在当时的条件下，他是一位出色的宣传家，他奉承那些刚刚觉醒的群众，纵容他们的种种传统偏见。此外，正如一个先知者所应具备的那样，他是一个头脑十分空虚的人，因此他以先知者自居。同时他作为一个真正的先知者是从不犹豫的，因为什么卑鄙的事情他都做得出来。他是否讲过你引的那些话，我表示怀疑。他曾经系统地编造过关于自己的一些神话。只要说一点就够了，8月初他在科伦曾经起过某种作用，曾制定一些令人完全难以置信的计划，计划的细节我记不得了，但是根据那些计划，一夜之间就应当出现奇迹。这都是在我们之前发生的事。当我们4月间来到科伦时，他的声誉已经急转直下，当我们大家为确定出版一份报纸而又聚集在那里时，他已经几乎被遗忘了。报纸和我们的工人联合会使他面临一种抉择，或者是跟我们走，或者是反对我们。算他幸运，7月初，他和安内克都被捕了，大概是由于发表了某些演说。1848年底或1849年初，他们被宣告无罪（我在《新莱茵报》上寻找了一阵日期等等，毫无结果，为了赶上把信寄出，我不得不停止寻找）。后来先知者哥特沙克自愿流亡到巴黎，希望通过强大的示威把他召回，但是谁也没有动静。在我们离开之后，哥特沙克回到科伦（也可能是在我们离开之前不久），由于他

过去为贫民治病出了名，当霍乱突然流行时，他便热心地重新为无产者病人治疗，结果自己得了霍乱而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292页）

如本卷刊印的科伦工人联合会的许多文件所证明的那样，该联合会在其发展过程中克服了哥特沙克及其追随者的影响，并在它的各任主席约瑟夫·莫尔（从1848年7月初起）、卡尔·马克思（从1848年10月中起）和卡尔·沙佩尔（从1849年2月底起）的领导下，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群众性组织。参看格尔哈德·贝克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科伦（1848—1849年）。关于科伦工人联合会的历史》1963年柏林版；另见康捷尔的有关评论，载于1964年《近代和现代史》（莫斯科）第8年卷第2期第149—152页。——515。

- 137 马克思、恩格斯、约瑟夫·莫尔、卡尔·沙佩尔和恩斯特·德朗克到达科伦以后，约于1848年4月15日在那里成立了同盟中央委员会，从而结束了美因兹支部短暂的临时职能。后来凡寄往美因兹给中央委员会的信（参看文件241）都寄到了科伦（参看文件242和243）。科伦中央委员会派恩格斯为特使前往巴门和爱北斐特，派沙佩尔前往美因兹和维斯巴登，派德朗克前往科布伦茨、美因兹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参看文件247、248、249、251和252）。——521。
- 138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贝格曼是从瑞士或从法国经瑞士到达巴伐利亚的。格贝尔特1848年12月21日给恩格斯的信（文件327）表明，革命爆发后，在瑞士的同盟盟员大都打算参加返回德国的志愿部队。因此，贝格曼在临行前以及他后来提到的1848年3月19日和31日两封信（可惜没有保存下来）都受到这方面的影响。——526。
- 139 1848年4月23日，应海德堡印刷工人联合会4月16日的邀请（告德国全体印刷工人书）。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卡尔斯卢厄、达姆施塔特、维斯巴登、美因兹和曼海姆的印刷工人代表，在海德堡举行了一次代表会议。这份邀请信是排字工人格奥尔格·亨克尔起草并签署的，他可能是在瑞士漫游的时候接触到了那里的正义者同盟。海德堡代表会议决定，促使德国各城市的印刷工人建立起委员会，以便在预定于1848年6月11—14日在美因兹举行的代表大会上把它们联合成一个全国性的组织。美因兹代表大会是以“全国印刷工人代表会议”的名义

举行的，与会代表共11人，分别代表99个城市大约10 000名印刷工人。瓦劳也是代表之一；美国河畔法兰克福的代表名叫格奥尔格·洛伦茨·勒夫，原是法兰克福流亡者同盟盟员，并秘密印刷过该同盟的材料。在美国兹代表大会上成立了德国印刷工人联合会，这是德国第一个规模巨大的工会团体。参看《德国印刷工人联合会。德国工会工作50年，附前史》1916年柏林版第1卷第199—202、209—222页。——533。

- 140 波尔恩在回忆录中写道，在计划好要驱逐他的时候，政治俱乐部在柏林警察厅长面前成功地为他说了好话。“冯·米努托利先生装作对此事一无所知，他甚至说我是对柏林居民非常有利的人，何况那时正缺少能对失业工人产生有利影响的人，不言而喻，驱逐我的措施不久就会取消。……我一点也没有把警察当局的反动企图将要造成的后果放在心上。”（斯蒂凡·波尔恩《一个四八年战士的回忆》第133页）——547。

- 141 波尔恩在1848年4月21日给赫斯的信中已经说过类似的话：“现在，我在相当程度上已占据了这里工人运动的领导地位。再过几天，我就将完成建立工人组织的准备工作。〔……〕资产阶级也像工人一样团结统一，几年以后，他们将作为各自巩固的群体而相互对立。我的计划得到了这里的尚未觉悟的市民阶级的同情，因此，我定能成功。”（《莫泽斯·赫斯通信集》第192—193页）

斯蒂凡·波尔恩到柏林以后，在柏林工人运动（当时运动中存在着一种对组织联合的强烈的自发的追求）中很快就起到了领导作用（参看注132）。但是，波尔恩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显然不能胜任他的任务，他的态度不久便引起了其他盟员的怀疑（参看文件240和249）。他遵循一条同《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的观点格格不入的机会主义政治路线。波尔恩不是把刻不容缓的政治任务提到首位，而是迎合那种不可避免地要在落后工人阶级中出现的仅仅局限于纯粹经济方面的要求，从而对企图在现存资产阶级关系下废除资本主义剥削的那种幻想的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1848年4月的一篇通讯中，波尔恩说：“我们非常清楚，如果盲目地试图进行一次新的革命，那么，我们面临的危险将是丧失我们刚刚才得到的一切，并使德国陷入一种无政府状态，而在无政府状态下，我们知道谁可能取得政权。在这方

面，我们的利益同资本家的利益发生了冲突，我们双方都要和平，我们必须达到和平。”（1848年4月23日《柏林阅览室》第97号附刊）

波尔恩在论述中，经常把自己那基本上是机会主义的观点同从《共产党宣言》中摘出的思想混淆在一起（参看文件259）。——518。

- 142 1848年5月17日哈瑙工人联合会的信是这样说的：“我们在公开的报纸上非常欣喜地获悉了你们获得的成就，因此，我们责成我们的代表瓦格纳同你们建立通讯联系。他今天向我们作了汇报，从而使我们欣喜地了解了你们卓有成效的活动，特别是看到你们在联合工人时独具匠心地选择了一条切合实际的方针，奉行了一条必将使越来越多的人参加联合的路线，而这一点正是问题的关键。你们有了这条方针，加之身处地广人多的科伦城，就有可能比我们（身处地窄人稀的小工厂城市的我们）采取更强硬的态度来对付雇主。朋友们，兄弟们，由于这一点，加之莱茵人天生具有的时政治的兴趣和激情，你们有义务树立榜样，向别人证明，你们是捍卫迄今为止一直受压迫的第四等级利益的先锋战士，并向整个工人阶级阐明，你们的认识是切合实际的，是普遍的要求。你们将拥有越来越有力的物质手段和精神力量。[……]”

“为了达到这种联合，我们将不时向你们通报有关我们的讨论和决议，同时请你们也这么做，暂时请按时给我们邮寄两份你们的《工人报》，不管是通过邮局还是书店邮寄，只要邮费便宜即可。让我们警惕，避免争吵和分裂，让我们在你们业已光荣地开始的为美好事业的斗争中永不松懈，我们的口号是：‘自由、博爱、劳动和工资’。”

（1848年5月28日《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刊》第6号）——552。

- 143 斯蒂凡·波尔恩在发表于《人民报》试刊号上的这篇文章中，竭力以《共产党宣言》的思想为根据，同时却拒不根据《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文件224）来阐述实际的政治要求；他的机会主义观点（参看注141）在该文中表露得尚不明显。

《人民报》于1848年6月1日开始出版，每周出版三次，是柏林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工人兄弟会（参看注156）成立以后更名为《博爱报》，由波尔恩在莱比锡出版。——554。

- 144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成员和一批同盟盟员于1848年4月初离开

巴黎（参看文件231）以后，这个在人员数量上有所减少的组织重新由海尔曼·艾韦贝克领导（参看文件258）。但是，巴黎组织从其组成来看，政治上也不很强大，并且受了小资产阶级观点的影响，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没有再在同盟内部起任何重要作用。莫泽斯·赫斯在他的办报计划（参看注131）失败以后回到巴黎，并很快对巴黎同盟组织产生了影响，于是他就大搞政治阴谋，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艾韦贝克本人也一度受了他的影响（参看文件308）。

——559。

- 145 第一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于1848年6月14—16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这次大会是由拜尔霍费尔领导的马尔堡民主协会起倡议召开的，该协会早在1848年5月30日的邀请书中就提出要上法兰克福召开一次大会，并明确邀请各工人联合会参加。与此同时，马尔堡工人联合会（拜尔霍费尔也是该联合会的领导人）也邀请各工人联合会参加同时在法兰克福举行的讨论会（参看1848年6月7日《新莱茵报》第7号副刊）。因此，参加法兰克福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共有代表234名）的代表中，有一部分是工人联合会的代表。代表中也有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如弗里德里希·安内克、亨利希·毕尔格尔斯、阿道夫·克罗斯、奥斯渥特·狄茨、恩斯特·德朗克、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热尔曼·梅特涅、约瑟夫·莫尔、卡尔·沙佩尔、奥古斯特·谢特奈尔、约瑟夫·魏德迈等人；安得列阿斯·哥特沙克是科伦工人联合会派去的代表。然而，无产阶级运动的代表未能控制大会的讨论进程，因为大会的领导权掌握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左翼的手里。

代表大会在其决议中，要求建立民主共和国，并为即将建立的民主党选出了一个最高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所在地设在柏林，但这个委员会并没有实行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政策，而且表现得也不够积极。中央委员会由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尤利乌斯·弗吕贝尔、维尔腾堡的哥·劳和海尔曼·克利盖组成，在柏林还增补了阿道夫·赫克萨默和爱德华·梅因；候补中央委员有：拜尔霍费尔、许特、安内克。中央委员会在柏林最终成立以前，有一个委员会，也叫临时中央委员会，在法兰克福存在了数周之久，其委员有齐茨、拜尔霍费尔、隆格、梅特涅和莫尔。该委员会6月20日还向各民主协会发了一份呼吁

书（参看1848年6月25日《新莱茵报》第25号）。这届中央委员会的职权一直行使到1848年10月召开第二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为止（参看注159）。

《新莱茵报》、《柏林阅览室》和《曼海姆晚报》被指定为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1848年7月10日，柏林中央委员会公布了一个组织计划（刊登于1848年7月15日《新莱茵报》第45号），指定科伦为莱茵省的“区域领导机关所在地”。在马克思的领导下，按照这个计划，在科伦成立了莱茵各省民主团体区域委员会（参看文件279和283）。——560。

- 146 作者在起草这份邀请书时，曾设想召集一次同国民议会并存的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工人议会”；当时，这一类要求十分普遍，但都证明是无法实现的。

召开柏林工人代表大会的建议，是由斯蒂凡·波尔恩领导的柏林工人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参看注132）。柏林工人中央委员会同汉堡的工人组织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而共产主义者同盟对汉堡的工人组织的影响是很大的。1848年5月20日，弗里德里希·马尔滕斯作为汉堡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到达柏林，并参加了当天举行的手工业者代表会议。会议决定在柏林召集一次手工业者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于1848年6月18和19日举行，与会代表共35人，主要代表萨克森和普鲁士东部地区的95个联合会（参看1848年6月22日《新莱茵报》第22号）。大会没有取得太大的成果，只决定在柏林召开一次普通的工人代表大会。6月22日发出了这份参加大会的邀请书，会上成立了“工人兄弟会”（参看注156）。

6月22日的这份邀请书表明，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同波尔恩、克吕格尔和毕林一起都为这次组织活动作出了努力，并起了领导作用。邀请书中没有提出任何政治上的要求，但是，明显地反映了波尔恩的经济观点（参看注141）。1848年7月1日《新莱茵报》第31号，根据《柏林阅览室》上的原文，摘要刊登了这份邀请书的主要片断。然而此后不久，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一篇文章中明确表示他们不同意邀请书中提出的纲领（文件281）。——566。

- 147 《新莱茵报》刊登了一篇1848年7月8日来自伦敦的通讯，并加了下

面的按语：“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向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工人发了一份呼吁书。我向您介绍其中的几段……。”本卷刊印了该呼吁书的结尾部分。这份呼吁书是由朱利安·哈尼和卡尔·沙佩尔签署的，而《新莱茵报》在刊印时只印了书记哈尼的签名。

沙佩尔7月初到达伦敦，把他的家属接回科伦。他把科伦工人联合会给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一封信（文件266）带到伦敦，并将伦敦工人教育协会的回信（文件274）带回了科伦。7月4日，他在伦敦参加了欢迎会，这是民主派兄弟协会和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为了欢迎他而联合举行的；会上为沙佩尔及其家属，为科伦工人联合会，“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健康以及《新莱茵报》取得的成功表示祝贺”（参看列维奥娃《卡尔·沙佩尔》，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和第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1963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第93页）。——569。

- 148 这封信的作者，与布鲁塞尔工人协会会员名单（文件191）中的那个弥勒很可能是同一个人。这封信在正字法方面有很多错误。信的内容表明作者曾经在布鲁塞尔逗留过。出生于萨克森的鞋匠亨利希·弥勒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伦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并多次参加过委员会的讨论。1849年5月，弥勒离开科伦，前往参加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当时他在维利希领导下进行斗争。后来他流亡瑞士。1850年在共产主义者同盟拉绍德封区部委员会中从事活动。——572。
- 149 早在1848年7月3日，安得列阿斯·哥特沙克和弗里德里希·安内克刚刚被捕，约翰·严森就被指定为工人联合会主席。但是，严森也随时有被捕的危险，必须躲避，所以必须进行一次补选。结果由约瑟夫·莫尔当选为主席，一直到1848年9月底，后来他也有被捕的危险，必须离开科伦（参看文件209）。莫尔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人之一，他的当选在科伦工人联合会的政治发展中出现了新的转折，其主要特点是系统地传播《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的思想，消除了哥特沙克的影响。——571。
- 150 很可能指的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所创立的德意志协会的章程，但该协会到8月份才最终成立。根据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政治路线，该协会属于民主派左翼，但它的一些通信（参看文件294）表明，它并没有

摆脱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影响，首先还存在巴黎同盟组织的弱点（参看注144）。

在一张可能与德意志协会有关的既没有日期又没有标题的纸条上，分三栏列出57个德国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名字，其中有许多是同盟盟员。

“阿蓬、赫斯、艾韦贝克、奈特、库斯特尔、裁勒尔、鲍威尔、施伦德、莱宁格尔、恩格沙尔、哈泽尔、劳施、欣克尔、亨利希、韦勒尔、甘萨尔、哈特；

“富尔曼、霍尔、福尔考、欣特勒、朗根贝克尔、宾德尔、许尔伯特、贝克尔、列曼、施米特、加布斯、格里希、布利萨特、默克、菲比格尔、卡普、许尔特、林奇、鲍威尔（亚历克斯）；

“韦拉尔特、艾勒斯、丁、施普洛克霍夫、德尼克、卡恩、施米茨、格雷廷、雷哈尔德、勒文施坦、西蒙、布鲁赫、博纳、施特恩、诺伊厄曼、施雷克、于贝尔、朗格、达内斯、施赖伯尔、哈特曼。”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20, op.1, Nr.105）——575。

- 151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第一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参看注145）以后，有人在科伦试图促成民主协会同工人联合会和工人业主联合会的联合，同时保证工人联合会组织上的独立。但讨论结果，在科伦各民主团体的委员会（中央委员会）这一形式下进行合作，该委员会不久以后便成了莱茵省各民主团体区域委员会（参看格尔哈德·贝克尔《马克思恩格斯在科伦（1848—1849年）》1963年柏林版第74页等）。

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成立，科伦工人联合会1848年7月14日委员会会议记录中是这样写的：“公民卡尔曼还提出下列问题：民主协会同工人团体实行了联合，这是不是真的。当公民莫尔肯定了这一点并报告了由现存的三个团体——民主协会、工人联合会以及工人业主联合会组成目前这个委员会的经过以后，会议宣布结束。”（1848年7月16日《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刊》第15号）该委员会成员有：工人联合会的代表约瑟夫·莫尔和卡尔·沙佩尔；民主协会的代表卡尔·马克思和卡尔·施奈德尔（第二）；工人业主联合会的代表海尔曼·贝

克尔和鞋匠师傅许岑多夫。

工人业主联合会人数很少，而且主要成员都来自落后的手工业者阶层，因此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而民主协会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组织。它是1848年3月20日开始在科伦什托尔维尔克旅馆的大厅里举行的几次民众集会上产生的，因而也称之为“什托尔维尔克协会”。民主协会成立时，科伦共产主义者卡尔·德斯特尔表现很突出。该协会在1848年4月的普鲁士邦议会和国民议会的竞选中，形成了比较固定的组织形式。并在4月25日的民众大会上宣告最后成立；它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于5月12日举行。1848年5月底，马克思、恩格斯、威·沃尔弗和其他共产主义者成了民主协会会员，并作了大量的政治工作。关于民主协会的发展，参看科切特科娃：《马克思恩格斯在科伦民主协会中的活动（1848年4—10月）》，载于《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史纲》1959年莫斯科版第303—322页，德译文载于1960年《苏联科学·社会科学论丛》（柏林）第11期第1155—1167页。——577。

- 152 《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刊》从1848年4月23日至10月22日每周出版一次，尔后更名为《自由、博爱、劳动》继续出版。该报主要是联合会的消息报。定期报道联合会委员会会议和全体会议的情况，同时还报道一些通信和联合会的其他事务。除此而外，该报还刊登一些有关现实政治问题和一般问题的文章。报纸在联合会主席（从7月起约瑟夫·莫尔任主席）的主持下出版。但是，莫尔无暇过问编辑部的事，于是主管编辑部的大权便落到了泽尔霍夫手中，而此人并没有坚持工人联合会的政治路线。首先莫尔形式上的职责被架空，而各种临时解决办法也无济于事以后，在9月14日的委员会会议上莫尔被委任接管编辑部的工作（参看文件297）。在7月31日委员会会议上遭到批评的那篇题为《政治》的文章没有署名，该文显然同《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中阐述的原则背道而驰。——579。

- 153 1848年7月中，手工业者代表大会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许多手工业帮工也参加了大会，但是手工业者师傅掌握了大会的领导权，并执行了他们的一条落后的、行会观点决定的路线。最后手工业帮工退出了大会并举行了自己的代表大会，然而他们的大会还是没有摆脱行会制度的强烈影响。关于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建立的手工业帮工

的组织。参看文件335。——580。

- 154 卡尔·沙佩尔于1848年8月11日收到警察当局要他离开普鲁士的通知。并在当天提出了书面抗议（参看1848年8月19日《新莱茵报》第80号）。1848年8月12日《新莱茵报》第73号刊登了一篇文章，文章写道：“对于《新莱茵报》总编辑卡尔·马克思的普鲁士国籍问题所发生的冲突，我们以后再报道。现在来谈谈《新莱茵报》的撰稿人和校对卡尔·沙佩尔先生。

“沙佩尔先生今天早晨曾经被所在区的警察署长传去。警察署长先生通知他，遵照盖格尔先生的命令，他这个外国人应在明天一早离开科伦和普鲁士国境。署长先生又补充说，他出于好意，把出境期限延长了一星期。

“沙佩尔先生不仅是德国人，而且还是拿骚人，他有完备的拿骚身分证。沙佩尔先生和他的妻子以及三个孩子都住在科伦。他是民主协会和工人联合会的会员，又是《新莱茵报》的校对，因此他是身犯三重罪过。

“业已通过的德国公民的基本权利第1条称：‘凡是德国人皆享有全德公民权’。按照盖格尔先生的解释，这大概就是说：凡是德国人皆享有被驱逐出37个德意志邦的权利。除了国民议会的立法还有盖格尔的立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32—433页）

8月18日，科伦工人联合会委员会发出了《工人联合会致警察署的抗议书》，要求无条件地撤销这道专横的驱逐令（参看1848年8月24日《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刊》第25号）。

8月19日，警察署长又用书面重复了这道驱逐令，但是，正如约瑟夫·莫尔8月21日在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上所说的，抗议成功了，致使警察当局声明，暂时撤销对沙佩尔采取的措施（参看1848年8月27日《新莱茵报》第26号）。

科伦工人联合会还坚决反对屡次驱逐马克思的企图——583。

- 155 革命爆发以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几乎所有德国的领导成员都离开了布鲁塞尔，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的活动一时几乎陷于瘫痪状态，从此以后再也没有重整旗鼓。

这封信中提出的一系列要求，都超越了要求参加柏林工人代表大

会的呼吁书（文件269）中所阐述的纲领范围，这也算是对它的答复。首先，这封信提出的经济要求，明确地拒绝了那些行会概念；此外它还提出了政治要求，即要求普选权，这个要求和小农摆脱封建负担的要求一样，都是以《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文件221）为依据的。但是，这封信同时也表现出强烈的经济主义倾向（这是早期工人运动的特点），以及在关于国家工厂的论述中存在空想平均共产主义色彩，在关于国家保障“工人的劳动组合”的论述中还存在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色彩。

经查明，后来，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和工人兄弟会之间并没有发生任何联系。——584。

- 156 在汉堡和附近的阿尔托纳，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首先是雅科布·奥多尔夫、卡尔·毕林、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格吕贝尔、威廉·莱默和弗里德里希·马尔滕斯，早在革命以前就在工人联合会中进行了积极活动（参看文件59），从1848年春季开始还多次参与了联合各工人团体的尝试。早在1848年5月，马尔滕斯就访问过柏林，并参加了关于组织工人代表大会的前几次讨论（参看注146）；6月，毕林进入了那个在柏林发布关于召开工人代表大会呼吁书（文件269）的委员会。毕林是马克思的私人朋友（参看注161）。

柏林工人代表大会于1848年8月23日至9月3日举行，大约有40多位代表出席了大会，他们主要代表普鲁士东部几个省以及萨克森和汉堡的联合会；相反，莱茵省、威斯特伐利亚以及德国南部，只有很少几个联合会派代表参加了大会。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对一些派代表出席大会的联合会曾产生比较强烈的影响。所以，除了汉堡工人联合会外，慕尼黑工人联合会也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同盟盟员弗里德里希·卡尔·泰奥多尔·洪特是该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该联合会主席弗兰茨·施彭格勒可能是同一名同盟盟员一起去柏林的；而同盟盟员弗里德里希·克吕格尔则是科尼斯堡工人联合会的代表，斯蒂凡·波尔恩主要代表柏林的几个联合会，同时还接受了外地工人团体的委托，如在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参看文件287）的委托，他在这次大会上起了很大作用。总之，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同盟盟员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因为那些重要的、在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下的工人联合

会，如科伦工人联合会和美因兹工人联合会，都没有参加大会。

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工人兄弟会，这是在“德国工人中央委员会”（会址设在莱比锡，委员有斯蒂凡·波尔恩、弗兰茨·施韦宁格和格奥尔格·基克）领导下的各工人联合会的一个非正式总会。这一次，各工人联合会的联合是组织上的一大进步，促进了工人觉悟的提高。但是，在这次大会筹备期间已产生很大作用的经济主义观点（参看注141），首先决定了工人兄弟会的活动。此外，在对待行会观点方面还存在姑息迁就的态度，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工人兄弟会后来总的说来还是起了积极的作用。手工业帮工和师傅之间在政治思想上，还有在组织上的分离日益明显。关于抵制行会倾向的努力，也可以从下列事实中看出，有少数人对柏林代表大会关于“国家帮助”的两条决议提出了反对意见，如第27条规定，如要取得师傅的资格，必须具备已学会手艺的证明，外加一次特别测验，对此，波尔恩、毕林、比斯基、迪斯纳、埃歇尔、施韦宁格、施潘道和施泰因豪厄尔明确表示反对；第31条则规定了学徒在数量上的限制，对此，比斯基、毕林、迪斯纳、费尔默、基克、施韦宁格和蒂尔恩施泰因也表示反对（参看《柏林工人代表大会决议》1849年莱比锡版第20页）。

在革命的进程中，工人兄弟会得到了发展，这不仅因为新加入了其他一批联合会，而且还因为它本身的发展。革命的经验，越来越有力地向着加入兄弟会的各联合会的工人表明，政治斗争有着重大意义，并帮助他们丢掉了各种幻想，以致为工人兄弟会在1849年初打破其经济主义的局限性创造了条件。关于工人兄弟会后来的发展，参看注169。——588。

- 157 在科伦郊区农业居民中所做的工作，8月份已在工人联合会中起到了显著作用。8月24日的委员会会议记录是这样写的：“公民沙佩尔然后说，在组织工作方面，应该考虑到两点：（1）农村无产阶级；（2）城市无产阶级。〔……〕为了帮助农村无产阶级，应该把荒先的土地分给没有土地的人耕种，必须尽量合理地利用国有土地，为全民造福，同时把土地集中起来，统一耕种。”（1848年8月31日《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刊》第27号）工人联合会立即照此建议办理，以致该报不久后便作了如下报道：“上个星期日，即8月26日，这里工人

联合会的一些会员前往离此三个小时路程的沃林根，他们在那里同农民讨论了当前的政治和社会状况。沃林根人提出的问题 and 作出的回答清楚地表明，农民十分清楚他们的隐衷所在，他们也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来改善自己的处境。当会员们谈到科伦工人联合会所作的努力并希望沃林根也组织一个类似的联合会时，农民们便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建议。联合会很快建立起来了，并且不久便有40多人参加了联合会。**我们希望新生的联合会繁荣昌盛**，我们沃林根的兄弟们可以相信，科伦工人联合会将竭尽全力支持他们为美好事业而进行的活动。农民和工人是国家的主要支柱，但他们在各方面都是被压迫者。资本家总是想方设法把本来应由他们承担的捐税转嫁给人民。不过，金融统治的末日就要来临，因为工人和农民的呼声越来越高；‘我们愿意劳动，但不是为懒汉和高利贷者劳动，而是为我们自己劳动；我们也要享受我们的劳动成果。’德国的革命力量在于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这一点，从三月革命以来已在我们祖国的绝大部分地区得到了证明。而革命力量在目前就是唯一能带来福音的力量。如果农民和工人联合起来，如果他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那么，他们很快就能摆脱封建负担，摆脱高利贷，摆脱资本的压迫。我们希望各城市工人联合会的会员们，到处都同农村的兄弟们建立联系。”（1848年9月7日《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刊》第29号）

关于弗里德里希·列斯纳在1893年科伦党代表大会上对1848年农村宣传工作的回忆，见本书第2卷；另见文件372。

1848年秋，杜塞尔多夫人民俱乐部的成员也在郊区农村开展了积极的政治工作。——591。

- 153 科伦工人联合会1848年10月19日委员会会议记录这样写道，约瑟夫·莫尔的弟弟克里斯蒂安·莫尔通知说：“伦敦工人教育协会给沙佩尔的家属寄去了5英镑捐款，同时还说明，以后还将酌情给予资助。”（1848年10月25日《自由、博爱、劳动》第1号）10月22日，首饰匠克里斯蒂安·莫尔被选入科伦工人联合会委员会（参看文件305），但他在10月30日的委员会会议上声明说，他不能接受这次选举（参看1848年11月5日《自由、博爱、劳动》第4号）。——603。
- 159 德国第二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于1848年10月26—30日在柏林举行，

当时的柏林由于在酝酿政变，政治气氛显得极为紧张。这次代表大会继续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参看注145），而首先是为了加强民主力量之间的合作；大约220名代表出席了大会，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140个城市的工人团体。代表大会的成分很不统一。参加大会的除了政治思想极不一致的民主团体外，还有一些工人团体。总的说来，这次代表大会是一次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讨论会，特别是在开头几天的讨论中，明显表现出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松散现象。会上一个地道的温和派分子表示反对建立共和国的纲领性要求，此外，联邦共和国的拥护者对此也表示强烈反对，就是在原来的民主阵营中，特别是在工人运动问题上，也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思潮。《新莱茵报》在其报道（1848年10月31日、11月1日和3日第130、131和133号）中严厉地批判了代表大会的这种模棱两可、动摇不定的态度。马克思为此专门著文指出，代表大会为10月29日维也纳革命而通过的、由阿尔诺德·卢格起草的告人民书是毫无根据的（参看1848年11月3日《新莱茵报》第133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528—530页）。

在代表大会的进程中，与会者逐渐分成了两大派：一个是温和的准备妥协的民主派，它起初拥有多数；另一个是由革命民主派、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组成的左翼，在这一派中，一些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得以产生显著的影响。同盟盟员就代表大会上的态度和同盟内部的若干问题进行了讨论（参看文件308）。他们同一些革命民主主义者一起组成了一个极左翼的小组。关于这个小组的成立，《新莱茵报》在一篇报道中写道：“第二天，会议的一方就试图结束这种客套，他们自成一派，表示要拥护‘红色共和国’，并定期私下集会。”（1848年11月5日《新莱茵报》第135号）这个小组的成员有：拜尔霍费尔、博伊斯特、布劳泽韦特、克吕格尔、德斯特尔、艾韦贝克、格律恩、哈根、海恩、海尔贝格、海泽、隆东和施纳克，可能还有布龙（参看文件322）。他们的代表要求建立“社会民主共和国”，并在代表大会的进程中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影响，首先因为其他派别的代表纷纷离开大会，最后只剩下三分之一的代表参加讨论。这次大会的向左转，主要表现在对新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上，新中

央委员会由民主主义者卡尔·赫克萨默和爱德华·赖辛巴赫以及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卡尔·德斯特尔组成。

在起草和审议社会问题委员会的报告过程中，极其强烈地反映出共产主义的影响。由于原先为这个委员会确定的成员早已离开大会，所以，路易·海尔贝格和科伦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弗里德里希·博伊斯特（参看文件305）在10月29日提议，必须组织一个新的委员会。新的委员会在第二天就提出了自己的报告，因而这个报告的起草工作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的。

在讨论博伊斯特提出的报告时，多数人不同意把报告的原则和要求作为代表大会的纲领基础。大会决定把这个报告作为这次大会文件的基础公开发表，并寄发给各联合会，听取它们的意见。

关于代表大会的进程，艾韦贝克曾作过一些描述，其中不乏有价值的材料，但有些地方夸大了代表大会的意义。在他为《新莱茵报》写的一篇通讯（该通讯的前半部分重复了他亲笔为一家法国报纸写的通讯）中写道：“巴黎12月10日。巴黎一家坚定地为‘工人’说话的报纸《公社社会报》，在其最后一号中说：‘[……] 10月底，柏林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发表的宣言（它是在2月份，即在革命以前就用德文在伦敦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的基础上写成的），是各地出现的最进步的宣言，现在人们看到，社会主义在普鲁士和整个德国具有多么大的威力。这个宣言的基础完全是共产主义的，而其中提出的要求必然成为共产主义的开端；因此，我们高兴地表示完全赞同，何况它的实现不会太困难。不管是法国的还是非法国的共产主义者，他们都想在过渡时期用国家代替银行家和商号。在这个重要的德文宣言中，游手好闲者受到了诅咒，资本自以为能够备加赞扬的那种津贴、地租、利息和特权，都被看作对劳动的掠夺而受到了批判和废除。在我们这里，在各个地方，工人都处于1789年以前的第三等级阶段，**他们一无所有，却生产一切东西**。这种不合理状况，这种对理性的讽刺，必须结束。四八年革命像八九年革命一样，也将纪念它的8月4日那一夜，在这一夜将连根拔掉人对人的可耻剥削的最后一条须根；然后，我们才能像我们的先辈取得政治平等那样，也取得社会平等。我们吁请我们的所有朋友，把这个德国代表大会的宣言认真研究一下，不管

怎么说，这个宣言是那个早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的准则的结果；有些人不愿理解安居乐业这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解决的道理。因此我们迫切请求这些人进行严肃的思考’。”（1848年12月13日《新莱茵报》第167号）

在科伦，博伊斯特在11月6日的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参看文件310）和11月19日的全体会议上，先后报告了柏林代表大会的讨论经过。记录中是这样写的：“会议开始以后，公民博伊斯特作关于他参加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的报告。他详尽地阐述了被代表大会树为样板的西里西亚民主组织的情况。公民沙佩尔宣读了柏林代表大会任命的社会问题委员会的报告草案，并对草案作了扼要说明，博得了与会者的热烈欢迎。”（1848年11月23日《自由、博爱、劳动》第9号）

社会问题委员会的报告基本上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观点和共产主义观点的杂拌儿。第一部分，即总纲部分，论述得极其模糊。第二部分分为四点，是一个原则声明，强调指出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意义，因而明显地突出了共产主义思想。报告的第三部分几乎照搬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文件224），两者之间的差异仅仅是，报告照抄了第1、2、3、6和8条，其中第2、3和6条由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作了很大补充；至于第1条，代表大会虽然表示拥护共和国，但没有作出明确的原则声明，并且只字不提共和国必须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这一要求（参看列维奥娃《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49年德国革命中制定无产阶级纲领的情况》，载于《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史。纪念第一国际成立100周年》1964年莫斯科版第489—495页；格尔哈德·贝克尔《1848年第二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上讨论的“社会问题”》，载于1967年《历史杂志》第15年卷第2期第260—280页）。——604。

- 160 海尔曼·艾韦贝克是由巴黎德意志协会派往柏林参加第二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的代表，他在这封信中谈到，莫泽斯·赫斯企图在巴黎建立一个特别小组，抵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策（参看注144）。这封信表明，在这段时间里，艾韦贝克受了赫斯相当大的影响，被诱导去进行阴谋活动，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艾韦贝克关于他在柏林的辩论的报道中，有些地方还谈到，当时伦敦和巴黎方面曾试图改组共产

主义者同盟领导机关。关于伦敦共产主义者（他们大约在同时还派约瑟夫·莫尔前往德国）的计划，现在缺乏具体的资料。关于巴黎方面的计划，可资说明的就只有艾韦贝克的这封信，信中有把中央委员会迁往柏林的打算，而这正意味着要削弱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艾韦贝克打算回巴黎后去找马克思（参看文件314），但这个打算没有如愿。——609。

161 毕林的这封信经编辑部加工后，刊登在1848年11月24日《博爱报》第16号上。

卡尔·毕林是汉堡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积极盟员，早在准备和建立工人兄弟会期间就进行了积极活动（参看文件288），此后又在汉堡区部组织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起先是汉堡区部委员会的第二书记，该委员会同兄弟会领导机关和莱比锡“德国工人中央委员会”的文书交换工作，大部分由他承担。约瑟夫·莫尔访问汉堡以后，共产主义者同盟汉堡组织的活动有了明显恢复。从1849年2月起，毕林任汉堡区部委员会第二主席。工人兄弟会德国北部区域代表大会（于1849年2月10—14日在汉堡举行）以后不久，在准备选举新的领导班子时，他于1849年2月22日写信给中央委员会说：“星期一就要进行新的区域执委会的选举，我希望获得理想的结果，这样，我们就还能在委员会里更好地继续活动。”（德累斯顿国家档案馆，MdI, NrI, 11026a.）关于这次选举的结果，威廉·豪普特（他是汉堡工人运动中超群出众的人物）在1849年3月6日给莱比锡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写道：“我们还要向你们报告：区域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已经改选，温德勒任第一主席，毕林任第二主席，希尔施任第一书记，豪普特任第二书记。我们相信，现在，我们将以更活跃更充沛的精力从事工人的事业，工人兄弟会在这里将把各种利益融为一体。在工人代表大会召开以后，这里人们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德累斯顿国家档案馆，同上）

从毕林1849年1月23日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他同马克思也有联系，信中写道：“亲爱的马克思：如果我的消息对您有用，我乐意尽力向您提供消息。”（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库，F.23, Nr. 6—9）毕林是不是《新莱茵报》的通讯员，现在尚

未查明。——612。

- 162 这封信表明，艾韦贝克不顾马克思的坚决反对，始终没有放弃反对恩格斯的阴谋活动（另见他1848年11月1日的信，文件308）。关于马克思和艾韦贝克商谈的其他内容，德朗克在1849年1月31日给马克思的信（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 1，op. 1，Nr. 323）中只是说，他们之间达成了艾韦贝克继续并扩大为《新莱茵报》从事通讯活动的协议。

关于恩格斯在瑞士的活动：他利用1848年11月初在洛桑短暂停留的机会，同委托他参加伯尔尼工人代表大会（参看文件325和328）的洛桑工人联合会建立了联系，随后他于11月9日到达伯尔尼。——615。

- 163 “德国共和主义军人联合会‘自助者’”，1848年10月在瑞士成立，同时还出版《自助者》杂志；该联合会首先提出的任务是，参加德国的共和派起义，同时争取侨居瑞士的德国民主派参加武装斗争。它所吸收的成员主要是侨居瑞士和法国的德国政治流亡者，而这些流亡者中有些人曾经参加过黑克尔的四月起义，其中很多是工人。在瑞士的一些德国工人联合会直接加入了军人联合会，在这个组织中，许多共产主义者积极地参加了工作。该联合会的领导人除最早的创始人约翰·菲力浦·贝克尔外，还有奥古斯特·维利希，他的伯桑松纵队（参看注167）加入了军人联合会。军人联合会组织严密，在内部联合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左翼和共产主义者，因此，总的说来，它具有革命民主主义的性质，但仍然不乏盲动主义倾向。——622。

- 164 布龙试图把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军人联合会“自助者”融为一体，这一点证明，他混淆了这两个组织迥然不同的阶级性质。卡尔·布龙是军人联合会“自助者”的领导人之一，并以特使身分代表该组织主要在德国从事活动。在这封信的下一部分（本卷未加刊印）中，他详细地叙述了准备在德国北部地区，首先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进行武装起义的情况。——622。

- 165 里德尔1848年12月27日给马克思的信表明，在邮寄《新莱茵报》时，在筹集费用方面碰到了困难。里德尔在信中写道：“恩格斯在这里时曾亲口对我说过，有人会免费给你寄报。当然我认识一些工人，他们

很喜欢看这份报纸；他们说，只要有办法，他们也愿意付一些钱；而对我来说，这却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每天要花4生丁邮资。〔……〕我不相信，理事先生们竟是这样一些庸人，竟然要我这样的无产者为139份报纸支付9塔勒15银格罗申，9塔勒15银格罗申真是谈何容易。”（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23，op.1，Nr.3—8）——623。

- 166 弗兰茨·施彭格勒是慕尼黑工人教育协会主席。他同格奥尔格·基克所属的工人兄弟会中央委员会有着频繁的书信往来。从他的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工人协会中有一个社会主义者小组，其中可能也有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如装修工弗里德里希·洪特曾一度是这个小组的成员。1849年3月，约瑟夫·莫尔拜访了慕尼黑工人教育协会。

协会秘书约瑟夫·雅科布（他显然也是施彭格勒所说的那个小组的成员），在1848年10月26日给莱比锡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写道：“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它将变得伟大而美丽，变得比这个世界上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伟大，都美丽。我们面临的不是一个普通的新的历史阶段，不是，而是一个崭新的时代。是的，这个时代已经来临，这个时代已经开始到来。我们不是看到，不是觉察到，人类到处都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苦难，正在寻找造成这些苦难的原因和消灭这些苦难的手段吗？看看那些穷人——人类真正的殉难者吧！我们对他们竟长期不闻不问，他们由于这种所谓世俗的偏见而像瞎子一样乖乖地任凭领路人的指使摆布。我们也要开始思考，开始说话，开始写作。我们要更多地工作，我们要联合起来，以便通过联合的力量摆脱精神和贫困的羁绊。”（德累斯顿国家档案馆，Mdl，Nr.11026a）这封信经编辑部修改后，发表在1848年11月7日《博爱报》第11号上。——624。

- 167 在伯桑松有一支德国政治流亡者的志愿部队，大家称之为“伯桑松纵队”，这些人都是在1848年4月第一次巴登起义失败后为免遭迫害而被迫逃到那里去的。这支部队主要由工人组成，奥古斯特·维利希是它的创始人。部队中也有不少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其中木工奥古斯特·格贝尔特同奥古斯特·维利希紧密合作。格贝尔特在革命爆发以前是拉绍德封共产主义者同盟瑞士总区部的成员（参看文件241），

并参加过巴登起义。——625。

- 168 法国二月革命爆发以后，侨居瑞士的德国流亡者也准备在德国举行一次革命起义。这次运动是由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导的，许多侨居瑞士的德国工人也参加了运动。这次运动不仅同德国西南地区正在作出的努力有，而且同受到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批评的海尔维格的行动有关，最终导致了黑克尔的四月起义。格贝尔特曾指出，当时瑞士的同盟盟员还不懂如何得同小资产阶级有动主义倾向明确划清界线，他们的这种态度可以从贝格曼1848年4月21日的信（文件241）中得到证实。正如格贝尔特在这封信中所表明的，他本人也深受这种倾向的影响。——627。

- 169 这篇报道可能出自约瑟夫·魏德迈之手。

海德堡代表大会于1849年1月28—29日举行，参加大会的有来自巴登、普法尔茨、莱茵黑森以及维尔腾堡地区的一些工人联合会的代表。这次大会表明，德国工人联合会和工人兄弟会在其总的发展进程中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从1848年底到1849年初，举行了一系列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这些大会扩大了工人兄弟会的影响。

1848年12月27—29日，举行了萨克森工人代表大会，接着又举行了海德堡代表大会，在这以后，1849年2月10—14日在科伦举行了德国北部地区代表大会（参看注161），1849年2月11—12日举行了图林根代表大会，1849年3月14日举行了哥丁根—维尔腾堡地区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参看注177）以及1849年3月3—4日举行了纽伦堡—巴伐利亚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关于纽伦堡代表大会，1849年4月13日《新莱茵报》第271号作了详细报道。上述代表大会表明，革命的经验也在广泛的工人运动中焕发并促进了人们对政治斗争的伟大意义的认识，同时激发并发展了人们对组织联合的追求。因此，工人兄弟会也日益具有明确的政治性质，但同时并不放弃总的经济目标。在试图实现工人运动政治上独立的发展中，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对工人兄弟会和其他分散在各地的地方工人团体产生了日益扩大的影响。科伦工人联合会在1849年1—2月进行了改组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莱茵省和威斯特伐利亚的工人联合会和德国的政治上最先进的工人联合会在1849年4月直接参与了 this 发展过程（参看文件366）。

海德堡代表大会辩论的中心，是分析批判1848年夏天组成的所谓法兰克福中央委员会（参看注153）的反动的行会观点。这种观点在革命的进程中日益失去影响，并在法兰克福控制下的联合会中也明显地遭到了日益强烈的反对。法兰克福帮工组织的领导人，浪漫了拥护反动的行会等级学说的文克布莱希教授，以思想代表的身分参加了海德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以文克布莱希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大会决议的基本条款如下：

“一、关于社会信条问题，留待下次**全体**工人代表大会取得一致意见。

“二、为了避免工人的分裂，本次代表大会经有关委员会同意，特作出如下决议：

“a. 目前在法兰克福和莱比锡的两个中央委员会合并成唯一‘德国工人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所在地设在莱比锡，从那里领导工人组织并从各方面共同代表工人组织的利益；

“b. 把中央委员会在莱比锡出版的杂志《博爱报》，确定为参加海德堡代表大会的各联合会的机关刊物。[……]

“三、决定成立一个**全德工人同盟**，但是，由于德国工人本身还不足以代表一个同盟的临时组织，由于代表大会相信上述两个联合起来的中央委员在下次**全体**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将会全力发展同盟组织，因此，大会认为没有必要提出专门的组织章程。

“四、为各地区出席代表大会的组织通过下列规定：

“第1条：工人在各地组织成工人**联合会**，在联合会中，工人定期举行集会，设法在会上作报告、讨论和学习一般的文化知识，特别在政治和社会问题上，要弄清自己的地位、要求和未来。

“在工人本身认为必要的那些地方，把一些工业部门变成工人联合会的独立分支，以便讨论他们的物质利益，并通过总的联合会发挥作用。”（1849年2月9日《博爱报》第33号）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也参加了海德堡代表大会的工作。早在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约瑟夫·魏德迈就从达姆施塔特写信给马克思，请他提供材料（参看文件332）。他是作为《新莱茵报》编辑同奥托·吕宁一起以来宾身分出席大会的。保尔和亨利希·施土姆普弗作为美国

兹的代表出席了大会。

斯蒂凡·波尔恩在代表大会后参加了莱因兹民主协会，接着在科伦拜访了马克思、恩格斯和《新莱茵报》的其他编辑。但是，他在回忆录中却没有提到他们之间谈话的内容（参看斯蒂凡·波尔恩《一个四八年战士的回忆》1898年莱比锡版第196—199页）。可以认为，他们的谈话内容是工人运动的组织问题，并对波尔恩的观点产生了一定影响。——635。

- 170 普林茨不顾1849年1月15日委员会会议决议（参看文件331），竟在联合会会刊上发表了一篇攻击拉沃的文章（《致拉沃先生》，载于1849年1月28日《自由、劳动》第5号），而事先没有把草稿送交于1月15日成立的编辑委员会审阅，为此编委会发表了下列声明：

“本工人联合会为《自由、劳动》编辑设立的编辑委员会并没有参与攻击拉沃先生一文的起草工作，该文在付印前也没有人送交本编委会审阅。1849年1月29日于科伦。勒泽尔、赖夫、沙佩尔。”（1849年1月31日《新莱茵报》第209号附刊）——637。

- 171 关于工人联合会会刊恢复原来名称出版的决议很快就落实了。从1849年2月8日开始，《自由、博爱、劳动》恢复出版，由克里斯蒂安·约瑟夫·埃塞尔担任编辑。第1号由《新莱茵报》印刷所印刷，后来由安内克出版的《新科伦日报》印刷所承印。《自由、劳动》报仍然作为哥特沙克的报纸出版，但已经完全失去意义，对工人联合会领导和《新莱茵报》极尽诽谤攻击之能事。——639。

- 172 联合会的改组早在1849年1月25日的委员会会议上就开始了。关于这一点，会议记录说：“公民沙佩尔提议，起草一个新的联合会章程，为此任命一个委员会，然后讨论章程，待章程通过后付印，发给会员们人手一册。他说：早就觉得有必要按一定的方式组织联合会了。从它建立以来，我们取得了许多在它建立时未曾有的经验，在当时也许是非常必要的东西，现在不再必要了。总之，联合会必须拥有牢固的基础和明确的规定，以便使每个人知道，应采取什么态度，也不能因为没有法规而产生不团结。此外，必须把这些规定或章程交给每一个会员，使他们也马上了解到联合会的倾向和体制。然后，还有许多人阐发了制订章程的必要性并通过了沙佩尔的上述提案。为了临时起草

章程，任命了由公民沙佩尔、埃塞尔、卡斯滕斯、萨尔格特和赖夫组成的委员会。”（1849年2月8日《自由、博爱、劳动》第1号）——640。

173 1849年2月5日的委员会会议就分会还作出了其他的决议。会议记录如下：

“鞋匠联合会，鲁滕堡街7号，表示愿意作为分会加入工人联合会，并愿意遵守那些章程。鼓掌。

“公民沙佩尔接着指出，继这个分会后将要建立的分会以下六个，即：

“第一个：主席 弥勒，在克兰茨街西蒙夫妇家；

“第二个：主席 萨尔格特，在福勒尔街莱格曼家；

“第三个：主席 沙佩尔，在库尼贝特附近小十字街赫歇尔家；

“第四个：主席 埃塞尔，在莱茵高地的普法尔家；

“第五个：主席 勒泽尔，在使徒街希尔格尔家；

“第六个：主席 威斯特曼，在鲁滕堡街7号。

并提议。暂时任命公民卡斯滕斯（列斯纳）、诺特荣克和赖夫为另外三个分会的主席，责成委员会在合适的地方再建立三个分会。”（1849年2月15日《自由、博爱、劳动》第3号）

3月初，在一个公告中列举了以下几个分会：

“第一分会，在克兰茨街西蒙夫妇家，每星期日8点钟；

“第二分会，在福勒尔街莱格曼家，每星期三和星期六8点钟；

“第三分会，在菩提树街（库尼贝特）赫歇尔家，每星期日8点钟；

“第四分会，在鲁滕堡7号达尔豪森家，每星期一6点钟；

“第五分会，在拜恩塔附近比贝尔巷拐角处卡斯特里家，每星期天和星期二8点钟；

“第六分会，在老塔附近普法尔家，星期四8点钟；

“第七分会，在武器库巷胡默尔斯海姆家，星期四8点钟；

“第八分会，在希腊门89号法斯本德尔家；

“第九分会，在布兰肯堡布兰克巷许纳沙伊特家，星期日8点钟。”（1849年3月4日《自由、博爱、劳动》第8号）——640。

174 委员会于1849年2月14日起草的章程草案，刊登在2月22日《自由、博爱、劳动》第5号上，在2月25日（误认为24日）第6号上又刊登一次。它的全文如下：

“第1条 科伦工人联合会的宗旨是，通过订购书籍、报刊、宣传读物，并通过学术报告和讨论，在政治、社会和科学方面培养它的会员。此外，联合会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设法保护其会员不受压迫，必要时给予资助。

“第2条 为了便于会员们就近参加会议，工人联合会分设九个分会。

“第3条 每个分会选举一名主席，一名书记员，一名图书管理员，一名司库和一名秘书，管理本分会的事务。

“第4条 每个分会每周至少举行一次会议，同样，每星期，即每星期一举行一次各分会全体会议。

“第5条 凡希望成为工人联合会会员的人应在会议上向分会的书记提出申请，书记在下次会议上宣读申请者名单，然后，如果没有人反对，主席就宣布申请者已被接收为会员。

“第6条 如果某一个候选人遭到反对，那么，工人联合会委员会在听取了有关接收或拒绝接收这个人入会的正反两方面意见后，通过表决作出决定。

“第7条 工人联合会的工作交给一个由15人组成的委员会主管。

“第8条 这15名委员中的5人由工人联合会全体会议任命，另外10人是9个分会的主席和联合会会刊的编辑。如果某个分会的主席被工人联合会全体会议任命为委员会委员，那么，这个分会的书记就代表其主席出席联合会委员会会议。

“第9条 委员会在其委员中任命一名主席、一名书记员和一名司库，负责本委员会的工作。委员会主席同时是全体会议的主席。

“第10条 工人联合会委员会和各分会委员会每三个月改选一次，但是，如果这些官员有不正当行为，选民随时都可以罢免他们。

“第11条 工人联合会委员会每周至少举行一次会议，为全体会议以及为各分会的会议确定一周的议事日程。

“第12条 工人联合会的每个会员每月向自己所在的分会缴纳1 银格罗申会费；没有工作的委员，事先可向司库说明情况，在找到工作之前，可以免缴会费。

“第13条 在这1 银格罗申中，把9 分尼留在分会储金处，把3 分尼上缴给工人联合会的总储金处。

“第14条 每个会员都有一个会员证，背面载明他每月缴纳的会费。

“第15条 某个会员如果连续三个月不缴会费（因失业而免缴的除外），按自动离会处理。

“第16条 委员会每次改选后，必须在全体会议和各分会会议上说明过去三个月的收支情况。

“第17条 由委员会和各分会的书记组成名誉法庭，受理对联合会会员的各种控告。

“第18条 如果某个会员要提出反诉，必须向他所在分会的主席报告，而主席必须召集名誉法庭审理。”

章程的附录部分共分五节，对各分会所藏图书作了规定。

章程草案也曾在《博爱报》上发表过，在一篇标明“科伦2月25日。”字样的按语（可能是科伦工人联合会的一名领导成员写的）中这样写道：

“如果所有的人都不想联合，如果联合不是有意识的，如果700名会员都不倾向于采取有力的行动，那么，他们在这个文件中能得到什么。我认为，章程能详细告诉你们。这个章程也许可以供我们国外的兄弟们借鉴。”（1849年3月6日《博爱报》第45号）——647。

175 根据章程第8条（参看注174），委员会的其他委员是9个分会的主席或书记。

从章程第9条可以看出，委员会必须从自己的委员中任命工人联合会的主席、书记和司库。关于这一点，1849年2月28日的委员会会议记录是这样写的：

“公民勒泽尔宣布会议开始后便根据章程第9条进行委员会的选举。

“选举采取投票的方式，其结果是：

“公民沙佩尔当选为主席，

“公民勒泽尔当选为副主席，

“公民赖夫当选为书记，

“公民贝多尔夫当选为司库。

“会议决议：

“章程印刷2 000册。”（1849年3月4日《自由、博爱、劳动》第8号）

科伦工人联合会的改组，以这次领导机构的改选而告结束。——648。

- 176 德朗克给恩格斯的这封信和另外两封信（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 1，op. 5，Nr. 325和326）都未注明日期，它们前后间隔的时间可能很短。恩格斯后来补上的日期是“49年3月”。其中第三封信，是直接答复恩格斯的一封信，此信没有保存下来。恩格斯在信中肯定要求德朗克立即赶到科伦。而德朗克答应在两天、最多在三天后到达科伦。3月19日，德朗克已在科伦参加了一次集会（参看文件352），可见，德朗克从巴黎起程的日子最晚是3月17或18日。只要把这三封信联系起来看，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本卷刊印的这封信是在3月1—10日这段时间内写的。——651。

- 177 1849年3月11日，维尔腾堡地区的11个工人联合会在戈宾根举行代表大会，为了达到在组织上的联合，为了建立维尔腾堡地区的组织同莱比锡工人兄弟会中央委员会的紧密联系，采取了措施。会上，乌尔姆工人联合会当选为“领导”，作为维尔腾堡地区各工人联合会中央委员会发挥作用。《太阳报》发表了关于戈宾根代表大会的报道，1849年3月13日《博爱报》第47号转载了这篇报道。

从乌尔姆工人联合会的这封信中可以看出，这是对斯图加特工人联合会的复信，后者在来信中请乌尔姆工人联合会帮助它同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建立联系。但是，斯图加特工人联合会在3月9日，即还没有得到乌尔姆的答复就直接给伦敦方面写了信（见文件363）。

乌尔姆工人联合会的信发表在斯图加特工人联合会出版的《太阳报》，即维尔腾堡地区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上，但是，现在已找不到

这份报纸（可能没有保存下来），只有一份手写的摘录，是在麦克斯·克瓦尔克的遗物中发现的。——654。

- 178 指约瑟夫·莫尔，他以伦敦新组成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特使身分，带着一张注明英国名字的护照访问德国。他相继访问了汉堡、科伦、柏林、莱比锡等城市后，2月下旬，又在慕尼黑呆了一周。从施彭格勒1849年11月21日的信（见本书第2卷）中可以看出，“泰勒”在慕尼黑逗留期间，曾要求他同伦敦方面建立联系。为德国工人传递莱比锡中央委员会的材料一事表明，莫尔在莱比锡曾同工人兄弟会的领导人举行了会谈。关于莫尔在莱比锡逗留的情况，后来维利希—沙佩尔宗得崩德的通信中也有证明材料。巴黎区部在1851年4月7日给宗得崩德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中，试图开脱自己的罪责，它说，它曾经资助中央委员会派往巴黎和瑞士的特使，而这一点并没有任何人委托它去做；并且还说，“当约瑟夫·莫尔1848年出使德国途中缺少继续旅行的费用时，是它在莱比锡给他预支了一笔钱，使他不致由于等待而失去宝贵的时间。后来同盟认可了这次借款。”（梅泽堡德国中央档案馆，Rep.97, lfd. Nr. 11）

文件350表明，约瑟夫·莫尔由慕尼黑前往乌尔姆，大约在2月底到达乌尔姆，并同乌尔姆工人联合会（它在前不久刚担负起维尔腾堡工人联合会中央委员会的重任，参看注177）的领导人进行了会晤。莫尔接着从乌尔姆出发，前往斯图加特；至于莫尔在德国究竟还到过哪些地方，现在还没有找到证明材料。正如施泰因根斯1849年10月24日的信（见本书第2卷）表明的，莫尔大约于1849年5月初在布魯塞尔作了短暂停留。后来，约瑟夫·莫尔参加了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在运动中，他以特使身分又作了一次危险的旅行以后，在牟尔克河畔的罗滕菲尔斯战役中阵亡（参看文件373）。——655。

- 179 后来的一篇关于慕尼黑工人联合会的活动的总结报告，曾提及该联合会的二月宴会和因此而遭到的迫害：“1849年2月24日，在我们平常开会的地方——十字酒店的大厅装饰得焕然一新，为了纪念法国革命，也就是为了纪念同工人阶级的解放休戚与共、血肉相关的革命，至少是使它有望获得解放的革命，我们在这里举行了宴会。其他一些具有自由思想的联合会委员会以及邦议会的左派都应邀出席了宴

会。在宴会上，许多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但结果却致了大规模的司法追究，至今还没有了结。从那以后，这次宴会（人们普遍称之为“革命宴会”）便成了我们的敌人用来反对我们的把柄。”（1850年6月29日《博爱报》第39号）——655。

120 威廉·沃尔弗的一组文章《西里西亚的十亿》。1849年8月22日至4月25日在《新莱茵报》上连载，文中揭露了农民和农业工人所遭受的封建剥削和奴役。该文不愧是农村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纲领。沃尔弗撰写此文，为农民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制定无产阶级策略，作出了重大贡献。

《新莱茵报》从1848年12月17日开始，连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农业问题的文章，而《西里西亚的十亿》是其中最出色的作品。这组文章几乎全部出自威廉·沃尔弗的手笔（参看瓦尔特·施米特《威廉·沃尔弗——〈新莱茵报〉编辑（1848—1849年）》，载于1964年《历史杂志》第12年卷第4期第615—627页）。

《西里西亚的十亿》这组文章引起了巨大反响，先后在许多报纸上转载，《博爱报》也转载了其中的几篇，而且还出版了单行本。关于这组文章的意义和影响，恩格斯写道：“沃尔弗就这样开始了反封建主义的运动，这个运动在《西里西亚的十亿》中达到了顶峰[……]这个运动实际上应该由资产阶级来进行。反封建主义的斗争本来就是这个阶级的世界历史性任务。可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资产阶级没有进行这个斗争，即或进行，也只是为了做做样子。由于德国的社会和政治落后，德国资产阶级处处都不去保卫他们自身的政治利益，因为无产阶级已经在他们背后带有威胁性地兴起了。巴黎工人在2月里的模糊的希望和意愿，尤其是他们在1848年6月的四天殊死斗争，不仅吓倒了法国的资产阶级，而且吓倒了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而在德国，在胆小的资产者看来，甚至早已在瑞士取得了法律效力的普通民主要求，也会侵害到他们的财产、他们的安全、他们的生命。像往常一样怯懦的德国资产者为了使得他们每个人都能拯救自己私人的利益，拯救自己的资本，而牺牲了他们的共同利益，即政治利益。最好是恢复旧的官僚封建专制制度，而不要让资产阶级这个阶级获得胜利，不要在革命阶级——无产阶级加强的情况下通过革命方式获得的

现代资产阶级的国家！这就是使得反动势力全线胜利的德国资产阶级的惊慌叫声。

“所以，在资产阶级放弃战场的地方，无产阶级的政党就要担负起斗争的责任。于是，沃尔弗就在《新莱茵报》上同封建制度展开了斗争。但是他进行斗争并没有使资产阶级感到高兴；没有，他是以真正的革命方式进行斗争的，因此，资产阶级见了这些充满法国大革命精神的文章，就同封建老爷们和政府一样地感到惊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73—74页脚注）

在布雷斯劳，民主总会于4月11日作出决议：“把《新莱茵报》上发表的关于西里西亚封建的土地关系和《西里西亚的十亿》的文章汇编成册，先印1000册，免费分发给农民。”（1849年4月15日《新莱茵报》第273号第2版）《新莱茵报》通讯员爱德华·弥勒-捷列林格在1849年4月8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关于西里西亚的文章，现在正在农村向农民宣读，当然遭到了公开的冷嘲热讽，往后我将不断报道这方面的消息，以便让《西里西亚的十亿》常见于报端。”（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23, Nr.5—21）——656。

181 这封信是1849年3月底在柏林的大搜捕（参看注182）中被没收的。当局在审讯奥古斯特·黑策尔和其他被捕者的过程中，试图证实“胡果”和“康内吉塞尔”是同一个人，但是枉费心机，黑策尔说这两个名字都是化名，并拒绝作其他说明。但是，康内吉塞尔可能并不是化名，而是在印刷工人罢工运动中起过领导作用的一名编辑海尔曼·康内吉塞尔。这封信的大概日期是根据另一名被告卡尔·韦格纳的供词确定的，他在3月中旬石印了章程。——661。

182 这封信可能是1849年3月30日前不久写的，现在只保存下该信的开头部分。3月30日这天，柏林警察进行大逮捕大搜查，奥古斯特·黑策尔就是在这一天被捕的。

大约在1848年12月中旬，约夫瑟·莫尔以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特使身分到达柏林，并把一份新章程交给了黑策尔。从那以后，早在1848年春就已负责柏林同盟组织（参看文件240）的黑策尔，便开始在柏林积极进行同盟的改组活动。大约在3月中，新章程由编

家卡尔·韦格纳（同盟盟员，可能还是某个支部的领导人）石印，当时共印了14份。黑策尔同卡尔·德斯特尔也有联系。后者在离开柏林时曾把一箱子文件存放在他家里。

参加这次改组工作的（其中有些人是支部主席），除黑策尔和韦格纳以外，还有裁缝师傅弗里德里希·本德勒尔，机线师傅茨勒尔，手套织工希尔德布兰德，手套织工李希特尔和他的弟弟、裁缝李希特尔，鞋匠尤利乌斯·海尔曼·施米特，以及裁缝海尔曼·施奈德尔。在1849年3月30日和以后几天里，由于有人告密，除黑策尔外，海尔曼·康内吉塞尔（参看注181）、手套织工李希特尔、施米特和韦格纳也相继被捕。

在柏林的大搜捕过程中，封建反动派的政治企图昭然若揭，他们千方百计想延长柏林的戒严期。当普鲁士第二议院越来越紧迫地要求政府解除1848年12月开始的戒严时，冯·曼托伊费尔首相在1849年4月25日的会议上声称，内阁早已考虑了解除的问题，但由于又要进行大搜捕，因此把解除戒严一事耽搁了（参看《关于奉1848年12月5日圣谕召开的议会辩论的速记记录。第二议院》，载于普鲁士国家通报》1849年柏林版第667—668页）。黑策尔、韦格纳、本德勒和李希特尔审判案到1850年8月14日和15日才审理，结果全部被无罪释放。不过，黑策尔被驱逐到布雷斯劳，李希特尔被驱逐到巴伐利亚。关于这一期间柏林同盟的活动，参看库尔特·韦尔尼克：《1848—1849年革命前、中、后柏林工人运动中的共产主义者和政治积极分子》，载于1968年《德国工人运动史论丛》第2期。——661。

- 183 1849年4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拥护者为创建一个德国工人阶级的独立的群众性革命政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当时，他们以1849年初建立的科伦工人联合会为基础，首先着手促使莱茵省和威斯特伐利亚工人联合会的联合，以便筹备预定在1849年6月举行的德国工人代表大会。同时，他们在组织上脱离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采取这些措施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从1848年底以来历次地方性的工人代表大会所取得的成就（参看注189），而这些成就可能都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在这些成就中，首推海德堡代表大会作出的决议，即召开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和成立一个全德工人同盟的决议最为重要。在莱

茵省,以科伦为出发点的发展所以具有重大意义,是因为在联合的过程中人们克服了在斯蒂凡·波尔恩领导的工人兄弟会中盛行的经济主义观点(参看《德国工人运动史(八卷本)》第1卷1966年柏林版第150—155页)。

自从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发表《雇佣劳动与资本》(文件356)一书,做好思想上的准备以来,4月11日的委员会会议初步确定了组织方面的措施,同时可能还讨论了有关退出民主协会的问题(参看文件358和359)。在4月11日委员会会议以后,发表了下面一则消息:“科伦工人联合会委员会相信,保护隐藏在民主派这个多义名称义下的一切努力都是枉费心机的,并且认为,必须导致只代表一种利益,即本阶级利益的整个工人阶级的团结友爱,因此,本委员会邀请普鲁士莱茵省的所有工人联合会,把自己的地址寄给《新科伦日报》编辑部,以期达到这种团结友爱。”(1849年4月12日《新科伦日报》第84号)4月11日的决议发表后,科伦共产主义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又为组织莱茵省和威斯特伐利亚的地方代表大会和筹备全国代表大会采取了一系列其他措施(参看文件360、362和366)。——662。

- 184 朱利安·哈尼的这封信是对恩格斯1849年4月6日的信的答复,而恩格斯的去信是对哈尼1849年3月19日的去信的答复。哈尼在这封信中阐述了同反对宪章派的革命发展的菲格斯·奥康瑞尔的分歧,此外还报告了创办一家独立的革命报纸的计划。哈尼在1849年3月19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还写道:“我需要你的帮助。我希望这个报纸不仅仅是宪章派的报纸,我希望它成为欧洲民主派的机关报。希望你每周寄来一封信。”(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1, op. 5, Nr. 216)

《新莱茵报》刊登了哈尼的一个声明,以表示支持他同奥康瑞尔的斗争(参看1849年3月16日《新莱茵报》第247号)。

《民主评论》从1849年6月开始由哈尼在伦敦出版,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为该报撰稿。——666。

- 185 这封信不是原件,而是明登警察局1852年8月29日的每周报告中所引用的一个副本。从这个报告中可以看出,当时,莱茵普法尔茨的弗兰

肯泽尔的印刷工人弗里德里希·卡尔·海特尔是从美国回国后不久在明登被捕的，从他家里抄出了许多信件，其中包括奥斯渥特·狄茨1849年6月8日写的这封信。——671。

- 186 1849年6月10日，为组织黑森—拿骚的维护帝国宪法的斗争，在维斯巴登附近的伊德施坦举行了一次地方代表大会。大会筹委会于6月5日就发出号召，要求黑森—拿骚的每个村镇都选派五名代表参加伊德施坦代表大会。同时，邀请他们参加6月9日在伊德施坦举行的预备会议。卡尔·沙佩尔是从科伦来到维斯巴登的，早在革命开始时，他就已在那里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进行活动并建立了一个工人联合会。他参加了伊德施坦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同时被维斯巴登“维护人民权利协会”推选为出席伊德施坦代表大会的代表。沙佩尔还是纲领起草委员会的成员。在伊德施坦代表大会上，沙佩尔是主要发言人之一。根据他的提议，会上选出了一个由7名代表组成的地区委员会，此外还选出了向公爵提交纲领的由56人组成的代表团。

1849年6月13日，沙佩尔和伊德施坦代表大会的其他组织者相继被捕。1850年2月8日至13日，在维斯巴登对他和其他被告进行了审判，审理了伊德施坦事件。由于代表大会的发言被一名与会者作了速记记录，并在庭审期间被宣读，所以这个速记记录又被收入了公开发表的庭审记录。——672。

- 187 在1849年6月9日的预备会议上通过了纲领草案第1条，全文如下：
“我们认为，德国制宪国民议会就是国民议会，它的决议具有绝对约束力。”沙佩尔对此提出了下列补充意见，在“制宪国民议会”一词后面应加上“在斯图加特，不管成员多寡”的字样。这个修改意见没有获得通过，但是，第1条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最后改成：“我们认为，德国制宪国民议会就是国民议会，它的决议具有绝对的约束力，国民议会不管设在哪个城市，都是我们的最高机构。”——672。
- 188 1849年5月底，弗莱里格拉特曾到阿姆斯特丹旅行，开始时同格奥尔格·维尔特偕行，去同卡尔·波斯特商谈钱的问题，以便偿还《新莱茵报》被查禁后欠下的债务。波斯特因参加了1849年5月10—12日的伊塞隆起义而流亡在外，他原来同民主主义者弗里德里希·格尔施泰因共同掌管着1000塔勒，这是里达的一位女民主主义者，奥托·吕宁

的好友寄给《新莱茵报》的，但在报纸停刊时她又把钱收回了（参看《马克思1849年7月13日给约瑟夫·魏德迈的信》，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524页；曼夫雷德·海克尔编《〈弗莱里格拉特和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1卷1968年柏林版序言》第LVII—LX页、第2卷第2—5页）。——677。

- 189 这次宴会遭到了反革命日益猖狂迫害的科伦工人联合会的最后一次公开活动。6月27日，它出版了最后一号会刊。尽管如此，联合会（这时由彼得·格尔哈德·勒泽尔领导）善于继续进行广泛活动。1849年7月，它改名为工人读书协会，秋天又更名为工人教育协会；1850年秋天，它最终被查禁。——678。

- 190 关于这个计划，马克思在1849年8月1日左右给魏德迈的信中写道：

“现在请你告诉我，用什么办法可以把小册子发行出去？”

“我想从论工资的小册子着手——《新莱茵报》只刊登了它的开头一部分。我要给这本小册子写一篇关于目前情况的政治性短序。”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530页）——682。

- 191 彼得·格尔哈德·勒泽尔在1852年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法庭调查和审讯中表现得很坚定，当一名刑事在押犯以间谍身分同他取得联系后，他在1853年底，即要塞监禁期间表示愿意详细招供。他希望获得释放，并趁此机会移居美国，但政府当局没有同意，相反，勒泽尔夫人却每月得到15塔勒的救济。他后来的请求也遭到了拒绝。当局进行审讯时采取了极其严密的安全措施。勒泽尔原先和弗里德里希·列斯纳一起被关押在格劳登茨要塞，后来被极端秘密地押送到柏林的莫阿比特监狱，在那里接受了第一次详细审讯；最后他被解到什切青要塞。同时，共产党人案件的其他在押犯也被转移到了别的要塞。勒泽尔到了什切青后又继续接受审讯。

从他的大量供词中可以看出，他一方面还竭力掩护自己的同伴以及其他盟员，因此，他在许多方面干脆作了伪供。这样一来，警察当局未能从他的供词中得到有价值的东西。但另一方面，勒泽尔也供出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情况。由于勒泽尔的供述是值得怀疑的，模棱两可的，因而也是不可靠的，甚至是伪造的，骗人的。然而，这些供词也提供了一些有关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情况的有意义的证明，而

有关这些情况，以前很少或者根本没有文字记载。阿泽尔的供词只有较小一部分涉及1849—1848年革命期间发生的事件，本卷刊印的就是这一部分，刊印时未作详细分析，但凡有明显不一致的地方都在脚注中作了说明。他的大部分供词所涉及的都是革命后的事件，因此将在本书第2卷刊出。——683。

- 192 流亡者同盟章程，明显地表现出这个秘密组织的密谋性质和非民主性质。在这方面，最为明显的是，它有两个章程：一个是中层和上层组织的章程，即所谓的山岭或营地章程；另一个是基层组织的章程，即所谓的一般章程，也称茅舍或帐篷章程。同盟原先是自上而下划分的：民族茅舍、高等法院、山岭、茅舍。同盟刚成立时，似乎还没有“茅舍”这一级最低组织。1835年，组织名称改为：中心、总营地、营地、帐篷。尽管如此，章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沿用了旧的组织名称，因此它们被普遍认为是山岭章程。

本卷刊印的是章程的较晚的一个版本，即1840年的版本。这个版本，正如预审机关所确认的那样，在内容上同早在1836年就已落入当局之手的一个石印本“完全一致”（参看列弗·伊尔泽《政治调查的经过……》1860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460页）。这个章程的较早的文本也像正义者同盟章程一样，前面还有一个编者按，其行文如下：

“下面的章程作为历史文献很重要。它是在施泰因大臣的文件中发现的，看来它或者是该同盟本身的章程，或者是寄给施泰因先生的同盟法草案。不管它是属于哪一种，本刊暂且予以发表，以给读者。

编者”

本卷刊印的1840年文本中，在组织名称方面很不统一。原件上有如下更正：

“又及：

“（1）凡出现H.H.（茅舍）的地方，均为Z.Z.（帐篷）。

“（2）凡出现B.B.（山岭）的地方，均为L.L.（营地）。

“（3）凡出现D.D.（高等法院）的地方，均为K.L.（总营地）。

“（4）凡出现N.H.（民族茅舍）的地方，均为B.P.（中心）。”

这里显然指的是一个按照老文本印刷的版本，所以指出新的组织名称是必要的。由此看来，这个版本最初使用的也是旧的组织名称，后来才用新的组织名称取而代之，而文中却未说明其理由。本次刊印时统一使用了新的组织名称，并在脚注中指出了在原文中更换名称的地方。章程原来的文本没有分段，在本卷中则分了段。此外，在原来的文本中，为了保密起见，组织名称全部是缩写，本卷刊印时，凡是能明确补齐的地方，全部补齐了，但未作说明。——691。

- 193 原件上的E. B. M. und B. R. 是指1834年在巴黎出版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再版于沃尔弗冈·席德尔《德国工人运动的开端》1963年斯图加特版第316—319页。这个宣言在流亡者同盟中传播甚广，被多次翻印，并被视为同盟的纲领性文件。后来的正义者同盟章程第3条也提到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阐述的原则”（参看文件5）。《宣言》的原文，沙·戴斯特把它收入了自己的著作《共和国的宪法草案和早期人权社的原则声明》1833年巴黎版。30年代初，戴斯特是人权社成员，受到了巴贝夫思想的深刻影响。关于戴斯特及其著作，参看沃尔金《法国空想社会主义》1960年莫斯科版第131—135页。——691。
- 194 流亡者同盟的所谓一般章程，是为基层组织即“帐篷”（原先为“茅舍”）制定的，因而也叫“帐篷”章程，反之便是“营地”或“山岭”章程。本卷所用的原件产生于1838年。1840—1841年，德国当局在调查时没收了这个章程，当时发现了两个不同的稿本，其中之一（A稿），是1838年按照一个从巴黎寄来的小册子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翻印的。1838年底，有人根据布龙的建议（他作了一些修改），在法兰克福出了章程的第2版（B稿），是分两栏印在一页纸上的。1840年，在各地被没收的许多份章程就是这个本稿（弗·伊尔泽《政治调查的经过……》第565—570页）。由于A稿的原文没有保存下来，所以本卷是按B稿刊印的。但同时也参考了调查报告和伊尔泽转述的报道（同上，第453、461—462页）中一些有关异文的说明，以致在一些地方能再现A稿的原文。有出入的地方以及再现A稿的界限，均在脚注中作了说明。同时补齐了原件中所有组织名称的缩写。——699。

- 195 这个宣传小册子是1834年春流亡者同盟成立时出版的，是同盟的最重要的纲领性文献，在往后的几年中，在该组织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705。
- 196 这个宣传小册子于1834年春在巴黎出版，是流亡者同盟的纲领性文献之一。它的最后一部分论述了民主力量的组成，并总结了阐述流亡者同盟计划的各种组织性建议。本卷刊印的摘录，就是从这个小册子的最后一部分摘出的一些组织性建议。——707。